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

The End of
the Western World and the Birth of
a New Global Order

大国雄心

一个永不褪色的大国梦

剖析中国文化思想底蕴，把脉中国模式深厚根基
引领世界、重拾大国梦想，中国新纪元已经开启

［英］马丁·雅克◎著
孙豫宁 张莉 刘曲◎译



Martin Jacques

中信出版集团 · CHINA CITIC PRESS

版权信息

书名:大国雄心

作者:[英]马丁·雅克

译者:孙豫宁,张莉,刘曲

ISBN:9787508657806

中信出版集团制作发行

大其心，容天下之物；

虚其心，受天下之善；

平其心，论天下之事；

潜其心，观天下之理；

定其心，应天下之变。

献给哈里

我对你的爱恋，天长地久

我对你的思念，无以言表

献给拉维

哈里给我的最好的礼物，我做一切的动力

专家热议

吴建民

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副会长，欧洲科学院院士、副院长

2009年是世界大反思的一年，马丁·雅克所撰写的这本书也是世界大反思的反映。20年前，当柏林墙倒塌的时候，西方一些人欣喜若狂，以为“历史终结”了，西方可以“稳坐天下”了，全世界都得按照“华盛顿共识”办。然而，世界的发展和变化与他们所预言的不一样，中国就是一个很突出的例子。马丁·雅克经过多年的研究和思考，写出的这本书，对中国人今天所走的这条路有独到看法，很值得一读。它会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当今世界和我们自己。

阎学通

著名国际关系学者，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

马丁·雅克是第一个研究中国崛起的思想影响的学者。他这本《大国雄心》的历史厚重性和未来前瞻性超越了我所读过的有关中国崛起的所有著作。本书暗示人们，中国崛起的结果将不是中国越来越像西方，而可能是世界越来越像中国。想展望世界未来的人需要读这本书。

时殷弘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美国研究中心主任

马丁·雅克观察亚洲问题的学识、视角和阅历在这本书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它给真正想要了解中国以及预测未来几十

年内世界大趋势的读者提供了非常宝贵的帮助。他创造的极其令人信服的核心理论是：在一个充满“现代性竞争”的新时代里，不论中国正在实现现代化，还是已经实现了现代化，它都会保持自己独有的特色。

余永定

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为什么中国会是这样？它将会走向何方？这是两个永恒的问题。我赞成马丁·雅克的“文化是理解中国关键”的观点。毫无疑问，这是我曾经读过的最优秀、最严谨的研究中国的作品之一——可以说是精彩绝伦的一部作品。

马凯硕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

这本书不仅限于阐述中国的崛起，它还揭示出中国的崛起对于世界新秩序和全球公众的生活方式所带来的很多重大影响。马丁·雅克对这个问题的看法相当成熟，这部富有前瞻性的著作非常有助于我们看清未来世界的发展趋势。

尼尔·弗格森

哈佛大学历史系及金融学系的特聘教授

中国的崛起是当今世界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经济和地缘政治的重大变化，没有哪一位英国学者能够像马丁·雅克那样，对此既投入深层次的思考，又给出极富启发性的分析。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享誉全球、备受推崇的近代史研究大师

这是一部非常重要的书，思维缜密，历史和现实感非常强。它不仅阐述了中国的崛起，还阐述了21世纪将不再是由西方发达国家塑造。我想这部书一定会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

约翰·格雷

英国政治哲学家

任何发展中国家都不能摆脱西方模式的说法，令我们难以认清当前世界重组的局势。当中国逐渐强大，它会愈加肯定其古代文明延续下来的价值观；它会在历史中寻觅智慧，以创造出一种现代化的新模式。

新版序

从邓小平时代到习近平时代

——致中国读者

本书的第1版于2010年1月在中国出版。虽然距今仅仅过去了6年的时间，但就很多重要的方面而言，却已经是完全不同的时代。自1978年改革开放伊始，中国就一直致力于两方面的要务：发展经济和消除贫困。其他所有目标都是从属于这两个目标。中国外交政策的目标也一直是韬光养晦、避免不必要的冲突。为此，中国寻求与美国保持相对友善的关系，因为中国能否为国际体系所接受的关键正在于美国。这一路径可以被称为“邓小平式的实用主义”。至2010年，这些目标在很大程度上都已经实现。但2012年习近平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之后，对中国的战略方向进行了调整，设定了新目标，开始了新征程。

本书从两个最为重要的方面对相关发展进行了预测。第一，中国将继续坚守其有别于其他大多数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的根本特征，即文明国家而非民族国家的本质、政府与社会之间的独特关系以及其与东亚邻国之间历史悠久的朝贡体系关系等。西方一直认为（直至今日很大程度上仍是如此），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深入，中国将必然走向西方化，最终演变成西方式的社会。换而言之，随着现代化的深入，中国与西方的区别将自然而然地消逝。这些所谓的“特征”只是中国落后的表现，中国沿着西方启蒙道路前行，必然会导致这些特征的消逝。邓小平时代，中国举全国之力致力于现代化进程，同时避免

与西方发生不必要的冲突，因此也就自然而然地对这些差异进行了淡化。由此，我产生了第二点思考。已故的美国汉学家、政治学家白鲁恂（Lucian Pye）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是裹着民族国家外衣的文明国家”，在19世纪末，受困于自身的积贫积弱而不得不接受当时欧洲的规范。对于中国与世界其他大部分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的截然不同，白鲁恂坚信不疑。与此同时，他又提出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即随着中国摆脱贫弱的状态重新实现富强，不必仰人鼻息，届时将会怎样？在邓小平时代，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对于这一问题我们无须过多考虑，但现在它却又回到我们的视线之内。实际上，这一问题也是笔者在本书着墨最多的部分。

在邓小平时代，中国全身心地投入到消除贫困、实现富强之中，因此在忽视了历史的同时，也忽视了未来。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每个国家都生活在历史的影子里：这一点毫不奇怪，所谓的当下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瞬，无不是过去积累、发展的结果。中国的历史感与历史意识可能远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更为深厚。历史对于中国有着巨大的影响。之所以如此，原因有很多，但其中最为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中国有史以来一直都是十分成功的文明，这也是中国人强烈的自豪感与认同的持续来源之一。

邓小平时代（即1978~2012年）最为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对当下的关注。在实现现代化和摆脱贫困的巨大压力之下，中国人的思想被整合，聚焦同一个目标：既不是沉迷于过去，也不是妄想未来，而是集中全力关注当下。迫于当下不容辩驳的要求，历史不得不屈居于次要地位，这一点在中国可谓非同寻常。邓小平时代，历史被视为掣肘现代化这一要务的困扰，是警醒人民辉煌的过去与一度饱受贫穷、困境、弱小困扰的当下之间巨大反差的警钟。换而言之，历史是一面令当下自惭形秽的镜子。然而，到2012年，受益于邓小平时代的辉煌成就，中国的位置已经发生了改变。中国得以再一次接受历史，拥抱历史。不仅如此，中国还需要再一次对中央王国的历史进行探究，以为

其未来的发展提供启发与指南。因此，相较于邓小平时代，习近平时代的标志之一就是历史转向。

与此同时，面向未来也成为习近平时代的特征之一。这一点在习近平所提出的“中国梦”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在邓小平时代，梦想未来并非为人所乐见。历史与未来都只能令人分心，现在才是一切：现代化的势在必行要求中国集中全部的资源与精力。梦想是一种奢侈，容易让人分散对中国所面临的历史性任务的关注。然而，中国现在的情况却截然不同。目前，已经有7亿中国民众摆脱了贫困，尽管其生活水平仍只是一般，但相比于前已得到了极大的改善。过去的中国相对贫困，现在却日渐富强。此前的中国生活在历史的阴影之中，现在的中国却越发自信、乐观。因此，中国能够做得起梦：不只于此，中国还需要有梦想，因为其必须要设想并构建出一个全新的未来。

从邓小平时代到我所称之为的习近平时代的转变，绝非仅仅是经济范畴那么简单，尽管迄今为止经济一直是中国改革的主题（我个人认为在未来经济议题的重要性将不断减弱）。当然，邓小平模式本身就具有多维度的特征：出口导向型和劳动密集型的经济政策、计划生育政策、韬光养晦的外交政策以及对政府进行改革和重新定位等。但中国所面临的、紧迫的经济要务不可避免地、或多或少地决定了其他一切问题。

同样，习近平模式也具有多维度的特征，但其构成却与邓小平模式截然不同，也更为复杂。当然，必要的经济改革同样被置于突出的地位：从出口驱动向内需驱动转变、实现劳动生产率和资本生产率的大幅提升、扩大服务业所占比重、发展金融业、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地位。此外，我们已经见证了计划生育政策的改革，而在不久的将来还将见证户籍制度的改革、对环境保护的注重、社会保障支出的大幅增加以及医疗服务投入和水平的提升。按照中国的设想，至2020年，中国将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到21世纪中叶，“中国梦”将会得以

实现。当然，“中国梦”并非只有经济一个维度，并非是只实现富裕那么简单。与其他所有的梦想一样，“中国梦”是对生活多方面的设想。当一个人饥寒交迫的时候，经济条件的改善就是一切；而当其变得富有之后，其他方面的考量与需求就会变得更为重要。“中国梦”的雄心所展示出的自信令人震惊，对以谨慎和持重著称的中国领导人、中华文明和中国来说，尤为如此。

当然，梦想有很多种。每个民族都可以有自己的梦想，我们每个人同样也可以有自己的梦想。“中国梦”既是中华民族的梦想，也同样是13亿中国人的个人梦想。“中国梦”强调了民族的重要性，但与此同时也表明了在中国，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截然不同。“中国梦”的理念，明确赋予了个人权利，鼓励每一个民众不仅要敢于构想国家的未来，同样也可以构想自己的未来。实际上，中国城镇里的年轻人已经明显展示出乐观主义精神和对未来的憧憬，开始为自己的梦想奋斗。在未来的几十年里，中国民众将经历一场全方位的巨大变革，将展现出与现在截然不同的特征：更为富有、健康，更为国际化、富有全球视野，更能体会他者的感受，更加自信，教育程度更高，思维更加开阔，更为重视环保。

尽管如此，就总体而言，“中国梦”仍是一个关于中国的梦，是关于民族的梦，是追求化茧成蝶的梦。正如习近平所指出，“中国梦”就是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最大的梦想。对此应如何理解呢？这一方面无疑表明了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方面将出现重大变革。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意义绝不仅限于国家层面。中国在唐、宋时期的成就之所以得到举世公认，是因为就同期的国际标准而言，其处于遥遥领先的状态。因此，作为拥有世界1/5人口的中华民族，其“伟大复兴”理应具有同等重要的国际内涵，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尤为如此。“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已经并将继续产生显著的全球效应，它将改变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也是“中

国梦”应有之义。实际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正是“中国梦”中最为大胆的一部分。

我们不妨以中国近现代史为背景对此进行考量。当我在2005~2008年间写作此书时，当时从历史背景出发对中国的未来进行思考还属凤毛麟角，我不禁为之震惊。现实的迫切需要使此种思考变成了当时中国难以承受的奢侈。因此，习近平认为，中国应该再次具有历史的视野，当下思考问题时必须具有历史的维度，必须在历史的背景下对当下进行考量（不仅局限于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还应有更为广阔的外延）。这一观点与立场成为邓小平时代告一段落的显著特征。

就此而言，19世纪末这一历史转折点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其象征着中国急剧衰落的开始，这一时期发生的事情不仅损害了国家的统一和领土主权完整，还导致中国的国际地位显著下降。然而，正如我在前文所述，现在中国已经不再积贫积弱，恰恰相反，随着时间的流逝，中国变得越发强大。很明显，中国正处于崛起之中，其心态已经从低调的平静变为越发的自信。白鲁恂所描述的中国的贫弱最终走向了终结。关于白鲁恂所提出的两个问题，中国目前还远不能提供一个明确的答案。但在衰落了百余年并将白鲁恂的问题丢入故纸堆之后，中国现在第一次开始对其进行探究。这两个问题再次出现在了人们的视线之内。我们不妨再加深一下对此的印象，白鲁恂所提出的两个问题是：一、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国家而非民族国家具有何种意义？二、如果中国不再因积贫积弱而被迫接受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而是有能力根据自身的需求、价值观、特征与历史对国际体系进行改造与形塑，那将会怎样？

在本书中，笔者认为中国如何看待未来其与世界的关系（实际上也是如何看待现代的自我），将受到其自身历史的巨大影响：这一观点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可以说是放之四海而皆准，但对于中国来说尤为

如此。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那样与历史的关系如此密切、受历史的影响如此之大。“中国梦”的相关表述将允许并鼓励中国民众以全新的方式探讨中国历史与未来之间的关系。与邓小平时代不同，当代的中国在对未来进行探讨时，历史将再次变得极为重要。但历史并非唯一的决定性因素，中国日益发展的现代性对中国未来的影响至少也同等重要。当然，二者截然不同。可以说，中国现代性的步伐与发展是如此与众不同，以至于中国一直处于不断变革之中。中国文化就是典型的例证之一。中国文化对于民众对国家及民族的认同可谓极为重要，但现在也处于明显的变革之中。当然，与此同时，相较于100多年前，世界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因此，认为中国将会以朝贡体系的角度来看待其与东亚的关系，也有一定的道理。但若就此认为未来的东亚秩序将是朝贡体系的简单再现，就是无知：问题的关键在于历史经验将会以何种方式、在多大程度上对东亚产生影响。

200多年以来，世界一直为西方所主导。现在，这一时代明显走向了终结。西方化的高潮已经远去。迄今为止，很多人都认为西方的行为方式（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都是规范性的，假以时日必将为世界所接受。然而实际上，这只是西方对非西方世界的要求与期待：在西方人的眼中，这是衡量其他国家发展程度以及国际接受度的标准之一。就政治方面而言，这种心态和压力体现得最为明显、持续。西方认为，西式民主将是决定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最终标准。

但随着西方的衰落和西方霸权开始受到日益明显的挑战，事情将发生怎样的改变？西方的治理模式很可能无法继续享有现在这般的权威与影响力。具体原因如下：一方面，自2007~2008年西方金融危机以来，西方统治精英的权威已经明显处于衰落之中，而且这种衰落趋势越发明显。这在欧洲体现得尤为突出，而尽管美国的表现形式并不如欧洲般剧烈，但也同样明显。对统治精英支持的下降同样也会动摇对治理机制的尊重，这不足为奇。当然，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因为西方国家也将不得不去主动适应一个更具竞争性的世界以及自身优势

地位的不再。所谓的“紧缩”将成为这一状态的代名词，“长期停滞”这一概念实际上也暗示了未来的希望渺茫。

另一方面，随着西方的衰落，其价值理念、体制机制、秩序安排的国际影响也将随之丧失主导地位。其他国家对西方规范、方法和机制的接受程度也会随之降低，因为西方世界已经无法享有此前的意识形态和文化的影响力与优势。此外，当美国位居经济霸主之时，庞大的经济实力是其相对其他国家的一个有力的杠杆，虽然现在仍是如此，但其经济实力却明显处于衰落之中。

实际上，我们已经开始见证这两个趋势所带来的冲击：尽管我们不应夸大其词，但其迹象已经十分明显。除了西方治理的困境日益显现之外，世界对中国治理模式的兴趣也与日俱增。这既是中国改革的结果，同时也是中国对世界影响日增的产物。关于治理这一话题辩论中出现的微妙变化，正是其例证之一。此前世界关于治理的争论一直是由西式的民主理念所主导，即应该如何选择政府。但现在争论的焦点却日益集中在治理能力之上，这也是中国理念的关注和特点所在。

西式民主影响与中式治理理念的此消彼长，无疑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世界对此种影响的感知程度却并不相同，相较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感触将更为深刻。当然，这一过程也将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不仅仅限于中国推动政治改革的能力（政治改革无疑将提升其对其他国家的吸引力）。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反腐运动的成败，当前腐败已经影响到了中国现有政治体制的正常运行和共产党的地位与作用。其他的主要影响因素还包括西方衰落的速度以及当前西方危机的持续性和严重程度。

我们不妨以欧洲为例对此进行分析。欧洲的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其正面临多重的危机：长期的经济停滞、欧元运转不力、欧盟成员国之间的新矛盾、对欧盟当前形态持续性的不确定、全球化背景下中东和非洲国家经济失败所引发的移民浪潮、中东地区欧洲后殖民秩

序的衰态初显、不少欧洲国家处理种族多样性不力等。欧洲的危险在于衰败、崩溃、冲突、压制所引发的恶性循环，这一危险并非空穴来风，而是真实存在的。欧洲正在日益为其与中东地区前殖民地的历史关系、对其的所作所为以及后殖民地时期对其的处置不当所困。此外，根据过去10余年的经验来看，欧洲就相关问题能提供的解决方案，反而会恶化、加剧相关态势。欧洲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对个人自由的越发限制、社会环境的日趋严苛、国家政权的侵略性日增，甚至出现整体的向右转。在此背景下，欧洲模式的吸引力将日渐缩小，实际上这已经是比较客气的说法了。

笔者所论述的治理发展趋势应置于更为广阔的背景下进行考量：这只是一个由中国崛起和西方衰落所引发的、范围更为广泛的全球治理变革的开端，我们将在21世纪见证这一过程。而这一进程将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如此）。

第一，中国不仅仅是一个国家，而且是一块大陆，换句话说，中国应被视为一个次全球体系。因此，在谈及全球治理的问题时，如此规模的领土范围赋予了中国特殊的意义。目前为止，这一点还很少为人所认知，每当谈及此事，人们更为关注欧盟而非中国。但中国的人口是整个欧盟的2.5倍，就过去40余年的表现而言，中国的治理模式也远比欧盟更为成功。

第二，正如上文所提及，欧洲中心主义的合法性，在中东和非洲等重要地区，正面临日益严重的危机。中东后殖民时代的政治安排以及其主观臆断的边界体系，正处于解体之中，在全球化时代已经遭遇了悲惨的失败。这一点不仅在中东，而且在欧洲乃至更为广阔的地区，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其是美国在中东地区霸权衰弱和欧洲后殖民主义政治安排失败的直接结果。随着中国影响的与日俱增，中国将在中东和非洲问题的解决方式的确定上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第三，中国在东亚地区和欧亚大陆影响（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助力下）的与日俱增，将催生全新的治理模式，包括新型的超国家机制。亚投行就是例证之一，当然这还仅仅是一个开始。实际上，中国驱动的全球化进程将成为全球化的主要模式和新型多边治理机制的摇篮，这一态势将越发凸显。就此而言，“一带一路”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计划，将产生巨大的影响，其伟大前所未现。纵观历史，与其最为相近的可能要算“二战”后美国实行的“马歇尔计划”。“马歇尔计划”的目的在于重建欧洲、巩固以北大西洋为中心的全球经济、建立与苏东集团对抗的北约同盟体系。当然，“一带一路”倡议的目的与“马歇尔计划”截然不同。我们必须要强调的是，“一带一路”对广阔的欧亚大陆所带来的全方位影响的广度与深度都是无可比拟的。

第四，世界普遍认为现有的国际金融体系明显失灵，2007~2008年的西方金融危机以及当前世界对极有可能爆发另一场危机的担忧就是明证。其最为明显的问题在于，现有国际金融体系对于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美元过度依赖，而美国的经济总量目前只占全世界的1/5。因此，我们很难相信，在未来的20年内，现有的国际金融体系仍可以持续。我们必将见证新型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崛起，中国和人民币将发挥主要作用，假以时日，甚至将发挥最为重要的作用。在此背景下，“二战”后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的现存机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如果想继续存续并发挥作用，必须要反映全球经济的变化，即体现出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印两国日益增强的主导地位，而不是继续充当西方体系的代言人。无论其命运如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作用无疑将日渐降低，并最终被边缘化。与此同时，随着全球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和民主化，一系列全新的全球机制和多边机制也将浮出水面并占据主导地位。

这令我们最终又回到了白鲁恂所提出的问题：如果中国变得强大，世界将会怎样？答案很简单，截然不同。

前言

中国：正在改变世界

1945年以来，美国一直是世界的主导力量。即使在冷战时期，美国的经济实力也遥遥领先于苏联，经济规模是后者的两倍，军事实力和科技能力也无比强大。“二战”以后，美国是创建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等一系列多边和国际机构的主要推动者，这也表明了美国在“二战”后所拥有的全球实力和权威。随着1991年苏联的解体，美国的主要竞争对手土崩瓦解，美国在全球的主导地位进一步增强。同时，还促使前苏东地区的国家开放了市场，并在很多情况下转而寻求美国的帮助和支持。

一个国家拥有如此广泛的影响力，在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即使当年处于最鼎盛时期的大英帝国也无法与当今的美国相提并论。美元成为世界通行的货币，绝大多数贸易都以美元来结算，绝大多数国家的货币储备也都是美元。除联合国以外，美国主导了所有关键性的国际机构，其军事存在遍及世界各个角落。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似乎无懈可击。在世纪之交，人们习惯用“超级大国”或“单极”等词语来描述这一全新的、独一无二的霸权形式。

全球实力最强的接力棒在传至美国之前，一直都掌控在欧洲的手中，尤其是主要的欧洲国家，如英国、法国和德国及早先的西班牙、葡萄牙和荷兰。从18世纪末的英国工业革命开始至20世纪中叶，欧洲一直以一种影响极其深远的方式塑造着世界历史。欧洲活力的源泉就

在于工业化及其殖民征服的扩张模式。“一战”之后，欧洲的地位日益衰落，尤其是1945年之后，更是急剧下降。但不可否认的是作为新兴崛起大国的美国，实际仍是欧洲文明的产物，并充当起了旧世界和新世界之间的纽带与桥梁。这一方面使其表现出了西方世界的理念，另一方面也缓和了同英国的潜在竞争关系。200多年的时间里，全球一直都为西方所主导，首先是欧洲，后来是美国。

现在，我们正在见证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变革，尽管这一变革目前只是萌芽初现，但是它最终必将改变整个世界。在经济规模方面，发展中国家正在急速地撼动着100多年来西方发达国家（这一概念虽然随着时代不断变化，但大致上包括美国、加拿大、西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日本的主导地位。1973年，发达国家约占全球GDP（国内生产总值）的60%，而2025年，这一比例则将降至1/3左右。当然，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要想获得与发达国家同等成熟的经济和技术实力，仍需要很长的时间。但鉴于其所拥有的人口优势，以及近年来，特别是西方金融危机以来保持的经济高增长率，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已经导致了全球经济重心的转移。以下几组数据足以阐释这种经济实力对比的变化。

在经历了20余年的持续下滑之后，大宗商品价格终于在世纪之交开始回升。这正是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结果。虽然在遭遇全球经济衰退之后，这一趋势有所逆转，但短短几年的时间，大宗商品价格又重回上升势头。1970年，发达国家在全球工业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达65%，发展中国家仅占35%。2010年，发达国家在全球工业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已降至53%，发展中国家升至47%。1999年，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份额仅占38%，发达国家占62%。但2010年，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份额一跃升至66%，发达国家的份额却降至34%。中国、新加坡、韩国等东亚国家和一些大宗商品生产国，特别是盛产石油的中东国家，拥有了大量的外汇储备。这些国家把相当一部分外汇储备盈余投资于国有主权财富基金，希望在其他国

家，甚至在西方，获得投资回报。随着西方金融危机的爆发，这些主权财富基金手中所掌握的、西方金融机构所缺乏的资源，更是使其获得了全新的、强大的优势。2007年中至2008年中，卡塔尔、阿联酋、新加坡、科威特、韩国等国的主权财富基金向美国的银行注资数十亿美元之巨。2008年9月，华尔街几家大型金融机构的倒闭，加剧了世界经济重心从西方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态势。一些身处困境的金融巨头转而向主权财富基金寻求支持，同时美国政府也在极力挽救住房抵押贷款巨头房地美和房利美。此举的一部分原因也是为了消除中国等国家的疑虑，这些国家向房地美和房利美投入了巨额资金。一旦中国撤资，可以预见的必然是美元的大幅贬值。

金融危机生动地体现了东亚国家与美国之间的不同，前者资金富足、多年盈余，而后者资金短缺、连年赤字。尽管人们普遍将此次危机称为全球金融危机，但并不恰当。就总体而言，此次危机实际上是西方的金融危机。美国、日本、法国、英国和意大利等国在金融危机的泥沼里举步维艰（德国可视为例外）；各国的银行仍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经济深陷债务泥潭。直至2010年秋，各国GDP仍低于危机前的水平，经济增长率较过去最高下降了10%。与此同时，中国经济仍保持了强势增长，其银行业仍保持了强劲的收支平衡态势。东亚地区除日本外，均很快从西方出口市场萎缩的困扰中摆脱出来。印度与拉美也很快恢复了经济增长。可以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境遇截然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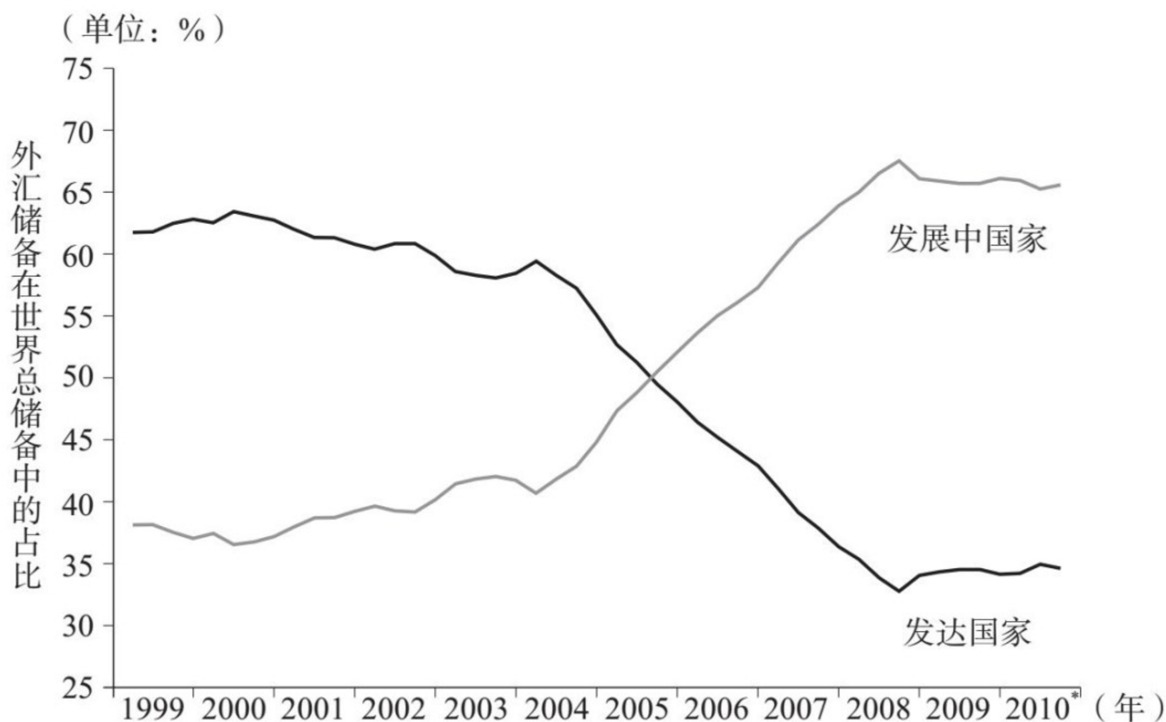


图1 东方的储蓄及西方的负债

注：* 2010年第三季度的初步
数据数据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如图4所示，根据高盛在2007年做出的预测，2025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大体上将与美国并驾齐驱，印度也将成为世界第4大经济体。高盛进一步预测，到2050年，中国、美国和印度将成为全世界最大的三个经济体，中国的经济总量将是美国的两倍，印度的经济总量将与美国不相上下。巴西、墨西哥、俄罗斯和印度尼西亚则紧随其后。只有两个欧洲国家忝列全球十大经济体之位，即英国和德国，分别居第九位和第十位。在当前的G7国家集团中，只有4个成员位居前十。普华永道也做出了类似的预测，认为到2050年，巴西的经济总量将超过日本，而俄罗斯、墨西哥和印度尼西亚等经济体也将超过德国、法国和英国。如果这些预测或类似的预言成真，那么在未来的40年里，世界将会呈现出一幅完全不同于当前的景象。当然，这些预测都只是基于过去的发展态势所作出的，虽然其中也包含了对未来的若干假设，如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将会下降，经济也会越发成熟等。未来，

也不会仅仅是过去的延续。但我们必须认识到，这并不意味着类似的预测仅仅是危言耸听，即吹捧发展中国家增长的同时夸大发达国家的衰弱。恰恰相反，这些预测都是在金融危机之前做出的，在笔者下笔之际，已经远远低估了世界经济重心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态势，金融危机的爆发更是加速了这一进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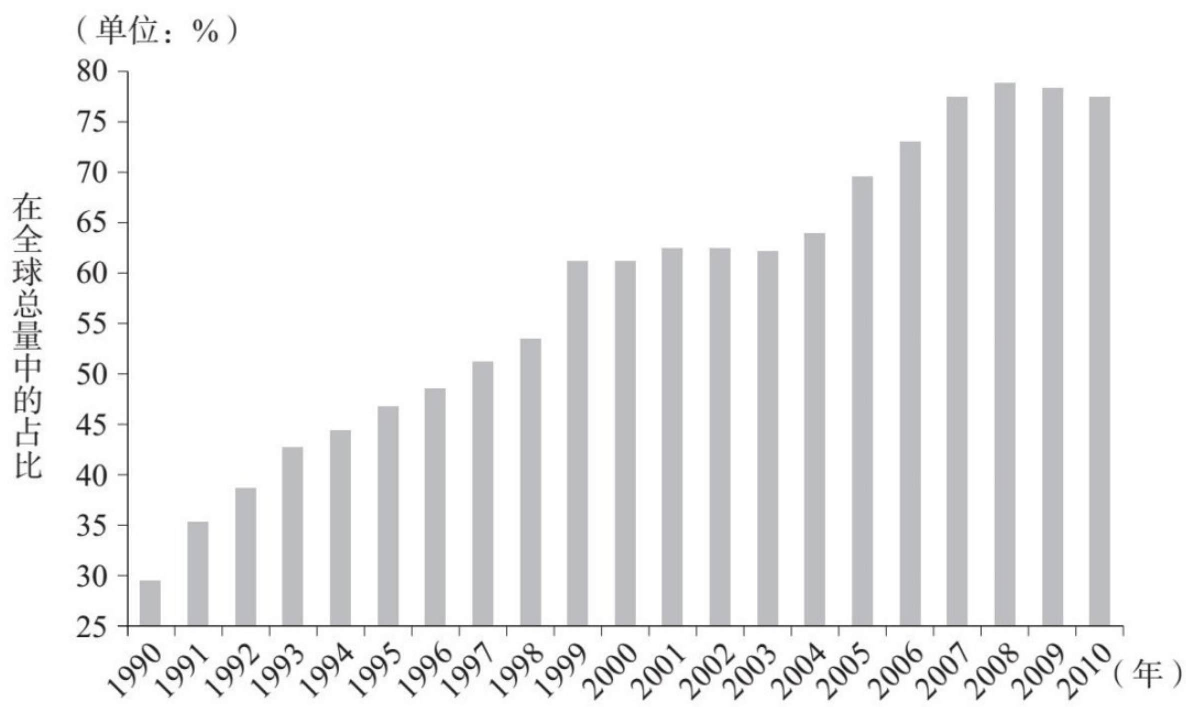


图2 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国际储备中所占份额

数据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截至2010年9月30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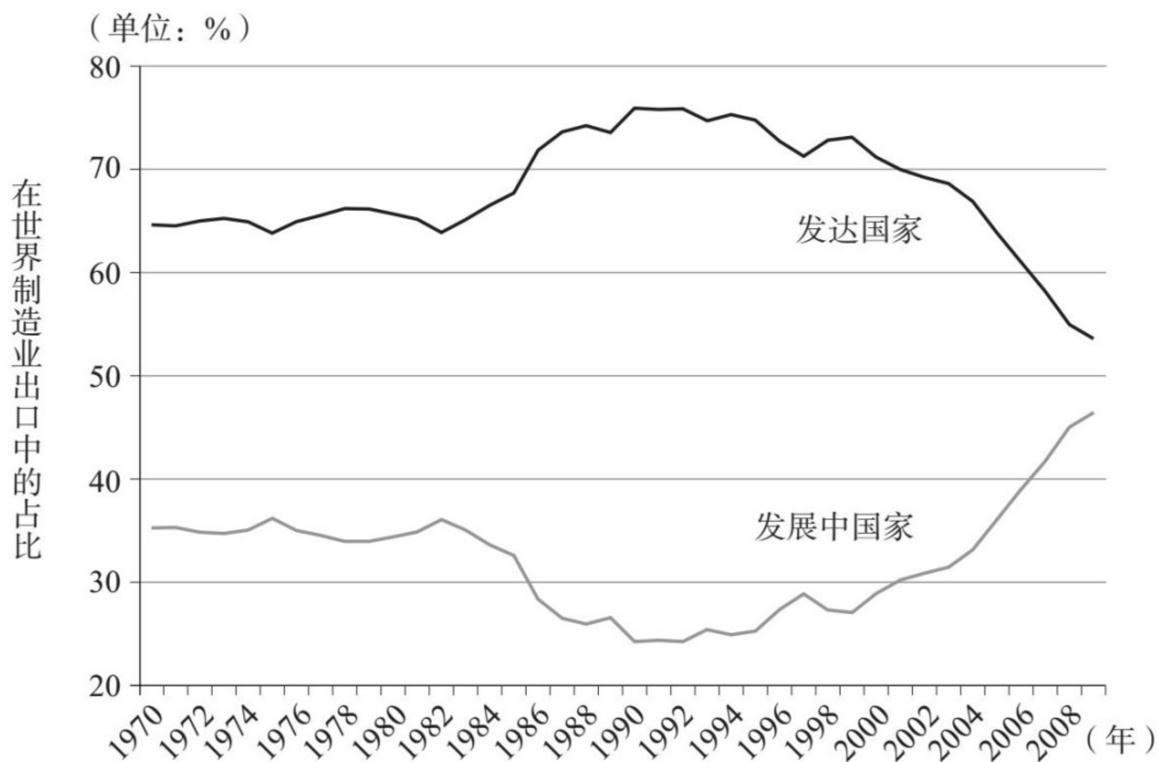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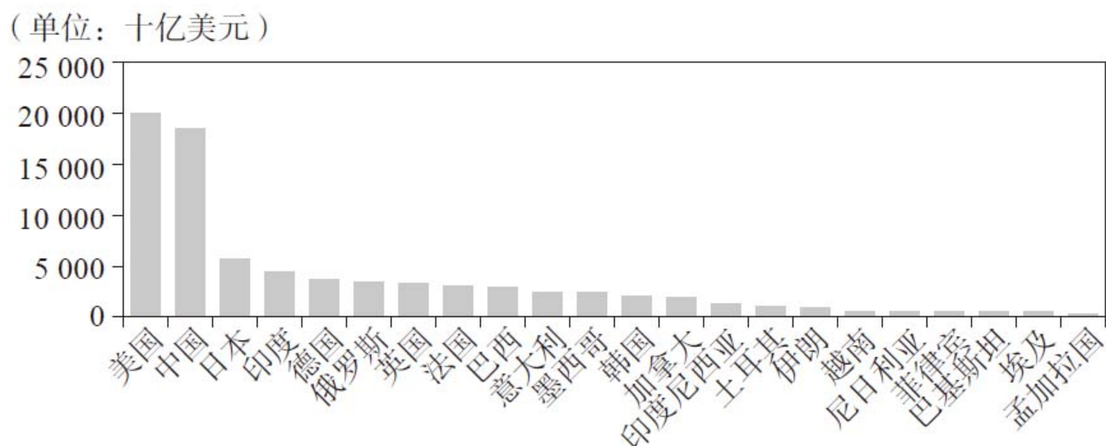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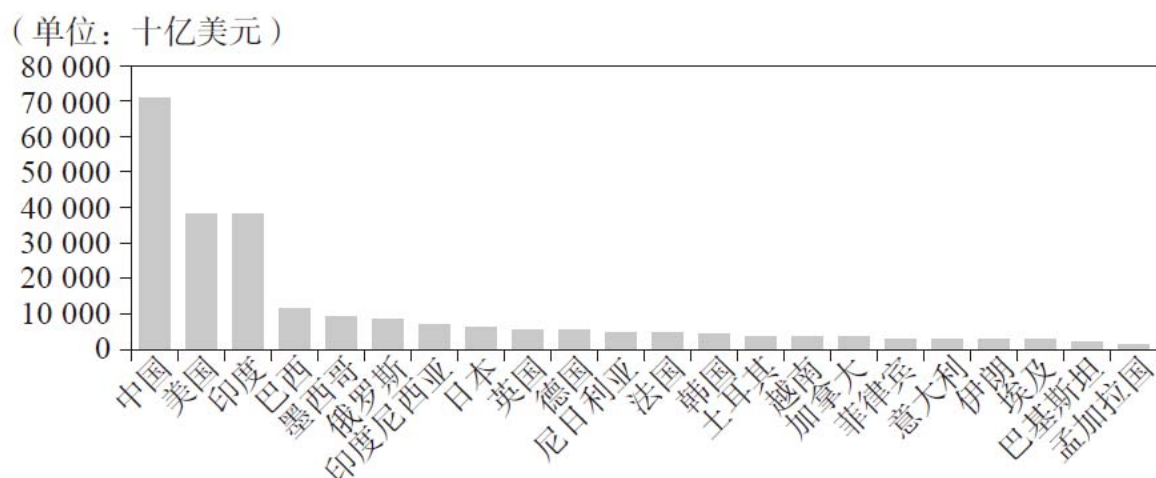


图3 世界制造业的国际性转移

数据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截至2009年12月31日



对 2025 年国民经济规模的预测（以 2006 年的 GDP 为基准）



对 2050 年国民经济规模的预测（以 2006 年的 GDP 为基准）

图4 国家经济规模的预测

数据来源：高盛集团，2007年数据

这样一个变革的世界，与人们在2001年时的设想大相径庭。“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美国不仅自认为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而且还试图在世界扮演起一种能与其全球影响力相匹配的新角色。1997年，迪克·切尼（Dick Cheney）、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保罗·沃尔福威茨（Paul Wolfowitz）等人创建了著名的新保守主义智库“新美国世纪计划”（Project for the New American Century，简称PNAC）。该智库的原则声明阐述了全新的美国外交指导原则，为小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奠定了基础：

> 20世纪即将结束之际，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在领导西方赢得冷战之后，美国又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在过去几十年来所取得的成就的基础上，美国是否具有继续驰骋纵横的远见？美国是否有决心塑造一个遵守美国原则、维护美国利益的新世纪？

2004年，极具影响力的新保守主义者查尔斯·克劳萨默（Charles Krauthammer）则写道：

1991年12月26日，伴随着苏联解体，一个全新的世界诞生了：一个由单一超级大国主导的单极世界，其决定性的影响力遍及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这是人类历史自罗马帝国衰落以来的从未有过的大变局。

在十几年前新世纪到来之际，国际社会都深深地意识到并相信未来的世界将是美国一超独大。新保守主义者喜欢从苏联解体、美国拥有举世无双的军事优势的角度来解释世界，而非上文所提及的经济多极化的发展视角，对其重要性只是轻描淡写，甚至视而不见。“新美国世纪计划”所确定的新准则，着重强调了美国应保持相对于其他国家的巨大军事优势以遏制潜在对手，强调美国应当寻求自身利益而非受盟友或国际条约的限制。在后冷战时代，美国的军费开支几乎相当于世界其他所有国家军费开支的总和（见图5），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个国家对其他所有国家存在如此巨大的军事优势。与前几届政府相比，小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反恐战争成为首要任务，美国与西欧盟友的关系退居次要位置，国家主权原则被侵犯、坚持要求他国政权更迭。入侵伊拉克，将小布什政府的相关政策推向了顶峰。但是，美国并没有如自己所愿主导和重塑全球事务，而是很快就发现自己陷入了伊拉克战争的泥潭，国际社会的支持率也下滑至1945年以来的最低点。事实证明，压倒性的军事实力在伊拉克并未取得预想中的效果，相反还损害了美国1945年以后慢慢积累起来的“软实力”——约瑟夫·奈（Joseph Nye）将软实力定义为一个国家的文化、政治理念和政策的吸引力。小布什政府未能领会深层次经济变革的意义，误判了伊拉克局势，过高地估计了自身的实力，采取了不恰当的行动。其制定的外交政策只能取得适得其反的效果：不仅没有提高，反而严重削弱了美国的全球地位。新保守主义的观点是对历史的一种灾难性误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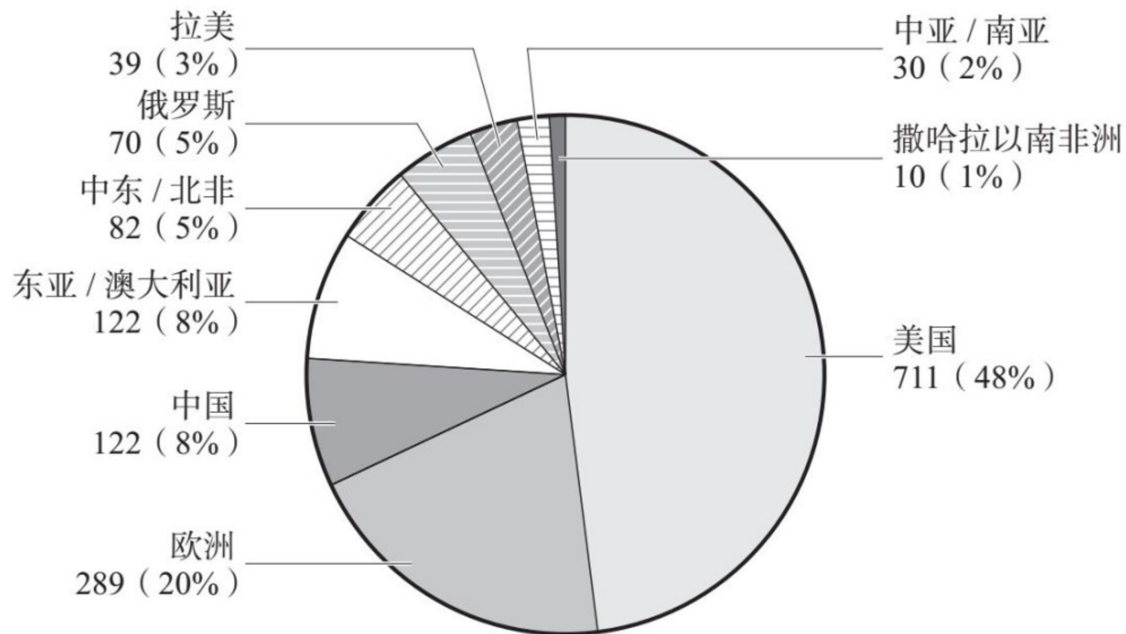


图5 2008年全球军费开支的分布状况（单位：十亿美元）

数据来源：美国军控与不扩散研究中心

军事和政治实力都必须以经济实力为基础。正如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在《大国的兴衰》[注]（*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一书中所说，一个国家行使和保持全球霸权的能力，最终取决于它的生产力。美国之所以拥有当前超级大国的地位，正是其1870~1950年间经济快速增长和20世纪下半叶成为世界上最大、最具活力经济体的结果。正是以强大的经济实力为基础，美国自1945年起才拥有了令人惊叹的政治、文化和军事实力。根据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的统计，1870年，美国占全球GDP的8.8%。此后，美国经济保持了高速增长，占全球GDP的比重在1913年升至18.9%，1950年升至27.3%。随后，美国经济出现了缓慢的下降，占全球GDP的比重在1973年降至22.1%，现在则保持在20%左右。鉴于美国人口只占世界总人口的4.6%，这一比例仍然相当可观，但是其长远趋势却已显而易见。人们很容易将美国与1850~1914年间维多利亚时代的不列颠帝国联系起来。当时英国率先完成了工业革命，所以享有了领先于其他所有国家的巨大经济优势。但与1944年美国经济达到顶峰时

约占世界GDP的35%的比重相比（虽然当时世界深受战争的蹂躏），英国即使在1899年经济状况最好时，占世界GDP的比重也还不到9%。“二战”之后，随着经济地位的下降，英国作为曾称雄半个世纪的世界大国的地位也急剧下降。1998年英国经济占世界GDP的比重仅为约3.3%。即使英国追随美国征战伊拉克，它能做出的军事贡献也是微不足道的。要称霸全球，打造一个正式或非正式的帝国，前提条件就是雄厚的经济实力。至少从长远来看，这是一个客观的尺度。尽管如此，那些江河日下的霸主似乎总是对此视而不见。1918年后英国如此，从小布什政府的所作所为来看，美国恐怕亦将如此，而且错误的性质可能更严重。很明显，小布什政府没能看清形势，没有看到美国正在走向衰落、在世界舞台上的权力正在大大缩水的事实，而是一厢情愿地认为在一个新美国世纪，美国将会主导整个世界。直至金融危机的爆发，美国的一些精英（尽管数量不断增长，但仍处于少数地位）才意识到美国可能处于衰退之中。2010年1月，在针对美国民主和共和两党的精英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中，有24%的民主党精英和28%的共和党精英赞同2008年的金融危机标志着美国世界霸主地位的结束。如果相关调查结果可信，这可能标志着华盛顿政治精英观点的重大转变。然而想要让美国精英及民众普遍相信美国衰弱以及未来美国的实力和影响力将大受影响却还远远不够。

据估测，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中花费的总预算和经济成本高达3万亿美元。即使花费如此之巨，军队还是感觉捉襟见肘、不堪重负。部署时间越来越长，重新部署的次数越来越多，长期服役的士兵越来越少，招募标准不断下降。军队失去了很多非常优秀的士兵，选择早早离开的军官也不在少数。这便是美国入侵伊拉克的高昂代价，更别提政治方面的恶劣影响了。而如果再入侵伊朗，其财政负担将会更加庞大：实际上，出于军事、经济和政治的考量，特别是考虑到其针对阿富汗开展的军事行动，小布什政府已经无力针对其他两个所谓的“邪恶轴心国家”伊朗和朝鲜开展类似的军事行动。换而言之，美国已经开始面临保罗·肯尼迪所描述的、帝国过度扩张的经典难题。美国需

要在全球维持庞大的军事存在，约800个美军基地星罗棋布地散布在世界各地，这也是导致当前巨额财政赤字的重要原因之一。2006年，美国的军费开支约占其GDP的6.5%。未来，美国将发现自己越来越难以维持这一庞大的军费开支。美国已不再是世界上主要的工业国家之一，也不再是主要的工业品出口国，其位置正逐步为东亚国家所取代。最近，美国一直处于入不敷出的境地：政府的支出超过储备，家庭也是如此。自1982年以来，美国一直处于入超的状态，仅有一年例外。这也导致了当前美国的巨额财政赤字和负债的不断累积。诚然，当前美国财政赤字是可以慢慢弥补的，但是只能通过放缓经济增长速度和降低经济活动水平的方式。直至2008年，外国机构一直担心美国的财政赤字将会导致美元的持续贬值，进而削弱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地位、侵蚀美国的金融实力。2008年，国际权威投资信用评估机构穆迪公司警告，美国若无法大幅削减政府开支，将可能丧失3A的信用评级。自1917年穆迪公司推出主权信用评级制度伊始，美国国债就被第一个赋予并一直稳坐3A宝座。这是发生在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之前。而接下来，随着美国政府拿纳税人的钱拯救金融部门，美国的债务负担再次急剧扩大。2011年4月，另一家主权信用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公司宣布将把美国长期国债信用前景展望由“稳定”调至“负面”，并警告美国有可能失去3A评级。当然，这并不表明短期内由于财政制约，美国必须削减其军事开支：实际上，鉴于军事在美国国民心目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及其长久以来在美国外交政策中所处的优先位置，削减军事开支几乎是不可能的。然而，身为“帝国”本身就是一项耗资巨大的工程。随着经济实力的持续相对下降，在未来的某一节点，美国自然无法维持这样的军事存在，也无法保持目前压倒性的军事优势。与此同时，目前有充分证据表明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正不断下降：在被其视为“后院”的拉美，美国的权威处于百余年来的最低点；在东亚地区，中国的强大使美国日益相形见绌；同样在非洲，中国的影响力已经超越了美国；由美国主导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

银行等国际机构的实力和影响迅速下滑。“二战”后美国所打造的、其占统治地位的国际秩序已经日薄西山。

一个全新的世界

我们很快就将进入一个全新的世界，但思想却依旧沉浸在旧世界之中：我们早已习惯了现在这个世界处理问题的范式与套路，从骨子里认定它们都是理所当然的，都是活生生的现实，而非变化的历史长河中的一部分。考虑到美国的全球霸权延续了几十年，西方的霸权地位更是历史悠久，这种想法不足为奇。我们习惯称当今世界是“西方的”，甚至是“美国的”，却很少设想世界是否还会呈现另外的模样。而且，在现有的、以西方理念打造的世界中，西方有很强大的既得利益，可以从中获益颇丰。霸权国家力图将自己的价值观和打造的体系灌输给附属国，后者也会因地制宜地进行调整和变革；如果后者没有做出令其满意的回应，霸权国家就会将价值观和条约强加在附属国身上，必要时甚至采用武力等极端方式。这种情况似乎是历史的必然。因此，无论从心态上还是利益上，美国乃至整个西方都很难设想或接受一个自身影响力不断削弱和缩减的世界。

以全球化为例，占主导地位的西方国家普遍认为全球化是世界其他国家日益西方化的过程，即接受自由市场、西方资本输入、私有化、法治、人权制度和民主规范的过程，并将其视为理所当然。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西方国家确实付出了很多政治努力。与此同时，自由竞争、市场和技术等因素共同作用形成的强大压力，使世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城市都呈现出融合和同质化的态势，随处可见的摩天大楼、高速公路、移动电话等就是典型例证。然而，各国不同的历史、文化也形成了强大的全球化反制力量，对本国的家庭、政府和公司等进行形塑，使其各具特色。此外，随着国家的日益繁荣昌盛，它们对自己的文化和历史更加自信，越来越不愿意效仿西方。全球化远不是一个

单向的过程，其实相当复杂：美国固然可能是最具影响力的行为体，例如能够对数轮全球贸易谈判施加很大的压力，但最大的赢家却是东亚，最大的受益者则是中国。全球化进程本身就是无休止的冲突和碰撞的过程：一方面，西方政治压力等力量使世界不断融合、趋同；另一方面，各国、各地区又不断呈现出离心化和本土化态势。

1960年之前，与世界其他的、基本上以农业为主的国家相比，西方国家和日本享有巨大的经济优势。但从那之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东亚地区的发展中国家，逐渐缩小了与西方的差距。结果，发达国家与较为成功的发展中国家之间越来越难以区分，如韩国和中国台湾目前都被视为发达地区。这就带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随着这些国家和地区逐步达到西方的发展水平，它们会变得更像西方，还是更不像西方，抑或是兼而有之呢？显然，趋同的压力将导致前者，而离心化和本土化的力量又将导致相反的趋势。以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不同主要表现在经济发展水平的巨大差异上。只有当发展中国家达到相当于西方发展水平的较低层次时，探讨趋同或分歧的问题才比较恰当。西方主流观点认为，只存在唯一一种现代化的方式，即走西方的道路，接受西方的制度、价值观、习俗和信仰，如法治、自由市场和民主等规范。此外，那些自认为比他人更加先进、更加文明的民众和文明通常都觉得，落后的国家只有按照先进国家的发展道路走，才能逐步赶上。

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越来越拥有影响力的世界来说，这场讨论的意义是深远的。如果它们最后发展成类似西方的国家，换句话说，即实现西方现代性，那么新世界将与我们早已习惯的当代世界没有什么区别，因为仅以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巴西4个国家为例，届时它们在本质上几乎与西方无异。这也正是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设想的未来。福山预言后冷战时代将建立在一种体现自由市场和民主等西方原则的全新普世主义上。如果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方式有别于、甚至迥异于西方模式，那么其主导的世界将与我们

当前仍然生活在其中的、“西方制造”的世界完全不同。正如我在第一部分的导读中所言，正是工业化进程使现代性变成了现实，而工业化的进程直到20世纪中叶仍为世界的一小部分所独享。因此，在20世纪下半叶之前，只有西方国家才具有现代性（其中日本是个特例），因为也只有这些国家实现了经济腾飞。可能有人认为，苏联模式也是一种现代化的路径。但从人均GDP、农村人口所占比例及技术水平等方面来衡量，苏联与自己声称的正好相反，它依然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此外，尽管苏联是个欧亚国家，但它却是一个传统的欧洲国家，沿袭了很多西方传统。

日本是一个特例，我将在第2章中予以探讨。“二战”之前，日本在世界舞台上扮演的角色并不太引人注目，直到19世纪70年代才开始工业化进程。但1945年以后，在经济方面，日本一跃成为西方国家的强劲对手，到20世纪80年代，更是发展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不过，日本在这一时期总是试图表明自己具备成为西方国家的特质，尽量淡化自己的政治特色和文化特性。日本在“二战”战败后一直被美国占领，直至1951年。日本的宪法是由美国制定的，无权保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因此日本的安全防护不得不依赖1951年缔结的《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即使没有沦为美国的附属国，日本的主权也受到了限制。很大程度上也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日本尽管在文化方面与西方国家存在极大的差异，但却依旧不屈不挠地试图强调自己的西方特性。

直至不久之前，除日本以外，现代世界的成员几乎全都是西方国家，包括欧洲国家、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换言之，便是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笔下的“欧洲分支”（European offshoots），即欧洲移民定居的国家以及欧洲后来征服的国家。实际上，西方现代性，或者说我们迄今为止所知道的现代性，只是人类发展历程中的很小一部分。这些现代性经验或是欧洲的，或源于欧洲，它们完全或大部分共享着同样的文化、政治、思

想、种族和民族特征。然而，西方经验的狭隘性和由此导致的非代表性，通常容易为人们所忽视。在过去的200多年里，西方国家一直处于主导地位。但随着那些拥有不同于西方文化、历史及文明遗产的国家开始了现代化进程，西方经验的狭隘性和局限性就越发明显。

在漫漫历史长河中，我们仍处于这一进程的初期。直至20世纪50年代末，第一批东亚国家和地区——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才开始了经济腾飞。70年代，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和其他一些国家才加入了这一行列，再后来是中国。一些特征曾或多或少地仅局限于东亚国家和地区——我指的是东北亚国家和地区（如日本、韩国、中国大陆及台湾和香港地区）及东南亚国家（如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和越南等），现如今已迅速扩散到其他地区和大洲，如拉丁美洲和印度次大陆。1950年，美国GDP几乎是东亚国家的3倍，所有亚洲国家的2倍。而到了2001年，美国GDP仅是亚洲的2/3，同时也远低于东亚的水平。在本书第一部分，我将详细讨论现代性的本质。我认为世界上并非仅有一种现代性的模式，我们正在见证一个丰富多样、相互竞争的现代性并存的世界的诞生。这正是21世纪全新的、独有的特征之一，我们迎来了一个我称之为“现代性竞争”的时代。

尽管我们可以看到，目前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在蓬勃发展，但到目前为止，中国才是最重要的经济体。中国是新世界的开创者和驱动力，对新世界拥有日益强大的支配权。短短十余年的时间，其影响力已经遍及东亚、中亚、南亚、拉丁美洲和非洲。中国与韩国、中国台湾等早期的亚洲新兴国家和地区截然不同，中国从来就不是美国的附庸，同时还拥有庞大的人口规模。因此，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影响，是亚洲其他新兴国家所无法比拟的。然而，直到不久之前，西方还存有一种共识，即无论是作为现代性的结果，还是作为现代性的前提条件，抑或是这两种情况的结合体，中国最终将变成一个西方式的国家。过去30多年里，美国的对华政策就是以这种信念为基调的，也为

美国加强与中国的合作、对中国的出口开放市场、赞成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及允许中国成为日益成熟的国际组织成员提供了支持。

西方主流观点认为，从根本上看，中国的崛起不会对世界产生太大的改变。这种看法基于三个关键假设：从本质来讲，中国的挑战主要表现在经济方面；中国必将成为一个典型的西方国家；随着中国融入国际社会、接受现有国际制度，现存国际体系仍然会一如既往。然而，所有的假设都是错误的。中国的崛起将会以一种影响极其深远的方式改变整个世界的面貌。

现在，全世界都能感受到中国经济崛起带来的影响，尤其是次贷危机之前许多消费品价格持续下降和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中国的人口规模是美国的4倍，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了两位数。高盛公司预测，到2027年，中国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尽管届时中国依然处于向现代经济体转变过程的相对初级阶段。这些经济预测可谓惊心动魄。然而，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假定中国的影响本质上主要表现在经济方面呢？新崛起的国家必然会凭借经济实力来追求更为远大的政治、文化和军事目标。这是成为霸权的优势之一，中国也必将成为具有统治性的力量。但是要西方国家去想象这种情形，似乎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由于占据全球支配地位的时间太久，西方国家已经用这些假设禁锢了自己的思想，已经无法做到从其他的角度去看待世界。它们习惯于用西方化的标准来衡量一个国家取得进步的程度，西方国家一直自认为是人类发展的最高峰，努力使“最西方”的特征显得名副其实，而其他国家进步与否、进步多大，就看它西方化的程度如何。政治和文化上的差异，被视为落后的代名词，他们认为这将随着经济现代化的进程逐步消失。但是，认为中国将会顺理成章地变成一个西方式的国家，那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与西方几乎毫无共同之处。只有剔除历史和文化的影响，将世界简化成只关乎经济和技术的时候，才有可能得出中国变得越来越西方的结论。

在第4章中可以看到，东亚国家虽然经历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欧洲殖民统治，又被美国权势笼罩了半个世纪，但它们事实上并没有西化太深，这实在令人称奇。如果这个说法适用于整个东亚地区，那它就更适合中国的情况了。这里有四个主题，每一个都植根于中国的历史，它们共同刻画出中国与西方国家的不同点。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意义非但没有减弱，反而可能在中国如何看待自身以及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和角色的问题上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力。这些主题构成了本书第二部分的内容，在此我简要概括如下。

首先，不应该仅将中国视为一个民族国家，即使目前中国是这样自我定位的和被定位的。中国在现有的疆域内存在了差不多两千年之久，但只在20世纪才开始自认为是民族国家。中国人的认同早在中国断定自己是民族国家以前就已经形成了，这一点与西方截然不同。在欧洲和美国，人们的认同主要都是从民族国家的角度来表述的。通过不断地提及自己拥有五千年的悠久历史，中国人深知界定自己身份的不是国家意识而是文明意识。在此背景下，中国不应该被首先看作民族国家，而更应该是文明国家。不能简单地将中国与其他国家等而化之，这一论断具有重要的意义。我将在全书尤其是第6章中详细探究这个问题。

其次，在民族观念上，中国与印度、印度尼西亚和美国等人口大国同样也有所不同。尽管程度各异，但后者普遍认为，它们生来就是多民族国家。像中国这样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占世界总人口的1/5）的国家，最初一定是由众多民族组成，这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占中国总人口92%的汉族，却坚信中国是由一个民族——中华民族构成的。其中的原因我们就要从历史悠久、独具特色的中华文明中去找寻。数千年的中华文明，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各民族不断融合、同化。此外，中国在对待民族问题的态度上存在意识形态的成分。19世纪末叶，处于清王朝统治时期的中国日益陷入了欧洲、美国和日本等列强的包围之中，民族主义者为了抗击

外来入侵者和推翻清朝统治，提出了“汉族”这一说法，获得了人们的广泛支持。但实际上“汉族”一词的作用，比起中国漫长历史带来的影响，实在是微不足道。在政治和文化作品中，民族往往是人们容易忽略的话题，但是对待民族和种族问题的态度，却是理解各个社会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正如我将在第5章中阐述的那样，它们塑造和界定着中国人看待境内外的外国人的方式。中国人对待差异的态度，是决定中国作为一支全球力量将如何作为的强有力因素。

再次，直到100多年前，整个东亚地区都处于以中国为核心的朝贡体系之中。所谓朝贡，是指邻国通过向中央王国（即中国）缴纳贡品，来表达对中国文化优越性和强大国力的敬意，以换取中国的仁爱和保护。众所周知，朝贡体系遭到了欧洲列强在东亚地区的殖民统治的破坏，被威斯特伐利亚民族国家体系（Westphalian nation-state system）取代。那么，朝贡体系还有可能在该地区再生吗？一如从前那样，中国仍旧是该地区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欧洲很久以前就远离了东亚地区，美国在该地区的地位也正在逐步削弱。不要理所当然地认为遍布于该地区的洲际体系将继续沿袭威斯特伐利亚的版本。如果说随着中国的崛起，我们正在进入一个不同于以往的世界，那么从此角度来看，东亚更是如此，已经处于被重新建构的过程中。我将在第8章思考朝贡国家体系过去和未来的本质。

最后，中国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就是统一性。西方曾一度普遍认为，中国将会以一种类似于苏联的方式解体。这种观点源于对中国的根本性误读。两千年来，中国的疆域一直相对稳定。当罗马帝国分裂成众多小国的时候，中国正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尽管历史上曾出现过很长时期的割据现象，但中国统一的进程一直持续至今。所以，中国至今仍是一个人口众多的统一国家。这深深地影响了其对世界其他国家的认知，也为中国提供了（至少是潜在的）特殊的力量。庞大的人口规模将中国与除印度以外的其他所有国家区别开来。对中

国统一性的本质和演进的探讨将贯穿本书，尤其在第3、第6、第7和第10章着墨更多。

且不论我将在书中讨论的其他观点，单从文明国家、民族、朝贡体系和统一性4个方面来看，中国的历史就极为独特，完全不同于西方。任何一个国家都习惯于凭自己的经验去看待世界。如果其崛起为世界大国，就会试图按照自己的的价值观和喜好去塑造世界。中国也是如此，也必将如此。因此，认为中国对世界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经济方面，实在有些过时，中国的政治和文化可能也会产生无比深远的影响。中国未来给世界带来的影响，将可与20世纪的美国媲美，甚至有可能会超越美国，而且一定截然不同。

这给我们大家提出了一个问题：从长远来看，中国究竟会接受现有国际体系，还是会试图从根本上改变这一体系？目前我们还无法对此做出任何肯定的回答，因为中国仍处在崛起的早期阶段。自1978年以来，中国一直积极寻求完全融入现有国际社会之中，并努力向西方国家证明自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负责任的大国”。极具影响力的美国国际关系学家约翰·伊肯伯里（John Ikenberry）曾指出：“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二战’后的西方秩序是独一无二的。任何一种由一个强国主导的国际秩序，都是恩威并用，既有自愿随从也有被迫无奈加入者。只有当前美国主导的秩序不同：它更民主而非独裁，从而使得这个秩序具有不同于以往的包容性、合法性和持久性。这个秩序的规则制度由全球不断革新的民主与资本主义力量所创建并巩固。它拥有广大的参与者和利益相关者，从而富于拓展性。它在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和实力增长的同时，又对成员保持一定的约束。这就使得这个秩序很难被颠覆，但可以轻松融入。”

伊肯伯里认为，当前美国创造的国际秩序，拥有吸纳中国并使之成为其中一员的潜力，从长远来看，它也不会被中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替代。这是考量中国崛起之意义的关键晴雨表。迄今为止，任何一个

新的全球霸权力量的出现，都会导致国际秩序的重大转变，英国和美国的情形都是如此。鉴于中国的崛起势不可当，自身又与西方迥异，因此人们很容易接受一种看法，即中国的崛起最终将预示着一种全新的国际秩序的诞生。这是我将在本书末尾探讨的问题。

---

1. 《大国的兴衰》中文版已于2013年1月由中信出版社出版。——编者注

第一部分
西方世界的终结

1800年的东方和西方，究竟谁更拥有经济优势？为什么东方又很快落后于西方世界？是必然因素还是偶然因素？欧洲的优势地位是如何形成的？塑造我们世界的欧洲现代性和美国现代性有什么不同？中国现代性的形成将具备什么样的特色？中国当前经济突飞猛进的基因源于1800年之后的近代？未来的世界，全球的主导力量是中国还是西方？

对东方来说，日本是个另类，它总在标榜自己的独树一帜，它总想着脱亚入欧、入美；对西方来说，日本也是个另类，从明治维新到向西方全面转变，它总是不遗余力，但无论如何，它也摆脱不了东方的特质。日本——究竟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

中国从1300年之后开始步入了衰退期？郑和下西洋的壮举为什么无法延续下去？中国未能实现工业革命，究竟有多么可惜？中国改良运动的失败源于中国人对西方越来越强烈的恨意？1949年，中国终于迎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历史经历了一次辉煌的改写历程。

西方对现代性的垄断将随着东亚的崛起而被彻底击破。究竟是东方西方化，还是西方东方化？文化的差异有多么根深蒂固？语言、服饰、饮食、政治权力，西化的成分有多少？中国现代性的出现，很快剥离了西方国家的中心位置，并使其处于相对弱势的境地。这就是为什么说中国的崛起将会带来如此深远影响的原因。

直至18世纪下半叶，人类生活本质上并没有太大改观，当下的生活仅仅被视为过去的翻版。同样，人们认为未来并非变幻莫测，只不过是历史的重演或再造而已。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都生活在陆地上，而陆地上的变迁着实缓慢，因此人们的这一观点不足为奇。宏大的历史事件和日常的体验更是使人们对历史经验深信不疑。经验、阅历、智慧、权威及传统等被人们视为思想的瑰宝，通过日常生活、艺术、宗教、文学传承下来。所有的变革，只要不威胁到这些宝贵的历史遗产，便是可以接受和合法的。即使是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这欧洲两大重要历史事件，正如其名称所暗示的，代表的也是对于过去的怀念，哪怕事实上承载着许多极富前瞻性、新奇的理念。例如，尽管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学者们致力于改变人们看待历史的方式，但是仍认为人们应该学习、仿效经典。从16世纪开始，这种师古的思想热潮逐渐推却，不仅在欧洲，在中国、印度、日本和伊斯兰世界都是如此，但在欧洲体现得最为淋漓尽致。科学的发展，科学方法影响力的不断扩大，世俗主义的扩张以及商业活动和市场的重要性的日益凸显，让人们越发质疑“现在和未来只不过是历史的重演”这一理念。

18世纪晚期，随着现代性的来临，一种完全不同的观点逐步深入人心：现在的生活不再是过去的简单重复，而是未来的起点；变革也不再是历史的重演，而是开创一个前所未有的未来的手段。进步、变革、现代化、理性、启蒙、发展和解放等一系列全新的词汇和概念，承载了“现代性”的内在价值观。这一全新的思维方式与传统、习俗、遗产、经验、守旧等陈旧的思维方式之间的冲突不断加剧。现代性——传统的划分，变成了社会生活的全新的主要原则。

现代性并不像某个国王的统治、某个朝代、一场战争，或工业革命的进程那样，有明确的时间顺序可循。现代性的起点不是某个具体的时间而是某段时期；而目前为止它似乎并没有确切的终点，更像是一个永不停歇的过程。工业化标志着现代性的到来和发展，现代性更像不断扩展的宇宙，处于不断的运动之中。

戈兰·瑟伯恩（Göran Therborn）认为，现代性标志着面向未来的新纪元的到来。克里斯托弗·贝利（Christopher Bayly）则认为，现代性是一个不断发展、无穷无尽的过程，“从18世纪末开始，一直延续到今天”。如果现代性在英国工业革命时期还是一个新颖的事物，那么现在它已经变成了引人注目的万能故事，横扫了前方的一切障碍，以其“新颖”魔力般地激发大众的想象力，影响遍布从北美到欧洲、从中国到日本的诸多地区。现代社会的诸多冲突都被视为“进步”与“保守”或“传统主义”之间的矛盾，这也说明了现代性的话语已经为世界很多国家所接受。

对于现代性来说，具有决定意义的时刻是经济腾飞和工业化的来临，时至当下仍是如此。随着工业资本主义的来临，全新的思维方式（具有变革和不确定性的价值取向，认为未来将不同于过去），从影响小部分精英扩展到改变整个国家的民众心态。经济活动的重心从土地转移到工厂，人类居住的中心从乡村转移到城市。生活标准、家庭结构、工作条件、知识技能、自我组织、政治倾向、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时间观念以及对人类存在的看法等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发生了革命性的转变。如同现代性本身一样，工业革命作为现代性的主要驱动力，也引发了一场经久不衰的经济变革。

即使将欧洲现代的起源追溯至16世纪，其变革的决定性时刻也毫无疑问地发生在19世纪，当时工业化进程横扫所有的西北欧国家，欧洲国家的经济实力大为提升，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诞生，实际上整个世界都被卷入了一个由欧洲主导的全球体系中。这些趋势结合在一起，标志着人类社会组织发生了质变。从那时起，现代性的影响力开始遍及全球，人们追求现代性的欲望变得一发不可收拾，并认为自己是现代的——从服饰和命名方式，到怀表、雨伞等个人物品。这种现象不仅发生在欧洲和北美，甚至连亚洲和非洲国家的精英群体也深受影响，当然，亚非的普通民众所受影响不大（日本除外）。

从那时至今，现代性进程的速度一直在加快。依照过去的标准，1780~1840年的英国工业革命，速度已经相当惊人；但是对比后来的例子尤其是亚洲四小龙的发展速度来评价的话，它其实极其缓慢。此后的每一次经济腾飞，其速度都是越来越快，与现代性进程相伴的城市化速度在不断地加快，农业就业机会的萎缩也在不断加剧。尽管最近欧洲在关于后现代性的争论中表达了对于现代性的疑虑，但是从全球视角来看，对现代性的看似永无止境的追求，至今仍是当今时代的支配力量，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对现代性的追求席卷了整个亚洲大陆，那里可是世界上60%人口的家园。实际上，这种追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烈。与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相比，欧洲对未来的信心和信念可能不那么明朗，但是美国却依然在不懈地致力于探索进步和未来。而如果有人想了解“拥抱未来”在实践中的真意，那么最好的地方莫过于中国。

欧洲是现代性的诞生地。1750年之后的两个多世纪里，欧洲现代性的触角已延伸到世界各地，它的思想、体制、价值观、宗教、语言、意识形态、习俗和军队，给世界其他地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现代性和欧洲变得密不可分，似乎彼此已经融为一体，难以想象将二者割裂的情形：它们似乎已经成了同义词。然而，尽管现代性孕育于欧洲，却没有欧洲的内在特性：除了在这里诞生，它同欧洲以及欧洲文化之间，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联系。过去的半个世纪中，随着现代性在东亚国家的扎根，它吸取了欧洲现代性（确切地说应该是西方现代性）的经验。然而，东亚现代性并非欧洲现代性的简单翻版，它极具特色，其体制、习俗、价值观和意识形态，都根植于自己的历史和文化。在第一部分，我将探讨现代性是如何与欧洲（广泛地说是西方）建立起不可磨灭的联系，而东亚国家又正在如何突破这种联系。

第1章
西方的兴起

到19世纪中叶，欧洲已经明显确立了对东亚国家的优势地位，1839~1842年鸦片战争中英国入侵中国的事实即是生动的说明。但是这种优势是从何时开始的？人们会忍不住追溯到更早的时期。欧洲之所以形成对东亚国家的优势，部分原因在于明朝之后——特别是产生多项发明创造的宋朝灭亡之后，中国在创新方面越来越不尽如人意。例如，历史学家戴维·兰德斯（David Landes）在谈及清朝时表示：“在科技领域，中国变得越来越迟钝，它故步自封，无意创新。”所以，他认为：“于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欧洲将中国远远地甩在了后面。”

一方面，与过去的辉煌历史相比，中国对自己的现状感到失望；另一方面，同时期的欧洲正在活力四射地稳步增长。大约从1400年开始，部分欧洲地区就开始呈现出稳步的经济增长趋势，同时文艺复兴的酝酿又为后来的科学和工业革命奠定了基础。然而，欧洲现代化的漫长过程却可能被所谓的“后见之明”夸大了：人们认为鉴于欧洲自19世纪初期就获得了一系列耀眼的成功和超级统治地位，所以其现代化进程的开端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期。于是产生了一种观点，当然并不流行，认为欧洲获得对中国的领先地位以及中国自身的衰落的时间要更早（实际并非如此）。

认为1800年欧洲轻松地领先于中国和日本的观点，日益受到历史学家们的质疑。杉原薰（Kaoru Sugihara）指出，1600年后的东亚并没有走向衰落，相反在后来300年的时间里，还出现了劳动密集型、以

市场为基础的经济增长的“东亚奇迹”——他称之为“勤劳革命”。这种经济成就完全可以与后来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欧洲奇迹”相媲美。他指出，1868年明治维新以前，日本农业表现出很强的创新能力，农作物的重大改良和生产力的大幅提高，为不断增长的人口提供了支持。正如亚当·斯密所说的，18世纪晚期，中国的市场显然比欧洲的更加先进和成熟。例如，中国生产的粮食被远距离运输到市场上的比例远高于欧洲。早期的市场之所以能够在中国获得发展，关键原因之一就在于封建制度的缺位。中世纪的欧洲，农奴都被束缚在土地上，既不能离开也不能任意处置土地。而中国农民只要拥有足够的资金，就能够自由合法地买卖土地及其农作物。

1800年，中国城市化的水平至少与欧洲旗鼓相当。据估测，18世纪的日本，约有22%的人口生活在城市，而西欧的比例为10%~15%。1800年之前，无论从资本存量还是经济制度的角度来看，西欧都未享有超过中国和日本的绝对优势，当时许多中国的生意都有股份制的影子。即使在技术水平方面，欧洲虽看似与中国旗鼓相当，但在灌溉、纺织织造、染色工艺、医药和瓷器制造等领域，欧洲还是落后于中国。中国在很久以前就开始使用纺织机，这些机器与多轴纺织机和飞梭只存在细微差别。多轴纺织机和飞梭为英国以纺织业为先导的工业革命提供了动力，但那已经是1780年左右的事了。中国很早就对蒸汽机不陌生，而且还创造出类似的各种类型的机器。只是与后来詹姆斯·瓦特的发明相比，这些机器是用活塞驱动飞轮，而不是相反。但是有一点毋庸置疑，英国的工业革命一开始，对资本密集型和能源密集型产业的投资就快速提升了生产力水平，创造出一系列技术、革新和增长，这也使得英国能在科学技术方面获得不断进步，并尽享领先于中国的优势。中国则正好相反，事实证明其“勤劳革命”并没有拉开工业革命的序幕。

1800年，在中国和西欧的一些中心地区，生活水平是大致相当的，可能日本略高一点，人均寿命和卡路里摄入量也基本相同。人均

寿命是衡量繁荣程度的一项重要指标，除了最富裕的地区，欧洲的人均寿命直到19世纪末才超过中国。保尔·贝罗什（Paul Bairoch）通过计算得出，1800年，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仍领先于西欧，亚洲的人均收入虽落后于西欧，但却超过了欧洲。当然，提起中国和欧洲，我们必须牢记一点，这两个地方都是幅员辽阔、人口众多：1820年，中国人口多达3.81亿，西欧人口达到1.33亿，欧洲总人口达到1.69亿。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活水平必然存在着很大的不同，互相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人们普遍认为18世纪末，中国最发达的地区——特别是长江三角洲，已或多或少与英国等西北欧最繁荣的国家处于同等发达水平。鉴于最发达地区在工业腾飞中所起的先导作用，必须对英国和长江三角洲进行具体的比较。

1800年，西欧远没有取得遥遥领先于中国和日本的经济地位，事实上，当时中欧两地的经济水平并无多大差距。从这个角度来看，认为工业化是一个持续了几百年而非几十年的历史变化过程的产物这一观点，不禁令人怀疑。相反，工业化在很大程度上看上去更像是相对偶然的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然而，这仍然遗漏了一个问题：1800年左右，为什么是欧洲而非日本和中国，能够如此迅速地把财富聚积起来，然后在19世纪取得如此令人赞叹的成就呢？

就此而言，偶然因素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当然并不是唯一的原因。1800年左右，包括中国和欧洲在内的旧世界中人口最密集的地区，越发觉得供养不断增长的人口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最基本的问题就在于，粮食、纺织品、燃料和建筑都在竞相争夺日益稀少的土地和森林资源。这一问题对中国来说尤其严重。中国的心脏地带地处黄河和长江之间，由于土壤肥沃，该地区孕育了众多且相对密集的人口。但是过度的开发使用，导致这片土地日益枯竭。再加之新开垦的土地质量不高，所以问题日益突出。欧洲——具体地说是英国，之所以能够解决类似于中国的问题，打破这种致命的土地限制，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英国在新兴工业区附近发现了大量的煤炭资源，这有

助于缓解木材日益短缺的困境，并为工业革命提供了燃料。相比之下，中国的煤炭储备虽然也十分可观，但主要蕴藏在偏远地区，尤其是西北部，与纺织工业集中地和运河所在的长江下游流域相去甚远。

其二，更为重要的是，新世界殖民地——尤其是加勒比和中美洲地区，幅员辽阔，劳动力（主要是农奴）充足且价格低廉，食物和原材料丰富。以曼彻斯特的早期经济增长为例，如果没有奴隶种植园大量便宜的棉花供应，这种增长是不可能实现的。如果英国没有从新世界进口棉花，而是靠养羊产羊毛来生产纺纱，那么就需要广阔的牧地（1815年约为900万英亩，1830年则超过了2 300万英亩）。总体而言，据估计仅在1830年，英国若想自给自足，替代从新世界国家进口的棉花、蔗糖和木材，所需的土地面积大约在2 500万~3 000万英亩之间，这甚至超过了英国所有耕地面积和牧场面积的总和。在此背景下，殖民地所发挥的作用也提醒着人们，欧洲工业化绝非一个内源性过程。新世界和在英国发现的大量煤炭资源，减轻了对土地日益增长的压力，消除了欧洲经济发展的瓶颈。中国则没有这么好的运气。因而，其影响是深远的，正如历史学家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所说："英格兰避免了变得像长江三角洲一样，二者变得如此不同，以至于现在很难发现它们还有什么相同之处。"

在关键时刻，新世界殖民地为英国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原材料，这纯属偶然，但是在过去的200多年里，英国对新世界殖民化的方式却并非意外。海外殖民扩张也让欧洲在其他许多方面长期受益匪浅。对殖民地的争夺、欧洲内部的大大小小的战争，加上经济上的激烈竞争，欧洲民族国家被磨炼成了名副其实的战斗机器。因而，19世纪，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欧洲民族国家具有了更雄厚的军事实力，其殖民扩张的野心也日益膨胀。当时军费开支的数额不容小觑。在1805年特拉法尔加海战（the Battle of Trafalgar）中，海军上将纳尔逊（Nelson）指挥皇家海军获得了胜利，耗资总额相当于5个亚伯拉罕·克劳利钢厂。该钢厂是英国工业革命中标志性的巨型投资项目之一。

与殖民地的贸易还为公司结构和融资系统的创新提供了沃土。以荷兰为例，为了与殖民地进行贸易往来，荷兰创设了股份公司。可以说，没有奴隶贸易和殖民统治，欧洲不可能取得这样的突破性成就。

诚然，从1644年到18世纪末，中国的疆域也在扩大，但是这些地域处于欧亚大陆的腹地，既没有幅员辽阔的土地，也没有众多的人口，不能像新世界那样提供丰富的原材料。东南亚资源丰富，本应该是中国在新世界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最佳选择。15世纪初郑和下西洋的时候，乘坐的船只之庞大要远远胜于当时欧洲建造的船只。这表明中国并不缺乏技术能力和财力，但是中国对待海外利益和财富的态度，与欧洲国家极为不同。尽管有大量的中国人移民到东南亚，但是与欧洲不同，中国无意为其子民的海外扩张提供军事和政治支持，相反，清王朝非常关注中国北部和西部的内陆地区。这些都反映出一个事实，中国认为自己是大陆文明而非海洋文明。有趣的一点是，率先对东南亚进行殖民统治的恰恰是欧洲列强，尤其是在19世纪中叶以后。

这引发了一个更高层次的问题，就是欧洲与中国及各自的精英，其态度到底存在何种程度上的差异，最终导致中国没能取得欧洲那样的突破性成果。中国的国力当然不是问题，我们在第3章将会看到，中国一旦把经济和自然资源完全利用起来，就肯定具备创建丰功伟业的能力。高度发达的粮食仓储系统、国家修建的长达1 794公里的京杭大运河、屯垦戍边政策，都展示出清政府强有力的治理能力。封建王朝统治下的中国也具备长途运输大宗物品的能力，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是，当时的中国优先考虑运输的不是煤炭，而是粮食、食盐、铜。这些物资对于维护国家稳定和团结、维持百姓生活至关重要，始终是中国历代王朝最为重要的关切之一。

实际上，这里存在一个重要的差异：封建王朝治下的中国往往把重点放在维持秩序和均衡发展方面，而非商业行为和工业化进程。中国一直在极力避免收入的巨大分化和明显的奢靡行为，这些都被视为

有损于儒家所倡导的“和”的理念。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禁止市场活动和商业行为，恰恰相反，它大力支持农业市场经济发展。但是，除了那些从事盐业和外贸等垄断活动的商人能从中享受到一些好处，在大多数情况下，它没有起到促进商业资本主义发展的作用。欧洲国家尤其是英国，则对新兴的工业更为支持。同样，中国也不允许各省之间展开竞争，认为那样显然会造成不稳定的局面。而在欧洲，这种以民族国家之间的对抗形式出现的竞争则相当普遍。导致中国和西欧国家心态不同的主要原因是：在欧洲，随着商业阶层的发展，其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跻身统治阶层之列。而在中国，商业阶层一直难以进入统治阶层，至今仍是如此。中国的商人没有权力根基，只能依靠政府的资助和扶持来保护和促进大型商业企业的发展。西欧国家，首先是英国，则更倾向于以工业发展为导向；而在中国，统治阶层和地主的利益仍然占主导地位。

因此，1800年的英国相对于中国来说拥有两大长期优势并非偶然。英国（其他欧洲国家或多或少亦是如此）比中国更倾向于工业资本主义（以及随之而来的工业化），殖民地和此起彼伏的欧洲内战也为西欧提供了丰富的战略资产，尤其在原材料和军事能力方面。但殖民化为18世纪末的英国解决了日益严峻的土地和原材料短缺问题，这一点则纯属偶然。1800年的中国（实际上还有日本）与西欧经济地位相似，也都拥有实现经济腾飞的类似潜力。造成两者后来境遇云泥之别的决定性因素是那些偶然因素。新世界国家的资源、相对充足的煤炭供应使英国能够打破资源困境，当然英国政府对工业化的支持态度同样也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则没那么幸运，未能拥有这些偶然因素，结果发现自己深陷困境、无法自拔。而且以鸦片战争为开端，随着欧洲列强尤其是英国的入侵，在随后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国所处的局势严重恶化。历史的影响是深远的：1850年的中国和1750年一样，都是农业社会，而到了1950年，中国仍是以农业经济为主。据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估计，中国1820年的GDP是2 286亿美元——

几乎是1600年的4倍。但是到1913年时微升至2 413亿美元，几乎没有什么增长，而到1950年时，却下降至2 399亿美元。

如果说中国1800~1949年的灾难性遭遇发轫于19世纪初，而不是16世纪，那么中国当前经济发展的缘起同样在近代也有据可查，而不是在历史的迷雾中无迹可寻。这也使得人们更容易理解中国自1978年以来开展的、引人注目的经济变革。1800年的中国经济绝对不是一无是处，相反它在很多方面都展示出了非凡的活力：社会的竞争性依然很强；农民体现出强劲的适应能力和创新能力；商人拥有极强的商业敏锐性。在列强入侵的年代，这些特征可能相对处于休眠的状态，1978年开启改革的大潮之后，它们则再次显现出来。此外，我们还要提出一个更具有当代色彩的观点。那就是，1800年全球经济并不是以欧洲为中心，而是呈现出多中心的特征。亚洲、欧洲、美洲共享着世界经济权力，其中中国和印度则是当时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目前，全球经济再次呈现出日益多极化的态势。不要认为这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相反我们应该看到，过去200年里经济力量主要集中在欧洲、北美和稍后的日本等少数国家手中，这是一种历史脱轨的非正常情况。殖民化在其中则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通过提供一些先决条件，殖民化使欧洲获得了普罗米修斯式的经济增长，同时还赋予欧洲抑制和扭曲世界其他地区经济发展长达100多年的力量和机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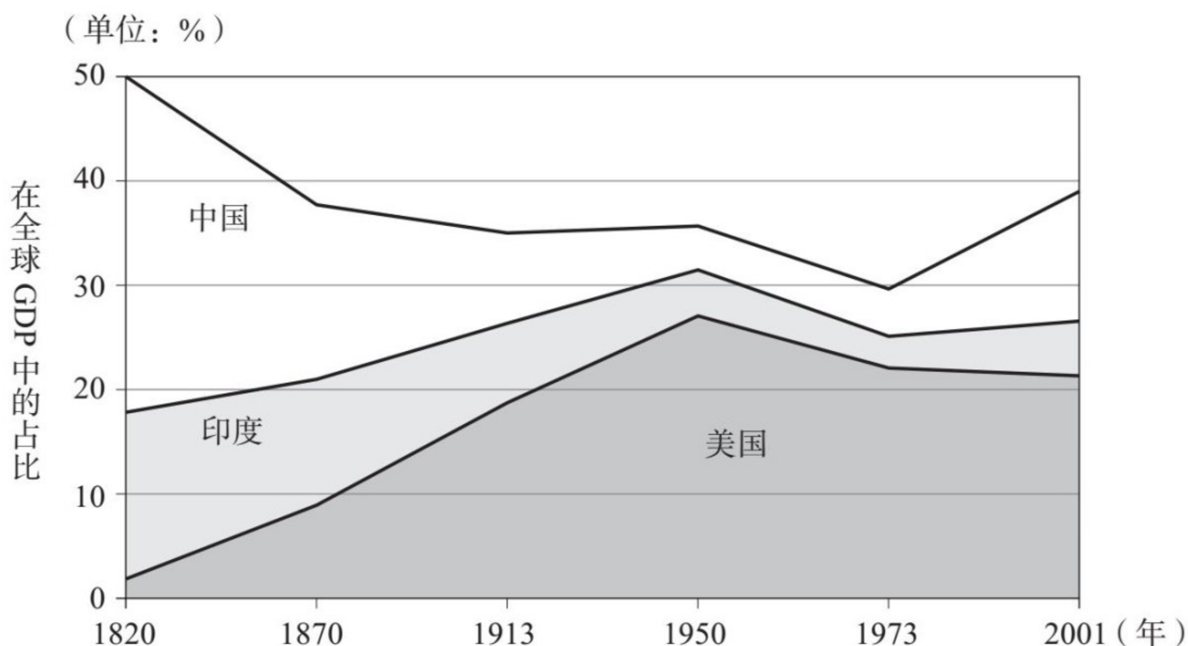


图1–1 中国与印度的起伏：在世界GDP中占比的变化（1820~2001年）

数据来源：由来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安格斯·麦迪森提供

是先决条件还是特征？

如果说18世纪中后期，西欧处于与中国非常类似的地位，那么我们了解那段历史和随后发生的事件，将具有深远的意义。欧洲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与时间相对较短的因素有关，并非漫长的几个世纪的渐变所预先注定的。换句话说，我们需要重新对欧洲经济腾飞的先决条件进行考量，也是人们通常认为的欧洲通过数个世纪所获得的经济腾飞前夕所具备的整体特征。这些特征也许是我们希望的，也可能是有利的，但是如果没有这些条件，经济腾飞真的就只是一个幻想吗？日本、中国和印度差一点也实现了经济的腾飞，但是其政治和文化历史完全不同于欧洲。如果最终的结果是它们获胜、欧洲失败，那么它们后来发展道路的特征，以及它们孕育的机制和价值观，肯定与欧洲的大不一样。的确，正如我们在后文中看到的，这些国家在实现现代性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特点，与欧洲范本之间存在着极为显著的差异。

从20世纪后50年的历史经验来看，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快速实现工业化的进程中，欧洲国家（特别是英国）经济腾飞的过程和条件，主要适用于西欧，实际上，实现经济腾飞的方式和路径多种多样。正如历史学家彼得·珀杜（Peter Perdue）所言："工业发展并不只是在那些西北欧发现、经过数百年长期积累形成的特质的成果，通往经济现代化的道路有很多条，英格兰只是走了其中的一条。"举个小例子，发生在英国乡村的阶级分化，如农民地位的急剧下降，就没有出现在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中。实际上其他很多特质都是如此。

这令我们不得不对欧洲现代化进程的更为广泛的政治、文化和知识基础进行审视。欧洲文明的根源往往可以追溯到希腊的民主、罗马的法治和犹太教、基督教信仰。实际上，将其视为欧洲现代性的先决条件和特征，已成为一种共识。虽然希腊民主的影响力被夸大了——到19世纪末，除了少数几个国家外，并未被整个西方世界所采纳——但是希腊文明的广泛影响，如判断是非的方法、辩论和演讲的传统、独立公民概念、民主的理念，一直贯穿于欧洲历史的发展进程中。还有一个更常见的例子：无论是古希腊时期的多利克柱式、爱奥尼克柱式，还是罗马帝国时期的科林斯柱式，这些建筑风格至今在那些试图展示永恒的权威感的建筑中都能够找到身影，从英格兰银行到法国国民议会，再到美国的最高法院、白宫和国会山皆是如此。与之相类似的，源于古罗马的法律的发展（特别是在11世纪和12世纪通过天主教的作用），帮助欧洲形成了独立的法律体系的概念和实践，而欧洲的这一法律体系在后来的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最后，基督教为欧洲注入了强大的普世主义意识，不仅塑造了大陆国家的自我认知，也形成了它们对其他文化和种族的看法，在殖民心态和教化使命意识的成型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认识到文明的传承与延续并非难事，但却很难找到理由来证明这些都是国家经济腾飞的必要条件。文化特征无疑有助于塑造欧洲的现代性，但绝不能与先决条件混为一谈。西方的个人主义和家庭也是如

此。事后来看，许多不同类型的家庭模式都与工业化进程并存。基于日益发展的知识探究自主性、科学活动普及性和研究的日益规范化及拓展，欧洲在科学领域的确具有明显的优势。但是同期很多其他历史悠久的国家，尤其是伊斯兰国家和清代的中国，也兴起了各种各样的思辨风潮，丝毫不亚于当时欧洲正在兴起的科学理性主义。此外，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在其他文明中，还存在着一种很强烈的倾向，就是试图将新兴的理念和传统权威结合起来，而并非彻底地抛弃后者。

1800年以前，欧洲已经积累了一系列的文化遗产，但这些都不是其经济腾飞的关键。它们应该被视为欧洲现代性的特征而非其先决条件。我们没有理由认为，与欧洲特征不同的其他文明不能在现代性问题上取得突破性进展：毕竟自1960年以来，其他文明实现现代性的例子比比皆是。克里斯托弗·贝利得出一个结论："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如果说1800年以前欧洲和中国的区别只在于欧洲国家大量使用煤炭以及欧洲拥有美洲这么一个广阔的腹地，那么欧洲政治优势中所谓内生的文化因素，恐怕就要被修正了。"

欧洲例外论

欧洲远不是现代性的范本，也不是后来的每一次变革都应该遵循的榜样，更不是衡量其他国家现代性的标准。尽管在实现现代性的问题上，欧洲是当之无愧的先行者，但是欧洲的经验无疑是特殊的，不具有普适性。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欧洲的现代性模式却被自己，也常常被他人视为标准的模板。这一点并不奇怪。近两个多世纪的全球霸主地位，使欧洲原本独有的特征看上去似乎也具有了普适性。那么，在欧洲现代化过程及其现代性中，到底存在哪些独特的特点呢？

尽管欧洲国家在彼此之间的战争中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16世纪中叶以后，欧洲在实现现代性的过程中几乎没有受到过持续的

外部威胁，除了东南方向的奥斯曼帝国。然而到了17世纪，奥斯曼帝国就已被击退，到了19世纪，更是被彻底排除出了巴尔干地区。纵观各大洲，唯有欧洲才享有这种优势。此后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中东在追求现代性的过程中，都面临和遭受过现代欧洲国家的入侵。甚至北美的欧洲移民也通过独立战争的形式与英国进行斗争以建立自己的主权国家，为美国的经济腾飞创造了条件。由此导致的结果是，欧洲很久以来很少设身处地为其他国家着想，只会考虑自己的利益，按自己的意愿（通常是殖民者的思维）行事。直到最近，这种情形才开始有所改变。

事实上，欧洲的殖民历史，是欧洲区别于其他地区和国家的更深层次特征。从16世纪到20世纪30年代，欧洲国家通过实行大规模扩张和征服，打造了庞大的海洋帝国，其触角延伸至世界各地。这几乎是绝无仅有的（与其最为相似的应该是日本）。而这些海外殖民地，尤其是新世界的海外殖民地和英治下的印度及马来半岛，都成为列强们丰富资源和庞大实力的源泉。就像我们所看到的，没有它们，欧洲就不可能以那样的方式实现经济腾飞。除了1868年以后的日本，没有哪个非西方国家在19世纪实现腾飞，结果，大部分国家都变成了欧洲列强的殖民地。

虽然人们普遍认为，要实现现代性，就必须经历一个从农业社会发展为工业社会，然后再过渡到服务业社会的转型过程，但我们仍找到了欧洲例外论的另一个例子。以英国、比利时、德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共16个国家）是世界上仅有的经历过工业人口多于农业人口和服务业人口这一特殊阶段的国家。1911年，英国的工业就业人数达到了顶峰，占当时总劳动人口的52.2%；相比之下，美国和日本在其工业人口顶峰时的1967年和1973年，工业人口占总劳动人口的比例分别为35.8%和37.1%。正是工业社会使现代欧洲具有很多最为鲜明的特征，尤其是阶级冲突的集中性和工会的重要性。然而从全球范围来看，就就业人口比例而言，大多数国家走的是与欧洲截然不同的路径，即直

接由农业社会转变为服务业社会，美国、加拿大、日本和韩国皆是如此。

用以往经济变革的标准来衡量，欧洲实现工业化的速度非常迅猛，但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后来实现腾飞的国家尤其是东亚国家相比，就要相形见绌了。西欧的转型历时弥久，如英国经历了两个多世纪才具备了今天的面貌。由此导致的一个结果是，西欧国家的现代性与其传统之间的冲突一直相对比较缓和。欧洲城市就是将现代性与传统结合起来的完美例证：它像是一种地质遗迹，不同时代的建筑风格和谐共存，宛若一个经历数百年风雨的活的博物馆；相比之下，北美的城市都是新建的，东亚国家更甚，在东京、首尔、新加坡、上海、吉隆坡和香港等城市，几乎找不到历史的印记。

欧洲的另一个独特特征就是一连串的内部冲突，或可称之为欧洲内战。这一现象可部分地归结于外部威胁的相对缺少，也就意味着欧洲所面临的主要问题都属于国家层面或欧洲内部的问题，而不是发生在欧洲与外部（包括殖民地）之间。这些欧洲内部的战争源于宗教冲突，最早可追溯到1054年基督教东西两派之间的斗争。1517年后，随着天主教与基督教之间分庭抗礼，整个欧洲基本也以南北轴线为中线分裂开来。持久的宗教冲突使欧洲的思维方式呈现出明显的神学主义倾向，并为后来的意识形态特征奠定了基础。这也成为欧洲最为显著的特征之一，例如，几乎每一个重大的“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共和主义、君主主义、新教主义、法西斯主义，都源于欧洲。

从16世纪40年代到17世纪90年代，欧洲的内战则主要关乎早期现代国家的巩固。法国大革命之后，阶级的重要性不断上升。从19世纪早期到20世纪，阶级成为欧洲政治和社会的最主要的话语，这在世界其他地方绝无仅有的。从1792~1870年左右，民族国家的建立在欧洲内战中发挥了根本性的作用。到19世纪末，伴随着对殖民地，特别是对

非洲殖民地的争夺，欧洲民族国家间的斗争已经扩展至全球，并由此导致了“一战”的爆发。“二战”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欧洲内战的延续，尽管起源于欧洲，但战火很快蔓延至全世界。欧洲这种对内战的偏好在冷战中也得到了体现：意识形态将欧洲划为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阵营两大部分，相互对峙。最终，事实证明对于欧洲来说这种对内战的偏好是几近致命的：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中，欧洲国家都深陷其中并被战争折磨得精疲力竭，其全球实力也基本被消耗殆尽。

最后，个人主义也是欧洲转型过程中的显著特点之一。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艾伦·麦克法兰（Alan Macfarlane）对个人主义进行了这样的描述：“（个人主义认为）社会是由自主、平等的单位即独立的个人构成的，个人终将比任何团体都更为重要。”这与东亚和南亚文化存在着极大的差别，后者认为集体认同比个人认同更为重要。以家庭为例，英国的家庭制度可以追溯到13世纪，通过清教徒的传播，又奠定了北美家庭制度的基础。这种强调核心家庭的个人主义体制，与中国和印度的以家族、包办婚姻为特征的、以血缘关系维系的传统家庭体系形成了鲜明对比。这种家庭体系的价值观及其特征一直延续至今，并没有随着城市化和家庭规模的急剧萎缩而有所改变。因此，在西方社会，婚姻本质上是两个个体的结合；而在中国和印度文化里，婚姻是两个家庭的结合。

欧洲实现、保持现代性的进程具有高度个性化甚至是独一无二的特征：外部威胁的相对缺乏、殖民主义、工业优势、相对缓慢的增长、欧洲的内部冲突（也就是我所谓的“欧洲内战”）和个人主义。因此，对于欧洲的现代性特征要比人们通常认为的更为独特这一看法，我们不应感到奇怪。然而欧洲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影响力是如此巨大，以至于人们很难区分欧洲现代性的特殊性和普适性。欧洲人长期以来一直认为他们所取得的成就必须得到推广，应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普及和应用，必要时甚至不惜使用武力，这一点不足为奇。只有随

着一系列新型现代性的兴起，才有可能对欧洲经验的普适性和特殊性做出区分。

欧洲的优势

19世纪初，西欧和北美沿海地区的人均GDP大约是南亚国家的2倍，与日本、中国南部和东部沿海地区的水平大体相当。而到了1900年，西欧和北美沿海地区的人均收入则至少是中国的10倍。18世纪后期，无法克服的经济掣肘让中国付出了无比沉重的代价，与此相反，欧洲正处于强劲的发展势头中，到处都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欧洲转型的关键在于工业革命。1800年以前，英国的经济蒸蒸日上；到19世纪下半叶，西欧许多国家也都取得了类似英国的长足进步。

虽然先前的经济增长速度就像冰川移动般缓慢，但当时西欧的复合增长率却令其对美国以外的世界各国尽享优势。在整个19世纪，除了北美、旧白人殖民地和1868年以后的日本外，相对于世界其他地方，欧洲都或多或少地享有工业化垄断地位。这种情形也给其他国家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欧洲与其他国家拉开的经济差距，大大增强了其称霸世界的能力。欧洲海外殖民的历史可追溯到17世纪，但是自18世纪中叶以来，随着对印度的逐步占领，殖民的步伐迅速加快，范围也更加广阔。打着基督教、文明和种族优越论的幌子，凭借举世无双的陆、海军实力，以英法为首的欧洲国家征服了世界大部分国家。这种对殖民地的争夺在“一战”之前对非洲的争夺中达到了顶峰。白人国家与中国、印度、北美的原住民，澳大拉西亚、南非等非白人世界之间爆发了激烈的战争。后者以战争来抵抗欧洲殖民者对其宗教和统治者的攻击以及对他们土地和资源的掠夺。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写道：

> 西方霸权是世界历史上最严重的非对称性现象之一。总的来说，所有西方帝国——美国、比利时、英国、荷兰、法国、德国、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大都市仅占世界总面积的7%，人口也仅占世界总人口的18%，但是这些帝国所占有的领土却占全球总版图的37%，治下的人口占全人类总人口的28%。如果将俄罗斯也视为扩展至亚洲的欧洲帝国，那么西方帝国占世界土地总面积和总人口的比例将超过一半。

作为世界的主导力量，英国试图根据自身的利益塑造全新的全球贸易体系。它主要通过大量出口制造业产品和以最低的价格进口食品和原材料来获取财富。自由主义并不只是一个抽象的原则和无私的政策，也是一种手段。通过这种方式，英国希望利用自己在制造业方面的压倒性优势，阻止其他国家通过收取关税来保护本国新兴产业的发展。英国倡导的国际自由贸易制度，对除西北欧和北美以外的世界其他地区都产生了抑制性的影响。欧洲列强一直都设法先发制人地保护本国生产者，阻止竞争者的出现，因此大部分殖民地的工业发展速度极为缓慢，或是根本没有发展。“无论殖民者的言论是多么冠冕堂皇”，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认为：“殖民地和非正式附庸国，都只是在为殖民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必要的补充，而不是充当其竞争者。”

城市人口是工业化程度的一个主要衡量标准，1900年，英法在亚洲和北美殖民地的城市人口比例仍然维持在总人口的10%左右，这与此前没有被殖民的时候几乎没有什么不同，而那时民众的生活水平甚至比1900年还要高。印度作为当时英国最重要的殖民地（18世纪中叶处于东印度公司的殖民统治之下，1857年被英国正式占领），1700年的人均GDP为550美元，1820年降为533美元，1870年仍然是533美元。换句话说，印度1870年的人均GDP要低于1700年，甚至还不到1600年的水平（550美元）。虽然后来印度的人均GDP在1914年升至673美元，但是到1950年又回落到619美元。在长达250年的时间内，印度几乎一直处

于英国某种形式的统治之下，但是印度的人均GDP却仅仅增长了5.5%。而印度独立之后，人均GDP在1973年就升至853美元，到2001年的时候，更是一路飙升到1957美元，这与独立前的水平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

1800年以后，欧洲经济腾飞不仅采用了一种规避亚洲的方式，而且有时候还综合运用经济和军事手段强制阻止亚洲国家走相同的道路。中国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1839~1842年，英国向中国发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以维护自己向中国出口鸦片的非法权利。当时，英国向中国输入了大量产自印度的鸦片，鸦片贸易一方面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的损害，另一方面给英国和其印度殖民地带来了巨额利润。随着中国的战败，英国向中国倾销的鸦片数量及行销的范围也与日俱增。鸦片的流毒毫无疑问地严重影响了中国人民的健康状况，但是在英国人眼中，“自由贸易”才是更高的原则。中国无力阻止西方打开中国的大门，反而加速了清王朝日益衰落。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清朝已经是外强中干、奄奄一息，被迫开放的、数不清的所谓通商口岸实际上成为外国殖民者治下的国中之国。1900年，当欧美的八国联军入侵中国镇压义和团运动时，中国显然无力抵抗，其命运与非洲一样，即被列强瓜分。

荒谬的是，没有什么比日本的崛起更能生动地说明欧洲力量的势不可当。日本曾经面临过西方列强的入侵，也怀有唯恐遭受与中国同样命运的恐惧，但是1868年明治维新以后，日本迎来了一个审慎规划的快速现代性进程。它派出专家小组到欧洲学习其先进的教育体制、精锐的海军和陆军系统、发达的铁路体系和完善的邮政制度等。日本不再自视为亚洲的一部分，反而希望别人能承认它是西方大国。它甚至效仿西方的殖民主义模式，占领朝鲜和中国部分地区。明治天皇的现代性计划实际上是对欧洲霸权总体特征的仿效。生活在欧洲影子里的所有其他国家，无论愿不愿意，都要被迫接受和效仿欧洲的部分特征，否则就会面临殖民化的威胁。

欧洲的崛起改变了所有人的游戏规则，但其带来的影响也并非完全消极：重要的是，欧洲的经历展示了工业化的巨大成就，世界也由此面临着现代性的必然选择。虽然列强们将殖民地视为满足其需求的奴仆，而且绝不允许它们与主人竞争，但是这些殖民地也多多少少从殖民者那里获得了一些后来发展所需的基本条件。英语成为印度的通用语言，中国台湾延续了日本的教育体制，上海等通商口岸的中国人学会了西方的商业模式。但是，正如早期的经济表现以及绝大多数殖民地对外来统治的敌意所体现的，殖民主义的影响仍是负面居多；而且在某些情况下，尤其在非洲国家，其影响几乎完全是消极的。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等白人殖民地却是特例：因为民族和种族原因，它们受到了完全不一样的待遇，所以最终获得了极其繁荣和兴旺的发展。

尽管直到20世纪30年代，意大利仍然设法霸占着阿比西尼亚（今埃塞俄比亚），但是欧洲列强殖民势力达到顶峰却是在“一战”以前。然而，当时美国已开始作为欧洲列强的继任者出现在世界舞台上，不仅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而且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影响力也日益增强。但这种崛起产生的影响，仍然被其孤立主义和与欧洲的密切关系所掩盖。1850~1930年欧洲向美国进行了大规模移民，其数量相当于1900年时欧洲总人口的12%，也是美欧密切关系的力证之一。随着各国实力的急剧下降，中国抗战的胜利及印度次大陆、印度尼西亚、非洲大部分地区和马来西亚等地的相继独立，1945年以后的欧洲明显地走向衰落。在此过程中，世界民族国家的数量猛增了3倍。正如19世纪一样，世界版图再次被重新描绘，但是这次的速度更快、变革更大。新兴国家的独立也产生了许多新的可能性，尽管事实证明这些新的可能性性质和作用各异。前面引用的经济增长数据显示，印度的情况的确有所改善；但经历奴役和殖民主义之后的非洲，整体实力大大削弱。据估计，由于奴隶贸易的强行贩卖，加之自然死亡，非洲人口减少了一半。相比之下，东亚遭受殖民主义侵害的程度远低于非洲，也没有进行过大规模的奴隶贸易（尽管也被迫提供了廉价的契约工人），所

以受到的影响相对要少一些。考虑到1950年以后如此多的前殖民地出现了如此巨大的经济变革，很明显在“二战”后的前20年，西方国家尤其是欧洲大大低估了非殖民地化和民族自由的意义。可以说，这是20世纪头等重要的大事，它为占世界绝大多数人口比重的发展中国家成为21世纪的重要行为体创造了条件。亚当·斯密就欧洲人发现美洲和所谓的东印度群岛曾做出如下预言：

> 然而，对于东西印度群岛的本地人来说，从这些事件中获得的所有商业利益都在带给他们的巨大的灾难中烟消云散了……在发现这些地方的特殊时点，欧洲人恰好拥有如此巨大的经济和军事优势，因此，他们可以毫不顾忌地侵犯这些遥远国度的利益。但之后，殖民地的本地居民也有可能会变得强大，欧洲有可能会江河日下，甚至，世界其他地方的居民有可能会获得和欧洲人一样的勇气和力量，同样令欧洲人产生恐惧，并改变国家之间的不平等态势，使其相互尊重彼此的权利。

美国的崛起

美国和欧洲的现代性往往被人们一并视为同一个西方现代性，实际上两者颇为不同。它们的联系在于1607年最先到达美国的移民是欧洲人。到1790年，美国共有392.9万人，其中69.8万人是奴隶，他们不被视为美国社会的一部分，白人中有80%是英国人（剩下的20%主要是德国人和荷兰人）。一波又一波的欧洲移民带来了他们的价值观、信仰、风俗习惯、知识和文化。他们的目标是在新世界中重新建立起一个旧世界。但是，与欧洲资本主义还保留着封建残余不同，这些欧洲移民不受已经存在的社会结构或风俗习惯的限制。实际上，他们可以不受历史的羁绊，一切从零开始。当然，这也使美洲本土的印第安人在极其野蛮的“种族清洗”运动中遭受重创。

当欧洲长期陷入土地不足的泥沼时，美国的欧洲移民则没有受到类似的约束。伴随着对美洲原住民的大规模屠杀，他们神话般地向西推进，领土范围不断扩大。欧洲人拥有强烈的版图和领土意识，但美国人还没有形成类似的归属感，因为他们无须如此或根本没有类似的经验。美国如同一张白纸，可以随意制定规则和设计体制：从一开始，美国民众就深受新教教义的影响，偏好抽象的原则理念，相关理念则在美国宪法和后来强烈的普世主义及全球终极使命意识中得到了完美体现。

欧洲移民带来了众多的价值观和宗教信仰，但却几乎没有欧洲本土的阶级理念，这令美国白人产生了一种认同感。将非洲奴隶排除在美国主流社会之外，加上对美国印第安人的屠杀，这让欧洲移民的身份认同打上了深深的种族烙印。广阔、富饶的沃土提供了无穷无尽的机会，持续扩展的边界给国家灌输了一种强烈的乐观主义情绪和勇于变革的精神。美国国内市场并没有受到地区偏好及盛行于欧洲的阶级差别、地位尊卑的影响（美国民众的属性基本相同，地位大体相当），也更加容易接受标准化的产品。劳动力的相对稀缺，刺激人们不断地引进节省劳力的机器以提高生产力。与欧洲不同，美国很少出现抵制机器化生产和流水分工的现象。因此，美国经济对技术革新、机械化、产品标准化、劳动过程持续改进和规模经济的强烈渴求，远非欧洲所能及。全新的大众市场和大众消费者以及在广告等领域随之出现的创新，是美国模式的鲜明特征。因此，从19世纪晚期开始，美国的资本主义远比欧洲的更具活力和创新能力。

1820年，美国经济仅占世界GDP总量的1.8%，而英国的比例却高达5.2%，德国也达到了3.9%。到了1870年，美国占世界GDP的比重已经上升到8.8%，同期英国是9.0%，德国是6.5%。1914年，美国占世界GDP的比例攀升至18.9%，而英国只停留在8.2%的水平，德国也只有8.7%。1950年是美国经济的全盛时期，占全球GDP的比例达到27.3%，相比之下，英国只有6.5%，德国只有5.0%，西欧加起来也仅为26.2%。

尽管两次世界大战带来了极大的创伤，但1870~1950年期间，美国经济还是大大超过了欧洲的水平，这为“二战”之后的美国成为全球最强大的国家奠定了基础。美国摆脱了“欧洲殖民地”的命运，成为第一个真正的全球霸主：美元被奉为世界货币；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等一系列新型全球机构的主导，更是美国经济霸权的体现；基于强大制空权的军事优势更是前所未见。美国成功地创建了一种全新的世界体系——美国是当之无愧的霸权国，但体系又保持了开放性和包容性。随着苏联的解体和中国日渐加入其中，这一体系最终发展到了顶峰。到了1960年（可能更早），美国已经取代欧洲成为一个令世人瞩目的典范。凭借好莱坞和电视肥皂剧，还有以可口可乐和李维斯牛仔裤等为代表的消费产业，美国展示出了一种全新的文化霸权和影响力。美国大学汇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顶尖学者和学生。在诺贝尔奖获得者名单上，美国永远名列前茅。当英语成为世界通用语言而流行于全球时，其背后隐含的是美国巨大的影响力和吸引力。

美国已经成为现代性的一个新隐喻：没有沉重的历史包袱、毫无负担、善于革新、拥有新边疆精神[注]。它诞生于当下，并且从未过时，秉承了宪法所体现的一系列抽象的行为准则，全社会都在致力于永不停歇的创新之中，源源不断的移民不停地改变着国家的构成和国民的认同。硅谷的兴起、人们对整容手术的嗜好、拉美裔人口日益增长的重要性，虽然体现在美国社会的不同方面，但都是美国精神的最新表现。美国现代性的特征与欧洲的截然不同，但美国的现代性确实源于欧洲的事实，又意味着两者之间存在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和亲切感，且很可能保持下去，在全球背景下尤为如此。血缘、种族、历史、文化、宗教、信仰以及共同的利益，掩盖了美欧之间深刻的分歧，“西方”这一称谓的普遍使用已经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所谓的“西方”，不仅是就地缘政治的意义而言，更重要的是从文化、种族和民族的角度而言。“西方人”一词，已经栩栩如生地刻画出所有这些潜藏的含义。

无论欧洲和美国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分歧，它们都会继续保留价值取向和身份认同的共识；实际上，非西方国家及其文化的兴起可能会巩固这种取向与认同。当然，欧洲新的少数族裔的逐渐增多和美国非白人少数民族重要性的日益增长（奥巴马的当选折射出这一点），正逐渐改变着欧美的社会，但是这种进程不应该被夸大。要让大西洋两岸的、仍占绝大多数的白人不再主导其所在的社会，还需要漫长的时间。

西方塑造了我们生活的世界。尽管现在中国的影响力与日俱增，但是西方仍然是当今世界地缘政治和文化的主导力量。西方对世界的影响如此之深，以至于难以想象如果没有它，或者所有这些从来没有发生过，世界将会怎样。我们将西方霸权的存在视为理所当然。西方霸权是如此根深蒂固和无所不在，以至于我们认为它的存在是与生俱来的。历史学家J·M·罗伯茨（J. M. Roberts）自信地写道："显然，西方文明的故事现在成了全人类的故事，其影响力的传播范围如此广泛，使过去那些反对者和对立者都变得黯然失色、毫无意义。"不过这也不尽然。西方霸权既不是自然的产物，也不是永恒的，相反，在某个时间它必将走向终结。

---

1. 新边疆是肯尼迪总统提出的施政方针，要求美国人民探索和解决"新边疆"以外面临的各种问题。——译者注

第2章
日本：现代国家但非西方国家

在东京过马路，是一种特别的体验。几乎每一个十字路口，哪怕是一个小路口，都设有交通信号灯，其中还有一个是专为行人所设。过马路时，即使没有汽车，人们也会耐心地等候绿灯，无论男女老少都鲜有闯红灯的情况。这就形成了巨大的群体压力。作为一个慢跑者，我发现东京的交通让我内心很纠结：密密麻麻的交通信号灯严重打乱了我的跑步节奏，但是每次想要闯红灯，我的内心都会产生一种负罪感，所以最后都能忍住冲动，哪怕当时身边一辆车都没有，甚至一个人都没有。这是一个遵守规则、协调一致的社会，这种特性会传染给身处其中的每个人。

就像防晒霜和蚊香一样，在某个特定的日子，泳帽会出现在所有的超市里，而过一段时间，它们又会突然消失。无论身处哪所学校或哪座城市，所有学生都穿着同样的制服，唯一的区别就是初中生和高中生的制服有所不同。一旦某件产品获得了5%~10%关键群体的认可，它便立刻像野火一样随风蔓延开来。对于90%的美国人来说，彩色电视机的梦想，等了20多年才实现；而在日本，却用了不到10年，1970年前后，日本的彩色电视机需求呈直线上升。曾在青少年杂志《Cawaii》担任编辑的吉行（Yoshiyuki）说，只要有5%的少女喜欢某样东西，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会有60%的少女跟风。尽管日本的年轻人都非常注重打扮，但是他们的时尚品位体现出强烈的一致性，缺乏个性。

日本庆应义塾大学的经济学家嘉治佐保子（SahokoKaiji）指出："在日本，你可以放心地把车停在大街上，即使忘了上锁，第二天早上它依然原封不动地停在那里。你即使把立体音响放在汽车的仪表板上，把手提包放在座位上，也不会发生任何事情。"地铁上，女士们可以开心地享受旅途，哪怕钱包就在打开的手提袋的最上层清晰可见，也无须担心；拥挤的汽车上，男士们可以将手机放在牛仔裤的后兜中，根本不用担心会被偷。嘉治佐保子补充道："日本人总是那么友善和守信。如果你在某家商店订购商品，并被告知大约需要两周的时间才有货，一旦商品提前到达，他们一定会给你打电话，而且十有八九商品会早到。"在日本，你很少能看到乱扔的垃圾，即使是在每天接待200万乘客的日本新宿车站。我印象中唯一的一次例外，便是在名古屋附近的丰桥车站，我看到地上有一张小纸片。当我对日本朋友表达我的惊讶时，他告诉我："别担心，人们立刻就会捡起来的。"

日本人非常有礼貌。见面时，人们总是向你致以最诚挚的问候，并鞠躬行礼。当你来到超市或商店，门口总有人迎接。这里不存在傲慢或粗鲁的行为。无论是排队还是走出电梯，你的个人空间永远都会受到尊重。你会感觉到别人确实拿你当回事儿。人们的包容意识已经深深地影响到日本的社会态度。日本著名的社会学家中根千枝（Chie Nakane）对我说："失业不仅仅是失业者的问题，更是整个社会的问题。"日本是一个很尊重个人感受的国家。在东京成田机场，身穿制服的乘务员会礼貌地示意你按秩序排队。当你正在踌躇自己到底该站在哪里时，地上涂好的脚印会打消你的疑惑。无论车站和机场有多大，你都不会迷路，因为日本人已经周到地准备了种种提示。这种细心周到还表现在日本人对守时的格外重视。在地铁站，站台指示牌不仅预报下一班地铁到站的时间，还会预报停站时间。地铁也非常准时，几乎与预报毫秒不差，人们几乎可以根据日本的地铁来调准自己手表上的时间。

表面上看起来，日本与西方国家极为类似，但实际上却大不相同，套用中根千枝告诉我的一句话：“日本表面上‘很西方’，但骨子里却‘非常日本’。”

日本是唯一一个19世纪便开始工业化进程的亚洲国家，也是唯一一个顺利闯进排外性极强的西方俱乐部的亚洲国家。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日本在效仿西方的尝试上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早在1914年之前就迅速实现工业化；1939年之前又占领了大部分东亚地区，并一直殖民统治到了1945年；到了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其人均GDP已经领先于许多西方国家。当亚洲四小龙在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实现经济腾飞的时候，日本的经济模式成为很多国家和地区效仿的榜样之一。如果我们想了解亚洲现代性的本质，最好从日本开始研究。日本不仅是最早实现现代化的亚洲国家，而且现在仍是亚洲国家中最发达的典范。不过，虽然日本是东亚地区的一部分，但这并不表明它就是这个地区的代表，相反，我们将会看到，日本在很多方面都是独一无二的。

日本从哪里来？

日本的形成，得益于两次与当时最发达文明的融合：公元5~6世纪的中国，以及19~20世纪的西方。早期的日本深受邻国中国的影响，这一点不足为奇，毕竟中国当时已经是一个相当发达和成熟的国家。在吸纳中国文明之前，日本甚至没有自己的书面文字体系，但是后来它吸收了很多中国的字符并将其本土化，融入自己创造的文字中。这一过程其实颇为不易，因为两种语言截然不同、毫无关联。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传统文化逐渐成为日本文化的基石之一。公元6世纪左右，中国的道教、佛教和儒家思想，经由高丽（今天的朝鲜）传入日本。道教与日本的泛神论融合成了神道教。儒家思想则与在中国时一样，变成了占主导地位的统治思想（在精英中尤为如此），至今仍以本土化的形式主导着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儒家思想可谓是当时最先进的

哲学思想之一，是一个涵盖了道德、社会、政治、准宗教等理念的复杂体系。儒家思想最伟大的成就就在于放宽了对人们接受教育和文化的限制，在此之前，读书识字、学习知识的权力只专属于贵族。中国对日本的影响持续了许多个世纪，直到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才被日益崛起的西方影响力替代。因此，日本在中国的影子里生活了几乎长达14个世纪，其中大部分时间都处于附属国的状态，不仅向中国的统治者朝贡，而且深受中华文明的影响。这在日本民众的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孕育了日本国民潜在的自卑感及防御主义和早期的带有军国主义色彩的民族主义。

尽管中国带来的影响是深远的，但这些影响都被融入了日本自身的经验和传统。很明显，日本儒学与中国儒学在各方面都是风格迥异的，中国儒学的核心价值观以“仁”为代表，而日本儒学则更强调“忠”。随着时间的推移，两者之间的差别越发明显。对长者（依权威、血统和年龄而定）的“忠”与“孝”，是作为日本文化核心的等级关系的最关键的特性之一，至今依然如此。中国和日本虽同受封建统治，但却有两点截然不同之处。

首先，中国可以改朝换代，天子可以易人。中国历史上就出现过36个朝代。与此相反，日本的天皇家族被视为神圣不可冒犯。在日本有文字记载的1 700年的历史中，一直都是一个家族盘踞天皇的宝座。其次，中国的统治者享有绝对权力，而日本天皇则没有。历史上只有1/3的时间，日本天皇家族保持着对国家名副其实的统治。而在大部分时间里，日本一直都在接受双重或三重政府的统治，天皇被迫与别人一起分享权力（至少实际上如此）。最典型的形式就是双重统治，天皇虽然名义上是统治者，但政治权力实际上掌握在幕府将军或有军事力量支持的首相或首席顾问手中。换句话说，永久掌握政权的代价，就是扮演一个影响力大为减弱的政治角色。

在德川时代（1603~1867年），真正的政治权力掌握在军方，即幕府将军手中。天皇仅具有象征性和礼仪性的意义，尽管在形式上，将军仍需对天皇负责。鲁思·本尼迪克特在她对日本的经典研究著作《菊与刀》中曾发表了一些有趣的见解：“在很多太平洋岛屿上，都发现了与日本天皇类似的圣主的概念。作为一个圣主，可能参与也可能不参与事务的管理。在某些太平洋岛屿上，圣主可能参与管理；而在另外一些岛屿上，圣主则会授权于他人。但是他的人格总是神圣的。”要了解日本，我们必须把它置于太平洋和东亚的背景下进行研究。

明治维新之前统治日本长达250年之久的德川时代，见证了一个高度集权、形式化的封建制度的创立过程。自皇室家族和大名[注]以下，整个社会分为四个等级，其等级制度如此森严，使当时的社会具有某种类似于种姓制度[注]的特征：四个等级分别是武士、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严格地说，还有一个等级——贱民，也就是被社会遗弃、不可接触的人。贱民从事的都是与死亡相关的工作，如殡仪业、被执行死刑者的掘墓人、死去动物的剥皮工等。他们一直都被看成社会的隐形人，是社会中可有可无的角色，直到今天仍然如此。贱民与华裔和韩裔一道，都被排除在日本的主流社会之外，这也算是上文所提及的日本包容性的例外情况。

在日本，人们的身份等级是世代传承的，千百年来一成不变。一家之主都需要在自家门道里张贴标注，表明自己的阶层地位和世袭身份以及符合他身份的规范。他与生俱来的权力决定了他能穿什么样的衣服，吃什么样的食物，住什么样的房子。大名每年都从农民那里收缴一定比例的粮食，除了满足自身的需要，还要给下属的武士分发一部分。武士没有土地，他们的正式职能是保卫大名及其土地和财产。他们是唯一被允许佩剑的社会成员，比起地位更低下的阶层，他们享有广泛而独断专行的权力。在德川幕府时代，大名主要对将军负责，而将军至少在形式上要对京都的天皇负责。日本的儒家思想与中国的

不同：后者尤其重视智识的杰出（官话便是竞争激烈的科举考试的产物）；而在日本，最卓越的称谓都给了武士，幕府时代尤其崇尚武士道精神。在德川时期，中国实际上是一个和平的儒教国家，而日本则是一个尚武的儒教国家。

德川家族是从17世纪初开始统治日本的。上台不久，他们便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切断日本与外界的联系，并镇压基督教，抵制外国对日本习俗和宗教传统的影响。欧洲船只不许使用日本的港口，只有荷兰可以把出岛作为贸易港口。日本人被禁止建造或经营大型船只，否则要受到严惩，这些规定严重阻碍了日本沿海的贸易活动。统治者制定这些政策的原因，似乎是希望能以此来限制商业活动，同时也表现了他们对外来影响的恐惧，尤其担心从欧洲进口的枪支会动摇各藩和将军之间微妙的权力平衡。尽管这些行为让日本倒退到专制主义时代，但是德川时代也出现了很多充满活力的变化。随着语言的日益标准化，不同地区的人们的认知和生活习惯趋同，日本社会日益朝着一元化的方向发展。

总之，当时的日本已经开始具备形成现代民族国家所需的条件。新建的道路网络两侧，一座座城市拔地而起，逐步发展成为充满生气的贸易中心。而遍布全国的道路网络，则进一步发挥了促进国家统一的作用。到德川幕府的末期，江户，也就是今天的东京，其城市规模堪与伦敦相媲美，人口也超过了100万；当时日本其他的一些城市，例如大阪、京都、名古屋和金泽，也具备了相当规模的人口。如在第1章所描述的，1800年的日本与当时的西北欧国家相比，经济更为发达，尽管日本当时与欧洲和中国一样同样面临着资源限制的问题。此外，与当时的中国一样，日本也并没有海外殖民地可供其改善自身的状况。但与中国不同的是，日本能够通过远洋捕捞获取一定的食物与肥料，而且可以从国内人口较少的地区调配必要的商品，这令其情况要比中国好得多。在1868年明治维新的前夕，日本经济腾飞可谓万事俱备，只欠一个以此为目标的政府。

最后，还有一点我们必须注意，就是武士的职能和作用不断变化。虽然他们最初的职责只是保卫大名的利益，但是随着后来必须承担越来越多的管理和保护大名财产的责任，以及代理主人与其他大名和幕府之间的谈判协商和签订条约的事务，武士的作用不断扩大。事实上，在明治维新前夕，他们就已经从一个军人阶层转变成日本社会里一个关键的管理阶层。尽管这些武士也笃信儒学的治世思想，但是他们的认知和立场本质上还是倾向于军事和科学技术，而不像当时的中国主要侧重于文学和学术理论。这种目标和倾向，对明治维新后的日本的特质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明治维新

1853年，美国海军上尉佩里率领“黑船舰队”，出现在江户湾（今东京湾），粗暴地打破了日本国德川时代相对和平与稳定的局面。佩里代表美国及其他欧洲列强，特别是英国，要求日本打开国门进行贸易活动。日本长期实行的孤立政策，再也无法持续下去：如同19世纪其他许多国家那样，日本再也不能无视西方及其疯狂扩张、抢掠的行径了。1858年，在持续不断的外部威胁之下，日本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列强由此打开了日本的贸易之门，并在日本的主要港口实行治外法权，从而使西方人逍遥于日本法律之外。这些不平等条约严重削弱了日本的主权。1859年，日本被迫取消已经执行了300多年的对基督教的禁令。

英国、美国、法国、荷兰等西方国家的干预，引起了日本国民对西方人（或其称之为“南蛮”）的强烈反感和愤怒，国内掀起了一波巨大的排外浪潮。面对日益动荡和骚乱的局势，德川政权陷入了几近瘫痪的困境。这样的状态持续了两年，并于1868年达到了顶峰。随后，幕府制度被萨摩藩和长洲藩联合推翻，一个由前武士阶层所主导的新政府取而代之。武士是德川幕府倒台的主要推动者，也是新明治

政权（以1868~1912年统治日本的天皇来命名）建立的主要发起者。明治政府致力于创建一个现代的国家，为创立这一新政权、获取在新政府中的威望，武士阶层也所付出了不小的代价：原有的封建特权被废除，被剥夺了随身佩剑的权力，所获取的报酬也由实物改为了现金，实际上也有所减少。

长达两个半世纪的德川幕府统治结束了，这场富有戏剧性的政治变化却并没有任何政治蓝图、政治目标或政治远景的引领。刚开始，日本国内从上到下都弥漫着浓厚的反西方情绪。然而，越来越多的统治精英越发清楚地意识到孤立并非上策：如果日本想要从西方国家的野蛮行径中幸存下来，它就必须应对西方的种种挑战，而不是忽视、逃避。新兴的统治阶层，虽然先前还充满仇外情绪和孤立情结，但在经历了彻底的政治转变之后，他们产生了强烈的共识，明确了自己的目标，并决心迅速实施。他们创建了一个现代君主立宪制，设立了首相来辅佐天皇，但实权都集中在首相手中。到1869年，日本民众可以自由选择婚姻和工作。1871年，日本的封建体制事实上已经解体了。1873年，日本颁布征兵令，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征兵，实际上彻底废止了只有武士才能携带武器的特权。此后，政府立即着手建立工厂，由先前的武士阶层负责运营，这些举措使日本迎来了一个全新的、极具特色的经济时代。

如果说早先吸收中华文明的精髓，对日本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那么遭受西方威胁的亲身经历，则令日本新的统治阶层坚信：如果日本希望维护国家独立，不重蹈中国经历鸦片战争之后主权沦丧的覆辙，就必须尽快向西方学习。明确了发展方向，日本新政府便开始付诸行动，在缺乏明确的目标和详细规划的情况下，其行动之快速、意志之坚定，涉及范围之广泛，可谓史上所罕见。

在这令人惊叹的20年里，日本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国家，迅速建立起一系列全新的机制。日本派出特使和代表团到欧洲乃至美国，研

究到底应该学习什么、借鉴什么、吸收什么。相关工作十分系统化，其目的在于明确哪些国家能在特定领域能提供最多、最有价值的信息和经验。效果也是立竿见影。日本1873年引入的教育体系，就是以法国的学区制为模板。其海军的建设师从英国，陆军的建设则先后借鉴了法国和德国的经验。铁路系统是以英国为范本，大学的创设则是效仿美国而成。1871~1876年间，大约有300余名欧洲专家被政府部门和相关机构邀请到日本，协助日本进行相关领域建设的规划与实施。其结果便是外国经验，以颇具日本特色的方式，开始不知不觉地融入日本的民族特性之中。

19世纪70年代后期，政府开始低价出售新建工厂。由此，日本开创性地孕育出了资产阶级。当时政府首先是通过给武士发放俸禄，取代了过去发放实物的封建的做法；后来又以发行债券的方式取代了俸禄。很多武士都用手中的债券购买了政府出售的工厂，成为新兴资产阶级中的一员。因而，日本的资本主义业主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两个显著的特点，并且在明治维新以后，一直作为日本的标志延续至今。首先，他们之所以能够存在并取得举足轻重的地位，主要得益于日本政府的慷慨赠予和大力资助，所以他们也背负着艰巨的责任和义务；其次，依据他们的背景、接受的训练和品性来判断，这些新兴资本家更像是管理者而非企业家。

就许多方面而言，明治维新都具有革命的特征。明治维新的目的在于建立一个现代国家，消除封建残余。新的统治精英不是从大名当中提拔起来的，而是主要来自武士，其中包括部分并入武士阶层的农民，还有一些商人。日本的阶级力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与欧洲不同，日本的新兴阶层——商人，既没有发起变革，也没有投身其中进行推动。实际上，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商人并没有与原有的体制发生冲突。相反，明治维新的领导人，也就是原有统治阶级中的武士阶层，则逐步转变为更广义上的统治阶层。为了强调历史的延续，同时也为了巩固大众的支持、为新政权提供合法性，武士重新尊奉天

皇，令其在日本的政治生活中扮演更为核心的角色。天皇迁都东京，便是一个极富象征意义的举动。与其说明治维新是日本人民自下而上的起义，还不如说它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自上而下的政变。因此，明治维新虽具有若干革命的特征，但实质上则是一场复辟，以将日本从外国的威胁中拯救出来为名，行维护现存精英权力之实。其目的则在于开展激进变革的同时尽可能地保留和维持日本的现状。

日本是一个非常保守的国家，其延续性远远超过了变革的程度。甚至在1868年，当变革势在必行的时候，它也没有像法国和中国那样采取革命的手段。那些意识到变革是大势所趋的统治精英，在实践过程中也在尽可能地保留原有的体制。因此，与大多数革命相比，明治维新的流血牺牲相对较少，也就不足为奇了。此外，统治精英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地保留了日本原有的生活习惯、传统、习俗、家庭结构、等级关系和层级结构。明治维新证明了日本精英阶层的灵活性、实力、适应能力以及在情势危急的情况下改变时局的能力。

欧洲的革命与日本的明治维新相比，存在一个根本性的差别。例如，虽有其他诱因，但法国大革命主要是对资产阶级兴起这一内部发展的回应，而明治维新则是源于对外部威胁即西方列强扩张的回应。当然，这也是欧洲和其他地区最根本的地缘政治差异，欧洲是领导者，也是掠夺者，因此其他国家必须找到一种对付欧洲列强和其扩张行径的方法。这一差异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明治维新是由一部分统治精英而非日渐兴起的反抗团体发起。迫使日本做出改变的不是商人阶层的兴起，而是西方国家的外部威胁。

历史的传承

日本是世界上第一个在西方现代性的压力之下，主动开展现代化进程的国家，这是一种在西方强权和主导地位下不得不做出的现代化

选择。因此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日本刻意、自觉地在西方化和本土化之间保持了平衡。尽管如此，与后来的其他亚洲国家现代化的例子相比，日本仍处于相对有利的地位，那就是能自由地做出抉择，特别可以自主选择现代化的方式，而后来的亚洲国家根本无法如此。因此，日本堪称一个绝佳的研究案例：一个国家的现有统治精英为了维护国家的本质特征，自愿并精心地开始了西方化进程。

尽管在德川幕府统治时期，日本几乎与世隔绝，但纵观历史，在关键的时间节点，日本对于外国的影响总是能展示出开放性，早在公元5~6世纪，处理与中华文明的关系时就是如此。在必要的时候愿意借鉴国外的经验，正是日本社会的能力之一。对于外部的理念，日本没有全盘照搬，而是在借鉴的同时力图保持日本的本质特征，也就是日本作家吉野耕作（Kosaku Yoshino）所描述的“我们自己的领域”，即传统习俗、体制和价值观。正如吉野耕作所说：

> 为了坚守“我们的领域”，人们选择并坚守了重要的差异。这不仅是为了区分“我们”（日本人）和“他者”（向其借鉴文化因素的其他国家），更重要的是，要强调“我们的领域”的存在，从而表明“我们”的民族作为一个文化实体的延续。这样，也就保持了历史的延续性。对于“我们”的文化领域，日本一直秉持排外的态度。

日本的独特性主要以两种方式来界定并加以保留：第一，在日本独有的认知领域，保留着那些被视为具有排他性的和真正意义上的日本要素；第二，将各种各样的外部影响因素与那些被视为日本特有的要素结合起来，形成独一无二的文化结合体。正如有人认为，就日本的自我意识而言，日本的“我们的领域”这一理念的重要性，要远胜于将外部因素与日本因素结合起来的“混合性”。尽管日本的独特性也包含了榻榻米、日本清酒、相扑等物质因素，但是其归根结底还在

于日本人行为举止的不同，或日本人和其他国家民众之间存在的根本性差异。在日本，这种二元性或混合性一直与其本土性并存，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能够找到外国因素的影子。在某些方面，两者以某种方式共存，互不干扰；在某些方面，则是将外来影响的精髓吸收、重构，与之融合。故而，日本现代性是一个相当复杂、不协调、有时候甚至有些怪异的现象。日本的混合性可以追溯到受中国文化影响的时代，但是在西方化过程中却表现得最为明显，日本所受的精神创伤也是最大的。这种融合是如此根深蒂固，使人们理所当然地将其看成日本天生所固有的特性。人们虽然上班时经常穿着西式的服装，但在周末，和服却到处可见，人们在家也经常穿着传统的服装。日本料理也深受中餐和西餐的影响，筷子和刀叉都是常用的餐具。正如上文所提及的，追溯历史，日语也深受汉字的影响，包含了由汉字演化而来的字母。

在大规模的西方化之后，本土元素和西方元素的关系，一直是日本认真思考和激烈争辩的主题。1868年后，日本一直处于西方化和日本化的交替的状态。明治维新后的前20年，日本国内许多领域迅速西方化，但是到1900年，这种现象让位于内省和对国家本质特征的界定。在这场争辩中，日本的国民性得以用三个特征来界定：天皇制度、武士道精神和家元社会的理念（天皇是最大的家元，相当于父亲的角色）。在“二战”失败并被美国占领后，日本再一次进入了疯狂追赶西方经济和西方化的时期。随后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期，又迈向了更深层次的重新定义日本国家本质的阶段。然而，历史从来都不会故步自封，在这一节点上所展示出的日本“国民性”概念，与其在20世纪初的意义完全不同。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性（nihonjinron，即关于日本国民性的讨论）聚焦于日本是一个集体导向的单一同质社会，认为日本是一个不善言辞、难以琢磨的民族。“二战”后美国对日本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日本性的界定也是通过与美国进行对比而得出的。因此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这种看法不足为奇。

当然，实际上日本国民性的本质无法用如此简单的词语来描述。日本性是针对西方影响而做出的具有政治色彩的文化回应。它让我们了解了日本人的许多心理，了解了他们希望保持自身特征的愿望，但是也只能部分地揭示出日本所固守的差异性。鲁恩·本尼迪克特在其著作《菊与刀》中指出：

> 在研究西方国家时，如果研究者没有接受过比较文化研究方面的训练，就会对整个行为领域视而不见。研究者会对一切都习以为常，不会去探究日常生活中的那些细小的习惯，也不会探究在家庭生活中约定俗成的惯例。而这些习惯和惯例恰恰是整个国家文化的体现，其对该国家未来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外交官签订的条约。

与其他国家一样，日本的独特性（从人际关系的本质到引导人们行为的价值观），恰恰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而且经常为人们所忽视。

日本的人际关系，要遵循严格的等级制度，这种等级制度主要基于人们的阶层、性别、年龄来做出划分，每一种人际关系都可以根据以往的接触频率和熟悉程度精确地分出等级。等级制度的重要性，最初都是从家庭中习得的，父亲毫无争议地扮演一家之主的角色，每个家庭成员都各就其位。家庭是整个社会的缩影：国家、公司都是按照家元体制构成的。关系中的等级差别在语言的使用中也得以体现，比如，在称呼“你”的时候，要根据对方的社会地位来选择不同的词语。语言也是分性别的，男人和女人需要使用不同的词语和称谓。日语有敬语体系，在使用敬语的时候通常会伴有按等级设定的鞠躬动作，鞠躬的角度取决于对方的身份地位，公司经常建议员工们根据他人的地位来确定鞠躬的角度。

日本的习俗不仅要求人们尊重等级制度，而且还包括一个庞大而复杂的责任体系，也就是所谓的“义”。日本存在两种类型的“义”：一种是“义务”，是无限的、终身的，例如对自己的父母就要有“义务”；另一种则是“情义”，是有限的。这些“义”构成了日本社会的核心，日本的“德”是从是否有“义”的角度来判断的，而西方社会的“德”则通常用金钱来衡量。如果一个人没有“义”，就会产生一种羞耻感。从广义上讲，文化可以划分为原罪文化（如基督教衍生出来的西方文化）和原耻文化。原罪文化源于“原罪”的观念，认为人生来都是有罪的。而原耻文化是通过站在他人的立场上审视自我，从而进行自我约束的产物。日本社会深深根植于原耻文化：与一个人自己的良知相比，他如何被别人评价，才是最为重要的。罪恶感可以通过道歉来减轻；而羞耻感则正好相反，几乎是无法减轻的。其结果就是导致了一种非常独特的行为方式。比如，在西方社会，自杀是一种自私的举动，会被人不以为然；而在日本，自杀却被视为敢于担当的终极表现形式，因此是一种崇高的行为。在日本社会，自杀现象很常见，平均每100 000个男性中就有35.6个会自杀；而美国只有17.9个，英国只有10.8个，德国则为19.7个。

基于等级和“义”的人际关系，在日本所有机构的运作方式中也都有所体现，无论是“数代同堂”的大家庭、公司，还是学校、政府等，皆是如此。以企业为例：大型企业与依附其的中小型企业之间的关系就呈现出明显的等级特征。至今仍在大型企业中盛行的终身雇佣制，就体现出公司和员工双方的一种“义”的观念。这与盎格鲁－撒克逊传统中的合同制（往往是短期的）完全不同。公司被看成是一个大家庭，公司对雇员承担许多义务，而雇员（几乎都是男性，与西方相比，日本女性工作的比例仍然很低）则会将自己的大部分时间献给公司作为回报，无论是就整个职业生涯还是每天的工作时间来说，皆是如此。在日本的公司中广为应用的年资制度，也是日本社会中年龄等级结构的反映。一个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在公司的地位也就越高，

收入和权力也就越多，而不像西方国家的公司，员工到了一定岁数便会被解聘。

独具特色的关系文化对日本民众对于各种机制的态度及各种机制所能发挥的效用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例如，日本人竭力避免运用法律解决问题，其主要原因在于他们不喜欢对簿公堂所体现出的对抗性。因此，日本的律师很少，无法与欧洲相比，就更别提美国了。几乎所有的民事纠纷，都是采用调解的方式来解决，要么在法庭之外，要么在任何司法判决做出之前。

表2–1 日本人对待性别的态度

	认为男人应该出去工作，女人应该留守持家（%）	认为男人和女人有平等的工作权力（%）
日本（东京）	16.2	46.4
美国（纽约和洛杉矶）	10.5	81.2
英国（伦敦）	10.5	81.8
法国（巴黎）	3.2	91.3
德国（柏林）	2.6	92.1
瑞典（斯德哥尔摩）	3.2	80.4

数据来源：日本电通人类研究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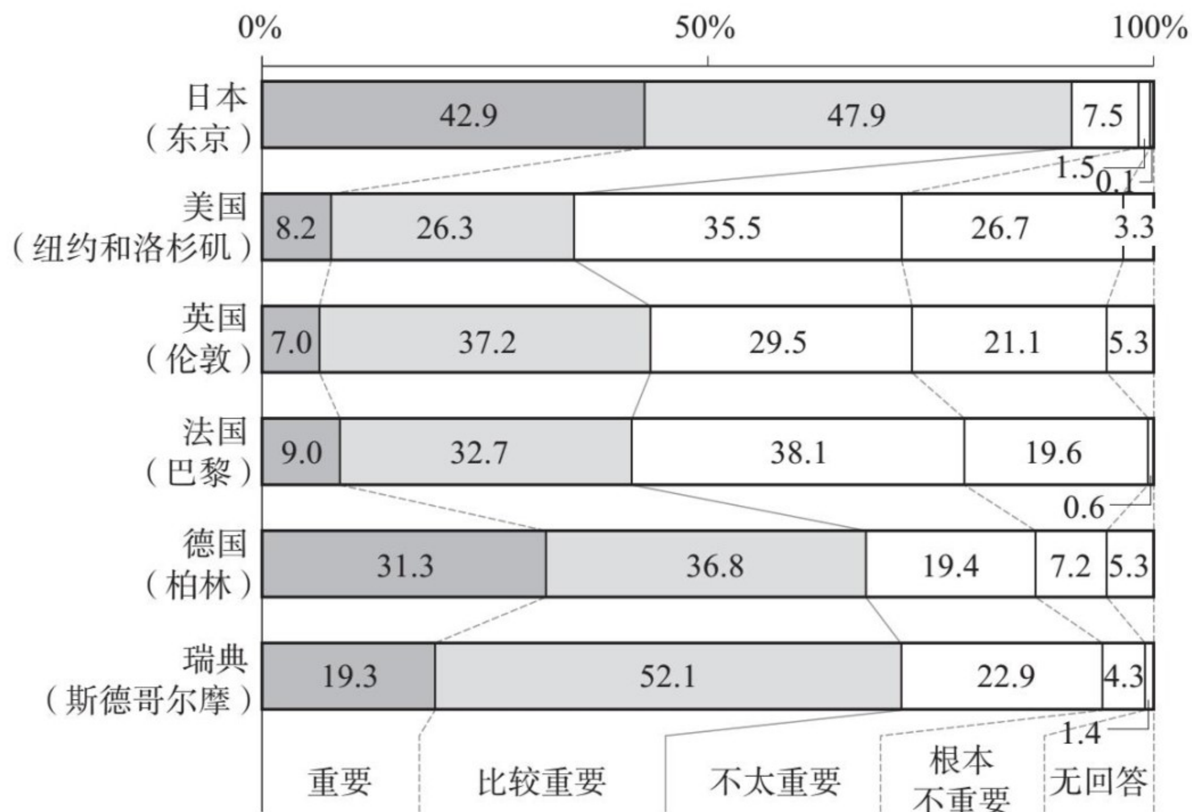


图2-1 日本人的工作责任感

数据来源：日本电通人类研究所

人们应该不会对日本的这种独特性感到意外。即使只是偶然地接触日本社会，也应该会有这种感受。尽管事实上日本和西方的发展水平大致相当，但正如上文的图表中所展示的，两者的文化和价值观至今仍是截然不同的。为什么会如此呢？首先就在于影响深远的文化差异，日本社会根植于一种与西方国家完全不同的文明之中，这一点无须赘述。其次是历史原因：因为明治维新距今并不久远，日本仍然保持着顽固的封建特征。此外，明治维新后的统治精英自觉并有意地竭尽可能保留了原有的体制特征。新的统治集团核心主要由武士组成的这一事实，也意味着会将长期以来所形成的、原有武士阶层的部分价值观带入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并影响至今。“二战”后的日本，如同明治维新后一样，一直由武士的后裔所统治：真正运营大型企业的不是那些企业家，而是他们；主宰自民党的也是他们；下台之后仍然

支配内阁的也是他们；当然，就理论上而言，建立了一百多年来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着核心作用的官僚体制的（在很多其他方面，发挥作用的时间可能更久），也是他们。

不足为奇的是，日本的治理方式也深深地烙上了历史的印记。纵观日本历史，大多数时候，权力都被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中心所共享，这种现象一直延续至今。天皇只是作为国家的象征而存在，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国会也少有实权。相较而言，日本首相的权力也远逊于其他主要发达国家的政府首脑，任期通常也不长。内阁会议主要是礼仪性的，会议时间不会超过15分钟。尽管日本拥有正式的多党制度，但是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自民党便独占权力的宝座（直至2009年为民主党所击败）。在此期间，自民党内的各个派系的作用实际上远比其他各党更为重要。因此，日本的权力分散在一系列各不相同的机构中，尽管就传统的儒家理念而言，官僚体制仍然发挥着最为重要的作用。从美国结束对日本的占领开始，日本就一直被西方视为西式的民主国家，但实际上，日本民主体制的运作模式与西方截然不同，很难说它就是西方民主的翻版。实际上，与西方民主国家不同，在实践中日本并非将人民主权的理念置于首要（关于人民主权，我们将在第6章中继续探讨）。相反，与另一个儒教国家中国一样，日本更为重视国家主权的理念。自1868年以来，日本可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历史的影响至今犹存，经久不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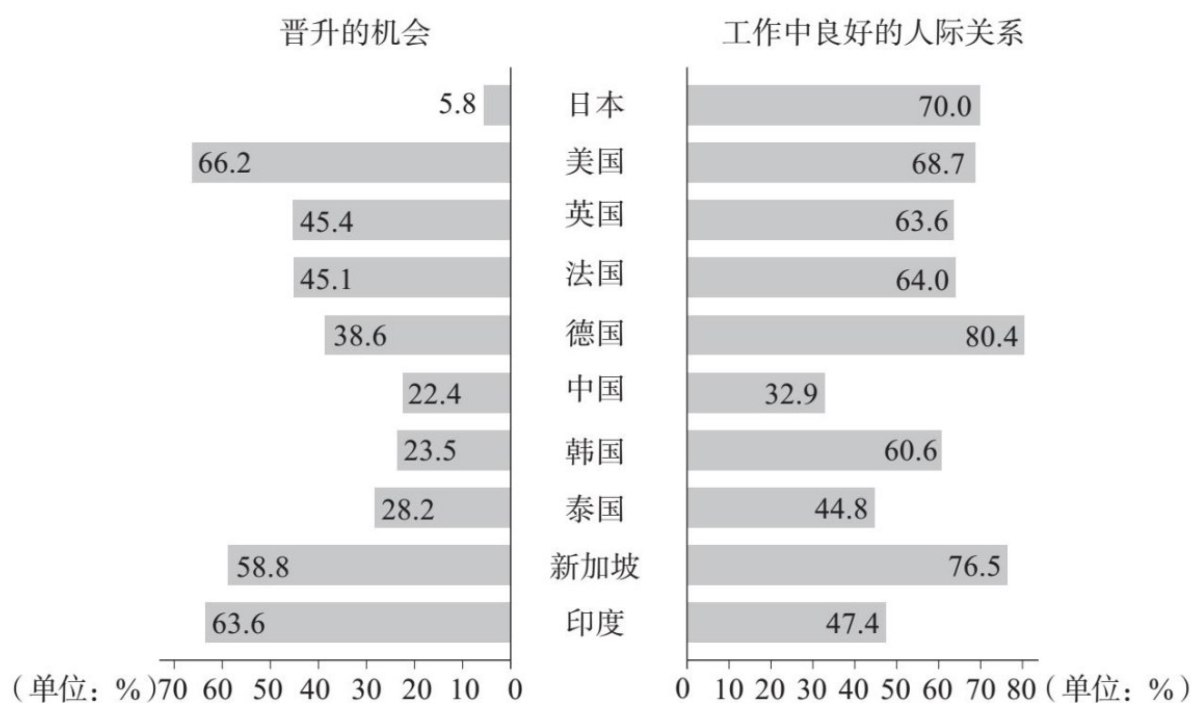


图2–2 日本人对工作场所的期望

数据来源：日本电通人类研究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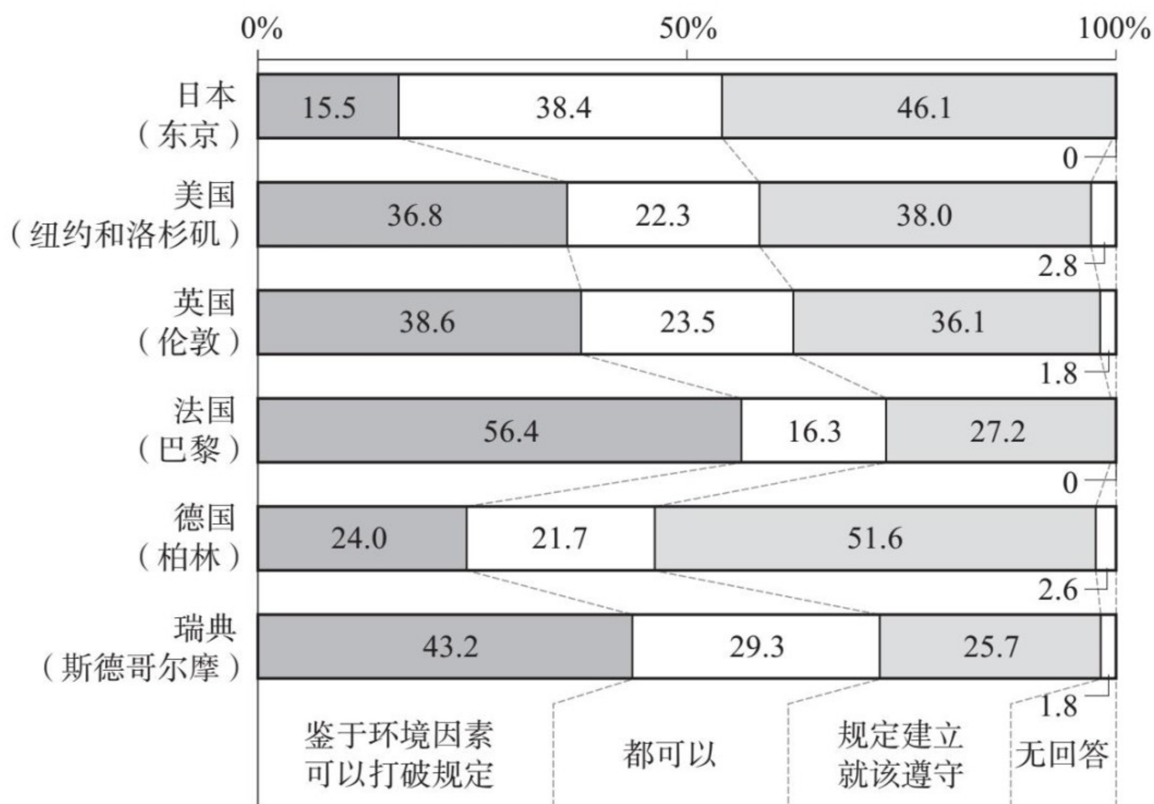


图2–3 日本人对规定的态度

数据来源：日本电通人类研究所

转向西方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的任务就是跨越历史的鸿沟，拉近与西方的距离，效仿西方国家并赢得它们的尊重，最终达到西方的水平，至少要在经济发展水平上如此。赶超西方变成了这个国家新的行动指南。在日本人心目中，1939年以前，西方主要意指欧洲国家；而1945年之后，美国便以压倒性优势取代了欧洲，成为西方代表。当然，最关键的目标是实现经济增长，但是日本始于明治维新时期的殖民扩张，也应归咎于效仿欧洲的愿望：为了成为一个现代化强国，日本必须拥有自己的殖民地。正是觊觎领土的野心，将日本卷入了太平洋战争，直至最终战败投降。那是一个极其羞辱的时刻：明治维新的目的恰恰在

于防止西方国家对本国进行统治，而此刻这个目标已经被破坏殆尽。1868年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最终竟落得个被占领的下场，仿效西方的愿望看起来似乎也要落空。

然而事实证明，战争只是日本历史上最壮观的一段经济增长时期的前奏。1952年，日本的GDP比仍处于英国殖民统治之下的马来西亚还要少。然而，就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日本已经从农业国家转变为成熟的工业化国家，1950~1970年的人均GDP增长率高达8.4%，远高于同期的其他任何国家，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成就。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人均GDP已经超过美国和欧洲，日本也成为工业和金融强国。这是一场非同寻常的变革，但很可惜没能持续下去。20世纪80年代末期，日本的经济泡沫最终破灭，在随后的15年里，经济几乎停滞；与此同时，美国的经济却又重新焕发生机，在一系列新兴行业和技术领域（特别是在计算机和互联网行业）展现出相当的活力。日本对此剧变的反应则颇具启发性——无论是就对日本的评价来说，还是就所有非西方国家在赶超西方的过程中固有的困难而言，皆是如此。

20世纪80年代，日本取得自明治维新后最为显著的成就，它最终赶超了西方国家，但同时也埋下了日后危机的种子。自1868年以来，日本的首要目标便是赶超西方国家，1945年以后，这种雄心更是压倒了一切并主要体现在经济方面。但当这个目标最终实现，当赶超差不多已经完成，当日本在许多关键领域都已经能与最发达的西方国家并驾齐驱，甚至在一些方面具有绝对领先地位时，又将会怎样呢？当明治维新的目标已经实现，下一步该做什么呢？日本并没有答案，该国陷入了一种生存主义的危机。人们一直习惯于从纯粹的经济角度来说明日本的泡沫经济，但我们还可以从更深刻的文化和心理的角度对其进行解释：这个国家及其机构（包括公司在内），完全失去了方向感（见图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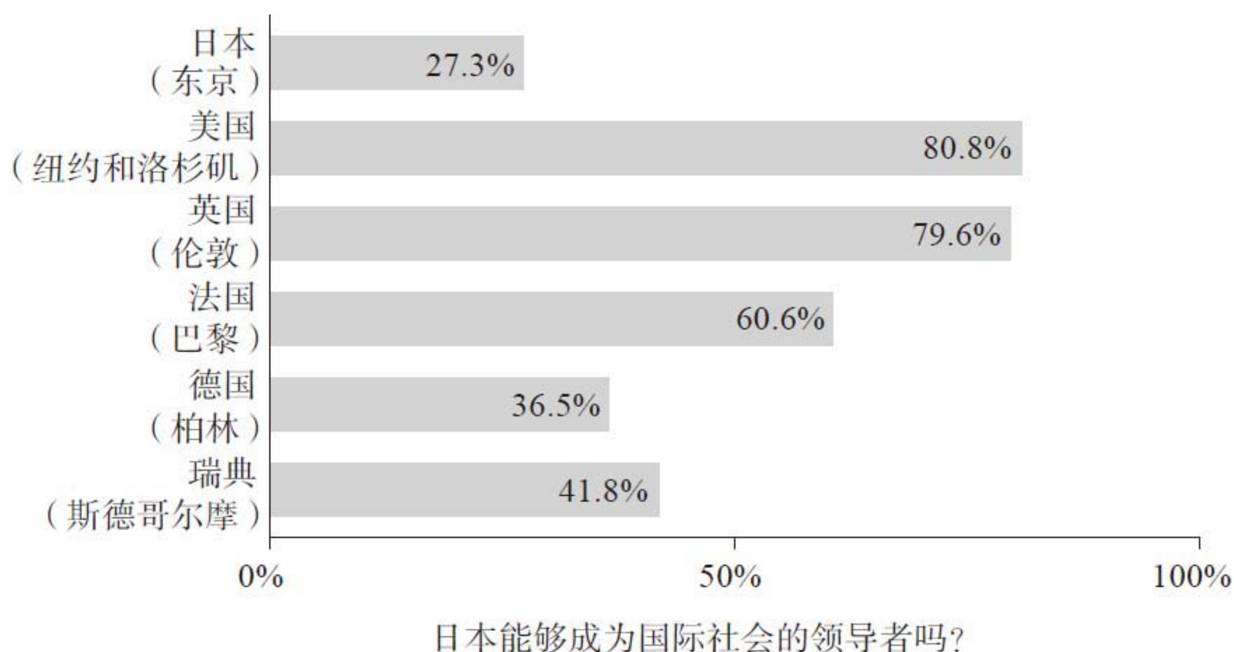


图2–4 日本人对日本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的悲观认知

数据来源：日本电通人类研究所

历史并没有赋予日本改变前进方向的能力和天赋。自1868年开始，在每个历史转折点，日本都展示出了牢牢掌控战略方向和为了远大目标坚韧不拔的非凡能力。日本可能会被人们贴上“一条道跑到黑”的标签，因为该国的所有机构都展示出了坚持走自己设定的道路的能力。这产生了一种强大的内部凝聚力，使日本能够极其有效地实现长期目标。然而，也是由于同样的原因，使得日本在发展路径的改变上显得经验不足、能力有限。日本历史上仅有的、改变发展方向的例子，就是1945年战败被美国占领之后和1868年的明治维新，这两个时期的日本当时都面临着巨大而紧迫的外部威胁。日本这种不善于改变发展方向的弱点，在过去二十余年的时间里，显露无遗。

泡沫危机之后，日本经济陷入了很长时间的停滞状态，举国上下开始进行自我反省，民众普遍感到忧郁和沮丧。有些人竟然提出，日本在历史上曾遭受了两次重挫：一次是在1945年，另一次就是在20世纪90年代。悲观情绪席卷整个国家，揭示出了当代日本国民心理的脆

弱性。在最终实现自己的目标之后，对于下一步该做什么，他们满腹疑问。美国经济逐渐恢复了活力，而日本的经济却仍是死水微澜，日本民众普遍认为日本的成就只是一种幻象，日本注定将永远生活在西方的阴影中。日本国民面对泡沫经济的心理脆弱性直接警示着世人：对于非西方国家来说，赶超西方的过程异常艰难、困难重重。用任何标准衡量，日本取得的成就都是显著的。在很多方面，它或与西方国家平起平坐，或更胜一筹。它甚至轻松地超过了欧洲绝大多数国家，而这些国家曾经是它极力效仿的偶像；它建立了世界顶级的机构，特别是创立了世界知名的跨国企业；日本的经济实力甚至一度升至世界第二。然而，即使在最为灿烂辉煌的时刻，它同样对自身充满了怀疑。

在这样的背景下，理解日本自我认知的本质是非常重要的。与欧洲人或美国人希望并认为自己具有普世性不同，日本人在对本国在世界上所扮演的角色，有着颇为不同的观点。长期以来，日本一直自认为处于主要文明的边缘和外围，而且认为这些主要文明已经创建了普世性的规范和准则。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中国和西方是日本效仿与借鉴的两个主要的对象，同时也是日本坚守“国民性”时所反对和排斥的两个主要行为体。吉野耕作指出，“对于日本人来说，向中国和西方学习是日本获得‘普世’文明的一种经历和体验。因此，日本人不得不一再强调自身的特殊差异，以便将自身与具有普世性的中国人和西方人区分开来。”换句话说，这个特点，不仅将日本与两个世纪以来文明居主导地位的西方区别开来，而且也将其与中国区别开来。要知道，正如我们在后文所要探讨的，中国人一直认为就普世性角度而言，自己的文明是两千年来最为精华的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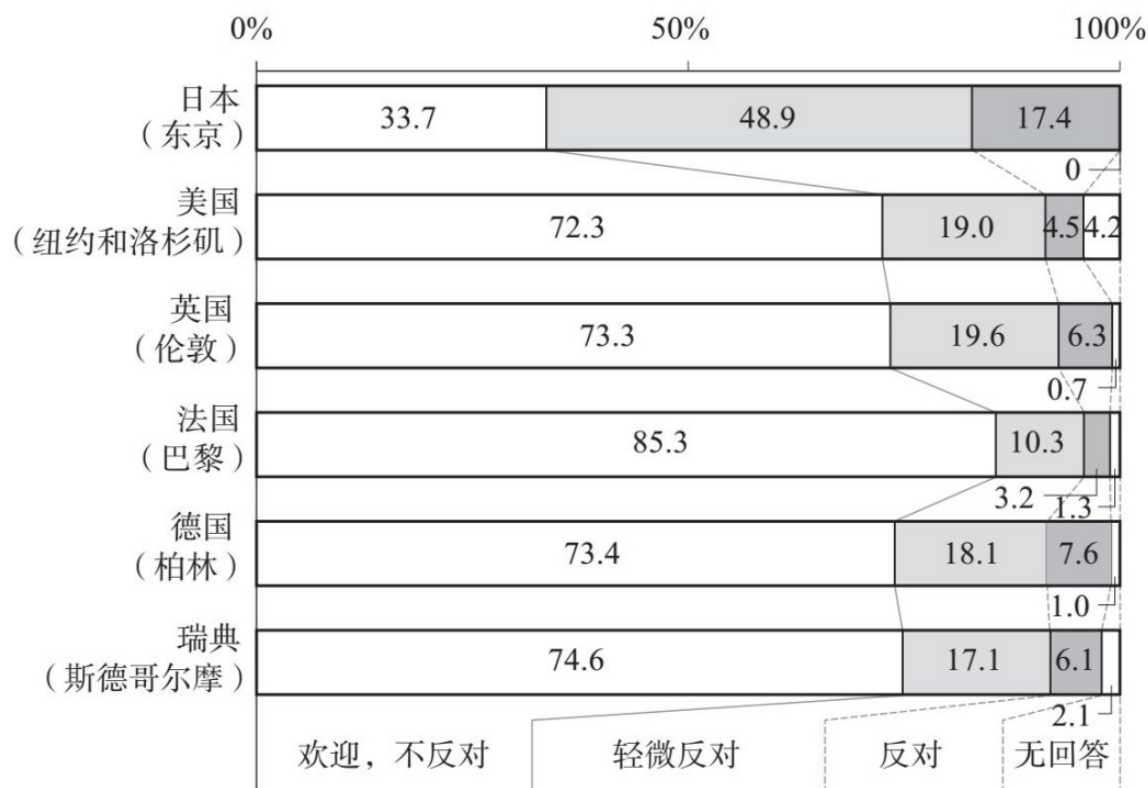


图2–5 日本人对“如果你或者你的家人与一个外国人结婚，你做何感想？”问题的回答

数据来源：日本电通人类研究所

为了进一步理解日本当前的两难处境，我们必须对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对自身所做的、更为广泛意义上的定位进行考量。当时的日本在转向西方的同时，开始敌视亚洲，将邻国视为二等国家。在转向西方的过程中，日本涌现出许多知名作家，最著名的就是福泽谕吉（Fukuzawa Yukichi）。福泽谕吉在1885年发表了著名的《脱亚论》，文中写道：

> 作为当今之策，我国不应犹豫，与其坐等邻国的开明，共同振兴亚洲，不如脱离其行列，而与西洋文明国共进退。对待支那、朝鲜的方法，也不必因其为邻国而特别予以同情，只要模仿西洋人对他们的态度方式对付即可。与坏朋友亲近的人也难免近墨者黑，我们要从内心谢绝亚细亚东方的坏朋友。

日本人很快便将这一新的战略态度付诸实践。1894~1895年，日本击败了中国，占领了台湾，控制了朝鲜。1910年，他们正式吞并了朝鲜。1931年，日本又吞并了中国的东北地区；1936年起，占据了中国大部分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1941~1945年间，他们又占领了东南亚的大部分地区。在1868~1945年的77年间，日本参与了10次大规模战争，时间累积达30年之久，其中绝大多数战争都是对亚洲邻国的侵犯。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整个德川时代的250年里，日本从未参与过一场对外战争。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不仅打算实现经济现代化和效仿西方，而且还怀有领土扩张的野心，自维新初始，日本就提出了“富国强军”的口号，由此可见一斑。尽管日本曾于20世纪30年代打着对抗西方、为亚洲谋利益的旗号，提议建立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但实际上，这只是日本企图征服亚洲以实现其帝国主义利益的一个图谋。

因此，日本人将世界的本质与日本社会中深刻的等级特性等同起来，这一点不足为奇。在以崇拜的目光仰望西方的同时，日本却将身处的亚洲视为落后和劣等的象征，企图征服亚洲以达到富强和扩张的目的。曾几何时，日本认为中华文明是何等优越，现在却将中国视为劣等的民族。在日本看待世界的视角中，种族等级观念是根深蒂固的，至今仍未被打破，这一点可以从它与东亚邻国的关系中得到佐证。白种人仍然颇受尊重，而同种的黄种人则被日本人视为二等公民。种族观念的思维方式在日本主流文化中是根深蒂固的。日本人至今仍坚持“日本人的同质性”（即使存在着很多少数民族）和“大和民族”（即使日本人曾经历多次迁移运动）的理念，认为日本人的“血统”与其文化行为的特定模式是紧密联系的。在日本的关于“自我”及由此衍生而来的“他者”这两个概念中，种族、民族和国家的概念几乎是完全重叠的。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于1986年所发表的、臭名昭著的种族歧视言论，便是例证。中曾根康弘认为美国人的智力水平比日本人的低，是因为美国国内少数族裔的缘故，具体来说就是

因为有“黑人、波多黎各人和墨西哥人”。即使在今天，日本也没有任何反对种族歧视的法律。

然而，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东亚已经摆脱了落后的状态，成为世界上最富活力的地区，日本已不再是一骑绝尘。但是日本对东亚国家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延续着明治时期的扭曲观念。日本仍旧倾向于把自己看成西方国家而非亚洲的一部分。我清楚地记得，1999年曾在东京召开了一次关于日本和欧洲关系的会议，会议曾正式建议日本考虑申请加入欧盟。在东亚国家逐步转变并开始在日本当今所面临的危机中扮演更重要角色的背景下，日本却未能对自身与东亚的关系重新定位。实际上，这一问题正是当今日本日益加深的挫败感的关键所在。日本人很难接受中国的崛起及其对日本的影响，因为这对日本来说不啻为其明治维新之后的自我定位敲响了丧钟。关于日本与东亚，特别是与中国的关系问题，我们将在第8章中进行更充分的探讨。

日本的现代性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日本是在19世纪开启工业化进程的唯一一个非西方国家；是目前为止东亚最为发达的国家；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根据按市场汇率计算的GDP数据）。民众的生活水准令人艳羡，公共交通体系堪称世界第一。与此同时，日本成功地保持了自身的文化和社会特质。然而，日本在“二战”之后所取得成就却从未得到过应有的认可，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亚洲皆是如此。个中原因有三：首先，自1945年以来，日本一直在煞费苦心地强调其与西方国家的相似性而非差异性。战败之后，日本被纳入了美国的势力范围，失去了独立的外交声音，基本上沦为美国的保护国。在此情形下，日本选择了低调，它不希望也没有理由强调自身的与众不同。其次，与东亚的紧张关系意味着日本从来没有在亚洲地区拥有过与其经济实力相匹配的政治和文化影响力。在一定程度上，日本依然存在很多问题，甚至有些声名狼藉。再次，日本一直认为自己独一无二，从来都不觉得自己可以成为他人学习的榜样。

然而，日本仍是第一个实现现代化的东亚国家，东亚地区的不少国家也正是在日本崛起之后才开始了现代化进程。如果没有日本，亚洲四小龙能否实现经济腾飞，恐怕要打上个问号。而没有亚洲四小龙，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毫无疑问将大为延迟。在众多的发展道路中，日本的选择可能是一个例外，但正是日本这一例外反证了规律的存在。目前亚洲很多国家，都跟随日本的脚步，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开启自己的现代化进程，甚至有时让日本感到不适。如果说英国是欧洲现代性的先驱，那么日本在亚洲也应享有如此殊荣。

---

1. 大名：日本封建时代的大领主。——编者注
2. 种姓制度：是印度与其他南亚地区普遍存在的社会体系，是古代世界最森严的等级制度。——编者注

第3章
中国：动荡的历史与翻天覆地的变化

遵从乔治三世的命令，第一个前往中国的英国贸易使团于1792年9月离开了伦敦。他们给这个遥远的东方国度带来了许多稀奇的礼物，比如望远镜、钟表、晴雨表、一辆装有弹簧悬挂装置的马车和气枪。贸易使团乘坐一艘装有66门火炮的军舰和两艘补给舰来到中国，其任务之一是向大清乾隆皇帝展示本国工业革命取得的巨大成就和精湛技术。使团的规模很大，有700多人，其中包括了外交官、商人、军人、科学家、画家、园丁等，担任正使的是伯爵乔治·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马戛尔尼是名经验丰富的外交官，善于发现良机（无论是对国家而言还是就个人而言，皆是如此）。组织此次出访的是代表英国政府的东印度公司，东印度公司实际上是英国的海外代理人，曾代表英国统治印度直到1858年。英国政府非常希望能够打开中国的市场，但之前的尝试都以失败告终，因此在此次出访之前进行了精心的长期准备。英国人首先到了当时已经被葡萄牙所占的澳门，随后又花了4个月的时间向北航行，其间与清朝皇帝的代表进行了若干次谈判，最终才到达北京，见到了期盼已久的乾隆皇帝。

马戛尔尼见到乾隆皇帝的时候已经是1793年的9月。马戛尔尼提出希望能在北京设立英国使馆，结束外国人只能在广州入境或贸易的制度，开设新的通商口岸，确立合理、公正的关税等要求。然而乾隆不为所动，其实他早在使团抵京之前就已打定了主意。乾隆皇帝没有给马戛尔尼明确的答复，而是向乔治三世发布了一道敕令，称“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货物以通有无”。乾隆在敕令中这样写道：

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尔之正使等所亲见。然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是尔国王所请派人留京一事，于天朝体制既属不合，而于尔国亦殊觉无益。”

当时英国的工业革命已经初见成效，虽然81岁的乾隆皇帝对此一无所知，但工业革命的确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并终将为中国所知。随着国力的与日俱增，英国颇为自得，因此对于中国的反应，觉得实在不可思议。遭到拒绝之后，两手空空的马戛尔尼沿着当时唯一一条可行的路线（沿运河南下，纵穿中国腹地，到达广州），离开了北京，踏上了归程。在此次路途中，他坚持做了大量的记录。其中有一段这样写道："清政府好比是一艘破烂不堪的头等战舰，它之所以在过去150年中没有沉没，仅仅是由于一班幸运、能干而警觉的指挥官们的支撑，而它胜过邻船的地方，只在于它的体积和外表。"他对大清帝国的未来非常悲观，认为其命运注定是要"在岸上撞得粉碎"。马戛尔尼指出，中国拒绝英国的要求是没有用的，因为"遏制人类知识前进的脚步是徒劳的"。从马戛尔尼的自负和乾隆皇帝对英国新型生产技术潜力的无知中，我们不难看出一个时代行将结束，另一个时代即将来临。与此同时，不同文明之间的碰撞也在外交礼仪的争执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对于马戛尔尼拜见乾隆皇帝时应行何种礼节，双方进行了漫长而又曲折的争论。早在拜见的6个星期之前，中国就明确要求马戛尔尼必须行三跪九叩大礼。马戛尔尼则坚持用觐见英王的礼仪，脱帽、单腿下跪，行吻手礼，并表示如果中方同样等级的官员愿意向乔治三世的塑像行三跪九叩大礼，他就愿意给清朝皇帝叩头。对于中国来说，这显然是无稽之谈：皇帝是"天下"的统治者，根本不可能与一个遥远的"藩王"平起平坐。甚至围绕着英国带来的物品也产生了许多争论：根据有着1 500多年历史的中国传统，外国人要来中国，只能作为朝贡者前来进贡。在中国人的眼中，马戛尔尼只不过是个附属国的"贡使"，但马戛尔尼则坚持认为自己是代表与大清处于外交

平等地位的主权国家的大使，给清朝皇帝带来的只是礼物。两方各不相让。就这样，两个不同时代、两种不同的文明在没有丝毫相互理解的情况下碰撞在一起。

此次访华最后以惨淡的失败而告终。马戛尔尼关于中国命运的预测也许是中国人无法想象的，但是当时实力不断增强而且富有侵略动机的英国显然已发出了某些暗示。马戛尔尼出使北京的时候，东印度公司已经开始从印度贩卖鸦片到中国，这种罪恶的贸易很快就被证明一本万利。1829年，中国明令禁止进口鸦片，英国对此大为恼火。随着两国关系渐趋恶化，英国发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1839~1842年），凭借坚船利炮在中国南部横行无忌。在《南京条约》中，清政府被迫割让香港岛，而且还首次开放了5个通商口岸并支付大量赔款。中国历史上“屈辱的百年”从此开始了。

如果说作为19世纪开启工业化进程的唯一非西方国家，日本堪称是“伟大的例外”的话，那么中国则是最好的反面教材：即便1800年时它仍与日本处于同一起跑线上，但后来却没有踏上工业化的道路。结果，19世纪的中国被当时的欧洲和美国远远地甩在了后面，随后又在19世纪末被日本超越。1800年以后——特别是19世纪中叶之后，中国经济日渐衰弱、几近崩溃，整个国家承受着分裂、战败和被外国列强瓜分的屈辱，主权大量沦丧。在1850年后的近百年中，中国可谓命运多舛，然而我们决不能夸大这百年进程的所谓“历史意义”。自1949年后——特别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取得的成就说明，其现在所具有的活力根源于自己的历史，尽管当时没有这样的迹象，但也不能说中国被这“屈辱的百年”完全摧毁。不过，这一时期的确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创伤。与日本一样，中国的现代化之路与西方所走的道路截然不同。

辉煌的历史

早在耶稣诞生的数百年之前，中国就已经出现了现代化的雏形。中国第一个皇帝秦始皇的胜利，标志着战国时期的结束和秦朝的开始。在战国时期，当时各诸侯国间战争频发，无休无止，与数百年之后的欧洲颇有相似之处。截至公元前206年，秦朝的疆域已涵盖了现在所认为的中国腹地的大部分地区，包括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之间的人口密集的地区，南至越南南部，北至长城以北。秦朝灭亡之后，汉朝继续开疆拓土，并于公元前141年至公元前87年，达到了顶峰，汉朝军队的足迹东北至今东北地区的南部和朝鲜半岛，南至今越南北部。在此后的一千多年里，中国的领土范围在北方、东北、西北、南方和西南等方向，均有所扩展。中国最终的广阔舆图，几乎与其大陆板块的自然边界重合，北至西伯利亚大草原，东方和南方直逼海岸线，东南方向则为山脉所限。

尽管中国当时已经人口众多，但大规模的内部迁徙、交通设施的不断完善和长达几个世纪的国家统一（或大体上统一）状态，有助于形成一种相对同质的文化。秦朝的存在时间虽然很短，但却建造了6400多公里[注]的官道，其规模与罗马帝国不相上下。一个中央集权制国家的理念，一种成熟的治国方略，在孔子的教化之下深入人心。孔子对此后两千年来的中国政治和精神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秦始皇的统治下，书同文、车同辙，度量衡、货币都实现了统一。中国的独特习俗——知天命尽人事的思想、依靠恪守孝道形成的家庭结构、使用文字和表意体系的语言、基于崇拜祖先观念的宗教，在秦朝都已经得到确立。在此基础之上，在公元后的第一个千年里，鉴于其实际上融合了多民族的事实，中国已经拥有了一种普遍的、强烈的文化认同。

中国在历史上一直都存在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尽管它多次遭受了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尤其是13世纪的蒙古族和17世纪的满族，但是所有这些入侵者，一旦统治得到稳固，便试图学习汉族人的习俗和价值观，并且按照汉族的原则和制度来进行统治（蒙古族是个

例外，但其对中国的统治只有不到100年的时间）。这都证明了汉族人所享有的声誉及北方游牧民族对中华文明的尊重。汉语的延续和稳步传播就是中华文明力量的一种象征：虽然遭受北方游牧民族持续不断的入侵，但居民的被迫迁徙却避免了汉语分化成不同的方言，同时让中国人自己更加深入地了解进而保护他们自己的语言和文化。很早之前就出现的“中国认同”，对于我们今天所知的中国来说，可能比其他任何事情都更为关键。如果没有这种认同，中国就不可能保持超过两千年之久的统一，也会失去其最为重要的特征——庞大的规模。

从历史上来看，较为先进的农业有助于社会维持大规模人口，并能为有组织型国家的发展提供有利条件，中国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中国在12 000年以前就已经开始种植小米和水稻，远远早于美索不达米亚。在至今8 000年前，美索不达米亚才出现原始的农业。虽然中国北方以旱地农业为主，主要种植谷物、大麦和小米，但也已引入了水稻等湿地农业。在公元后第一个千年的初始，水稻种植在北方开始缓慢的发展，但在第一个千年行将结束之际，就已经得到了普及。这不但在后来推动了中国农业的大发展，还促使中国的经济重心从关中平原转移到长江流域。这一时期中国人发明了很多水稻种植的新方法，包括育种、早稻、系统的选种，又发明了能将水引至高处的踏板水车和许多先进的灌溉工具。新技术和新工具使得中国拥有了世界上最先进的水稻种植技术，极大地提高了农作物的产量。

到宋代时，先进的农作技术已在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得到推广，并随着疆域的南扩向南传播。农业繁荣使人口迅速激增，公元1000~1300年，中国的总人口几乎翻了一番。6~10世纪，中华帝国的中部就已经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砖砌的交通道路网络，从首都长安（现在的西安）到任何一个颇具规模的城市，都只需要8~14天的时间。更为重要的是，漕运、运河、海运等水上运输方式得到了广泛的发展。这些不同的水路交通体系组成了水路交通网络，为13世纪已经初具规模的全

国性市场奠定了基础。来自欧洲最大海港威尼斯的马可波罗，在13世纪晚期曾对长江进行了如下的描述：

> 我保证自己所说的句句属实，这条河流是如此之长，经过的地区是如此之广，沿岸的城市是如此之多，就货运量及交通量和交通价值而言，将远超所有基督教地区的河流与海洋的总和。

随着公元12世纪纸币在中国北方和南方被广为接受，中国经济也日益走上商业化的道路。奢侈品和大米等必需品的大型跨区域贸易不断发展。在宋代，沿海贸易蓬勃发展，贸易范围远至日本和东南亚地区。城市化进程也相当迅速，例如，13世纪晚期，中国当时最大的城市杭州已经拥有近700万人口。截至那时，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城市化程度最高的社会，城市人口大约占到全国总人口的10%。然而，这些城市并没有如欧洲城市般，发挥政治和个人自由中心的作用：自治性城市的发展受到了中央集权结构的制约，这一模式直到20世纪才有所改变。在政府的鼓励之下，在宋代，特别是北宋一个半世纪的统治时期内，出现了思想的百花齐放和发明创新的浪潮。这一时期有时也被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时期，见证了传统科举制度的发展，新儒家思想的诞生，火药、活字和雕版印刷技术的发明、书籍的广泛发行以及数学、自然科学、天文和地理等学科的重大进展。其中大型纺纱机的问世，至少从理论上来说，差一点就引发了一个类似于英国数百年后所经历的工业革命进程。相比之下，北宋结束长达两个世纪之后，欧洲的文艺复兴才姗姗而来。

雕版印刷技术所带来的图书的普及、大型百科全书的出版、以选拔官员为目的科举考试的参加者日益增多、数学领域取得巨大进步（尤其是代数的发展）以及士绅阶层的出现，都使得中国成为当时世界上文化修养最高和计算水平最强的社会。相比之下，只有伊斯兰世界可以同日而语，那时的欧洲还处于望尘莫及的境地。中世纪时期，

欧洲国家还广泛引进了中国的新式发明，如纸张、指南针、独轮手推车、船尾舵、手纺车和雕版印刷术等。当时，中国是东亚最先进的文明国家，对邻国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当时东亚的很多邻国长期以来都是中国的朝贡国，向中国皇帝进贡，承认中华文明的优越性并对其进行广泛借鉴。

1300年以后，这种非同寻常的繁荣逐渐衰退，中国中世纪的经济革命开始被一段时期的经济停滞所取代，直至1500年。蒙古的入侵标志着宋朝（这个就很多方面而言堪称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时代）的灭亡，蒙古人建立了元朝，中国被蒙古帝国所吞并。这是一段极为痛苦的历史，中国人民发现自己被置于异族的统治之下，沦落到卑微的境地。当时的经济之所以停滞不前，有几个方面的原因。中国由其腹地向南扩张，令其拥有了肥沃的未开发耕地，为中国经济提供了发展的动力，但是此时开始涌入了大量的北方移民，可想而知对资源尤其对粮食生产的压力日渐加大。蔚为壮观的科学发展进程，此时也开始陷于停滞。宋朝十分重视贸易和与外部的交流，特别是与日本和东南亚之间的往来，其交往范围还包括中亚、印度次大陆，甚至是非洲的东海岸。到了明朝，这一进程开始进入缓慢的逆转期。1371年，由于倭寇猖獗，对中国船只构成了威胁，明朝政府明令禁止沿海居民出海。明朝于1390年颁布的一项法令宣称：“今两广、浙江、福建愚民无知，往往交通外番私贸货物，故禁之。”在此后的3个世纪里，明朝统治者又相继颁布了一系列禁令，先后禁止了民间贸易和政府贸易。正如马戛尔尼所抱怨的，到1757年，广东（今广州）成为允许进行合法贸易的唯一港口城市。

1411年大运河的成功重建，是一个关键性的历史事件。京杭大运河最初建于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7世纪之间，北起北京、天津，南至杭州和盛产水稻的长江流域。大运河的重建标志着对沿海航运以及海军需求的大大降低。在从宋朝坐稳江山到开展非凡的海上探险活动的明朝早期这450年的时间里，中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海洋国家。当时中国

的大型多舱帆船（最多可有4层甲板、4~5个桅杆和12个帆）已经使用尾舵来控制航向，并配有航海图和指南针，最多容纳500人左右。15世纪的郑和下西洋，是一次伟大的航海壮举，其航行范围到达了东南亚、印度洋和非洲东海岸。他所乘坐的船只，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但是从此之后，中国的海上实力便急剧下降。1436年，明朝政府下令禁止制造适于远航的大型海船，小型船只的建造数量也大为减少。为何会出现越来越严重的孤立和内省倾向，其原因不是十分清楚。但是后人未能延续郑和下西洋的伟大壮举，主要有如下几个原因：明朝政治态度的转变；1421年将首都从南京迁往北京，导致明朝统治者对北部边界更为关注，对沿海和海洋的兴趣日益减少；对关心航海的成本和远征蒙古失败的关切。统治者确实也存在一些担忧，因为沿海城市与其他地区相连，有可能成为动乱的发源地，毕竟维护社会秩序始终是中国统治者关心的头等大事。而且当时的中国人内心也认为中华文明远胜蛮夷（特别是北方的游牧文明）。明朝对元朝（蒙古人统治的）所持有的种族主义态度，更是加深了这一理念。这也令明朝转向故步自封和孤立，看起来顺理成章了。

公元1500~1800年，中国经济一改此前的停滞，开始蓬勃发展，重获繁荣。中国的粮食产量稳步增加，一方面是因为西部和中部省份的移民安顿下来进行生产，耕地面积有所增长；另一方面则是由于生产力的提高（如引进了玉米和花生等新型农作物）和农田水利的发展。各方面的综合发展，促使中国人口在1400~1800年增长了5倍；而1300~1400年的时候，它还是呈急速下降态势的。中国在这一时期的表现往往容易被忽视，与此前中世纪的经济革命相比，的确相形见绌。与宋朝不同，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与科技发展的关系并不大。18世纪，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其次是印度，欧洲的经济还远远滞后。亚当·斯密将中国视为以市场为基础进行经济发展的典范，他曾在1776年指出：“中国比欧洲的任何国家都更为富有。”实际上一直到1850年，伦敦才取代北京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城市。

正如我们在第1章中看到的，18世纪末，英国通过运用其殖民地的资源和本国充裕的煤炭供应，摆脱了日益严峻的因资源短缺带来的限制。但中国却一无所有，这片土地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呢？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当时拥有足够的可用资本，尤其是考虑到英国在参与棉花产业起飞的过程中，只消耗了相对较少的资本这一事实。尽管中国的商人无法享有英国商人那样的独立和权威地位，不得不依附于官僚和地主，但他们仍然受到了广泛的尊重，财富与日俱增，也拥有了相当的权力。与欧洲相比，中国对投资的支持相对更少，但是中国也存在数量众多的大型企业。中国市场的成熟度与欧洲相当，建立的时间也更长久。伊懋可（Mark Elvin）认为，中国失败的原因在于他所谓的“高水平均衡陷阱”（high-level equilibrium trap）[注]。中国所面临的资源短缺问题在其人口众多的腹地日益凸显：人们越来越缺乏木材、燃料、衣服、家畜、金属和良田。盲目的森林砍伐行为贯穿于整个19世纪，在一些地方，木材短缺如此严重，以至于人们几乎无柴可烧，只能拿谷物的秸秆和外壳做燃料。在河南、山东等人口大省，森林覆盖率下降到土地总面积的2%~6%，而同时期的欧洲国家（例如法国）这一比率高达8.3%~25%。在技术相对停滞的情况下，人口的持续增长给土地和其他资源带来了很大的压力。由于没有资源丰富的海外殖民地，中国没有任何外部手段能使其打破日益严峻的制约。



郑和宝船的模型与哥伦布所乘坐船只模型的对比（拉尔斯·普劳曼摄）

随着劳动力价格的下降、利润率的下滑以及市场处于停滞的状态，人们没有足够的动力投资于能够大量节省劳动力的机械，相反只能鼓励节约资源和固定资本。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几乎没有什么理由参与技术革命，以建立英国工业革命标志性的工厂制度。换句话说，对中国人来说，不对节省劳动力的机械投资是理性的选择。正如伊懋可所说的：

> 在一种融合了强烈的经济理性意识、对发明者的崇拜心理……以及富有引人注目的机械天赋的文明的背景下，技术停滞是可以理解的。

另一方面，随着市场的不断发展和劳动力成本的不断上升，英国对节省劳动力的机器的投资，是一种完全理性的行为。它实现了发明、应用、日益提高的劳动生产力和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相反，中国依然深陷于陈旧的模式之中。在英国，以小规模的家庭作坊为基础的家庭生产体制成为工厂体制的雏形。然而在农村工业化水平与英国相当的中国，却没有发生类似的事情。英国的实践表明家庭生产体制与工厂体制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但在中国却并非如此：广泛的农村工业化进程没有为中国带来工业革命。

中国人眼中的“国家”

欧洲和中国之间最显著的差异，不是各自工业化的时机，而是在于政治体的规模不同。就人类历史的进程而言，二者开始工业化的时间大同小异，仅相差了200年，在历史长河中只是白驹过隙。但政治体规模的差异却至少持续了两千年，且影响极大。在近两千年的历史中，中国一直保持了统一，而欧洲却四分五裂。也正是这一点能够解释为什么在理解中国时以欧洲为模板显得那么无力。罗马帝国崩溃之后，哪怕拿破仑和希特勒再野心勃勃，欧洲也没能够再现可以对整个大陆行使中央集权控制的帝国统治。相反，政治权威被转移到了许多国家手中。甚至在现代民族国家体系创立和德国、意大利各自统一之后，欧洲仍然保持着多国体系的特征。与此相反，从公元前3世纪群雄纷争的战国时代结束之后，中国一直保持了帝国的制度，尽管其间也经历过蒙古族（元朝）和满族（清朝）等外族统治及不同的统治形式。实际上，除了外蒙古以外，今天的中国版图，与清朝疆域鼎盛时期大致相同。对于中国来说，一个统一的农业帝国是常态。而对于欧洲来说，在两千年的时间里一直是诸多国家的集合。

由此可以得出当代中国人和欧洲人态度上的根本差别：在中国人视统一高于一切的时候，欧洲人更相信民族国家而非欧洲范围内的主

权——尽管成立了欧盟。19世纪欧洲民族主义的兴起，导致很多历史悠久的帝国的分裂和众多新国家的建立，而中国并未发生类似的事情，甚至连丝毫可能发生的迹象都找不到。这一事实也说明了中国渴望统一的内在实力。中国人所致力的统一有三个维度：国家和人民把统一作为根本要务；期望国家在确保统一的过程中发挥核心作用；为统一奠定了坚实基础的、强烈的中国人的身份认同感。这并不是说中国的统一就是理所当然的：历史上大约一半的时间，它都处于不同程度的分裂状态。考虑到中国的幅员辽阔以及远胜于欧洲的多样性特征，我们不用对此大惊小怪。由于高度重视国家的统一，所以中国大体上避免了笼罩欧洲历史几百年之久的内部战争。但是在四分五裂的时期，它往往也要付出战争和饥荒的惨痛代价，尤其是处于长期分裂状态的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国家频繁地出现分裂，加上由此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更增强了中国对统一的向往。统一的传统始于春秋时期的孔子，由于目睹了动荡、战乱的灾难，孔子深深意识到和谐的重要性。

中国与欧洲国家之间，还存在另一个重要区别，即在近千年的时间里，中国从来没有面临过试图限制其权力的贵族精英的竞争。到10世纪中叶，当时的士绅全部都被摧毁，其后果是没有一个精英能够享有独立于国家的权威。情况正好相反，尽管官僚精英拥有无人可比的权力，享有数不清的特权，但其他精英却深深依赖于国家赏赐给他们的地位。选择官僚的关键性机制就是科举考试制度。早在唐朝时，科举考试制度就已经称得上很完善了。虽然贵族在考试中享有一定的优势，但是科举考试还是为社会流动打开了大门，成为皇朝招贤纳士的有力手段。对于参加科举考试的考生来说，儒家经典是考试的核心内容，这有助于共同价值的塑造与强化。在欧洲，除了一些极端的时期（例如战争年代）以外，精英仍然拥有一定的自主权；而在中国，由于精英都是由国家录用的，而且事实上成为国家的一部分，所以他们往往按照国家的旨意来行事。在皇帝的支持之下，朝廷根本不会遭受来自宗教团体（自9世纪查封佛教徒的财产后）、司法机构、地主、军

事或城市资产阶级的挑战。不过其中最大的例外是像孔子一样的文人，只要能够让自己与社会日常生活相脱离，他们就能获准写一些批判的文章。

因此，与欧洲的情形不同，中国从来都不受独立的强力精英的制约，这些精英在中国也从未享有过广泛的、不受挑战的权威。在欧洲，国家和社会之间的界限被明确界定且争议不断，中国却不存在类似的情况。在中国，这种边界始终是模糊的，直到今天依然如此：因为中国不存在互相竞争的社会团体，所以也没有必要去界定它们。鉴于中国的国家——精英关系的非对抗性本质，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界限是由具体的问题和资源限制所决定的。相比之下，在欧洲，自主、竞争的精英——贵族、牧师和市民，都在为限制国家的权力而战斗。欧洲国家和精英之间的竞争，与教会和阶级紧密相连；但是在中国，学者、农民、商人和艺人的功能分化，并没有转化为独立的权力基础或为社会所认可的声音。

由于要治理的疆域如此之广，中国没有，也不能单纯依靠或主要依赖武力施压来维护国家形态。那样做既不合理也不可行，实施起来也将需要大量的资源。与日本相比，在中国人的生活中一直没有军事的身影，至少到20世纪初还是如此。相反，国家权力主要通过各种各样的高压政治来强化。明清时期，封建政权想尽办法向国民灌输建立在儒家思想基础上的共同价值观和文化。相比之下，欧洲恰好相反：欧洲人并不把灌输价值观和文化思想视为国家的责任，直至19世纪末这些职责一直都由教堂来履行。中国政府认为，对普通民众和精英人士进行道义的教化，既可迎合民意，又是社会控制的一种手段。对精英而言，国家要求学校必须教授儒家经典，同时它还成为科举考试的应试科目。此外，它还促使普通民众遵守儒家教义的教化，就连皇帝在处理社会等级和纳税等事务需发布敕令时，也频繁地采用道德的论调。政府还试图促进民众对特定神灵的尊崇，同时极力压制其认为可能会造成社会动乱的潜在因素。

除了宗教控制之外，中国在这些事务上比欧洲先进数百年。直至19世纪末现代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出现之后，欧洲才开始关注这些问题。正如历史学家王国斌指出：“从中国的角度来看，正因为缺乏对教育和道德教化的关注，欧洲的统治才会遭遇根本限制，教育和道德教化对于欧洲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缺乏代议制对中国的影响。”同样的说法还可以用来描述中国实行的对民众的监控。对于中国而言，对民众进行监控是理所当然的，通过户籍登记及其他手段，可以更好地预测民众不满的原因、预防社会动乱。实行社会控制的重要手段之一就是家族或血统，这一点从古至今都是中国社会的重要特征，中国对其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了欧洲。中国有很多庞大的家族，虽然个中关系盘根错节，但均能追溯到一个共同的男性祖先（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还只有不到500个姓氏），且都是建立在正式成员的基础之上的。每个家族都享有很大的权力，甚至可以将人从家族中除名，对其进行孤立。

封建王朝非常清楚善治的重要性和克制的必要性。善治思想与强调统治者的道德责任的儒家传统密切相连。例如，皇朝统治的一个持续性特征就在于承认税收必须保持在较低的水平，以便农民丰衣足食，从而促进整个社会的和谐，避免抵制和反抗。中国的王朝统治也并非完全缺乏问责制：皇帝的权力拜上天所赐，因此只要统治者治理不善，他的权力就可能被剥夺。在周王朝统治期间，统治者们首次宣称他治理国家的权力是受命于“天”（一个含义更广泛的、客观的神），任何家族如果具备能够治理天下的道德，就会得到“天”的授权，也就是“天命”。这一信条也宣布了统治者必须对引导人类社会的最高道德力量负责。中国人思想中“天”这一概念，与西方人的“宇宙”概念截然不同。西方人的“宇宙”是由神明创造和控制的，而对于中国人来说，“天”胜于地球上的一切，但却并非造物主，也不可能物化为具体的形象。依据西方的“君权神授”学说，统治者的权力实则来源于出身。而中国统治者的天命则建立在道德的基础之上，这使得普通的中国人能够与统治者保持一定的距离，对统治者的

道德及合理性进行考量。连年的收成不佳、日益严重的贫困现象、一系列自然灾害（例如洪水、地震）发生之后，人们都可能会质疑皇帝的统治权：这种日益增长的合法性危机，可能导致声势浩大的民众暴动。中国历史上最后的一次大规模暴动，是19世纪的太平天国反对清朝统治的运动，当时数千万的民众都开始相信清王朝的天命已尽。

中国关于道德作用的假定，只是它如何看待自己的责任这一极其广泛的概念中的一部分。天命意味着，国家还有义务解决生态问题和经济问题，保障人民的生活水平。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清政府在18世纪的时候通过对粮仓储备的管理以确保各地粮食供求的相对平衡，从而保持粮价稳定。这一做法可以追溯到元朝甚至更早。国家还肩负起了建设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重任，当然是就当时的标准而言，例如为防止洪灾而治理黄河、建设大运河等承担责任。京杭大运河最早于公元7世纪初竣工，此后历朝历代均对其进行了修护。就以上的每个方面而言，中国人眼中的“国家”责任与欧洲的国家大相径庭。直至几百年之后，欧洲人还都认为国家责任仅仅是立法。以上的事例也有力地说明了，中国的发展是独特的，这也驳斥了其他国家必须遵循欧洲发展路径的错误观点。

如果一定要对中国与欧洲进行区分的话，那么首先的不同就在于中国很久以前就具备了一个“现代国家”的许多特征——包括一个规模庞大的官僚体系——早于欧洲各国完成了国家转型。此外，从17世纪起，在战争当头、追求财富、政治代表性的需求等力量的驱使下，欧洲民族国家逐渐开始了对外扩张。然而这些因素却与塑造中华帝国的因素截然不同。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独霸的欧洲不同，中国相对于邻国的压倒性优势已经持续了1 000余年，所谓的政治代表性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很陌生的概念，甚至在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的统治覆灭之后仍是如此。在中国和欧洲，国家创造的活力几乎在所有方面都存在着深刻的差别。因此，正如在第6章所要探讨的，现代中国与欧洲国家是如此不同，其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是如此迥异，也就不足为奇了。

内忧外患

19世纪的最初几十年，清王朝面临的问题开始逐一显现。它第一次尝到苦头，是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被英国打败。随后，在19世纪中叶，随着经济困难开始增多，加上一系列地方起义和四次影响巨大的起义活动（即1855~1873年的云南回民起义，1862~1873年西北地区突厥后裔发起的另一场回民起义，1853~1868年的北方捻军起义以及1850~1864年的太平天国运动），清朝的统治开始动摇。

在所有起义中，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最大。鸦片战争的失利动摇了清政府的统治基础，加之1848~1850年发生的严重洪涝灾害和饥荒，起义的条件已经成熟。太平天国运动最先从中国南方开始，随后途径长江流域许多富庶的地区，之后辗转到北部和西部，直逼北京：据估计，这次起义造成了大约2 000万~4 000万人的死亡。太平天国运动的发起者洪秀全极力向众人说教自己对基督教《旧约全书》的看法。历史学家保罗·柯文（Paul Cohen）曾将太平天国的思想体系描述为，“一种融合了福音派基督教、原始共产主义、性清教和儒家乌托邦主义的怪诞炼金术”。起初，这场运动得到了从北方迁至南方的各少数民族尤其是客家族的大力支持，并包括了一部分坚决反满的力量（清王朝是满族人的天下）。运动持续了几年，但结果一直不甚明朗，最终被在英、法军队支持下的清王朝的新军所镇压。尽管清王朝最后取得胜利表明它仍然拥有非常强大的力量，但是其道德权威已经受到了严重的损害，而且再也没能恢复。

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西方国家日益增长的勃勃野心和侵略行为，逐渐成为19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清朝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对于英国提出的中国应允许进口产自印度的鸦片的要求，中国进行了抵制，但却以失败告终，并被迫与英国签订了《南京条约》。《南京条约》这是中国近代签订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它涉及赔款、割地（损失香港岛）和设立4个通商口岸（英国在这些口岸享

有特许权）等内容。不过，鸦片战争失败造成的影响是有限的。虽然以战败告终，清朝政府却未因此重新考虑自身的态度：实际上，这个王朝国家此后对英国人的看法，与对其他外国人仍别无两样，无论其来自北方草原还是中亚地区，或者是来自东亚和东南亚的附属国，例如朝鲜和越南。中国人的优越感和自信仍然顽固地存在着。这种状况一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才开始有所变化，在这场战争中，英法联军洗劫并火烧了圆明园，最终迫使清政府签订了《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根据这些条约，清政府开放了一连串新的通商口岸，并在通商口岸地区给予西方公民治外法权；容许外国军队在华设立军事基地；容许传教士享有在中国境内旅行的自由；给予两国更多的赔款。中国开始失去对一些重要事务的管辖权。1884年，在争夺越南的战争中，法国成功击溃了中国海军。在历史上，越南长期保持与中国的朝贡关系，如今却被法国殖民统治颠覆。中法之间的海战暴露了一个发达的欧洲工业国家同一个农业大国之间的悬殊差距，尽管这次战斗的地点远离法国本土。战斗刚开始，中国的旗舰就被鱼雷炸沉，不到一小时，所有的中国战舰全部被摧毁，从此，法国控制印度支那的道路变得无比通畅。

但是，起决定性作用的转折点则是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如同与法国的战争那样，这也是一场关系着中国对其附属国的影响力的战争，朝鲜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是与中国关系最为密切的附属国之一。面对工业强大、越来越咄咄逼人的邻国，中国遭受了屈辱性的失败，被迫与日本政府签订《马关条约》，赔款数额超过清政府年收入的3倍。朝鲜事实上沦为了日本的“保护国”，直至1905年正式被日本吞并。中国失去了台湾和东北地区，并进一步开放了4个通商口岸，日本赢得了在现有的通商口岸建造工厂的特权。日本的胜利让西方列强看到了希望，它们纷纷对中国提出进一步的要求，并逼迫中国做出一系列让步。到了20世纪初，随着英国、法国、日本、德国、美国、比利时和俄国等国在中国影响的不断扩大，中国的主权受到了严重的损害和制约。

强加给中国的主要不平等条约

与英国签订的《南京条约》（1842年）

与英国签订的《虎门条约》（1843年）

与美国签订的《望厦条约》（1844年）

与法国签订的《黄埔条约》（1844年）

与俄国签订的《瑷珲条约》（1858年）

与英国、法国、俄国、美国签订的《天津条约》（1858年）

与英国、法国、俄国签订的《北京条约》（1860年）

与普鲁士、德国海关联盟签订的《中德通商条约》（1861年）

与英国签订的《烟台条约》（1876年）

与葡萄牙签订的《中葡和好通商条约》（1887年）

与日本签订的《马关条约》（1895年）

与俄国签订的《中俄密约》（1896年）

与英国签订的《展拓香港界址专条》（1898年）

与英国、美国、日本、俄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奥匈、比利时、西班牙和荷兰签订的《辛丑条约》（1901年）

与日本签订的“二十一条”（1915年）

在日益高涨的反西方情绪的刺激下，1900年爆发了义和团运动。此次运动得到了1861~1908年间清政府的实际掌权人慈禧太后的暗中支持。义和团对外国传教士及其他西方人发动了大规模的袭击。最后，英国、日本、法国、美国等国组成的八国联军攻占了北京，镇压了这次起义，并在紫禁城驻兵一年多。清政府被迫做出更多让步，其中包括新一轮的赔款。虽然中国没有陷于殖民统治，但实际上它已沦为半

殖民地社会：外国军队可以自由进出，通商口岸与小型的殖民地无异，传教士可以到中国境内任何一个他们想去的地方鼓吹西方的价值观，外国公司有权在中国设立子公司，几乎不用缴纳任何赋税或关税。中国蒙受了极大的耻辱，变得日益穷困。然而，即使后来日本占领了中国东北三省并向南征服了大片土地，中国也从来没有完全沦为殖民地，这一事实对于中国1949年之后的复苏来说，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清政府在面对日益增长的外国干涉面前显现出的无能为力，刺激部分有志之士发起了一系列旨在让国家走上现代化道路的改良运动。然而与日本不同的是，实施变革的决策是由少数精英做出的，从未获得过广泛的认同，举步维艰，结果只能是走走停停、零敲碎打。此次改良运动的发起者除了清政府的一小部分官员外，就是一些文人和学者。康有为就是其中之一，他有着广泛的社会关系，而且善于论证新的思维方式与传统的儒家教义的一致性。然而，就大部分时间而言，满清政府既不理解也不接受现代化的必要性，更没有意识到其紧迫感，因此其或无动于衷，或积极反对。这一点与1868年后的日本截然不同，当时的日本政府成为现代化进程的主要推动者。然而，清政府也的确做出了一些改革举措，如首次在英国伦敦和法国巴黎等主要国家的首都建立外交机构；进入20世纪之后，还对教育课程进行了修订，加入了西方的科目。1898年，当受到清朝统治集团的首次认可后，改良运动达到了顶峰，但这种认可却仅仅持续了几个月。

改良者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是，现代化进程逐步变得与西方国家密切相关，而当时，西方国家正在对中国实施殖民统治，整个国家蒙受了百般羞辱，所以，这帮改革者被统治者视为受到西方蛊惑，乃至被当作卖国贼，而非爱国者。结果，中国人民对于西方国家越来越多的敌意和不满，一并发泄在反对改良运动的进程中。中国的单一集权制政府体系，也阻碍和扼杀了改良理念的发展。相比之下，日本的权力更加分散。此外，儒家思想的主导地位也使得其他思维方式很难享

有一席之地，这也使改革越发艰难。直到1900年前后，改良的想法才被实际纳入了儒家思想的框架内，而且要坚持中国“本质”与西方“方法”之分（即张之洞的名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20世纪以后，其他思维方式才开始占据一席之位，其中包括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思想。这一改良过程在1911年的辛亥革命时达到了顶峰，辛亥革命的发生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受西方思想的影响。而在此期间，尽管儒家思想的地位开始下滑，但并未消亡，人们也并没有认为它与变革无法共存。不过，如早期的佛教和道教一样，儒教思想确实迫切需要与其他思想相互融合，重获新生。

在20世纪的最初几年，清王朝面临着深刻的权力危机。任何事务都需要不断地寻求占领国的批准，因此主权十分有限。由于被迫支付大量赔款，经济状况日益恶化，政府不得不依靠从外国银行贷款来履行义务，这意味着它经常处于财政窘迫的状态。清王朝赖以粉碎各种叛乱（特别是太平天国运动）的军队，也表现出越来越多的离心倾向。清政府还面临着民众与日俱增的不满和失望，矛头直指清朝的反满情绪不断蔓延。

在统治中国266年之后，清王朝在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彻底垮台，也让持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体系在中国大地上落下了帷幕。中国这段漫长的王朝统治经历，创造了世界历史上最为长久的连续统治的奇迹。孙中山建立的共和政府取代了清王朝的统治，开创出一个全新的更具希望的时代。然而孙中山所创立的政权，实际上只是中国后来出现的军阀割据、战乱频仍局面的前奏。在军阀的割据混战中，中国有限的主权被一种更为糟糕的东西所取代，即主权长期的多重分散。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处于一种非常弱势的地位，既没有军队受其指挥，也没有政府机构供其支配。当时，孙中山试图与最具实力的军阀袁世凯达成协议，结果却是将实权拱手相让，自己则被排挤出权力的中心。1916年袁世凯死后，他委派到各省的军政府的首长（事实上的军阀），彼此争吵不休，在列强的支持下对中国分而治之。

1916~1928年是军阀混战时期。当时整个国家四分五裂（并非就法理的角度而从事实角度而言），甚至出现了几百年来首次的军阀和外国势力主宰中国未来命运的情况。

仅仅在1928~1937年期间，当蒋介石成为中国的领导人和事实上的独裁者之后，中国才变得相对统一。蒋介石不仅是新军阀，还在孙中山逝世后被推上国民党领袖的位置。但是即使在这段时期，蒋介石的权力也受到了限制。日本占领中国的东北；其他外国列强也在中国各有驻军；其政权在农村地区缺乏支持；中国共产党则在南方为反对国民党的统治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在30年代初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为躲避国民党的正面进攻，中国共产党于1934~1935年进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1937年，中国的苦痛进一步加剧，日军从东北大本营向南推进，占领了富饶肥沃、聚集了中国大部分工业产业的中国东部省份。日本对中国实施了极其残酷的殖民统治，1937年12月的南京大屠杀就是铁证。当时，日本军队屠杀了大约30万名中国军人与平民，这给中国人民的心灵造成了巨大创伤，时至今日仍困扰着中日关系的发展。然而，蒋介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对日本与中国共产党谁才是其眼中的主要敌人含糊其辞，甚至表示“日本是藓疥之疾，共匪才是心腹之患”。实际上，蒋介石过于低估了日本侵华对中国民族意识和公众舆论的影响。1936年的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停止内战，与中国共产党结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抗日。中国共产党在敌占区开展了富有成效的游击战，令其很得民心。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国民党利用其所掌控的军队对共产党人发起了进攻。然而抗战时期与日本作战的屡次失败已经影响了蒋介石的声望，悍然发动内战令其更失民心。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解放战争中取得胜利，有多方面原因，其中包括国民党贪腐严重、长期未能实现国家的统一和现代化以及抗日不力等。1949年，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最终夺取全国政权。新中国的成立与1911年的辛亥革命的意义截然不同。辛亥革命实际上只是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逗号，是此后近40年的权力分散和外国占领的前奏。事实证明，1949年才是具有决定性的历史转折点。

从这段中国历史上最痛苦的时期，人们可以总结出两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为什么中国长期处于分裂状态，但却从未解体呢？尽管发生了这一切，为什么至少从长期来看，西方和日本占领对中国的影响还是相对有限呢？

1911~1949年间，中国解体的可能性是真实存在的。1911~1916年，实际上曾经出现过三次各省宣布脱离中央政府的情况。然而，这些举动只是为了对中央政府的某些特定行为进行回应，并没有涉及原则问题。实际上，事实证明当时并不存在另一种足够强大的认同能够为分裂国家的形成提供切实可行的基础。当然，有两个例外：一个是1933~1941年间处于独立状态的外蒙古；另一个则是1913~1933年间，西藏的部分地区处于事实上的独立状态。在中国辽阔的腹地，类似的分裂或独立运动却从来都成不了气候。实际上，自19世纪末开始，在反满情绪的影响下，汉族身份的认同得到进一步的强化，排外性更强。地区性独立不得人心，也没有任何民族主义的支持。此外，随着中国在极为不利的条件下进入由西方主导的现代民族国家体系，它也受到了现代国家主义的约束——而外国的占领给中国人带来的苦难，又强化了数千年来由独特的农业文明孕育的文化认同感和凝聚力。

最后，为什么外国占领给世界其他地方，特别是非洲和中东地区，带来了深远的影响，而在中国，这种影响却相对有限呢？首先，若想对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进行殖民统治（哪怕是大部分地区），即使对于曾贵为世界霸主的英、美来说，都无疑是困难重重。当然，日本和欧洲的一些国家曾有过这样不切实际的想法。因此，整个国家的大部分地区，仍继续处在中国的主权管辖之内。除了东北以外，被外国持续占领的主要是通商口岸，它们实际上是中国广阔无垠的农村腹地包围下的一小撮儿飞地（尽管这些地方也是中国最为发达的地区）。当然，这并非贬低外国占领对中国所带来的影响，但中国的确没有经历过类似于非洲地区那样的殖民统治。其次，到1800年之前，中国是一个先进的农业经济实体，农村的工业化进程十分普遍，

商业化程度相对较高，拥有相当成熟的市场。这就意味着一旦外国占领结束，中国可以利用这种文化、技能和传统，来实现自身的工业化进程。再次，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古老、最先进的政治体制和治国策略，是1949年以后的中国可高效利用的巨大资源。这与非洲和中东的后殖民地国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那些地方，现代国家的建立基本从零开始，甚至连国家的边界都是由殖民者所确定的。最后，强大的“中国人”的身份认同感，有助于中国抵制西方和日本殖民主义所带来的文化和心理方面的负面影响。中国人对西方列强和日本的军队，始终保持极其敌视的态度，并对自己被迫做出的让步抱有一种深深的耻辱感。举个例子的话，这与印度的情况就完全不同，印度学会了适应英国的统治。尽管如此，中国人在内心从未失去对其自己的历史和文明的自信或优越感。然而，中国在近代“屈辱的百年”中所承受的苦痛和动乱，仍对其国人的意识造成了显著而深远的影响，至今仍是如此。

1949年之后

到1949年时，中国已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主权沦丧状态。实际上1911年之后，中国经历的不仅是有限主权的状态，实际上是多重主权：中央政府不得不与多个占领国（也就是所谓的“多重殖民主义”）和国内的割据势力一起分享国家权力。大多数国家对这种情形都难以接受，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有着长期独立历史，有着长达两千年之久的单一国家体制传统的国家来说，这种状况简直无法容忍，它严重地侵蚀了这个国家的自豪感。共产党人面临着相互关联的三大任务：主权的回归、国家的统一、国家的重建以及单一国家体制的恢复。尽管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但是日本人一直到“二战”结束才投降并被迫撤离中国。1949年，中国共产党打败了国民党，取得了解放战争的胜利，中国终于重获统一（除了台湾、

香港和澳门等“失地”外）。中国共产党所建立的新中国之所以能够获得广泛的支持（实际上，至今仍然如此），其关键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就在于它恢复了国家的独立和统一。这也是毛泽东最伟大的成就。

经历此前40年的劫掠、封建王朝的覆灭和国民党的失败之后，共产党肩负着建立一个全新执政体制的艰巨任务。自西方崛起以来，中国在现代化问题上面临一系列战略选择：或是改革传统的封建体制，但1911年以前的历史已经证明这种尝试未能获得成功；或是效仿西方的模式，这种做法在1911~1949年也遭遇了严重失败；还可以借鉴国外的经验并结合本国的历史和现实创建新的体制。在苏联的启发之下，共产党人选择了最后一种方式，但是总体来讲，毛泽东思想是在本国成长和发展起来的产物，而不是舶来品。实际上，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共产党人已经逐步积累了一定的治理经验，从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的苏区，到1937年以后抗日战争期间其所控制的、不断扩大的根据地，再到1945~1949年解放战争期间不断扩大的解放区（特别是中国的北方地区）。无论是晚清帝国，还是孙中山和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党，都面临着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对政府收入的失控。在此背景下，新中国迅速重申了中央政府对收入和支出的控制权。尽管财政支出的实权仍保留在地方政府的手中，正如18世纪以来一样，但是中央政府再次拥有了对开支的决定权，就此而言，新中国与晚清帝国之间保持了政策的连贯性。

共产党是新执政体系的核心力量。在很多方面，共产党都证明了其拥有一种高效的管理机制，特别是相对于晚清政府和国民党而言。其中，毛泽东是关键人物。尽管其在执政的过程中也犯了一定的错误，但作为革命的设计师和独立、完整的新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在赢得民心和新政权合法性等方面发挥了主要作用。即使到了今天，毛泽东仍然是许多中国人崇拜的对象，人们对他的感情甚至要胜于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1949年之前，中国共产党的主要支持者是占

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群众，国民党的势力则主要集中在城市。这与布尔什维克完全不同，后者的支持者主要集中在人口较少但相对集中的城市，农村势力较为薄弱。因此，相较于苏共，中国共产党的支持率一直更高，与群众的关系也一直更为密切。新中国所具有的潜在实力和弹性，在毛泽东去世后共产党进行自我革新时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当时，中国深受创伤，“大跃进”和“文革”给整个国家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在“文革”中，整整一代人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但在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中国共产党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展示了不同寻常的自我革新的能力，调整了工作的方向，采取了一项独特而成功的经济政策，引导中国走上了经济快速、持续发展的道路，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无论是以中国的视角或西方的视角对1949年之后的中国进行评价，都会认同并强调其代表一个全新的起点及与中国连续性和传统的决裂。各种原因不难理解。与其他共产党人一样，中国共产党人强调他们代表了一种与过去截然不同的全新体制。毕竟，那才是革命——特别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本质所在。中国共产党对一些传统不良习俗表现出极大的改革决心，从妇女长期遭受压迫到儒家的等级观念，并以阶级斗争的名义实行了全面的土地改革。与此同时，除了“二战”期间的短暂时期外，西方国家自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始终把共产主义政权视为魔鬼的化身。他们很少尝试在历史和文化的背景下理解共产主义国家，也很少试图体会其与历史的延续性而不仅仅是中断性。总而言之，种种原因导致人们忽视了1949年成立的新中国与中国历史上黄金时期之间的强大连续性。正如王国斌指出的，尽管儒家思想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着明确的分歧，如等级观念与平等意识、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和谐与斗争，但是它们之间也有重要的相似性。例如，儒家传统也强调减少不平等现象、限制土地规模和重新分配土地的必要性，这与毛泽东所采取的政策不谋而合。同样，正如我们前面所看到的，国家必须为人民负责，这是中国的一项古老传统，只不过共产党用一种独特的方式延续了这个传统。就国家应在经济和

社会安全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而言，也是如此。在毛泽东时代，工人们都抱着“铁饭碗”，国有企业必须向员工提供住房、教育、保险以及稳定工作。

另外，两者在政治上也存在很多相似之处。儒家思想和共产主义的统治模式，都涉及人们与国家之间的隐形契约：如果国家未能履行其义务，那么农民就有孟子所倡导的反叛的权利。在封建时期，这种思想的表现形式是天命；在社会主义时代，则是以阶级斗争即无产阶级抵御和战胜资产阶级的名义体现出来。在毛泽东时代，这成为实行以“文革”为代表的自上而下的大规模动员运动的理论支持。然而，两者都认为国家与民众之间的关系是威权的、有等级的。这与西方国家的政治传统、对政治权利的理解和正式的代表制截然不同。这种连续性在其他很多方面均有体现。面对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巨大差异，二者都承认应分别采取不同的治理方法。儒家传统通过科举考试的手段来招募由受教育程度和文化修养较高的人才组成的统治精英阶层，共产党人则通过采用发展党员的方法来为国家招募贤才，当然如今的公务员考试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最后，无论是在儒家传统还是在共产主义的理念之中，统治精英都被视为从属于国家的一部分，而非具有自己的组织和权力的独立集团。因此，在社会主义的中国没有市民社会和自治的公共领域并不是什么新问题：中国自古以来就没有。

因此，共产主义传统和王朝历史之间存在很强的连续性。新中国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对它的理解，也只能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历史学家王赓武指出，新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对旧皇朝国家的取代”，而且“毛泽东有效地恢复了关于领导人魅力的观念”。国际关系专家赵穗生提出了与此类似但略有不同的论断：

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建立起来的。然而，与共产主义的普遍原则相比，它与

中国民族主义，与中华民族的复兴，与中国未来的现代化更为相关。

正如我们将在第二部分看到的，中国现代性的外延不仅留有共产主义的痕迹，它背负的更多是中国的历史印记。在晚清政府、北洋政府和蒋介石的统治下，中国曾进行了历时50余年的现代化尝试，但这些三心二意的尝试却弄巧成拙，均以失败告终。最终，中国只能在1949年新中国建立之后再开启现代化的进程。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包括很多方面的内容，如中国的统一和主权的恢复、一个能够存续下去的高效政权的建立、彻底的土地改革、原有阶级结构和等级制度的废除以及妇女地位的提高等。这些也正是新中国建立的历史意义之所在。

经济腾飞

中国与西方列强和日本几乎是在同时踏上了工业化的道路，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却以失败而告终，为此，19世纪的中国遭受了严重的打击。大约从1860年开始，中国就出现许多工业发展水平与日本相当的显著事例，在上海地区尤为如此。但是，考虑到中国的辽阔地域，其工业进展又显得太琐碎、太分散。尤为重要的是，中国缺少了日本现代化进程中的两个关键要素：强大的现代化政府和可以为工业化提供盈余资金的富足的农业。在19世纪下半叶，由于日益严重的分裂、此起彼伏的起义和动乱、银价的不断上涨、频发的洪灾和饥荒，中国农业处于停滞不前甚至倒退的状态。更糟糕的是，在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巨额的赔付条款和面对西方国家及日本提出的各项无理要求时表现出来的无助，几乎让中国元气大伤、濒临破产。西方列强通过划分新的势力范围和获取“租界”，继续剥削已经伤痕累累的中国。随着进入中国的外国企业数量的急剧膨胀，外国资本不断流入中

国，它们热衷于在这种几乎毫无限制的背景下攫取高额的利润。1920年，汉学家谢和耐（Jacques Gernet）曾这样写道：

> 整个中国经济都依赖于上海、香港、青岛、武汉的大型外资银行和一些实力强大的外资公司……海关、盐税的行政管理部门和邮政服务都由外国人把持，他们攫取了所有利润。在华夏大地上，西方国家和日本的军舰及商船随处可见——遍及港口、海岸和长江流域。除了少许的中国公司……整个现代工业部门（纺织厂、烟厂、铁路、航运、水泥厂、肥皂厂、面粉厂，以及城镇的煤气、自来水和电力以及公共交通部门），都处于外国公司控制之下。

中国的人均GDP数据可以生动地说明中国在这一期间所处的困境：1820年为600美元，1850年没有变化，1870年甚至跌至530美元，1890年为540美元，1913年为552美元，1950年仅为439美元，仅相当于1820年的73%，甚至比1850年时还要低。这些数据足以说明中国经济在1820以后的120年中的灾难性表现，而外国势力的干涉和占领则是最主要的原因。所以，中国现在只要提到1850~1949年这100年，就会将其称为“屈辱的百年”——这个说法很能说明问题。日本明治维新后约80多年，也是英国工业革命的序幕拉开一个多世纪之后，中国才刚刚开始走上经济腾飞的道路。

除了恢复国家统一以外，新中国面临的中心任务便是工业化。为此，它进行了大规模的土地重新分配、建设了大型的人民公社，并以收取农业税的方式从中获得了可观的农业盈余，然后投资于重工业的建设。新中国所采取的经济政策与过去截然不同，将市场排除在经济生活之外，依赖于国家和中央的统筹规划。这一经济政策虽源于对苏联模式的借鉴，但却少了些僵化，也没那么复杂。

尽管毛泽东的领导经历了沧桑变迁——尤其是“大跃进”和“文革”——但是，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中国还是取得了不俗的成就，1950~1980年，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4.4%，整个国家的GDP翻两番，人均GDP翻一番。相比之下，同期印度的GDP只增加了不到3倍，人均GDP仅增加50%。中国的社会发展所取得的成就更加令人瞩目。1950~1980年，中国大力发展教育、扫除文盲、促进平等（包括男女平等）和改善医疗，人类发展指数[注]提高了3.5倍，同期的印度只提高了2.75倍。中国所实行的政策还成功地规避了不少困扰其他许多亚、非、拉国家的难题，如农村地区的贫穷、巨大的贫富差距、男女不平等、城市失业人员形成的贫民区、教育和卫生基础设施薄弱等。虽然中国为此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这些成就毫无疑问地巩固了民众对政府的支持与拥护。

中国共产党在执政的第一阶段，彻底扭转了中国的国家命运。这一时期取得的成就，为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失败已经困扰中国近百年之久。新中国成立的第一阶段成功地扭转了中国一个世纪以来的衰败局面，重新实现了国家的统一与稳定，实现了此前的中国政权无法创造的经济腾飞。尽管毛泽东在执政过程中出现过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但实现中国伟大转折的基础正是在毛泽东时代所奠定的。

---

1. 1公里=1千米。——编者注

2. 高水平均衡陷阱，指中国的传统农业在当时的资源和人口条件下，已经失去内部发展动力，必须有其他因素介入，才能摆脱困境。——编者注

3. 人类发展指数是指以预期寿命、教育水准和生活质量三项指标衡量一个国家发展程度的标准。——编者注

第4章
中国与西方：相互融合，还是相互竞争？

> 自从第一次来到中国，我们就自认为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占尽优势，而且会自然而然地将我们自己的经验普世化。但是，实际上我们西方人对现代世界的看法非常与众不同，以至于石约翰（John Schrecker）认为“西方文明是当代所有伟大文明中最狭隘的一个”……西方人从不把其他民族对其的看法放在眼里。而且，与其他伟大的文明不同，西方人从未有过迫于生存而对自己的文明进行深刻的反思，审慎地放弃其中的很大一部分，最后再将其恢复原貌的经历。这一情况可能将产生一个终极悖论，即对创造现代世界贡献最多的西方人，在某些方面反而最不理解这个世界。
>
> ——保罗·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

当西方游客第一次来到上海、东京或吉隆坡，仰望闪亮的高楼大厦，看到挤满汽车的街道，漫步于充斥着时尚名品的购物中心时，他的反应一定是：“实在太现代了！”稍事停顿后，他又会认为“这实在是跟西方一样”。在某种程度上，的确如此。这些城市所在的国家的生活水平正在提高，而且其中的一部分已与西方不相上下。如果这些城市的面貌与西方一样，实在不用大惊小怪。我们每个人的脑海中都存在一种自然倾向（这可能也是铁律），即根据自己熟知的情况来判断陌生事物：我们都是彻头彻尾的相对论者。一旦发现熟悉的对象和行为模式，我们就会认为其与我们的情况没什么区别或十分相似。看到其他地区有现代化和进步的迹象时，西方人也会认为这些社会或

文化正朝着与其一致的方向发展，虽然它们可能仍落后于西方。正如中国每多一家麦当劳，西方人就会认为中国正变得越来越西化，变得和西方越来越相似。

的确，在西方人经常出入的场所，这些现象会更为明显。商人们在国际机场着陆，乘坐出租车去国际酒店，相聚金融区召开会议，最后打道回府，这就是同化的最终形态。无论坐落在哪里，现代机场都被设计得如出一辙，都有不少的中餐馆，香港赤腊角国际机场和巴黎、慕尼黑、蒙特利尔的国际机场几乎没有差别。国际酒店的情况也差不多，都是为了迎合国际潮流而不是按照当地人的传统来建设的。提到国际酒店的大堂，你脑海中一定会浮现这样的场景：大多数男士西装笔挺，用英语交流，阅读的是《国际先驱论坛报》。

人们可能认为，在东亚国家生活过的外国人的经历更具启发性。有时候的确如此，但大多数时候他们所处的环境与西方无异。居住在东亚的西方人大多聚集于新加坡和中国香港，这些城市想尽办法吸引西方移民。中国香港曾经历过150多年的英国殖民统治，至今还留有印记；相较于东亚的其他地方，新加坡则是绞尽脑汁把自己建设成西方人的天堂，俨然一个亚洲内部的小西方社会。居住在这些地方的西方人也无须学习普通话或广东话，因为许多人都会说英语，他们觉得无此必要。生活在亚洲这些舒适、宜居的“小西方”的西方人，往往享有某些特权，并和当地的主流社会基本隔绝：居住在港岛的半山区或愉景湾，肯定与生活在新界的沙田有天壤之别。

最后的结果就是大多数来到亚洲的西方人，如游客、商人或移民，仍是在这种熟悉的、经过了“净化”的西式环境中度过大部分光阴，只是偶尔涉猎当地的文化，而不会真正地与之融为一体：他们都是戴着西方的有色眼镜看待亚洲。认为我们不能从所观察到的现代性的硬件中有所领悟的看法，无疑是错误的：建筑物、商场、消费品和娱乐设施都向我们展示了亚洲国家的发展水平、优先考虑的事项，有

时还可从中发现一些文化差异。但是，就像理解西方现代性一样，要真正理解亚洲的现代性，不在于它的“硬件”而要看它的“软件”，即处理人际关系的方式、价值观与信仰、风俗习惯、社会机制、语言、礼节与节日，以及家庭在社会中的地位等。这些现象既难以看透，又难以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

东亚现代性的兴起

20世纪上半叶，工业化国家的精英俱乐部继续被19世纪实现经济腾飞的国家所主导，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1914年以前的世界发展模式似乎已被冻结，在19世纪错失经济发展良机的国家，看上去再也没有机会能分得一杯羹。20世纪50年代，“依附理论”学派把这种状态归纳为：其他国家不可能跻身先进国家的行列。但是，关于经济领域为什么处于冻结状态，确实存在令人信服的理由。世界大部分地区仍然处于殖民统治之下，它们实现经济增长和腾飞的可能性极其有限。此外，两次世界大战不仅消耗了交战双方的巨大能量，世界其他很多地区也深受其害。

从20世纪50年代末期开始，东亚出现了第一个深刻变化。日本以极快的速度从战后的废墟中恢复，但是，作为一个1914年以前工业化国家俱乐部的成员，其经济实力的复苏不足为奇。相反，吸引人们眼球的是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快速增长，它们分别是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亚洲四小龙不仅数量少，而且规模也非常小——一个中型国家、一个小型国家，还有两个城市。韩国和新加坡刚刚独立不久，中国香港仍处于英国的殖民统治之下。它们不同程度地受到战争的洗劫（其中韩国还遭受了朝鲜战争的破坏），而且都缺乏自然资源。但当地的经济却都开始以惊人的速度增长，其中，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在此后的30年里，年均增长率接近两位数。20世纪70年代末期，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度尼西亚也加入了经济快速增长的行列，此

外，后来的亚洲新兴国家，甚至创造了比先前亚洲四小龙还要高的增长率，中国就是典型的例子。世界上还从来没有出现过如此之快的增长速度。1820~1870年是英、美两国在19世纪经济增长最快的时期，但在此期间，英国的GDP年增长率仅为2%左右，美国的年增长率也才略高于4.2%。其结果就是，一个拥有大约20亿人口的地区完成了快速、积极的转型，东亚地区的贫困水平下降到2007年时的不到25%（该数字在2006年是29.5%，1990年是69%）。

后发者不可能跻身先进国家俱乐部的神话已经被打破。相反，亚洲新兴国家的经历证明，后发者也能享有重要优势：它们可以学习他人的经验，借鉴和运用现有的技术，实现技术的跨越式发展，运用最新的知识，赶超发达国家。此外，它们的经济发展模式都很具本土化特征，与新自由主义或华盛顿共识——这种思想体系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就占据西方意识形态的主流，直到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才崩溃——几乎没有什么关系。然而，亚洲新兴国家的崛起，还具有更为根本的意义。到目前为止，除了日本，现代性一直都被西方国家垄断。但是这种垄断地位现在已经被决然地打破。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学术界极具影响力的现代性理论认为（卡尔·马克思持有类似的观点），发展中国家将逐渐达到发达国家水平。现在，我们可以通过东亚国家的发展历程来检验这一命题。

转变的速度

所有亚洲新兴国家和地区都具备一项基本特征，就是转型速度飞快。1950年，它们还都是农业社会，刚刚开始工业化进程。1950年，韩国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79%（与1920年的91%相比，变化不大），到1960年的时候是61%，而今天是10%左右。在20世纪60年代末，农业人口仍然占到中国台湾总人口的一半，然而今天，这一比例却降至8%。还有印度尼西亚，从1960年75%降至现在的44%，同一时期，泰国则从

84%降至46%，马来西亚从63%降至18%。至于中国，1950年，全国总共有85%的农业人口，而现在，这个数字降至50%左右。另外，这些国家或地区城市化的进程，也极为的相似。1950年，中国台湾地区76%的人都居住在农村，而到1989年——仅仅过了39年，这一比例发生了惊人的逆转，当时城市人口已达总人口的74%。同样，韩国1950年的城市人口比例仅为18%，到1994年增至80%；马来西亚实现经济腾飞后，这一比例从1970年的27%增至1990年的53%。1975年的中国，城市人口仅占总人口的17%，预计到2015年，该比例将达到46%。我们还可以把目光投向日本。日本在“二战”后实现了经济飞速发展，1950~1990年，其GDP增长了14倍。日本迅速从战争的废墟中站立起来，完成了经济腾飞的过程，实现了人口从农村到城市的大规模迁移。在1950~1973年日本经济发展的黄金期，其年均GDP增长率达到了9.29%。

与欧洲相比，这些亚洲新兴国家和地区的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速度令人震惊。德国的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1850年为15%，1910年为49%（这段时期大体上恰逢其工业革命），1950年为53%。法国城市人口比例1850年为19%，1910年为38%，1970年时则为68%。而英国的城市人口在1800年时约占总人口的23%，1850年为45%，1910年为75%。对美国而言，1850年其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14%，1910年为42%，1950年为57%。如果我们将韩国作为参照物的话（其人口大致与英国和法国相同），其城市人口在44年的时间里增长了62%，而英国在110多年的时间里只增长了52%，德国在60多年的时间里只增长了34%（其100多年的涨幅也仅为38%），法国在60多年的时间里只增长了19%（其120多年的涨幅为49%），美国在60多年的时间里只增长了28%（其100多年的涨幅为43%）。换言之，在耗时仅为德、法、美三国约2/3的情况下，韩国城市化的速度是欧洲国家中城市化进程最快的德国的两倍多，是法国的三倍，是美国的两倍。

这种从农村到城市，从农耕到工厂的转变，不仅是经济腾飞进程的重要特征，也是现代性产生过程中最为关键的节点。人们原本在古

老的土地上年复一年、世世代代地劳作，生活平静如水，几乎没有涟漪，工业化如同一颗被扔进水里的石子，从此为人们生活的喧嚣转型揭开了序幕。在工业化的背景下，不确定性代替了可预见性，人们再也看不清未来，更无法在过去的基础上对其做出预测，在这里，人们必须向前看，再也不能一味回顾。在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向现代性转化的国家不断增多，却仍只局限于世界少数地区，即西欧和日本，但是到21世纪初，这种转化的范围越来越大，已经在许多东亚国家出现，并且其速度远比欧洲和北美早期更为迅猛。对于东亚国家现代性的本质来说，这种变化的相对速度包含两个重要寓意，从而将它们与欧洲和北美的现代性区分开来。

1. 对历史传统的追寻

亚洲新兴国家的大部分民众不久前还在田间务农的事实，意味着过去已经在当下的生活里刻下了深深的印记，传统的遗存仍然是当今这个追求现代性的时代中一股极具生命力的力量。让我们从更加人性化的角度来分析这个观点。在韩国和中国台湾，绝大多数祖父祖母辈的民众——他们中几乎一半的人超过50岁，40多岁左右的也不少——都在田间耕作过，至少有过一段时间。在中国，农村人口仍占50%，农村的印记更为深刻：不仅绝大多数的祖父母将一生献给了土地，而且40岁左右的人也大都在务农。正如人们所料想的那样，这种现状对人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例如，近3/4的台北居民认为自己是外乡人：每当邻近中国的农历新年，火车票必须提前数周预定，台湾中山高速公路会持续堵塞数小时，因为大量的台北居民都要回南部过节。类似的现象在东亚屡见不鲜。上海是一个拥有2 000万常住人口的大都市，另外每天还有进进出出寻找工作的300多万流动人口，其中还包括那些在街边摆摊卖水果和蔬菜的农民。上海与无数的中国城市一样，背负着历史活在当下，现代性中融合着传统，这与欧洲城市的经历很相似。所不同的是，东亚国家的变化如此之快，以致其今昔的差别与19世纪的欧洲城市相比，更为明显和突出。

过去对当下生活的巨大影响，也可从人们的态度和信仰中窥见一斑。每逢初一、十五，许多中国人都会烧香祭祖。在初一或十五的晚上漫步台北的街头，你经常能看到人们烧纸祭奠先祖。清明时节，许多人都会返乡，凭吊祖先。与西方相比，中国社会并不十分笃信宗教，但是不少中国人却相当迷信。日常生活中，许多台湾报纸都会在头版的显著位置根据阴历提醒人们宜忌事项。在做大事或做重要的决策之前，许多中国人都会去寺庙拜祭和祈求神灵。甚至连那些高度理性的知识分子也有迷信的习惯。例如，很多人都会注意所谓的风水，因为它可能会带来不同的结果，尽管他们并不信。在中国香港，只有请风水先生看过之后，建筑工程才能最终完工。即使是在台湾新竹科学工业园内的代表了顶尖科技水平的电脑公司里，那些拥有美国博士学位并且已经在硅谷工作多年的员工，也会摆上贡品，烧香拜佛，祈求上苍保佑自己好运。这些例子不能仅仅从过去的影响这个角度来解释，毕竟它们也反映了内在的文化差异。无论何种缘由，“前现代”思维方式的继续存在，是许多东亚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

2. 从现在到未来

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讨论的，现代性着眼于未来而非传统所主导的当下：人们的目光和思想都面向未来，而不是回首过去。但是这种现象的程度有所不同。与欧洲相比，美国的这一特征更为突出，过去如此，现在仍是如此。其中一部分原因在于美国的转型比欧洲要快，还有一部分原因则在于美国没有为任何形式的前资本主义传统所束缚，不用背负历史的重担前行。但是，比起美国，东亚国家面向未来的导向更加明显，这不是因为它不受历史的影响——恰恰相反，东亚地区历史悠久、内容丰富、影响深远——而是因为飞快的转型速度产生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变革体验和预期。与欧洲和美国不同，这些国家呈现出了超现代性的特征，即迷恋变革、醉心于技术、拥有极大的灵活性和强大的适应能力。

因此，如果说过去的深远影响是亚洲现代性的一个方面，那么另一方面则是与其截然不同的、对未来的期望和对变化的强烈向往。这一点不足为奇。如果经济年增长率保持在10%左右，或者每7年翻一番，那么人们的体验和期待，将会与生活在经济增长率约为2%的西方国家的那些人完全不同。这些不仅仅是抽象的宏观数字：假设收入分配是公平合理的（东亚的大部分国家都是如此），那么这种快速增长意味着大多数社会的生活标准不断提升、就业模式发生巨大转变、城镇化持续快速推进、城市景观巨变、越来越多的消费品加速进入国内市场。而所有这些转变，都是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内完成的。对于这些国家来说，如此快的增长速度是前所未有的（“二战”后的日本除外），它改变了家庭等社会单位，提供了无数的机会，同时为社会结构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对于英国来说，这种转变几乎耗去两个世纪中的大部分时光，而对于早期的亚洲新兴国家来说，只花费了不到40年的时间。为了应对这种变化，无论是就个人还是就社会而言，都需要与欧美截然不同的心理准备和思维方式。台湾知名网络企业家兼作家詹宏志曾意味深长地说道：“在如此短的时间里，我们不得不屡次改变我们的价值体系。”结果也不足为奇，它催生了一种高度发达的实用主义和灵活性，否则将无法应付如此快速的变化。

这种迅速变化的特性也在东亚城市与众不同的特征和结构中得到了体现。欧洲城市，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美国城市，它们的城市规划都经过了认真审慎的设计，无论是建筑物的高度、风格，还是功能区的设立。亚洲城市通常没有这样的次序和条理：它们的规划较为随意，每个地区都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建筑物的形状和大小也是形形色色，各不相同。西方城市通常都有一个可确定的中心，而亚洲城市却很少如此：随着城市不断的变革，其城市中心也不断地变化，最后导致一个城市有多个中心。以上海为例，陆家嘴、外滩、虹桥、徐家汇、浦东新区都可以称为中心。吉隆坡则有金三角、双子星塔和普特拉贾亚。日本的东京，与中国台北和韩国首尔一样，都经历过缺乏条理和理念的发展过程，是自然发展的产物。缺乏规章、管制和秩

序，是东亚城市的典型特征：尽显混搭之风，却无凌乱之感，虽无深厚的城市积淀，却并不缺少激情与活力，甚至还能让人流连忘返。人们在社会发展中进行着不断的调整，他们勇敢尝试、敢于冒险，就好像能够持续下来的只有变化。城市的建筑就是经典的例证。亚洲的城市总是不断地拆掉、重建，很少注意保留，这与欧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欧洲的城市虽历经沧桑，但大都尽可能地保持了自身的历史文化风貌。亚洲的城市则总是在颠覆性地重建。你所钟爱的欧洲城市的地标——可能是一个书店或一个电影院，也可能是一个广场或一栋高楼，还有可能是一个地下停车场——当你下次来访的时候，它们依然在原地；而在亚洲城市，唯一确定的便是当你重游故地的时候，已经今非昔比，让你几乎连这个地方都认不出来，更别说能够找到那些地标了。

在对未来或超现代性的追求上，日本可能表现得最为极端。与欧洲和美国不同，在这里你很少能发现破旧的老爷车在街上晃晃悠悠，这里也几乎没有二手车，对二手物品也几乎没什么需求。相反，日本对新东西总是有着近乎贪婪的渴求。直至泡沫经济破裂前，日本汽车制造商一门心思地考虑的，还只是每年推出几款新车，这与西方奉行的“一年一款新车”的原则截然不同。日本电子公司以其不断改变生产线而闻名世界。西方时装界乐于一年举办两次服装展，一次在秋季，一次在春季；而日本设计师则认为时装展应该追求潮流，因此每年都会有许多这样的展览，令人眼花缭乱。日本青年已经成为追逐流行和时尚的行家里手，无论是最新的电子游戏，还是时装服饰，或是最新款的手机，抑或是《宠物小精灵》的动画片。无论你是男士还是女士，在日本当你走进美发店，店员都会拿给你一本厚厚的发型书，里面有各种发型和颜色供你挑选。自然而然地，日本成为消费潮流的引导者。不断提高和创新已经成为这个民族的一大快事。在这里，单脚滑行车的车灯会在光线变暗的时候自动开启，名片夹的盖子可以自动弹开，洗手间的坐便器带有令人应接不暇的调节器和控制开关，虚

拟主题公园的游乐设施让你可能永远都无法想象，至于舞蹈机，让人对舞伴的需求从此显得多余。

如何界定现代性

在其所著的《现代性的后果》（*The Consequence of Modernity*）一书中，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试图对现代性和前现代性的特点加以区分。谈到前现代社会的时候，吉登斯指出：

> 传统的特点是回顾过去，这与只回顾历史而不展望未来的现代性没有区别……然而，从现代性视角来看，无论是‘过去’还是‘将来’都不是孤立的，都与‘现在’紧密相连。

在东亚国家的现代性里，就感知而言，过去、现在和未来，都不像吉登斯所描述的那样紧密相连，相反，现在与过去同未来都存在断层。过去和未来，以一种不同于西方现代性的方式，共存于东亚现代性中。东方的现代性，既非常年轻又无比古老，这种自相矛盾的特质在中国、在上海和深圳等中国的城市，表现得淋漓尽致。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不曾断续的政治体，深圳则是中国最年轻的城市之一。上海浦东新区，一幢幢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拔地而起，展示了极为现代的城市风光，象征着一种雄心壮志和一个没有极限的世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哲学教授高瑞泉认为，“中国就像一个非常渴望长大成人的青少年。他能够看到目标，并希望尽快实现。他总是表现得比实际年龄要成熟，屡屡忘记自己的真实处境”。从社会和经济现实、态度和意识的角度来看，东亚现代性是现在、过去和未来的独特综合体。我们可以将东亚国家描述为“时间压缩型社会”，过去和未来都被压缩至现在当中。世界其他地方200年的经验和历史似乎可以同时发

生在东亚的同一地点。一切都是急匆匆的，没有时间去思考和回顾。代沟异常明显，社会就像一个活生生的地质层。

关于现代性，吉登斯还认为："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血缘关系仍然是重要的，特别是在核心家庭中，但它们不再是跨越时空的组织紧密的社会关系的载体。"这一说法可能适用于西方国家，然而在中国和海外华人社团中却并非如此：在这些地方，"血缘关系"，特别是大家族的血缘关系，经常"都是跨越时空的组织紧密的社会关系的载体"。例如，无论生意大小，海外华人都依赖家族制来实现其分散于全球的商业操作。然而，中国台湾、海外华人社团和中国的其他经济发展较为迅速的地区，毋庸置疑都属于现代世界的一部分。事实上，血缘关系在中国的重要性，远比在西方国家高很多，无论其发展水平怎样，或者信仰如何。1999年，吉登斯第二次在BBC的里斯讲座（Reith Lecture）上发表演讲时说道：

> 这种看法，当然不会随着现代化的发展而完全消失。关于命运和宇宙的神奇概念和构想，仍然在人们的脑海中占有一席之地，但是大多数情况下，它们是作为一种迷信而继续存在，人们对之只是半信半疑，略带尴尬地追随信奉。"

毫无疑问，这种观点并不符合现代华人社会：迷信和传统观念，如我们之前提到的对祖先的崇拜和祈求神灵赐福的现象，依然是多数中国人思想和行为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现代化在世界不同地区和不同文化中的实现，迫使我们重新考量现代性的含义，不得不承认其多样性和多元化。我们得出的现代性概念，不能仅仅建立在北美和欧洲的经验基础上。随着新型现代性的出现，我们对现代性的理解也应该发生相应的变化和扩展。中国学者黄平认为，在许多方面，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都是风格迥异、各有千秋，因此仅仅用西方的概念，是很难理解中华文明及其现代性的。他

总结道："这难道不是一个关于西方的概念或理论是否脱离中国现实的问题吗？中国自身的实践，能够产生替代性的概念、理论和更有说服力的理论框架。"

文化的决定性影响

香港最后一任英国总督彭定康（Chris Patten）在其著作《东方与西方》（*East and West*）中写道："我认为在比较西方和东方的时候，我们所看到的，更多的是由于时间的差异而非深刻的文化差异所造成的后果。"其言外之意在于，时机是一个相对暂时的问题，而文化则几乎无关紧要。然而，我们已经看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时间和速度，远远不是一个暂时的现象，而是具有真正持久的影响。更重要的是，认为文化差异不会对现代性的本质产生深远影响的观点无疑大错特错。当那些国家远不如西方发达——即处于经济腾飞之前或早期阶段的时候，认为这种差异主要是由于其落后的现状而不是文化差异造成的，似乎还说得通。但随着东亚新兴国家的成功转型，韩国、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发达程度至少已与许多欧洲国家相当，这意味着文化差异几乎不起作用的命题可以拿到实践中进行检验和考量。"二战"后的日本就是一个经典的样本。正如我们在第2章看到的那样，尽管日本的发达程度已经可以与许多西方国家相提并论，但在本质上，日本与西方国家却存在着很大的不同。如社会关系的性质、机构的运作方式、家庭的特征、国家扮演的角色、政治体制的运转方式，都深刻地有别于西方。所以，无论如何也不能把日本的现代性描述成与美国或欧洲的现代性相似，更不用说将它当作后者的代名词了。

这种情形同样适用于中国，其通往现代性的途径也是独具特色。国家的构建方式、发挥的作用完全不同于西方。现在和过去之间的关系，在这个国家也表现出根本不同的特质，这不仅是因为历史在现代

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还在于中国比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重视自己的历史，受历史的影响更深。

这种不同文化之间长久以来的差异可谓根深蒂固。1998年4月，为了做一个电视节目，我采访了两个身在北京的美籍华人。为探究中国的真实面目，同时更深入地了解自己，他们决定踏上前往中国的征程，到这个他们陌生的国家工作一年。其中有一位名叫凯瑟琳·金（Katherine Gin）的女孩，当时大概25岁左右，出生之后就一直生活在美国旧金山。她给出了如下见解：

> 我认为美国人和中国人最大的差别之一就在于，美国人永远都在努力地重建自己，他们认为成为第一个做某事的人很重要。即使美国作为一个国家，它也在不停地重新创造自己。而中国人却很少提出这些问题，中国作为一个国家，似乎对于它从哪里来这样的问题有着更强烈的意识。当然，中国确实是瞬息万变，但是他们从来不问自己是谁，也没有不断地将自己与他人作比较。

从中可以得出一个极具说服力的结论：中国人之所以对他们的身份认同有着深刻的领悟，是源于国家悠久、持续、丰富的历史；相反，作为一个相对新生且年轻的民族国家，美国人一直都在探寻他们的身份认同。

承认中国的某些文化特征可以由历史来解释，并非是单纯的“文化本质论”的观点。“文化本质论”认为所有的国家和民族都有一系列固有的特征，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相反，身份认同是不断变化并被重构的。但是这些并不意味着源于气候、农业生产方式、语言、环境、家庭结构和信仰等影响深远的因素的文化特征，没保留什么历史印记或对现在没什么影响。罗伯特·J·博伊德（Robert J. Boyd）和彼特·理查森（Peter Richerson）曾对文化发展与基因进化

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他们认为：“大量证据表明，尽管时间不断推移、环境不断变化，但文化的传承性却是稳定的。”

西方化有多深

漫步台北，几乎每一条街道的道路指示牌都是同时用中英文标注。在台湾，打开电视，最流行的体育运动便是篮球和棒球。星期六晚上想去看场电影，虽然许多台湾电影导演在国际上享有盛名，但影院里放映的却大多是好莱坞的电影。在上海，前往人民广场的地下商场，橱窗里所陈列的时尚广告中，很多模特都是金发碧眼的美女。散步于浦东新区的八佰伴商场，你会看到许多用英文书写的装饰性彩带。上海复旦大学的优秀学生大都希望能够进入美国的大学攻读研究生学位，或者到上海的美国跨国公司工作。30多岁的马来西亚的中产阶层更喜欢去欧洲或澳大利亚度假，而非到日本和中国旅游。在东京最时尚的原宿和新宿疯狂购物时，很快你就会发现，自己会不自觉地附和从时装精品店或咖啡屋里传来的西方流行音乐。

我清楚地记得一位说话温柔的马来西亚律师告诉我：“我穿着你们西方的衣服，说着你们西方的语言，看着你们西方的电影，连今天是什么日子，也完全由你们西方说了算。”甚至连“亚洲”这个词，也是欧洲人的发明。所到之处，你都能感受到西方的存在。西方现代性的绝对权力和动力，已经主导东亚近200年之久。从殖民主义到好莱坞，从英语到篮球，从公历到微软，从越南战争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长久以来，西方对东方的影响远胜于东方对西方的影响。在当代中国崛起之前，亚洲的现代性只是通过日本对西方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此外，东方对西方的影响，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大批后殖民时代移民到北美和欧洲的华人、印度人、韩国人的身上，他们对西方的影响最主要在于饮食方面，此外还有语言、宗教和文化。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亚洲的国家一直在与西方的国家、影响和军队打交道：首先是殖

民主义时期（当时除了日本和泰国外，所有的亚洲国家都遭受过西方的殖民统治），随后则是“二战”后的美国霸权时代。这种不平等的互动，也可被视为东西方现代性的根本差异之一。

上述讨论引出了两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首先，西方的现代性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并塑造了东亚的社会？其次，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深入，东亚国家变得更加西方化还是更少的西方化，抑或是两者相互矛盾的交织？这些问题很难一言以蔽之。在不同的社会，在同一社会的不同时期，答案都有所不同。正如人们所料想的，其答案的很大一部分与历史相关——尤其是一个国家是否被殖民化，殖民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持续了多久。菲律宾就是一个极端化的事例：1542年首次遭受西班牙的殖民统治，1899年又被美国占领，直到1946年才获得独立；还有中国香港，在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被英国占领，一直到1997年才回归中国。日本则代表了另外一个极端，设法摆脱了被殖民统治的厄运。

为了解西方对东亚的影响程度以及影响力是否在日益增强，我们不妨从以下四个不同的方面——语言、体貌、饮食和政治，一探究竟。

1. 语言

> 一个群体共同使用的语言，正是他们所分享的共同历史记忆的媒介。语言使共同历史的延续和叙述变得可能……每一种语言皆有老老少少学习，每一种活的语言本身就是传统文化的化身。

语言不仅是一种交流的工具，还是一种文化的体现和表达。丢失了自己的语言，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丢失自己的文化，21世纪，很可能有数万种语言从地球上消失，正如20世纪的悲剧一样。台湾出版界的翘楚詹宏志曾指出：

语言对于观念的形成是必不可少的——只要你保持独特的语言，你就能保持一种创造想法和思维的方式。传统都保持在语言之中。语言是我们走出去的障碍，但也是阻止他人闯进来的屏障。语言就是我们的长城。

当今世界上使用最广泛的前20种语言中，几乎一半源于东亚国家（见图4－1）注。与本质上是通过海外扩张（正是这个原因，使得目前说英语、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的人数，大大超过它们发源地国家的人数）得以传播的欧洲语言不同，东亚国家的语言是在人口密集、粮食富饶的本土自然而然地发展起来的，其使用人数的增加主要得益于本国人口的增长以及陆地领土的扩张。其在海外的使用范围主要限于本国的移民，因此人数较少。汉语是世界上使用最广泛的语言，远远超过英语，但是其使用者绝大多数都生活在中国，相比之下，英语已成为世界通用语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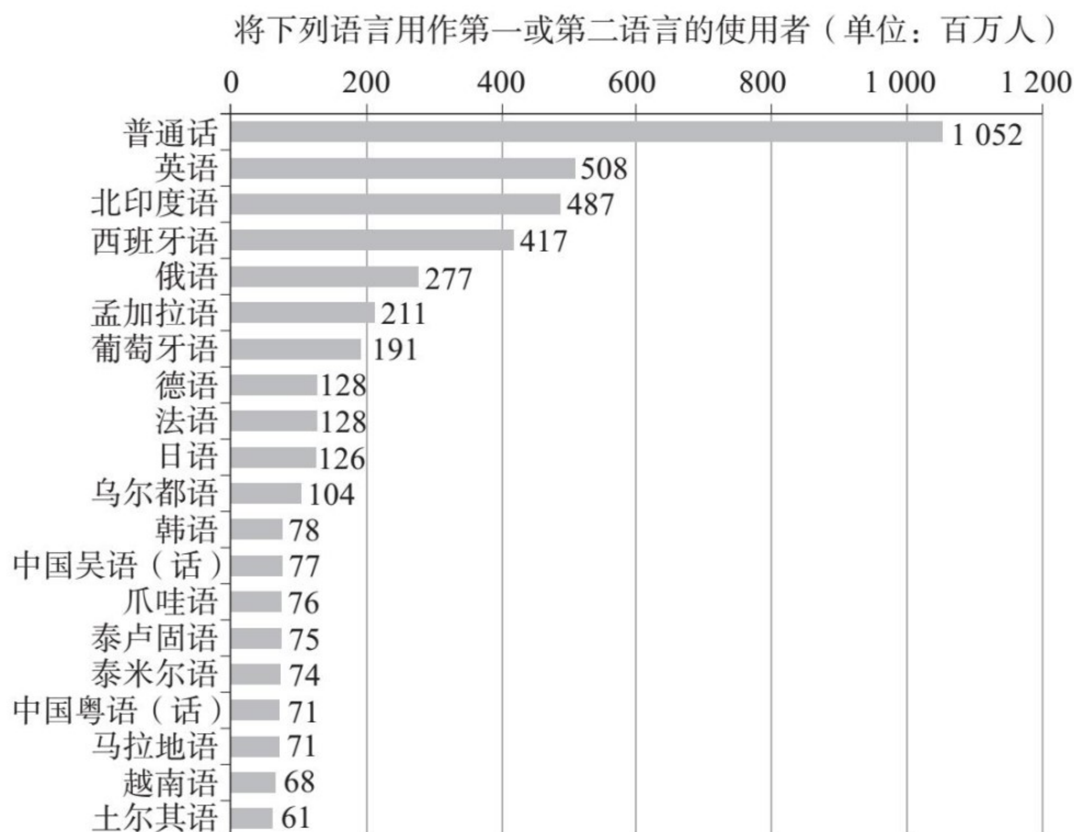


图4–1 世界上排名前20位的语言

资料来源：英国学者尼古拉斯·奥斯特勒的《语言帝国》一书

随着美国在全球主导地位的确立，1945年以来，英语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传播，但是这对主要的东亚语言并没有什么影响，它们在各自的国家里依然非常普及。不仅英语未能削弱或取代主要的东北亚语言（汉语、日语和韩语），那些语言本身也几乎没有受到英语的影响。日语中的确有很多英文的外来语——主要是名词，但这却是一种典型的日本对待外来文化影响的方式，即在本国文化中添加外来元素，而日本的本质并未受到任何影响。同东亚地区的其他地方一样，在日本穿着印有英文单词的T恤、经营一家有英文名字的商店，或刊登一则带有英文口号的广告，都是很时髦的事情，但是这与日本人使用英语的程度和意愿没有什么关系。尽管日本有一大批英语教师，学校也开设了多年的英语必修课，但是绝大多数日本人还是不说英语，既

没有热情也没有能力。不光是英语，日本人对待其他语言也并不感冒。相反，在过去的10年中，中国人已经成为怀有巨大热情的英语学习者，许多受过教育的年轻人都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给人印象十分深刻。疯狂英语的创始人李阳甚至在可容纳2万人的大型体育场内授课，所有学生都重复地大声诵读着英语单词，场面蔚为壮观。自从英语成为中国小学的必修课之后，中国能说英语的人数直线上升。实际上，有人预测现在中国能说英语的人数已经超过了印度。但是中国人学习英语的热情，丝毫不能代表中文流行程度的下降。相反，英语仍只是第二语言，掌握它只是为了与“外国人”更好地对话。总之，对于那些年轻人、知识分子和雄心勃勃的精英人士来说，英语只是一种交流的工具。就中文本身而言，其与日语不同，中文中的英语外来语相对较少，实际上中文从任何其他语言中借来的成分都微乎其微。英语的兴起确实对中文有一定的影响，例如对大量多音节词的使用，但那也相当有限：几十年前曾有人提议通过以拼音取代汉字的方法使中文罗马化，后来也不了了之。

我们不应该对中文的延续性和应变能力感到惊奇。这是一门可以追溯到3 000多年前的语言。包括普通话、粤语（话）、吴语（话）和闽南语（话）等在内的不同的汉语方言或汉语语系的分支，都使用汉语的象形文字书写体系。其中，超过70%的中国人（约8亿人口）说的都是普通话，而且随着电视和教育体系影响力的与日俱增，说普通话的人的数量正在稳步增加。尽管普通话与方言和不同的方言之间，交流起来可能会有些费力，但一旦流于笔端则大同小异，这对于维持中国人共同的身份认同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尽管经历了蒙古族、满族等使用不同语言的民族的长期统治，但汉语却仍流传了下来。少数民族语言不仅未能对汉语施加影响，反而被汉语同化。中文对日语、韩语、越南语等邻国语言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通过将汉字吸收与转化——例如韩语常用汉字和日语汉字，这些国家也创建了自己的语言文字体系。尽管这些国家的语言结构与中文不同，但由于中国古代文化的博大精深，其语言中也出现了大量中文词汇，直到今天依然如

此。中国人经常称自己的语言为中国话，意为“中央王国的语言”。可见，中国中心主义，或者我将在后文描述的“天朝心态”，已经深深影响到了中国人对待本国语言的态度。甚至在字母时代的猛烈冲击之下，中文仍经受住了挑战，实际上，想要创造出一种字母语言，使其能够作为如此之多的汉语语系分支的通用书写体系，供世界上1/5人口共同使用，几乎是不可能的。

在东亚的国家和地区中主要讲英语的只有两个，即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在这两个地方，英语是常用语言。虽然马来西亚的官方语言是马来语，但英语的使用也很广泛。此外还有菲律宾，英语和菲律宾语都是官方语言。在这些国家或地区中，除了菲律宾是美国的前殖民地外，其余都是英国的前殖民地。英语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如此盛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多种族和多语言的环境中，英语能够作为一种有助于交流、对话的工具，印度的情形也是如此。菲律宾是一个语言纷繁复杂的国家，除了菲律宾语外，还有很多的岛屿方言，那里的学生从12岁起，就必须接受学校的英语教学。印度尼西亚的主要语言是印尼语（实际上是数百种语言的统称），其旧殖民统治者的语言荷兰语，现在变得毫无价值。类似地，在越南、柬埔寨和老挝等前法国殖民地国家，法语曾经是行政管理和教育体系中的官方语言，但却早已失去了曾经的地位与作用。

这就带来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英语作为世界公认的第二语言，其使用程度和地位到底如何？就此而言，英语在全球的地位一直稳步（甚至是快速）上升，在东亚国家也不例外。在东盟会议或在北京召开的国际学术会议上，主要的工作语言大部分是英语，即便不是唯一的，至少也是其中之一。在东亚地区，人们学习英语的热情十分高涨。人们之所以认为英语的国际地位不太可能被扭转，主要有几个原因。在全球范围内已经有大量的社会资本和个人资本被用于推广英语的学习和使用，这成为英语得以持续和扩展其影响的强有力原因。英语已经确立了在全球媒体（其影响力和渗透力极有可能进一步增

强）中的主导地位。美国在全球的支配地位，则确保了在大部分领域中，英语仍是最为重要的语言，从国际贸易到科学，再到互联网和外交，皆是如此。最后，作为促进和传播特定文化价值观及规范的工具，盎格鲁－撒克逊世界在确保英语的国际通用语言地位上有着巨大的既得利益，英语在全球的地位为其提供了可观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利益。

尽管英语的价值十分可观，但这并不代表其地位不可动摇。一种语言的国际渗透力与其主要支持者的权力和影响力紧密相连。尽管美国当前仍是全球霸主，但其相对的全球经济地位正在受到挑战，从长远来看，这必然影响英语的命运。就互联网而言，英语的主导地位已受到严重挑战，即便在相对较短的时期内，随着中国互联网使用者人数已经超过了美国，英语也势必无法保持领先地位。尽管英语依然是全球媒体的主流语言，可是随着新兴的非西方媒体进入全球媒体市场，以及主要的西方媒体越来越多地使用当地语言作为扩大市场的一种手段，英语的优势地位可能无法长久地保持。实际上，这些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例如，位于卡塔尔首都多哈的阿拉伯语电视媒体半岛电视台和印度电视台（Zee TV），都已经开通了多语种频道。东亚的星空传媒（Star TV）和中国的凤凰卫视，目前都归于默多克帝国旗下，都在用当地的语言来播放节目。最后，尽管英语在新技术领域尤其是计算机方面有着特殊地位，但随着技术创新的日益多样，加之现在的电脑已经能够支持多种语言的事实，都意味着英语迄今为止在该领域的绝对优势地位，再也无法得到保证。

英语成为全球通用语言，是近些年来发展的结果，因此也可能只是一种相对短暂的现象。不难想象，英语的主导地位正在为更加多元的情形所侵蚀、取代。随着中国在东亚影响力的日益增强，汉语变得越来越普及，不仅该地区内的中国人用其相互交流，就连其他国家和种族的人们也都钟情于它，把它作为第二语言。目前包括泰国和韩国在内的越来越多的国家，在学校中都把汉语作为一种必修或选修的语

言。人们普遍认为，汉语是未来的语言。与此同时，这种趋势也已在北美和欧洲国家出现。随着中国逐步成为东亚的经济中心，日本、韩国、越南、泰国、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等国（还有很多，在此就不逐一列举了）的人们学习汉语也就顺理成章、必须为之了。此外，东北亚和东南亚地区的主要语言，如日语、韩语和越南语，和与其颇有渊源的汉语之间的共同点远多于英语。再过50年，中文很有可能会取代或者至少与英语分庭抗礼，成为该地区的交流性语言。如果这一设想能够实现，那么在中国现代史上，将首次出现世界上使用最广泛的语言同时也成为其他国家首选的第二语言的情形。

那么，就目前所探讨的语言领域而言，认为东亚将处于日益西方化的单向进程之中，无疑是大错特错。古老的欧洲帝国语言，除了英语以外，现在的影响力都已经式微。而东亚地区的主要语言，在它们自己的国度里，仍然具有非凡的影响力。当前英语已经是世界最主要的第二语言，而且其重要性与日俱增，但是我们却有理由怀疑这一地位是否能够永久地保持下去，尤其是考虑到美国正在衰落而中国正在崛起的事实，以及这一现象对汉语普及的影响。关于汉语的问题，我将在第10章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

2. 体貌

本文所说的体貌，主要是指身体特征，尤其是肤色及服装的风格。通过对体貌的研究，我们会有一种截然不同的认识。在体貌方面，西方的影响非常深远，尤其在东北亚国家表现得最为明显，相比之下，东南亚受影响的程度则略轻一些。在日本、韩国、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等地，人们的日常穿着非常西方化（如穿着西裤、衬衫、西装、牛仔裤、T恤衫、短裙、长裙和女式衬衫等）。传统服装则仅仅在相对礼仪性的场合例如婚礼上才派得上用场，在华人社会尤为如此。传统服装淡出人们生活的原因，至今还不明确。然而，印度的情况并非如此，尽管西式服装很常见，特别是在像班加罗尔那

样的“新经济”城市中心里，但妇女围着面纱、穿着沙丽克米兹（上衣、围巾和长裤），男人穿着古尔达－巴贾马（宽松的上衣和裤子）的情形也依旧无处不在。而且，实际上印度的情况与上述国家、地区恰恰相反，有大量证据表明印度人正在回归传统的服饰风格。

明治维新后，西式服装开始在日本流行。最初，主要是公务员在出席正式场合时穿着，但是没过多久，便在老百姓中间流行开来。1930~1945年战争时期，人们普遍用更为简洁的着装取代当时看起来有些“华而不实”的日本和服。“二战”后日本为美国占领，期间经历了大规模的西化过程，许多人直接从战时着装转向了西式服装。从1960年左右开始，西式服装变成绝大多数日本人的首选。然而，传统的和服并没有被遗弃。在出席特殊场合时日本人仍选择和服，比如婚礼、成人仪式和葬礼等。在家里放松的时候，人们（特别是男性）也通常选择经过改良、简化的和服。周末穿和服是日本城市中司空见惯的现象，甚至有些餐厅和酒店，还把和服作为员工的工作服。

尽管如此，深受日本人青睐的西式服饰，仍然是日本独特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日本，妇女穿着休闲装的时候几乎都会佩戴圆边的软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日本人的个子相对比较矮小，这也影响了其对服装和鞋类的选择。年轻妇女的穿着带有浓厚的女性色彩，反映出保守的性别角色依然是日本社会的显著特征。对于日本的男性和女性来说，无论是在服装还是其他方面，都存在一种强烈的从众心理或团体意识，与西方相比，较少强调个人主义。这种特征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就出现了一种与众不同的日本“外形”，其典型的表现之一就是日本近年来流行的可爱的少女装，在国外也很受欢迎。日本最著名的三个服装设计师——川久保玲、三宅一生和山本耀司，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登上了全球时装舞台，但却都没有超越广义的西方传统的界限。不过，比起欧美设计师，他们更具有自己的个性。尽管日本设计师和欧美设计师各有千秋，但日本设计师更为注重服装的材质，颜色使用上也更为朴素暗淡，善于创新，不断推新。当然，在以Zara和H&M

服装品牌为代表的“快速时尚”模式出现之后，不断的、快速的推陈出新已经不再算是日本设计师的显著标志了。西方时尚界对展现女性身材极为关注，但是对于日本设计师来说，他们对女性的身材和展现女性形体关注较少。事实上，川久保玲在设计服装时，会尽量避免公然展现身体的性感。在西方占据主导地位的当今全球时尚界，以上的种种均反映了日本设计师截然不同的审美观。

中国的经历与日本略有不同，但结果却极为相似。千百年来，中国的服装都与社会阶层深深地联系在一起，是社会阶层极为重要和直接的表现形式之一。比方说，只有皇帝才能穿明黄色的衣服，皇子只能选用金黄色，而贵族则只能穿蓝黑色。正如瓦莱丽·斯蒂尔（Valerie Steel）和约翰·S·梅杰（John S. Major）所写道：

> 在古代中国，如何着装，事关重大。服饰为皇帝借以统治国家的权力增添了一道神奇的光环。此外，还可通过服装来分辨文明与粗俗，男人与女人，高贵与卑微，得体与不当。简言之，它是一个致力于等级制度、和谐共融和自我控制的社会用以维持秩序的工具。

因此，出现了辛亥革命在推翻王朝统治的同时也为服装革命提供了契机这样的说法，便不足为奇。清朝的消亡导致陈规旧俗的逝去：满族人所引入的男子梳辫子的习俗，一去不复返；而女子缠足的陋习在持续了一千多年后，也终于烟消云散。随着鸦片战争和通商口岸的开放，中式服装受西方的影响越来越多，但是1911年之后民族主义的兴起，令西方穿着对于中国人来说更成问题。其结果便是“中西合璧”服饰的出现，最有名的例子当属旗袍，它结合了汉族、满族和西方元素，成为20世纪30年代旧上海不可磨灭的记忆。1930~1950年是旗袍发展的鼎盛时期，而其在香港地区风靡的时间更为长久。

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开启了一个全新的着装时代的序幕。当时的新中国政权将传统的中国服饰视为封建残余，因此鼓励人们穿着类似于中山装的（也就是西方所误认为的“毛式服”注）、更具有平等意义的服饰。中山装的特征是高领短款上衣，与旗袍一样，它也是借鉴了日本、德国和苏联的军装因素设计出的一种“混血”服饰。相比之下，风靡一时的服饰，则体现了中国普通百姓的传统穿衣风格的影响。虽然中国并没有颁布关于服装的法令，但是这一全新的服饰，清晰地反映出了平等主义原则，同时也折射出当时中国的贫穷。直到1978年以后，中国人的着装才逐渐开始发生变化并发展成现在的样子，如今，西式服装在中国的各大城市随处可见，成为中国的主流着装形式。现在，毛式服几乎已经销声匿迹，此前中国政府官员钟爱的中山装也在很大程度上被西装所取代。唯一留存下来的中国传统服装是唐装（中式夹克），直到现在仍然十分流行，尤其受老人喜爱。中国妇女普遍习惯穿长裤，相比之下，其数量远远超出喜好穿着裤子的西方妇女。这也是中国古老传统的一种延续。裤子在西方曾作为男权的象征，而在中国却没有此种含义。中国传统服饰的影响已经式微，无论是男装还是女装，也无论是传统的还是经过现代改良的，几乎已经不见踪迹。唯一的例外则是近来旗袍在服务员和酒店工作人员中的再次兴起。

许多设计师都试图将传统作为主题重新引入到现代的中国服装中。最著名的例子是邓永锵所创立的“上海滩”，但它所取得的成功极其有限，因为其专卖店里的衣服，主要购买者都是西方人。另一家香港公司“源”（Blanc de Chine，一个非常有名的服装品牌，深受国际影星的喜爱），以及台北的夏姿·陈，也有类似的雄心壮志。此外，谭燕玉、Amy Chan、安娜苏等华裔设计师也在不断地探索如何将中国元素运用到服装设计中（尽管其事业大部分都在西方）。虽然人们为此已做出了诸多努力，但是与印度相比，现代中式服装最突出的特征仍是它如何西方化的以及其包含的中国传统元素到底有多少。与此同时，在过去的10年中，中国元素，例如中式衣领和盘扣，在西方

的女装时尚界已变得越来越普遍，这也反映出中国服饰日益增强的影响力。而且东亚国家的服装模式正在越来越多地被西方时装采用，这也从侧面体现了东亚市场与日俱增的重要性。此外，东亚市场日益增强的重要性，也导致西方时装模特的用武之地越来越小。

为什么日本人和中国人会如此彻底地放弃他们的服装传统呢？很明显是由于西方现代性的影响——主要是欧洲现代性的影响——已经扩大到人们的着装方面。如果想成为现代人，人们认为穿着就必须西方化：西方服饰已经成为现代性的一个象征。另一个经常会被提及的解释是实用性：人们认为传统的着装形式对于现代生活来说很不切实际。但是这并未解释为什么传统元素没有以大众所能接受的现代形式表现出来：毕竟，这正是不断创新的西式服装所展示出来的事实。修长的连衣裙和衬裙，紧身上衣和马裤，高帽和燕尾服等，都已经销声匿迹，但是西方的服装传统却生根发芽，茁壮成长。有趣的是，在日本，传统的（或简化的）和服从未被看成日本生活方式的根本，不像语言、食物、清酒和榻榻米等，被吉野耕作视为“我们自己的领域”。传统服饰是日本准备遗弃的传统元素之一，服饰的西方化也成为明治维新以后现代化进程的一部分。在中国，传统服装则被认为与封建秩序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实际上濒于灭亡。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西式的着装风格很快就成为中国的主流。

整个东北亚地区的情形与中国大陆差不多，如韩国和中国台湾。另外，大多数东南亚地区的情况也基本如此。主要的例外是马来西亚，还有印度尼西亚，只是其程度稍轻。时至今日，绝大多数的马来西亚妇女仍习惯用纱巾包头，身穿马来套装（围裙和短上衣）。面对快速城市化的进程和种族多元化的客观环境，对传统服装的坚守，实际上也是对自身的文化认同的有力表达。这一方面体现出对马来西亚传统的回归，另一方面也是对各种各样的伊斯兰传统的借鉴，通过使用极其大胆的颜色，表现出一种独特的马来风味。与印度裔马来西亚

人和华人对西式着装风格的一味效仿相比，马来西亚人拥有强烈的时尚意识。

假设是出于上述原因，西式服装在中国、日本和其他国家广泛流行，那为什么在印度和马来西亚的妇女身上却没有发生类似的情形呢？实际上在这两个事例中，宗教在保持传统的服装形式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日本或东北亚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缺乏一种强有力的有组织的宗教体系。印度的情况恰恰相反，印度教和伊斯兰教都很盛行，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文化影响力。而且在这两个国家，服装至少扮演两种角色：首先，它是宗教教化的一种反映，这一点不仅限于对于男、女不同着装的规定；其次，它可能是区别宗教信徒和非宗教信徒的一个标志。着装对于马来西亚的妇女和印度旁遮普邦那些一辈子不剪头发、包着头巾的女性来说，确实发挥着上述两种功效。事实证明，宗教成为西方服饰在南亚国家广泛流行的阻碍，而在中国和日本，宗教在衣着方面的影响却甚微。

东京时装秀是白人模特和日本模特的舞台，但秀场上却很少出现深肤色的模特。川久保玲的品牌“Comme des Garcons”在走秀时只选用白人模特。与华裔模特一样，白人模特在香港时装周也很常见，但黑人或棕色人种却很少会被选作模特——如果有的话，数量也极为有限。当地的时尚杂志通常都是《Vogue》或《Elle》等西方杂志的本地版——内容以本国语言为主，但是模特却几乎是清一色的白人。在香港，包括佐丹奴、盖普等在内的大多数品牌的时装广告，也主要使用白人模特（甚至比华裔模特还要多），几乎看不见黑人模特。这一情况在日本已经有所好转。然而漫步位于上海繁华地带的人民广场的地下购物中心，情况几乎与香港无异：其广告虽然主要以中国模特为主，但也有许多白人模特，然而深肤色的模特却几乎没有。在印度，虽然活跃于T型台和时装杂志上的模特几乎都是印度人，但这些模特也都拥有白皙的皮肤。

在对美容专家，也是上海女性的偶像杨青青进行采访时，我试图找寻为什么白人模特数量众多而深肤色模特却极为罕见的原因。杨青青告诉我说：

> 中国的文化是非常开放的，我们可以接受外来物。我们看待外国人时，对她们的容貌更为宽容。然而如果她们是中国人，国人就会开始吹毛求疵。距离产生美，这正是我们偏爱西方人容貌的原因。

尽管我再三努力，她仍然拒绝回应为什么看似开放的中国文化却并不青睐肤色较深的女性。曾指导过蜜丝佛陀品牌并担任过很多中国流行歌手和影星美容顾问的台湾美容专家美玲，在论及相关问题时更是一语中的：

> 在香港、台湾和大陆，中国女孩都喜欢美白护肤品。她们认为白色是美丽的。人们都怀揣与西方有关的梦想。我们是黄种人，但却并不喜欢自己的肤色。对于蜜丝佛陀、兰蔻和其他护肤品牌来说，每个季节的主打色都是一样的，即白色，非常单调和乏味。我们尝试在不同的季节为中国的女性消费者打造不同的肤色，但是她们只要白色。亚洲人喜欢白皮肤。70多年过去了，白色始终是人们一贯的选择。因为中国人的面部特征是小巧的鼻子、高高的颧骨、窄长的眼睛，因此相对于西方女性，皮肤的颜色对于她们来说显得更为重要。

中国、日本和韩国妇女，对美白产品有着极大的需求，美白护肤品在这些国家是如此受到青睐，以至于它们在电视台和各大报纸的化妆品广告中占据主导地位。据估计，2001年日本的美白产品市场规模约为56亿美元，中国美白产品的市场规模也涨势迅猛，总值达13亿美元。西方化妆品公司针对亚洲妇女消费特征制作的大多数广告，都使

用图片和文字，隐晦地说明亚洲妇女的“黑色”和“黄色”皮肤，从审美学的观点来看处于劣势地位。然而，在西方人的眼中，中国女性和日本女性对于美白产品的追求近乎疯狂，甚至有点儿可怕。所有的一切都在清楚地暗示：黑色令人讨厌，黄色不受欢迎，只有白色才是好的。人们对白色的渴望，还体现在其他方面，比如，在中国、日本、新加坡和该地区的其他国家，同样是艳阳高照的晴朗天气，中国和日本女性会撑起一把伞，以保护自己的皮肤免遭阳光的直射，她们不想让自己的皮肤被晒黑。

日本长期以来，一直谋求将自身与东亚的其他种族，尤其是与中国人区分开来。在漫画和动画片中，日本人把自己描画为高度西方化的形象——大眼睛（有时甚至是蓝色的），颜色明亮的头发（有时甚至是金发），再配上白皮肤。而实际上，日本人的典型体貌特征是黑头发、小眼睛、棕色的瞳孔、黄皮肤。日本人总体上肤色比中国人浅淡，他们喜欢视自己为白种人，而绝非中国和韩国那样的黄色人种。无论在日本还是中国，黑色都具有高度消极的含义，因此在选用模特的时候很少用黑人。生力啤酒曾在香港投放了一个广告，主要内容就是拿一个黑人开玩笑。美玲说：“在我负责编辑的化妆目录上，他们都不喜欢看到黑皮肤，唯独对白色情有独钟。”一家美国顶尖电影公司的高级主管告诉我，在东北亚地区投放的好莱坞电影或美剧几乎不需要黑人影星。放眼日本或中国的电视和电影，最受欢迎的长相属于带有西方特点的日本人或中国人。成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对于日本妇女来说，白人男友享有很高的地位，而黑色或棕色皮肤的男友是无法获得同样的礼遇的，后者往往很难进入她们的视野，要让她们选择黑人男友，那需要莫大的勇气。

在过去的200多年里，西方体貌特征对东亚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先是最富有象征意义的肤色，此外还有白色人种的其他特征，如金发、大大的眼睛和高挑的身材。这一方面虽然在以往很少提及，但是相比本书中探讨的大多常见主题，其更为普遍，对人们的心理影

响也更为深远，就民族认同而言，影响更为重大。日本人照镜子时，总希望能从中看到一个白种人，他们强调自己类似于白种人的那些特征（尽管二者在体貌特征上存在着深刻差异），由此可以看出日本人对自我形象的认知、他们如何看待自身以及日本人在当今世界上的地位。对于日本人来说，与西方人相比时常会自觉体质羸弱，因此更加强了其民族自卑感和不安全感。相比之下，尽管程度较轻，但中国人也会对自己的外貌有类似的感觉。

不过，简单地将东亚人对白色的偏爱归结为西方影响的产物，无疑是错误的。这些国家的人对于白色，有着与生俱来的偏好。对于日本人和中国人来说，长期以来，洁白都承载着强大的阶级内涵。如果你的肤色很黑，那意味着你只是个务农者，处于社会的下层：这种偏见深深植根于两国的国民心里，并随着现代化和城市化的进程而日益加深，人们普遍认为，白皙的皮肤象征着城市生活和富足，而深色的皮肤代表着农村生活和贫穷。国家与国家之间、同一个国家内部的不同民族之间，以及同一个民族内部的不同派系之间的差异性，都可以通过不同的肤色来界定和强化。自明治维新以后，肤色成为日本人区分其自身与中国和韩国等邻国人的标志。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这种肤色等级在肤色较浅的东北亚地区与肤色较深的东南亚地区之间的关系中也有所体现。甚至在东南亚地区内部不同的种族，如原住民、海外华人和海外印度人之间，也是如此。几乎在东亚的每一个角落，肤色都是一个极为敏感的问题，很可能会引发强烈的情绪、感知与偏见。西方模特的影响力，恰恰在于它可以与历史悠久的固有肤色观相互影响和相互促进。我们将在第7章中深入探讨这一主题。

3.饮食

一提起西方化在东亚地区日益突出的表现，人们会很自然地联想到麦当劳。2008年，中国一共有950家麦当劳（第一家于1990年在深圳开张），而早在2004年的时候，日本就大约有3 500家，马来西亚也有

300家。星巴克、肯德基和必胜客，在该地区也有许多家店铺：2008年肯德基在中国拥有2 200多家分店，2006年必胜客在中国也有140家分店。负责麦当劳在中国地区的广告宣传事宜的麦肯锡咨询公司，曾在1999年快餐备忘录上提出：

> 这与现代性有关。快餐店是现代性的标志之一。新的“西式”快餐店（尽管主要是麦当劳）变成了新兴中产阶层的地位象征。它成了中产阶层表明自己能够过上西方式（通常称为美国式）的生活的最初标志。

不过，所有美国快餐店加在一起，也只占这些国家中所有饭馆和餐厅的很小一部分。它们的确引起了媒体特别是西方媒体的很大关注，但同时却也令外界对东亚地区人们的饮食习惯产生了误解。要知道，绝大多数民众还是继续消费本土食物。在北京或重庆，品种繁多的中餐几乎是所有人的午餐或晚餐，日本的情况也是如此。西式快餐——包括所有快餐中最流行的三明治，都处于大众饮食习惯的边缘。西式餐厅在快餐中也没有占据垄断地位。相反，中式和日式的快餐店，即西方人也很熟悉的面馆和寿司店，倒是随处可见，林立于大街小巷。

张光直在其开创性研究著作《中国文化中的饮食》（*Food in Chinese Culture*）中写道：“正是饮食的无限可变性，这种并非人类生存所必需的可变性，赋予了它在理解人类文化方面的重要价值。”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吃的食物也不同；哪怕同处一种文化，人们所吃的东西也经常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此外，人们对养育他们长大成人的食物显示出极大的依赖性，他们对这些食物倍感亲切。人们的本能也体现在饮食上：在新加坡国立大学的食堂里，我印象最深刻的便是中国学生吃中餐、印度学生吃印度餐、马来西亚学生吃马来餐的情形，大家各自坚守自己的饮食习惯，在这方面几乎没有什么融合。

西方国家也同样如此：我们可能偶尔喜欢印度菜、中餐或墨西哥菜，当然都已根据当地的饮食习惯进行过很大的改良，但是我们一日三餐还是以西餐为主。

中国不仅是东亚地区的语言中心，同时也是饮食中心，拥有世界上最让人称道的饮食文化之一，其历史源远流长，可能比任何其他类似的饮食文化都要长久。如同其他所有的饮食文化一样，中餐也是深受其可选用的食材的影响，中餐食材的特点就是种类繁多。因为世界各地食材并不相同，因此中餐所选用的本土食材也令其具备了鲜明的本地特点。中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因此中餐中也蕴涵着巨大的地区差异，这一点不足为奇。事实上，比起单一的中国饮食传统，在此谈论中国菜系可能更为合适。人们普遍认为中国有四大菜系，即鲁、川、苏、粤四大菜系；也有人认为存在八大菜系，即在前述四个的基础上再加上闽、浙、湘、徽；还有人认为是十大菜系，也就是除了上述八大菜系，还可以加上京、沪。从很早开始，中国菜肴就开始引进外国的食物，如很早之前就从西亚地区传入的小麦、绵羊和山羊，5世纪从印度尼西亚传入的香料，以及17世纪初叶从北美传入的玉米和甘薯，这些都助推了中国饮食传统的形成和发展。一般而言，中餐最核心的就是饭（谷类以及其他淀粉食物）和菜（蔬菜以及肉类）。中餐尤为强调膳食均衡，既要有饭又要有菜，而且要适量。

中国饮食的特点就是灵活性和适应性，中国人积累的大量关于野生植物的认识可以反映出这一点，遇上粮食歉收和饥荒的时候，人们为了生存，便会找寻各种可以食用的东西。许多奇特的材料，例如木耳、百合，以及鱼翅等精美的食物，都是这样被发现的，后来成为中国饮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中式烹饪还很擅长保存食物，这是在饥荒时期以及北方人在严冬里寻求生存的又一个结果。中国人对待食物的态度，与健康的理念和健康饮食的重要性息息相关，其根本原则建立在阴阳有别的基础之上，这也是中华文化的一大特色。最后，很少有文化能像中华文化那样，以饮食为根本。中国人，无论富有还是贫

穷，对饮食都极为精心，在这一点上甚至超过了法国人。几千年来，饮食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御厨的重要性，在《周礼》记载的名册中得到了充分证明。据记载，近4 000人负责周王的饮食起居，其中有2 271人负责周王的饮食和饮酒。在英语中，标准的问候语是“你好吗”，而在中国，人们见面经常问“你吃了吗”。张光直认为，“中国在饮食方面显示出的创造性，可能源于一个简单的理由，即饮食在中国国民的生活方式中至关重要，甚至是其精神特质的一部分”。而谢和耐则认为，“毫无疑问，中国在饮食方面所显示出来的创造力，比其他任何一种文明都要巨大”。

在这幅饮食画卷中，我们还应该加入中国的茶。没有人知道饮茶是从何时开始的。到唐代，中国的茶文化已经相当发达，但是要追根溯源的话，肯定还可以回溯到更久以前。中国的茶文化博大精深，千变万化。领悟中国茶文化，需要敏锐的洞察力和严谨的态度，这一点与探究欧洲的葡萄酒文化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在西方文化中，没有类似于传统的茶馆那样的场所；走进中国的茶室，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品种各异的茶叶，令人眼花缭乱，沏茶时所遵循的步骤和品茶过程中的各种讲究，足以让人瞠目结舌。另外，大凡茶室，环境都很典雅别致，的确能让品茶者充分地享受到中国茶文化所蕴含的宁静和淡泊。虽然咖啡已经越来越受大家的欢迎，但是茶仍然是中华国饮。随着人们对中国文化的日益喜爱，不久之后，中式茶馆很有可能会成为许多西方城市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因此，仅凭中国人喜爱麦当劳，就认为中国饮食文化正在被西方化，似乎有些荒谬。的确，中国饮食已经受到了西方的影响，如食材方面，但是这种影响相对比较有限。与中国文化的其他方面（如衣着和建筑风格）不同，无论是东南亚，还是北美洲，海外华人群体的饮食习惯依然以中餐为主的事实，充分说明了中国人对中餐的特殊依恋。

日本饮食受西方的影响更大。日本有很多家常的、以西餐为基础的美食，其中不少都是在明治维新后才发明的。19世纪下半叶，日本的精英就已经试图学习制作法国菜，“一战”之后，西方菜肴开始进入中产阶层的厨房，尽管进行了明显的本土化改良。从本质上讲，外国菜在日本饮食中被作为正菜以外的配餐，这样做既可以为日本社会所接受，又能在很大程度上保留本国饮食的特点。卡塔日娜·奎尔特卡（Katarzyna Cwiertka）认为：

> 关于融合日本和西欧的食材、调味品、烹饪技术的基本规则，大约是在20世纪30年代左右形成的，并且一直延续到今天，日本厨师一直对外国元素加以改造，再融入日本的饮食中。某些组合最终变成了后来日本饮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他的则被舍弃了，但是几十年后它们还可能重新出现，并作为全新和时尚的方式而备受尊崇。

东亚国家的语言在本地区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但是在东亚地区之外却难成主流，这与饮食的情况大不一样。贫穷的移民带着本国的食物一路漂洋过海——例如在移民定居的早期，中餐馆一直是华人移民的支柱产业，任何一条唐人街都可以证明这一点。欧洲食物对东亚饮食的影响极为有限，且主要是在殖民统治时期产生的；然而在过去40年中，通过迁移到西方的移民，东亚的饮食却对西方国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中国、日本、越南、泰国、韩国和马来西亚的餐馆——印度的当然就更不用说了——已经遍布西方国家的主要中心城市。在过去的25年中，日本料理在美国西海岸人民中极为流行，甚至还创造出加州卷等新型日美混合美食。

与其说东亚饮食的习惯被西方化，西方饮食被亚洲化可能更为恰当。这与移民的确有很大关系，但同时也是东亚地区品种繁多的食材和高超的烹饪技术所致，相比之下，欧洲和北美大部分国家的饮食文

化就逊色很多。以世界上最大的殖民统治者英国为例，就目前而言，该国所拥有的饮食文化只能用贫乏和俗套来形容（当然，英国的布丁除外）。“二战”之后英国烹饪艺术的空白，很大程度上是由外国饮食文化填补的，首先是欧洲，特别是意大利和法国，再次是亚洲，尤其是印度和中国。因而，英国菜肴实质上变成一个混合物：在饮食方面，英国类似于一个发展中国家，在保留了一部分本土特色的同时，广泛地借鉴外来的饮食文化。美国情况也较为类似，尽管其饮食文化最初是以欧洲各地饮食文化的杂合而开始的。当然，全球化时代的一大特点是世界各地的饮食相互融合，但是其程度却不应该被任意夸大。东亚地区的饮食基本上还是以本土为主，与外来饮食的融合并非主流。当然也有例外，马来西亚作为一个典型的多民族国家，中餐、印度菜和马来西亚菜相互融合、互相借鉴，最终造就出具有鲜明特色的本国美食。

4.政治和权力

西方普遍认为，所有的政治制度都正在，或不久后将会，向以西式民主为主要特征的相似政体发展。此外，还有一种观点，在将西方历史、经验和实践视为具有普世性的基础上，认为所有国家正在或必须以相同的方式行使权力。事实上，在不同的社会之中，政治权力的本质也相去甚远。鉴于政治体系的抽象性和机械性，从政治文化的角度来思考，更易于得出结论。原因很简单：政治根源于文化，特定的文化孕育出特定的政治。因此，它是一个既深刻又狭隘的概念。商人可以超越许多不同国家的地理界限，去经营自己的生意或展示自己的手腕，知名学者可以在全世界各个大学里举办学术讲座；而政治家的才能，即获取民众的广泛支持和权力的运用，却仅限于特定的国家里：这样的才能和魅力是无法环游世界的，它们都是为当地民众精心打造和刻意雕琢的，源于深刻的民族文化。当然，大国的某些领导人可能会赢得全世界人民的钦佩和欣赏，例如20世纪80年代的撒切尔夫人，现在的巴拉克·奥巴马和20世纪前10年在中国大受欢迎的弗拉基

米尔·普京（这一点十分有趣）。但想要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国家获取民众的支持、进行统治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西方社会和东亚社会的权力本质存在着深刻的差异。前者主要是源于对个人自主和个人认同的追求。在东亚文化的中心地区——无论是东北亚（换言之，即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文化）还是东南亚，权力都源于个人对群体（包括家庭）认同的追求：个体是作为某个群体的一分子，而不是从个人身份中得到肯定和认可。个人是通过成为群体的一员，来寻求安全感和价值。而西方的统治方式主要基于功利主义的概念：即政府必须给选民提供一定的好处，来换取他们的支持，至少理论上如此。东亚政治则完全不同。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相较于西方国家政府的权责明确，东亚国家的政府在运作上一直不是很透明，政府能实现的目标非常有限，政治博弈的最终结果往往是由很多超出人为控制范围的其他因素所决定的，其中的因果关系扑朔迷离、难以捉摸。东亚政治不以实用主义为基础，权力本身就被视为一种最终价值，与社会的集体福祉密切相关。政府基本上扮演家长的角色，民众则将政府视为靠山。虽然在现代化和经济增长的压力下，社会不得不变得更加实用——正如发达国家所倡导的那样，但是关于政府治理的传统思维方式依然强劲有力。东亚地区的许多国家，即便是日本、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定期选举的国家，仍处于家长式的一党执政之中，就是对此点的力证。

虽然以上论断对东南亚地区和东北亚地区皆为适用，但是两者之间也存在显著差别。下面我将集中讨论后者，即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社会，例如越南、日本、韩国、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从很早开始，中国就主要从世俗的角度来看待政府的职能，这一点极为罕见。中国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治理体系并没有将自己打造成一个天赋神权的代言人，而是以道德秩序理念为基础。统治者在治理过程中必须遵循孔子的思想，同时还担负着人们寄予的代表最高道德水准的厚望。此外，中国还有一套复杂、精巧的政治等级制度，决定政府官员能否升

迁时必须将其道德水准纳入考量范围。政治体制被等同于社会秩序，总目标是要建立一个和谐、平衡的“大同世界”。从秦朝开始到清朝衰亡，这些原则一直在不同程度地影响着中国的治国理念。

社会和政府的模式都建立在家庭的基础上，家庭也是每个人最亲密、最熟悉的社会制度。个人被视为社会和国家的一部分，正如家庭的一分子一样。儒家文化中的家庭具有两个主要特点。首先，是“孝”，子女都有尊重父亲权威的义务，父亲则承担赡养家庭的重任。国家也是效仿家庭而建立的，在封建时代，对于国家而言，君就是“父”。其次，尽管中国人总体而言并不笃信宗教，但是其与其他儒家社会一样，信仰神灵，即认为祖先是永远存在的。人们通过祭祖的仪式来表达对祖先的敬意，这有助于强调家庭的延续性和血缘关系，突出家族成员的谦恭。同时，对祖先神灵的信仰，也鼓励人们像敬仰祖先那样尊敬国家，崇拜这个代表着中华文明连续性的机构。在中华文明里，家庭的重要性可从姓氏所暗含的意义的中窥见一斑。在中国，姓氏的意义要远远大于西方，人们普遍都十分重视姓氏，姓在前，名在后。

在儒家社会，通过家庭来实现个人的社会化，一直是个高度纪律化的过程。孩子们很小就认识到，万事有定位，他们自身也是如此。人们对自己作为公民的作用和职责的了解，也是从家庭责任延伸的角度实现的。通过家庭，人们学会了服从集体，明白了个人相对于集体来说永远位居第二的道理。西方社会主要依靠基督教中的原罪来约束和指导个人行为，至少从历史上看是如此；儒家社会则不同，它依靠人们的羞耻感和怕“丢面子”的心理对个人行为进行约束。儒家社会的纪律是通过在家庭进行的个人社会化过程内化于每个个体之中，西方则是通过宗教的教化来实行外部诱导——尽管这一传统在日益世俗的欧洲已逐渐被弱化。

就是这样一种归属感的力量——先是归属于自己的家庭，后来延伸到社会、民族和国家——使民众对自己的种族和国家，产生了强烈的依存感和热爱。也正是出于同样的原因，民众可能将外国人视为“野蛮人”、“魔鬼”或其他邪恶的化身，并从内心排斥他们。所有的儒家文化国家都推崇“公民”这一概念。中国、日本、韩国和越南等国家的国民，都有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情结，人们经常将这种现象归结为对西方专制压力（如殖民主义）的反应。但事情远非仅仅如此，这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甚至可以说是一个不太重要的方面：身份认同的效用、对外来者的排斥和本国民族主义的力量，主要是由本土社会化进程的性质造成的。

家庭的作用，在于为其成员提供安全感、支持和凝聚力。换句话说，在儒学社会里，政府是以这样一个机制为原型而设立的：其重点不在于实现外部目标，而更注重强调自身的利益、自我维持和自我延续。因此，这些社会都明显表现出强调国家的统一、稳定、连续性、凝聚力和团结等特征，也就不足为奇。因而，与我们所熟悉的西方政府的概念不同，儒学社会对政府概念有着不同的理解。在西方，政府实际上被视为人工构建的产物，是民众期望其能担负起责任的一个外部机制，但与此同时民众又对政府充满了怀疑，不断尝试去界定、限制和约束政府的权力。中国和其他的儒学社会对此的看法则截然不同：对于它们来说，国家本质上类似于家庭，是社会自然的和内在的组成部分，就更广泛的意义来说，也是民众的共同目标和福祉的一部分。像家庭一样，国家既不受法律约束，也不受任何限制。中国的民众对政府的理解从未仅限于狭隘的政治视角，而是更多地将其视为价值、道德行为和社会秩序的引导者。政府之所以被赋予了如此广泛的职责和期许，是因为其深深植根于中国文化之中，而中国文化将政府视为自然规律（“道”）的一部分。

对于西方人来说，理解和把握儒家政治文化的本质，绝非易事，因为其与他们所熟悉的西方政治文化存在很大的不同。长久以来已经

习惯于掌控世界的西方人，还无法适应需要理解和承认差异。所以，他们只是从极其肤浅的层面来看待东亚政治。日本被看成一个民主国家，只是因为它有选举机制和竞争性政党，然而其政治体系的运作方式与西方完全不同。对于1949年后的中国的理解，基本上是从共产党政权这一视角出发，结果就忽视了其与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之间的潜在连续性。事实上，对于日本政治极其特殊的本质，以及共产党领导与王朝统治的密切关联，我们都不应感到惊讶。两者都是政治根植于文化的范例。

鉴于东亚政治的运作方式和传统与西方截然不同，我们能否总结出各自的优劣之处呢？对于西方人来说，这是一个微妙的问题。尽管他们的接受能力比较强，但他们会不可避免地运用西方标准来加以衡量。打个比方，绝大多数西方人都将依赖视为一种消极的东西，而东亚人的看法则截然相反，认为它是积极的。谁对谁错？无从判断。鉴于东亚社会中存在的较强的依赖性和家长式政府的理念，东亚社会的缺陷可能就在于集权主义和一党制政府。然而，另一方面，这种家长式领导体制也有一定的优势。因为政府和领导者享受不同类型的信任，人们赋予他们更多的自由来改变方向和政策。他们不会受到类似西方领导人那样的限制。在某些方面，东亚领导者更加平易近人，因为他们是从大局出发来审视自己对社会的责任，同时，人民对他们也采取类似的看法。他们所享有的绝对的权威，来源于家长制和依赖性的共生关系之中，这也促使他们以较为长远的眼光来面对社会及社会的需求。

东亚政治体的鲜明特色，深深扎根于历史之中，但它们是否会随着现代化的进程而弱化呢？某种程度上，它们正在变得越发强劲。随着反殖民主义意识形态的减弱，人们逐渐回归到更为传统的家庭和本土主义的理念之中。此外，虽然家庭这个体制本身正在发生变化——在中国，家长制已不如从前那般盛行——但其与西方的家庭仍然存在极大的不同，这一点在责任、价值观等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事实

上，在亚洲所有的机制中，家庭习俗的变化最为缓慢。而这种塑造了东亚政治的深厚力量，不可能对东亚社会逐渐丧失其政治特色听之任之、坐视不管。

本土的现代性

以上四个方面的分析所展示出的并非西方化的广泛影响，而是其令人惊讶的局限性。通过对比的方式，对以上四个方面进行分析，令我们了解到了东亚社会的最为核心之处。从中，我们可以得出两个一般性的结论。第一，如果西方化影响是有限的，那么东亚社会及其现代性就仍然具有植根于本国历史和文化并由其塑造的独特性。这些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也不只是简单地甚至主要依靠从西方借鉴经验，而是依靠其本身具有的自我变革、自我现代化的能力，换句话说，东亚社会现代化根源于本土而非舶来品。获得亚洲现代性的第一个国家日本，便是例证。它可能从西方广泛地引进了大量的经验，但是最终结果却完全是极具特色的日本现代性。第二，如果现代化的过程只是原封不动地照搬照抄，它是很难取得成功的。人们必须相信，现代性必须要结合本地的实际，才能生根、结果。所有东亚国家都深受西方或日本抑或两者兼有的影响。实际上，这些国家（包括日本在内）的现代性都具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即混合性，它们都是各种各样的本土与外来元素的结合。但是这种外来影响与本国固有特性之间的界线何在，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一个社会感觉自己的现代性从本质上讲是被强行附加的，是一个舶来品，一个移植产物，那么这种现代性一定会被抛弃，其结果只能是以失败而告终。对于殖民主义时代没有一个殖民地社会能够成功地实现经济腾飞这一现象，除了当时的殖民者故意压制殖民地人民、防止其与本国产品竞争外，还有更深层次原因。就字面上的解释而言，所谓殖民状态就是指殖民地受异域的殖民者和文化的控制。唯一的例外是白人定居者建立的殖民地，由于其与殖民者英

国人同源同种，所以经常能被另眼相待。香港直至20世纪50年代末，即英国占领其一个世纪之后，才成为最早实现工业化的殖民地，这虽然令英国在殖民统治了一百年之后赢得了所谓的美名，但实际上香港的成功离不开中国大陆心照不宣的合作与支持。

鉴于中国源远流长的历史和独树一帜的特性，不言而喻，中国的现代性只能在一种情况下取得成功，那就是让中国人民感觉其现代性进程从根本上说是一种中国现象。在1850年的“中体西用”之争后，关于这个话题的唇枪舌剑在中国已持续了一个世纪之久（日本也是如此），直至今天仍是一个极富争议的话题。在实现中国现代性的过程中，中国传统与西方现代性之间的冲突，在我十多年前所组织的一场讨论中得到了很好的诠释。参与讨论的是4个来自中国顶尖学府之一的复旦大学的学生，当时都是20岁刚出头。其中，两个女生高怡人和黄永依（音译），不久就要去美国读博士；另外两个男生王建雄和张晓明（音译），刚刚在上海的美国公司里获得了理想的工作。他们可谓是精英，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的最终受益者，也是全球化浪潮中的中国赢家。

> 王：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华文明处于世界舞台的边缘，西方文化则占据了全球主导地位。相较于西方，中国一直以来过于关注过去、关注历史。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为什么我们会落后于其他国家，为什么我们国家一直无法发展。西方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胜利，这对于中华文明来说，是一个不小的危机。
>
> 高：我们的传统价值观与现代的西方价值观一直存在着冲突。在如何处理这种冲突上，我们总是不知所措。这两种价值体系一直是相互排斥的。我们总是觉得有必要回顾历史，从中理解我们到底是谁。我们之所以对历史如此专注，是因为传统依然十分强大。
>
> **你对未来是否更为乐观？你认为中华文明将继续处于边缘位置吗？**

王：我们的文明正在步入一个关键时期。在过去的一个世纪，我们主要使用西方的思维来发展自己的社会和文化。这并不是很好。我们必须建立自己的知识体系、自己的方法论，用来发展我们的国家和文化。我们必须建立自己的东西，而不是照搬外国思想。这是我们20世纪已经主要在做的事情。但是我相信，在21世纪，中国人将能够创造出自己的知识体系。

如果中国做到了这些，它在世界上的地位会变得更加中心和重要吗？

王：中国不会成为世界的中心，但是中国将会实现自己的现代性，而且这种现代性既不同于美国——顺便说一句——也不同于苏联。那将是一种全新的现代性。

这种现代性的与众不同将会体现在哪里？

王：我们可以以中华文明为基础，来创建我们自己的现代性。当然，我们会借鉴西方文化中的部分内容，但是我们不会将其全盘移植到中国。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犯的一个错误，就是总想把它们的体系和机制移植到其他国家。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因为它忽略了一个国家文化的核心。我总是喜欢关注文化的核心：改变或排除文化的核心是不可能的。

那么中国文化的精髓是什么？

王：5 000年的悠久历史。

这种文化精髓的价值观是什么？

王：这种价值观是由很多因素组成的，例如我们对生活、家庭、婚姻等的看法。在中华文明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因为我们的祖国是如此幅员辽阔，我们已经形成了很多不同的观点和看法。

你和张晓明都是学习国际金融的，但是你们所说的全部都是关于中国特色的东西。

王：全球化是西方化，但它应该是一个双向的过程：我们接受西方的思想，同时西方国家的人们也应该尝试着理解甚至接受

我们的一些观点。现在的情形却完全不同：仅仅是我们在接受西方的观念，反过来却并不如此。这就是问题所在。因此，我们失去了自身文化中的很多东西，这不禁令人忧心。现在我们都很害怕失去自己的文化。我们接受西方观念，不是因为它们对我们有好处，而是由于它们的新颖性。它们对于我们来说是全新的，所以我们接受它们。但是总体来看，我并不认为它们对我们有益。可能再过20年，就该是我们放弃它们的时候了。

张：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总是有一部分中国人希望改变，另外一部分则想保持原样。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整个社会，我们都生活在一种矛盾的状态中。在清代，我们闭关锁国，拒绝与外界接触，主要是因为我们想要保持自己的文化和文明。原因之一在于我们自认为优于世界其他地区，这一点是令人难以信服的。当我们最终打开国门，才发现自己与西方国家相比，已经被远远地甩在了后面。现在，我们再次打开国门，正是因为这种开放，让我们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西方影响。我们害怕会失去自己的文化和特性。我想要改变，因为目前中国的情况并非令人满意，但我也很担心，在消除自己文化缺陷的同时，我们可能也会失去中华文明中最本质、最精华的部分。

黄：尽管目前西方带来的影响巨大，且带有一定的侵略性，但我认为中国人不会失去自己的文化，因为它毕竟体现了一种厚重的历史积淀。哪怕表面的一些东西发生了变化，其本质却是根深蒂固的。在我们每个中国人心目中，都存在一种强大的核心文化，即便我们的生活方式有所改变，这种文化也不会变。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经常会重现。当前，我们正处于一个茫然的时期，对此我并不否认。我们之所以感到迷茫，主要源于现代性与传统之间的潜在冲突。不过，我还是坚信，新东西终将出现，独一无二的中国将会继续屹立于神州大地。

高：我们已经渡过了最困难的时期，比如我们沦为半殖民地的时候。现在我更有信心。中国现在正处于一个全新的时代，我们并没有遭到侵略，但是我们确实正在受到西方的影响。不过有

一点是明确的，我们不会被西方化，我们的核心文化依旧傲然挺立。

现代性竞争

当今世界的均势，正在发生急速的变化。1973年，美国、西欧、日本以及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笔下的所谓“西方旁支国家”（如澳大利亚）等组成的发达国家俱乐部，人口只占世界总人口的18.4%，但其GDP却占世界总值的58.7%。到2001年时，这种景象却大为改观，这些国家占世界GDP的比例已下降为52%，同时其人口占全球总人口的比例降至14%。期间发生的最引人瞩目的变化，莫过于除日本外的东亚国家占世界GDP的比例急剧上升，即从1973年的16.4%一跃而至2001年的30.9%，而其人口比例仅从1973年的54.6%增至2001年的57.4%。在未来几十年里，这种变化趋势将表现得更为显著。据估计，到2032年，所谓的“金砖四国”，即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占世界GDP的比例，可与美国、加拿大、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和日本所组成的G7集团的相应份额等量齐观。预计最迟至2027年，中国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为了理解世界未来的多样化程度，我们不妨也将目光投向其他的发展中国家。据估计，到2050年，孟加拉国、埃及、印度尼西亚、伊朗、韩国、墨西哥、尼日利亚、巴基斯坦、菲律宾、土耳其和越南这11个国家的GDP总和将相当于G7集团的2/3。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人口占全球总人口的比例将稳步上升，但亚洲人口总量会相对稳定地保持在略低于60%的水平。2001年时，印度和中国这两个世界人口大国的人口总量已占世界总人口的37.3％，预计届时这一比例会略微有所下降。发达国家人口总量占世界总人口的比例将继续稳步下滑。

19世纪和20世纪都是西方的时代，但是这个时代即将结束。到21世纪中叶，西方国家占世界GDP的比例将降至不到一半，这表明西方时

代行将成为历史。中国、印度、巴西、韩国和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崛起，不仅代表着一种经济力量均势的巨大转变，同时还包含了更广泛的寓意。经济的繁荣有助于这些国家增强自信心，也促使其在更为广阔的舞台展示其政治和文化价值观。亚洲新兴国家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在现代化的初始阶段，它们原本将西方的一切都视为现代性的特征，对其充满了渴求；与此同时，将自身的本土特性视为贫穷和落后的代名词，恨不得弃之如敝履；而随着现代性进程的发展，它们越发重视起本土的特征，而且较之西方的特性更甚。例如，在20世纪70年代，关注传统中国大陆家具的台湾人为数甚少，但是到90年代早期，越来越多的人对传统工艺品产生了兴趣。中国近来的情况也是如此，古典家具兴起了热潮并带动了很多相关的电视节目的发展，但真品太少、赝品太多，导致古典家具的行情一路攀升。台湾流行音乐的发展过程也极为相似。20世纪70年代后，本土或本地区的中文流行音乐的影响力取代了西方音乐的影响力。换言之，传统并未被抛弃，而是作为一种新型本土现代性的组成部分得到了更进一步的重新表达。

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东亚地区的情况也是如此。1980年，很少有人了解或关注本地区内的其他国家，所有的目光都盯着那个全世界都向往的地方——美国。东西方之间的交流几乎都是单向的过程，西方的信息、音乐、政治观点、科技、教育、电影、志向和心愿等，一股脑地涌向了东方，势不可当。大多数东亚人对发生在纽约、华盛顿和伦敦的一切，远比对东京、首尔、北京和吉隆坡所发生的事情了解得多。东亚国家至今仍然非常密切地关注来自美国的消息——特别是相对于美国对东亚国家的一无所知而言，更是如此，但是情况也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詹宏志曾形象地描述了这种心态的变化：

> 当我还在上高中和大学的时候，我们把所有的精力都集中在西方文学和思想上，我的儿子现在刚十几岁，相比之下，他更有机会实现创新，因为他可以同时学习中国文学和西方文学。

所以在未来的日子里，世界将不只存在一个占主导地位的西方现代性（当然西方现代性本身也是一种多元化现象），还会有很多不同的现代性。很显然，我们已经进入一个具有多元现代性的时代：到21世纪中叶，我们将彻底进入这样一个时代。一直以来，我们都生活在一个西方制造和西方占主导地位的世界里，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交流均不可抗拒地呈现出由西方流向其他国家的单向性特征。如今，一切皆已开始改变，交往和流动已经变成了双向的进程，或者更为确切地说，是一种多向的进程。关于原有的等级次序是如何一点点被打破乃至被颠覆的，板球的发展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趣的说明。以前，英国以及两个前白人殖民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板球实力一直领先于其他国家。然而到了2008年，印度已经占了板球比赛总收入的80%，并建立了自己板球超级联赛。印度的板球联赛一共有8支球队，分别代表印度的不同城市和政府，而且正在招募许多全世界最优秀的板球手，让一向以板球中心自居的英国板球机构非常懊恼。显然，板球的未来属于印度次大陆，这个地区将在决定板球比赛特征、偏好和发展等方面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如果说在足球领域，曼联、利物浦和巴塞罗那的球迷遍布全球，那么在板球领域，“旁遮普王者十一人”队和“金奈超级王者”队也在朝着类似的方向发展。

西方时代的标志，并不仅指西方在经济和军事方面占据主导地位，还有其在文化、科技理念、绘画、语言、体育和医学等几乎所有领域的领先优势。西方霸权意味着，任何与西方相联系的事物都拥有其他文化所没有的声望和影响力。白色的肤色在全球都很受欢迎，在亚洲也是如此，其被视为西方权力和财富的同义词。出于同样的原因，西式服装在全世界也都非常流行。英语之所以成为全球通用语言，与美国在世界中的极端重要性也是密不可分的。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西方特别是欧洲和美国的历史更为人们所熟知，因为西方的中心地位迫使或促使其不得不去了解这些历史。也正是出于同样的原因，西方的（也只有西方的）政治理念和价值观被认为具有“普世意义”。但现在，西方已不再是现代性的唯一家园，随着其他国家逐渐

成为前现代性国家，全球的均衡在整体上发生了变化。印度教不再是落后的代名词，印度服饰也是如此。现在，再也不能将把中国的政治传统视为中央王国时代的封建残余而置之不理，也无法再将西方的家庭视为现代化的化身，而把中国与印度的家庭当作农耕时代的残存。对于越来越多的非西方民众来说，人们也会像熟悉西方历史一样去熟悉中国历史，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也就是说，西方国家与其他国家的竞争，从根本上说将不再是现代性与传统之间的不平等的竞争，而是逐渐演变为不同现代性之间的公平竞争。这一点在商界已经有所显现。来自韩国、日本和中国等国的，带有本国文化特征的公司与企业正在和与之截然不同的欧洲公司进行竞争，而且还获得了不小的优势。

20世纪的特点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这种分歧始于1917年的十月革命，在1945年之后的冷战中得到了明确的体现，最终随着1989~1991年的苏联解体而结束。当时那个世界中的每一次冲突和每一场分裂，都有意识形态对抗的背景。然而随着苏联的解体，这样的一个世界在瞬间就烟消云散了。美国的新保守主义者认为，反恐战争——即他们所描述的第四次世界大战（第三次世界大战是冷战），是新的全球分野，但这是对历史的根本性误读。事实上，我们现在正在进入的这个时代，最确切的表述应该是现代性竞争的时代。与冷战时期不同，其本质并非政治或意识形态的分野，而是文化的竞争。新型现代性的出现，不仅意味着在现代性的问题上，西方不再享有实质性的垄断地位，而且意味着这些社会的历史、文化和价值观，也应该得到某种全新的肯定，再也不能被视为“落后”或“失败”的代名词。相反，这些社会和文化应重新获得认可，不再对西方俯首称臣、毕恭毕敬，而是享有越来越多的自信。

迄今为止，西方的傲慢自大一直是整个世界的特征之一，西方国家坚信其价值观、信仰体系、制度、机构和安排均优于其他国家。这种心态的影响力和持续性不应该被低估。西方国家的政府一直都理直

气壮、肆无忌惮地向其他国家兜售其自己民主和人权的理念。这种心态绝非西方国家的政府所仅有，其大体上可被视为是民众的文化共识的反映。例如，许多西方女权主义者臆断西方国家的性别关系，比世界其他任何地方都更为先进，而且与其他文化中的妇女相比，西方妇女的解放和独立程度更高。

在西方，人们心目中普遍存在着一种根深蒂固的心理优越感，在西方世界强势的经济、政治、意识形态、文化和种族等思潮中，无不有所体现。一个具有多重现代性的世界的崛起，正挑战着这种心态：在现代性竞争时代，这种心态将逐渐被侵蚀、削弱。“先进”、“发展”和“文明”之类的理念将不再是西方国家的代名词。这预示着西方社会将面临一次最严重的生存危机，其政治影响我们无法预测，但肯定是极为深远。影响了几代西方人对世界其他地方看法的假设，现在已经越发不可持续、四面楚歌。西方国家认为自身具有普世性，是其他所有国家无可置疑的模式和榜样：而在未来，其却只能成为若干可能性中的一种。正如在本章伊始所引用的保罗·柯文的观点所表明的，至少直到近期，西方国家对这一景象几乎毫无准备的。在未来的日子里，西方必须要从比较而非绝对的角度来审视自己，必须放下内心中潜在的优越感，抛弃那种自认为最了解整个世界、将自己视为世界其他智慧的源泉错误想法，了解其他国家并向其学习。中国将在这场变革中承担重任，一部分是因为中国幅员辽阔和日渐增长的经济实力，还有一部分是由于其文化和观点的特质。与日本不同，中国始终认为自己具有普世性，是世界的中心；即使历经千年甚至更久，仍始终认为自己实质上就是整个世界。中国现代性的出现，将令西方失去世界中心的位置，使其相对化。这也正是为什么说中国的崛起将会带来如此深远影响的原因所在。

---

1. 虽然有近两亿人将阿拉伯语作为自己的母语，但阿拉伯语却不在这前20种之列。其原因在于阿拉伯语的不同分支之间无法进行有效的交流，因此将这些分支视为单独的

语言，而非阿拉伯语的不同方言。其中，埃及阿拉伯语的使用人数最多，大约有4 600万人。

2. 毛式服，是指毛泽东同志喜爱穿着的、经过改良的灰色中山装。——译者注

第二部分
中国世纪的来临

尽管中国部分地区已经相当繁荣和发达，但是国内仍有大约一半的人口生活在农村。中国仍然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发展中国家。所以，只能认为中国的现代性仍处于积累之中。其中，一部分特征已经相当清晰，一部分特征才初见端倪，还有一部分特征尚未显现。但是有一点毋庸置疑，即中国现代性与西方现代性存在着巨大的差别。其原因不仅存在于眼前的现实当中，更多地体现在过去的历史里。中国与西方几乎没有什么相同之处，文化背景也截然不同。中国的政治、国家和道德观，都是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建构起来的，与邻国的关系亦是如此。几千年来，中国人一直认为他们构成了全世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正是这种认识和心态，形成了中国独一无二的特性。而且，与众多发展中国家不同，虽然中国的许多城市都遭受过殖民统治，但是整个国家却从未被殖民统治过。殖民统治是促使一个国家走向西方化的一种强劲手段，但是中国却从未陷入完全的殖民统治，与印度和印度支那的遭遇截然不同。中国巨大的体量，即幅员辽阔的土地和众多的人口（这一点更为重要），为中国人以专制主义和普世主义的视角来思考问题提供了必要条件。有人可能会质疑以上这些情况均属过去，但正是过去的历史塑造了现在的中国，给当下的中国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现代性并非当今时代随心所欲的产物，而是历史发展的结果。

自1949年，特别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主要精力一直集中于实现现代化之上。也正是这一点，使其加强了与西方的联系：中国需要获得美国的支持与认可以便加入当前的国际体系，中国学习并

借鉴西方经济发展的经验，中国对外国投资者和民众开放，这些都是典型的例子。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发展，她将发现自己受发展规则的限制越来越少，对自身现在的情况及本国的历史越发自信，也不再为自身的特性能否为世界接受而担忧，更加坦然地对待自身的独特性。

第5章
中国：超级经济大国

1993年8月，我第一次前往毗邻香港的广东省，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当时从深圳到广州的道路状况很差，很多地方甚至泥泞不堪。尽管我们身处农村的腹地，但路上还是充斥着各色人等和各种各样的车辆。展现在我面前的是一幅融合了各个时代特点的独特画面：妇女牵着牲口、手拿农产品走在路上；农民骑着自行车或驾驶三轮车行色匆匆；城里的新贵开着黑色的梅赛德斯和雷克萨斯汽车，隐匿在黑色的车窗玻璃后，疾驰而过；公路上还有一连串的面包车、皮卡、货车和微型客车；公路两旁的田地里，农民们正赶着水牛在小块儿稻田里犁地。这个画面好似把200年的历史在这一瞬间都浓缩到了同一个地点。这是一个正处于飞速变化中的国家，人们生活在当下，正在寻找和把握机会，好像这些机会一旦错过就永不再来。我渐渐被这源源不断的精力、创造性和意志力吸引住了。英国工业革命一定与这里的情形有几分相似：投机倒把、混乱不堪和活力四射——完全是一团乱麻。广东确实是一团糟。你目光所及都处在建设之中——似乎每件事物都在经历变化，随处可见未竣工的公路、正在修建的无数建筑工程以及正在被清理的土地。整个广东就像一个巨大的工地。

两年后，我跟着一个电视节目摄制组回到广东，希望能追寻到上次的足迹。但是当年的情形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当时的混乱不堪被如今的井井有条取代。这里有崭新的公路、桥梁、工厂、居民区和更多的小轿车，居然找不到任何有关两年前所吸引我的时代融合画面的蛛丝马迹。在此期间，我曾向几名官员寻求帮助，但当我描述了希望在镜头中重新捕捉的画面后，他们耸了耸肩，好像那些都是早已遥远

的过去。对我来说，这不过是短短两年前的情景；但对他们来说，可能已是另一个世纪的画面了。作为邓小平的心血之作，广东不仅正在成为中国的工业中心，也正在成为世界的工厂。这里工厂林立，其中不少是港资企业，其为全球市场生产出了大量的廉价商品。广东见证了中国经济变革的开端。

第一次“火山喷发”过后才不到20年，如今的广东已经翻开了新的历史篇章，它已经不再享有当年的比较优势。劳动力相对短缺，劳动力价格不断上涨，人们的期望也已发生了很大变化。2010年5~7月，广东爆发了一系列的工人罢工，最终导致了富士康（台资企业，世界上最大的电子产品代工企业，其深圳厂区的雇员达27万人）、本田和其他很多公司不得不大幅提高了工人的工资水平，这次事件就是对此最为生动的说明。相对越南或印度尼西亚的企业来说，广东的工厂已经没有多少竞争优势。仅在2007年，广东就至少有1 000家鞋厂关闭，占总量的1/6。而在2008年，广东境内关闭的玩具厂达4 000家。公司纷纷将工厂迁往生活水平较低的内陆省份。而广东正试图实现产业升级，发展服务业，摆脱依赖于当地民众和外来务工人员的低廉劳动力成本的生产模式，向依靠设计和技术的新型生产领域转型。跟广东其他的城市一样，现在的深圳和广州看起来正蓬勃发展，到处都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与其之前所呈现出的“西部大开发”景象大相径庭。深圳目前的生活水准可能还无法与香港相提并论，但两者的差别正在急速缩小。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广东已从工业革命的早期阶段发展到与西欧欠发达地区平起平坐的水平。

1976年毛泽东逝世时，谁能预料到当时的中国即将步入完全改变本国面貌和经济状况的最显著经济增长期？事实上此事无法预料，也没有人能有此先见之明，正如另一个极其重要的事件—1989年东欧发生剧变那样出人意料。当时中国在“文革”中变得四分五裂。在毛泽东逝世后，“文革”的热潮实际上已经退去并引发了广泛的质疑，但对于中国的未来该何去何从，却仍是一片迷茫。不久，“文革”中被

打倒的老干部复出，邓小平成为新的掌舵人。当时其首先面对的便是“文革”遗留下来的经济灾难和政治混乱，但好在新的领导集体可以自由地推行自己的理念与抱负。

当时有一个颇为有利的预兆。到20世纪70年代末，除了中国之外，东亚地区保持了高速的经济增长态势。东亚地区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都在蓬勃发展之中：日本一日千里，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已经实现了经济腾飞，马来西亚、泰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经济腾飞态势初现。中国大陆境外的华裔群体，主要是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地区的民众，以及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海外华人，是这次经济转型的关键人物。换句话说，中国大陆周边那些近在咫尺的榜样国家和地区，正在向其发出召唤，向其展示了未来发展的可能性。中国的东亚腹地正在被整个区域的赶超型经济变革所改变。当然，中国也面临着独特的问题，尤其是国土面积的幅员辽阔和民族的多样性，以及内战遗留下来的动乱和国土尚未统一。除了长期被孤立，导致当时情况发生的部分原因在于中国自身，部分原因在于美国的贸易禁运（美国全面禁止与中国的贸易，直到1971年才解除封锁，美国也一直拒绝承认新中国为中国的合法代表，直至1979年才与新中国建交），加之苏联于1959年停止了所有援助并撤离了所有人员。因此，中国大陆领导人面临的挑战，远远多于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尤其相对于那些在冷战期间享受了美国给予的大量保护和援助的仆从国和地区。

中国改革的进程始于1978年，当时在东南沿海（包括广东省在内）设立了一些经济特区，取消了传统的农村公社，农民获得了土地的长期使用权，并鼓励农产品进入市场。改革采取了循序渐进、逐步开展和局部实验的方法。如果改革措施有效，就会被推广到其他地区，如果失败了，就会被直接否定。这种脚踏实地的务实精神与“文革”时代和毛泽东时期盛行的宏观意识形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邓小平本着简明精炼的传统，借鉴了长久以来对中国历代统治者影响深远的儒家思想，提出了“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和“摸着石头过河”。新的经济发展方式需要党和政府转变传统的思维模式，因此，必须要从上到下地进行大规模人事调整。1978年，邓小平指出：“干革命、搞建设，都要有一批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随后，《人民日报》就政治改革发表评论说：

> 政治改革是一项庞大的社会系统工程，其中包括理顺党政之间的关系，政府和司法机构、群众团体、企业和机构之间的关系，以及中央、地方和基层组织之间的关系。它涉及数亿人的利益，是一项艰巨和长期的任务。

提起中国的改革时，人们通常认为其仅限于经济方面，仿佛很少涉及政治方面。事实上，邓小平开启的改革不仅是一场经济的变革，而且还是一次在很大程度上尚未得到认可的政治变革，给整个国家的工作方法和人事安排带来了一场全方位的改变。“文革”时期的普世主义、意识形态模式为更接近亚洲新兴国家发展模式的理念和模式所取代。政治改革的一个基本内容就是权力的下放，这被视为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增长的一个先决条件。决策制定权，包括事实上的产权和财政权，都被下放至不同层级的地方政府手中。结果，中央政府的财政预算占GDP的份额大幅缩水。

几乎从改革一开始，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就从“文革”时期的4%~5%，增长至1978~1992年的年均9.5%。然而，中间也经历了短暂的间断。对于改革应何去何从，中共党内也颇有争论。实际上，这只是一段小插曲。在1992年农历新年之际，邓小平以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宏伟气概，到中国经济改革的沿海腹地“南巡”视察，并在与香港毗邻的全新城市——深圳发表了讲话，不仅重申了市场改革极其重要，而且还吹响了前进的号角，要求必须进一步加强和加速改革的进程。邓小平还提出了著名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

裕”的观点。那时，改革进程还主要集中于南方，但现在已经开始向内陆省份扩展，而且最为关键的是，扩展至中国传统的经济重镇上海和长江三角洲地区。这一举措引发了外来投资的又一波热浪，资金主要来源于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等地区（直至今日，它们仍然是中国大陆外来投资的最大单一来源），与此同时，中国的出口——主要是对美国的出口，也迅速地增长。在邓小平关于开展市场经济的号召下，在每年两位数的增长速度的感染下，一场经济热潮开始横扫整个中国。数以千万计的农民——中国的劳动力储备大军——为了过上更好的生活，离开了农田和村庄到城市中寻找工作机会，没有什么比这更能象征“新边疆”的经济精神了。

从一开始，日本和亚洲新兴国家就对中国的经济改革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如何制定经济政策方面，邓小平思想与这些国家不谋而合，都在遵循务实和非教条主义的观点。但是，有一条是公认的，就是没有哪个国家能为中国提供一个合适的发展模式：它们当时所面临的条件——尤其考虑到中国巨大的体量和多样性——与中国简直截然不同。而且，在始于1980年左右的全球化时代，中国不可能像日本和早期的亚洲新兴国家那样，依靠关税的保护来实现产业和公司的成长，直至其具备在国际市场上竞争的能力。另外还有一个更为复杂的因素，即与亚洲新兴国家相比，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仍然受到美国一定程度的猜忌和怀疑：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花费了15年的时间，并与所有国家都签订了最为详尽的协议。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印度几乎未被附加苛刻条件，几年后便顺利入世。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中国必须开创出自己的道路。

尽管中美关系不如韩、日两国与美国的关系那样密切，但中国很清楚，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赢得美国的支持和合作是至关重要的。正如在经济改革上所遵循的务实原则一样，中国在对美态度上也采取了务实的策略。1972年的尼克松访华掀开了中美关系新的篇章，1979年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解决了财产归属，解冻了资产，同时美国

承诺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这些改变为中国后来于1986年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1982年获得关贸总协定观察国地位创造了条件。20世纪80年代，对于中国来说，美国的价值日益显现：美国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出口国；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到美国留学深造，其中包括许多政府官员的子女；中国也越来越多地受到美国资本主义模式的影响。苏联的解体令美国的影响力大增，以硅谷和互联网为代表的经济强势发展，又进一步增添了美国的强国魅力。然而20世纪90年代，针对美国的民族主义情绪不断高涨，畅销书《中国可以说“不”》的流行和抗议美国轰炸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的示威活动，充分地表达了这一倾向。尽管如此，美国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仍在持续。甚至连中国自己的经济道路和民意也都带有一定的新自由主义的特点：崇拜财富，信奉企业家，默许不平等现象的日益加剧，政府从教育和卫生等公共产品领域撤退，快速降低关税壁垒以及采取一个极为开放的贸易制度。这些都是邓小平的继任者江泽民在任期间的中心思想和工作主题。

邓小平成为国家最高领导人以后，尽管改革进程中也出现过明显的激进主义行为，但是中国领导层一直努力采取谨慎和务实的态度。他们尽量避免休克疗法和大动作。虽然借鉴了新自由主义的元素，他们却抵制华盛顿的正统经验，转而寻求一个适合本土的发展路径。他们一丝不苟地通过不断测试和反复试验，循序渐进地开展改革。尽管政府的经济职能不断缩小，政府收入在GDP中的份额从1978年的1/3的降至2005年的17% ，但沿袭由来已久的中国传统，政府在改革过程中仍一直处于核心地位。对于中国领导人来说，经济改革的目标不在于西方化，而是希望通过经济增长，最终建立起一个强大的民族和国家。政治稳定压倒一切。邓小平认为，“中国要实现自己的发展目标，必不可少的条件是安定的国内环境与和平的国际环境”。1991年苏联解体，进一步增强了邓小平的信念：经济改革至关重要，在这方面苏联明显以失败而告终；同时还要避免落入破坏稳定的政治改革的陷阱。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同样证实了中国领导人对休克疗

法的反感：中国应该十分谨慎地对待金融改革，抵制任何过早开放资本账户的行为和由此产生的人民币的浮动，因为这可能导致对货币的投机性冲击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不稳定，就像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在韩国、泰国和印度尼西亚所发生的那样，这些国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所以，人民币与美元、日元和欧元不同，仍然不可自由兑换）。

为应对日益全球化的经济所带来的挑战，深谙加快改革进程必要性的中国领导人，仍选择了休克疗法的一个重要举措。与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推行的经济战略不同，中国大陆在20世纪90年代迅速消除关税壁垒、允许外来直接投资大量流入，给国内企业造成了极其残酷的竞争环境。为了生存，中国企业不得不拼命与更富有和更先进的西方和日本的对手竞争（见图5－1）。迅速的开放，使中国经济能够利用流入的巨额外国资本，同时迫使中国公司了解并学习外部世界，但这种做法的成本较高，很多中国公司不得不艰难求生。中国的东北亚邻国曾长期享有通过保护性政策免受外部竞争的优势，其国内的公司正好利用这段时间谋求发展。相比之下，中国却没有那么幸运。面对如此激烈的竞争，中国的公司要么因无力竞争而倒闭，要么适应国际竞争规则生存下来，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时被附加的条件，使中国在帮扶本国的国有企业时步步掣肘，虽然中国也找到了各种方法对其进行扶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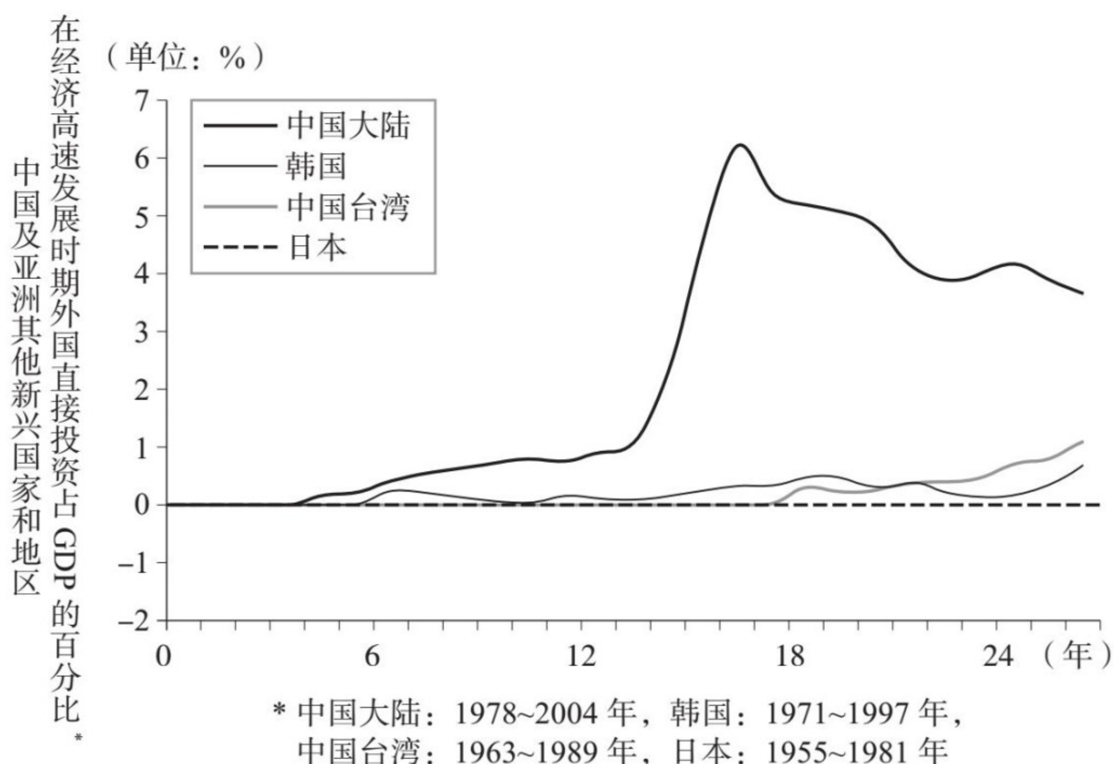


图5–1 外国直接投资在中国和亚洲其他新兴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中所起到的作用

尽管改革初期的重点主要放在刺激农业经济增长上，但是到了80年代末，改革重心已经决定性地转移到了城市和工业经济上来。实际上，在80年代，广东的经济已经成为中国未来经济形态的缩影，体现了一日千里的中国经济所具备的比较优势。香港企业家将其制造业从本地移往邻近的广东省，就是为了利用当地廉价的劳动力。于是，广东迅速成为香港的制造业基地。90年代，这一产业转移过程迅速向中国的北部和东部扩张。特别是在2001年中国极有可能加入世贸组织的背景下，西方与日本加大了对华直接投资的力度，也加速了向中国的产业转移。正如针对贸易问题所采取的开放的政策一样，中国在对待外来投资方面也采取了相似的做法。1978年以来，中国已经获得超过5 000亿美元的外来直接投资，是日本1945~2000年外来直接投资累计总和的10倍。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在经济发展最为迅猛的时候，外资占GDP的比重还不到1%，直至最近也不超过2%。而中国大陆在20世纪80

年代以后，外资占GDP的比重为4%~6%，与依靠外资的东南亚模式中的马来西亚、泰国、印尼等国十分相像。在中国大陆的某些省份，这一比重甚至更高，广东尤为显著，在1993~2003年期间，外资占广东GDP的比重高达13%。2003年，中国超越了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外来直接投资目的地国。其中为数不少的外来投资投向了外国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分支机构，其目的在于仿效港资企业的做法，利用大陆丰富的廉价劳动力，尽可能地使其产品更具竞争力。目前，外国公司的出口总量已占中国出口总量的60%，在占有重要地位的高科技产品出口中，外资公司的比例约为85%。在此过程中，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世界上迄今为止最廉价的低端或中端制造业的基地。

关税的系统性降低，导致中国经济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外贸的依存度高，相关产业约占GDP的75%，远超美国、印度、日本和巴西等其他主要经济体的30%或更少。中国经济对外贸的高度依存，在提高了中国在全球经济地位的同时，也使中国更容易受到全球经济下滑、美国经济衰退、西方日益增长的贸易保护主义情绪等外部因素的影响。

当前，中国正处于马克思在谈及英国工业革命时所描述的原始积累时期或我们所了解的经济腾飞的进程中。在这一过程中，绝大多数的劳动人口离开耕耘多年的土地来到工厂，离开贫苦的农村来到繁华的城市。1952~2003年，农业占中国GDP的比例从60%下降到16%，农业人口占就业总人数的比例从83%下降到51%。中国只花费了10年的时间（1977~1987年），就实现了人均产出翻一番，比起英国耗时58年、美国耗时47年和韩国耗时11年，确实相当神速。中国的经济平均增长率连续30年都保持在9.5%左右。尽管如此，中国至今仍有近一半的人口还在务农。据估计，甚至20年之后，也依旧会有大约20%的人口继续生活在农村。这种农村劳动力的“无限”供应造成的一个重要后果是，未来几十年内，非熟练劳动力的工资还将继续维持低位；换句话说，这个时间会远远长于曾经历过此阶段的亚洲新兴国家。这并不代表一些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例如广东省）的工资水平会继续偏低，相

反，正如我们所见，当地的工资水平已经大幅上涨。只是在较贫穷、偏远的内陆省份，工资会持续走低，这也是很多低端制造业不断转移至此的原因。中国经济自1978年以来的迅速增长，主要得益于极高的投资比例，多年来都保持在占其GDP 40%的水平，目前约为45%。在2010~2011年，为应对西方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中国采取了一揽子的刺激举措，当时的投资比例接近50%。如此之高的投资比例，可能与同样高的国内储蓄比例有关，当时的国内储蓄约占GDP的40%。再加上一些外来投资，也为中国的经济腾飞提供了主要的资金来源。2001年，中国平均每户家庭的储蓄额约为其税后收入的25.3%，相比之下，美国只有6.4%（2002年）。中国家庭创造出的巨额储蓄，与近年来一直走高的公司储蓄一道，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资金，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发挥了极为关键的作用（见图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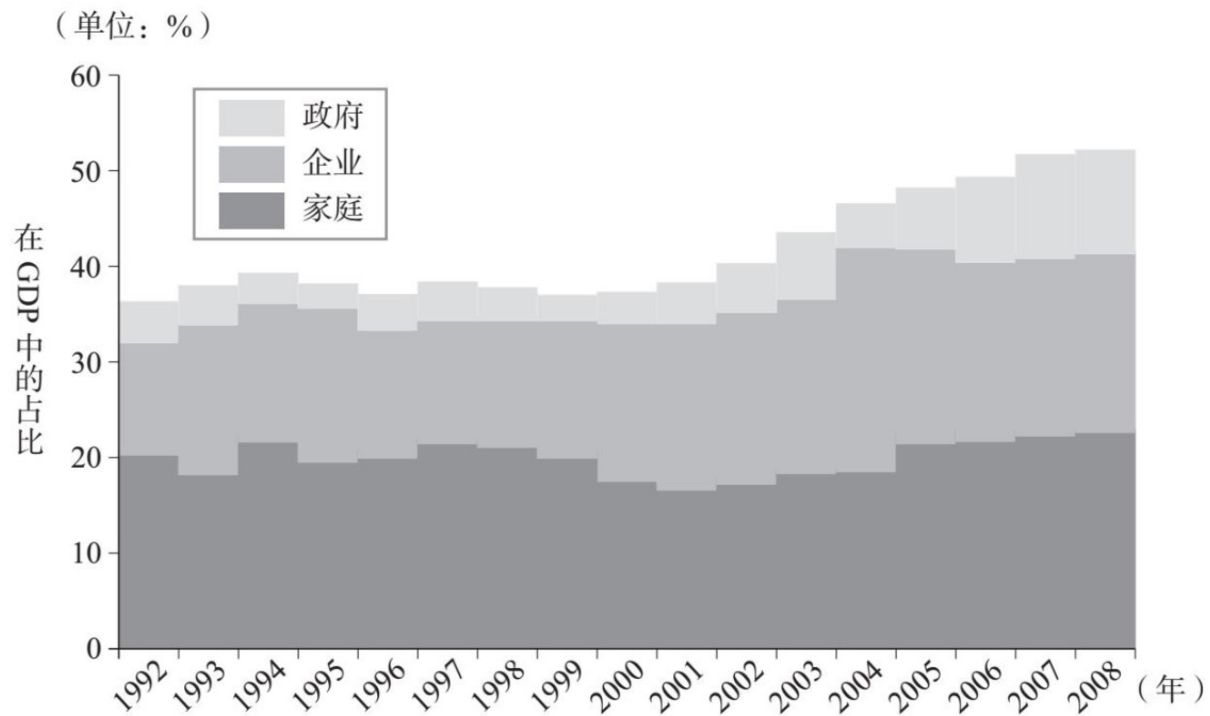


图5–2 中国的国民储蓄总额

数据来源：由马国南和王毅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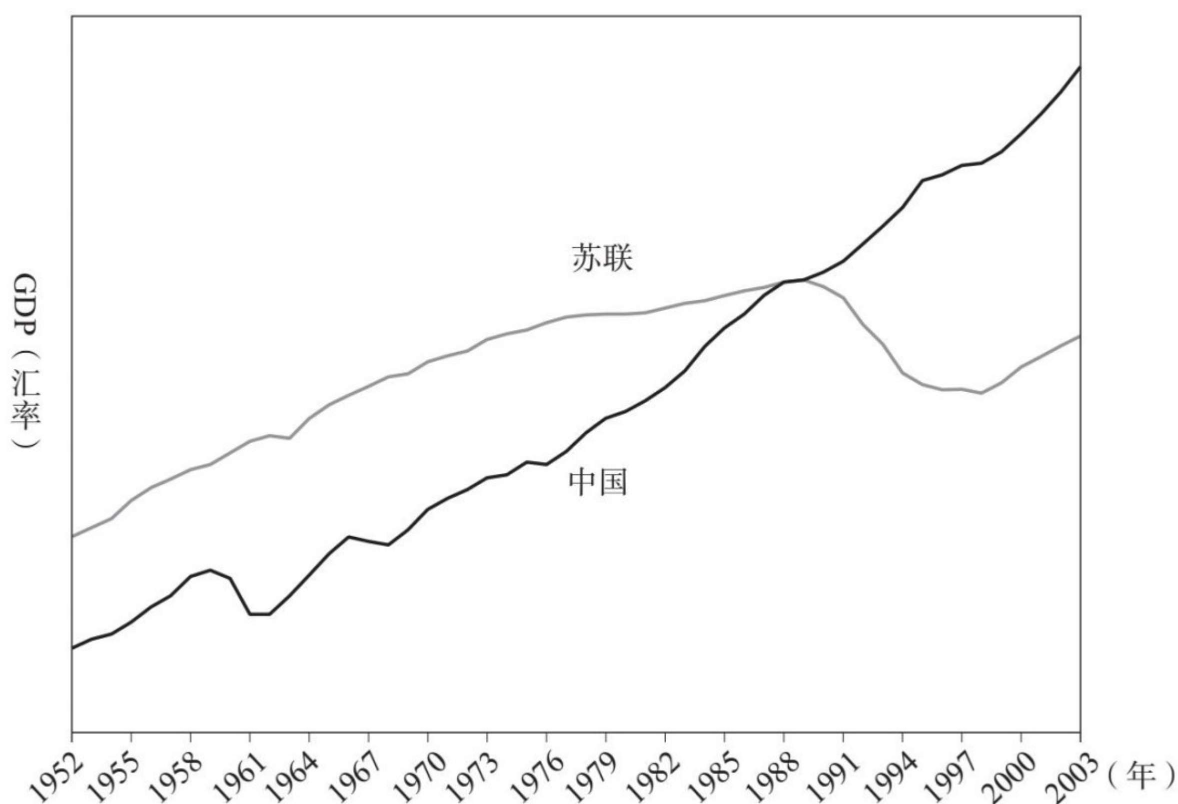


图5–3 中国和苏联经济发展对比

数据来源：由来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安格斯·麦迪逊提供

比较一下中国和苏联的经历，无疑对我们更具启发，因为两个国家都面临着如何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问题（见图5－3）。苏联主要依靠西方开出的休克疗法的处方，最终导致90年代超级通货膨胀、大规模资本外逃、货币崩溃和外债拖欠等一系列现象的发生。相比之下，中国通过一种更为循序渐进的方式，避免了超级通货膨胀的出现，政府在国际社会树立了值得信赖的形象，期间也没有发生资本外逃的情况。俄罗斯的国有资产被政府官员以低廉的价格出售给自己的亲朋好友；中国国有企业的数量虽然大幅减少，但国有资产的比例却没有太大的变化，而且均集中于少数的国企巨头的手中。根据《福布斯》2007年全球富豪排行榜的统计，在前100名的榜单中有13个是俄罗斯人，中国人却榜上无名。1990年，中国的GDP还不到俄罗斯的两倍，而到了2003年，却一跃至俄罗斯的6倍。全球衰退之前的俄罗斯经

济复兴，很大程度上是石油和天然气出口价格上涨的结果。与中国不同，俄罗斯的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本国丰富的资源。中国领导人在处理一系列困难和棘手问题时，表现出极大的耐心和卓越的能力。例如在90年代末，中国政府面临着三个极其困难的国内议题：关闭大量经营不善的国有企业；整顿存在大量呆账、坏账且资金主要借给国有企业的国有银行；提高中央政府的财政地位。10年过去后，政府已经基本上解决了这些问题，大幅改善了国有企业的负债问题，实现了银行系统的转型，改善了自身的财政状况。

鉴于其规模和速度，中国的改革开放无疑是人类历史上最引人瞩目的经济变革，甚至超过了英国工业革命。中国政府的经济战略极其精明、富有远见，并取得了非凡的成功。中国的经济实现了飞跃式增长，人均收入大幅提高，从1990年的339美元增加到2003年的1 000美元。经济发展的范围也不再局限于少数几个沿海城市，而是席卷了中国的大多数省份，尽管发展速度有所不同。在极短的时间内，中国变成了全球制造业中心。“中国制造”的字样，已经随着一系列大规模生产的消费品红遍海内外。中国生产了世界上2/3的复印机、鞋、玩具和微波炉；1/2的DVD（数字多功能光盘）播放机、数码相机和纺织品；1/3的DVD－ROM（数字视盘）光驱和台式电脑；以及1/4的手机、电视机、PDA（掌上电脑）和汽车音响。2011年，中国一跃成为世界上第一大工业国（按产量计算），打破了美国对此长达110年的垄断。中国还完成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脱贫减贫项目，贫困人口数量由1978年改革进程刚开始时的2.5亿降至1993年年底的8 000万，2001年时为2 927万，2007年时为2 600万，约占此期间全球脱贫总人数的3/4（见图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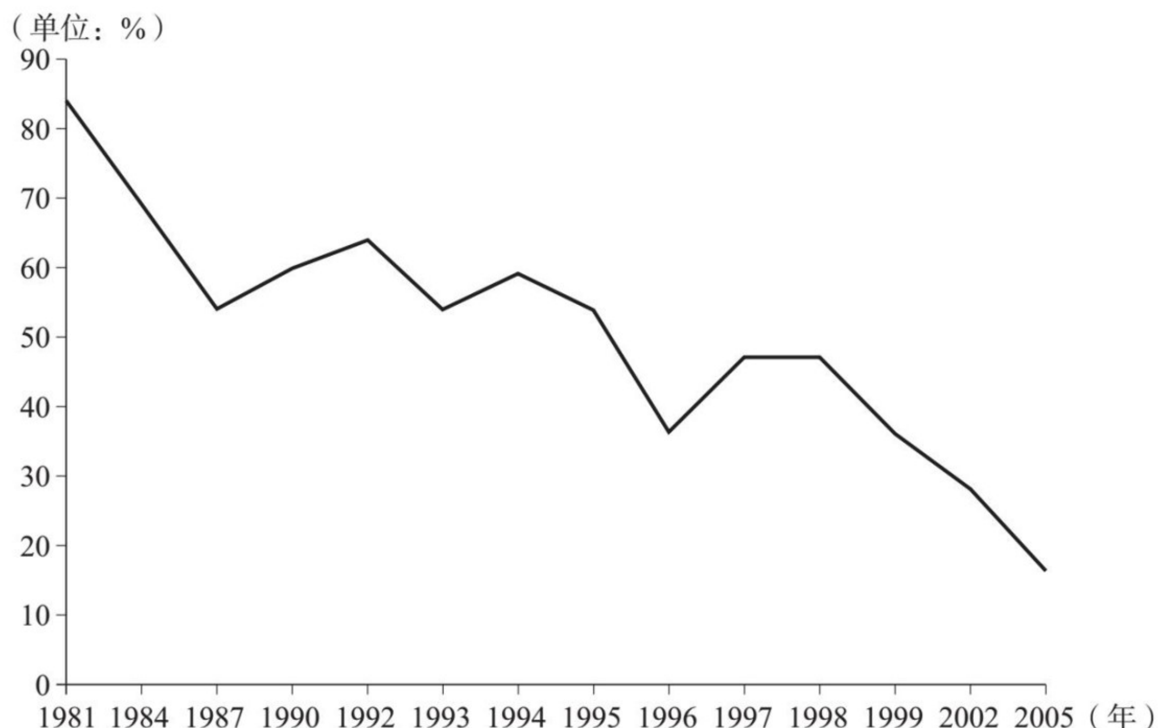


图5–4 中国每天生活费低于1.25美元（联合国赤贫线）人口所占的比例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截至2005年的最新可得数据）

尽管中国的出口仍然由外国跨国公司主导，但是一些土生土长的中国企业例如海尔、康佳、TCL、联想、华为和格兰仕在家用电器和电信等领域也都做得风生水起。世纪之交，中国政府提出了“走出去”战略。在此激励下，一些中国大型企业已开始向海外投资和建立海外子公司。虽然中国经济已取得了惊人的发展，但其转型还远未完成，仍处在转型的过程中。尽管就GDP总量而言（按市场汇率计算），中国已经于2010年8月取代了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这主要是由于人口规模所致，而并非经济成熟的结果。中国是否能够发挥其巨大的潜力，成为一个全面的超级经济大国呢？

中国如何才能实现可持续性的经济增长？

任何关于中国在未来世界中的作用（更不用说中国世纪）的讨论，都离不开一个中心，那就是中国的经济前景。保持10%左右的经济增长率，是中国政府最为重要的战略。中国每年需要为其不断扩大的城市人口创造800万个工作岗位，同时还要为寻求城镇就业的新农村移民创造1 500万个工作岗位。因此，实现快速的经济增长将仍然是政府的核心战略：尽管随着0~29岁年龄段人口的日益下降，巨大的就业压力将日趋缓解，但人们一直认为经济增长率一旦下滑并持续低于8%，将导致严重的社会动乱。但这样的增长速度还能继续保持下去吗？中国目前发展模式的短板何在？何种因素和怎样的环境将会导致其目前的战略出错？而且，还有至关重要的一点：已经令中国改变短期看法的全球缩紧的经济形势，又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从2008年西方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低迷对中国的冲击中，我们又能了解到什么？

中国经济成功的基础就在于农村的劳动力大量涌入城市，保持了低廉的劳动力成本，这使得中国对外资来说极富吸引力，同时也使中国出口的制造业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保持了较高的竞争力。这也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基本动力所在。当前的发展模式仍可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目前，中国还有近半数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因此相对贫困的农村人口还将为城市提供至少20年的价格低廉的劳动力。据估计，在未来的15年内将会有3.26亿农村人口涌入城市。然而，中国经济也正处在迅速的转型之中。当前，沿海地区特别是广东和长三角地区的劳动力成本急速上升，已无法与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或中国的内陆省份相比。尽管在过去的10年中，随着工厂大量的关闭，这一趋势已经十分明显，但2010年5~7月发生在广东的罢工潮无疑加速了这一进程。因此，富士康这一广东省最大的用工单位之一，也是苹果最大的代工商，不得不决定将其部分工厂迁往四川成都，并计划在当地招聘30万工人。至2011年已招10万工人入厂工作。与此同时，英特尔已将其上海的基地迁往了成都，一同将工厂搬往成都的还有戴尔和联想，而惠普、宏碁和华硕则搬去了重庆。不同地区的工资水平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山东和陕西的工资水平仅相当于上海的82%和76%，而日益成为电

子加工业新宠的重庆，工资水平更是仅有上海的61%。安徽、湖南和江西等省份，得益于中国完善的交通基础设施，很多中国企业纷纷在其投资，使当地很多城市的经济增长速度大幅提升。随着中国内地省份日益扮演起了广东、上海等地区此前的角色，这些经济先发展起来的地区也日渐失去了对外来务工人员的吸引力。因为随着家乡当地就业机会的日益增多，他们无须背井离乡为生活打拼。与此同时，上海、广东等地正在积极谋求产业升级，提升劳动力素质、重点发展中高技术产业。政府正通过种种方式鼓励后者的产业升级进程：颁布了新的劳动法，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鼓励旅居美国和加拿大等国的海外高层次人才回国创新创业，在高校进行扩招，加大对高等教育和研发的投资力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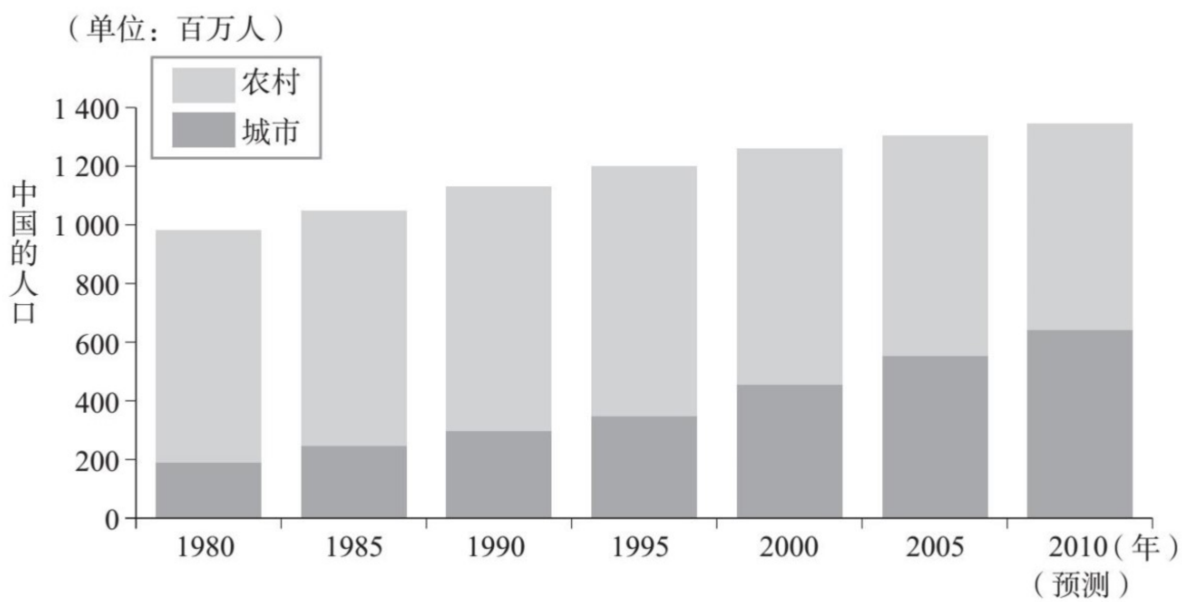


图5–5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

数据来源：中国经济数据库，龙洲经讯数据

当前，中国的经济日益复杂多样，不再仅依赖于大量的低素质劳动力和简单的生产技术。因此，经济发展的重点也在发生转变，发达地区的需求与欠发达地区的需求截然不同。除此之外，其基本的政策框架几乎没有变化，依然依赖于廉价产品的大批量出口（其中外资公

司占出口总额的一半），依靠高储蓄比例维持的高投资以及在政府调控下一直偏低的人民币汇率。在未来的10年，中国经济的重点将发生转移，以投资效率为基础的集约型发展模式将逐步代替原有的以投资总量为基础的粗放型发展模式；降低对出口的依赖、扩大内需；人民币逐步升值，稳健地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和自由兑换。在此背景下，现有的经济态势必将发生改变。

中国经济所面临的最为明显的问题一直在于对外资的依赖，至今仍是如此。这使得中国对外部环境的变化极为敏感。2007~2008年，中国遭遇了“完美风暴”，西方爆发了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为严重的金融危机，西方市场迅速萎缩，这对中国的出口造成了严重的影响。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欧洲约占中国出口市场的22%，美国约占18%，而在全世界经济衰退的今天，中国已经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依赖西方的出口市场了，这将对中国能否继续保持快速的经济增长带来极大的考验。外界普遍认为，在全球经济衰退的大背景下，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将降至8%，甚至低至6%。还有更悲观的观点认为，中国失业率将激增，社会日益动荡，甚至政治稳定也将受到影响。然而，中国经济的表现却令所有预言（包括世界银行的预测）都落空了，其经济增长率2008年为9.6%，2009年为9.1%，2010年的目标则定位略低于10%。中国之所以在恶劣的外部环境下仍取得了如此的成就，主要归功于2008年10月火速推出并于2009~2010年度实施的总额达5 800亿美元的救市举措。

中国政府试图通过拉动国内消费来弥补外需的下降，因为西方国家每年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占中国出口总量的1/3。此外，政府还积极支持大规模公共支出，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教育和卫生等领域。中国政府之所以能采取这些措施，是因为其所拥有的强大财政能力，这使得政府能够投入大量的资金用于刺激经济。比起负债累累、资金短缺、增长缓慢的西方经济和有心无力的西方政府，中国经济增长迅速、盈余不断，中国政府资金充裕，两者可谓天壤之别。此外，中国

的银行业巨头大多是国有银行或有国资背景，其资金十分充裕。在政府的命令下，这些银行以极为优惠的利率向企业提供了巨额的贷款。相比之下，西方的金融部门却濒临破产。

就算西方经济持续衰退、停滞不前，或再次面临金融危机，中国政府也还能够再次负担得起一揽子的刺激举措。实际上，如果环境需要，中国政府的实力足以进行两三次类似的救市。在西方经济严重衰退的时候，中国经济已经展示出了其强大的生存能力，这出乎所有人的意料。然而，这一揽子的刺激举措并非中国经济逆势而上的唯一原因。在2008年年末遭受金融危机的冲击后，不少东亚国家（除日本外）很快就恢复起来；而很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印度和巴西，经历短暂的调整之后，在2009年和2010年也保持了经济的强势增长。换句话说，中国经济的逆势繁荣，是中国的救市措施和其所依赖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共同作用的结果。发展中国家的份额占中国经济出口总额的一半还多。因此，在很多情况下，中国经济成功地摆脱了西方经济的干扰。然而，从长远来看，中国的经济仍存在着不确定性。如果西方的经济没有能够成功复苏，而是像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一样，在可预见的将来，甚至是10年内，仍处于或接近零增长，将会怎样？

就西方的视角而言，中国经济是否能够承受得起如此之长的不景气的外部环境？当然，这在很大程度上将依赖于此种情况所造成的政治影响，特别是美国和欧盟日趋明显的保护主义倾向。目前为止，中国政府所采取的战略是基于如下判断的结果：至少从中期来看，西方经济将恢复至危机前的增长水平，西方的出口市场也将复苏。然而，如西方经济长期萎靡这样的实质性风险也有可能发生。一旦如此，中国所能依靠的最大的外部保障就是发展中国家。经济逆势增长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将成为中国经济的外部缓冲器。

让我们再次回到中国经济面临的长远问题上来。正如前文所指出，当前中国经济的结构正在快速调整之中，尽管其基本经济战略的

绝大部分内容都没有大幅度的改变。实际上，中国所推出的、主要依赖于基础建设投资的一揽子救市方案，在某些方面，反而加剧了中国的发展过度依赖投资规模而非投资效率的问题。中国经济若想保持持续增长，就必须对若干关键问题进行战略性调整，具体包括：货币政策、投资效率、消费、财富和日益增长的不平等问题。中国政府已经开始着手处理相关问题，随着西方经济的低迷，相关问题（除环境问题外）的紧迫性日益凸显。

中国政府的一个优势在于，自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人民币就一直处于非自由流通状态。在中国经济日趋开放的情况下，人民币为其筑起了一道重要的防火墙。此外，中国政府还可以借此控制人民币与其他货币的汇率，这对于确保中国出口商品的竞争力十分重要。中国政府一直反对资本账户自由化和人民币自由浮动，尽管此举将有利于增强人民币的国际作用，提高中国的金融地位，同时为向海外投资的中国公司提供更多便利。然而问题在于，这种措施除了会限制人民币汇率的自由浮动，而且可能会使支撑起中国庞大投资水平的国内储蓄，由于储蓄者去国外投资寻求远高于国内的回报而大幅削减：这将导致中国目前所持有的投资资金减少，甚至引发经济增长率的骤然跌落。此外，人民币一旦自由浮动，如果遭遇亚洲金融危机时，韩元、泰铢和印尼盾受到投机性冲击也将会表现得极为脆弱。2000年，时任中国总理朱镕基曾有意开启资本账户自由化的过程，但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使他意识到此举可能有些轻率。尽管人民币已经逐步走上了自由化的进程，但西方国家仍一再要求中国放宽对资本账户的管制，然而当前西方金融危机再次证明了中国领导人管制资本账户的决策是明智之举。

自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就一直对中国施压，要求人民币大幅升值，以削减其对中国的巨额赤字。然而，却遭到了中国国内生产廉价、低端出口产品的企业的大力反对。这些企业深知一旦人民币升值，其产品的国际需求将受到严重影响，因此极为敏感。中国商务部

也对相关企业的举措给予了坚定的支持。另一方面，中国人民银行却一直对人民币的适当升值持积极态度，认为此举将有利于推动中国经济向高附加值产业转型。2010年7月，中国放宽了对人民币的限制，此后，在政府的控制下，人民币对美元逐步稳定升值。此举并非是迫于美国的压力，实际上，对于如何应对、化解美国的压力，中国政府可谓了然于胸。其主要原因在中国政府的战略转型，希望借此助力产业升级，提高产业的附加值，减少对出口的依赖。此外，随着中国经济和财政实力的稳步提升，关于人民币是否应在国际上发挥更大作用的战略讨论也逐步升温。官方宣布的将在2020年把上海打造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目标；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在中国开设分支机构所带来的日益增长的资本需求；人民币成为主要贸易货币将带来的财政收益，所有的一切都要求中国政府采取更为积极的举措以放松对人民币的管制。

经济增长不能仅依靠不断增加GDP中用于投资的比例，正如中国一样，因为它将耗费越来越多的国家资源，从而带来难以承受的压力。现在，中国用于投资的资源已经超过了一半。而且很大一部分投资都被浪费掉了，例如用于修建那些不必要的豪华公寓和金碧辉煌的政府办公大楼。对此，地方政府难辞其咎。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必须由投资驱动转向由消费驱动，因此必须着力提高资本效率和劳动生产率，而不是单纯地依赖投资。这也是中国产业升级能否成功实现的关键所在。实际上，随着全球危机之后玩具等低端商品出口的锐减和高科技产品出口的增加，中国已经开始了这一进程。同样，中国也需要降低对于外贸出口的依存度，否则，一旦全球经济有任何的风吹草动，中国经济就会受其影响，正如此次全球经济危机所展示的一样。然而还有一个风险，那就是如果西方经济没有能够强势复苏，大量的中国商品极有可能刺激相关国家采取相应举措，转向贸易保护主义。相对于出口，中国将更为重视内需的开发。产业结构的升级和扩大内需的举措将带动人民币进一步升值。无论全球衰退会导致何种后果，人们都有强有力的理由相信，从长远（甚至是中期）来看，当前的增长模式

将无法持续。事实上，中国的决策者及其智囊们已逐渐认识到，有必要对由邓小平开启、江泽民继承的发展模式做出重要调整。在胡锦涛的领导下，这一进程已经开始启动，即从90年代的过度的新自由主义转向建立一个符合儒家理念的“和谐社会”，强调共同致富，更加注重社会保护，减少对出口的依赖，扩大内需，同时逐步避开美国的影响，即逐渐为人所知的“去美国化”。“十二五”规划（2011~2015年）正是这一结构性转向的体现，尽管相关问题的紧迫性日益凸显，但中国经济结构性转向的最终实现无疑是任重而道远，也将更为痛苦、艰难。

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引发了一个日益严峻的问题：中国在极短的时间内，从一个高度平等的社会变成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中国的基尼系数（衡量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标）已经由1978年的0.3上升至2009年的0.47~0.5（系数越大收入分配越不平均）。造成这种不平等的原因有三：一是沿海地区和内陆省份之间日益扩大的差距，中国最富裕省份的人均GDP是最穷省份的10倍（而在巴西，这一比例是8∶1）；二是城乡之间日益扩大的差距（根据2009年的数据，城镇居民收入是农村居民收入的3.3倍）；三是正规经济和非正规经济之间日益扩大的差均。据预测，中国最富有的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约41%的财富。中国巨大的贫富差距导致民众的愤怒和不满情绪日益上升。而且很多民众认为，很多新贵的财富都是腐败而来，是通过政府官员与近来才私有化的企业主之间的非法交易获得的，因此更加剧了民众的不满。《中国日报》在2009年发表的一篇社论指出：“民众‘仇富’，仇的是那些靠非法手段攫取财富的人。这些人无疑只是一小部分”。然而，实际上中国当前的腐败问题相当严重。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案例之一，就是重庆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原重庆市司法局局长文强的贪污、涉黑案。这种针对不平等和腐败的不满情绪，甚至有可能侵蚀改革开放赖以进行的广泛共识。2010年年末，中国经济学家余永定曾指出：“富人奢华的生活方式和穷人生活水平缓慢改善之间的强烈反差激起了社会的紧张情绪，对这种现象的反弹随时可能发生。”中国政

府已经开始更加注重促进社会的公平公正，提出构建“和谐社会”，但目前为止收效甚微。

在此背景下，还存在着一个关键问题，即国家的财政能力如何根据需要的方式来发挥作用。根据经济学家胡鞍钢的观点，在改革初期，中央有意鼓励权力下放，中央财政收入也经历了一个锐减的过程，从1978年占GDP的34%，下降到1995年的6%。中央政府则发现自己日益丧失了原有的收益来源和责任。同时，国家支出占GDP的比例也急速下降：从1978年的31%下滑至1995年的约11%。到90年代中期，人们纷纷对国家能力的丧失表示出深切的关注，其中包括国家促进区域之间协调发展的能力以及扭转这一进程的决心。有人甚至担心，各省份已开始出现像独立国家那样运作的苗头，对外贸易不断增长而省际间贸易流动不断下降。因此，政府决定进行重大的税制改革，实行分税制，其中包括第一次对中央政府单独征收中央税。此前，中央政府的税收要依靠地方上缴部分比例的财税，而在这个过程中就难免存在讨价还价。中央政府还获得了征税权力，大部分收入先集中上缴至中央，然后再由中央将其中一部分重新分配给各省。不出意料，富裕省份很抵触这种做法。然而，到1999年，国家支出占GDP的比例已上升为14%，2006年更是高达22%左右。

最重要的是，国家必须有能力为其新的社会保障方案提供财政支持，以便给数以千万计的下岗工人提供培训、医疗和住房等方面的保障。而此前，这些工人的所有需求几乎都是由原先所在的国有企业来承担，包括教育、医疗和住房等。其中，教育和医疗问题特别严重，过去的近20年里，相关领域的公共投资严重不足，引发了民众的广泛忧虑和极大不满。政府非常重视这些问题，仅2008年一年，政府教育投入就增长了45%。在毛泽东时代，医疗支出几乎全部由国家负担：而现在这个数字仅为16%左右，远远低于美国约44%和西欧超过70%的水平。因此，现在很多人都看不起病。2009年4月，中国政府宣布进行大规模医疗改革，其中包括实现为90%的人提供基本医疗保险的近期目

标。尽管大多数中国人（特别是城市人口）的生活水平已经获得极大提高，但由于缺乏完善的社会保障和公共福利的支持，很多民众都缺乏安全感，因此有着强烈的储蓄意愿。

表5–1 2000年中国十大城市的人口数：实际人数与登记人数（有户籍的人数）

（单位：百万人）

		城区实际人数	城区登记人数
1	上海	13.5	11.4
2	北京	9.9	9.7
3	广州	7.6	5.7
4	武汉	6.8	7.5
5	天津	6.8	6.8
6	深圳	6.5	1.3
7	重庆	6.2	9.0
8	沈阳	4.6	4.9
9	成都	4.0	3.4
10	东莞	3.9	1.5

数据来源：2000年人口普查

户口登记制度极有可能成为下一步改革的重要内容。中国现有的户籍制度始于1950年。根据现行制度，每个人在出生之后都将在其父母的户籍所在地进行登记，并被明确划分为农业户口或非农业户口，享有也只能享有当地相应的医疗、教育和福利保障等社会保障。其结果就是，如果农民工离开自己户籍所在的城镇或乡村前往城市谋生，将无法享受当地的教育和医疗服务。这成为农民工将自己的家庭带进城市的重要障碍（虽然很多人也将家庭一起带进了城），也导致农民工及其家庭在城市中被视为“二等公民”，产生了实际上的不平等。

仅北京一地，在2007~2009年出生的46万儿童中，就有一半的儿童无法在本地接受教育。当前，对户籍制度进行改革的呼声很高，其中也不乏来自广东省等省份的声音。随着众多企业将工厂内迁，广东发现其对外来务工人员的吸引力不断下降：实际上，广东的一些企业主已经开始偷偷雇用越南的非法务工人员。据估计，仅广东省的劳工缺口就高达200万。2010年的罢工潮实际就是外来务工人员对于捍卫自身权利进行的一次尝试。2010年2月，事态出现了不同寻常的进展，中国各地的13家报纸共同在头版发表社论，敦促废除户籍制度。根据政府统计数字，目前大约有1.53亿农村人进城务工，这也意味着要实现这些人的完整社会权利，政府需要花费巨资。

最后，中国实行的是程度极高的资源密集型经济增长方式，需要耗费土地、森林、水和石油等几乎一切资源。这也是中国最深层的问题之一。在自然资源一直不甚丰富的情况下，中国却要养活幅员辽阔的土地上生存的泱泱民众。唯一例外的是稀土，中国的稀土产量占世界的96%，而稀土是生产从手机到荧光灯，再到混合动力汽车的重要原材料，目前交易价格不断攀升。中国只拥有世界耕地的8%，却必须养活世界人口的22%；与之形成鲜明的对照的是美国，其人口不到中国的1/3，但耕地面积却是中国的3倍多，而且美国农民耕作的时间只有中国的1/10。此外，中国的发展正在迅速耗尽其有限的资源。在过去的40年中，几乎一半的森林遭到破坏，致使中国现在成为森林覆盖率最低的国家之一。1993年，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成为石油净进口国，现在中国近一半的石油需求都依靠进口来满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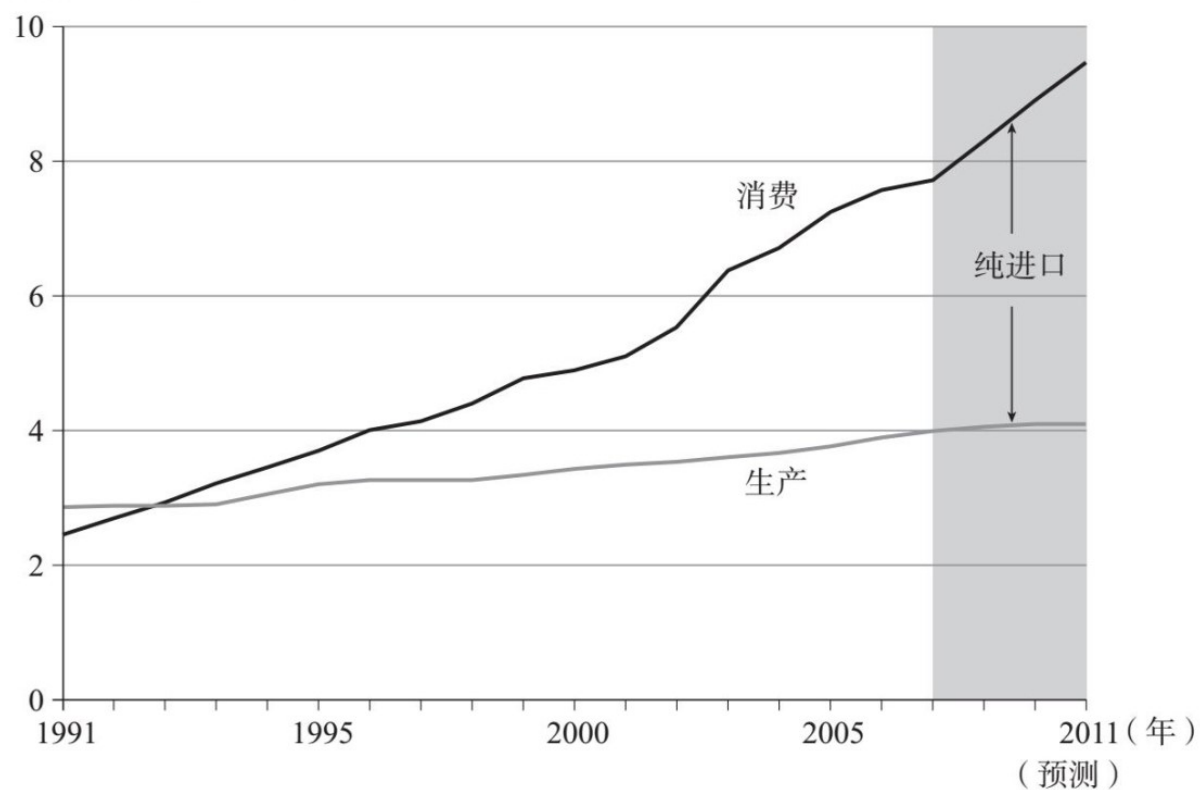


图5–6 中国的石油生产与消费

数据来源：美国能源信息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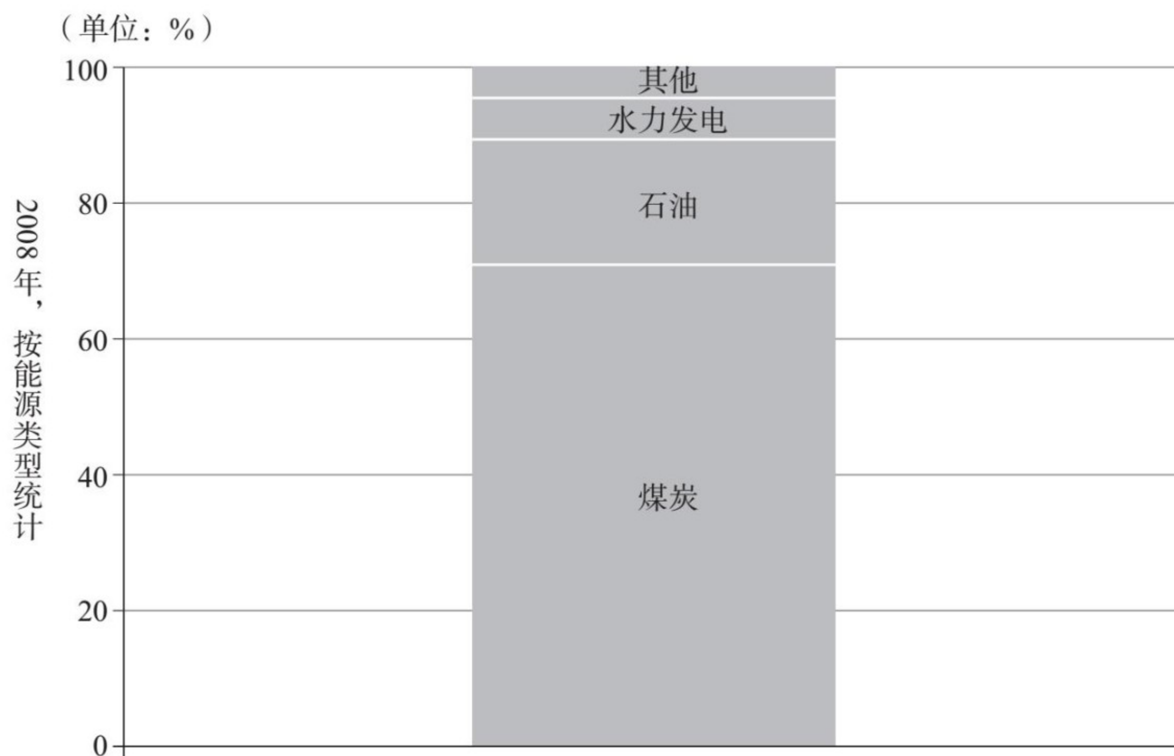


图5–7 中国的能源消费

数据来源：美国能源信息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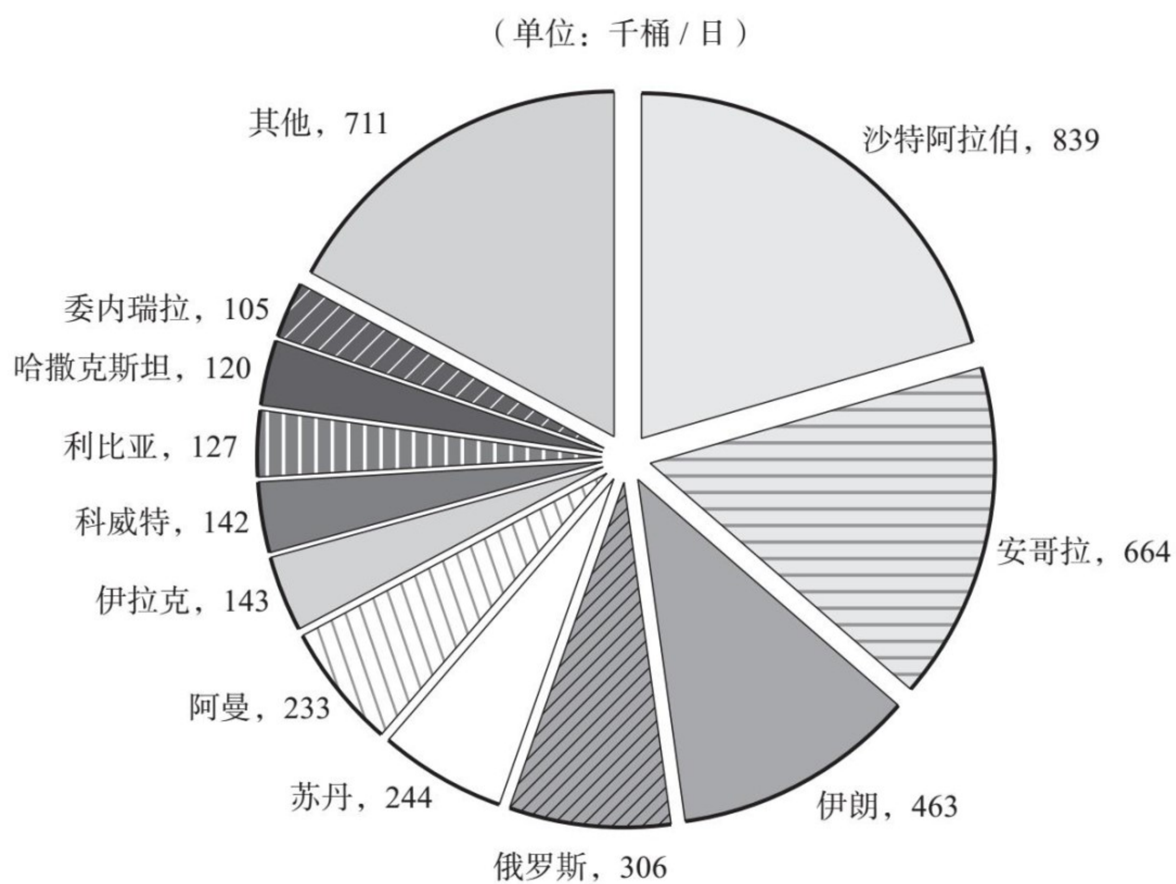


图5–8 2009年中国的原油进口分布

数据来源：费氏全球能源咨询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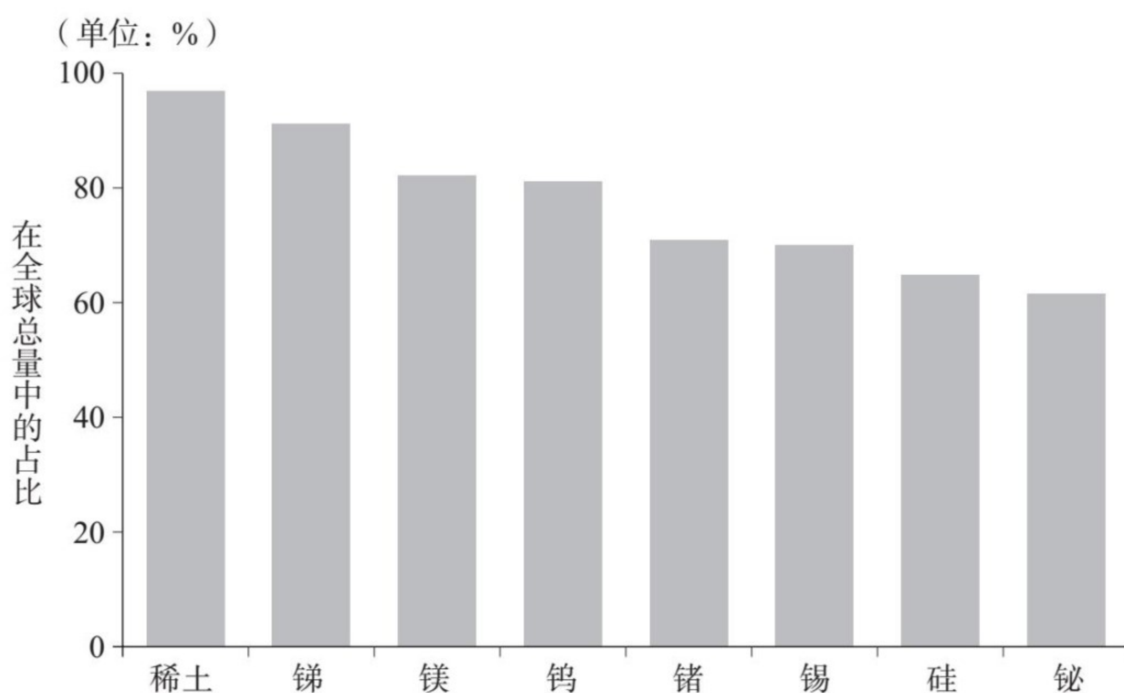


图5–9 中国主要的金属和矿石的产量占全球总量的比重

数据来源：万思迪研究公司

因此，为了获得经济增长所需的大量原材料，中国正变得越来越依赖世界其他地区。中国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铜进口国、第二大铁矿石进口国和第三大的铝进口国。中国消费了将近全世界1/3的煤炭、钢铁和棉花，以及近1/2的水泥。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能源消费国，其中煤炭占近70%。2005年，中国消耗的煤炭超过了美国、印度和俄罗斯的总和。2004年，中国石油需求增加量占整个世界石油需求增加总量的约40%。如果中国经济继续以8%左右的年增长率递增，2031年，其人均收入将达到美国目前的水平，那时中国所需消耗的粮食相当于当前世界粮食产量的2/3，纸张的消费量更是相当于目前世界产量的两倍。如果其人均汽车拥有量达到与今天的美国同样的水平，它将拥有11亿辆汽车，而目前全球汽车总数也不过8亿；届时，它将每天消耗9 900万桶石油，这与2006年每天8 400桶的全球石油总产量形成强烈的对比。毫无疑问，从世界现有的资源来看，这种

需求是难以持续下去的，更不用提它可能对全球环境产生的可怕影响了。直至不久之前，资源密集型发展政策仍是中国经济战略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对于这样的政策，中国肯定无法坚持下去。出于种种原因，中国别无选择，只能寻求一条新的发展路径。正如我们稍后将会看到的，中国已经开始了这一探索。

人口老化

中国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庞大且老龄化程度相对较低的人口。2010年，中国的劳动适龄人口（15~64岁）占总人口的比例为71.9%，这也是近30年来劳动适龄人口稳步增长的最高点。中国劳动人口的规模和相对年轻化为其提供了丰富的廉价劳动力，这也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在中国南部的大型制造业中心，其所雇用的几乎是清一色的年轻人——那些愿意、渴望离开自己的村庄，作为外来务工人员到工厂去打拼的年轻人（也包括年轻的女孩子）。而对于那些年过四旬的中年人来说，故土就比较难离了。据统计，在中国的农村人口中，16~30岁这一年龄段的人口，有24%选择了外出打工，而在40岁的年龄段，这一比例只有11%。

然而，这一年轻的景象现在已经开始改变：实际上，中国人口总体而言仍相对年轻，平均年龄只有30岁左右，但却在迅速老化。至2050年，中国人口的平均年龄将增至45岁。在未来的几十年内，依赖于劳动人口的老年人的比例将由现在的10%升至2050年的40%。大约从2030年开始，中国老龄人口的总数就将超过儿童，这与总体而言儿童人口仍将超过老龄人口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形成了鲜明对比。中国老龄化的趋势已经相当明显。中国60岁以上人口的比例已经由2000年的10.4%升至2011年的13.3%；而同期16岁以下人口的比例则由20%降至16.6%。上海是中国大陆老龄化最为严重的城市，其60岁以上的人口比例为19%，2030年将达到32%。从现在起至2015年，中国劳动适龄人口

的比例仍可保持缓慢增长，将由2010年的9.77亿增至2015年的9.93亿。但在未来10年，15~24岁年龄段的劳动适龄人口的比例则将下降约30%。而2008年女性已占劳动适龄人口比例的44.65%这一事实，则说明通过鼓励女性就业增加适龄劳动人口数量的空间十分有限。中国老龄化的态势与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等东亚国家和地区的情况十分相似。然而，上述国家和地区在出现老龄化问题之前经济就已经相当发达，而中国在面临这一问题时却仍处于经济发展的进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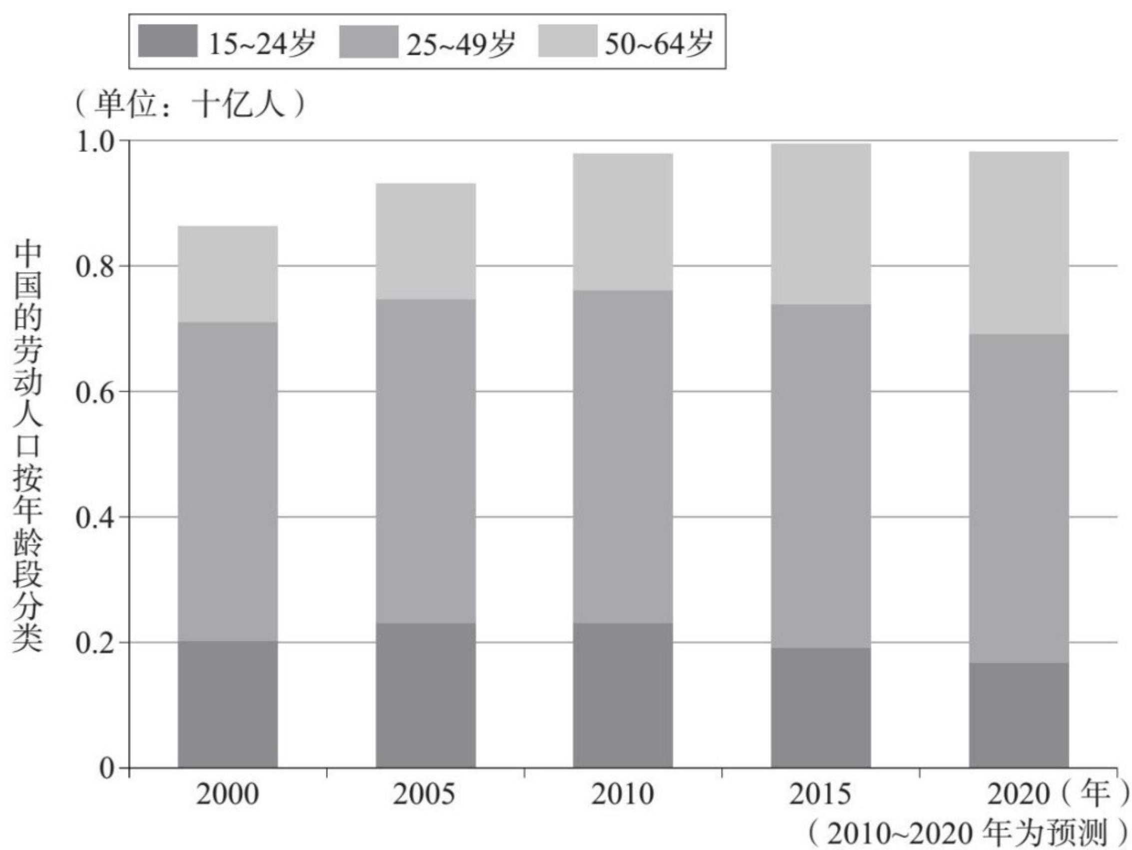


图5–10 日渐老龄化的中国人口

数据来源：美国人口普查局；龙洲经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鉴于其发展速度，中国人口的老龄化将会产生深远的影响。中国将无法再享受劳动人口数量的红利，而劳动力的成本也将不断攀升。

实际上，广东已经出现了外来务工人员的用工荒，在2010年夏天的罢工潮中，这也成为工人最终取得胜利的筹码之一。不断上涨的劳动力成本将降低中国作为低端产品生产中心的竞争力，虽然相关产业向内陆地区的转移在中短期内仍可以缓解这一问题。但与此同时，劳动力成本的上涨也将倒逼中国经济向资金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发展。中国也不得不去应对老龄人口不断上升的难题，这些老年人不但无法继续从事劳动，相反还将依赖一部分劳动人口去照顾。相关问题的社会、文化乃至经济影响都是巨大的。中国的年轻人除了在父母的帮助下要抚养孩子长大外，还必须要照顾自己的双亲：这就意味着在当前计划生育的背景下，中国的家庭通常会呈现4位老人+2个年轻人+1个孩子的结构。随着老龄人口的增加，情况将会变得越发困难，极有可能出现1个孩子不得不照顾双亲和4位祖父母和外祖父母的情况。当前，中国的养老院仍相对较少，养老金制度也仍不健全：目前只有31%的劳动人口能够享受到公共养老金和公共医疗服务，且大都集中在国有部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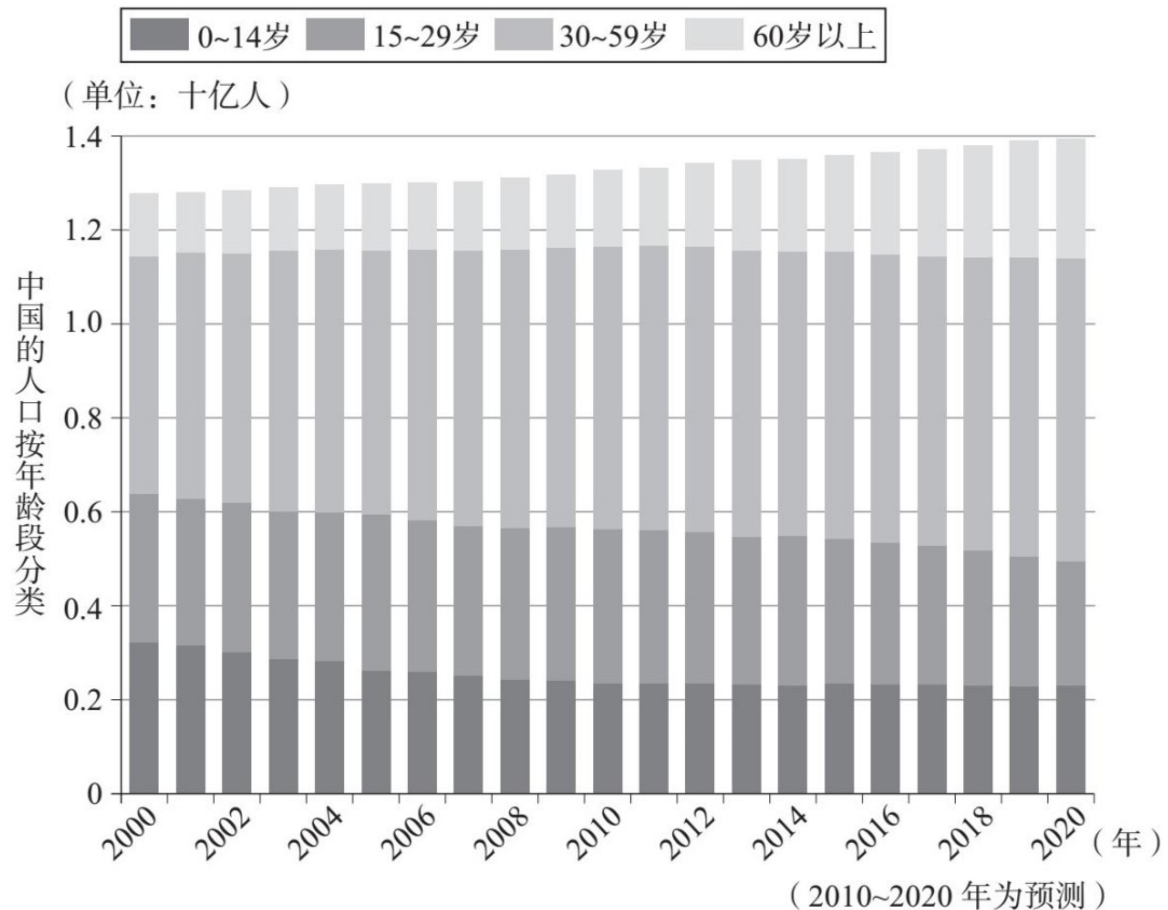


图5–11 年轻人口日益短缺

数据来源：美国人口普查局

当然，对于中国政府来说，缓解老龄化进程有一种显而易见的办法，即对现有的计划生育政策进行改革。现有的计划生育政策是在邓小平掌权之后于1980年推出的。从其名字中我们就不难猜出政策的主要内容。实际上，农村地区一般可以生两个孩子，而少数民族甚至可以更多。最近，中国政府已经对政策进行了进一步的改革，例如，如果父母双方都是独生子女，就可以生育二胎。地方政府在处理计划生育问题上已经被赋予了更大的权限，而近期所采取的一系列举措也证明了计划生育政策体系有所松动。毫无疑问，中国政府迟早将被迫采取改革举措以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造成人口老龄化的根本原因有两个：一是生育率低，低于人口替代率2.1%的水平（目前中国的生育

率在1.7%左右）；二是预期寿命高，仅从1990年至2008年，中国人口的预期寿命就增长了5.1岁，达到了73.1岁。很明显，如果中国能够找到提高生育率的办法，那么老龄化的进程就会推迟，或至少可以大幅缓解。但即便对现有的计划生育政策进行大幅调整，甚至废除，生育率能否大幅提高，仍是个未知数。就其他东亚国家和很多西方国家经验来看，城市人口，特别是城市的女性，已经越发习惯以事业为重并选择不同于以往的生活方式，养育孩子的意愿越发减弱。就中长期来看，中国人口的老龄化将会构成严峻的挑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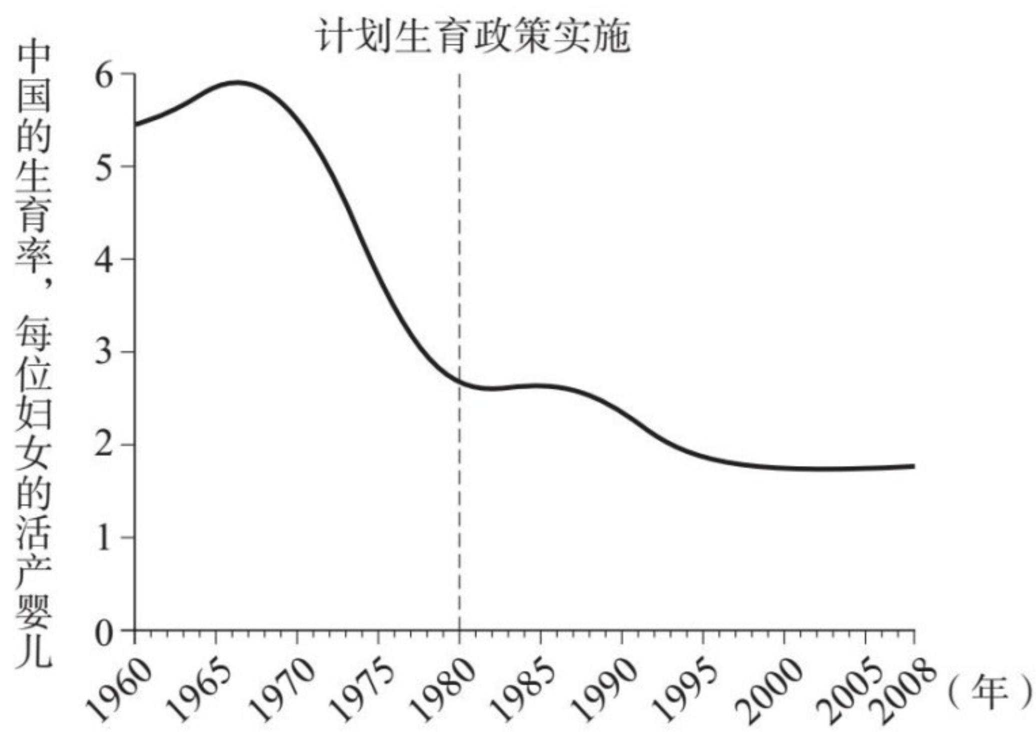


图5–12 不断降低的生育率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环境的两难困境

通过全球市场，世界各地当前都在经受中国的巨大矛盾——即人力资源的极其丰富和自然资源的极其稀缺——所带来的影响。劳动力过剩，意味着在制成品价格大幅下降的同时，中国所需原料产品的价格在全球经济衰退之前却在急剧上升。这些现象结合在一起，构成了所谓的中国时代的全球范式。到目前为止，从中国经济增长中获益最多的是消费品实际价格不断下降的发达国家，以及那些以生产初级产品为主的国家。全球经济衰退一开始导致大宗商品的价格急剧下滑，但在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大国，特别是经济逆势增长的广大发展中国家需求的驱动下，随即又有所反弹。国际能源机构预测，世界经济形势一旦恢复，石油价格就将重新反弹至每桶100美元以上，2030年时更会增长为每桶200美元。实际上，在2011年初，国际原油的价格就已经远超每桶100美元。大宗商品价格的重新上涨将会使当前中国资源密集型发展模式的成本不断增长，最终必定无比高昂。因此，从长远来看，中国不可能一直沿袭美国的资源密集型发展模式；而且，就算中国遵照这样的发展模式，其生活标准想要达到美国现在的标准，也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实际上，很明显中国已经决定走一条能源密集度较小的增长路径。

但是，中国将会发现改变方向极其困难。千百年来，中国对自然资源一直在进行高度开发。由于人口众多，与大多数国家相比，中国的人均自然资源尤其耕地面积和水资源都是极度贫乏的，比如，中国的人均占水量只有美国的1/5。此外，尽管中国南方相对湿润，但养育了全国近一半人口的北方地区，却是一片广袤的干旱地带，如今正面临着沙漠化的危险。从明朝的大运河到目前的三峡大坝，中国政府长期以来都秉持一种观点，即认为环境是可被人类改造并服从于人类目的的。政府和民众的环境意识仍比较缺乏，尽管现在这一情况正在迅速改变，特别是在城市里，政府和民众的环保意识正在不断增强。在北京，政府和民众千方百计地试图改善空气质量，就是环保意识增强的力证。而且，往往一个社会越贫穷，出于种种原因就越是优先重视物质的变化，为实现这一目的，甚至不惜牺牲几乎所有其他因素，其

中包括环境。富裕的社会确实比贫穷的社会更容易优先考虑环境，而中国仍然是一个相对贫穷的社会。到2015年，中国的发展程度仅相当于大多数西方国家在1960年的水平。西方发达国家之所以能够积累起巨大的财富，不仅是依靠本国或殖民地的自然资源，而且是可以不受环境限制约束、为所欲为地发展的结果。用欧洲人的话来形容，中国凭借与其相似的资源密集型发展战略，仅用了30多年的时间，就从18世纪一路狂奔到21世纪，在这一过程中，环境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绝不只是跑跑龙套而已。其结果就是，两个世纪的巨大生态赤字都被压缩到短短这几十年中：日益严重的水资源短缺，超过3/4的河流无法为人们提供饮用水或可供捕鱼，3亿人缺乏干净的饮用水；疯狂的森林砍伐；世界20个污染最严重城市中有16个在中国；整个国家1/3的土地都受到酸雨的影响；1/4的土地都已荒漠化；58%的土地被划分为干旱或半干旱地区。

然而，尽管中国仍然很穷，但在它有朝一日跻身富国行列之前，它必须解决两个重要的环境问题。不管是否愿意，首先，迫于成本压力，它将不得不转向资源密集程度更低的技术。随着石油价格的急剧飙升（至少从中期来看如此），以及对进口石油的依存度已经达到60%，中国已开始设法控制其石油消费量，例如，对“油老虎”（耗油量极大的汽车）课以重税，并鼓励替代性汽车技术（如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在中国环保最为出色的城市——上海，私家车的牌照费已达36 231元。中国经济学家余永定确信中国政府将采取行动：“10亿中国人都开着高耗能的运动型多功能汽车，这顶多只是一个幻想。相信我，中国没有那么愚蠢。中国必须也必将减少对石油进口的依赖。”其次，另一个不可抵制的环境挑战是全球的气候变化。正如全球气候变暖问题已经迫使其他国家寻求新的发展方式一样，中国也不得不设法控制其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与印度一样，中国一直不太接受其应该与发达国家承担同样的环保责任的观点，理由是后者将温室气体排入大气层的时间更长，因此对全球变暖负有更大的责任，这种想法是可以理解的。在过去的40年里，中国对气候变化所造成的影响只相当与

美国的1/6。而在过去的20年中，中国对气候变化所造成的影响，则不到美国的一半，与欧盟大体相当。另外，中国能源消费的大户，并不是需求极少的国内消费者，而是出口贸易。实际上，40%的中国能源都用于生产出口到西方市场的产品上：换言之，西方国家实际上将本国的部分温室气体排放量出口到了中国。发展中国家对全球变暖所做的“历史贡献”微乎其微，这在给予它们免责条款的《京都议定书》中已经是公认的，但美国和澳大利亚拒绝签字，使协议基本上处于无效的状态。

然而随着2007年中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尽管其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将仍然是美国的1/7），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国家也不大可能继续排除在未来的任何协议之外了。尤其是全球变暖对中国的影响日益严重：荒漠化的加速、农业产量的减少、降雨类型的改变、发生风暴和干旱的概率的增加以及极端天气的频发（如2008年中国中部的雪灾和2010年中国西南地区遭遇的百年不遇的大旱）等。在中国，能源利用通常给环境造成非常严重的不利影响，因为它主要依靠燃煤（煤炭在能源消耗中的比例，中国为60%，相比之下美国是23%，法国仅为5%）。比起石油和天然气，煤炭会产生更多的碳排放。尽管中国领导人一直拒绝将中国置于国际碳排放目标的限制之下，但却已经接受了关于全球气候变暖的科学论据，无论是从其公开言论还是日益增加的新环境法规中，都体现出他们对这个问题的高度重视。实际上，在可再生能源、清洁生产、环境影响评价和污染控制等方面，中国已经出台了一些世界上最先进的法律。目前为止，中国政府仍然将快速的经济增长作为优先考虑的对象，坚决抵制由于环境因素而贬损经济增长重要性的想法，但是，在中国最高领导层中，环境问题的紧迫性已成为一种共识。颇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胡鞍钢指出，中国迫切需要一种绿色发展战略，而不是依赖陈旧过时的资源密集型模式。胡鞍钢一直呼吁进行环境保护，并主张为此将经济增长率控制在8.5%以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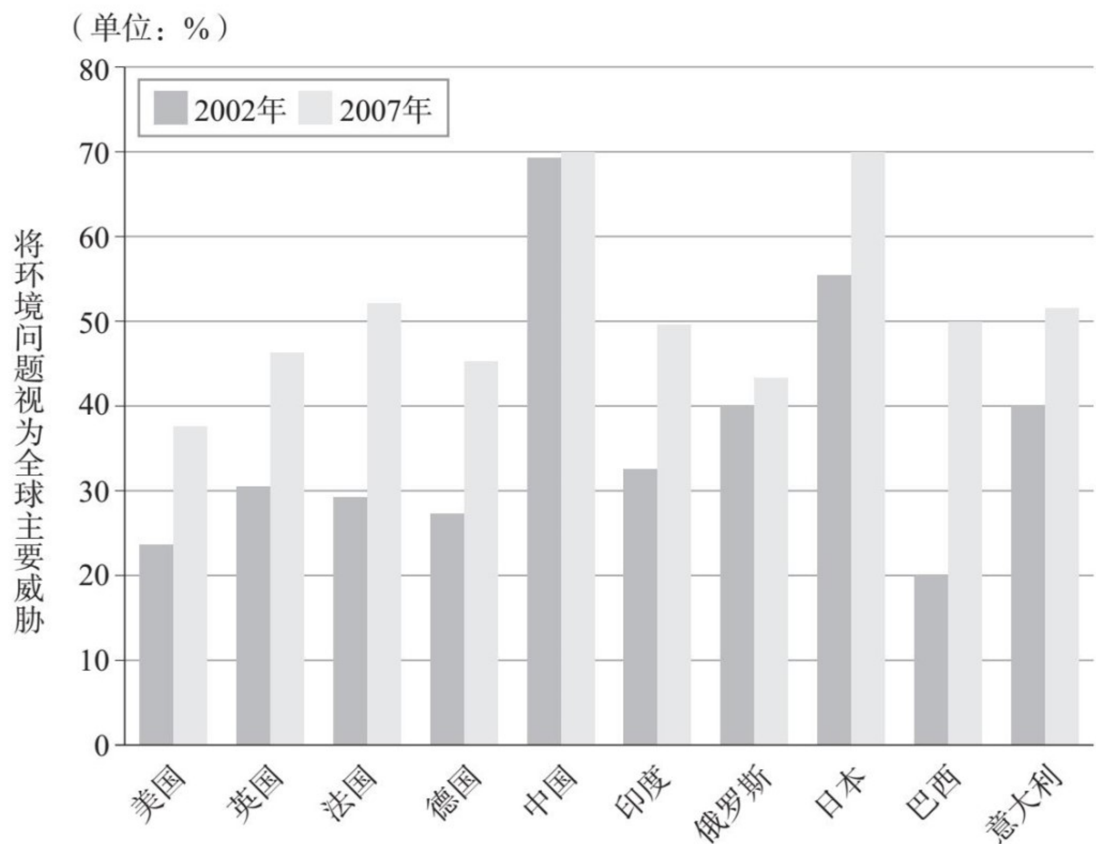


图5–13 对环境问题日益增长的关切

数据来源：皮尤国际态度项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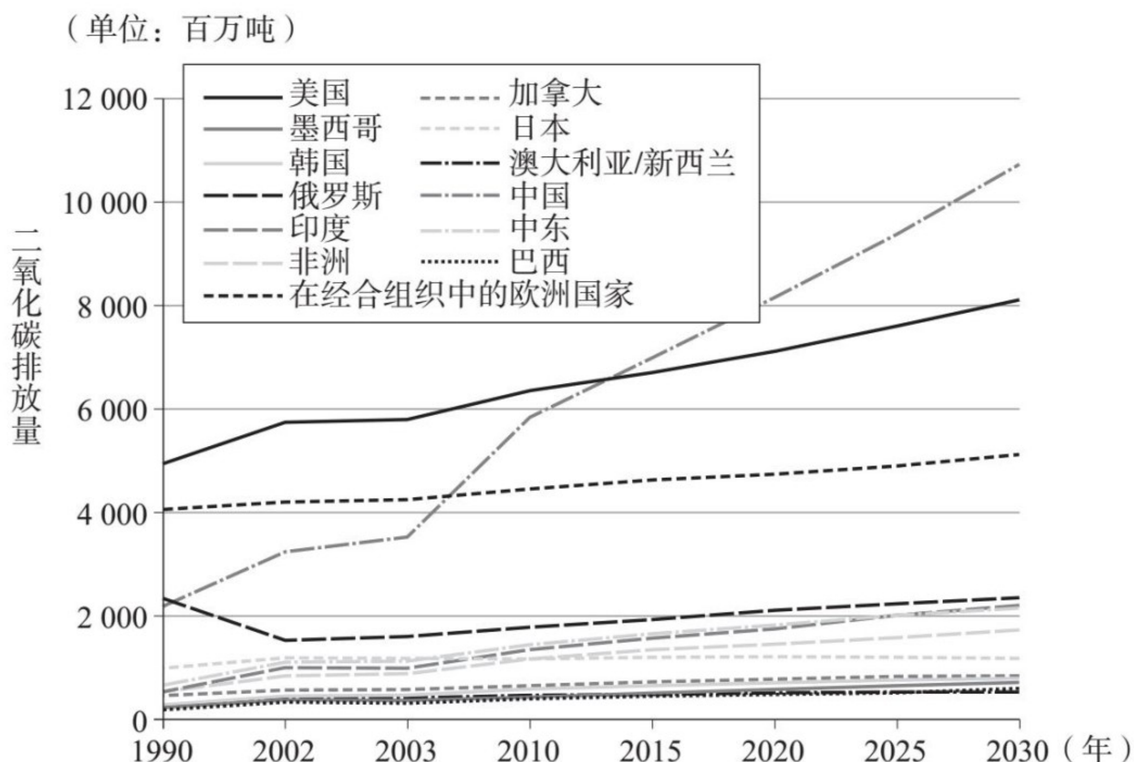


图5–14 世界主要国家的二氧化碳排放量（1999~2030年)

数据来源：美国能源信息署2007年数据

2009年12月在哥本哈根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象征着关于气候变化的辩论进入到关键阶段。在峰会之前，中国的最终承诺是到2010年，中国单位GDP的能源消耗量将比2005年下降20%；到2020年，中国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将比2005年下降40%~45%。此次会议最终被证明是一次变化莫测，充满了矛盾和冲突的会议，中国、欧盟和美国的目标各不相同。中国、印度、巴西和南非四国（也就是此后所谓的金砖国家）结成了紧密的同盟。中国还与77国集团的发展中国家联合起来，尽管其与77国集团内的岛屿国家存在着严重的分歧。这也说明了发展中国家也不再是人们设想中的铁板一块。在世界近代史上，首次出现了国际会议并非由美国或欧洲主导的局面。实际上，在会议的最后阶段，欧洲甚至都算不上一个重要的角色。最终协议的起草国是以中国为首的金砖国家，美国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在希望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和印度的强烈反对下，此次会议

并未达成任何禁制性的国际目标。发展中国家甚至声称任何禁制性目标都是对国家主权的侵犯。会议只是达成协议，通过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将全球变暖的上升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之内。

与此同时，中国付出巨大努力开发可再生能源。中国的目标是到2020年，将可再生能源发电量比例提升至15%，2050年提升至1/3。实际上，中国已经是最大的太阳能电池板生产国，其中95%出口到国外，无锡尚德更是世界上最大的太阳能电池板生产商。2009年，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风力涡轮机生产国。与此同时，中国也在下大力气发展电力汽车。中国政府为生产商和消费者提供了极为优惠的政策支持，因此到2015年，电力汽车占中国汽车产量中的比例极有可能达到一半。比亚迪公司可谓是新能源汽车的领导者，其制定了雄心勃勃的新能源汽车生产计划，其中相当一部分面向出口市场。电动自行车和电动滑板车的快速增长可以让我们对未来的发展略知一二：10年之前，中国电动车的年产量只有几千辆，2009年则已经达到了2 200万辆，普通自行车电动改装装置的年销售量也已经达到了几百万套。电动自行车和其他电动代步工具已经遍及中国城市的大街小巷，中国几乎在一夜之间就成了相关产业的全球领导者。中国也采取了极为大刀阔斧的举措减少汽车尾气的排放。2008年，中国将1.0升以下的家庭乘用车购置税降至1%，同时将4.0升以上的大排量的轿车、中巴车和SUV（运动型多用途汽车）的购置税提高至40%。中国的燃油效率管理条例也远比美国严格。中国还加大对于公共交通设施的投入力度，在那些大城市，地铁和高速公路网络迅速扩展。

中国已经明确表示希望成为新兴低碳科技（从太阳能、风力涡轮机、氢气到水电和电池技术）的全球领导者。鉴于中国市场的巨大规模，中国所发展的任何清洁和可再生能源技术，一旦投入应用，必将成为新的全球标准。中国已经向包括很多发达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地出口了大量的可再生能源设备。到目前为止，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主

要的可再生能源设备生产国，而即便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其产品的价格也负担得起。

就中长期来看，中国是否会减少其碳排放量，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对此，中国政府必将认真对待，对其重要性也了然于胸。然而，中国政府至今仍致力于经济的快速增长，这无疑与减排的目标相冲突。在未来的相当一段时间里，尽管对可再生能源的投资将大幅增长，但中国的电力供应仍将严重依赖于煤炭。此外，快速的城镇化进程（目前以年均1%的速度增长）意味着在未来的30年内将有4.5亿民众在城市定居（这一数字相当于美国人口的1.5倍），无疑将加大排放总量。

低科技还是高科技？

目前，中国的相对优势在于低端制造业，即能够利用庞大而廉价的非熟练劳动力，以世界市场上最低的价格（又称“中国价格”，这一称谓已作为新的全球标准而路人皆知）为世界市场提供大量的廉价商品。从长远来看，这种状况本身存在两个问题。首先，从产品推向市场需要总费用的角度来看，制造业费用占比是非常小的，大约为最终价格的15%，大部分费用都被设计、营销、品牌等主要在发达世界进行的环节剥夺去了。例如，尽管苹果手机最终是在中国组装的（因此，其总产值在美国对华贸易赤字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在中国进行的组装环节的附加值只占最后出厂成本的3.6%。其次，大多数中国出口产品都是由西方和日本的跨国公司生产的，中国制造商主要充当分包商。换句话说，中国基本上只是在西方跨国公司的多元化全球业务中扮演低端制造业分包商的角色。

然而，大量证据表明，中国正在不断地提升自己在全球技术链中的位置。正如所有的后发国家一样，它不得不在探索中前行，并从中

开辟出属于自己的独特道路。为获得新技术，中国综合运用模仿、购买以及吸引合资企业中的外国合作伙伴转让技术，以换取进入中国这个巨大市场筹码的策略。实践证明，中国的市场诱惑是一个强有力的交易筹码，尤其是面对普通跨国公司的时候，现在越来越多的一流跨国公司也对此越发感兴趣。中国已经在许多重要的技术领域超越了很多东南亚国家，它与外国跨国公司讨价还价的能力，是取得这些进步的主要因素。即使是宝腾——马来西亚国有汽车公司，也无法说服其若干外国合作伙伴（尤其是三菱）转让关键技术，不管怎样，中国汽车企业在这方面做得成功得多。实际上，技术转让成了合资的基本要求。此外，随着中国实力的日益增强，技术转让的需求也变得越发坚决。尽管外国公司不免会有怨言，但通常都会让步。对绝大多数跨国企业来说，中国市场这块蛋糕实在是太大、太重要了，它们难以承受被排除在外之痛。中国通往科技高山之巅，还有另一条路线。当外国跨国公司将其制造业务转移到中国时，出于方便、能够利用规模经济以及拥有众多高度熟练的廉价劳动力等原因，该行业其他的相关业务也表现出强烈的追随倾向。例如，意大利的纺织行业是逐步迁移到中国的，首先是制造业，随后是其更增值的领域（比如设计业）。微软、摩托罗拉和诺基亚都在北京建立了主要研发中心，而朗讯科技公司也已经在南京采取了同样的行动，目前，中国境内已经有1 200余家外资研发中心，其中很多都是全球研发中心。其结果是，在跨国公司的研发活动中，中国的专业人士正成为越来越重要的成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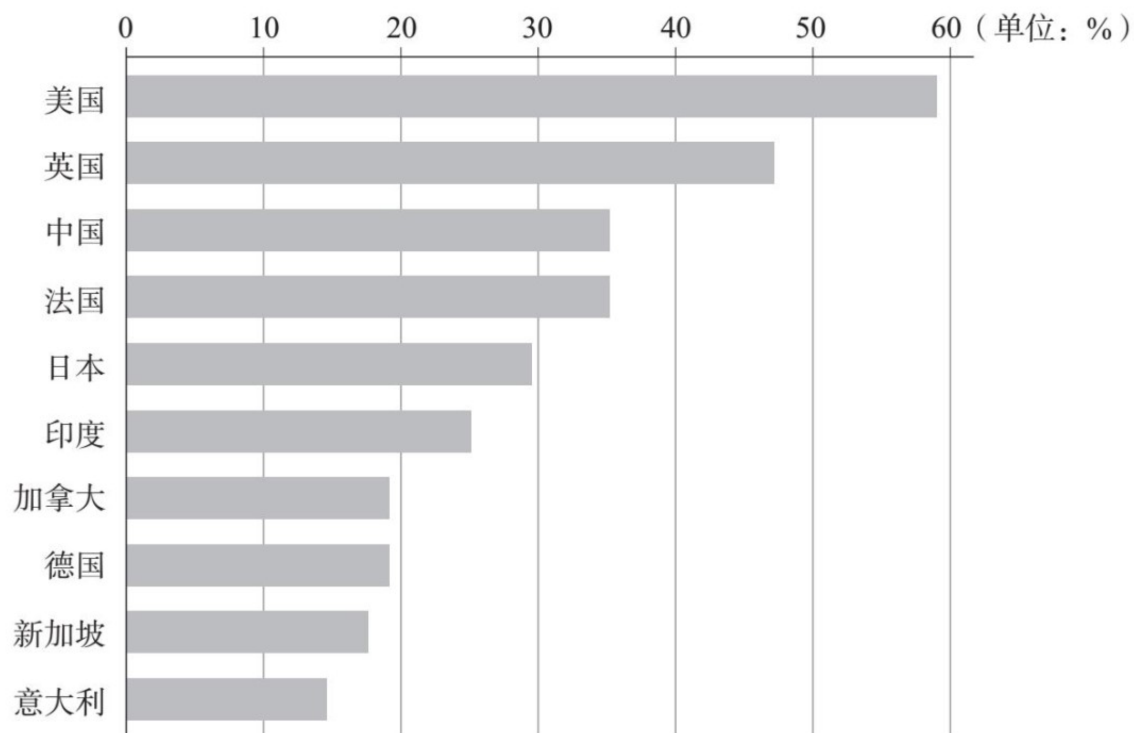


图5–15 2006年跨国公司研发中心在不同国家的占比

不过，从长远来看，中国技术潜力的关键，还在于它能够打造属于自己的高水平研发能力。因为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进口技术，只有0.03%的中国企业拥有其所使用的核心技术的知识产权。此外，中国公司的研发费用，平均只占其营业额的0.56%，大公司会略高一点，也只有0.71%。但是，为改变这一现状，中国正在做出巨大的努力，其制定的目标是将研发支出由2004年的246亿美元（占GDP的1.23%），增长到2010年的450亿美元（占GDP的2%，但实际上该年的研发支出只占GDP的1.75%），再到2020年的1 130亿美元（占GDP的2.5%）。2006年，欧盟的研发支出占其GDP的1.76%，美国的比例为2.62%，日本为3.39%，而中国的比例只有1.42%。2011年，中国的研发开支已经超越了日本，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但美国的优势依旧十分明显。且中国已经在很短的时间内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在科技文章的发表方面，中国也日趋发挥重要的作用。中国发表的科技文章占世界总量的比例已从1995年的约2%上升到2004年的6.5%。根据汤森

路透集团的基本科学指标的统计，2009年中国发表的科技文章占世界总量的比例已升至11%，而美国的比例则由20世纪80年代的40%降至28%。尽管中国所发表的文章引文率较低，但是正在成倍地增长。总体数字掩盖了中国在某些特定领域的优势，如材料科学、分析化学和水稻基因组学。最近对纳米科学出版物的一项分析表明，2004年中国排名第二位，仅次于美国。当然，这些出版物主要集中于一些顶尖的院校，例如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中国正在努力将它们打造成世界级的科研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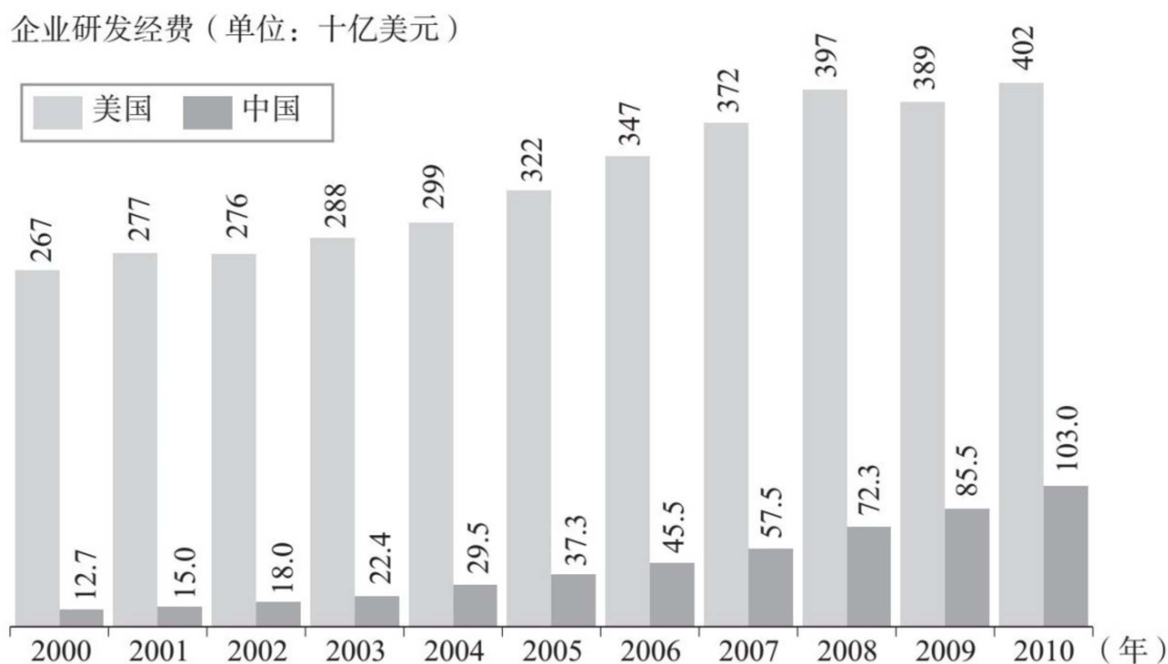


图5–16 中国日益增长的研发投入

数据来源：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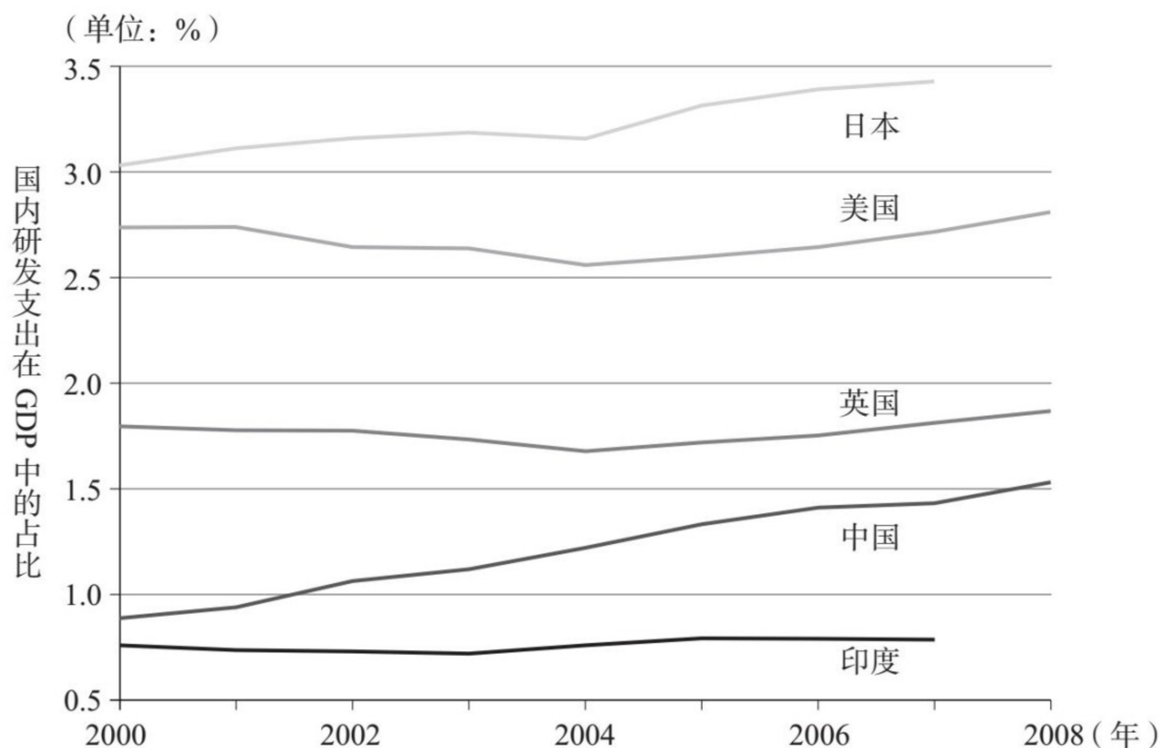


图5–17 研发支出在各国GDP中的占比

数据来源：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中国的优势之一还在于，拥有大量受过良好教育的专业人员和深入民心的强大的教育理念。中国高校毕业生的人数已经由2000年的95万上升至2007年的近450万，而同期美国高校毕业生的数量则分别为210万和270万。此外，众多中国学生在美国顶尖大学接受过教育，其中相当一部分后来都选择留在美国工作：例如，硅谷所有的专业技术人员中，中国人约占1/3。中国政府一直在努力吸引优秀人才回国：81%的中科院院士、54%的工程院院士都是“海归”。总体来看，目前在海外工作的华人专家中约有20%都已回国，这一点与此前韩国的移民模式十分类似。在中国提高其经济科技水平的过程中，海外华人是一笔极为宝贵的潜在资产，因此中国政府做了大量努力劝说其回国效力。

事实上，与其他所有领域的发展状况一样，中国在技术领域的发展也是极不平衡的，既有原始技术、低科技和中等技术，又有先进的甚至是非常发达的技术。然而，毫无疑问，中国将会稳步地攀登科技高峰。毕竟，这正是亚洲其他新兴国家和地区，特别是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所经历过的过程。这些国家和地区都是从最低级的模仿开始做起，现在都拥有了令人瞩目的技术竞争力，其中日本和韩国甚至已经超越了绝大多数欧洲国家。很明显，中国也以同样惊人的速度，踏入了类似的进程之中。认为中国永远都只能抬头仰望科技之巅的想法，只是一种错觉。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必将成为令人敬畏的科技大国。

与早期亚洲新型国家的企业不同，中国企业无法在拥有了坚实的经济基础、技术竞争力、知名品牌和主导国内市场基础上的高利润之后，再拓展海外市场、发展海外生产能力。许多中国企业走出去的主要动机，是希望逃离中国入世之后的残酷竞争——大多是来自外国企业——以及随之而来的稀薄的国内市场利润。研究中国经济的专家彼得·诺兰（Peter Nolan）认为，对于中国企业来说，要成为顶尖的跨国公司将是极其困难的，因为它们并没有躲在贸易保护的背后，在国内逐步建立起自身的稳固地位。他还提出，过去20年发生了一场全球性的商业变革，由于中国公司没有奋起直追，现在已经远远地落在了国际顶尖企业的后面，这将使它们的任务变得更加困难。

如果中国大陆不能打造出一批大型跨国公司，那么就此而言，其将远远落后于日本、韩国，甚至中国台湾地区。但这一观点无疑过于悲观。无论面临的情况是多么困难和独特，中国都已在致力于创建自己的发展道路，就像英国在19世纪进行的探索，美国发明了大规模生产，日本发明了即时生产体系一样。那么中国到底会开辟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呢？我们不妨以汽车工业为例，一窥究竟。就中国的汽车市场而言，中高端市场都掌握在欧洲、美国和日本公司的手中，而新兴的中国汽车公司（例如奇瑞和吉利）则主导着低端市场。中国企业能够

生产出比外国生产商更廉价的汽车，因为它们采用了模块化、组装的方法，而不是日本企业声名远扬的生产一体化方法。吉利和奇瑞等公司所使用的很多零部件，都是借用、仿造或从外国公司手中购买的。尽管最终产品的质量相对较低，但极为便宜。例如雪佛兰的斯帕可微型车，与中国的奇瑞QQ非常相似，但是销售价格是后者的两倍。印度塔塔公司的Nano汽车也采用了廉价策略，售价不到2 500美元，是与其价格最为接近的汽车售价的一半。

表5–2 2009年中国汽车销量前十名排行榜（单位：辆）

1. 比亚迪 F3	285 913
2. 别克凯越	241 109
3. 现代伊兰特（新款）	239 449
4. 大众捷达	224 857
5. 本田雅阁	175 357
6. 现代伊兰特	171 605
7. 奇瑞 QQ	168 554
8. 东风丰田卡罗拉	157 457
9. 广汽丰田凯美瑞	154 977
10. 夏利	147 547

注：标黑为中国品牌
数据来源：www.chooseauto.com.cn

模块化或开放式体系结构的生产方式，对于一个劳动密集型的发展中国家是非常适合的，但是如果西方和日本企业想要模仿，并不是不可能，但也是非常困难的。在中国，模块化生产方式首先是在摩托车、卡车和家电行业发展起来，然后才被国内汽车企业采纳。此外，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低端市场的份额在今后许多年里仍将是最大

的。尽管要与资源更为优越的外国汽车生产商大力竞争，但是中国汽车生产商在中国市场（目前是世界第一大汽车市场）所占份额正在缓慢上升：2006年，其比例为25.6%，仅次于日本厂商（25.7%），比所有欧洲厂商加起来还要多（24.3%）。其中，仅奇瑞和吉利两家就占了10%。2009年，国内汽车生产商在中国市场的份额已经升至32%。此前分析师和业内人士认为，中国汽车厂商要想获得全球竞争力，至少需要一代人的时间，现在他们则将时限调整为10年甚至5年。中国汽车厂商竞争力的不断提升也得益于海外并购，最为显著的例子就是2010年吉利公司从福特公司手中收购了沃尔沃集团。对于中国来说，出现若干能与国际汽车巨头一较高下的中国车企只是个时间问题，特别是如果比亚迪能够成为电动汽车和混合动力汽车的全球领导者的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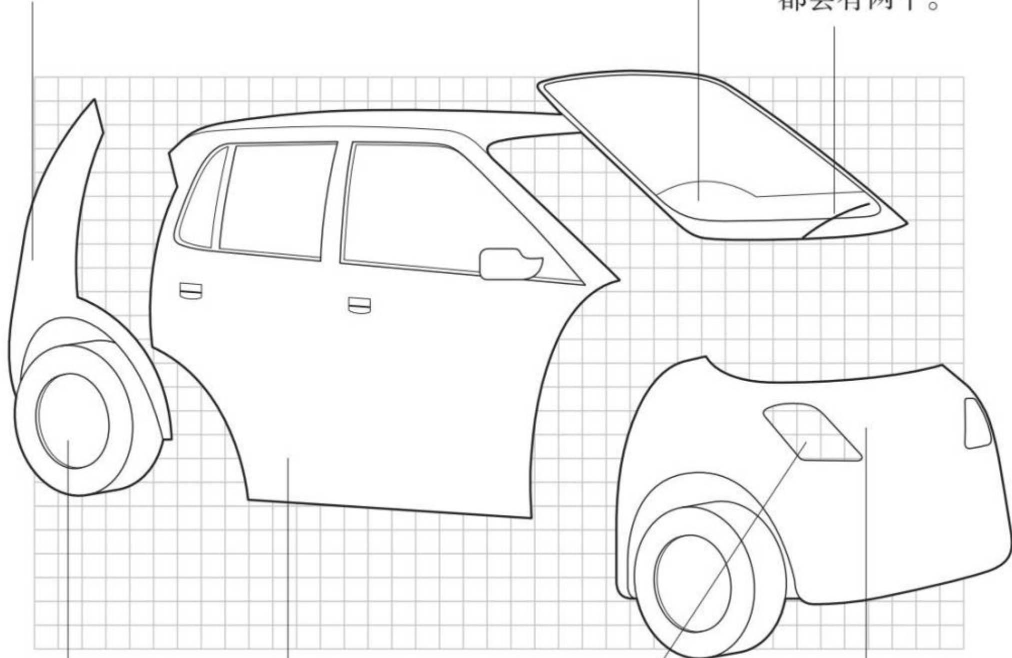


图5–18 如何制造廉价汽车，印度风格：塔塔Nano的经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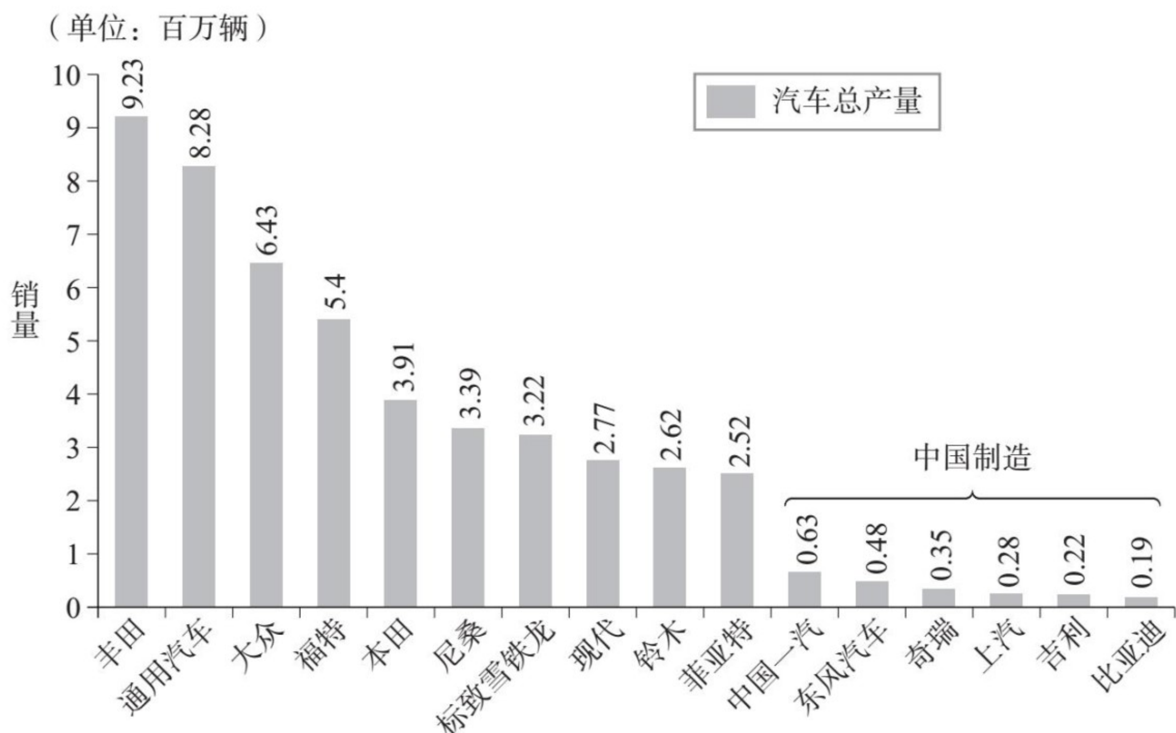


图5–19 2008年世界汽车制造商排行榜

数据来源：国际汽车制造商协会2009年数据

基于中国汽车工业的经验，我们可以认为，中国企业将首先进入全球市场最底端的大众消费品市场，最初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就此已经有不少的证据），但随后就会进入发达国家市场。对于海尔、康佳、格兰仕、奇瑞和吉利这样的企业来说，若想在西方市场站稳脚跟，还需要一段时间。毕竟设计要求、安全标准、市场品味、预期与中国企业目前具备的价格优势存在很大的差异。事实上，比亚迪、吉利和奇瑞都已经数次推迟了进军美国市场的时间。在这方面，中国电视生产商TCL，提供了一个引人警醒的先例，它与法国汤姆逊公司合资在欧洲创办了一家公司。由于对欧洲市场一无所知，TCL做出了一系列严重的误判，最终不得不于2006年宣布关闭其在欧洲的业务。但是TCL只是个例外：中国家电企业大多选择在发展中国家而不是发达国家建立自己的海外生产基地。在此背景下，中国企业最初以发展中国家为目标与此前日本及韩国的经验不谋而合。例如，日本公司就是首先取

得了当时相对贫穷的东亚市场的主导权，然后才开始正式拓展西方市场。此外，日本和韩国公司正在欧洲和美国开展的业务都是从廉价的低端市场做起，然后再不断地稳步走向高端市场，丰田公司的经验就是例证。同样的情况也大体上适用于中国，只是中国优先考虑发展中国家市场的愿望更为强烈。中国对非洲、中东、亚洲和南美洲地区的出口增长速度，远高于其对美国的出口增速。2000年，中国对美国的出口还超过其出口总量的31%，但2007年年初已经下降到略高于22%，现在仅有18%。

我们已经对能够代表中国企业未来发展的若干大趋势进行了分析。我们将会继续见证，中国的跨国公司正缓慢但稳步地出现在便于发挥其国内比较优势的领域，特别是其庞大的国内市场优势的领域，如家用电器、摩托车、卡车和汽车等。海尔、格兰仕、康佳和比亚迪就是此类公司的代表。此外，鉴于中国对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高度关注，建筑、基础设施和重工业也将是中国跨国公司发展的温床。三一重工（建工）、上海振华重工（建工）、广西柳工（装载机）、三一重装（煤炭业用隧道掘进设备）以及和利时（工业自动化控制系统）等公司，不仅是相关行业的国内领军企业，在发展中国家和一些发达国家的影响也在不断上升。例如，上海振华重工承担了旧金山新海湾大桥重建工程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分。与此同时，中国在2009年已经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高速铁路网络，2012年，其高铁网络的规模更是将超过世界其他所有国家高铁网络的总和，中国南车等机车制造商也将毫无疑问地成为国际市场上最有力的竞争者。百度公司的发展经历也令人感叹。作为互联网搜索巨头之一，2011年，百度在中国市场的占有率达75.8%，与谷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谷歌在中国市场的份额只有19.2%。未来，百度是将继续称霸国内市场还是拓展国际市场，我们还不得而知。

此外，在体育（鉴于中国正日益成长为一个体育大国）和医药领域，中国品牌的影响力也在不断提升（如李宁）。李宁在中国市场的

占有率仅次于耐克，在研发领域投入巨大。就医药领域而言，中国庞大的人口规模为临床试验提供了巨大的优势。中国基因药物的巨头——先声药业，就是中国医药企业快速发展的代表。正如上文所提及，中国目前正在大力推动新能源的发展，特别是太阳能电板和风力涡轮机领域。就太阳能电板而言，无锡尚德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生产商，而中国高速传动、金风科技、华锐风电和东方电气等公司则是风力涡轮机领域的佼佼者。中国企业可再生能源领域的表现正是其在高科技行业展示出巨大竞争优势、占据相当的国际市场份额的例证之一，但中国企业在高科技产业中的优势领域绝不仅限于此。其中，最为显著的例子当属华为。华为是中国最大的电信设备和网络技术供应商，2009年，其在全球通信基础设备市场中的份额达到了约15%。2009年年末，华为更是取代了诺基亚西门子网络公司成为仅次于爱立信的全球第二大移动网络设备供应商。华为最初的影响力仅限于国内和发展中国家，现在已在发达国家市场具备很大的竞争力。华为的产品不仅有价格优势，在专业化程度和质量上也颇具竞争力。2009年，就在美国、欧盟和日本登记的专利数量而言，华为仅次于松下，据世界第二位。当然，中国移动无疑也是中国电信产业的巨头之一。此外，在收购了IBM（国际商业机器公司）的个人电脑业务之后，联想在世界的地位也大幅提升。

中国商用飞机有限公司已经开始生产自己的支线客机，并在2008年完成了处女航。而且目前正在研发能够与空客320和波音737客机相媲美的窄体客机，预计于2016年开始量产。而空客公司也宣布打算将其部分的产业链转移至中国。此外，2007年，据媒体报道，中航工业第一集团有意收购或竞价空客在欧洲地区的6家工厂，当时空客的产能相对过剩。中航此举可能是出于跨越式发展的需要，但最后因故未能实现。假以时日，已经是世界第二大航空市场的中国必将成为世界航空制造大国。中国政府正在制定一系列新的规定以支持国内飞行器制造商的发展，从而满足未来20年的客机需求。此外，航空航天产业更是在2010年被选为七大“新战略”产业之一，国家给予更多的财政支

持和政策倾斜。中国稳步发展其航空计划的事实，也表明了其有意在航空航天领域获得高度的技术竞争力。中国先后于2003年开展了一系列成功的载人航天飞行；于2007年发射了月球探测器；于2010年年末发射了六颗卫星，作为其全球定位战略的一部分；并打算于2020年发射自己的空间站，并实现自己的登月计划。此外，中国在其他高科技前沿领域也在雄心勃勃地实施相应的发展计划：最近，中国自主研发的超级计算机，其运算速度已经超越了欧洲和日本，跃居世界第二。中国还领先美国研发出了世界顶级的潜水器，能够探测比已往潜水器达到的深度更深的海床。

关于中国企业的全球影响，最为人所熟知的例子就是中国的银行和石油公司。2007年，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繁荣，见证了中石油超过埃克森美孚成为全球最大的石油公司的历程。从公司价值而非销售额的角度来计算，到2007年年底，在全球5家最大的公司中，中国就拥有3家，它们分别为中石油、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移动。2010年的《财富》世界企业500强中（按公司收益计算），前10名中就有3家中国企业（中石化、国家电网和中石油）。而在依据市场价值计算的《金融时报》全球企业500强排行榜中，前10名中仍有3家中国企业，其中，中石油更是位列榜首。关于中国企业的发展，我们从《财富》世界企业500强中中国企业的入围数，便可见一斑。2010年有54家中国企业入围，2008年为43家，而2000年只有9家。一些大型的中国企业正在寻求通过收购外国公司的方式来实现向海外扩张。目前已存在这方面的例子，例如联想收购IBM电脑，中海油意欲并购美国石油公司优尼科。中国企业资金充裕，渴望快速扩张，因此不难想象其海外并购热浪将会不断高涨。2009年，中国企业所有的大型海外并购都集中在自然资源领域，其中最为雄心勃勃的莫过于中国铝业公司试图收购力拓公司的股份。力拓是全球最大的矿业集团之一，集团总部设在英国伦敦，澳洲总部在墨尔本。最终，此次收购提议遭到了拒绝。该事件也令人清醒地意识到，即便在所谓的低敏感领域，中国企业在进行大型海外并购时，也面临着巨大的困难。毋庸讳言，由于全球金融危机，许多西

方公司遭受了严重的资金短缺，对于中国那些资金富足的公司，尤其是石油企业来说，收购机会可谓不计其数。此外，中国还建立了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该公司的注册资本为2 000亿美元，其中800亿美元将用于对外投资，这也使中国在面对被其确认为投资对象的外国企业时，拥有不断增强的潜在影响力。

最后，我们不应该忘记，作为“系统集成”公司的中国分包商在许多外国跨国公司的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越发重要。至少从长远来看，这一发展态势可能对这些跨国公司的管理、科研能力甚至所有权等方面产生更广泛的战略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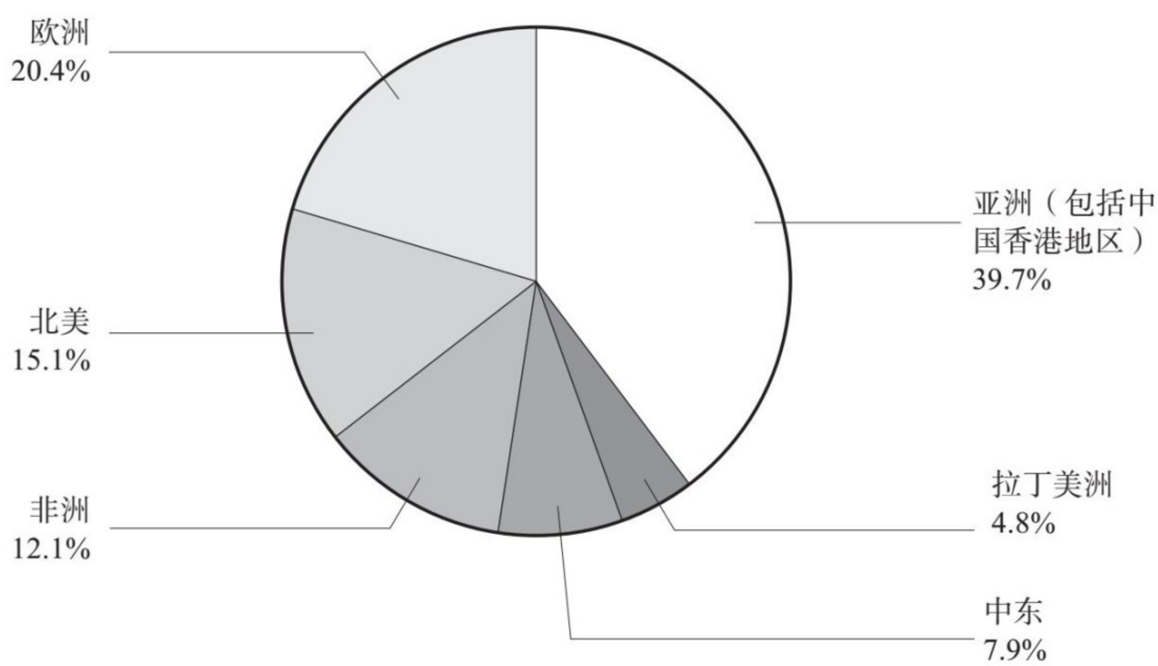


图5–20 2010年中国海外投资的分布（在总额中的占比）

数据来源：环亚经济数据有限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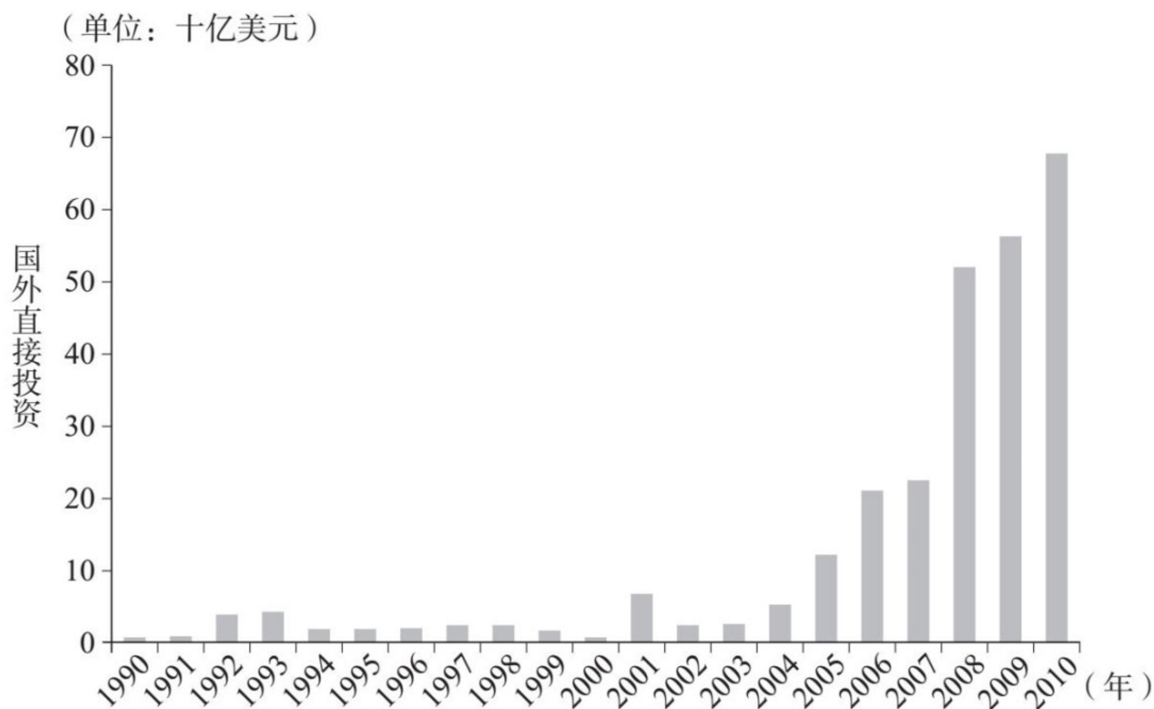


图5–21 中国快速增长的海外直接投资

数据来源：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2011年7月29日数据）

在跨国公司的建立过程中，海外直接投资至关重要。2010年，中国企业在非金融领域海外投资总额达590亿美元。当年，中国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总额是1 000亿美元。2008年，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总额为410亿美元，与2002年相比实现了大幅攀升；官方数据显示，2006年，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60%流向了亚洲，16%流向了拉丁美洲，7%流向了北美洲和非洲，6%流入欧洲，近4%流向澳大拉西亚。这些数据表明中国企业海外发展的主要区域是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大宗商品生产国。我们将在下一章讨论中国直接海外投资的问题。

中国模式

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包括政府职能的大幅削弱），引发了人们对中国经济和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相似性的关注。但是，与西方

经济相比，中国经济显然也拥有同日本和韩国一样的独特性。然而，中国与其他国家最大的差别在于国家的角色与作用。这可以视为中国古老传统的一部分，正如我们在第3章和第6章中所论述的，国家在经济中通常发挥关键性的作用，被广大人民当作社会的保护神和化身。虽然中国正在推行市场改革，但各级政府（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经济中仍然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20世纪90年代末的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已经开始打算大规模削减国有企业（其中很多企业生产效率低下且负债累累）数量和作用，并仿效其他国家的模式对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而10年以后，中国却呈现出一派相当不同的景象。在“抓大放小”战略的指导下，国家对大型国有企业进行重组、给予资助，并通常合并为更大型的国有集团公司，结果是国有企业的数量大幅削减。2008年，工业和服务业领域中有30%的资产掌握在国有企业手中，但其数量却只占企业总数量的3.1%。换而言之，国有企业的数量虽然不多，但其资产比例却并不低。自1999年以来，国有企业占中国企业总数量的比例由37%降至5%，其资产比例却仅从68%降至44%。中国政府并没有对国有企业实行彻底的私有化，而是试图提高重点国有企业的生产效率和竞争力。因此，中国规模最大的150家国有企业并非是绣花枕头，相反却具有极强的盈利能力，据统计，2007年其总利润达1 500亿美元。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一流企业是政府整体经济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其中大多都是国有企业。

与其他国家对国有企业施以各种不同程度的保护，而且通常使其处于准垄断地位不同，中国政府将国有企业投入到激烈的竞争之中，促使国有企业之间，或国有企业与外国公司之间形成竞争关系。此外，与许多西方国家不同，中国国有企业还可以募集大量的私人资本。2007年，上海证券交易所12个规模最大的IPO（首次公开募股）均为国有企业，其募集的资本占交易资本总量的85%。其中有些大国企股东中还有外国公司的身影，尽管可能会产生一些冲突，但通常会有利

于这些企业改善经营状况。与此同时，中国的大型银行的股东中有1/4是私人投资者。由于同时拥有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的特征，中国的国有企业最恰当的称呼应是混合所有制企业。重要的国有企业受到国家的支持与帮助，但同时也保留了大量类似私营企业的独立性，同时可以像私营企业那样募集资金。另外，还存在一种运作形式相反的混合所有制形式，例如联想电脑公司和华为这样的电信设备制造商，均是中国最大的私营企业，由于与政府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所以获得了极为重要的扶持。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情况与日本和韩国的情况甚为相似。但是，与私有公司在日本和韩国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况不同，中国许多经营状况最好的公司都属于国有。钢铁工业中有很多私人资本，但整个行业的龙头老大是却是国有的上海宝钢集团。中国铝业也是国有企业，目前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铝产品制造商之一，并准备向多元化的金属制品跨国公司进军。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正在与日本的三菱集团和丸红株式会社就亚洲境内火电站的修建展开激烈的竞争。中国的两大造船公司——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和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正在迅速发展，与日本和韩国造船公司的技术差距也逐步缩小。汽车行业中的奇瑞公司也是一家国企，所占市场份额位居第5位，由于其致力于发展技术和研发创新，因此展示出很强的竞争力。最重要的是，这些国有企业在全球舞台上，在与西方和日本公司竞争中，其竞争力也正在不断增强。

新兴的中国模式见证了国家正以一系列不同的策略和形式活跃在各个领域：为私营企业提供帮助，给众多国有企业出谋划策，助推人民币逐渐转变为可自由兑换的货币，最为重要的是成为推动中国经济转型的“经济战略工程师”。中国的成功表明，中国的国家模式注定要在全球范围内尤其是发展中世界发挥强大的影响力，由此也将改变未来经济发展的理念。可以想象，在西方金融危机中崩溃的盎格鲁-美国模式，将使中国模式在更多的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更有市场、更具吸引力。

规模效应

巨大的人口规模和超高的经济增长率相结合，为世界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经验：毫不夸张地说，中国正在改变呈现在我们眼前的世界，而且还会把它带入一个完全不同的未来。这种转变及其对世界的影响是如此之大，人们谈论现代经济历史甚至会使用“中国前”和“中国后”之类的术语与“公元前”、“公元后”类比，而1978年则成为这两个时期的分水岭。在这一小节中，我将集中探讨中国规模的经济意义。

当美国经济于1870年开始快速发展时，其人口为4 000万。到1913年，该数字已达到9 800万。日本“二战”后经济的黄金时期始于1950年，当时的日本人口是8 400万，到1973年年底黄金期结束时，人口数量已达1.09亿。相比之下，1978年中国开始发展时的人口是9.63亿，这个数字是美国1870年人口数的24倍，日本1950年人口数的11.5倍。据估计，到2020年其快速发展期结束时，中国人口将至少达到14亿，相当于美国1913年人口数的14倍，日本1973年人口数的13倍。如果我们将比较范围再扩大一些，印度1990年开始经济腾飞时人口是8.39亿，差不多是美国1870年人口数的21倍，日本1950年人口数的10倍。

总人口数只是中国规模所产生的影响中的一个方面，第二个影响是其劳动力规模。中国目前的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21%，其劳动力人数占全球劳动力总数的25%，略高于前者。1978年，中国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只有1.18亿非农业人口。截至2002年，非农业人口已经增至3.69亿，而发达国家加起来的总人口是4.55亿。估计到2020年，中国将有5.33亿非农业人口，这个数字将比整个发达世界的总人口至少高出1亿。换句话说，中国从事非农业劳动的人数正在迅速增加，因此，也极大地促进了世界非农业劳动力人数的增加。

中国崛起的第三个规模效应在于其经济规模对世界其他地区产生的影响。自1978年以来，中国GDP的年均增长率一直保持在9.4%左右，是美国1870~1913年期间3.94%的增长速度的两倍还多。据预测，两个国家各自腾飞持续的时间将大致相同：美国约43年，中国约42年，因为尽管中国的增长速度快得多，但其人口规模也大得多。美国1870年开始腾飞时，其GDP占世界总量的8.8%，到1913年时，该比例上升至18.9%。相比之下，中国1978年时的GDP约占世界总量的4.9%，但这一比例到2020年的时候，很可能会增加为18%~20%。就中美两国而言，两国GDP的增长都对世界GDP总值的增加产生了重大影响。例如，20世纪80年代，在所有国家中，美国对世界经济的发展贡献最大，其贡献率约为21%；然而，20世纪90年代，中国在其发展水平有限的情形下，对世界经济发展的贡献率仍达27.1%，而美国的贡献率仍为21%。

第四个规模效应是中国对世界贸易的影响。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是世界上最封闭的经济体之一。1970年，其出口贸易只占世界总量的0.7%；70年代末，中国的进出口总额只相当于本国GDP的12%，处于世界最低水平。当时的中国经济之所以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影响很小，原因有二：首先，当时的中国是一个非常贫穷的国家；其次，它也是一个非常封闭的国家。但是，自1978年以来，中国已迅速成为世界上最开放的经济体之一。中国正计划逐步将平均关税税率从2001年的23.7%下降到2011年的5.7%，目前该目标已经实现了一大半。尽管中国1978年的贸易依存度（出口和进口占GDP的比例）还不足10% ，到2004年该数字却已跃至70%，远远高于其他大国。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出口国、第二大进口国和第二大贸易国。

这些规模效应中的任何一个——人口、劳动力、经济和贸易，显然都对世界其他国家具有非常积极的影响：既能刺激全球总体增长，还能拉动各国经济增长。但第五个效应，即中国的资源消耗，则对世界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由于中国自然资源贫乏，而人口规模庞大，再加上资源密集型的发展模式，中国对自然资源的需求会产生双

重效应：一方面会导致全球原材料价格的增长，另一方面会加大全球原材料储备的消耗。按照目前的趋势，未来这一进程可能还会大大加快。

中国的全球经济影响力

尽管中国仍然很贫穷，2011年其人均GDP仅为4 282美元（按市场汇率计算），但它已经并正在对世界产生深刻的影响。中国和美国是21世纪前10年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为世界经济从2002~2005年实际产出的增长，做出了不低于1/3的贡献。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在西方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中国经济仍保持了持续的快速增长，使得金融危机所导致的全球经济衰退的程度大为降低，持续时间也相对缩短。中国作为世界工业制成品的最廉价生产商，在过去的20年中，它使很多商品的全球价格大幅降低。例如在过去10年里，美国服装和鞋类的价格下降了30%。制成品价格下降的主要受益者，是发达国家的消费者，而中国需求造成的原料产品价格的上升，又对初级产品生产者产生了有利影响，其中大多数都是发展中国家。为了获得足够的原材料来推动经济发展，中国在非洲、拉丁美洲和中东一直非常活跃，并与伊朗、委内瑞拉和苏丹等国达成了重要协议。另外的两个赢家是俄罗斯和澳大利亚，前者主要生产原料产品，尤其是石油和天然气，而后者就更不用说了。原材料的匮乏，促使中国对许多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展开了重大的外交攻势，其中包括2006年11月在北京召开的中非合作论坛。迄今为止，主要的输家是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的比较优势也是劳动密集型生产，与中国极为相似，因此不得不直接与中国竞争。在吸引外资方面，他们也不如中国，甚至许多国际公司将原本在这些国家的生产部门迁到了中国。还有一些明显的输家，即发达国家的蓝领工人，他们发现自己的工作都被跨国公司外包给了中国。

迄今为止，中国崛起对东亚地区的影响最大。主要的受益者是东北亚地区那些发达的亚洲新兴国家和地区——韩国、日本以及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它们一直都受益于中国生产的廉价制成品，同时由于中国对知识和资本密集型产品的需求不断增长，这些国家也能享受相关产品价格上涨带来的收益。与此同时，为了充分利用中国大陆廉价的劳动力，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公司把自己的许多业务都迁移到了中国，正如中国台湾计算机产业那样。同样，输家也是这些国家的同业者，由于工作被外包给中国，很多工人都丢了工作。但是，与同中国之间存在着庞大贸易赤字的美国不同，所有与中国保持贸易关系的东亚国家都处于出超或小幅入超的状态。该地区的灰色地带当属东南亚，这一区域的国家的经济与中国极其类似——虽然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要发达得多。在过去的10年里，东盟国家亲眼见证大量外国直接投资都流向了中国。它们还在电子和计算机设备大规模集成产业上输给了中国——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是最为显著的例子，最后为了避开与中国的竞争，它们都被迫升级价值链。受伤害程度最深的国家，是经济最类似于中国的印度尼西亚。在纺织业等领域和吸纳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上，印度尼西亚已甘拜下风，这些跨国公司都选择中国而非印度尼西亚作为其首选生产基地。当2010年1月1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协定生效时，印尼单方面决定推迟实施，因为该协定遭到了印尼国内廉价商品业主，特别是纺织业主的强力反对，他们担心将无法与中国进口的商品竞争。不过，总的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大大有益于东盟国家，中国已经成为这些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即使不是最大，也是较大的伙伴国之一）和最大的市场。在很多情况下，中国都是这些国家外来投资的主要提供者。

要衡量中国日益增强的全球影响力，一个重要的方面当属中国在中美关系中的优势——尽管与中国相比，美国的GDP和人均GDP仍高得多。这种优势是双边贸易不平衡的结果，也是中美关系中的核心议题。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出口国，美国对中国制造的消费品表现出极大的需求。而美国出口到中国的产品相对较少，中国享受着巨大的、不

断增长的贸易盈余，而且自1999年以来不断快速增加。中国将这些盈余投资于美国国债——实际上是向美国提供贷款——从而使美国利率保持在较低水平，这种状况有利于美国消费者，当然在次贷危机爆发前，也是有利于抵押贷款持有者的。尽管美国身陷债务之中，但中国持续大规模购买美国国债（在此用“国债”一词，泛指中国持有的各式各样的美国资产）的举动，部分缓解了次贷危机给美国造成的压力，使美国人能够继续尽情地挥霍和狂欢。2011年1月，中国外汇储备达到2.85万亿美元——这一数额比除9个国家以外的世界其他所有国家的年度经济产出总和还要多。外汇储备的迅速增长使中国成为金融世界的“大亨”。西方国家金融实力的下滑，更加凸显了中国的重要性。当许多西方金融机构、公司甚至某些西方国家都发现其资金流动性短缺时，中国却正好相反，其资金流动性相当好。从战略上而言，这将使中国在未来的10年内处于潜在的优势位置，可提升其国际金融和经济影响力。举个例子来说，中国可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慷慨的贷款，还可以在全世界购买合适的资产。中国的财力在2011年欧盟向中国政府寻求经济援助以支撑欧元时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中国如何利用其国家外汇储备是一个非常令人关切的问题，对美国来说尤为如此，因为中国的大多数外汇储备都投资于美国债券。尽管中国的外汇储备构成仍是一个秘密，但人们普遍认为在中国的外汇储备中，美元约占65%，欧元约占26%，英镑约占5%，日元约占3%。如果中国将相当一部分外汇储备转换为其他货币，将会立竿见影地出现美元贬值和美国利率被迫上升的后果：转换的金额越大，这种后果就越明显。但是，中国政府也面临着一定的两难境地。如果将大量外汇储备资产从美国国债中转移出来，肯定会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2010~2011年，美元不断下跌，鉴于美国的预算赤字，未来美元将进一步贬值，中国持有的美元价值可能大幅下降。中国投资于美国国债的庞大美元资产，只能赚取微乎其微的回报率，这对于一个仍然很贫穷的国家来说，实在意义不大。但是，如果中国将大量的储备从美元资产转换为其他货币资产，就会导致美元进一步贬值，而自己的美元储

备的价值也会随之下跌。中国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当代的两个伟大但全然不同的经济大国，发现它们彼此处于一种奇怪的、相互依存的状态，至少目前如此。2008年9月金融危机那些最黑暗的日子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当时人们普遍认为，考虑到手中所持的股份，中国会迫使美国政府出手营救房利美、房地美以及后来的美国国际集团，同时美国也肯定会害怕中国会卖掉手中的部分美元储备，带来美元贬值的可怕后果，最终损害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地位。

早在这些动荡发生之前，中国已经开始探索使用其庞大外汇储备的新途径，而不仅仅是充当美国事实上的金主。2007年年初，中国政府宣布成立中国投资公司，这是一家新的国家机构，负责监督2 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投资，性质类似于新加坡的淡马锡控股公司。淡马锡是新加坡政府全资的一家成功的投资机构，它掌管着1 080亿美元的全球证券投资。为了“一试身手”，中国投资公司向总部设在美国的私募股权集团黑石集团投资了30亿美元，表明中国打算将它的部分美国国债投资转换到风险更大的股票上。实际上，自负责监管中国外汇储备的国家外汇管理局开始多元化投资以来，这一趋势就已经出现。这些举动预示着中国作为一个重大的全球性金融强国的崛起。2007年下半年，在次贷危机开始显现的时候，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以巨额资金入股了总部设在英国的巴克莱银行。在美国投资银行贝尔斯登破产之前，中信证券公司与其成立了战略联盟。同时还有三家中国银行正在考虑收购总部设在英国的新兴市场贷款人——渣打银行的股权。但随着中国政府逐渐意识到西方金融市场上资金短缺的严峻性，以及它购买任何一家西方金融机构股权可能存在的潜在风险，这些计划被叫停了。由于这一多元化的战略，中国也承受了巨大的损失：据估计，仅国家外汇管理局就损失了超过800亿美元。然而，总体而言，当2008年9月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时，中国几乎没有受到什么影响。

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关系，需要放置到一个更宽泛的全球和历史背景中加以分析。2001年中国才姗姗来迟地加入世贸组织，这也标志着

世界贸易体系自20世纪70年代末当代全球化开始以来最大的一次扩张。作为外国直接投资最大的目的地并很快将成为最大贸易国，加之人民币仍无法自由兑换，中国的加入立即改变了世界贸易体系的性质和动力。通过获得低成本的制造业基地和极其廉价的进口品，发达国家已成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主要受益者。但中国本身也是一个大赢家，不仅为其出口获得了更广泛的海外市场准入机会，同时还获取了流入国内的庞大外来投资，有助于维持其两位数的增长速度。至少在西方金融危机之前，中国融入全球经济一直被看成一个双赢的局面。那么这一现状有没有继续保持下去的可能呢？

中国对全球贸易体系的影响是巨大的，但从长远来看这种影响也非常不确定，所以很难对这一问题做出回答。中国与世贸组织的关系已呈现出紧张的迹象：一方面，发达国家指责中国没有履行其在世贸组织中应尽的职责；另一方面，美国和欧盟都以反倾销条款（被设计用来阻止其他国家以不公平的价格销售商品）为借口，来部署针对中国商品的保护主义措施。围绕着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中美之间争议不断，2007年，争议主要集中在中国产品尤其是食品和玩具的安全性以及中国对知识产权保护不力上。目前，中美之间的这种小摩擦还不是双边贸易关系的主流，但未来这种紧张局势可能会愈演愈烈。虽然当今的全球化时代是由西方尤其是美国设计和创造的，但东亚国家，特别是中国，才是当之无愧的最大受益者。如果西方在某个时候断定中国才是实际上的主要受益者，同时对西方越来越不利，那么西方很可能会变得更加趋向于保护主义，当前的全球体系也会被逐步破坏。

西方金融危机已经对全球经济的前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尽管未来经济的发展仍相对乏力，但中美之间潜在的利益冲突目前仍处于低烈度的状态。随着美国人的生活水平不断下降，就业机会日益减少，这种冲突将越发明显。双边利益冲突的焦点在于人民币的汇率上。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质疑人民币的汇率被严重低估，因此人为地降低了中

国出口商品价格，认为美国必须采取报复性举措，引入保护性措施，直至人民币明显升值为止。如果美国采取此种举措，中国肯定会做出回应。目前，中美之间爆发贸易战的可能性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高的，但并非不可避免。我们将在第9章中对此继续进行探讨。

除西方的金融危机外，我们还应从长期的视角考量中国的崛起。迄今为止，西方世界中主要的输家是那些非熟练和半熟练的工人，他们在与中国的竞争中失去工作。但是，他们的不满并没有引起赢家的重视，跨国公司依然把中国作为廉价的生产基地，众多消费者依然从中国价格中受益匪浅。随着中国迅速升级自己的价值链，当中国的产业对熟练的体力劳动者和越来越多的白领工人及专业人员的工作构成威胁时，其政治考量将会发生怎样的决定性改变？中国的价值链已经开始以某些方式升级，比如意大利普拉托市和科莫市的纺织品产业，不仅生产部门转移到了中国，甚至部分设计也在仿照中国。因此，西方可能做出的反应主要取决于中国升级其技术能力的速度：这一过程进行得越快，政治考量就越有可能改变，保护主义壁垒也越有可能建立；这一过程进行得越慢，贸易摩擦就越有可能被控制，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正如上文所提及，中国产业升级的速度要比此前预计的快得多。在太阳能电板、风电、电信网络、电力传输和高铁等领域，中国公司已经与西方公司平起平坐，通常是通过合资来实现技术的发展。在其他领域，如建工、机床、汽车、电气工程等，中国的大公司（如上海电气）与西方的差距并不大，不久之后就可一较高下。很多中国企业已经考虑在欧洲建厂或建立研发中心，收购欧洲著名的品牌、企业，挖角欧洲的工程师，其中，德国是中国的首选。中国对德国的投资数已经由2007年的7宗升至2009年的45宗。在2011年3月前的半年时间里，中国企业在欧洲的投资数额（包括收购、贸易和贷款协定）比此前3年内的数额翻了一番还要多。中国经济的崛起，已经导致全球经济力量的多重重新分配：从东南亚到中国，从日本到中国，从欧洲和美国到中国等皆是如此。鉴于中国的腾飞阶段刚过半，仍然有超过50%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很显然中国经济崛起对世界的影响还只

是刚刚开始。拥有1/5的世界人口并产生了各种规模效应的中国，以极快的速度融入全球经济之中（用历史的标准来衡量），并且其间并未引发紧张态势和冲突，着实令人不可思议。迄今为止，中国融入世界一直都是相对相安无事的。但目前来看这一双赢的态势似乎不太可能继续下去。随着西方国家受损者数量的上升，政治考量必将改变，西方国家这一自由贸易的传统鼓吹者，很有可能将首先开始进行贸易保护，始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全球化时代也将走向终结，这并非妄加推测。西方经济的困境很有可能成为诱发这一进程的原因。

第6章
文明国家

香港曾是廉价劳动力和廉价商品的代名词，但当广东成为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基地后，它就理所当然地摘掉了这个“头衔”。香港已跃升至价值链的高端：工人们期望很高，已不能忍受恶劣的工作环境、长时间的工作和微薄的工资。传统的纺织工厂需要大量廉价的纺织工人，即使没有经验也无妨，这类劳动力在香港曾经很富余。改革开放后，大陆这类廉价劳动力十分充足。因而，这些纺织工厂开始向北迁移。广东省放宽了政策与管制，吸引了附近地区和内陆省份大量廉价的农民工劳动力。这些外来务工人员，带着对城市美好生活和赚大钱的憧憬，来一江之隔的香港打拼。

从早上7点到晚上12点，广州火车站挤满了招聘人员和农民工。这就是狂野的东方。不管工资多低、工作条件多差，充满机遇的广东仍然颇具吸引力。年轻的打工妹早早地离开了学校，来到这个离她们家乡上百公里甚至上千公里的地方，长时间重复地做着最简单的工作，生产服装、玩具和烟花，出口到西方。下班后只能回到简陋的工厂宿舍，在狭小房间里的上下铺上休息几个小时，随即又要出工。即便是这样，也要比她们老老实实地待在家里种地强。

在短短几十年间，香港逐渐爬升至价值链的高端，其居民生活水平也得到大幅提高。而现在的广东，也面临着同样的转型。当地居民的期望在不断提高，拥有的机会也日益增多。人们已不满足于最卑微的工作，逐渐寻求更为体面、收入更高的就业机会。同时，随着中国整体生活水平和民众期望的提高，人们对没有一技之长的工人和农民

工的就业保障问题日益担忧。这些工人缺乏法律保障，工会的权力受到种种束缚，难以发挥作用。经过数年的讨论，中国终于在2008年颁布了新的劳动法。但许多企业主却强烈反对这部法律，认为此举会削弱他们的竞争力并且会使其面临破产的困境。

在内地做生意的香港老板反应尤为强烈。聪明的商人大多非常努力和精明，他们把工厂设在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大陆，就是为了解决香港日益提高的劳动力成本问题，但是现在他们发现新劳动法的出台和华南地区民众期望的提高让，他们同样感受到巨大压力。在珠江三角洲地区的9万家企业中，有近6万家是港资企业。很多中国大陆的老板大多非常愿意和它们做生意。玖龙纸业是世界上最大的纸业制造和回收公司之一，其董事会主席张茵是中国最富有的女企业家，她也认为这部法律实际上是恢复了毛泽东时代的“铁饭碗”。全国工商联也指出该法律将引发更多的劳资纠纷，导致更多的公司破产。在华设厂的美资企业也表达了对新劳动法的忧虑，因为它们来到中国最主要是因为这里有丰富的廉价劳动力。但全国总工会最后声明，表示拒绝对任何企业做出让步。

新法律是时代变革的一个重要象征。像中国香港一样，中国大陆不可能永远依靠廉价商品、廉价劳动力和恶劣的工作条件来推动经济发展。人们对工人权益的关注最终将改变建立在廉价劳动力基础上的、工人未受到工会或法律保护的、被置于野蛮的市场力量之下的经济体制。目前为止，这一转变最为显著的体现就是2010年7月席卷广东的罢工潮，当时有数万名工人参与其中，特别是富士康和本田的员工。富士康是一家台资企业，是苹果公司电子产品的代工商之一，也是广东最大的工厂之一。当时，富士康在深圳的工厂出现了好几起自杀事件，十余名工人均选择了跳楼结束自己的生命，随即就出现了罢工。工人们之所以罢工，不仅是因为工资待遇较低、劳动环境较差，还因为新劳动法的颁布令其产生了新的期望。在政府的暗地支持下和工会的积极介入下，罢工以企业大幅提高工资、改善工作条件、明显

转变态度而告终。广东也因此发生了永久性的变化。中国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迈进，其政治领域也会进行相应的调整。保护工人权益、改善工作条件的意识将成为主流，政府不会放任不管。

西方仍普遍认为，中国最终会在发展进程中选择遵循西方的道路与模式。这实际上只是一厢情愿，必将面临来自中国的挑战。除日本之外，中国将是两个世纪以来的工业化过程中，第一个不按照西方模式崛起的大国。其与19世纪末美国崛起所代表的西方道路截然不同。为了分析中国崛起的真正含义，我们不但要了解中国的经济发展过程，还要了解它的历史、政治、文化和传统。否则，我们就会陷入盲人摸象的境地，根本无法理解或预测中国崛起的真正含义，只会感到惊慌失措。本章旨在阐述中国政治的特点，这是下个世纪西方应探究的一项重要课题。

中国——一种文明

中国，并不仅是一个民族国家，还是一种文明。事实上，中国成为一个民族国家只是近代以来的事，至于这一事件发生的确切时间，还有待商榷——是19世纪末，又或许是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就此意义，中国是一个相当年轻的国家，类似于人们所说的建国才半个世纪的印度尼西亚或者只有100年多一点儿的德国或意大利。当然，这是无稽之谈。因为中国已经延续几千年了，至少有两千年，这是肯定的，甚至可能有三千年，而中国普通老百姓则愿意说成“上下五千年”。也就是说，在成为一个民族国家之前，中国很早就以一种明确的、延续的政治体形态屹立于世界了。

毫无疑问，中国确确实实是目前为止世界上最古老的、延续至今的政治体，其历史可追溯到公元前221年，甚至更早。这可不是枯燥乏味的历史记录，而是所有中国人（不仅是那些社会精英，连普通的出

租车司机也一样）对自己国家的认同感。在与出租车司机的交流中，他们常常会不经意地提到这段悠久的历史，并言及孔孟之道，也许还会引经据典。中国人眼里的“中国”实则是国家、民族乃至“中华文明”的同义词，包括诸如中国的历史、朝代、儒家思想、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家族联系和习俗、人际关系、家庭、孝道、祖先崇拜、价值观、独特的哲学体系……简言之，中国万物孕育于中华文明之中。与西方人不同，西方人的认同源于民族国家的历史，中国人的认同则是其文明史的产物。中国人并没有将中国视为民族国家，而更多地看作文明国家。或者我们可以说，中华文明像一个古老的地质构造，文明国家是深厚的底层，而民族国家的意识则是浅显的表层。西方社会由民族组成，而中国由文明构成，这种差异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

当然，世界上还存在着很多其他的文明。就此而言，中华文明可能并不是独一无二的。然而，中国最大的特点是，在绝大部分的历史进程中，“国家”与“文明”是合二为一的（中国西部可能算个例外）。这也是我们为何不光将中国视为一种文明，而是一个文明国家的原因所在。其他国家可能具有文明国家的某些元素，但却远不及中国。我们不妨以美国为例，伴随着对美洲印第安人的杀害和欧洲殖民地的覆灭，一个全新的国家，或可以说，一个全新的文明诞生了。但这一文明实际上仅仅是对欧洲文明的继承，其历史充其量也仅有400年之久。印度也可以被视为一个候选的对象，但如我们目前所知，印度与中国截然不同，只是近代英国殖民统治的产物，其此前的历史要比中国更加多样化。

中国只是在19世纪末由于实力的差距不得不加入由西方霸权主导的世界体系，因而才被迫成为一个民族国家。此后的100多年来，中国一直将自己描述为民族国家而非文明国家，尽管其首要的身份和主要特征明显如此。现在，中国的身份同时具有民族国家和文明国家的双重属性。从历史和建构的角度来看，中国无疑是一个文明国家；而作为积贫积弱的后果，它又被迫成为一个民族国家。或者，正如白鲁恂

凭借敏锐的观察力所得出的结论一样："中国是一个伪装成民族国家的文明帝国。"然而，未来这两种身份将如何演进、互动乃至冲突，至今仍无定论。

中国人的这种文明感有利于帮助我们理解为何中国人总是对自己的历史倍感亲切。对中国人而言，过去——遥远的过去而非近现代的过去，与现在是如此息息相关而又意义重大。这是世界上任何其他民族都无法做到的。相比之下，其他任何国家似乎都成了"菜鸟"，因为历史的断裂令其民众与本国的历史割裂开来。然而中国人却不是这样，尽管中国曾经历过巨大的混乱、侵略和分裂，但其文明的延续性却仍坚韧地得以留存，最终占据主导地位，纵然历尽波折，仍深深地镌刻在大多数中国人的脑海中。不管中国人身在何处，与祖国相距多远，他们总是生活在本国的历史中，这与其他社会存在着巨大的差别。历史学家王赓武写道："其他任何国家能像中国一样拥有两千年、一千年的外交史，并能在今天也如此引人瞩目吗？"中国学者金观涛说："（中国）存在的唯一模式就是从历史中重生；除了从历史传统中寻求启迪和力量之外，在中国文化中找不到任何一种可以令中国人接受的机制与现实抗争。"中国学者黄平写道："中国就是一部活生生的历史。几乎今天发生的每件事情都与历史密切相连，如果没有历史背景，我们就无法解释它。不仅仅是学者，公务员、企业家和老百姓都有着强烈的历史感……而不管受教育程度如何，他们都活在历史中，承载着历史，为历史代言。"

杜维明评论道："当接受过正规教育的中国人谈论杜甫的诗歌、司马迁的《史记》（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该书写于公元前109年~公元前91年，记载了从传说中的黄帝到汉武帝长达三千年的历史）、孔子的《论语》时，他们言谈中透露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积淀……人们将杜甫、司马迁、儒家学说与现实生活融合在了一起，表明传统思想将永远存在于中国的历史长河中。"

现在所知的最早的关于“中国”的认知可以追溯到周朝，它于公元前2000年左右发迹于黄河流域。实际上在周朝之前的商朝，现代意义上的“中华”已经雏形初现，如表意文字、祖先崇拜以及王者独尊概念的存在。然而，那时人们对“中华文明”的认知并不强烈。直到数百年之后，孔子才在其著作中提及“中华文明”之说。正如在第3章中所论述的，当时，汉语是官话和教学用语，“君子受天命而治天下”的思想也已作为王朝统治的基本原则得到确立。

孔子生活在中国历史上的战国时期之前的春秋晚期。在战国时期，不同的诸侯国之间进行了持续的、数不清的战争。秦王朝的一统六国为战国时代画上了句号，实现了中国领土的大体统一。而秦王朝通常也被视为现代中国的雏形。尽管孔子生前地位不高、得到的认同不多，但其死后却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文人（尽管其思想理念并非一直处于主导地位，如公元500~850年，佛教的影响力就超过了儒家思想）。孔子死后的两千多年里，其推崇的理念和道德操守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中国，他提倡的治世之学影响了历朝历代的统治者，《论语》也成为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书籍之一。儒家思想虽然也融合了其他思想流派，特别是道教和佛教的思想，但孔子自己的理念至今仍占据着最重要的地位。孔子认为政府在治理国家时，要重视道德教化的作用。孔子还强调了统一和稳定的重要性，这与其身处的动荡不安的时代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孔子的这些思想奠定了中国文化价值观的基础。直到19世纪末，孔子的影响力才开始稍有减弱。尽管如此，在风起云涌的20世纪，甚至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儒家思想依旧根深蒂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儒家思想曾一度被质疑，但《毛主席语录》的内容与风格却明显留有儒家风格。

中华文明的延续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即国家和教育，这两点均可从儒家学说中找到根源。至少从孔子所处的时期以来，国家均被视为中华文明的象征和守护者。这也是为何不管是在过去还是在共产党执政时期，国家均被附以巨大的权威性和合法性的原因所在。在国

家的诸多责任中，最为重要的就是维护中华文明的统一，这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与西方不同，政府的作用是没有边界的。政府就像民众的父母（人们也经常这样类比），拥有无限的权威。家长作风被认为是政府应该也是必不可少的重要特征。虽然在现实中，国家的权力并没有理论中的那么大，但民众对其的尊敬与顺从却是毋庸置疑的。同样，中国独特的教育理念和养育理念的根源也在于传统文化。自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孟子以来，中国人就一直对人性持乐观的态度，认为人性本善，只要在孩童时给予适当的教育引导，那么他们就能获得正确的认知、价值观和良好的自我修养。在学堂，学生必须尊敬师长；鉴于中国历史的极端重要性，孩子所学习的内容实际上也是对历史虔诚的致敬。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教育是一项崇高的职业，教师的职责是传道授业解惑。中国人一直很重视对孩子技能的培养，而西方人则更看重孩子的开放性和创造力。因此，中国儿童与西方儿童相比，通常在很小的时候就掌握了较高技能，比如在音乐等艺术方面。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许是中国人使用表意文字的结果，要记住好几千个汉字，还得能完美地组词造句。

在强调中国文化的延续性的同时，我们还应注意到：两千多年来，经历了历史的沉浮（时不时就遭遇剧烈、巨大的变动），中国今天的文化已经大为不同。当然，从某个层面上说，这种说法有其合理性，也许我们没有完全意识到，中国的确已经发生了许多变化；但从另一个层面说，中国文化的传承是相对稳定的，这也是显而易见的。这一点在中国人的自我认知中显得尤为重要：中国文化一如既往的表达方式、人们的思维方式、风俗习惯、礼节、中医、饮食、政府与家庭在社会中的作用等，与历史上并无大异。王赓武认为，“这种不同寻常的延续感使中国的文明越来越不同于以往，这也是最为典型的中国特征”。自公元前221年以来，中国只有1074年处于统一状态，相对统一的时间为673年，分裂的时间为470年。在过去的一千年里，中国曾遭受几次较大规模的侵略和占领。这些侵略与占领，说得委婉一些，比较不同寻常。然而，这些中断，也表明了中国文化的力量及其

深层次的弹性与持续性。从历史上看，辽、金、元、清都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但在每一个少数民族所建立的朝代，统治者或早或晚都被汉化。相对于少数民族统治者的文化，中华文化展示出了相当的优越性。即便是公元1世纪传入中国的印度佛教也在几百年内日益“中国化”。

西方文化大约在1850年开始对中国文化形成挑战：相对于传统的儒家文明，西方文化的侧重点截然不同（主要体现在科学知识方面），且明显处于优势。当时很大一部分中国人拒绝在传统的价值观和西方文明之间进行实质性的平衡、调和，这也使儒家思想陷入了日益深刻的巨大危机。与日本的明治维新不同，中国在西方的挑战面前无能为力，结果就是遭受了侵略，经历了内战、内部的崩溃和长期的动荡。1911~1949年间，中国所有重要的文化体制和机构（政体、大学、报社、教堂等）几乎都无法存续超过一代人的时间，足可见当时中国僵局的严重和实质所在。西方的挑战使东方的文明不断被去中心化。最后，在所有的努力失败后，中国人转向了共产主义。更确切地说，他们转向了毛泽东思想。正是毛泽东思想，最终使现代性在中国生根，虽姗姗来迟，犹未晚也。在毛泽东领导时期，儒家思想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仍然影响颇深，以某种形式潜藏在人们的思想理念之中。直至今日，中国已经成功扭转了当初的衰落颓势，踏上了实现现代性的征程中，然而却仍被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被西化的程度等问题困扰。这些问题我们在第4章已有涉及。在经历过动荡、战乱、混乱和重生后，中国仍明确地保有原来的特征，仍具有强烈、独特的自我认知。

就此而言，中国文化就是一个有趣的例子。所谓的中国文化，是指构成、渗透于中国社会之中的社会关系、习俗、价值观、规范、机制的总称。人们特别是中国人通常认为，中国文化正处于危机之中。1850年以来，中国先后经历了帝制的覆灭、儒家思想作为现代化路径的失败、“文革”、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资本主义的迅速扩张和

西方思想的冲击，因此产生这种错位感不足为奇。在此背景下，中国的传统文化面临着巨大的动荡和变革。鉴于中国传统文明深刻的渊源、悠久的历史和韧性，其中不少变革令中国人产生了失落感，这也在意料之中。实际上，传统文化的深刻性和持久性也正是中国变革困难重重的原因所在：抵制和惰性的力量实在是太强大了。中国文化所遭受的干扰极为明显，但这并非意味着其遭到了较大的束缚或日渐衰弱。尽管可能要经历一个重建和更新的过程，但在很多方面，中国文化仍然是生机勃勃。中国经历了如此巨大的变革却依然保持相对稳定和两位数的增长率，恰恰说明了中国文化的强大和韧性，能够从现代化所带来的困境中安然抽身。当然，文化的重构将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尽管中国在所有方面的发展速度都十分惊人。当初欧洲花了几乎200年的时间才发展出一个与现代性相一致的文明。中国所重构的文明，将在很大程度上继承儒家的传统（实际上儒家的很多思想存留至今），同时也会吸收毛泽东思想和西方理念的精华。与儒家思想的卫道士所倡导的相反，中国不会简单地“回归儒教”。儒家思想虽然时至今日仍具有重要的影响，但其无法带来或实现中国现代化这一事实已经为人所公认。尽管如此，中国历史持续发展的主线仍是清晰可见、难以磨灭。

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而言，其现代化的过程往往呈现出身份认同危机的特征，沦为殖民地的经验通常又放大了这一特征。这些国家受困于本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间，它们常将本国的文化与其相对落后的、复杂的劣势局面联系起来。中国的确曾一度蒙羞，但却从未认为自己是劣等民族：中国人非常明白中国文化的含义，并拥有强烈的民族自豪感，这就是中国特质的魅力。实际上，这种特质的魅力也使得其他色彩浓厚的认同感（比如区域性、阶层、语言）变得相形见绌——这一点可以拿印度做例子。归属感源于中国的历史文化，它使各民族团结在一起，否则整个国家将会被方言、风俗、种族、地理状况、气候、生活水平和经济发展状况等因素搞得四分五裂。白鲁恂曾

说过：“把中华民族凝聚在一起的是文化、种族、文明等意识，而不是对民族国家的认同。”

文明国家这一概念对于中国而言至关重要。其不仅是理解中国的基础，更是在很多不同的方面对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先，中国的身份认同基本上就是从文化因素，如语言、家庭规范、社会关系结构等衍生而来的，而非近代民族国家的产物。其次，文明的统一性是中国政治毋庸置疑的第一要务。第三，维护、保持这种文明的统一性，被视为国家的神圣职责，因此国家被赋予了远超传统民族国家的权威和合法性。第四，中国的文明史以一种极为不同的方式塑造、定义了中华民族的本质，这一点我们将在下一章中有所论述。其中人口众多的汉族，无疑是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民族。第五，尽管鲜为人知，但中国作为一个大陆性的文明国家，接受了并且需要一种基于地区多样性的多元化。对于香港回归的宪法中所规定的解决办法就是典型的例子：基于“一国两制”原则的这样一种解决方案，与主权国家的“一国一制”截然不同（1990年德国统一时正是采取的此种解决方式）。第六，文明国家这一特征对中国的影响绝非仅限于近现代，而是至少有两千年之久。这的确令人称奇。历史一直在对当下产生重要的影响，成为当下行事的指南和标尺。“文明”一词通常情况下指的就是遥远、间接的影响和消极、被动的存在。然而，在中国，历史和文明均是鲜活地持续至今：中华文明这一理念，并非一个静止的、毫无生气的客观存在，而是一个鲜活的、动态的有机体，为中国人界定国家和自我认知提供了最主要的认同与认知背景。第七，文明国家的属性与概念不断提醒中国人，中国是一个中央王国，作为世界的中心，中国的地位自然与其他国家不同。中国人的优越意识直接来源于中国文明的伟大。

中国——一片大陆

作为一个文明国家，中国具有三个典型的特征。此前，我们已经就其中两个进行了探讨：历史的悠久及文明和国家的统一。第三个特征则与其规模有关。我们可将中国理解成由许多带有某种自治特征的省份所组成的大陆体系国家。这些省份的规模甚至和某些国家相当。例如，山东、河南、江苏和安徽四省的总人口要比美国还要多。而中国有9个省份的人口数相当于甚至大于法国和英国。据预测，至2020年，中国有6个省份的GDP将比俄罗斯、加拿大和西班牙等国还要高。因此，各省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也就不足为奇了。各省的人均收入非常悬殊，经济结构也迥然不同（例如不同省份的对外开放程度以及工业在其经济中的重要性），文化差异十分明显，政府管理方式的多样性也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实际上，在很多方面，我们可以认为每个省都类似于一个民族国家。中国各省之间的差异比欧洲各民族国家间的还要大得多，甚至超过了东欧和巴尔干半岛地区的那些国家。

表6–1 中国各省的人口

	人口	占中国人口的比例（%）	同等人口规模的国家
广东 * **	104 303 132	7.8	墨西哥
山东 * **	95 793 065	7.2	菲律宾
河南 * **	94 023 567	7.0	菲律宾
四川 *	80 418 200	6.0	德国
江苏 *	78 659 903	5.9	伊朗
河北 *	71 854 202	5.4	泰国
湖南 *	65 683 722	4.9	法国
安徽 *	59 500 510	4.5	英国
湖北 *	57 237 740	4.3	意大利
浙江	54 426 891	4.1	缅甸

广西	56 026 629	3.5	西班牙
云南	44 966 239	3.4	乌克兰
江西	44 567 475	3.3	哥伦比亚
辽宁	43 746 323	3.3	坦桑尼亚
黑龙江	38 312 224	2.9	波兰
陕西	37 327 378	2.8	加拿大
福建	36 894 216	2.8	波兰
山西	35 712 111	2.7	阿尔及利亚
贵州	34 746 468	2.6	加拿大
重庆	28 846 170	2.2	马来西亚
吉林	27 462 297	2.1	委内瑞拉
甘肃	25 575 254	1.9	沙特阿拉伯
内蒙古	24 706 321	1.9	朝鲜
上海	23 019 148	1.7	莫桑比克

（续表）

	人口	占中国人口的比例（%）	同等人口规模的国家
新疆	21 813 334	1.6	澳大利亚
北京	19 612 368	1.5	喀麦隆
天津	12 938 224	1.0	塞内加尔
海南	8 671 518	0.7	瑞典
香港	7 003 700		保加利亚
青海	6 301 350	0.5	巴拉圭
宁夏	6 176 900	0.5	巴布亚新几内亚
西藏	3 002 166	0.2	蒙古
澳门	542 400		所罗门群岛
中国	1 316 493 591	100	

*排名前9名的省份的人口数相当于甚至大于法国、英国和意大利。山东、河南、广东、四川四省的人口比包括德国在内的任何一个欧洲国家还要多。
**仅排名前3名的广东、山东、河南三省的人口总和就几乎与美国的人口相当。
数据来源：2010年人口普查

要治理像中国这样庞大的国家，仅靠中央政府来集中发号施令是远远不够的。实际上，各省都享有很大的自治权，这也是民族国家的特征之一。于是，在中央和各省之间实现复杂的权力平衡也是治理的重要内容之一。当然，最终权力还是集中在中央，这一点大家都认同，但这同时也常常意味着地方对中央只不过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罢了。各个省市虽然表态要严格贯彻中央的政策，但在实践中有时却把这些政策抛在了一边，对此中央政府也是心中明了。因此，尽管中国有着中央集权式的政府结构，但其实际运作方式却更像联邦制。比如某些经济政策的实施方面和社会秩序的维护方面皆是如此：

中央政府希望各省管好自家事，不要让本省的任何麻烦波及其他省市。要阐明中央政府和各省市政府之间的关系，最根本的就是明白下面这一事实：在西方，政治上的分歧通常都是围绕着“发展”这个主题产生的，保守派和现代派就总是在这个问题上意见相左；但在中国，争论的焦点变成了要中央集权还是地方分权。是否允许媒体拥有更大的话语权，是扩大还是限制各省的自治权，这才是最牵动中央政府神经的议题。正如上一章所提及的，邓小平提出的改革举措之一，就包括更多地给各地方政府放权，以此来进一步调动其积极性，发展经济。其结果就是从中央到地方的权力转移。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地方权力的扩大引起了中央政府的关注，最终很大一部分权力又再次收归中央。

民族国家的绝大多数民众，其生活通常具有相关性，但在中国却并非如此。在中国，某一地方所爆发的重要事件，可能对其他地方或中国这个整体影响甚微，甚至毫无影响。例如，1989年的动乱虽然在若干城市引发了动荡，但对于中国整体却并无太大影响。当然，也的确有一定的影响的存在，但中国实在是太大了、太复杂了，因此就普通民族国家的角度而言，所产生的反馈的确令人摸不着头脑，也无法预测。这也是为什么预测中国政治至今仍是一个难题的原因所在。这一点也有利于我们理解现代中国的领导人，如毛泽东和邓小平，之间的显著区别。在西方，连贯性、一致性被认为是领导人应具有的特征，然而中国的情况却恰恰相反：灵活被视为一种美德，实事求是地做出回应被视为领导人智慧的象征和权力的体现。不同领导人之间政策上的区别实际上正是中国庞大的规模和内部无数矛盾的反映。这也有实际的好处，领导人可以先在一些省份进行改革的试点实验，邓小平在实行改革开放时就是采取了此种办法。而这对大多数民族国家来说是根本不可能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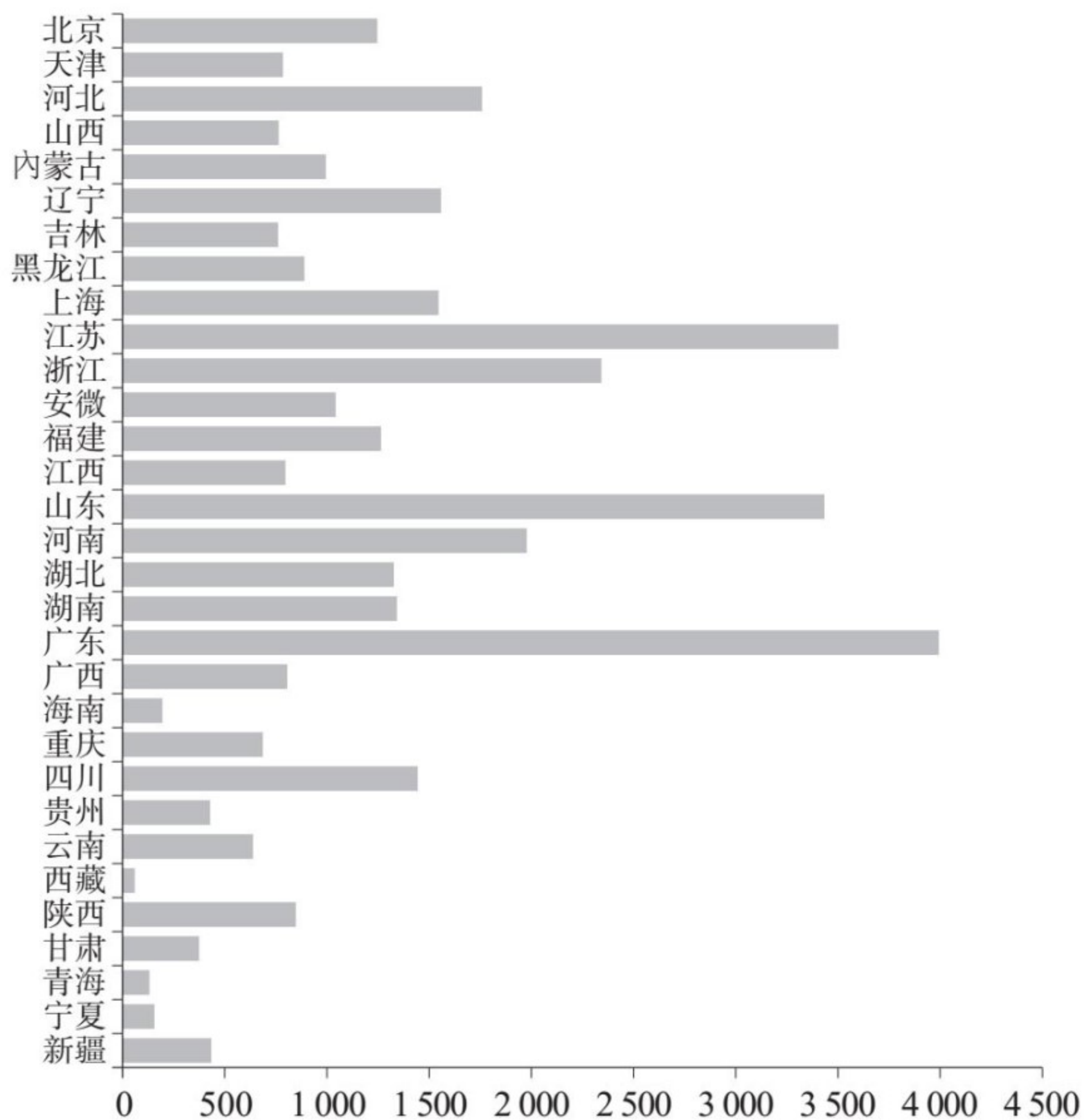


图6–1 2009年中国各省的GDP（单位：十亿元人民币）

数据来源：中国官方统计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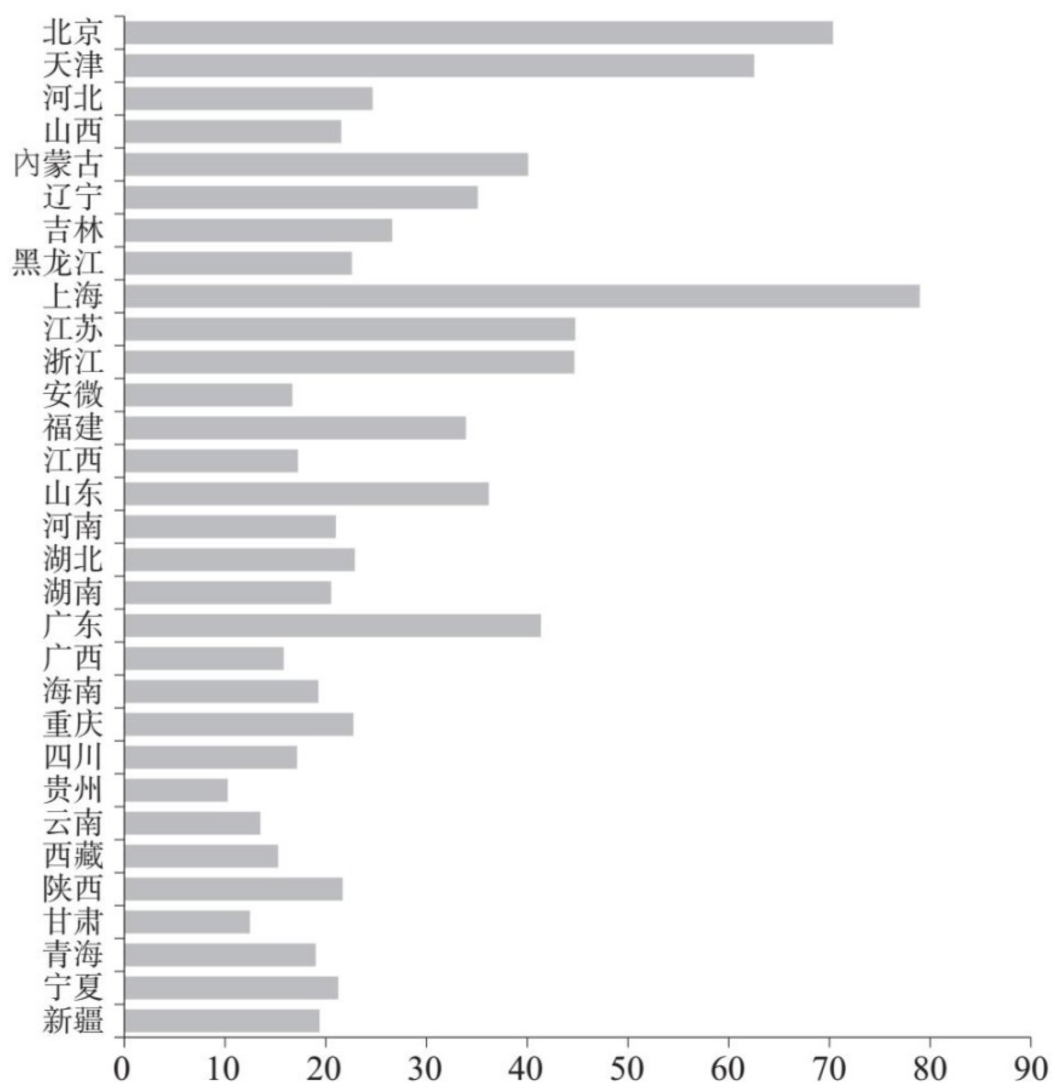


图6–2 2009年中国各省的人均GDP（单位：一千元人民币）

数据来源：中国官方统计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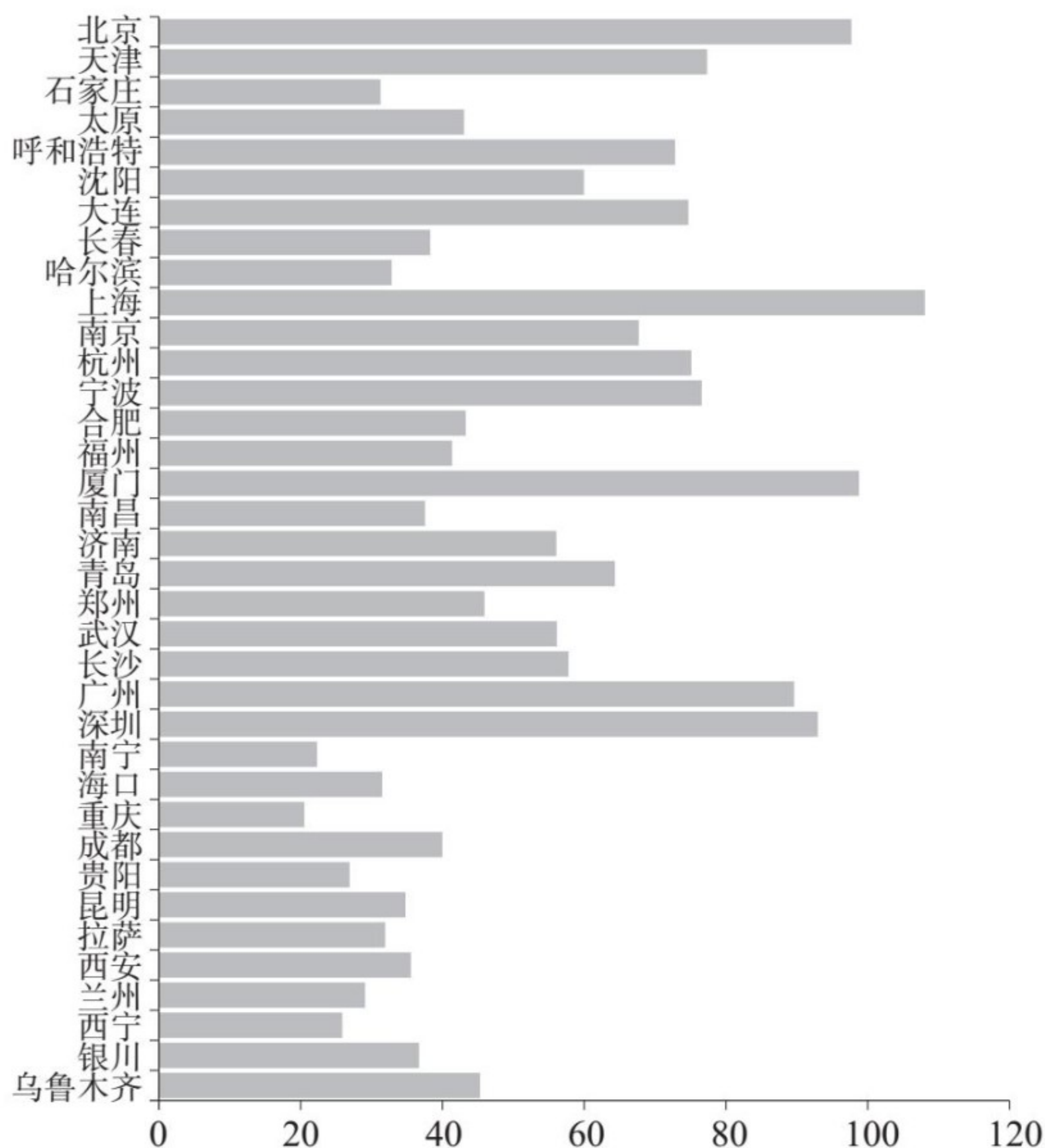


图6–3 2009年中国主要城市的人均GDP（单位：一千元人民币）

中国政治的本质

在所有关于中国的讨论当中，对中国政治的讨论是最欠缺的，在西方尤为如此。而任何这样的讨论又不可避免地带有价值评判的色彩。因为领导中国的是共产党政府，于是我们就自然而然地预设了所有主要问题的答案。这其实是冷战时期形成的思维定式，无助于我们

理解中国政治的本质以及当前中国的政治体制。在后冷战时代，中国已经为我们展现了这样一个有趣而无法预料的悖论：当欧洲的共产主义思潮进入尾声的时候，中国的共产党政府却在主导着一场人类历史上最不可思议的经济转型。就更为广义的层面而言，如果认为共产党的执政偏离了中国历史，从根本上打断了中国政治的延续性，那就完全错了。恰恰相反，尽管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发生了很多翻天覆地的变化，但相对而言，中国政治的许多基本特征和延续性却并没有受到多少影响。真要说有什么影响的话，那就是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政治特征似乎又得到了巩固和加强。关于中国政治的许多基本真理不仅适用于中国过去的历朝历代，也适用于今天共产党执政的中国。那么，中国政治到底具有什么样的基本特征呢？

在中国，政治通常被等同于政府，人们普遍认为政治是政府的事，而其他阶层的精英和普通民众却很少参与。这种情况在孔子生活的那个时代就已经如此，而在当今也依然未变。尽管毛泽东时常发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但这种运动基本上是工具性的，而不是互动的，即是自上而下，而不是自下而上的。孔子认为，不要让老百姓干预政事，这么做是有好处的，可以让政府官员遵照儒家所倡导的崇高的道德体系和理想来行事。虽然这些理念可能与西方的情感和传统相悖，但西方人依然不应将其忽略。因为人类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政治秩序正是按儒家倡导的体系构建的，其中的治理原则不仅被日本人、韩国人和越南人当作楷模并加以效仿，而且在19世纪上半叶，英国人和法国人也对其进行了仔细研究，甚至美国人也有所研究。儒家体系显然是一种精英文化的体系，但它还包含了一种非常重要的淘汰机制。中国皇帝是受天命来统治国家，但是，如果民怨四起，就可以认为是皇帝已失天命，就应该推翻其统治。

在中国，国家一直被认为处于整个社会结构的顶点，享有无上的主权；而在欧洲，政府的权力自古就受到其他权势的制约，比如教会、贵族以及新兴的商业阶层。事实上，欧洲政府一直以来都不得不

同其他权力集团或机构分享自己的权力。而在中国，这样的集团或机构在历史上（至少近1 000年来）要么不存在（比如中国就没有组织完备、权力强大的教会），要么就是社会地位比较低（比如古代的商人阶层）。不仅如此，在欧洲各种权威可以共存，这样的观点在古代中国也不符合道德规范。当然，中国历史上那些伟大的先师和知识分子堪堪被视为例外。尽管他们并非“居庙堂之高”，但在特定的情况下却能比那些大臣更具影响力。他们通常扮演文化传承者、传统文化的卫道士和民众福祉及民意代表的角色。在乱世，他们甚至被视为天意的代表和裁决人。在中国，为人所公认且真正重要的机制也就两个：政府与家庭。唯一被认可的利益是“公益”（天下的利益），而代表这一利益的就是遵守最高道德标准的政府，这种最高道德标准过去是孔子的儒家教义，在当代则是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当然，现实中的确存在不同利益，只不过这些利益在政治上并不被认可，并且也并不急于被认可。这些利益活跃于人们的视野之外，以个人行为的方式游说政府，并谋求对个人而不是对整个阶层或团体的支持，因为这样的支持可以给他们免除赋税或是带来某些有利条件。即便是商人阶层也是如此。在儒家体系中，商人位列末等，而在现实中，他们也从未试图去打破这种等级划分。商人的这种非政治传统一直延续至今。他们自视为政府的拥护者，而非谋求独立代表权的利益群体。这一状况在改革开放时期就如此，在回归后的香港更得以体现，那里的“商”已经成为“官”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论是在孔子的时代还是在当今中国，任何一种社会阶层都缺乏建立独立组织的传统。因此，在中国始终无法形成一个市民社会，特别是西方类型的市民社会，也就不足为奇了。也许这种情况以后会慢慢改变，但不论政治上出现何种改变，中国深厚的历史始终对当下影响深远。

从19世纪末至今，在围绕现代性而展开的争论和斗争当中，中国人始终力图以维持自身政治体系的基本特征为上。因此，相较于中国社会的其他任何领域，其政治体系更能抵御西方的影响，无论是封建王朝统治还是社会主义时期，皆是如此。而绝大多数其他发展中国家

则恰好相反，它们的政府常常与推动本国现代化的力量联系紧密，其领导人也通常接受过西方教育，比如印度的尼赫鲁家族。这种情况在中国则从未发生过。像毛泽东、邓小平这样的中国领导人，尽管对西方也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但却无法被打上“西方化”的印记。迄今为止，尽管中国的现代性进程已经如火如荼地进行了30年，但中国政治独树一帜生存下来的能力却并未有任何变化。这不仅让人刮目相看，同时也证明了中国的政治体系有着良好的适应性，在中国人的精神层面占有一席之地。

极为重视道德教诲和道德榜样的作用，这是中国的政治传统。在古代，要走上仕途必须通过科举考试，考试的主要内容就是儒家思想。公职人员也应遵守那些最高道德标准，并向其而非向不同的利益集团或者人民大众负责。在现代中国，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取代了儒家思想成为指导思想，模范代表是当年长征的红军和后来劳动大军中的英雄人物。在中国，不仅政府将这些道德标准奉为行为准则，人们也深信，家庭和学校教育这两方面在儿童的教育和塑造上占有重要地位。不论以何种文化标准来评价，独具特色的中国家庭实际上都发挥了极为重要的社会化作用。正是在家庭中，孩子知道了什么叫作权威，因为父母之命——传统上应是父命——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且绝不能受到挑战。通过家庭生活，孩子开始明白社会等级的重要性，并意识到自己在这个等级体系中所处的位置。在理解了孝道（中国文化比其他任何文化都更重视孝道）、羞耻感以及对颜面尽失的恐惧后，孩子才懂得自律。在特定的“耻感”文化中——而非基督教社会的“赎罪”文化——中国孩子最怕的就是丢面子。在中国，“家”和“国”是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的。所以，中文里的“国家”有时也写作“家国”，这不无道理。正如黄平所言，在中国，“许多人都认为国是家的扩展”。

西方将“人民主权”的理念作为政治核心，而这一理念在中国很大程度上却仍处于缺失的状态。“民族国家”这个概念在19世纪中叶

到末叶才从欧洲传入中国，随后中国的一些精英分子也深受欧洲民族主义的影响。然而，中国和欧洲在对国家主权的解读上却有着根本差别。欧洲的民族主义认为，民族主权是和人民主权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在中国，这两个概念却被分割开来。一方面，国家主权被赋予了最高意义；另一方面，人民主权又被国家主权替代。这一点不足为奇。其一，正如上文所提及，中国历来有着浓厚的国家主权传统，而非人民主权；其二，中国的民族国家意识，形成于中国受到西方列强和日本侵略的时期。在这样的条件下，最重要的自然是维护民族主权，而非人民主权。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其诞生的环境全然不同于欧洲的民族国家。在民族主权上，那些欧洲国家从来没有受到欧洲大陆之外的巨大威胁。反观中国——欧洲之外的国家或多或少都是如此——则在19世纪以及20世纪初处于外来的重重危机之中。正是由于受到殖民主义的威胁，中国那持久而深刻的国家情结便顺理成章地得到了巩固和加强。帝国主义外患，加上国内的政治传统，使得中国在形成民族国家的过程中同时将国家主权和民族主权这两个概念结合起来。

中国政治最根本的特征之一就是将国家统一置于首位。迄今为止这仍然是中国政治的主要话题。追根溯源，这并非是在中国成为民族国家之后的短期内形成的，而是根植于中国文化之中。中国在历史上饱经分裂和战乱的痛苦，所以格外珍视统一。对于什么是祖国和统一的本质，中国人是从文化上理解的。因此，中国政府高度重视香港、澳门的回归及台湾的统一，即便其中有些领土是由中国拱手相让的（香港和澳门就是如此）。如何看待这些领土的归属，所依据的只是“中国性”这个极为重要的、已经持续了至少两千年的概念。具体来说，就是所有中国人都是中华文明的一部分，中国的全部领土也是中华文明的一部分。如何选择从来就不是个问题。

中国格外强调政治稳定。正如上一章所提及的，邓小平高度重视政治的稳定，他指出：“中国要实现自己的发展目标，必不可少的条

件是和平的国际环境和安定的国内环境……中国发展的关键，就是要有一个安定的政治环境。”这一点与孔子的思想颇为类似。此外，普通民众也格外重视政治的稳定。不久前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社会稳定在民众最关心的问题当中位列第二，这一排名比在其他任何国家都要高得多。在中国人的心里，稳定与社会秩序要比个人和政治自由重要得多。只要看一看中国的历史，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稳定会受到如此关注。历史上，中国曾频频出现混乱和不稳定的局面，且常常生灵涂炭，包括战争导致的直接死亡，以及随后的饥荒和疾病导致的间接死亡。据估算，13世纪蒙古人推翻宋朝，中国损失了大约1/3的人口（约3 500万人死亡）；17世纪满族人入关时，中国损失了近1/6的人口（约2 500万人死亡）；19世纪上半叶的农民起义（包括太平天国运动），使当时的人口骤减5 000万。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的统治，但随后动荡和内战不断，只是从20世纪20年代末期到日本侵华这段时间内出现了短暂的相对平静。抗日战争胜利后，接踵而至的又是解放战争，直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有了这一系列的历史事件做铺垫，再来看中国人对分裂、不稳定以及社会动荡万分恐惧，也就不足为奇了，尽管分裂、动荡、统一都是中国历史的常态。而在欧洲，类似中国人这样对和平稳定的渴望最近一次出现则是在1945年之后。当时“二战”刚结束，整个欧洲大陆都渴求欧洲国家间不要再发生任何战争。虽然中国以流血牺牲的方式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也许就是让如此大的疆域统一在同一个国家之下的必然成本。然而，欧洲也付出了类似的代价，换来的却是国家间激烈的竞争以及欧洲大陆认同与凝聚力的缺失。

中国与民主

对西方人来说，评价一个国家政治的好坏、治理水平的高低，就是看这个国家是否有民主制度，而民主的标准就是看民众是否有普选

权，以及该国是否存在多党制。实际上，这是一个十分狭隘、片面的视角。民主只是衡量一个国家治理本质和质量的众多标准中的一个。以意大利为例，就选举的频率而言，几乎少有国家能与其相提并论：意大利总是在投票。然而其治理却仍很薄弱，因为在民众的眼中，国家缺乏基本的合法性。自“二战”后成立现代的共和政府以来，意大利举行了无数次的选举，却无法改变国家的态势。意大利政府之所以丧失了合法性是因为在民众的眼中其并非是民众的代言人，而是一个与己无关的机构，其权威可以被颠覆、忽略或侵蚀。造成这一状态的原因在于“复兴运动”本身的缺陷。“复兴运动”是指19世纪末意大利为争取统一进行的一次思想文化运动。然而，“复兴运动”并未能创造出一个成功超越、克服各地区分歧的国家，意大利的统一只是部分成功和在形式上完成了。结果就是，自1994年至今，贝卢斯科尼这样一个公然无耻地以国家公器为私人牟利工具的人，居然多次当选为意大利总理。有一半的选民之所以认为贝卢斯科尼的行为可以接受，是因为他们与贝卢斯科尼的国家观念具有不同程度的相似性。

我们再将目光投向中国，对中国治理的本质进行考量。毫无疑问，以西方的视角而言，中国实行的绝非民主政治。然而，中国政府却远比西方国家政府具有更多的合法性。对于中国人对中国政府的敬畏与尊重，西方人几乎并不理解。而这种敬畏与尊重的原因明显与民主无关。换言之，一个国家的合法性不能简化为是否民主。恰恰相反，民主并非是国家合法性的最重要因素，或许正如中国的情况所表明的，民主并没有那么重要。正如上文所提及，中国政府之所以具有合法性的深层次原因在于中国民众将政府视为中国文化的化身和捍卫者，因此政府具有某种程度上的精神意义。而如果国家出现了分裂，那么政府的合法性就会受到损害。因此，中国民众对待政府的态度与西方截然不同。对于西方民众来说，政府是一个外来者，一个局外人，甚至是一个干涉者，必须要对其进行限制。这一情况在美国最为明显，例如“茶党”成员甚至认为政府是与自己格格不入的。即便在欧洲，不少人对政府也多多少少持有怀疑的态度。与之相反，在中

国，政府与社会并不矛盾，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体的：民众与政府的关系较为密切，对待政府就像对待家庭中的一员，当然并非普通一员，而是家长。而且与西方不同，在过去的一千多年里，政府的权威并没有遭遇任何严峻的挑战。因此，对于中国政府权威的理解，必须在以上的背景下展开。在此之后，我们才能讨论民主，西方意义上的民主在中国的未来。

过去50年来，自诩实行这样或那样的民主制度的国家不断增加。但是，在许多重要地区，尤其是中东、非洲、中亚，当然还有中国，仍然少有民主的身影，至少在现实中如此。如果条件成熟，而且本国文化有民主的根基，那么某种形式的民主制度仍然为人们所向往，这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如果民主只是外来的移植物——比如像伊拉克的情况，民主是由英美联军荷枪实弹地强加而来的——那么这强加的民主所造成的代价比它带来的好处就会高昂得多，不论这代价是反抗、民族冲突还是其他任何形式。民主不应是抽象的概念，不能脱离历史和文化，也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因为如果缺乏相应的环境，民主不但不会奏效，甚至还会带来灾难。民主必须自己慢慢地成长，而不应是强加的。民主也不是衡量一个国家治理水平的最为重要的标准。尤其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同民主建设相比，发展经济、维持民族和睦（对于多民族国家来说）、减少腐败、维护社会秩序和稳定的能力，至少应被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不同的社会所处的环境和发展水平各有差异，都有各自的轻重缓急，因此，民主也应放在恰当的历史和发展大环境中来考量。

事实上，几乎没有哪个国家的民主进程（西方意义上的民主）与经济腾飞是同步进行的。英国工业革命发生在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然而直至1850年，也只有大概1/5的英国男性拥有选举权；直至19世纪80年代，英国的绝大部分男性才获得了选举权；英国30周岁以上的女性获得选举权，则是在1918年，也就是工业革命之后130多年的事。其他西欧国家的情况也都大同小异，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其实都是比

较缺乏民主的。实际上，在工业革命时代的欧洲，最普遍的政体就是君主专制和君主立宪。美国的情况则较为不同。1860年，大部分美国白人男性都已拥有了选举权，但绝大多数黑人实际上都没有。美国黑人直到1965年才获得选举权，而美国女性赢得选举权则是在1920年。这也就是说，在美国经济的腾飞时期，只有一少部分人才有选举权。再来看日本，日本到了1925年才引入男性普选权，之前正好是明治维新后日本经济开始高速发展的时期。综上所述，除了拥有特权的很小一部分人之外，选举权在这些发达国家得以普及都是工业革命已经完成之后的事（只有美国白人男性勉强还算个例外）。此外，欧洲列强也从未允许其任何殖民地的人民拥有选举权。尽管选举投票在这些宗主国早已被广为接受，但他们却认为，要在其众多殖民地实行选举投票仍然不合时宜。唯一的例外是英联邦内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所谓的“自治领”。这些自治领的民族和种族构成与英国相似，因此英国才在这些地区施行了相对宽松的政策。直至“二战”结束后，殖民地国家纷纷获得独立，才终于得以选择自己的政治制度。因此，西方坚持认为的不论一国的经济发展程度如何，民主总是可行的说法，显然是虚伪的。

民主治国如今在发达国家已经极为普遍了，但它们的经济腾飞却是在100年或者更早之前完成的。相对而言，各发展中国家的民主程度存在着极大差异，这也是预料之中的事。大体而言，民主在发展中国家并未普及，或说得好听一点儿，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陷。东亚地区基本上采取了与西方发达国家类似的“先经济后民主”的模式。比如日本在经济腾飞之前根本没有什么普选权。亚洲四小龙——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以及新加坡，没有一个是在民主环境中实现经济腾飞的。当时，韩国和中国台湾实行的都是军事独裁统治（尽管统治者较有远见）；作为英国殖民地的中国香港也没有民主；而新加坡实行的则是高度的威权和管制下的民主。这四个国家和地区的成就都得益于各自高效且颇具战略眼光的政府管理。这些发展型国家和地区的政府执政的合法性并不是来自人民的授权，而是因为政府有能力实现经

济的高速增长并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如今，这四个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水平和生活标准都已和西欧某些地区持平。香港在1997年回归中国后已经获得了少许民主权利；新加坡依然是集权统治；韩国和中国台湾则都实行了普选制和多党制。这几个国家和地区再加上日本的经历都已证明，提高工业化程度以及发展经济，通常可以为民主的发展提供更多的有利条件。

就此而言，人们也许会产生这样的误解，认为今天的中国应该而且已经做好了准备，差不多一夜之间就可以变为建立在普选基础上的多党制民主国家。然而，中国的工业化之路才刚刚走了一半，仍有一半以上的人口生活、工作在农村。的确，印度目前的发展水平远不如中国，却拥有其历史上最好的民主制度。但印度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例外。印度尼西亚则又是一个有趣的案例。尽管印尼是一个多样化的群岛国家，但现在却建立起了一个脆弱的民主制度。国家在经济腾飞阶段无须过多考虑民主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工业革命本身具有内生的威权特征——为了实现某个单一目标，需要将所有社会资源都调动起来。从历史经验来看，人们已经有所准备，对这种需求也表现出了宽容，因为人们最关心的是如何摆脱贫困、养家糊口。人们的这种心态在某种意义上也反映出了政府的态度。于是，政治集权主义与日常生活中的集权、强制环境相辅相成，民众实际上也无从选择。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经济高速发展的阶段一般都以集权而不是民主为特征。很多人都认为，目前中国尚不存在对民主的内在需求，也就是说，民主化暂时还提不上日程。苏联解体后的动荡以及印尼、中国台湾、菲律宾和印度在民主化之后的困境，所有的一切都让大多数中国人更加深信：民主并不是最迫切的需求，相反，它很可能会对保持经济增长这一主要任务造成干扰。在这样的背景下，甚至有人隐隐担心，朝着民主化迈出的任何一步都会将中国卷入巨大的混乱和骚乱。这也是为何民主未能获得绝大多数中国人支持的原因所在。

对于西方那些认为民主乃重中之重的“极端民主派”来说，这种观点肯定难以苟同。季礼（Bruce Gilley）就是其中之一。在中国和俄罗斯之间，他更看好后者的前景，至少是长远的前景。原因就在于，俄罗斯已经解决了民主方面的问题。然而，考虑到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速度要高得多，而俄罗斯的民主制又并非那么稳固，那么季礼的判断就显得过于武断了。季礼还指出：“关于强制投票、公平竞选、政治黑金、司法审查等等方面的争论将成为主导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性’议题。”诚然，这些问题在西方国家都很重要。但对于饱受西方金融危机和单一超级大国困扰，还需应对中国乃至印度崛起所带来的影响的整个世界来说，对于种族冲突缠身的民族国家来说，对于那些倾尽全力致力于经济发展的国家来说，认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主旋律就是事事围着民主转的观点，只不过是将西方狭隘的心态暴露无遗。

虽然尚无迹象表明中国已经面临推进西方式民主的压力，但中央和各省市层面，责任政府的需求却在不断增加。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看待中国的民主问题呢？中国的经济腾飞差不多才刚刚完成了一半。即便再发展20年，届时仍将有20%以上的人口生活、工作在农村。即使不确定因素依然很多，但鉴于中国经济仍有希望继续以相对较快的速度增长，且政局也大体稳定，那么我们就有理由相信，中国的民主化程度在这段时间内会有显著提高，速度甚至还会超过预期。以发展的眼光来看，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将会比亚洲四小龙以及西方国家更快。中国的政治传统既不认同也不追求民主。在中国，几乎没有民众问责的传统，同时人民主权的地位又被置于国家主权之下，因此，政府实际上只对自己负责，遵循的也只是某些道德标准。这也体现在支配政府政治行为的核心价值取向上，即“真诚、忠诚、可靠、坚定”。而所有这些价值取向其实都源于儒家思想以及共产主义思想（虽然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相对较小）。相比之下，西方的核心政治价值观则是“责任、代表、参与”。此外，中国自古就没有独立组织的传统，甚至连市民社会的观念都相当淡薄。国家拥有绝对的权力。各个利益集

团不是在寻求代表各自群体的集体利益，而是通过个人游说以及获得国家认同的方式来表达各自的诉求。利益集团并不会和国家提要求、搞对抗，而更愿意以个人名义依附于国家权力。

在世界范围内，民主从来就是、现在也仍然是民族国家的专利。然而，中国幅员辽阔、多样性突出，实际上是一个大陆体系，这就让民主问题大大复杂化了。世上根本没有什么按民主原则建立起来的多边、地区性或国际组织。如果说这些组织能够具有那么一点儿代表性，也是因为作为其成员国的各民族国家实行了民主制。欧盟就是一个典范，要不是成员国都是民主国家，欧盟本身也不会采纳民主制。即便欧盟议会是通过选举产生的，但它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处于毫无实权的状态。而民主制度之所以能在印度这个同样幅员辽阔的国家得以实行，原因之一就是印度与中国相比，组织更松散，中央集权程度也没那么高，印度的各个邦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以民族国家的方式行事。

中国的情况则截然不同。几千年来，中国都以其高度集权、整齐划一的制度而自豪，尽管在实践中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存在一定的分权。因此，即便中国东部和南部沿海的一些发达省份已经准备好接纳更为民主开明的制度，但由于中国绝大部分地区的发展水平相对低得多，前者的民主化之路就必然受到制约。不过也存在这样的可能性，即深圳和上海等比较发达的城市在中央的支持下先于其他地区推行民主改革。2008年，深圳市市长曾表示，未来该市70%的城市居委会和村民委员会领导班子将由直接选举产生。自2009年以来，中国已经逐渐放松了对慈善团体、商会等社团活动的限制，允许其无须在政府官员的监管下直接注册，允许其在国内和海外寻求私人资助，甚至还可以雇用外国雇员。目前，中国已经有3 500余家非政府组织。同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在2007年年底颁布法令，将在2017年实现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的直选；目前，半数以上的立法委员会成员是通过选举产生的。这样一个举措也符合“一国两制”的精神和多种体系并存的文明国家的传统。

此外，我们应牢记于心的是，中国是儒家思想和体系的发源地，其对儒家思想的体验远比日本和韩国丰富、严格。对日本和韩国而言，儒家思想只是从中国引入的外来物，因此其影响并不像在中国这样深远。因此，日本和韩国更容易接纳民主思想，民主制可以在这些国家与儒家思想体系共存，对其而言，只不过披上了一层政治的外衣。但中国却很难采取这样的做法，因为中国的儒家印记实在是太深了。

从长远来看，中国无法再继续抵制民主化的进程，因为随着中国的社会构成日益复杂和多元化，经济实力日益增强，民主也在逐渐成为一种内在需求。那么中国的民主将会是什么样呢，这是个有意思的话题。关于民主，在西方有一种“一刀切”的观点，影响广泛。但事实上，由于各国在历史、传统以及文化上的差异，其民主形式也千差万别。因此，除了欧洲中心论一说，再没有别的理由相信，曾经造就了欧洲社会（包括像美国这样发端于欧洲的国家）以及欧洲民主制度的那些特定条件，无论如何都会在世界其他地方建立起同样的民主社会。

日本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日本明显具有我们早已司空见惯的某些西方民主标志，如普选制和多党制，这并不奇怪，因为日本在“二战”中战败后，事实上是美国制定了日本的战后宪法。但历史随即证明，日本的民主制度在现实中和设想的完全是两回事。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直至1999年，自民党几乎一直连续执政，而其他党派除了偶尔和自民党组成联合政府之外，几乎总是处于在野党的位置。其拥有的权力和在日本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甚至还不如自民党的各个派别。即便民主党在选举中击败了自民党，但看看其到底掌权了多久，就可以知道以上言论的真实性。此外，正如卡雷尔·范·沃尔费伦（Karel van Wolferen）所指出，掌握大部分实权的其实是各类公务人员，而不是政府本身，在某些政府部门里尤其如此。换言之，实权大多掌握在工作稳定的公务员阶层，而不是由选举产生的历届政府。再比如，

日本内阁很少召开民主讨论会议，即使偶尔为之也不过是走走过场。民主党上台后虽发誓要改变官僚阶层掌握大权的现状，但最终却以失败告终。当然，鉴于历史和传统的重要影响，这不足为奇。尽管日本实行了西式的民主，但国家主权却仍高居于人民主权之上。在这样的背景下，选举和人民主权的意义自然要比在西方小得多。所以，在日本，权力不仅体现了社会等级分明的特点，还体现出儒家思想的影响；权力的归属是一成不变的，受选举的影响并不大。

在中国，不论演变出何种民主政治制度，它都将深深打上儒家思想的印记。相对而言，要评价共产主义对中国的长远影响就更为困难了，因为共产主义的历史尚短。然而，共产主义和儒家思想之间的确存在某些重要的延续性。比如，一国应该有一个领导阶层，二者在这一点上惊人地相似。在东北亚的一些国家和地区（日本、韩国、越南、中国台湾），儒家传统的重要影响至今仍清晰可见，如重视教育、家庭的结构、官僚体制的核心作用及强调和谐等。新中国建国之后，儒家思想的影响一度有所减弱，但自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儒家思想在中国的影响有所回升。这其中固然有政府推动的作用，但与儒家思想本身的复兴也密不可分。发表在《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曾指出，为了发展市场经济，有必要“法治与德治并举”。儒家思想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2007年3月，时任中国总理温家宝表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有它的许多珍贵品质，许多人民性和民主性的好东西。比如，强调仁爱、强调群体、强调和而不同、强调天下为公。”在河南省，基于儒家传统价值观念的“尊老爱幼”和“家庭和睦”被纳入了对党政领导干部的考核范围；中学也重新开设儒学课程，每年则又开始举办庆典纪念孔子诞辰。在实际层面，共产党则又开始强调党员干部对其所代表的人民的责任与义务（即“三个代表”）。对党员干部的教育则强调不能仅唯领导是从，更重要的是，他们要更注重倾听民声。这些新理念在官员因处理汶川大地震和三聚氰胺牛奶事件不力的公开道歉和辞职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相比之下，日本政府领导人和公司老板的反应

则要逊色得多。此外，中国将其在世界各地开设的传播中国语言和文化的中心命名为孔子学院，此举更是意味深长。

在中国这样一个儒家思想和理念具有重要影响的国家中，儒家思想的逐渐复兴应该是意料之中的。可以认为，总体而言，马克思主义那些在中国最具影响的原则，正是那些与儒家传统最相吻合的内容，如自我批评（体现了儒家的自省思想）、领导者应该是道德表率和工人阶级先锋队的理念。同理，那些在中国遭遇困境的马克思主义理念，也正是与儒家思想最相抵触的内容。即便是中国领导人染发的习惯也能够从孟子的思想中找到根源。孟子认为，白发者（年长者）应该得到照顾，而非从事繁重的劳动。最重要的是，儒家思想仍蕴涵在中国文化之中：孝敬父母这一点至今仍为中国人广为实践和认可，法律甚至明文规定子女有赡养老人的义务。在中国的餐馆中，我们经常能看到这样典型的一幕，一大家子人围坐一起吃饭，饭店中随处可见的大圆桌无疑正体现了这一习俗。

儒家思想不应被看作一成不变的学说，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儒家思想本身也经历了数次变化和发展。同所有哲学思想和宗教信仰一样，儒家思想长青的秘诀也在于其能够与时俱进，不断适应新环境和新时代。儒家思想包容并蓄的传统无疑提高了其灵活性和适应性。最好的例子就是宋代的新儒学曾吸收了在当时盛极一时的佛教和道教的思想。另外，认为儒学完全排斥民主思想，这样的观点也是大错特错的。比如1911年辛亥革命的领导者、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孙中山先生就曾经说过：“我辈之三民主义[注]首渊源于孟子，更基于程伊川[注]之说。孟子实为我等民主主义之鼻祖。”儒家认为，如果君王的统治不得民心，那么民众就可以起来反抗，这也是遵“天命”。相对于欧洲的“君权神授”来说，儒家的“天命论”显得民主得多。此外，儒家还主张君王的统治要靠道德教化，要施仁政，为政以德；此外，社会的不同等级在一定程度上也需要互惠互利，其实也正道出了隐含的权利和义务。政府应该赋予社会较大的自由度和独立性。这种独立性不

应仅限于经济领域，在很多重要的方面也皆是如此。中国在发展市场经济的初期历史正是其真实写照。尽管中国的市民社会仍相当薄弱，但中国却具有深厚的民间社会的传统，或者说乡土文化。中国的乡土文化所包含的各种习俗及其相应的支撑体系，已经有着数千年的悠久历史，时至今日仍代表着政府之外的一个重要的自治领域。综上所述，儒家思想虽然理所当然地为威权体系提供了支持和帮助，但其本身也蕴含着民主、民权的元素。

需要强调的是，在中国，任何的民主制度都将不可避免地带有明显的儒家文化特点。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如：政府及官僚阶层的核心作用；家庭及以家庭为基础的、更为扩展的社会网络（如家族）的核心地位（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政府在提供社会福利方面的某些负担）；人际关系的重要性；更倾向于通过调解而非诉讼来解决争端的儒家理念。这些都意味着，在中国（以及日本），法律和司法程序远不如在西方那样受到重视，而价值观和道德因素对人们的行为产生了重大影响。类似的、历史悠久的价值体系一直在深深地影响着社会的运作方式。和日本、韩国一样，中国对公共秩序的理解与西方普遍认同的某些标准大相径庭。因此，这些国家的犯罪率才会大大低于西方。事实上，这些历史悠久的社会传统无疑还有助于中国以及其他东亚国家适应全球化和现代化带来的潮起潮落，客观上发挥了减震器的作用。

虽然中国的民主与其他国家的民主一样，具有某些普适性的特征，但其也必然是独具特色，具有强烈的中国社会特征和历史传统特色。最为重要的是，中国的民主必然将国家主权置于人民主权之上，正如日本一样，但就历史经验来看，其程度要远比日本深得多。换言之，相较于民众，政府将处于优势地位，因为民众坚信理应如此。鉴于儒家思想和共产主义的文化背景，以及治理这样一个庞大国家的迫切需求，中国在发展民主的过程中将需要大量独到的创新。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拥有世界上最古老、最为成熟的治国之道的国家，我们有理

由相信，类似的创新是完全有可能出现的。同时，我们也认为，中国的民主化绝不是短期内就可以完成的。此外，国家治理的创新并非“单行线”。一方面，对于治理这样一个庞大的国家，中国可以借鉴美国的联邦制和欧盟的经验；另一方面，作为拥有世界1/5人口和世界上最为称职的政府的大国，中国也可以为其他国家提供大规模治理的经验，而这一点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显得越发重要。

共产党的领导

苏联解体和当时中国国内出现的动荡，曾经令西方的观察家们坚信，中国共产党也即将面临与苏共同样的命运。然而，他们大错特错了。与日益瘫痪、僵化的苏共不同，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表现出了极大的创造力和灵活性，通过改革开放以及提高绝大多数人民的生活水平，来应对历史遗留下来的重重危机。于是，人们不再质疑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由于成功领导了整个国家的转型，中国共产党树立起了自己的威信。在这样的背景下，“感觉良好”与“感觉自信”的情绪在民众中应运而生。中国民众对其经济状况及中国政府经济能力的满意程度，远胜于其他任何国家，这不禁令人大吃一惊。中国共产党受到支持的原因及其合法性的本质，已经慢慢发生了改变：已不再主要是意识形态的作用，而越发来自中共保持国民经济增长、提高治理质量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已经开始表现得类似于其他东亚发展型国家，尽管正如在前文中所探讨的，东亚发展性政府的权威性在本质上也源于本身的文化。目前来说，虽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发展正面临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我们没有理由对中共的领导进行质疑。恰恰相反，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将比毛泽东去世后的任何时期都更为稳固。鉴于中共作为执政党取得的巨大成功，以及在过去的10年里每年平均有两千万人申请入党的事实（虽然每年只有200万人被批准入党），这样的预测就不足为奇了。尽

管仍有人呼吁进行激进的变革，但毕竟只是少数，且局势均在中共的掌握之中。

表6–2 民众对本国经济情况的满意度

	2002 年	2007 年	2008 年	2009 年
满意率	%	%	%	%
波兰	7	36	52	29
肯尼亚	7	60	—	19
德国	27	63	53	28
俄罗斯	13	38	52	20
韩国	20	8	7	5
尼日利亚	32	37	41	23
土耳其	14	46	21	24
英国	65	69	30	11
美国	46	50	20	17
阿根廷	1	45	23	20
中国	52	82	82	88
印度尼西亚	15	23	20	48
黎巴嫩	5	9	10	11
日本	6	28	13	10
西班牙	—	65	35	13
法国	45	30	19	14
约旦	33	44	39	33

巴基斯坦	49	59	41	22
墨西哥	31	51	36	30
埃及	—	53	44	27
印度	39	74	62	73
巴西	—	—	—	—

资料来源：皮尤研究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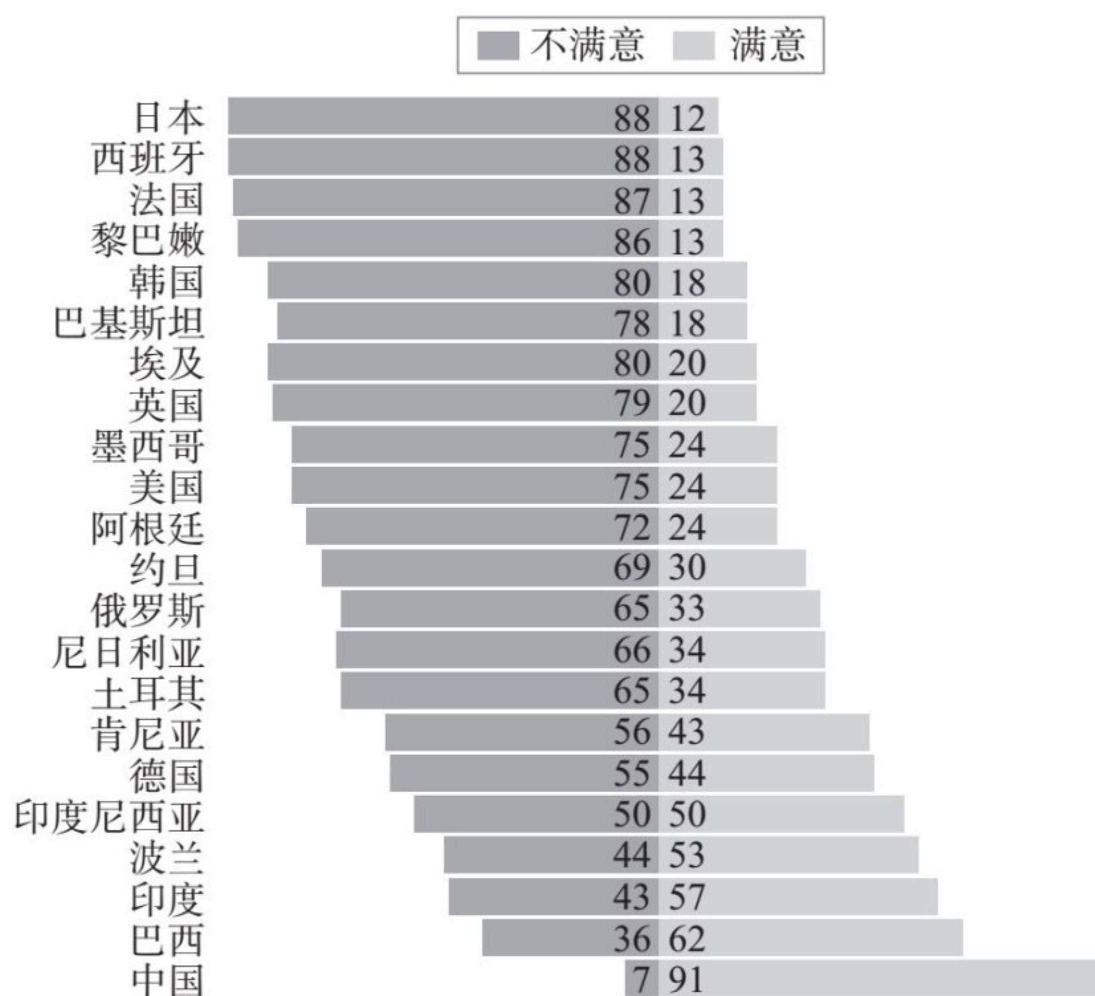


图6–4 民众如何看待当前本国的经济形势（2010年）

数据来源：皮尤研究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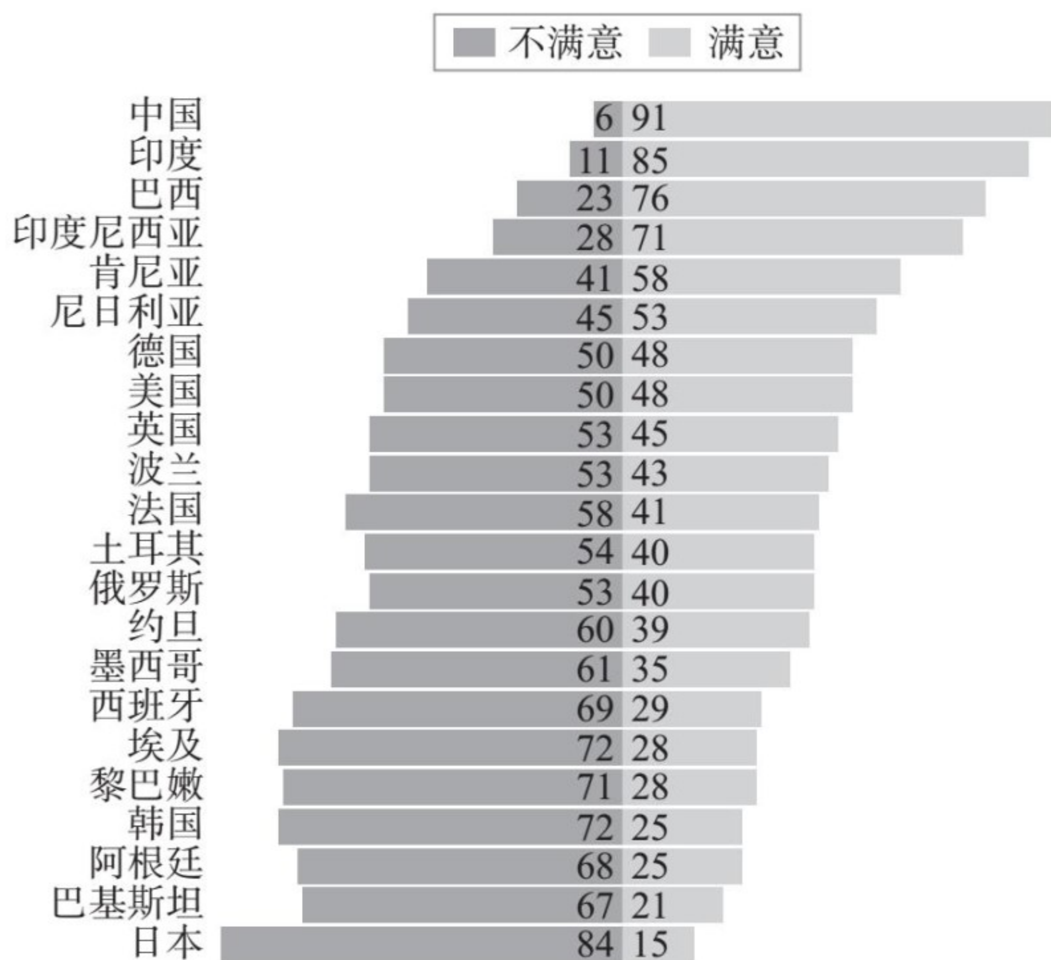


图6–5 对政府经济能力的满意度（2010年）

数据来源：皮尤研究中心

如果说中国的改革以推行大胆的经济政策为一大特色，那么另一个显著的特色就是中国在政治改革上的相对谨慎。这么说绝不是要贬低中国的政治改革，中国政府已经采取了全面而深远的改革举措，特别是在1982、1988、1993和1998这4年。在中国绝大多数行政村以及某些乡镇，差额选举已经逐渐得到推广。例如在广东和福建两省，甚至已经开始试点市级的差额选举。另外，公务员改革也稳步推进，中央政府也逐渐将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全国和地方人民代表大会的作用也有一定加强……在经济发展的推动下，法制的趋势日渐明显，但离“法治”（法律不受政府的干扰）的目标仍相距甚远。有一位中国专

家就曾说过，“法治”在中国只有10%~20%的适用度。鉴于法治要求中国共产党要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行使权力，法治的真正全面实现仍旧是任重而道远。然而，某些程序在中国已经实现了制度化，比如国家主席最多只能连任两届。军方与政府的关系也实现了正常化。

与改革前相比，中国对待公开讨论及严厉批评的政治宽容度明显提高。尽管中国政府对网络进行了巧妙的监管，但互联网已经成为最重要的公众辩论平台，其尺度远远超过其他传统媒体。此外，党内也进行了重大改革，规定领导人到了年龄必须退休，而不再是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2002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16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实现了权力的有序交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将权力移交给了继任者胡锦涛。在某些省份，党代表的差额选举工作也已展开。另外，中国共产党还扩大了党员的范围，特别是根据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理论，吸纳私营企业家为中共党员。包括最高层在内的中共各级领导在专业化水平和受教育程度上也超过了以往，党员干部受到了更好的培训，甚至还为党员开设了MBA（工商管理硕士）式的学院。此外，知识分子也以更为公开、系统的方式参与到高层的决策讨论之中。

中国的政治改革采取的是缓慢、渐进的方式。和经济改革不同，中国的政治改革从来就不是以深度的、系统化的改革为目标，也不是为了建立西式民主制度。在2005年发布的《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中，中国政府明确指出西式民主既不符合中国的传统，也不符合当前的实际需要。中国政治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实现政治和行政过程的现代化、程序化，是为了在保持政治稳定的同时提高效率。例如，村级直选的目的是为了提高治理水平和运作效率，而不是要启动任何民主进程。另一方面，中国在民主和人权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香港媒体和舆论一直十分关注中国大陆相关方面的动态，近年来其对大陆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日益给予了积极评价。中国现在的言论自由和行动自由有了很大的提升，只要不触及核心敏感问题的底线。互联网在这

一方面体现得尤为明显，虽然中国仍然对互联网进行监管，但在网络上几乎可以就所有问题进行广泛、坦率的探讨。

与此同时，对官员行为问责的压力也与日俱增。根据公安部的统计，2006年，中国共发生了9万余起群体性事件（包括示威、罢工、占领、骚乱等）。据北京的一家学术机构估计，2010年，中国群体性事件的数量已经上升至18万起。其中相当一部分都是与农民的土地问题有关。开发商和当地政府进行私下交易，最终受损的是农民的利益，得益的却是腐败的官员。尽管这些案件一般都与国家主管机关无关，但面对民众日益的不满，中央政府下大力气去维护农民的土地权益。2008年10月，中国政府推出了一揽子改革举措，加强了农民的权力，允许其流转土地承包权，这一改革实际上使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得到了进一步保障。与此相类似，为改善劳动条件，中国政府于2008年颁布了新劳动法，提高了工会的作用，使投资方解雇工人或大量使用临时工变得越发困难。新劳动法已经明显提高了工人的待遇，改善了工人的工作条件。

在毛泽东时代，全社会都多少呈现出政治化的特点。“政治挂帅”这个由毛泽东本人提出的口号就恰如其分地总结了1976年之前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特点。当时，群众运动此起彼伏，尤其以“文革”为最。相比之下，在改革开放的岁月里，出现的则是持续的去政治化，并伴以意识形态的迅速淡化。这时，毛泽东时代高度政治化、颇具鲁莽特色的中国已经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更像是一个讲求专家治国、类似东亚其他发展型国家的中国，而政府的权力范围仍十分广泛，从计划生育、人口迁徙到历史课本、大小媒体，无所不包。随着中国共产党从意识形态治国到实用主义治国、从“政治挂帅”到专家治国的转变，党对民众生活的干预也越来越少。在党和民众之间事实上已经形成了一种新的社会契约——党的任务就是治理国家，而民众享有充分的自由去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民众对政治不再那么感兴趣，而是越来越多地退回到个人生活，享受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日益丰富的消费

品。同时，经济活动取代了政治，成为最重要且受人尊敬的社会活动形式，党内党外都是如此。因此，为了拉动经济的增长，一些政府官员也纷纷参与到商业活动中。对党员干部来说，衡量标准在某种程度上已不再是“政治上的忠诚”，而变成了能否促进经济大发展。这也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有可能导致对党的认同的下降、号召力丧失以及内部日渐腐化。

中国共产党越来越重视实现从一个革命组织到一个执政党的转变。为此，中共现在着重强调专业能力、创业精神和知识水平，而此前，中共更为注重的是革命资历、军事成就以及阶级背景。如今，党的领导层已不再是当年的革命家，而是一批讲求专家治国的精英。在过去20年里，中共领导层在社会构成上有了极大的变化。1982~1997年，在所有中共中央委员当中，受过大学教育的委员所占比例从55.4%上升到92.4%。截至1997年，当时的7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都有大学理工科专业背景，拥有工程、地质、物理等专业的学位；在24名政治局委员当中，有18名受过大学教育。同时，为了扩大党的代表性，鼓励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中国共产党还向民营企业家敞开了大门。截至2000年，已经有20%的民营企业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民企老板积极入党，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据统计，在1995年，半数以上的民营企业家就出自党员和政府官员。大量党员和政府官员投身私营经济，这也成为导致腐败激增的最主要诱因，因为他们可以利用自己掌握的知识和社会关系来侵吞国有资产、获取银行贷款来中饱私囊。腐败问题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一大挑战，如果不加制止，将会动摇中国共产党的道德地位和执政的合法性。然而，即使中国共产党高调开展了一系列重大反腐行动，甚至连前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也因此落马，但种种迹象表明，腐败问题仍然严重，前景不容乐观。究其根源，腐败源自中国共产党的内部以及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的社会结构也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从长期来看，这必将对政治造成深远的影响。但就目前来讲，

“专家治国派”仍是党和政府领导层的主流，其地位也几乎不会面临任何挑战。农民虽对现有土地状况不满，但仍处于弱势、边缘化的地位。工人的地位和影响力都大为下降，其不满和抗议也仅限于以工厂为单位的零星个例。而新兴私营业主则似乎又回到了历史上“商人”的传统地位——通过取得政府认同来实现个人利益，而不是谋求整个阶层的独立性。

从长远来看，中国在政治发展方向上有四种可能性。其一，就是多党制。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种可能性最小。其二，是认可党内各个派别的存在，实际上，这一进程已经悄然开始。其三，则是通过各项改革来提高人大和政协的活力和独立性。如果这三种可能都能实现，那么结果也许会和日本的情况类似——多党制的确存在，但是只有一个政党说了算；自民党内部的各个派别有着明显的个人主义色彩，势力比其他独立的政党还要大得多；国会拥有一定程度的独立性……另外一种可能的结果则是类似于新加坡。邓小平就曾经对新加坡的政治体制安排表示出一定的兴趣。表面上看，新加坡仍是多党制，但实际上却是执政党唱主角，而反对党则受到政府的贬低、干涉以及打压。而第四种可能性，则是中国学者潘维所主张的，强调“法治”而非民主，强调政府如何治理而非谁在治理，政府官员应依法行使手中的权力，建立一个真正独立的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这一提议与新加坡和香港的治理模式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一旦遵循了此种路径，就意味着所谓的西方民主在中国不可能落地生根，中国仍将推行传统的、儒家思想中的精英治国理念。

从短期来看，以上几种可能都不会立即成为现实。在可预见的将来，最可能的结果就是中国继续当前的改革进程，即使社会的某些不安定因素以及由来已久的腐败现象会给政府带来越来越多的问题。经济学家余永定认为腐败对中共构成了严峻的挑战，“中国公众最痛恨的就是官商勾结……打破这一联盟是执政者在2011年和今后所面临的最大考验。在中国目前的制度条件下，精英管理是廉政善政的先决条

件。但阿谀奉承和玩世不恭的政治文化已经对精英管理造成了严重的侵蚀”。此外，中共内部的权力现在看来已经井然有序，实现了平稳过渡。中共自身已经越发自信，而这一点可以从中国民众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乐观态度中得以验证。2010年3月，就在埃及发生动荡后不久，皮尤研究中心进行了一项民意测验。有87%的中国受访者对中国当前的发展态势表示满意，而埃及的比例只有28%；91%的中国受访者认为中国当前的经济状况良好，而埃及的比例只有20%。有近2/3的中国民众认为自己的生活状况较5年前有所改善，这一比例远高于美国和西欧，而有50%的埃及民众认为自己的生活水平大幅下降。中国民众对未来也充满信心。74%的受访者认为其生活在未来5年将得到进一步改善，这一比例也远高于美国和西欧，而埃及民众认为在未来5年内其生活将得到改善的比例却只有23%。在就政府的经济治理能力进行评价时，有91%的中国受访者对其表示满意，而美国的比例只有48%，英国的比例只有45%，埃及的比例只有28%，日本的比例只有15%。就以上数据而言，西方那种认为中国将遭遇与埃及同样命运的论调无疑是荒谬的。中国政府的这种日益增长的自信，同样在学者的言论中有所反映。中国顶尖的国际关系学者王缉思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如果没有一个高效、集中和强势的政府，就不会有中国的奇迹……当其他国家试图向中国学习时，它们首先要建立一个和中国类似的政府……中国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继续实行一党制。这是我们必须认识到的事实。在政治上，中国会变得越来越多元化和多样化，将完善法律体系并努力保护人权。”

实际上，中国政府已经越发锐意进取，推动改革。西方评论家所谓中国政府认为自己统治基础不牢固的论调，实际上是大错特错，实际上他们并未真正理解中国政府对自身作用的定位。有史以来，历届中国政府都极为重视社会秩序的稳定，因此对任何有可能威胁内部稳定的因素都极为警惕。同时，中国政府也认为自己有责任监督、保护中国社会运行的态势。这些均被视为良治的基本要求，当然其中也许会有一丝偏执的意味。正如一位在伦敦的华裔律师曾提醒我，中国政

府就像一位中国的父亲，总是给自己的子女明确行为的准则并要求其遵照执行。

最后，让我们再次回到中国未来发展态势这一主题。毫无疑问，对于中国和世界来说，最坏的情况就是中共会像苏共一样垮台、消亡。苏共的垮台在此后的十多年里对俄罗斯民众的生活水平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今天的中国在人口总数、经济规模，以及与外部世界融合度上都远远超过苏联，如果中国共产党内部也发生类似苏联共产党那样的巨变，那么在国内和国际上所造成的复杂后果当然会严重得多。这是中国以及整个世界都不愿看到的。混乱和失序将会影响国家的稳定，引发动荡与冲突，甚至可能终结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使中国再次回到历史上那些分裂、内省的时期。但庆幸的是，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发生。如果中国共产党能够继续成功地带领中国按目前的路线实现平稳转型，那么这对中国和世界来说都是最佳的前景。鉴于中国在过去30年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这也是到目前为止最可能成为现实的前景。

一个与众不同的国家——中国

在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该条约标志着30年战争的结束，各国在主权原则的基础之上建立了中欧地区的新秩序）签订之后，欧洲民族国家逐渐成为国际体系的主要行为体。中国的崛起是对这一理念的直接挑战。对西方来说，最重要的概念就是民族国家，但中国是一个文明国家。这种区别至少会对各国的相互理解产生影响。我们可从语言的区别对此进行阐释：在英语中，“国家”有“nation”、“country”、“state”、“government”这4种表述方法，而在中国常用“country”和“state”两个名词。当然，最重要的区别并不在于语言的表述，而在于这些单词背后的不同文化背景和蕴藏的意义。尽管是同样的单词，对美国人、法国人和中国人来说也

有不同的含义。黄平认为这些文化上的区别“将产生很大的问题”。在由西方概念、价值观、机制和立场所主导的当今世界，中国不得不去适应这一客观事实，因此，相对于西方来说，这些区别给中国造成的问题要大得多。但随着中国的崛起及其影响力的扩大，文化上的差别则会给西方造成更多的问题。在过去的200年里，西方一直居于主导地位，因此其认为没有必要去探讨、理解一个非西方文化的概念框架，更不要说以平等的视角了。

就此，那种认为中国将会如19世纪时那般不断适应、吸收西方文化规范的理念实在是大错特错。以西方为范例、遵照民族国家的既定模式，对中国来说都不大可能。中国的发展将完全不同于西方。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想要改变世界，因为中国一直在努力让国际社会相信，中国无意颠覆既定的国际秩序，中国扮演的不是挑战者的角色。然而，任何国家在看待这个世界的时候都会自然而然、不可避免地参照本国的历史和经历，且世界观也必然会受到地缘政治和权力政治的影响。欧洲列强是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国际体系的主要缔造者。在设计和塑造现有国际体系时，其不可避免地带入了自己的传统和历史因素。现有国际体系的核心——“民族国家”，就是欧洲特有的产物。而美国人看待世界的方式也反映出了其欧洲的血统和其在建国和发展过程中的独有特色。

由于历史上美国曾通过持续的对外征服来扩大版图，而且作为一个移民国家，它一切都要从零开始，所以，说到美国在世界上扮演的角色，美国人普遍认为自己肩负着重要的使命。虽然国际体系的相关原则现在被世人广为接受，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原则在创建之时就广受欢迎，或者平白无故地就这么产生了。恰恰相反，创建这些原则的都是些强国，它们凭借着自己的优势地位推行其意志，保护其所重视的利益。中国正逐渐成为一个世界大国，也许最终会成为一个超级大国，甚至假以时日可能成为世界的主导力量。届时，中国也会像之前的那些大国一样，用本国的历史经验来看待世界，冲破此前受到的种

种束缚，并试图按自己的方式重塑世界。随着中国力量的增长，中国必将日益从文明国家的身份和经验出发，看待整个世界，而非以民族国家的视角。就此而言，中国对南海的领土主张实际上是有其历史和文化渊源的。

然而，从另一个方面来讲，中国的崛起又必然会改变我们今天熟知的这个国际体系。欧洲的民族国家是构成这个国际体系的最初的基本核心。它们大体上都比较类似，即都是中小型国家，人口相对较少。随着“二战”后各殖民地纷纷独立，加上1989年苏联解体，民族国家在数量和多样性上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尽管如此，在20世纪后半叶主导世界的仍是美国和苏联，它们都比欧洲的民族国家庞大得多。其结果之一就是，西欧各国意识到它们需要团结在欧盟这个民族国家集团内。像欧盟这样建立在主权分享基础上的民族国家联盟如今已被视为——特别是被欧洲视为——一种发展潮流。类似的组织还有东盟、南方共同市场等，尽管其并没有涉及主权的让渡。出于种种原因，美国也主要从民族国家的视角来看待世界。但中国和印度的崛起将重塑整个体系。当然，这一方面更加巩固了民族国家的地位；但另一方面，它们又不是普通的民族国家，而是大型民族国家。如果说21世纪会日益属于中国、印度以及美国，那么这也是一个大国的世纪，尽管中国应被视为一个文明国家。但这并不意味着民族国家联盟的存在会过时，然而这些联盟存在的主要意义会有所转变，成为与大国抗衡的力量。这里的大国不仅指美国，尤其指新兴的中国和印度。

那么中国和印度的崛起到底会让古老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走向何方呢？现在仍不得而知。中国和印度都有着庞大的人口规模、地域，以及巨大的潜在实力，与这样的民族国家相比，其他绝大多数国家就显得渺小得多了。其实这也不是什么新迹象。在冷战时期，美国和苏联都曾与各自的附庸国建立了极不对等的关系，从而大大削弱了这些附庸国的主权。直到今天，美国与许多国家之间的关系或多或少依然如此。然而，中国和印度的人口规模要比美国更加庞大。中国的人口

总数是美国的4倍，中国和印度的人口加起来大约占全世界的38%。鉴于这两个国家仍处于转型的初期，目前我们还无法判断这两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会朝何处发展。在中国和印度成为世界强国后，特别是鉴于中国文明国家的性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或许仍然可以维持下去，但这一体系将会发生巨大变化，与以往任何时期均有所不同。

中国的崛起还会带来另一番新景象。从18世纪末工业革命开始至今，世界上的强国都具有两个特征：第一，它们的GDP在当时都位居世界前列（即便不是最高）；第二，它们的人均GDP同样也相当高，也就是说，最富裕的国家同样有着最富裕的人群。就时间顺序来看，英国、法国、德国、美国以及日本的情况皆是如此。唯一的例外或许就是苏联了。然而，这种状况即将改变，因为中国只会拥有这两个特点的其中之一。中国的GDP已经相当高了，按市场汇率来计算，中国的GDP已经位列世界第二。如果正如高盛集团所预测的，最迟至2027年，中国的GDP总量超过美国，但其人均GDP仍然相对较低，即使到2050年，中国的人均GDP也只能属于中上水平，而不是发达水平。显然，这是一个新型的世界强国：在同一个时期内，就GDP总量而言，中国已经达到了发达国家的标准；但按人均GDP，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一个潜在的超级大国同时具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双重特征，这将会在众多方面造成深远的影响。在此之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定义都是十分明确、毫不含糊的。1900~1960年这60年间，那些在19世纪就已经实现工业化的国家与非工业化国家之间可谓泾渭分明。这样的局面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亚洲四小龙崛起后才有所改变。而将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区别会更加模糊。像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大型民族国家很可能在数十年间同时具有这两类国家的特征。由于人口众多，这两个国家国内不同地区的发展程度和生活水平会继续存在较大差距。此外，巴西、印度尼西亚等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也将步入中国、印度的行列，而俄罗斯则应该已经算是这类国家之一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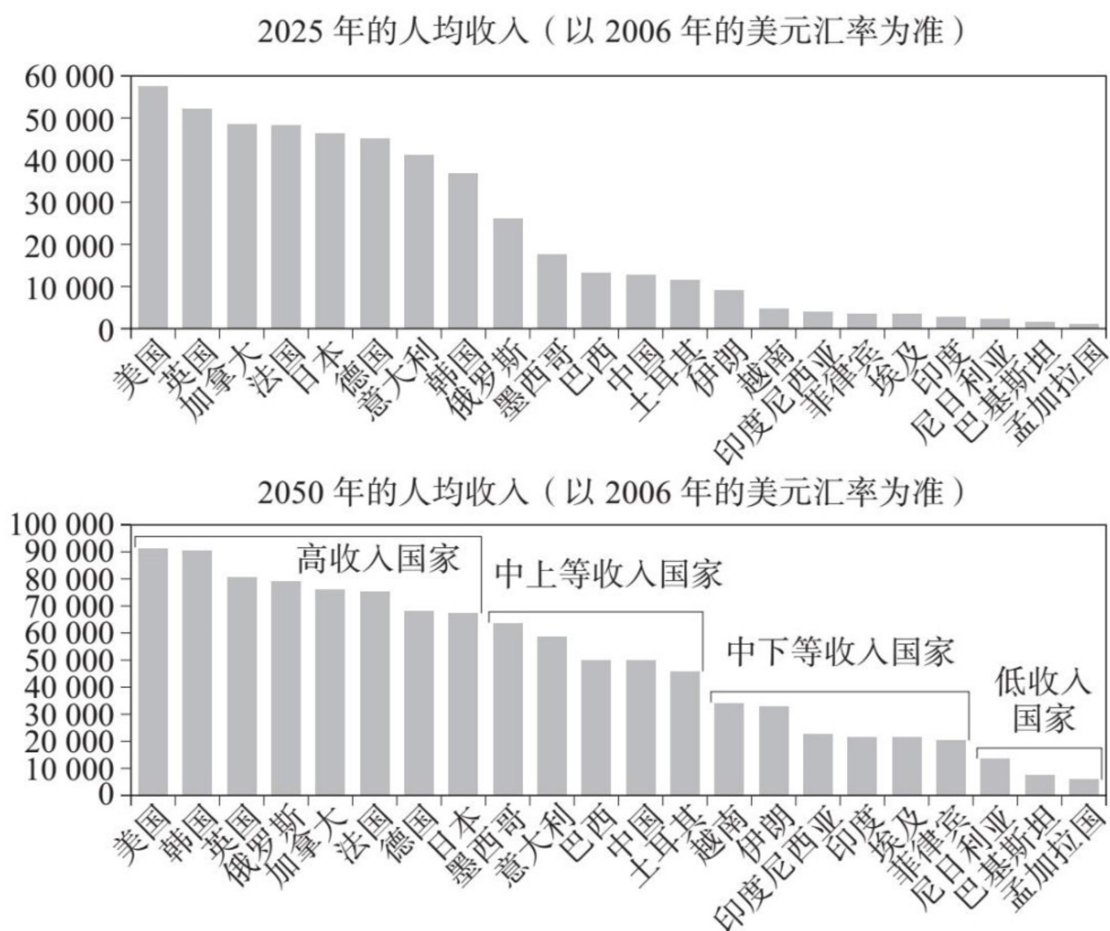


图6–6 未来主要国家的人均收入

数据来源：高盛集团，2007年

中国和印度同时具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属性特征，这就意味着它们的利益取向也会呈现出多样性。也就是说，它们会同时身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这两大阵营，并同时拥有这两类国家的目标和关切。迄今为止，主导贸易关系的关键因素，一方面是发达国家的利益，另一方面是发展中国家的利益。那么中国和印度会加入这场游戏的哪一方呢？它们会更偏向于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或者依实际情况两者兼顾？我们有理由认为，在未来的20年里甚至更长的时间内，中国和印度仍将基本上站在发展中国家一边。中国、印度、巴西以及南非就已经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内展开了相关合作，这就是明证。同样，在2009年12月举行的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上，发展中国

家内部因发展程度、利益不同而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分化，也说明了这一点。

但是从长远来看，假如中国和印度未来继续保持高速发展，那么它们的利益重心、关切的重点很可能就会慢慢地从其经济的“发展中”部分向“发达”部分转移。与此同时，随着富裕程度的提高，两国经济中更为现代化的那些部分会拥有越来越强大的力量。这种趋势在中国其实已经相当明显了，比如企业家的力量变得日益强大，而农民的地位则持续下降。此外，这种趋势还会进一步拉大这类国家国内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的差距。由于历史原因，这些国家本来就存在国内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而全球经济的发展和不平等则进一步加深了其国内地区间的分化。

作为大国，中国和印度还有另一个共同之处——中国曾沦为半殖民地，而印度则曾经完全处于殖民统治之下。这些地区的殖民者正是如今发达国家俱乐部的成员，它们要么早在19世纪就已经开始了工业化进程，要么像英国那样，工业化起步得更早。当然，美国最开始也曾经是殖民地，但由于来到美洲大陆的都是欧洲（尤其是英国）移民，所以其与宗主国英国的关系，与那些种族、文化完全不同的殖民地迥异。此外，美国后来也拥有了自己的殖民地。因此，中国和印度将首次成为经历过殖民统治、有着非白人文化和种族的大国。换句话说，中国和印度对那些曾沦为殖民地的国家感同身受，而西方列强则不会。在第9章我们会看到，正是这种共鸣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关系。这也是中国，特别是印度崛起会给国际政治的本质和象征所带来的又一个深远影响。

中国的崛起将对国际体系的本质产生深远的影响。实际上，这一影响在某些方面已有所显现，但在未来20年内，将越发明显。人类现代史上将第一次出现这样的景象：一个文明国家、一个规模空前的大

国、一个发展中国家、一个西方列强和日本的前殖民地，将日益成为世界发展的主导力量。

---

1. 三民主义指的是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编者注
2. 程伊川，即程颐，北宋理学家，字正叔，世称伊川先生。——编者注

第7章
大国心态：中国人在想什么

从上海北部的复旦大学乘车到市中心的上海博物馆，几乎要花上1个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10年前，上海的道路并不拥挤，其中还有一些处于整修状态。然而，此次上海之行却让我十分惊讶，我发现许多出租车司机对我说的目的地只是知道个大概方位，而且在快到达目的地时，我自己也不大认得出周围的环境。上海的变化如此之快，以至于新版地图没有面世就已过时。这与伦敦有着天壤之别，因为在那座城市里，出租车司机无处不知。不过幸运的是，上海博物馆可以说是上海的一座地标建筑，要找到它还是没有问题的。

陪同我采访上海博物馆创始人的是复旦大学社会学系的一个学生。她姓高，当时读研三，已经取得了攻读美国顶级大学博士学位的资格。受导师嘱托，高女士将在我停留复旦的一个月里给我提供一些必要的帮助。她非常聪明，也很专注、博学。此外，她还是一个称职的、令人愉快的向导，总是给我提出很好的建议，能够尽可能地给我提供帮助，而且也有主见。多亏她，我的上海之行十分圆满。此次，高女士主要是陪同我前往，并在必要时提供翻译帮助。

在出租车里，我们就此次采访的内容和有关上海博物馆的信息进行了交流。此前我已经多次参观过上海博物馆，而就在此次采访的一周后，我就将返回香港。后来，我们又讨论了许多其他话题。这位复旦大学的高才生对去美国留学感到异常兴奋，谈话中她突然问我：“你知道有些中国学生到美国后就会与当地人结婚吗？”我告诉她去年自己曾参与录制过与海外华人相关的电视节目，其中有一个是对旧

金山的一对跨种族婚姻夫妇进行访谈。我又补充说："实际上，3周前我还在超市里看到一对不同人种的夫妇。女方是中国人，而男方则是美籍黑人。"真是奇怪，为什么要告诉她这些呢？我想可能有若干原因。实际上，跨种族婚姻在香港很少见，我也只见到过一对，所以印象非常深刻。我妻子是印度和马来西亚的混血儿，她有着非常漂亮的暗褐色皮肤。但让人伤心的是，别人常常不像我一样欣赏她的肤色，而其中又以香港人尤甚。

高女士的反应却令我大吃一惊。她的脸一沉，那反应就像是听到了什么恶毒、令人厌恶的话语似的。高女士非常反感我的这一说法，似乎将跨种族婚姻看成异端。之前，我从没有见过对于跨种族婚姻如此强烈的抵触情绪。在她看来，跨种族婚姻是那么不可思议。高女士接受过高等教育，非常聪明，也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但她的反应的确让我颇受震动。我问她到底什么令她如此厌恶，但却没有得到回应，我也无法再追问。这就是我与高女士关于此话题谈话的大致内容。那次乘车的经历令我永生难忘。但是，我们也没有理由认为高女士的反应是不正常的或纯属个案。这不是一个人的反应，而一种文化的态度。毫无疑问，高女士将成为中国未来的精英人士。

中国将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大国？按照惯例，我们可从地缘政治、外交和国际关系等领域来回答这个问题。换言之，人们往往习惯从外交和军事等部门，或从外交、双边会谈、多边协商等领域来考量。但是，以国际关系的结构视角来考量中国，往往会令我们忽略了塑造人们思维、行事方式和认知的文化因素。地缘政治学的视角可以告诉我们，各国精英怎样思考和采取行动；而从根植于历史和公众意识的文化分析视角则可以看出，特定人群的价值观、态度、偏见和思维定式。从短期来看，前者能解释国家间关系的一系列问题，但如果从长期来看，人们的价值观和偏见的作用则要更为明显、深远。毕竟，国家往往用自身的历史、价值观和思想倾向分析世界，根据本国的经验和观点来改造世界。

以美国为例，若要理解它过去三个世纪的所作所为，就必须要认识到：美国是一个由殖民者建立的国家，他们通过战争和传播瘟疫消灭了大部分原住民；他们毁灭了美洲大陆之前存在的所有事物，并代之以自己带来的欧洲的传统；他们不断地向西扩张，直到占领了整个美洲大陆；他们一夜暴富，但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剥削非洲黑奴的基础之上。如果不了解上述情况，那么我们就很有可能无法理解之后的美国历史。只有熟悉历史，我们才能真正理解美国人的行为方式。也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真正理解为什么美国人自认为其模式具有普世性和天定命运论。因此，民族或种族的特点是我们清楚了解其行为的基础。不管是出于无意还是有意，文化总是决定了人们对自我及与他者关系的认知。

而若想对中国进行分析，文化的视角无疑是最为重要的。其原因就在于中国将自己视为民族国家并据此行事也只是不久之前的事：正如上文所论及的，我们最好从文化传承性的角度分析中国的态度、观点和行为，而不是将其民族国家的身份作为着眼点。如果想真正了解中国将怎样对待外界，那么我们必须首先了解其历史渊源、演变过程、中国人的起源和自我认知。在没有理解中国人的自我认知之前，我们很难断定其对待世界的态度。因此，历史、文化、民族和种族再次成为论述的核心。

从多样性到同一性

与其他广袤的领地一样，中国，或至少是我们称其为中国的这一大片土地上，生活着众多的民族。今天，中国自视为一个同质性的国家，并也展现出了同质性国家的特征。中国91%的人口为汉族。《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但其他民族加起来却只占9%，鉴于中国广阔的疆域，这一比例的确有些偏少。华南的广州、华东的上海、华北的北京，其大部分居民都是汉族，但我

们仍可以轻易看出其体貌上的差异。北京人的身材和白种人差不多，广州人相对矮小一些。鉴于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这些微小的区别也就不足为奇了。中国与其他人口大国之间的差异，并非在于是否缺乏多样性，而在于中国文化的源远流长和持续性，以至于在数千年的历史中，伴随着战争、兼并、同化、通婚、被边缘化、灭绝和政府的重新安置，相当一部分民族已经消失。

像其他民族一样，汉族也是由多民族不断融合而成，是一个建构出来的群体。实际上，“汉族”这一概念最终形成是在19世纪末。但其思想的力量和文化的根源则来自中国悠久的历史（其起源可以追溯到古老的历史神话），跨度则可从今天追溯到远古时代。这些神话表明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民族，他们拥有共同的起源，这也是中国人自然而然地把自己当作中国大家庭中的一员的最好解释。而且这俨然已成为中国民间传说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为儒家等多种思想流派所共同遵从。中国官方最近出版的一份爱国主义教育读物指出：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几千年来，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从来就是推动历史前进的一种巨大力量。中国人都认为，华夏文明源于黄帝。传说中，黄帝生于公元前2704年，他统治着一个位于关中平原、靠近黄河的部落，而这就是华夏文明的起源。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中国人都认为中国有着五千年的悠久历史。海内外的中华儿女，都认为他们的祖先是黄帝。

改革开放之后，炎黄子孙的概念又重新获得了某种程度的复兴。1984年，邓小平在一次演讲中公开表示：最终完成台湾与祖国大陆的统一是炎黄子孙的共同心愿。中国著名的知识分子苏晓康则写道：“黄河养育了一个黄皮肤的民族。而这个民族的祖先就是黄帝。”今天，世界上每5个人中就有1个人是炎黄子孙。苏晓康的说法表明，中华民族的起源不同于其他民族。尽管现在普遍认为人类起源于非洲，但与日本一样，中国也一直认为人类有多个起源的观点更为可信。

1929~1930年在周口店出土的“北京猿人”，一直被视为蒙古人种的祖先。2008年，中国考古学家又取得了重大发现，他们在河南许昌发现了原始人的头盖骨化石，这些化石可追溯到8万~10万年前。《中国日报》的一篇文章指出，“‘许昌人’的发现证实了中国人源于中国境内而并非非洲”，“此类重大发现将有助于维护对中华民族和历史悠久的中华文明的认同感”。虽然在国际上，不断呈现的人类学发现被视为全世界探求人类起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中国，这些人类学发现却被赋予了非同寻常的意义。它们被视为中国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用于加强“中华民族同宗同源”的概念认同。

中国历史学家通常喜欢将中国开疆扩土的过程称为“统一”而非“征服”，并将其视为一个积极的演进过程，认为中国的统一是不可避免的，是历史必然的发展趋势。而领土一旦获得，就成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此外，人们还认为，不同的种族或民族都愿意效忠历代的帝国政权。然而，这只是一个假设。中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远非一帆风顺、水到渠成，实际上也是一个由战争、敌对、民族冲突、和谐、同化、征服、迁徙等构成的复杂过程。当代中国的雏形初现应该可以追溯到秦朝。在之前的战国时期，100多个诸侯国在中国北部和中部地区争夺霸权。秦国以“区区关中（今陕西省的东北部地区）灭六强国”，最终一统天下。在秦朝统一后的两千多年里，中国的疆域逐渐延伸到了南至南海、北至西伯利亚、西至中亚的广大地区。中国的开疆拓土并非是一个平和、和谐、自然融合的过程，而是充斥着战争与冲突。

中华的发展实际上也是北方的中国人向外扩张的过程。其中最著名的冲突区域就是北京以北的地区，大体位置相当于今天的蒙古和中国东北。几千年来，北方的游牧文明和中国的农耕文明在这里相互碰撞和融合。中国的历史学家认为，中国历史就是一部好战的游牧民族与爱好和平的农耕民族通过战争或相互学习不断进行交流的历史。而实际上，北部边界的安全一直是中国人最为关注的，中原帝国不得不

多次出兵北伐以求边境安宁。这一情况直至清朝才有所改善，因为满族本身就能征善战。万里长城不仅是抵御北方敌人入侵的堡垒防线，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视为中原帝国向北方扩张的工具。从“镇北台”等万里长城关口的名字中，我们就不难看出中国的目的所在。农耕民族常常抱有大汉族思维，将游牧民族视为蛮夷。中华民族和游牧民族之间的长期冲突令前者产生了文化优越感，并产生了文明人与蛮夷人之说。这种区别为日后中华民族区分“自我”和“他者”埋下了伏笔。出现这种现象并不奇怪：世界上所有的农耕民族往往都瞧不起游牧民族，他们往往认为后者落后、原始。虽然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之间曾一度发生战争，但也存在共生现象。历史上，游牧民族曾多次征服农耕民族并成为他们的统治者，比如蒙古族和满族。作为千余年来相互冲突与融合的明证，封建帝国的统治阶层基本上都是中国北方人和游牧部落结合的产物。蒙古族和满族等所有游牧民族在征服中国后，或早或迟都被“汉化”，反过来又证明了中华民族的优越性。历史学家王赓武曾指出：“过去一千年，虽然汉族统治中国只有280年的时间，但所有的外来统治者都不得不采用儒家文化和治国体系来治理整个国家。”这是表明儒家文明优越性及其对周边民族产生巨大影响的最好例证。

中华民族向南发展的历史并不为人所熟知。这段历史长达三千年，它包括人口的大规模迁徙、民族融合和文化的消失与演变。在这个过程之中，随着附属国或被消灭，或被同化、吸收，有不少民族消失了。亚热带地区富庶的土地使南方民族有实力反抗汉族统治者，特别是在秦汉时期，这里的人民还能或多或少为自己保留一个风雨飘摇的政权。

清朝早期是中国疆域取得大发展的关键时期，幅度最大、速度最快。从1644年到18世纪末，中国的疆土扩大了一倍多，现在的蒙古和中亚地区都被纳入了清朝的版图。中亚和西藏地广人稀、物产富饶，这些地区的少数民族与汉族也存有较大差异，不过他们最终都臣服于

大清帝国。中国疆域的扩展往往是综合运用军事手段和文化手段的结果，无论其目标是中原、华南还是游牧民族居住地，皆是如此。当然清朝政府在征服西北和西部的过程中颇费周折。当时的准噶尔部占据了今天新疆的大部分地区，清政府不得不派出重兵进行一番苦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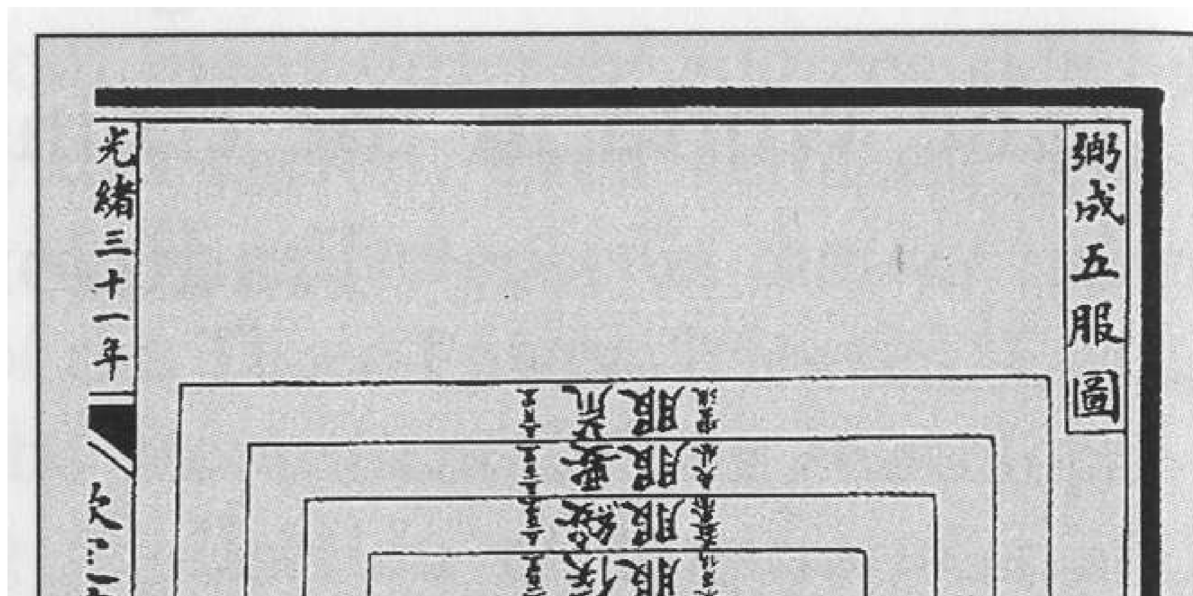
中华帝国领土的扩张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往往伴随着规模巨大的人口迁移，即迁民戍边，这也是其主要特点之一。在古代，人口的流动受到政府的高度监管，也是政府重要的政策工具之一。比如，清朝就曾把大量人口迁移到新占领的地方，并实施安抚政策。其中一个重要的例子就是湖广填四川。1681年，四川的常住人口不足50万，后因清政府的移民政策颇为有效，到1812年时，其总人口已达到2.07亿。今天这一过程仍在继续，如内地有汉族人不断迁徙到了内蒙古、新疆、西藏等地区，甚至在某些地区汉族人口已经占据了多数。在某种程度上，人口迁徙过程就是中华民族不断扩大影响力的过程。

在此，我们非常有必要对如中国一样的陆地型扩张和英法等欧洲国家的海洋型扩张进行区分。欧洲的海外殖民地几乎都没能持久。因为除了白人定居者占绝大多数的澳大利亚和北美等地的殖民地外，殖民者与被殖民的当地民众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也相距甚远，根本无法实现民族和文化的同化。中国则截然不同，其采取的是陆地扩张模式，不但具有空间距离近的特点，而且还能对所扩张的区域施加上千年的影响，使其同化。因此，就人口组成的多样性而言，中华帝国实际上已经算不上一个帝国。当然，对于人口稀少的西部特别是西北地区来说除外。因此，中国所面临的不同只是其人口内部的区别，这种区别也只是相对的。然而就领土而言，西部地区十分重要，约占中国总面积的64%。因此，就领土的角度而言，中国仍是一个帝国。

从天下到民族国家

在19世纪与欧洲产生互动之前，中国的自我认知与民族国家标准仍有很大的出入。中国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中央之国和“天下”。其他国家与中国不可同日而语，所以中国都不需要一个名字，它就是“中央之国”。中国纯粹是文明的光辉造就的一片土地，而不是像以色列或美国那样因上帝的青睐而生。理解“中央之国”这一概念的最好方法就是查阅这个时期（即公元前6世纪以后）的地图：地图呈同心圆的状态，而北京就是同心圆的中心，其核心成员是中国北方人。同心圆不断地向外扩散，首先是汉族人，其次是内部的蛮夷，再次是远方的蛮夷和藩属国。最外面就是一大片无法开化的黑暗之地，即遥远的岛屿和大洲。

总之，中华帝国完全将自己置于全球秩序的中心。中国眼中的世界，并非通常意义上的由民族国家组成的体系，而是由两部分组成。中间是单一的“文明”，环绕着“文明”的是众多荒蛮之地。荒蛮的远近则依其文化受文明影响的程度而定，距离文明越远的越未开化。作为“天下”，中华帝国自己就是一个世界，其位居世界之首，享有非同一般的地位。中华文明是一个高层次的文明，它建立在儒家思想的价值观、道德、教化和其域内的历代王朝之上。“中央之国”的理想是天下大同，这也是中华帝国向外扩张的理论依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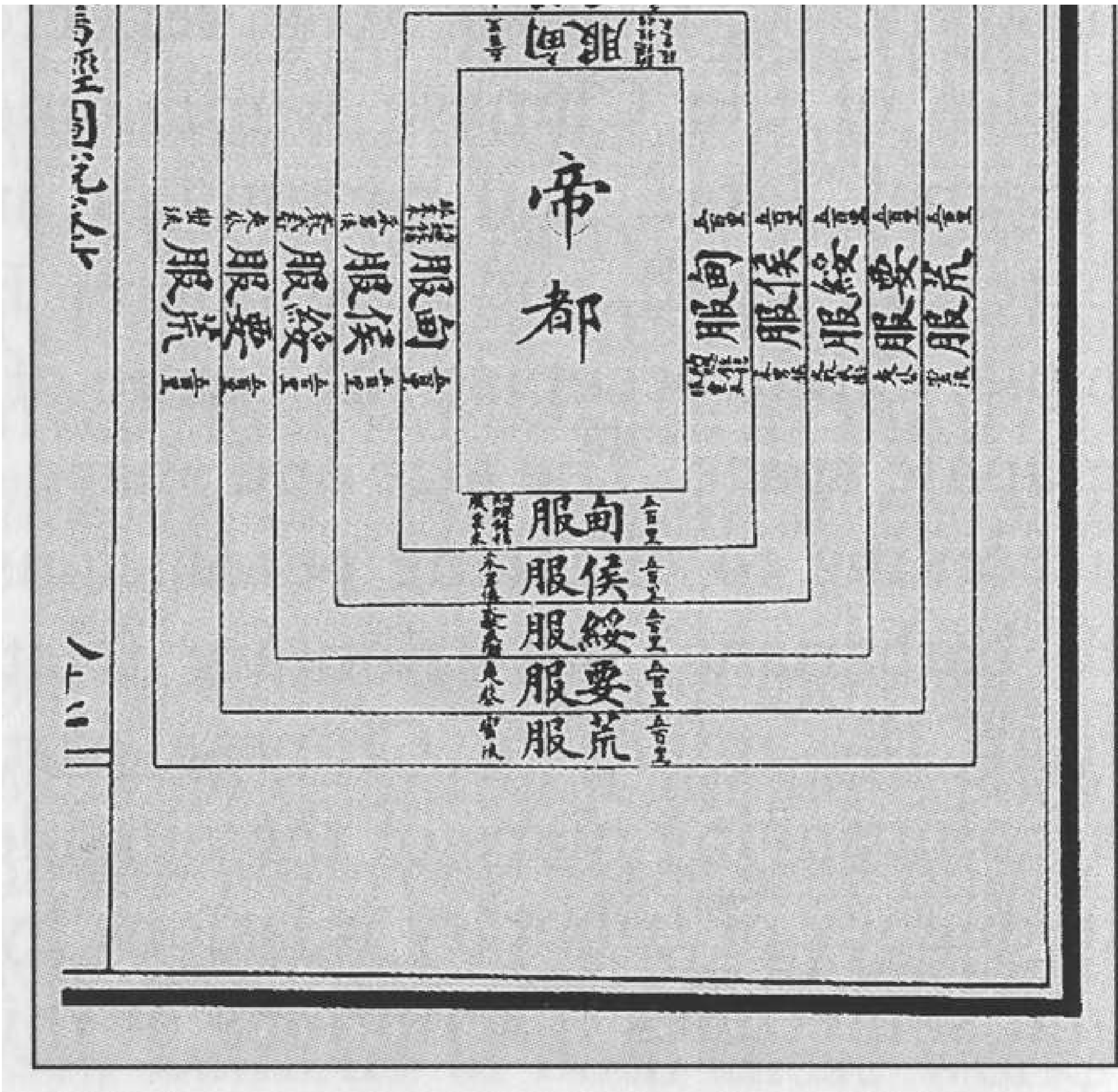


图7–1 中国古代的天下观

图片来源：摘自理查德·J·史密斯的《中国地图》；沃伯格研究所赞助提供

中国古代经典的天下观可追溯至公元前6世纪的史学经典《尚书》中的《禹贡》篇。这一具有深远影响的著作将天下按距首都（帝都）远近依次分为了五个区域：甸服（天子领地）、侯服（诸侯领地）、绥服（平和之地）、要服（结盟的蛮夷之地）和荒服（凶蛮之地）。此五服之地都被画成了长方形，也符合中国古代“天圆地方”的理念。

与民族国家不同的是，中华帝国并没有明确的疆界，边界上也没有布满重兵作为守卫。中国的边界更像是模糊的区域，从文明直接延伸至各种蛮夷之地。因此，世界的中心——中国并不需要名字，而

“中央之国”无须进一步解释或描述。中国扩张的模式是一个征服加同化的过程，其意识形态合理性来自“提高蛮夷之地的文明程度”。相对于周边的地区，中华体系处于绝对支配地位：即使在相距甚远的日本和朝鲜半岛，其使用的文字也是从汉字演变而来的，并在治国方略和道德准则上广泛吸收了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成为中华朝贡体系的一部分；北部的大部分游牧民族，当条件允许的时候，也归于儒家思想的门下；如今的越南，虽进行了几百年的激烈抗争，但最终也被儒家思想同化；最后，正如我们所见，中国境内各种各样的民族都被汉化，最终才有了今天的中国。在这个过程之中，武力当然不可或缺，但中国思想和行为方式的巨大力量、影响和声望才是最为重要的。

西方传统的政治理论往往在区分农耕文明政权和民族国家时陷入困境。中国虽然具备许多民族国家特征，总体而言还是一个文明国家，而且兼具文明国家和民主国家特征的现代中国与历史上的天朝上国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延续性，这使得传统的国家分类方法遭遇了困境。实际上，封建时期的中国已经具备了我们所理解的、广义的民族国家的某些特征，至少从形式上来说如此。比如，儒家学说中就包含非常优秀的国家意识形态内容，这些思想在当时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并在精英和平民阶层中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当时中国的官僚阶层，那些精通儒学、怀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远大抱负的官员，无疑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行政管理人员。中国早已拥有共同的语言文字，虽有诸多方言，且不同方言之间差异极大，但这些方言都能用同种文字表达，这在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融合程度、身份认同和凝聚力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最后，“中国中心论”，即“中央之国”观念、把中国看作世界的中心、将中华文明视为世界上最先进的文明等，使华夏民族拥有了初步意义上的爱国主义意识形态。不过这种意识形态与现代民族国家推崇的与国家主义相关的爱国主义也不尽相同，而是深嵌于中国的天下观之中、中华文明与其他民族和社会的关联性之中，以及中华民族相对于其他民族与生俱来的优

越性之中。这种先天的优越感，也包含着某种意义上的种族优越感和文化优越感，而随着历史的演进，二者日益交织在一起。

19世纪末，来自日本和欧洲的威胁不断增多，清朝被迫按照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国际体系规则行事。中国此前由相对于其他国家的显赫地位而产生的自命不凡，在西方强大优势的冲击下变得支离破碎。“天朝上国”又回到了凡间。中央之国成了众多国家中的一员，它也有了自己的名字，那就是中国。在文化优越感浸淫中成长起来的中国精英和民众，陷入了漫长的、充斥着怀疑、不确定和羞辱感的危机之中。

直至一个半世纪以后，这种文化优越感才开始复苏，而中国在列强虎视眈眈的围堵中，被迫开始与邻国划定明确的边界线——虽然即使在今天，有些边界线（比如中国与印度之间的边界线）仍悬而未决。

中华民族的优越感遭到了挫败。随着19世纪末中国所面临的环境日益险恶，中国人开始了漫长而痛苦的自我认知的过程。在这个时期，爱国主义作家章太炎首次用“汉人”来界定中华民族，这一称谓迅速得到广泛应用。其实，当时也可以选择“秦人”这一称谓，但汉人好像更受欢迎。因为汉朝统治足有400年之久，而短命的秦朝只有15年，所以后者就相形见绌了。但“汉人”这个新名词，只不过是一个文化上的称谓。实际上，汉人是一个由众多民族构成的集合，使用这一称谓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方便区分本族与外族。满族建立的清朝统治了中国250年之后被推翻，这一称谓当时主要指的是那些旨在推翻清朝统治的中国人。另外，这一区分的矛头实际上也对准了欧洲人，欧洲人迫使清朝开放了许多通商口岸，被视为对中国和中国民众生活的威胁。仇视欧洲人的情绪最终引发了义和团运动，这场运动也被视为中国的现代民族主义的萌芽。然而，直至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中国的民族主义才全面爆发。时至今日，我们仍可时常在现实生活中找到中

国民族主义的例子，而其针对的对象通常是日本（如2005年的反日示威）和西方强权（特别是美国的霸权）。中国的民族主义已经日渐兴起。虽然它看起来与其他国家无异，但实际上却存在着很大的差别。由于其深厚的文化根源，我们很难简单地将中国的民族主义界定为一般民族国家的民族主义。封建时期的“中国中心论”对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的形成与巩固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更确切地说，中国现代民族主义具有双重性，即中国文明主义和中国民族主义，它们相互融合、互为支撑。

中国人与种族问题

种族主义是一个十分敏感的话题，人们通常对其敬而远之，因为它会带来很多政治麻烦。无论在何处指出这一问题，都将招致愤怒的回应和立即的否定，但这的确是大多数社会（即便不是所有社会）都存在的重要问题。种族主义可能就潜藏在某处，只不过它有时候藏在幕后，有时候登台表演罢了，我们无须对此大惊小怪。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而体貌特征是最简单的辨别方法。在体貌特征基础之上，综合文化和心理的特点来区分种族不失为一个好方法。换言之，就是在区分种族时强调体貌特征、追溯文化特质，甚至将社会组织与生物群落类比。不仅在东亚，世界各地的人们普遍认为种族问题是“白种人”的问题，因为白种人自视优于其他种族。在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地区，官方都认为种族主义只是一种西方现象。但是，许多人对这一观点的合理性存有疑问。其实，所有种族都对其他种族心怀偏见并存在种族主义思维定式。种族主义是所有种族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即使曾经饱受歧视的种族也难逃这一怪圈。所有种族主义现象都有共性，但也会因历史和文化差异而存在各种区别。

正如世界上存在不同的文化，不同种族主义之间也千差万别。值得一提的是，白人种族主义对现代社会的影响要比其他种族深远得

多、严重得多，实际上也恶劣得多。过去两个世纪里白种人一直占优势地位，加之殖民主义的助力，所以白人种族主义的影响和偏见作用更大、影响范围更广。但这不代表其他种族在面临弱势种族的时候就能逃脱种族主义的怪圈。

东亚地区的情况也是如此。虽然民众可能并没有认识到这一问题或否认其存在，但种族主义在现实中的确存在，特别是在东北亚地区。人们通常用种族来界定彼此的身份。19世纪末以来，中国和日本都曾使用过许多词语来表示本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区别。在汉语中，存在“族”、“种”、“族类”、“民族”、“种族”、“人种”等表达方式。而在日语中，也有jinshu（人种）、shuzoku（血缘）和minzoku（种族、国籍）等说法。即使在种族构成相对复杂的东南亚地区，种族身份也十分重要。总而言之，种族身份归属常常在东亚地区国家身份认同中处于核心地位。

种族问题之所以在日本、新加坡、韩国、越南、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等儒教文化国家和地区非常重要，其原因在于种族问题是与家庭的核心性相联系的。家庭在中国（包括所有的儒家文化国家）的传统中是一条无法割断的主线，它与国家均为最重要的社会机制。虽然家庭意指“我们”，但家庭也是与血缘存在着密切联系的。而血缘则有助于定义一个更大的“我们”。中国人认为，同姓之人往往有着共同的祖先。自明朝以来，中国就有将血统不同但同姓的人归入同宗同源的习惯，并通过同一个著名的历史人物，例如黄帝，来建立实际上不存在的血族关系。周启荣教授说：“整个中华民族都可归结为同一个血脉，因为他们都姓‘汉’。”而中国姓氏相对较少的这个事实，也在放大这种效应。据有关数据显示，中国100个最常见的姓氏占中国人口的比重为85%，其中最常见的三个姓为王（9 200万人）、李（9 100万人）和张（8 600万人）。相比之下，美国90%的人口涵盖了7万个姓氏。按照中国传统，和家庭一样，血缘与生物延续性、血统（儒家社会的核心文化特征之一）乃至国家都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在所有社会

中，血缘关系都是界定国民概念的先决条件——实际上，用其他任何方法来界定公民身份都是不可能的。

与其说种族主义是西方的发明，不如说它其实根源于中国和日本。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曾引用公元前1000年左右的文字资料表明，汉族早已认为自己是优等民族，而北方人把南方人视为“南蛮”。在古代，统治者通常以文化程度作为群体划分的标准，那些不按中华标准行事的群体被视为蛮夷，并根据汉化的程度，对其继续细分。人们将生活在中国境内的蛮夷划分为“生藩”和“熟藩”两类。“生藩”是指那些野蛮的、不愿被同化的种族，而“熟藩”则是驯服的、顺从的蛮族。“熟藩”已接近开化，而“生藩”则无法被汉化。此外，那些中国以外的种族则要么被认为是“生藩”，要么更糟，被等同于兽类。在中国的民间传说中，人兽之间的界定往往含混不清。那些中国以外的种族经常被看作遥远地域上的野蛮人，常被认为带有兽性。因此，中国的优越感是建立在文化和种族之上。文化和种族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至于何者为重，则要视具体时间和情况而定。历史学教授冯客（Frank Dikotter）在研究中国种族主义的著作中写道：

> 一方面，大同思想让汉族精英相信野蛮人可被教化，或可通过施以有益的文化影响而改变；另一方面，当自己的文化优越感受到威胁时，他们又会认为野蛮人和自己是两回事，所以应该把这些化外之民驱逐出去，使中国免受外部世界的不良影响。

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中国仍相信“有教无类”的观点。

肤色在历史上就很重要。在古代，中国人就喜欢“白皙”一词，素有“玉面”之说。12世纪初叶，精英们赋予了白皙的皮肤更为重要的含义，而且随着航海技术的发展和宋朝对外交流的增多，他们对肤色的敏感程度更是有增无减。此时，即便是刚刚才开始在中国盛行的

印度佛祖也从黝黑、半裸的形象摇身变为身着薄衫、面容白皙的神仙，正如西方基督教中的耶稣被白人化一样。当然，并不是所有中国人都面如玉色，尤其是长期在田间劳作、饱经日晒雨淋的农民，绝对会皮肤黝黑。随着与世界的接触日益频繁，中国的统治精英更是将“肤色是阶级地位的象征”这一观点，投射于中华民族与其他种族的关系之中。白色被人认为是文明世界中心的代表，即中国；而黑色则代表劣等野蛮人，他们生活在离文明中心十分遥远的地方。明朝时期，特别是郑和远航非洲和南亚地区，进一步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因此又加深了他们对肤色和外貌的偏见。当时的中国人认为，最劣等的人为非洲人和原住民，其次就是马来人和越南人。

清朝时期，种族取代了此前盛行的文化，明确成为划分蛮夷的主要标准。不过，种族自古以来一直在中国人划分蛮夷时发挥重要作用。清朝西征时中国人遭遇与自己有着很大差别的人种，后者十分彪悍，所以在整个19世纪下半叶的大部分时间里，西征只是取得了部分成功。而此类征伐则进一步推动了种族划分标准的发展。两次鸦片战争后，欧洲列强叩关，清王朝危机四伏。西方的野蛮行径不仅震惊世界，也使中国精英和老百姓在旧有观念中如梦初醒，使得种族主义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传统的文化种族主义逐渐融入新兴知识分子所提出的大众的种族哲学之中。而这些知识分子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当时西方盛行的种族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此时，种族主义成为流行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开始在大众中传播，特别是在通商口岸很有市场。新的种族学说涉及不同种族的所有体貌差异，从肤色、毛发、身高到鼻子的大小、眼睛的颜色、脚的尺寸以及体味等，几乎无所不包，而且还试图从这些细节揭示更为宽泛的思想和文化含义。自19世纪初开始，中国对那些蛮夷有了新称谓——“鬼”，而且对蛮夷的划分又有了新标准，即皮肤的颜色。白种人被称为“白鬼”，深色人种则被称为“黑鬼”。对待这些外国鬼的方式并非一视同仁，“白鬼”被视为统治者，而“黑鬼”则

被视为奴隶。当时，在中国那些通商口岸的文学作品中充斥着对非洲人和印度人的不屑。

在这个时期，“汉人”的说法日益普及，但中国人不再称自己为白种人，而是以黄种人自居，从而将自己与欧洲白种人和其他深色人种区别开来。当时，中国正在试图抵制日益增长的来自欧洲的威胁。那时的世界，是适者生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盛行的世界。就当时的情况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角度而言，深色人种被认为是失败的人种，因此注定要被遗忘。而以中国人为代表的黄种人，则正在为了自己的生存与占主导地位的白种人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此外，在华人世界，因为黄色与黄河和黄帝有着紧密的联系，所以被赋予了非常积极的含义。著名诗人闻一多在1925年留美期间，写下了一首《我是中国人》的诗。作者慷慨激昂地在诗中表达了民族自豪感，这种自豪感因其在西方的经历更加深刻和强烈：

> 我是中国人，我是支那人，
>
> 我是黄帝的神明血胤；
>
> 我是地球上最高处来的，
>
> 帕米尔便是我的原籍。
>
> 我的种族是一条大河，
>
> 我们流下了昆仑山坡，
>
> 我们流过了亚洲大陆，
>
> 我们流出了优美的风俗。
>
> 伟大的民族，伟大的民族！

冯客通过按照时间顺序举出了无数的例子来强调种族主义思维方式在中国的盛行。此后，他又补充道：

> 如果人们仅仅认为这些（种族主义的）陈词滥调只是存在于纸面上，那就大错特错了。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与西方一样，盛行于中国的有关种族主义的老生常谈、陈规旧习、思维定式不胜枚举，可谓汗牛充栋。这些陈词滥调鲜明地体现出了当时所盛行的、极富影响力的种族主义论调。而且，居然少有质疑。一大帮知识分子也信以为然并将之奉若经典。

很明显，这种种族主义不仅是中华帝国面临困境时的产物，也反映出了中国被无情地推入民族国家体系且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之时，其所面临的身份危机以及对确定性和认同的渴望。此外，这一现象还可归因于——有着三千年历史的中华帝国的显著特征之一——文化种族主义。森严的种族制度与儒家社会秩序中的文化等级制度呈现出惊人的相似性，这也表明中国社会的文化和种族优越性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的。

种族主义的思维方式也对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民族主义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孙中山是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在1911年领导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孙中山认为所有的中国人是一个种族，黄种人和白种人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冲突：

> 人类可分为五个人种。黄种人和白种人比较强壮和聪明。其他人种较为虚弱和愚钝，所以才被白种人奴役。只有黄种人才能与白种人竞争，这就是进化……在现代民族中，只有黄种人和白种人才可被称为优等民族，而中国人属于黄种人。

他还写道："最大的力是'血统'。中国人黄色的原因，是由于根源黄色血统而成的。祖先是什么血统，便永远遗传成一族的人民，所以血统的力是很大的。"最开始，孙中山认为藏族、蒙古族和满族人口太少而不会产生太大影响。因为孙中山是一个汉族主义者，因此

他把中国人等同于汉人。但辛亥革命后，孙中山不得不面对少数民族人口虽少却占据着半个中国的现实情况。如果仍把中国界定为单一的汉民族国家，那么极有可能遭到少数民族的反对，引发民族的对抗和国家的分裂，而当时也的确出现了这样的事情。于是，孙中山的革命政府放弃了原来的主张，提出了“五族共和”，认为中华民族是由汉族、满族、蒙古族、藏族和回族这5个民族共同组成的。换言之，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有着共同的起源，它们共同组成了中华民族。蒋介石也继承了这一观点，但采取更为激进的态度，强迫少数民族进行汉化。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民族政策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新政府正式否定了自19世纪末以来就一直存在的种族主义观点，并全力抵制大汉族思想，称中国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国共产党鼓励少数民族的归属需求，最后确定了56个民族（包括汉族）。各民族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有些民族有很强的身份认同感，而且渴望民族自治，比如维吾尔族和藏族；有的民族拥有很强的身份认同感，但没有民族自治的愿望，比如彝族；有些民族的身份认同感极其微弱，比如苗族、壮族以及满族；其余的民族与汉族融合度较高，比如白族、土家族等。而最后一种类型，实际上代表中国历史的主流，即一直在被缓慢的同化。至今，中国一共建立了5个少数民族自治区，它们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藏自治区和内蒙古自治区。这些自治区享有一定的自治权，如各自治区的行政领导均由少数民族担任，但相关自治权力均要在中国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行使。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历史演进，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融合仍在进行之中。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对大汉族沙文主义进行了限制，不再声称汉族是中国的核心，并在法律上保证了少数民族的平等地位，从而避免了民族主义高涨引发的社会过度同化。此后，民族的划分一度为阶级所取代。然而，种族主义的余毒仍荼害至今。有一部分汉族

人，甚至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汉族人，其思维方式仍带有种族主义的色彩。此外，中国各民族之间客观上也存在着发展不均衡的现象，中国也在大力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但问题在于这种扶持与促进，却大都以汉族地区的发展为蓝本。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和扶持力度也有待加强。改革开放以来，民族问题与经济发展问题日益交织，令中国的民族问题更为复杂。

海外华人

包括美国、澳大利亚以及欧洲各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的华人经常遭受种族歧视，他们对此非常敏感。海外华人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通常会聚在一起形成一个华人群体。尽管华人在美国饱受歧视，但在当年声势浩大的人权运动中他们并没有和美国黑人站在一起。规模最大也是最为重要的海外华人群体是在东南亚地区，他们在当地的人口中占了相当一部分比例。特别是马来西亚，华人占到了该国总人口的1/4。多年来，华人在东南亚遭到多种形式的种族歧视，即便东南亚国家在“二战”后纷纷取得独立，这一局面也没什么改变。但我们应该更全面地看待问题，这点很重要。华人在东南亚地区控制着很大一部分私营经济，通常都在一半以上，而且生活水平普遍高于当地占多数的原住民。所以华人或多或少地对占多数的原住民存在优势心理，且与其交往较少。华人在东南亚国家遭受种族歧视的问题，我们应一分为二地看待：一方面，华人作为一个少数族裔，确实遭到各种形式的歧视；另一方面，华人也存有优越心理，且其经济上处于优势地位。印度尼西亚籍华裔作家、商人理查德·奥（Richard Oh）这样形容华人对当地人的态度：“华人群体好像蜷缩在整个社会的一角，几乎不愿意同其他社会成员交往。尽管华人经常遭受歧视，但他们依旧非常高傲自大。他们的优越感到底从何而来呢？”所以，就其个人而言，他更喜欢与印度尼西亚人交往。

海外华人认为只有中华民族才是“正统”，这种民族自豪感根深蒂固，海外华人甚至经常将本地人称为外国人。英国作家、记者詹姆斯·金奇（James Kynge）曾给我讲述了发生在意大利北部城市普拉托的一件奇事。一家由华人社区创办的报纸，在头版报道了“三名外贼”在当地唐人街多次行窃的新闻。金奇打电话给该报主编，发现“外贼”指的居然是当地的意大利人，而且发现他们会自动地将华人之外的所有人都称作“外人”。这也是世界各地中文报纸的一贯做法。白鲁恂对此有独到的见解：“华人认为自己和其他民族有着本质区别，所以即便他们生活在遥远的国度，忍受着孤独且无法进入当地主流社会，他们在潜意识里还是顺理成章地将其所在国的其他国民称作‘外人’。”

海外华人群体有个明显的特征，无论在哪个国家，都始终保持着“华人特色”。比如在许多东南亚国家，华人通常更愿意把他们的孩子送进中文学校，华人群体也通常会赞助很多中文学校。而在不少西方国家，当地华人虽然在人数上远不如在东南亚多，但还是组织起了各种周末学习班，让他们的孩子可以学习中文、了解中国文化。美国旧金山的华人很多，经常会组织“寻根之旅”。当地华人会回到中国、回到他们的祖先曾经居住过的村落，希望找到自己的远房亲戚。梁伊凡（Evan Leong）就是其中之一。1997年，当他还是加州大学的一名学生时，就参加了“寻根之旅”。他激动地写下了自己在中国的经历和感受：

> 虽然我的祖先在125年前就来到了美国，但我至今仍不是彻头彻尾的“美国人”。不论别人怎么称呼我，不论我穿着什么样的衣服、吃着什么样的食物、有着怎样的喜好，不论我的朋友们来自哪些种族，也不论我和什么样的女孩约会，我明白，我还是一个华人。

他还写道：

> 无论是在美国出生的华人，还是刚移民到美国的华人，都普遍认为，中国和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

有趣的是，在美国，新来的中国移民似乎比在美国本地出生的华人更受欢迎，因为大家觉得他们的中国味儿更浓，而来自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移民则没有这种情结。梁伊凡在谈及家庭对中国传统的坚守时，这样写道：

> 虽然我与中国的亲人远隔重洋，而且有很大的差异，但我的祖先们仍然在美国沿袭着许多中国传统习俗。比如过年过节以及过生日的时候，我们这个大家族会聚在一起；到了春节，我们也会穿新衣、大扫除、把家里装点一番，迎接新年的到来；清明节，还有其他的重要日子，我们也去给祖父扫墓。

“大中华”的概念在华人中间日益流行，充分体现了“华人身份”所带来的凝聚力。这个概念囊括了以中国为中心的全球所有华人群体，包括港澳台地区、新加坡以及其他地区的中国人。“大中华”实际上只是一个文化概念，而非领土或者政治上的范畴。这一情感纽带的力量源于海内外华人共享的中华文明，因此进一步增加了中国作为文明国家的维度。尽管中国大陆实行与西方完全不同的政治制度，但海外华侨华人和港澳台同胞还是通过巨额投资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海外的俄国人大都刻意回避苏联（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经济发展所遭遇的大问题之一就是资本的外逃）。海外的印度人对印度发展做出的贡献也远不及海外华人。在世界的华人群体和中国内部，“大中华”的概念在文化上形成的一种强大向心力。中国人，无论身在何处，都对祖国有着强烈的归属感。

在为北京奥运会举行的全世界火炬传递活动中，这种向心力又得到了另一种表达。虽然在伦敦、巴黎、雅典、旧金山等个别城市，一些人以中国西藏问题为由阻挠火炬的传递，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但其他各地则与这些城市的景象大为不同。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对中国举办奥运会表示支持的足有1万人之多，远远超过了反对者。在韩国首尔和日本长野，数千人走上街头，对北京奥运会表示支持，使抗议者相形见绌。吉隆坡、雅加达、曼谷和胡志明市的情况也是如此。无论在哪个城市，对北京奥运会表示支持的绝大多数都是中国人，其中既有中国留学生，也有海外华人。

海外华人对中国的崛起感到无比自豪，这一点不足为奇。在祖国遭受两个世纪的贫穷与落后之后，中国在较短的时间内一跃成为全球性的大国，并日益散发出巨大的魅力。全世界各大电视台都充斥着关于中国的节目，许多国家的民众都掀起了学习汉语的热潮。因此，中国对海外华人的吸引力也与日俱增。我儿子参加的周末汉语补习学校甚至决定停课一天，以使孩子们能够参加伦敦为奥运会火炬传递而举行的庆典活动。对海外华人来说，作为故乡，中国正日益为其所扎根的城市所接受。这是中国取得巨大成就的象征，也让全球意识到了奥运会背后所蕴藏的深刻含义。

为了支持北京奥运会，海外华人在全球各大城市中举行了声势如此浩大的活动，这表明他们对所在国家和中国政府来说都是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当然，此类现象并非新生事物，也不是仅存在于中国的特殊情况：很多国家的侨民一直在支持其祖国的活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其中影响最深远的莫过于“二战”后犹太人对以色列的支持。相较于其他国家的侨民，华人虽有共性，但又有着自身的特点：他们广布全球，数量庞大，从非洲到欧洲、从东亚到美国，我们都可以看到海外华人熟悉的身影；由于受到特定历史和文化因素的影响，海外华人拥有强烈的“中央之国”的身份认同；中国已成为世界大国，并渴望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随着中国实力的增强及其全球利益的扩

大，海外华人的数量将大幅增加；随着中国经济取得巨大成就，海外华人、华侨的生活水平也将不断提高；随着中国地位的提升，华人、华侨的声望必将不断提升，其对中国的归属感也必将不断增强。

中国如何对待差异

和其他大国一样，中国也将用自己的历史和价值观看待世界，并试图依此来塑造世界。然而，当今世界充满了巨大差异和多样性，即便是像中国这样庞大的国家，也无法成为整个世界的缩影。于是，中国会如何面对差异性，会如何看待其他民族纷繁多样的历史、文化，以及民族和种族特色，就显得尤为重要。那么，中国会怎样对待其他与其截然不同的民族呢？会在多大程度上对其他民族表示尊重和理解？能否包容其他民族的不同经历吗？这些问题很难回答。首先，在历史上，中国除了与邻邦有所往来，基本上都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其次，这些问题的答案目前显然还是个未知数，中国当前的行为还只能作为参考，因为中国目前的实力和影响还十分有限，也许将来会大不一样。在此后的探讨中，我们应对很多因素进行考量。

中国的民族史十分独特。虽然中国由众多民族组成，但将全体中国人视为统一的“中华民族”的汉族仍占据着绝对主导地位。其他民族加起来则还不到中国总人口的9%（虽然也有1.05亿人之多），因此被称为“少数民族”。王晓东认为：“中国人的起源也许很多，不过95%的中国人都相信，中国人属于同一个民族。”多民族合而为一的关键，就在于中国罕见的、延续的悠久历史。正是在这个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汉族得以形成，代表并融合了中国的绝大部分人口。这既是中国作为文明国家留下的财富，也是华东地区的民众不断融合（从古至今就是人口最为密集的区域）和数千年来强烈的中华文化认同感作用的结果。实际上，每个国家都是独具特色的种族建构的结果。就中国而言，实际上就是不断汉化的过程。其力量则源于占主导地位的汉族

所提供的纽带和凝聚力，如果没有这种凝聚力，中国就会像其他帝国一样分崩离析。然而，其缺陷在于对差异的理解和尊重不够。黄平认为："历史上汉族人在中国称雄的过程，也就是其他民族臣服、种族差异消失的过程。'中华民族'就是在这一过程中形成的。"因此，中国人常常低估甚至忽略了民族差异，认为其只是暂时的现象，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会被汉族的认同所覆盖或取代。而造成的后果之一，就是对其他民族的认可不够。

虽然中国是世界第一的人口大国，但其民族构成却非常的同质化，这在整个世界范围内都是独一无二的。正如贾雷德·戴蒙德所指出，世界上其他的四个人口大国印度、美国、巴西以及印度尼西亚，不仅都是近代的产物，而且也都是多语言、多民族的"民族大熔炉"。然而，中国的情况却并非如此。实际上，许多汉族人还相信，他们不仅同属一个民族，而且同宗同源。至少就象征意义来说，他们都是黄帝的子孙。中国人在种族问题上的看法与世界其他所有地方都不一样，这不禁让人提出疑问：中国人能真正理解和尊重其他国家那些起源和构成与之迥异的民族吗？世界上其他的人口大国，特别是印度、美国、巴西和印度尼西亚，均承认其起源和人口构成的多样性。实际上，这些国家还都为自己的种族多样性和文明多样性感到自豪，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反观中国，除了一些偏远地区，种族和民族实际上已经合二为一，这在其他人口大国绝对是不存在的。

中国独特的历史会不可避免地影响它对其他民族的看法。黄平指出："汉族人认为自己同根同源，他们这样看待自己，也是这么看待别人的，比如印度人或者非洲人。"换言之，对于如何理解外部世界里各民族差异的实质这个问题，中国人确实有不小的困难。黄平还表示：

中国要了解的东西还很多，不仅是我们是谁、从哪里来、怎么来的这些简单的问题……人们不应该理所当然地就认为大家都

是中国人。其实这是一个历史建构的过程。大家都把它当成了必然，实则不然。我们可以教给（世界）一些东西，但首先我们必须先学习了解一些东西。

然而，由于中国人的这些观点由来已久、根深蒂固，因此，任何观念上的重大改变都需要极为漫长的过程。与此同时，中国人脑海中所潜藏的优越感多少会影响其对世界其他民族的态度和认知。

中国人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由于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明，因此中国人常常极度自信，甚至在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这段充满了动荡和灾难的岁月里也没怎么动摇过。而所有的一切，自然也留下了自己的印记。1986年，《丑陋的中国人》一书曾在中国风行一时。此书作者柏杨是中国台湾人。他在书中形容中国人总是处于两个极端，“一方面是绝对的自卑，一方面是绝对的自傲。自卑的时候，成了奴才；自傲的时候，成了主人！自卑的时候觉得自己是团狗屎……自傲的时候觉得其他人都是狗屎，不屑一顾”。这刚好抓住了“屈辱的百年”对中国人的心理以及他们脆弱的情感所造成的影响。然而，如果据此就像柏杨那样断言：中国人曾在其他所有种族面前都感到自卑，那可就错了。我们惊奇地发现，虽然中国人在现代历史中长期受到各种问题的困扰，但他们仍然没变，仍然认为自己是优秀的民族。的确，中国人在遭受挫折的时候曾自卑过，但这个阶段相当短暂，因为中国人很快就恢复了自信。陈光兴教授则认为：

这种民族自豪感为汉族人提供了一个心理机制，用来对抗帝国主义的干涉，并使自己的生活显得不那么糟糕。‘这些（白）外国鬼子可以打倒我们的身体，但绝对无法征服我们的思想’……但与此同时，这也一逻辑也带有种族歧视的色彩……这是一个利盾，既可以防身，也可以伤人。

另一位台湾作家卢令（音译）在谈到中国人的这种观点时也清楚地表示：“中国人在心底里自认为是优秀民族。”除了中国，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人民都没有如此强烈的自信。

如果我们认为中国人的优越感完全或者主要源于其种族身份，那就错了。因为这种优越感是他们的文化和种族身份共同作用的产物，已经存在了数千年。中华帝国能够持续扩张，首先是靠武力征服，其次是靠渐进的民族融合和民族同化过程。中国人的观念摇摆不定，有时认为其他民族无法接纳中国的文化，有时又认为其他民族可以被教化，这都取决于中国人当时的自信度，以及当时各方面的实力对比。换句话说，中国的扩张是一个霸气十足的伟业，渴望将其他民族吸收进来，用中华文明去开化他们，最后达到民族同化的目的，使他们成为中华民族的一部分。“中华民族”这个概念在中国扩张、融合的过程中不断被重新定义，包括在中国历史上那些不是由汉族建立的朝代也是如此，因此“种族”这个概念在中国并不是、也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它一直都处于变化之中，只不过比较缓慢而已。因此，尽管“种族”这一概念在今天看来的确具有排他性，但这并没有妨碍中国人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对其他民族的吸收与同化。

中国人认为，他们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然而这种自信可能会给世界带来一些困扰。毕竟这种态度在中国积贫积弱时是一回事，在他们拥有巨大的全球权力和影响力时又是另一回事。当然，欧洲等西方世界也曾出现过这样的现象，他们也长期抱有基于文化和种族观念上的优越感。但两者却存在两个明显的区别：首先，中国的骄傲源远流长；其次，中国有世界上1/5的人口，要比西方世界的人数多得多，即便是英国和美国到达人口顶峰时也未能望中国项背。那么，中国成为一个超级大国后，这种优越感将对中国的行为有何种影响，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中国人认为，中国应该实现民族复兴，过去的两百年对中国来说不过是历史的车轮稍稍偏离了原有的方向。20世纪，每一位中国领导人几乎都以洗刷半殖民地时期的民族耻辱、重塑中国辉煌作为历史使命。“二战”后的德国也希望能够重现复兴，但德国的挫败感无非是几十年前的事。然而，民族复兴的夙愿已经萦绕在中国人的心头长达百年之久。阎学通是中国国际关系的顶尖专家之一，他对中国的复兴有着以下简要的描述：

> 中国的崛起是自然而然的。中国人对自己在人类文明史上取得的早期成就颇为自豪。在过去的两千年里，中国数次成为世界超级大国，比如在汉代、唐代以及清初……中国在历史上的超级大国地位一方面让中国人极其自豪，另一方面也让中国人对中国目前的国际地位深表痛心。他们相信，中国的没落是历史的错误，所以他们应当更正这个错误……中国人认为，中国的崛起只不过是中国重获它应有的国际地位，而并不是得到什么新东西。

或者如白鲁恂所说：“中国人的潜意识里影响最大的就是其显著的、毋庸置疑的、无可动摇的历史自豪感。因此，‘我是中国人’这样一个事实就足以被看作最伟大的历史奇迹的一部分。”在中国人眼里，中国的崛起和复兴，似乎是历史的必然。

中国人与众不同的优越感和自豪感，其根源并不在于近代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经历，而在于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国家所拥有的悠久历史。事实上，作为民族国家的中国在近代史上曾饱受他国凌辱。我们应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看这个问题：一是中国的文化优越感至少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二是中国的民族优越感与文化优越感紧密相连，也使中国人具有了与生俱来的优势心态：作为中国人，其意义非同一般。而文化优越感和民族优越感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中国特有的“中央之国”心态。那么中国的这些信仰和观念到底已经存在了多久呢？这的确是个有意思的历史问题。显然，我们可以拿中国与埃

及、希腊、罗马这三个文明古国做一下比较。如果现代埃及人、希腊人、罗马人也认为，他们辉煌的古代文明可以为他们今天或者将来的命运给予任何指导或是慰藉，那简直不可思议——但这恰恰就是大多数中国人的想法。这并不是说中国人的认同就是一成不变的。恰恰相反，在中华民族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特质”的内涵总是处于变化之中。正因为这些理念由来已久，所以它们具有极强的历史延续性和适应性，而且短期内在重要的领域都不太可能发生任何变化。而中国的崛起极有可能进一步强化这些理念。

西方对中国的评论，错就错在太过于关注中国的政体、民主的缺失、共产党政府以及所谓的军事威胁等问题。事实上，中国崛起所带来的真正挑战很可能是文化上的，比如我们之前讲到的“中央之国”心态。或者换句话说，中国崛起所引发的最大难题并不是民主的缺失，而是中国会如何处理自己和别人的差异。除了利益以外，一国的历史和文化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它会以何种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历史上每一个曾经称霸的国家或者大陆都会用一种全新的方式来展示其实力。比如欧洲的典型方式就是海上扩张和殖民帝国，而美国则是空中优势和全球经济霸权。中国同样也会以崭新的方式来展现其实力。

毫无疑问，中国与西方的传统截然不同。虽然二者也存在着些许相似之处，最明显的就是普世主义的理念、一脉相承的优越感等，但在实践中其作用的方式却大相径庭。尽管历史上中国曾一而再再而三地通过陆上扩张来扩大自己的版图，但和西方的海外扩张以及欧洲人在全世界建立殖民地相比，仍存在天壤之别。即便是在远离自己所在的大陆，西方仍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塑造世界。但西方的这种方式，中国绝不敢苟同。同样，儒家思想同化其他信仰的方式也与基督教或伊斯兰教迥然不同。中国最有可能获得主导权的领域还是文化。中国人的文化自信感和文化优越感植根于他们作为文明国家的悠久灿烂的历史。这一点和美国完全不同，因为后者并没有如此丰富的历史遗产可

利用；和欧洲也有区别，只不过没有和美国的差别大。中国看待世界，很大程度上是以文明的视角。因此在中国崛起为一个世界大国后，很可能会在文化等方面改变现有的世界秩序，当然这将是一个极为漫长的过程。中国对世界各国乃至各个大陆的影响，绝非经济那么简单，更多的是文化的影响。

第8章
中国与周边国家：愈加紧密，还是错综复杂？

20世纪90年代早期，关于中国的研究著作可谓凤毛麟角。当时研究的焦点是“亚洲四小龙”。即便如此，西方的研究人员也基本上是以新加坡和中国香港为着眼点，透过当地的视角来看待中国大陆乃至整个地区。初到亚洲时，我也遵循了同样的方式：新加坡和香港是我必去的地方，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那里有比较成熟的人脉网络，大部分人也都会说英语。鉴于文化上的偏见，那么对中国的了解仅仅是管中窥豹，也就不足为奇了：当时所有的问题都可归结为大陆会在何时、多大程度上受香港的影响。当香港最终于1997年回归时，几乎每个英国人都在洋洋自得地认为，这颗东方明珠不会像昔日在大英帝国统治下那样继续散发出耀眼的光芒；而且，这些人大多都认为中国未来的走向，将取决于与香港类似的程度。按照这个观点，中国的发展由它向其他国家和地区学习的程度决定，知识流动的方向永远是从海外向国内流动，而非从国内向海外流动。不过这一说法的确反映了一定的实情：东亚地区的转型的确是在中国大陆之外开始的。但在这个全面转型的过程中，中国香港与新加坡所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还有待商榷，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作用更重要一些。相较于中国香港与新加坡，这些国家和地区与西方的相似程度更低，西方在其转型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也更小。

实际上，这种观点是对中国的贬低，它把中国看成了一个空瓶子，需要不断地吸收西方的思想和技术。诚然，中国的确有很多地方要向西方学习，但它的转型却主要由内生驱动，而非西方之功。实际

上，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靠香港和台湾地区的企业家的投资；那么到了20世纪90年代，这一情况就迅速发生了逆转。中国再次成为影响力、权力和财富的中心。20世纪80年代，香港、台湾乃至东南亚地区的资金源源不断地流入了大陆；现在的态势却恰恰相反。中国，已经取代了周边国家，成为东亚各种影响力的中心。

香港虽然还是香港，但在经济上已经被中国大陆重新塑造。就市值而言，上海的股票交易额已经超过了香港。在北京或上海就能发现价值所在，谁还会去香港？过去10年发生的一切表明，大陆对台湾的重要性远比台湾对大陆的重要性更甚，台湾经济因对大陆相对隔绝的政策而不得不承受日益加深的痛苦。同样，在整个地区的范围内，中国的影响力正在逐步增强。中国的吸引力无处不在。先前发生在中国之外的故事，现在的场景都已经切换到了中国。中国的经济增长及其外溢效应日益明显，对老挝、柬埔寨、韩国、日本、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澳大利亚等国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国的崛起正在重塑东亚，东亚的发展日程在很大程度上将由中国决定。

对于中国崛起，我们既不应站在欧洲或美国的角度居高临下的观察，也不应以非洲或拉丁美洲的视角去分析，而应以东亚的视角去考量。东亚可被视为中国的后院，已经深刻地体验到了中国崛起所带来的重要、深远的影响。如果我们想要理解中国崛起及其对世界影响的内在含义，这就是最好的起点。中国怎样在东亚地区处理自身崛起带来的问题和发挥影响力，也就意味着它成为世界大国后会怎样对待世界。

若想成为世界大国，一般都需要首先成为地区的主导性国家。英国在这个问题上是特例：在19世纪获得全球霸权之前，英国没能主导欧洲。相比之下，由于美国在北美洲没有强大的对手，所以很快就取得了地区的主导性地位，最终在20世纪下半叶成为世界大国。中国要

在东亚地区取得主导地位仍任重而道远。东亚地区的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1/3，中国在崛起的过程中还要应对两个主要竞争对手，即日本和美国。日本至今是东亚地区经济最发达的国家，尽管其经济总量（以市场汇率计算的GDP为标准）已不再居地区首位。与此同时，美国通过其在遍布东亚的同盟网络、军事基地，特别是海军力量，至今仍是该地区最强大的军事力量。此外，东亚在地理上属于亚欧板块，中国北边同俄罗斯接壤，西南与印度为邻，这两个国家的实力也相当强。因此，中国若想成为东亚地区的主导力量，必然不会一帆风顺，也不会在短期内实现。

然而，历史为中国的复兴之梦提供了不少激励。直至19世纪最后几十年，中国一直是东亚地区的绝对主导。当时的中国是“中央之国”，其他所有国家在不同程度上——取决于它们距北京的远近——都得向中国表示臣服，并承认自己是“天朝上国”的藩属国。这种以中国为中心的等级体系最早可追溯至汉朝，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扩展至相当一部分东亚国家。在这一体系中，其他国家统治者在与中国皇帝的接触中应遵照一定的礼仪和制度，如纳贡等，以表示其对天朝上国权威的认可。这也就是著名的“朝贡体系”。到清朝时期，“朝贡体系”的制度发展得十分完备，其内容包括：按照清朝的等级制，授予异族统治者衔位；在公文中使用清朝历法，即冠以大清皇朝年号；在相关的法定时节，进献各类纪念性贡品；在进贡的同时按照大清律法递交国书；向清朝皇帝行三跪九叩大礼；清朝在接纳贡品的同时会向藩属国回赐并给予其一定的贸易特权和保护。如果各国愿意承认中国文化的优越性并按规定向皇帝纳贡，那么清朝皇帝一般会采取不干涉政策，让它们自行处理国内事务。因此，朝贡体系更像是一种文化和道德体系，而不是管理体系或经济体系。当然，其中包含着重要的贸易成分。中国优势地位的基础在于其超强的经济实力和文化、政治体系的优势。中国皇帝很少真正运用强制性的权力，其控制往往是象征性的。事实上，中国之所以能够控制众多的藩属国数千年之久，正是得益于中国所采取的简单而松散的统治模式。在朝贡体系

中，处于相对中心位置的是“大中华圈”，即朝鲜、越南、日本和琉球。这些国家受中华文明的影响最深，特别是文字书写体系、儒家文化及中国的治理和官僚模式。第二圈是亚洲内陆国家，包括蒙古等社会、文化、语言与中国有较大差异的国家。第三圈则是泰国、缅甸、马六甲等东南亚国家，它们向中国纳贡或至少承认中国的宗主国地位。那些在地理和文化上与中国都比较接近的国家，地位也要高一些。比如，中国如果算是大哥的话，那么朝鲜就是二哥，而日本就是小兄弟。

鉴于朝贡体系涉及地域、国家与文化的多样性和较长的时间跨度，如果将它视为一成不变的单一体系，那就错了。汉、唐、明、清各朝的朝贡体系皆有所不同，同一朝代的朝贡体系也有可能发生很大的变化，如明朝早期和晚期的朝贡体系就有很大的差异，清朝早期和晚期亦是如此。此外，也不应将朝贡体系理解为古代中国国际关系的全部。实际上，中国的对外交往要综合考量安全、战争、军事等诸多因素，中国传统阶级的统治方式也展示出了相当的灵活性和实用主义。实际上，在中国古代的国际关系中，最为主要的一条主线就是中国的“天朝上国”思想。这也涉及中华封建王朝合法性的核心，即历代王朝的统治者都认为自己是天子，受命于天，因此其他国家的统治者都应听命于己，称臣纳贡以示顺从。而在实际中，中国的这种“天朝上国”的思想也会因时、因势而异。如果中国的国力较弱，如宋朝时，统治者就无力维持朝贡体系，因此不得不视邻邦为平等的国家。然而，无论中国国力强弱，正如历史学家王庚武所指出：“在如此长的时间里，中国的统治者总是能够在朝贡体系的神话和被迫接受现实之间转换自如，却从不曾放弃‘天朝上国’的信仰，这的确令人称奇。”不同国家和朝代下的朝贡体系的本质一直都处于变化之中。以日本和韩国为例，与韩国相比，日本拥有更大的自主性，并时不时地挑战着整个朝贡体系，甚至在朝贡体系处于顶峰的明朝早期也是如此。无疑，这也是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展示出了非同一般的独立

性、公然挑战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和转向西方的原因之一。而且，这也是现代韩国与中国关系较为密切的原因之一。

毫无疑问，贯穿于朝贡体系发展始终的主线就是承认中国文化优越性，只是程度不同而已。这种对中国文化优越性的承认，加之中华帝国超凡的实力，也正是藩属国接受朝贡体系，并自愿将中央王国的利益视为本国利益的原因。朝贡体系在历史上长期处于相对稳定状态，固然可归因于其灵活性，但最重要的原因则是中国在体系中占据压倒性的优势地位，可以凭借一已之力维护整个体系。19世纪下半叶以来，随着欧洲国家乃至后来日本实力的增长及中国的衰落，以欧洲国家为主体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和殖民体系逐渐代替了朝贡体系，并在东亚地区国家间的关系中发挥着主导作用。或更确切地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和殖民体系已经凌驾于朝贡体系之上。

由于朝贡体系在东亚已经存在了2 500年，因此其深嵌在东亚地区的历史记忆中。东亚大多数国家都曾向中国进贡，直至一个世纪或一个半世纪以前依旧如此。虽然朝贡体系在19世纪末已经走向崩溃，但其影响却一直持续到20世纪。因此，如果未来中国采用传统的朝贡体系的方式来处理与东亚国家的关系，也是可以理解的，而且肯定可以看到它的影子。此外，还有不少中国人都认为，中国理应是主导东亚的核心，因为中华文明在东亚无出其右，中国应有的地位是历史所赋予的，必定会在将来得以重现。中国人仍将它的邻居叫作“外围国家”，这也表明传统的思维方式至今仍有重要的影响，或许中国会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来重新确立朝贡体系在新时代下的含义。因此，如果古老的朝贡体系能在中国再次成为东亚经济的中心之时衍生出新的含义，那么我们也不必为此大惊小怪。著名学者费正清对朝贡体系的研究之深入至今无人能及。而早在40多年前，费正清就曾指出：“民族共产主义的中国已经继承了一整套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而这种思维方式与在相互平等的主权国家之间盛行的欧洲国际关系传统却难以相容。当代中国在19世纪和20世纪适应民族国家国际秩序时所遭遇的困

难，多少也与中国天下体系的传统有关。而这一传统不仅具有历史意义，对当代中国的政治思想也有着重要影响。”在欧洲国际关系传统和理念主导的当代世界，对中国的朝贡体系进行分析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令人感到遗憾的是，至今为止，朝贡体系没有得到西方学者，包括西方国际关系学者，应有的重视。中国的朝贡体系传统与西方的国际关系理念截然不同。我们必须要认识到，殖民体系在过去的几百年中一直是西方处理与世界关系的主要方式，但中国的天下观中却从未有殖民思想的存在。

于是，我们在此便遇到了一连串的复杂问题。中国会重获此前的地区主导地位吗？这个过程要多久？会以何种方式实现？这样的主导地位会是什么样子，将会采取何种形式，与过去的朝贡体系在哪些方面以及多大程度上相类似?

中国重回舞台中央

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的改革开放虽然已经进行了10多年，但中国却仍处于相对孤立的状态。整个90年代，中国毅然拒绝参与任何地区性的多边安排，不愿给日本打下手。同时，中国也十分清楚美国的态度，美国对于任何可能将其排除在外的地区性国际组织都表示强烈反对。此外，由于长久以来一直存在的历史优越感，中国一如既往地对该地区的事务表现出冷漠、疏远的态度。所以，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仅仅同韩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越南以及文莱等国建立了外交关系。然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期，中国决定开始实行一种全新的战略，并且以惊人的速度付诸行动。

1994年，中国同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以及塔吉克斯坦共同建立了“上海五国”会晤机制，以应对苏联解体后中亚地区面临的问题，借此同俄罗斯展开接触，并谋求在中国西北边疆地区同

这些国家展开合作。2001年，各成员国在“上海五国”会晤机制的基础上正式成立了更为完善的上海合作组织（以下简称“上合组织”），还将乌兹别克斯坦纳入其中，并在上海设常驻办事机构。同时，该组织也将担负起更多新的使命。上合组织的目的有三：第一，促进中国同中亚国家的合作；第二，共同应对伊斯兰极端主义；第三，抵制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上合组织先后将印度、伊朗、巴基斯坦、蒙古以及阿富汗接纳为观察员，并邀请东盟和独联体向该组织派遣代表。虽然我们很难预测上合组织的未来走向，但它确实代表了一个实力强大的中亚国家集团，而且还高度独立于美国的影响之外。中国新战略的核心不在西北，而在东南，即东南亚。数百年来，中国对东南亚地区的事务历来持有一种敬而远之、漠不关心的态度。然而毫不夸张地说，过去的十余年里中国在东亚地区的战略支点就是改变了其对东盟的看法，即改变了对这个成立于1967年、拥有10个东南亚成员国的地区性国际组织的态度。

中国对多边主义的拥护姗姗来迟，对此我们该做何解释呢？首先，也是最关键的一点，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建设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因此不仅信心倍增，整个国家也更加雄心勃勃。其次，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这不仅意味着它即将融入国际体系，而且还标志着中国已经全面接纳了多边主义。再次，中国逐渐适应了自己在本地区所处的地位，同时也满怀信心，相信中国不会久居日本之后。最后，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沉重地打击了东南亚国家（以及韩国）的经济，从而使中国与相关国家的关系日益紧密。这些遭受危机的国家都曾经历过长期的经济高速增长，但经过残酷的经济危机之后，终于清楚地认识到：一方面，自己在全球性的经济波动面前是何等脆弱；另一方面，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加于自己的危机解决方案将给自己带来怎样的伤害。在努力摆脱金融危机影响的同时，东盟国家开始以一种全新的视角来看待中国，不再将中国视为令人恐惧的对手，也不再对中国的动机妄加揣度，而是越发将其视为朋友和伙伴。这其中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保持了人民币的坚挺，没有令

东盟国家的经济雪上加霜。此外，中国在危机期间还向东盟国家继续提供了援助和无息贷款。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穆罕默德曾在1999年表示：“中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中的表现值得赞赏，任何一个国家都应该对其坚持人民币不贬值致以崇高的敬意。中国的合作与高度的责任感为阻止地区经济的恶化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倒退10年，中国和东盟的这种友好关系还是不可想象的，而此时却成为必然。对于中国人来说，这样的关系也意味着他们需要采取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要解放思想，摈弃陈旧的观念，以国内经济改革的勇气来处理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关系。

令人惊奇的不单是中国突然间准备支持本地区的多边主义，还有中国所采取的方式。自唐代以来，中国一直以高高在上、漠不关心的态度来对待周边国家，认为中国并不需要邻国，而是邻国需要它。如今中国却准备和东盟国家接触，而且是以东盟的方式，要知道东盟的成员国基本上都是东南亚地区最弱小的国家。换句话说，中国的态度变得格外谦逊，让这些东南亚国家觉得新鲜和陌生。历史上，东北亚地区一直是中国、朝鲜和日本等古老而强大文明的家园，而东南亚则相对比较落后，经济发展程度较低，民族众多且民族观念极为淡薄，因此，前者在本地区曾处于明显的支配地位。现在，这种“北强南弱”的传统局面竟然出现了大逆转，至少在外交领域如此。

就东盟方面来说，能够同中国建立新的友好关系主要得益于两个历史举措。第一个是在1992年，当时东盟决定建立东盟自由贸易区（AFTA），要求其10个成员国在2010年之前消除所有贸易壁垒，实现成员国之间的自由贸易。第二个是在1990年，时任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呼吁东亚各国成立一个东亚经济集团，也就是后来的东亚经济论坛，以应对西方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对亚洲国家造成的负面影响。马哈蒂尔的提议得到了东盟国家的支持，但遭到了日本的反对，因此直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该提议才真正被提上了议事日程。马哈

蒂尔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提议，是因为他坚持认为只有东亚各国才有资格加入本地区的国际组织，他并不赞成像亚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那样允许美国和澳大利亚等非亚洲国家加入。事实上，马哈蒂尔的立场也预示了东亚各国内部日益严重的分歧，即是否应将美国排除在东亚地区之外。日本的态度一直是否定的，而中国虽然没有明确表示，但实际上在大多数情况下还是希望将美国排除在外。

1997~2001年，中国对东盟的态度有了重大转变。在2001年举行的中国——东盟峰会（“10+1”峰会，即东盟10国加上中国）上，中国提议在2010年之前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而前期谈判早在1999年就已经开始了。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一个极为大胆的提议，因为中国和东盟的人口加起来差不多达到了20亿，这使得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将成为世界上迄今为止最大的自由贸易区。正如中国所倡议的，中国——东盟自贸区最终于2010年1月1日全面启动。此前，东盟各国在面对中国时已经表现得越来越紧张，担心中国日益强大的经济实力会影响它们的出口以及外商对它们的投资。在中国提出建立自由贸易区后，东盟国家终于放下心来，相信中国不会只顾自己的经济发展而不考虑会给其他国家造成怎样的后果。在2003年举行的中国——东盟峰会上，中国正式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成为第一个接受1967年《东盟宪章》的非东盟国家（印度紧随其后）。此外，中国还于2002年签署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承诺不以武力解决南海的争议问题。

关于南沙群岛和西沙群岛的归属问题，中国历来与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以及文莱等国家存在严重分歧，并曾经与越南和菲律宾发生过武装冲突。中国和东盟签署的相关协议给整个东亚地区的政治局势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在这些协议签订之前，日本作为活跃在东南亚地区的主要经济体，曾一贯反对建立任何地区性的贸易组织，只希望在双边协议的基础上发展贸易。如今，日本突然发现自己被甩在了

后头，受到中国积极外交策略的牵制，于是便开始加快了追赶的步伐。

其实早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就已经举行了第一届东盟与中日韩（“10+3”）领导人会议，并在后来演变成了定期会晤。在2003年的“10+3”会议上，中国总理温家宝提议对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进行可行性研究，并得到与会各国的支持。继中国之后，日本也在2005年开始与东盟就签订日本——东盟自由贸易协议展开谈判，并于2007年达成了框架协议。2012年，澳大利亚与新西兰也与东盟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至此，在东亚地区进行的贸易谈判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个由各种双边、多边自由贸易协定组成的复杂网络。而这一系列自由贸易协定将有可能成为一个更为广泛的东亚自由贸易协定的基础。东亚自由贸易协定计划于2007年成形，并于2020年之前正式启动。实际上，现在东盟已经与6个国家（除中日韩外，还包括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就建立“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展开了全面的商谈。当然，对于这样一个协定最终是否能成为现实，我们将另当别论，但以中国为主导、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过程本身已经与世贸组织多哈回合谈判的僵局形成了鲜明对比。在多哈会谈中，无论是东盟，还是其他东亚各国都未得到应有的重视。

东盟不仅在东亚新的制度安排中处于核心地位，而且还为东亚合作提供了自己的模板。虽然东南亚各国历来在地区关系中处于弱势（比如，1999年东北亚各国的GDP之和足足有东盟经济总量的9倍之多），但东北亚各国却不可能发挥同样的作用。其一，东北亚各国历来不和，首先是中日之间存在一些争议，其次是日韩矛盾，再加上中国台湾问题和朝鲜半岛的敌对状态，使整个东北亚地区分歧严重。其二，在东北亚地区既没有一个像东盟这样的地区性国际组织，实际上也根本不存在任何正式的多边合作框架。当然，早在10多年前，中日韩三国就分别与东盟建立了双边会谈机制，此外，2008年三国还宣布在未来将举行独立的三边首脑会谈。这些因素导致的一个重要结果就

是将美国有效地挡在了东亚地区的经济外交之外。虽然中国并没有明确表示要将美国排除在外，但不论愿意与否，这都已是既定事实。20世纪90年代中期，亚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曾名噪一时，且美国也是该组织的重要一员。但如今这一切似乎都已成为遥远的回忆。然而，2011年年末，美国却决意通过吸纳更多东亚国家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的方式，在地区经济制度上重返东亚。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始于2005年，新加坡和文莱都是创始成员国，现在马来西亚、日本和越南则正在就加入该协议进行商谈。同样将美国边缘化的还有2000年签署的“清迈倡议”。该倡议是在中国的倡导下签署的，其主要内容包括东盟国家、中国、日本和韩国之间双边货币互换协议的建立等，这样就能确保相关东亚国家的货币在受到风险冲击时能够得到支持。此外，协议的内容还包括该协议成员一旦出现收支平衡问题和短期支付问题，有权依据协议规定，以其本币与美元实施互换，以补充流动性。“清迈倡议”资金的总规模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已经达1200亿美元。

日本曾于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提议设立亚洲货币基金，“清迈倡议”正是该提议的直接产物。日本的提议当时遭到了中美两国的强烈反对。美国表示反对是因为它可能削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作用，而中国则是因为该提议来自日本这个劲敌。自此以后，由于人民币的地位得到了巩固与加强，中国不再表示反对。而美国则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时的失败表现，也不再反对相关提议。

如果说东盟提供了一块画布，那么在这块画布上重画东亚政治经济版图的就是中国，所用的画笔便是积极主动的外交政策。事实上中国一直在探寻各种方式，以期成为本地区的主导力量。而对中国在本地区日益增加的影响力起支撑作用的，正是它日益增强的经济实力。这才是改变整个东亚地区的真正动力，是重塑本地区格局的真正力量。欧盟是先有政治上的统一，而后才有经济上的融合；而在东亚，经济是促成改变的真正动力，随之而来的才是政治上的变化。在东北

亚没有达成正式贸易协议的情况下，日本、朝鲜和韩国、中国大陆以及台湾地区的贸易总额已占据了地区贸易的52%，而这一格局是在短短10年内形成的。相比之下，欧洲地区内贸易额攀升到贸易总额的60%，足足用了半个世纪。1991~2001年，全球贸易总额增加了177%。而尽管期间出现了亚洲金融危机，亚洲的地区内贸易还是增加了304%。截至目前，中国经济的强势增长一直是亚洲贸易发展最为强劲的动力。1990~2002年，中国在区域内贸易中所占的比例翻了一番，并始终保持增长态势。20世纪60年代亚洲四小龙的出现，及此后其他亚洲国家的腾飞和中国的崛起，使人们开始将东亚的经济发展比作“雁型模式”，领头的是日本，其他国家依次跟随其后。但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日本在本地区经济上的领头地位越来越多地被中国取代。1980~2002年，中国占整个东亚地区出口总额的比例从6%上升到25%，而日本则从50%下降到30%；同样，中国在这一时期占东亚地区进口总额的比例从8%上升到21%，日本则从48%下降到27%。

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即便是在日本的影响力处于巅峰的时期，它所起的作用也是有限的，因为日本一直拒绝向邻国开放其国内市场（其海外子公司的商品除外），对来自世界其他国家的出口也加以限制，日本的影响力只是体现在对其海外子公司的直接投资，进口其海外子公司的商品以及日本对本地区其他国家的出口之上。而中国的情况则与日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由于选择了极为开放式的经济发展道路，中国的影响力要比日本深远得多。中国不仅为来自本地区其他国家的产品提供了市场，而且还为这些国家提供了商品和多元化的投资。

张蕴岭是中国新战略的设计师之一，他与唐世平都将中国的目标描述成“通过为地区内国家提供市场、投资、技术，逐渐成为地区经济增长的火车头”。最明显的事例就是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事实上对本地区所有国家来说，中国已成为最为重要的市场，而且也即将成为该地区所有国家最大的市场（见图8－1至图8－3）。对东盟各国来

说，中国市场如今已经是日本市场的3倍。所以说，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承受忽视中国市场或中国的代价。日本也是如此，2009年，中国已经取代美国成为日本最大的海外市场。2010年，对中国（包括中国香港在内）的出口额占日本出口总额的23%。自2000年以来，中国从东盟各国的进口额以每年30%~40%的速度增长。2009年，对华出口占马来西亚出口总额的17%，而1990年仅为2%。2010年，对华出口占韩国出口总额的31%，而1990年相关比例却几乎可以忽略不计。2010年，对华出口占澳大利亚出口总额的21.%，1992年只有3.7%。在东南亚地区，很多人都担心，中国从东盟国家进口大量的原材料会对其所在国家产生不良影响。中国对木材的需求，也确实对印尼地区的森林覆盖率造成了一定影响。尽管从中国的原材料进口中收益颇丰，但印尼却有不少人担心国家会从此陷入“资源的诅咒”，难以实现产业升级。然而，实际上，东盟向中国出口最多的还是各类半成品，中国从东亚进口的工业半成品几乎占了其进口总额的一半。许多外资跨国公司（例如美国、欧洲、日本以及韩国公司）如今都将总装线设在了中国，然后再将最后的制成品出口到最终目的地。于是，在这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复杂的分工体系中，像马来西亚和泰国这样的国家也还是占有重要一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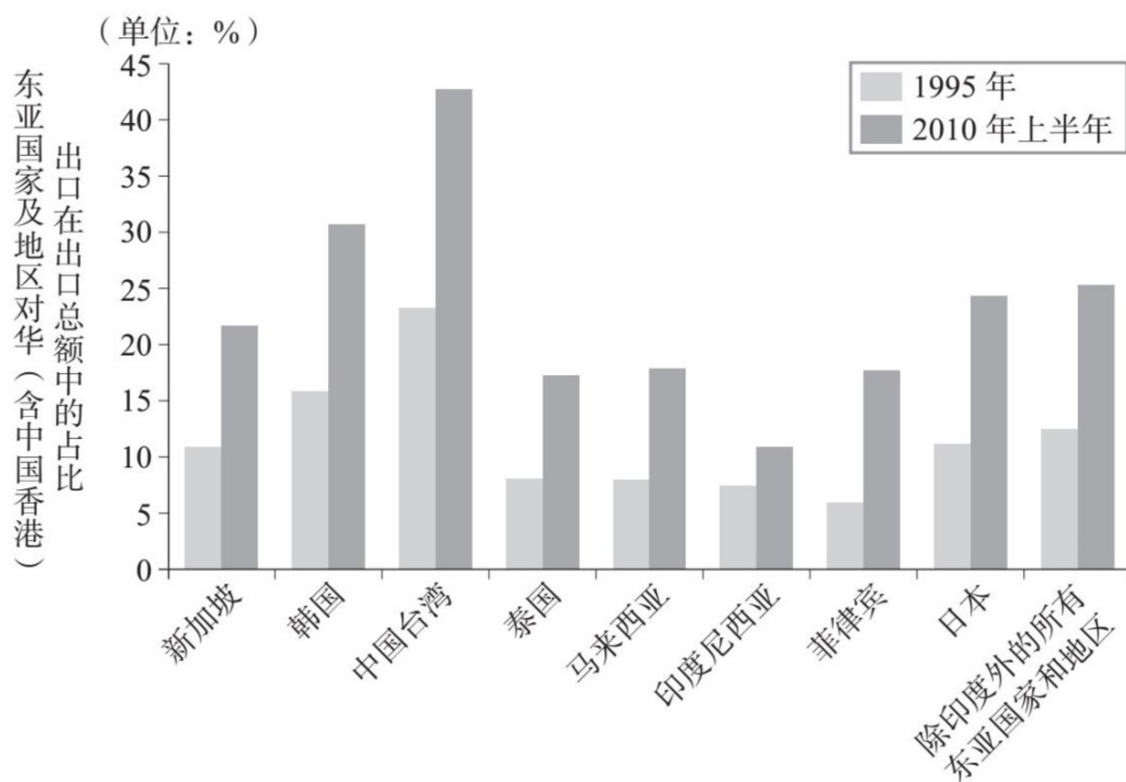


图8–1 中国市场对东亚国家及地区与日俱增的重要性

数据来源：法国巴黎银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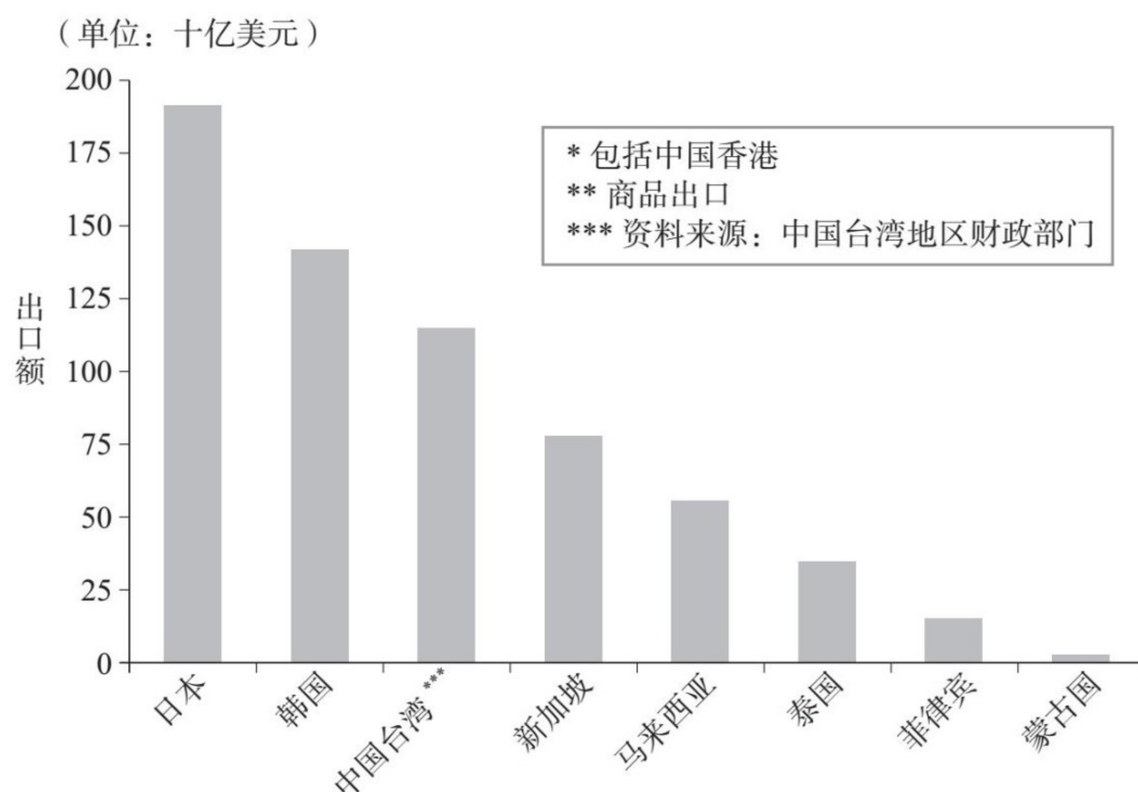


图8–2 中国*作为其最大出口目的地的东亚国家和地区**

数据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统计年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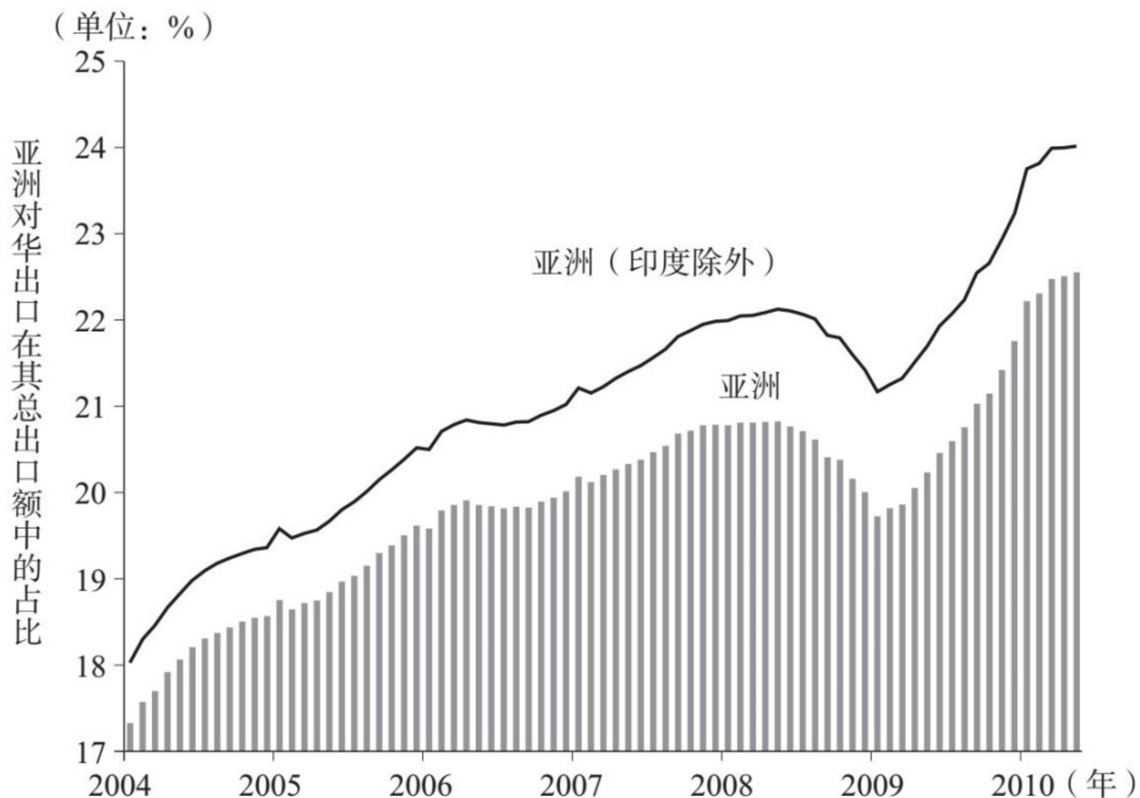


图8–3 中国市场约占亚洲出口总额的1/4

数据来源：法国巴黎银行

此外，中国在本地区也越来越多地扮演着投资人的角色，其相当一部分资金都投到了矿产领域、石油加工业、铁路和公路基建领域，以提高中国对该地区自然资源的利用效率。2002年，中国对亚洲其他国家的投资占其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60%。因此，虽然过去几年里西方国家对东南亚投资的减少产生了一定的不利影响，但来自中国的投资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替代作用。

唐世平和张蕴岭将中国的地区战略描述为“积极参与、自我克制、提供保证、开放市场、促进相互依存、创造共同利益、减少冲突”。通过迈出这大胆而出人意料的一步，中国以当年邓小平的气魄成功改变了本地区的格局，促进了本国乃至本地区经济的发展，并使自己日益成为未来地区经济发展的关键。中国的东亚政策充分展现了

中国在外交上的勇气十足和深不可测，就如同1971年毛泽东决定同美国改善关系一样。中国对东盟极为重视，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改变了东北亚地区矛盾重重的局面，因为在中国总理温家宝于2003年的“10+3”峰会上提出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后，日本和韩国也越发参与其中。对于当前东亚自由贸易区这一进程（更确切地说是多个进程）的结果，我们还无法预料。因为这样的进程本身就具有开放性，涉及方方面面，而且随着印度乃至其他南亚国家的加入，未来极有可能呈现出不同的态势。如果有那么一天，出现一个完全成形的“东亚经济联盟”，甚至还产生了共同货币，这也并非没有可能，当然这需要消除本地区巨大的经济分歧。

同样，随着中国政府进一步放松对人民币的管制，推动人民币的自由兑换，人民币必将在本地区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实际上，人民币已经开始试水跨境贸易结算。鉴于中国在东亚地区贸易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再加上美元持续贬值，未来的5年内，使用人民币进行跨境贸易结算的频率将会猛增，此外，人民币最终很可能会越来越多地用于贸易结算。在未来的10年内，人民币将更多发挥地区性货币的作用。此外，随着中国在本地区贸易中重要性的增长，本地区会有更多的国家将其外汇储备转化为人民币，人民币必将日益成为该地区重要的外汇储备币种，尽管这并非朝夕之功。实际上，马来西亚国家银行，已经将人民币作为其外汇储备。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周边的一些国家，比如在缅甸、蒙古、老挝、柬埔寨以及越南，虽然人民币目前还不能自由兑换，但事实上已经在自由交易中广泛使用，并在某些时候已经取代美元而成为一种储备货币。

不出所料，中国在本地区与日俱增的经济影响力也正在政治和文化上形成更加广泛的反响。中国的影响力随处可见，只不过在不同国家程度不同而已。正因为中国愿意同其他国家形成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愿意探索新的合作机制，并充分考虑其他国家的需求和利益，所以中国给这些国家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沈大

伟（David Shambaugh）认为："不论是处理双边还是多边外交关系，中国的外交策略都显得成熟而灵活，在本地区广受赞誉。如此一来，本地区大多数国家如今都把中国当成一个友好邻邦、一个建设性的合作伙伴、一个耐心的聆听者，以及一个不会威胁他国的地区性大国。"当中国诚意支持多边主义发展的同时，美国却在2000~2008年期间着力于中东，并在小布什政府任期内极力推行单边主义，二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中国对外援助力度也越来越大，从1993年的2.6亿美元增加到2004年的15亿美元；而同一时期美国却在削减其对外援助的规模。如今，中国对菲律宾的援助已经达到美国对其援助的4倍，对印度尼西亚的援助也是美国的2倍，对老挝、柬埔寨以及缅甸的援助也远远超过了美国。中国在本地区资助了许多重大工程的建设，其中包括东帝汶的新总统官邸和外交部大楼，以及缅甸的新议会大厦。同时，中国还资助柬埔寨和老挝的官员来华培训，并为本地区的政界人士和重要人物日益增多的来华访问提供便利。它还向外国留学生打开了大门，2009年，共有15万名来自东亚其他国家的留学生在中国的大学里深造。本地区学习汉语的热情也不断高涨，在韩国、泰国等国家，汉语甚至成为学校里的必修课。东南亚的中国游客也越来越多，已经大大超过了日本游客的数量。

中国的崛起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在本地区的不同国家引发了迥然各异的反映。在21世纪的头10年，中国在东亚地区的影响力大增，东亚国家对其的认可也有了显著提高。然而，在过去的几年中，也有一些邻国对其表示了一定的忧虑。

瞬息万变

随着中国经济重要性的与日俱增，东亚的绝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开始紧密地团结在它的周围。当然也有例外，如日本。两岸关系也呈现出明显的改善。甚至作为美国传统盟友的菲律宾和新加坡，在过去的

10年里也开始积极地向中国靠拢。但也有个别国家害怕中国的崛起，因而倒向了美国一边，但毕竟属于个案，且大都发生于2010年之前。2004年，新加坡的资深一位外交官曾自信地表示：

> 国际均势的天平正逐渐从美国倒向中国。过去10年，中国从未在东南亚政策上出现过失误，日本则一无是处，而美国则对该地区漠不关心。所以，泰国、老挝、柬埔寨等许多国家都把自己的国家利益界定为对中国的‘芬兰化’[注]。美国永远都不会放弃它在东南亚的利益，但现在看来，相对过去50年，美国的空间已经大大地缩小。

正如图8–4所示，相对于对美国的态度，东亚各国对中国的好感已经大幅提升。中国被视为新兴的地区权力中心和绝大部分国家最重要的经济合作伙伴。为了展示中国在东亚权力的重塑，下文将就缅甸、马来西亚和韩国这三个不同的案例进行探讨。此外，还将就澳大利亚如何被纳入中国的轨道进行分析（当然严格来讲，澳大利亚应属于亚太国家而非东亚国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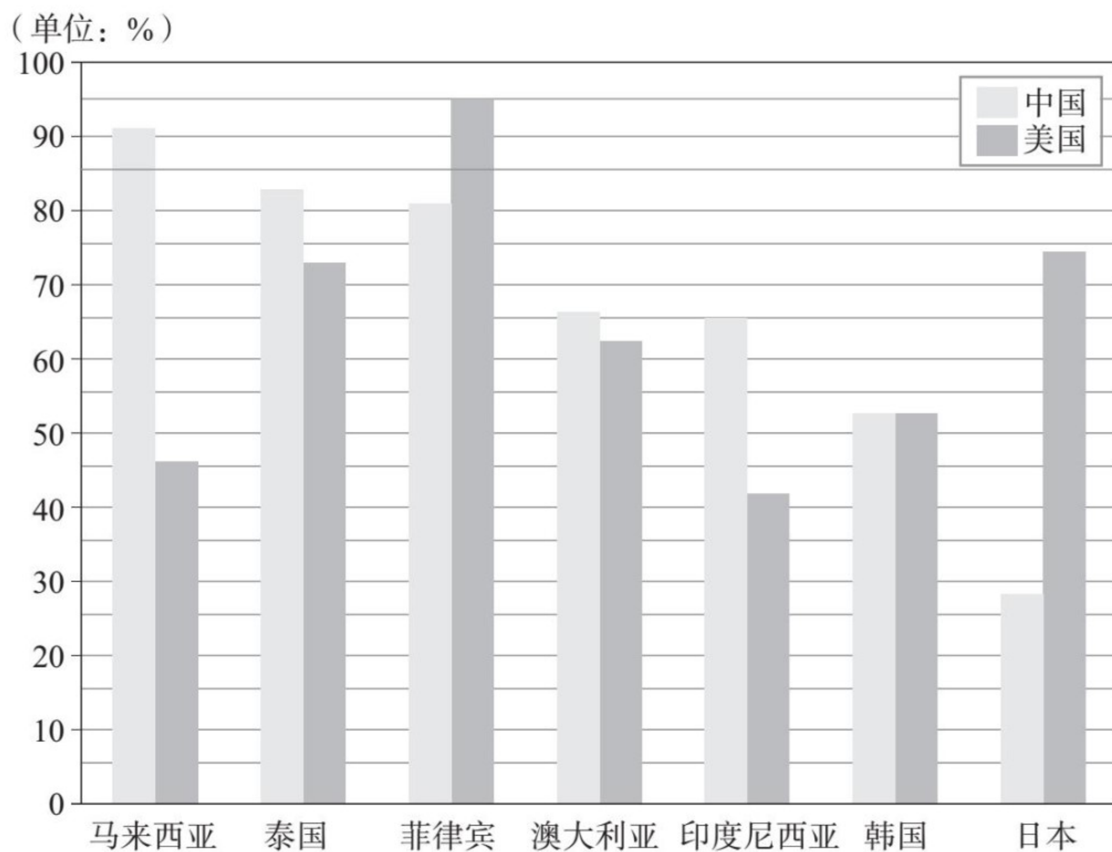


图8–4 2005年11月，东亚国家对中国和美国的态度（以好感程度的百分比为例）

资料来源：皮尤全球态度项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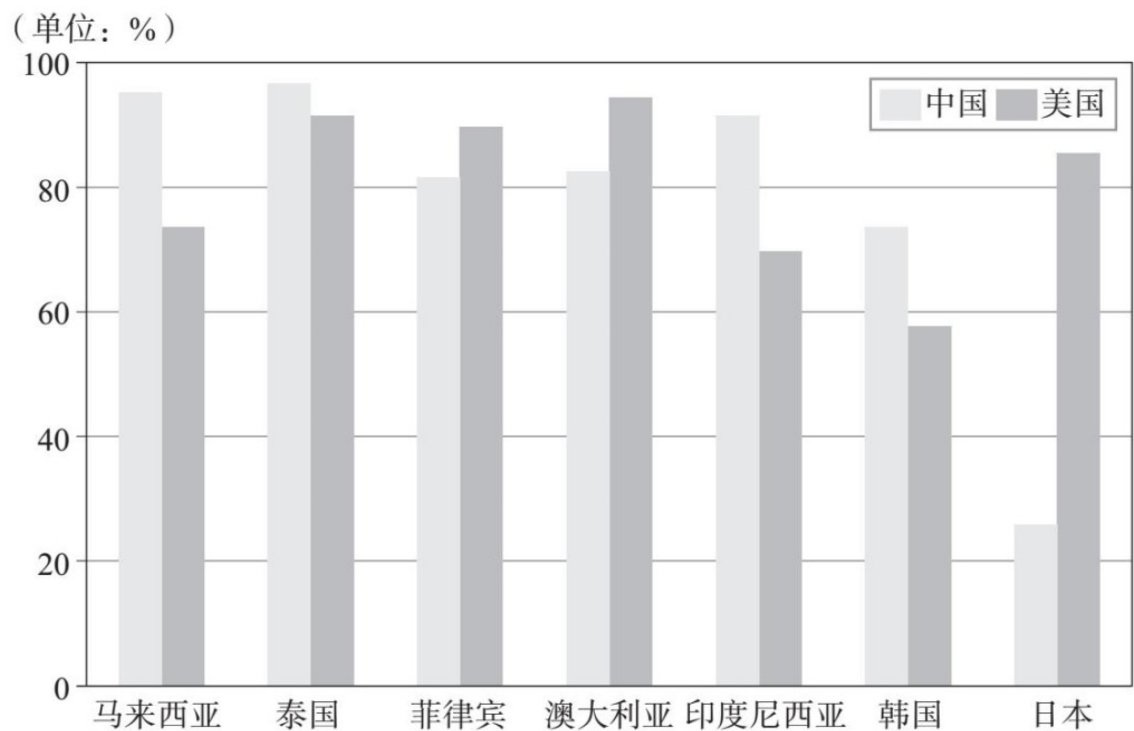


图8–5 2005年11月，东亚国家对与中美双边关系的认识（以良好程度的百分比为例）

资料来源：皮尤全球态度项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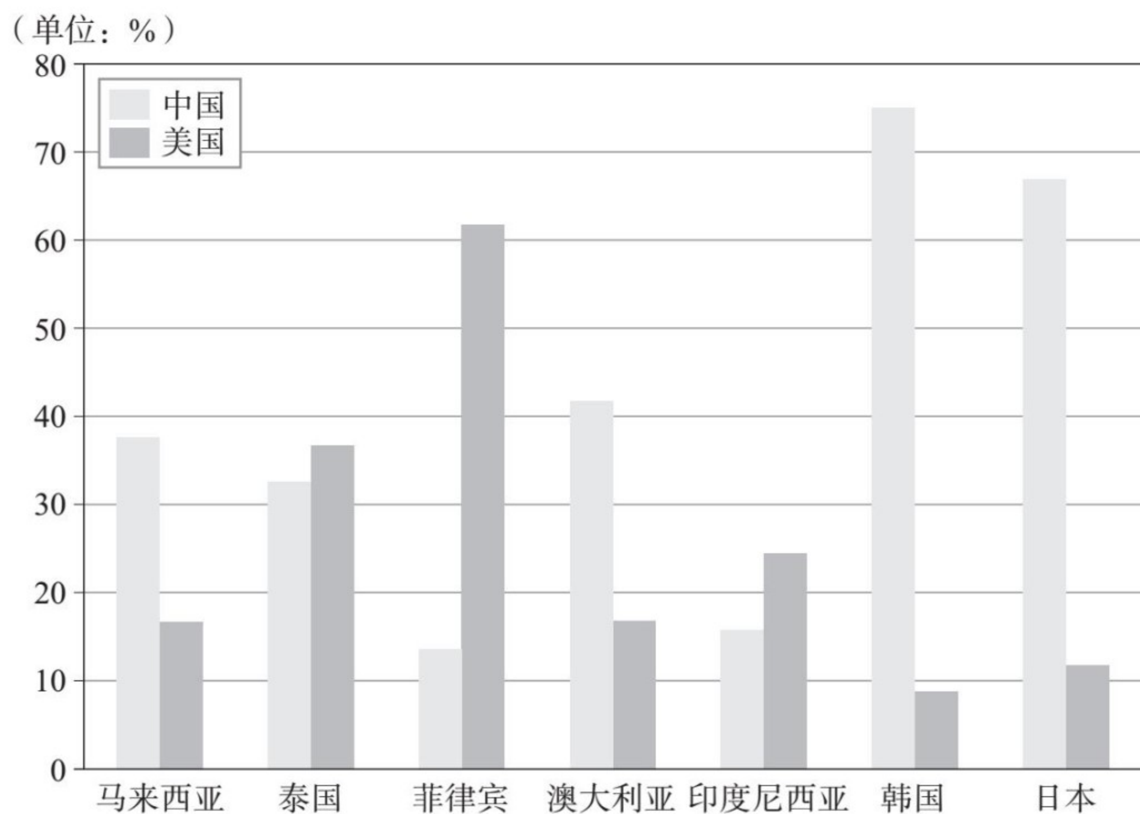


图8–6 2005年11月，东亚国家对未来亚洲中心的预测

资料来源：皮尤全球态度项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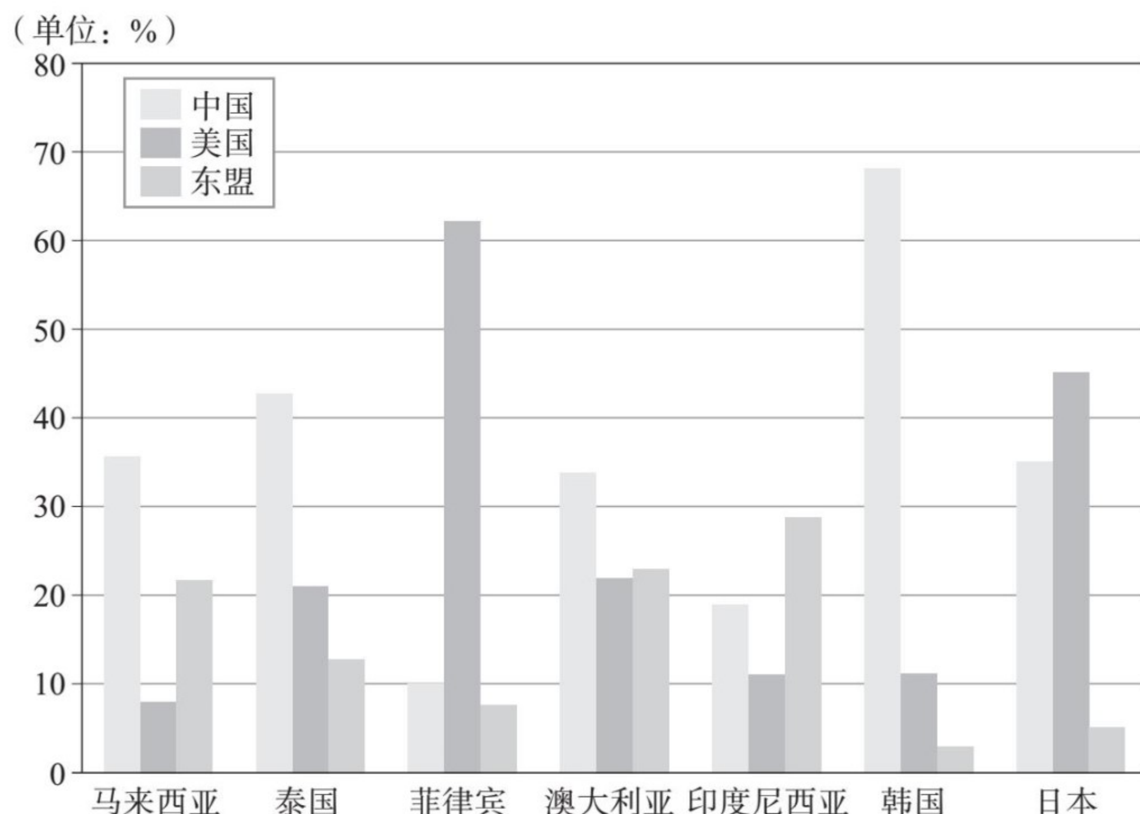


图8–7 2005年11月，东亚国家对未来5~10年中最重要合作伙伴的预测

资料来源：皮尤全球态度项目

作为“中央之国”朝贡体系的曾经的藩属国之一，缅甸长期与中国保持了紧密的关系。但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这种关系越发密切。随着缅甸日渐被其他国家（尤其是西方）所孤立，其在贸易和安全问题上更加依赖中国，如今中国已经成为缅甸最大的贸易伙伴和最大投资国。这多少令视缅甸为自己势力范围的印度有所不满。现在，中缅天然气管道正在建设当中，这条管道将使缅甸的天然气得以输往中国。与此同时，中缅石油管道也即将铺设。建成之后，来自中东地区的原油可不经过马六甲海峡，直接经由缅甸输往中国。作为缅甸国内的少数族裔，华裔近年来在人数上有显著增长（甚至有人认为华裔人口比例已占缅甸总人口的1/3），并在同中国日益紧密的经济联系中扮演重要角色。除经济外，中缅两国在军事上的合作同样密切，这在本地区恐怕也是仅有的一例（中国同朝鲜的关系除外）。中缅两国有

着漫长的陆上边界线，缅甸之所以是中国重要的盟友，原因不仅在于缅甸为中国西南内陆省份提供了通往印度洋的重要出口通道，而且还为中国海军在印度洋展开行动提供了基地。出于历史和经济原因，同时也因为缅甸不希望失去中国而变得更加孤立，中缅关系事实上比中国同本地区其他任何国家的关系都更为密切。尽管2011年缅甸政府暂时叫停了其北部地区一个由中方资助的水坝的建设项目，但这绝不会影响双边紧密的经贸关系。缅甸也不会投向美国的怀抱。

由于地理原因，东南亚各岛国同中国的关系历来比较疏远，不像缅甸、越南这些陆上邻国同中国保持着密切的关系。此外，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在民族、文化以及宗教信仰上与中国的差异，也更为明显。在1957年独立后，马来西亚曾对中国疑心重重。一方面是因为其国内有着人数众多的华人少数族裔；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毛泽东时期，中国对马来西亚境内的华人针对英国殖民者及后来的马来人政府开展的游击战表示支持。然而，随着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同马来西亚的关系也大为改善。尽管中马两国就南沙群岛仍存有争议，时任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穆罕默德却仍决定发展对华关系，因为他深知马来西亚在那场冲突中毫无胜算。同样也是马哈蒂尔，在10多年的时间里发挥了关键作用，促使中国更多地关注本地区，特别是东盟的事务。此后，马来西亚一直奉行对华友好的政策，即便是新总理纳吉布·拉扎克（Najib Abdul Razak）上台后也是如此。2009年6月，纳吉布当选后的第一次国事访问就将中国列为第二站。当然，此访中的首站是与马来西亚具有特殊关系的新加坡。纳吉布在访华时表示：“中国发展得如此之快，因此我需要将双边关系提升到一个新高度。”

从长远来看，马来西亚同中国的关系一旦深入发展，很可能就会影响其国内已经比较脆弱的种族平衡，也就是占人口多数的马来人和占总人口1/4的华人少数族裔之间的关系问题。正是这些华人最先涉足了马来西亚的对华贸易，他们是中国——马来西亚往返航线上的常

客，也是从中马双边关系中获得最大经济利益的群体。因此，马来西亚在谋求进一步同中国发展双边关系的同时（这对其国内的华裔来说，同样具有吸引力），也必定会对中国抱有一种矛盾的心理。本地华人少数族裔在经济上占据优势的现象并非马来西亚所独有。在泰国、缅甸、老挝、柬埔寨、越南以及其他一些国家，华裔在人数上虽然还不及马来西亚华人，但也主导着当地的私营经济。尽管如此，最近10年来，中马关系还是日渐紧密。

中国的崛起改变了其与本地区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其中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中韩关系。韩国自“二战”以来就是美国的重要盟国，其经济腾飞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冷战期间对美国的依附。但过去10年左右的时间，不论是在官方还是民间层面，韩国和中国都走得越来越近。中国如今是韩国第一贸易伙伴，韩国公司在中国大陆大规模投资，使中国成为吸收韩国海外投资最多的国家。实际上，已有3万多家韩国公司在华投资设厂。在中国留学攻读高等学位的东亚留学生中，一半以上来自韩国。与此同时，在韩的中国留学生也有6万多人。2009年，到访中国的韩国游客有240万，相较于2003年的100多万有了大幅增长。而2010年，去韩国旅游的中国游客也有150万，比2005年翻了一番还多。每周，往返于中韩之间的航班有840余架次。在金大中和卢武铉执政期间，长期悬而未决的朝鲜半岛危机以及朝核问题进一步拉近了中国与韩国的关系。韩国发现，与美国布什政府对待半岛问题的激进态度比起来，中国显得更加谨慎和克制，这与韩国的观点不谋而合。事实上，由于中国在处理朝鲜半岛危机时展现出的负责任态度及扮演了主要调停者的角色，其主张进一步得到韩国以及本地区其他国家的支持。与此同时，美国深化了同日本的同盟关系，从而使美韩关系更生嫌隙。由于历史上，日本曾对韩国进行过殖民统治，韩国历来对日本敌意颇深。

实际上，韩国对朝鲜、中国及美国的态度，一直摇摆不定：金大中和卢武铉政府均主张对朝和解，同时加强与中国的关系。但2008

年，相对保守的李明博当选总统后，韩国又开始对朝鲜采取强硬立场，并向美国靠拢。2010年年初，韩国政府指责朝鲜政府袭击了天安舰，造成了46名韩国海军官兵死亡。而随后展开的国际调查也将矛头对准了朝鲜。而朝鲜对此矢口否认，中国则保持沉默。“天安舰”事件使美韩关系进一步密切。事件发生后不久，两国就不顾中国的强烈反对在黄海举行了海军联合军事演习。2010年，朝鲜对延坪岛进行了炮击，韩国军队也予以反击，两名韩国军人和两名韩国平民在炮击中丧生。随后，韩国在延坪岛部署了火炮。这也是自朝鲜战争以来最为严重的事件之一。对于中国对相关事件所保持的克制态度，很多人不免暗中揣测。就长远来看，中韩关系远比中朝关系更为重要。例如，中韩的双边贸易额是中朝的70倍。另外，保持朝鲜半岛现有的状态对中国来说也最为有利。因此，中国也急于与朝鲜维持一个相对密切的关系，因为朝鲜一旦生变，将会产生很多不可估量的影响，例如可能会有大量的难民涌入中国。另外，中国人也认为有必要维护中朝两国的传统友谊。然而，如何处理中朝关系，对中国来说都是一个极大的考验。中朝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将使美、日、韩三国走得更近，还有可能引发韩国国内的敌对情绪。此外，中韩关系中还存在一个历史问题，即古代国家高句丽的问题。当时高句丽的活动范围包括现在的中国、韩国和朝鲜的部分地区，因此中国和韩国均把它视为自己的一部分。

尽管近年来中韩关系有所反复（实际上2012年的韩国总统选举结果有可能对双边关系的未来走向产生重要影响），但从长远来看，韩国仍将采取向中国靠拢和疏远美国的策略。其关键在于中韩两国深厚的历史渊源、一衣带水的地缘位置、日益增长的经济相互依赖以及中国经济力量的不断增强。此外，随着美国经济实力的下降，美国在东亚的实力和影响也不断减弱，无疑也有助于这一趋势的发展。美韩同盟最终可能会瓦解，但这可能需要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同时，如果朝鲜半岛危机得以解决，美国也极有可能撤回在朝鲜半岛的驻军（目前驻韩美军达两万八千人之多）。当然，半岛问题走向的关键性因素

之一在于朝鲜，即朝鲜将进行中国式的改革，还是继续推行现有的政策。未来也不排除有朝鲜半岛统一的可能性，当然这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当前中韩关系的日渐紧密，很大程度上可被视为朝贡体系下双边关系的再现。在中朝建交之前，朝鲜与中国的关系也保持了数百年之久，直至清政府在甲午战争的战败。

中国与澳大利亚关系的发展无疑是最有趣、最吸引人的事例之一。严格来说，澳大利亚属于亚太国家。亚太地区包括东亚及太平洋沿岸各国。澳大利亚的一个重要的地缘文化特征就是，其位于印度尼西亚的南部，人口大多数为白种人，长久以来一直被视为西方国家。尽管历史上澳大利亚曾属于大英帝国的一部分，但在1942年以后却与美国保持了极为密切的关系。澳大利亚一直是美国在亚太地区最为亲密、忠实的盟友。过去1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开始逐渐扩展到这个辽阔的大陆，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澳大利亚拥有丰富的原材料，尤以铁矿石和煤炭最为丰富，此外还包括铝、钻石、铅、锌、黄金、铜、镍等。中国已取代日本成为澳大利亚最大的出口市场，2010年，中国市场已占澳大利亚出口份额的21.8%，而1992年只有3.7%。相比之下，2009年，美国市场的份额只有5%。总体而言，亚洲市场已占澳大利亚出口份额的72%（其中中国所占份额无疑最大），而10年前只有40%。在中国需求的拉动之下，过去20年澳大利亚的经济蒸蒸日上，甚至在西方金融危机之后，也没有如西方世界般陷入泥沼。这也意味着澳大利亚经济的发展正逐渐摆脱西方经济特别是美国经济的影响。澳大利亚也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几个因中国经济发展而获得双重收益的国家，即消费品价格的下降和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而后一点对澳大利亚来说尤为重要。此外，澳大利亚的金融市场也越发受到了中国而非美国的影响。自2004年以来，上海和悉尼股市的联动性越发增强。然而，鉴于中国在澳大利亚丰富自然资源上的利益，其并非仅扮演消费者的角色。自2007年以来，中国作为投资者的角色正变得越来越重要。中国大量购买澳大利亚矿业公司的股份，而其中，中国国企巨头中国铝业公司购买力拓矿业公司大量股权的提议尤为引人瞩目，

虽然最后以失败而告终。与此同时，澳大利亚主要的服务产业，特别是高等教育和旅游业，对中国的依赖也与日俱增。2010年，共有约13万名中国学生在澳大利亚就读，这一数字远高于其他国家。总而言之，澳大利亚正越来越依附于中国经济的羽翼之下，实际上，新西兰亦是如此，这一点不足为奇。

中国在澳大利亚经济领域的重要作用已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果20世纪的澳大利亚是由西南威尔士州和维多利亚州，以及悉尼与墨尔本之间的对立占主导的话，那么21世纪的澳大利亚的最大特点就是西澳大利亚和昆士兰等矿业州的崛起。这无疑是中国对澳大利亚大宗商品需求的结果。因此，澳大利亚与中国的政治关系也成为一个极度敏感的话题。尽管就地缘来说相距甚远，但澳大利亚一直以安格鲁-撒克逊国家而自居，并深以其西方的渊源为傲，这一点从其长期以来对非西方移民的敌意中可见一斑。澳大利亚与中国日益紧密的联系，也逐渐在国内引发了争议。其中，最为明显的体现就是力拓拒绝中铝集团的报价、澳大利亚政府阻止五矿集团对OZ矿业的收购提议，以及中国政府以行贿和窃取商业机密为由逮捕了力拓集团的4名中国雇员一事，在澳大利亚国内引发了强烈反响。澳大利亚之所以对中国收购澳大利亚矿业公司以及购买其股份反应强烈，不仅是因为外资属性和中国并非属于西方世界，还在于提出收购的都是中国的国有企业。迄今为止，工党领袖陆克文（Kevin Rudd）在2007年当选总理一事最能体现中国的影响，尽管不久之后（2010年），陆克文就在党内选举中失利。陆克文会讲中文，熟知中国传统文化，并与中国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他曾在北京工作多年）。毫不夸张地说，他是西方社会选出的第一位有中国工作背景的领导人。从历史上看，相较于自由党，工党一直更倾向于发展与亚洲的关系。陆克文的前任，工党的首相保罗·基廷（Paul Keating）是第一个提出“转向亚洲”的澳大利亚领导人。相比之下，其继任者，来自自由党的约翰·霍华德（John Howard）就更为亲美一些。

鉴于澳大利亚与美国之间的亲密关系，我们很难预测澳大利亚未来的政治走向。2011年，澳大利亚总理茱莉雅·吉拉德（Julia Gillard）发布了《亚洲世纪中的澳大利亚》白皮书，坦言澳大利亚的发展离不开亚洲。然而就在不久之后，吉拉德却宣布美国仍将在澳大利亚北部的军事基地驻军。因此，认为澳大利亚将疏远美国并如泰国、韩国般发展与中国的关系，还为时尚早。更现实的是，澳大利亚将更为谨慎地对待澳中关系，并让美国了解其相关的关系。就此而言，澳大利亚可能会成为中国在西方国家的代言人。但从长远来看，随着美国权势的减弱，澳大利亚将不可避免地偏向中国和疏远美国。

中国的快速崛起和布什政府专注中东所带来的美国在东亚地区影响力的不断下滑，意味着东亚地区的发展产生了新的可能性和不确定性。可以说，过去10年，东亚地区的主题就是中国的崛起以及其富有成效的外交政策。然而，自2009年年末开始，事态明显发生了变化。中国的崛起，在给东亚地区带来了不确定性的同时，也使地区内对中国将如何行使其日益增长的权力的疑虑悄然而生。在此背景之下，南海争端就成了地区关注的焦点。中国坚持对南海权益的主张。此外，中国还坚持主张有关南海问题的任何谈判都应在双边而非多边的基础上举行。一位美国官员表示，曾有一位中国官员将南海问题界定为“核心利益”，尽管中国官方从未使用过这一说法。要知道，“核心利益”在中国的语境中通常与中国台湾、西藏和新疆问题有关。此外，中国政府增强了其在南海的海军力量。中国的这些举措，不免使东盟国家，特别是那些也对南海有权益主张的东盟国家，心生疑虑。2010年7月，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受邀参加了东盟地区安全论坛。期间，她不顾中国的反对，表示美国愿意扮演南海问题调停人的角色。希拉里的这一表态，多少有一些挑衅的意味。而时任东盟轮值主席国，也是南海声索国之一的越南，在这一过程中也扮演了关键的角色。中越两国历史上的恩怨，更加剧了两国在南海问题上的紧张态势。

邀请希拉里前来参会，加之随后的一系列举措，表明至少有一部分东盟国家有借助美国制衡中国的打算。资深的新加坡政治家李光耀就曾表示：“中国的体量使包括日本、印度在内的亚洲其他国家在二三十年内难以与其抗衡，因此我们需要美国来制衡。”而菲律宾前外长，也是美国的老朋友，阿尔韦托·罗慕洛（Alberto Romulo）却断然拒绝了希拉里的提议，明确表示南海问题只是中国与东盟自己的问题。印度尼西亚前国防部部长、传统上属于亲美人士行列的尤沃诺·苏达索诺（Juwono Sudarsono）则指出：“我们可以在中美之间游弋，时不时地发出中美两国对我们都很重要的信号。但如果我们和任何一方走得太近的话，肯定有损印尼外交政策的核心价值。”实际上，李光耀的相关表态代表了东盟内部关切的要点：尽管对于中国当前的作为存在一些批评，但最令人焦虑的是当中国更加强大之后，在未来的几十年里将采取何种举措。在某种程度上，南海岛屿的争端被东盟国家当成了试金石。就此而言，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强硬立场也就不足为奇了。在过去的10年里，中国的所作所为及其外交举措赢得了广泛的尊敬。但如果中国在南海问题上处理不当，引发东南亚国家的焦虑的话，就有可能前功尽弃。所幸的是中国有的是时间，因此尽可以耐心应对。就此而言，中国没有同意东盟国家提出的正式缔结旨在和平解决南海问题的《南海问题行为准则》的提议，多少有点儿令人不解。

就在着力解决南海问题的同时，中国发现其与韩国和日本的关系也有恶化的趋势。中韩关系的变冷与“天安舰”事件有关。而中日关系的恶化则与日方扣押中国渔船有关。然而，二者与南海问题不可同日而语。“天安舰”事件与中国并无任何瓜葛，只是中国做何反应都进退两难。而扣押中国渔船完全是日本政府内部，特别是外务省对华强硬态度所致，与中国无关。即便如此，在南海问题和中日、中韩关系恶化的多种作用之下，中国在东亚地区也不得不采取了守势。此外，美国也明显加大了重返东亚的力度，比如其在东盟内部，特别是针对越南施展外交手腕，利用“天安舰”事件拉近美韩关系。2010

年，奥巴马东亚之旅的国家选择上，也将美国的用心暴露无遗。美国选择了印度、韩国、日本和印度尼西亚四国：其潜台词无遗是中国的崛起及如何对其进行战略遏制。2011年11月，美国更是采取了进一步举措，在亚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领导人峰会上力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宣布美国将继续在澳大利亚北部驻军，随后又首次参加了东亚峰会，要知道以前美国对东亚峰会可是不屑一顾（东亚峰会的成员国现在包括东盟10国以及涵盖美、俄在内的其他8个国家）。很明显，美国正在步中国的后尘，寻求加入东盟所主导的机制，以作为其抵制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恢复美国霸权的整体战略的一部分。

如果就目前的变化就断然做出任何结论，那实在是为时过早。实际上，美国在东亚的影响仍在不断减弱，而中国在东亚的影响仍在不断上升。美国主导东亚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自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实力明显受损，中国的实力显著提升。有意思的是，就在2010年奥巴马访问印度尼西亚之前，中国宣布将向印尼投资66亿美元用于印尼急需的基础设施建设。这就是中国经济实力的体现。中国的经济实力将继续与日俱增，美国也越发无法与之相提并论。在2011年4月，时任中国总理温家宝访问印尼时，双方又达成协议，中国将再次向印尼提供一笔价值40亿美元的贷款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与此同时，就贸易总额而言，中国也迅速超过了美国：2009年，印尼与中国的贸易总额达235亿美元，而同年印美贸易总额却只有188亿美元。印尼还对美国的贸易保护政策大加抱怨。尽管东盟国家对中国的崛起存在不同程度的忧虑，其中一些国家甚至还希望美国能发挥制衡作用，但没有人认为，江河日下的美国能够取代中国这一世界上最具活力的经济体所发挥的作用。它们都很清楚，中国才是东亚的未来，其与中国的双边关系必将日益优先于与美国的关系。正如维基解密的资料显示，2009年1月，美国民主党参议员吉姆·韦伯（Jim Webb）对泰国进行了访问，其在此后发回国的电报中指出：泰国国王普密蓬的一位私人秘书表示很抱歉“不得不打中国这张牌”，但同时也指出“过去的10年中，美国对东亚的关注不断减弱，而中国却日益成为泰国的重要伙伴”，要知道

泰国可是美国的传统盟友。此外，当问及美国的又一个传统盟友菲律宾是否会因南海争端向美国寻求保护时，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抱怨说“他们得在那儿啊”。与东南亚地区的其他国家一样，菲律宾深刻地认识到与中国达成并继续保持和解的重要性。正如阿基诺三世所指出：“如果我们要和他们（中国）打拳击的话，那么我们每个人要对他们15个人。”此外，中国正谋划建设连接中国与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老挝和柬埔寨的高铁网络，当然主要是由中国出资和建设。一旦建成，将极大促进和加强中国与东南亚地区关系的发展，其程度是航空网络难以企及的。当然，近来所发生的种种事件表明尽管中国的崛起势不可挡，但这必将是一个充满曲折反复的复杂过程。此外，2009年以来的中国外交政策也值得商榷。尽管在贸易协定谈判中，中国对东盟持十分开明、包容的态度，但对其国防建设（虽然幅度十分有限）的增信释疑做得还远远不够。

搁置争议，共同开发

在中国崛起重塑东亚格局的大背景下，现在我们可以回到其他东亚国家和中国关系的发展这一问题上来，特别是其将在多大程度上带有朝贡体系的烙印。朝贡体系和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经常被视为两个相互排斥的极端体系，前者拥有森严的等级关系，而后者则建立在主权国家平等的基础之上。但事实上，正如第6章所指出，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并非如此简单。在大多数时期，它仅局限于少数欧洲国家，甚至直到20世纪后半叶，还有许多国家没有获得独立，就更不要说平等了。即便在独立之后，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国家也不能与美国或西欧国家建立平等关系。实际上，在冷战期间，当相关国家附庸于美苏两国之后，它们的主权更是受到了限制。在当今世界一超独霸的背景下，情况也并没有什么改变。大部分国家的主权仍然受到限制，只是根据同美国关系远近的不同，程度有别罢了。鉴于现实中的国家间关系极

为不平等，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中的平等理念只是法律意义上的，而非现实存在。在实践中，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也存在等级的成分。此外，如朝贡体系一样，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也具有极富影响的文化成分，我们可称之为文化霸权或软实力。换言之，朝贡体系和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之间的区别并不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样明显。就此而言，朝贡体系以某种现代的形式得以复苏也并非遥不可及。朝贡体系至今仍在东亚地区具有深远的影响。中国文化不但在东亚仍享有声望，其影响也在与日俱增，而且在各地华侨、华人的共同努力下，这一趋势还将不断加强。此外，在东北亚和越南等地，其国内存在的儒家文明本身就是当年中国文化的遗产，但它与希腊——罗马文明在欧洲的作用相比又截然不同。

从历史上来讲，朝贡体系是各国对中国文明国家性质和存在的认同。正如文明国家的理念至今仍在中国国内具有巨大、深远的影响一样，朝贡体系的思维方式至今在中国的国际关系理念中也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实际上，在很多重要的方面，朝贡体系对中国如何看待主权和国际关系所产生的影响，不亚于于当代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

中国对待海洋主权的态度，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实际上，中国海洋主权的概念与西方国际法中的海洋主权概念存在很大差别。以南沙群岛和西沙群岛的争议为例。虽然中国已经和东盟签订了相关条约，同意暂时搁置关于南沙群岛归属问题的争议，但从长远来看，这一问题始终未得到解决。南沙群岛和西沙群岛几乎就不是什么岛屿，只不过是位于南中国海的一些荒无人烟的岩石，而且有不少还是在水下。南沙群岛位于东马来西亚以北和菲律宾以西，而西沙群岛则位于越南以东。其实海上主权只是历史上较晚出现的一个概念，这一概念的首次提出是在1945年，当时美国宣布将对其领海行使主权。这也基本上是东南亚国家对南沙群岛和西沙群岛提出主权要求的法律基础。而中国则恰好相反，坚持历史依据，认为这些岛屿千百年来就一直是“中央之国”东南边境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就像北京以北的陆上领

土一样。对相关岛屿进行考古调查所发现的种种文物，如唐、宋两代的瓷器和铜币，也被中国用以支撑其历史依据，表明相关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此外，这些岛屿同样也是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自古以来，中国历朝历代的探险者写下了不少与之有关的文章与诗句。此外，在很多中国地图上也明确标出了“九段线”，证明其是属于中国的领土。（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台湾也依据相似的理由认为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位于中国南部沿海的海南省或许是中国陆地面积最小的省份，但也可以说是中国面积最大的“海洋省份”，因为如果把它的海上领土也计算在内的话，海南省的版图就延伸至了南海深处。2007年，中国在海南省设立了三沙市，其管辖范围包括与越南存在争议的南沙群岛和西沙群岛。越南民众曾因此在中国驻越大使馆前举行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中国运用了“时际法”（intertemporal law）的原则，来支持其对南海主张的历史依据。中国的法学专家们认为：“任何法律事实都应放在当时的背景下来理解，而不是以争议发生时的现行法律为依据。”这就将历史的有效性和合法性与当前现实结合起来。

1984年，邓小平曾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换言之，主权问题不一定就会拖累解决其他问题的步伐，它可以被暂时搁置。中国人常常引用邓小平的观点来说明南海的岛屿问题（实际上，邓小平的理念在南海问题上已经付诸实施），以及在东海上同日本存在类似争议的钓鱼岛问题。实际上，在处理台湾问题时也采取了此种立场。虽然中国坚持对台湾拥有毫无争议的主权，但同时也或多或少同意了暂时搁置台湾问题，前提是台湾不谋求独立。这也体现了中国人在处理相关问题上的灵活态度。此外，中国政府提出，只要台湾承认中国对其拥有主权，那么台湾地区可以继续保留其政府、政治制度，甚至自己的军队。

中国对香港回归问题的态度，也再次反映出中国人和西方人在如何看待国家主权上存在的根本差异。中国人认为香港主权移交这个问题是不容商榷的，不仅是香港，包括台湾、澳门以及那些存在争议的海岛，皆是如此。中国从历史、文化以及民族关系出发，认为所有这些领土都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如果按照西方的标准，中国对这些领土行使主权的方式可谓非同寻常。在香港问题上，英国乃至西方普遍认为，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后，中国人很可能会将香港这块土地变成和中国大陆极为相似的模样。当然，英国人的判断并没有成为现实，总体而言香港回归后几乎没什么变化，基本上保持了原有的政治和司法体系。

要理解中国人的这种主权概念，关键就在于理解“一国两制”原则，这也是香港回归之后《基本法》的基本核心。对中国来说，问题的关键是承认中国对香港拥有主权，至于大陆和香港是不是实行同一种社会制度则位列其次。而基于民族国家的西方模式则完全不同，其主权和社会制度是相互融合、相互联系的。实际上，“一国两制”源自中国有着上千年历史的传统思想，那就是承认并接受存在于各个省份之间的巨大差异。或者换句话说，这些差异正是中国这个“文明国家”内在的、密不可分的一部分。中国这一文明国家是建立在“一种文明，多种制度”的原则之上。而西方主权理念的基础却是“一国一制”，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实际上则是以“一种制度，多个国家”为基础。

中国人的主权观与“和而不同”的儒家传统理念紧密相连。这一理念在当今中国已再次兴起。有些中国学者就把“一国两制”理解成“和而不同”的范例。在西方人眼里，“和”即暗示着趋同或者极为相似；但在中国人看来，差异性是“和”的重要特征。儒家思想认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有趣的是，中国人常常将同质化与“霸权”这个词联系起来，作为对大国强权的蔑称，如苏联以

及今天的美国。相比之下，中国人认为“和”的精髓在于允许差异、接纳差异。

谈到中国与其东亚邻国的未来关系时，我们不仅要考虑朝贡体系的历史影响，还要考虑现实政治(注)的影响。历史上，现实政治曾是朝贡体系的主要特征，而在以全球化和现代民族国家为特征的今天，现实政治的作用则更加明显。中国目前正急于向世界证明其将保持自我克制，会尊重其他国家的利益。但从长远来看，随着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那么中国同本地区其他国家之间的差距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发明显。我们不难想象这样一种场景：强大的中国与其邻国之间的实力差距，在世界上任何其他地区都难得一见。于是，中国将会通过各种方式来展现它极其强大的实力，不论是在经济、文化上，还是政治、军事上，都会有所体现。这就是本地区其他国家对中国持怀疑态度的原因所在，它们担心的并不是现在的中国——况且中国一直在努力保持克制以取得它们的信任，而是将来强大之后的中国。马来西亚海军司令曾在1996年表示：“……随着时间的推移，当中国的实力大为增强之后，它的行为方式也将会存在着不确定性。到时候它是会遵循国际或地区准则，还是依仗强大的军力肆意妄为？”

我们不妨来想象一下，50年后，中国同其邻国的关系会变成什么样子呢？一边是超级强大、无比先进的中国，拥有15亿多人口，另一边则是人口才刚过1 000万的老挝和2 000万的柬埔寨，或者是人口超过3 000万的马来西亚。且不提朝贡体系的影响，单从国家规模来看，中国同本地区其他国家的关系都是绝无仅有的，与其他任何地区的主导国家和邻国的关系都截然不同。

中国将来会是个什么样子？它会如何行事？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只不过谁都无法给出明确的答案，因为答案大都隐藏在遥远的未来，而且充满了无法预知的因素。但有一点十分清楚，那就是中国对东亚地区的认知与举措，将受到朝贡体系及其文明国家性质的影

响。正如时至今日，英国殖民的历史仍对英国对非洲和中东的态度有着深远的影响一样，当然，这里指的不仅仅是英国愿意使用武力。实际上，这种影响在中国的行为和思维方式上已经有所显现了，比如中国在处理南沙群岛和西沙群岛、中国香港以及中国台湾等问题上的态度。可以说，至少在本地区，中国的行为绝不能仅以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中的民族国家的角度来理解。在南海问题上，中国与东盟国家的法律和理论出发点截然不同。中国对中国台湾问题的处理也是如此。鉴于这种具有深厚历史渊源的概念分歧，中国将如何实现其目标呢？我们是应该以中国现在所表现出来的包容和克制来预测它未来的行为，还是认为其必将被更具“中国中心论”色彩的态度取代？在处理与印度、日本和东亚国家等与其存有领土争议的国家的关系时，中国是将继续搁置争议，还是摒弃现有的小心谨慎，变得更加强势？随着中国越发强大，即使中国真的以自我为核心，我们也不会感到奇怪。

实际上，这也在我们的预料之中，至少从长远来看是如此。不论今天的中国如何强调发展经济的重要性，如何一心一意地专注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中国目前表现出来的克制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在其众多目标中分出了个轻重缓急而已。中国在改革时期的自我约束力的确让人印象深刻，然而，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得更长远些，当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大为改善，中国在东亚地区拥有了决定性的主导地位之后，那种带有“中国中心论”色彩的观念又会有怎样的表现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也许最好的办法就是在当下寻找线索，尽管这些线索分散零落，但依旧可以为我们提供参考。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

1997年，印度尼西亚发生针对当地华人的暴行后，当时的中国政府在这一事件中还是表现出了相当的克制，甚至还试图劝阻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纽约、东南亚以及澳大利亚的华人不要举行针对这一

事件的游行。但是，如果我们看看当时互联网上关于该事件的一些评论，就会发现许多华人对此都极度愤怒。有一则评论这样写道：

> 我的祖国母亲啊，你听到了呼唤的声音没有？你的儿女在国外大声呼唤。帮帮他们吧。我不懂什么是政治，也不敢妄言政治。我不明白什么叫“没有永远的朋友和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也不知道这是些什么样的“利益”……我只知道我的同胞遭到了野蛮的屠杀，他们需要帮助，而不仅仅只是道义上的理解和关切。我的祖国啊，他们都是你的儿女。他们的身体里都流淌着汉族的血液。他们的真诚与善良也都是源自你的抚育。帮帮他们吧……

尽管国内存在这样的情绪，但当时的中国政府还是显得相当谨慎和克制。而随着中国在本地区的实力越来越强大，中国同海外华人之间的关系也会越来越多地成为这些华人所在国的政府考虑的重点，因为事实上在所有东盟国家，当地华人不仅在经济上拥有很高的地位，他们的自信心、生活状况以及社会地位也会因中国的崛起而显著提高。这些华人受到中国崛起的鼓舞，也许会利用其更高的社会地位来进一步增强自己的实力。而他们所在国的政府在处理当地华人事务时则很可能会越来越小心谨慎，因为生怕激怒华人背后的中国。王赓武认为，海外华人虽然同其所在国的其他少数族裔有很多相似之处，“但‘华人’（与他们）还是有着根本的区别，那就是他们的‘祖国’在地理位置上离东南亚较近，国土面积广大，人口众多，有着巨大的潜力和优越感”。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就历史而言，历代中国封建政府都没有肩负起保护那些数百年来离开祖国而去东南亚谋生的华人的责任。

台湾——容不得讨价还价

中国的地区政策出现新的转型之后，仍然存在两个例外。一个是对中国最为重要的台湾，另一个就是对曾经奴役中国的殖民者、中国最大的对手——日本。虽然中国自21世纪以来几乎对东亚其他所有国家和地区都采取了接触、和解以及退让的策略，但对中国台湾和日本的态度却绝非如此。

中国对台湾问题尤其关切，这不仅是因为中国将台湾视为失去的领土、历来就属于中国的一部分，而且还因为台湾是国共内战的遗留问题。1949年，共产党建立了新中国，蒋介石政府则败逃到了台湾。因此，对中国共产党来说，台湾问题代表着未竟的事业，是解放战争中唯一未完成的任务。这也是为什么中国政府在台湾回归问题上毫不妥协的深层次原因。此外，中国民众对台湾问题的态度以及由此产生的巨大力量，远非其他任何国家能够想象。中国从1949年走到今天，一路上起起伏伏。由于美国一开始只承认台湾，新中国的国际环境相对孤立；随着尼克松访华，中美两国关系出现了重大转变，在过去的40年里，台湾在国际上始终遭到孤立。然而统一台湾的过程，却仍将是任重而道远。

事实上，在过去的20年里，中国大陆的统一愿望曾遭受到了出人意料的打击，那就是支持台独的民进党在台湾地区领导人大选中胜出，击败了至少原则上主张“一个中国”的国民党。自从陈水扁2000年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后，台湾一直实行“去中国化”的政策，台独思想有所抬头。但这一时期，台湾与大陆在经济上的依存度不降反升。虽然陈水扁及其前任李登辉都曾对其进行过抵制，但台湾与大陆的经济关系仍然发展迅速。至2003年，台湾排名前1 000位的公司中有一半均已在大陆投资，通常都是在大陆设立生产基地，这其中就包括台湾地区所有主要的计算机生产商。

台湾对大陆的投资占到了其对外直接投资的3/4，有数十万的台湾人在上海和广东居住、工作。2010年，对大陆的出口目前占台湾出口

总额的43%，而1992年这一比例却只有1%，这也使大陆远超美国和日本，成为台湾的第一大出口市场。大陆和台湾在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度越来越高，这是否就意味着二者不可避免地会越走越近，直至在政治上也达成某种一致呢？还是两岸之间的差异将最终导致台湾法理上的独立呢？

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台湾人”身份的本质。“台湾人”同“中国人”到底会有多大的区别？它对台湾的民族主义以及台湾的独立会有什么影响呢？通过图8－8我们发现，1992~2006年，认为自己只是中国人的受访者人数持续下降，而认为自己是台湾人的人数则相应增加。然而，另一个群体的人数也在稳步增加，就是认为自己既是台湾人又是中国人的群体，这一群体的比例最大，几乎占到总人数的一半。此外，只有一小部分人认为自己要么是中国人，要么是台湾人。因此，该图所反映出的问题格外复杂。大部分受访者认为自己既是台湾人又是中国人，这就意味着有近半数的人并没有把“中国”和“台湾”两个身份对立起来，而是认为二者互为补充。事实上，很多台湾人都认为由于台湾和大陆有着共同的历史、文化以及风俗习惯，所以他们的“台湾人”身份其实是包含在“中国人”身份之中的，二者是共存的关系。这也就说明了台湾人的认同与台独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图8－9可以更好地证明这个观点。受访者中，认同海峡两岸现状的人比例最高，他们认为两岸关系如果真会出现什么改变的话，那也是以后的事，也就是“等着看”。而对两岸现状满意，但认为台湾地区将来仍会独立的受访者人数占第二位。但持这一观点的人和认为两岸现状会永久保持下去的人在人数上基本相当。第三种观点就是支持两岸保持现状，并希望两岸将来能够统一。持这一观点的人数与前两组相比，差距并不大。然而，支持尽快统一的人数比例并不高。同样，也只有一小部分人支持台湾尽快独立，持这一观点的受访者与希望台湾保持现状、将来再独立的受访者，加起来的比例还不到1/4。持这两种观点的人数在1999年达到了顶峰，此后便一直持平，甚至还出现了小幅下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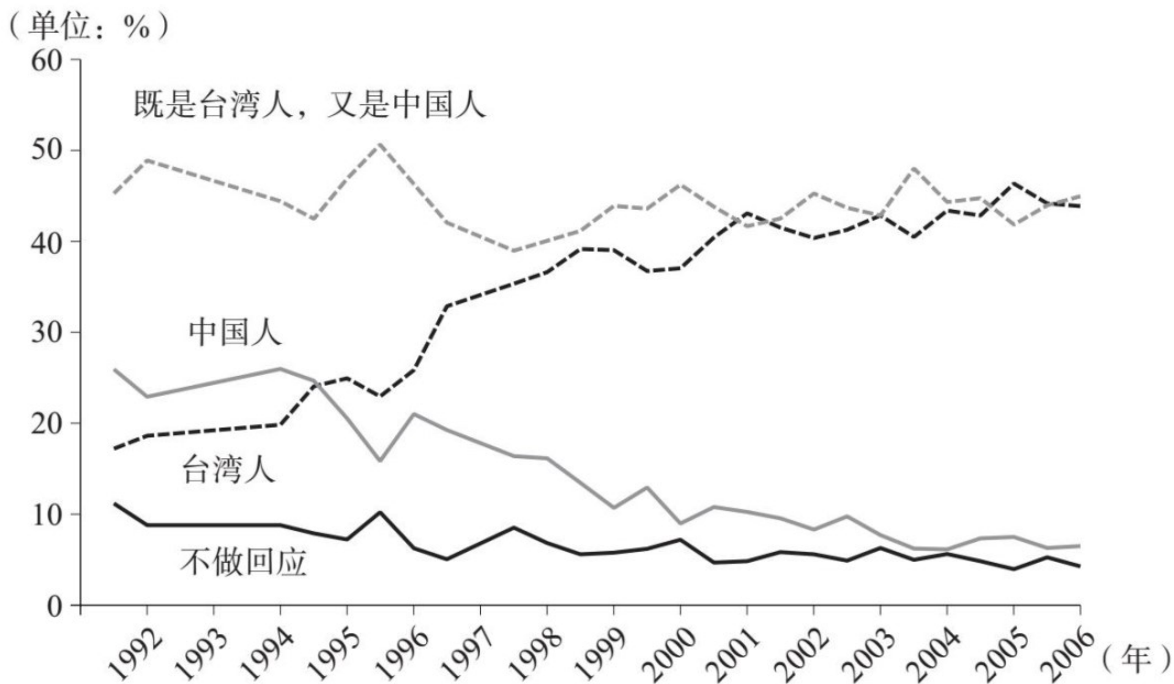


图8–8 台湾民众对“台湾人”和“中国人”身份认知的变化

数据来源：台湾国立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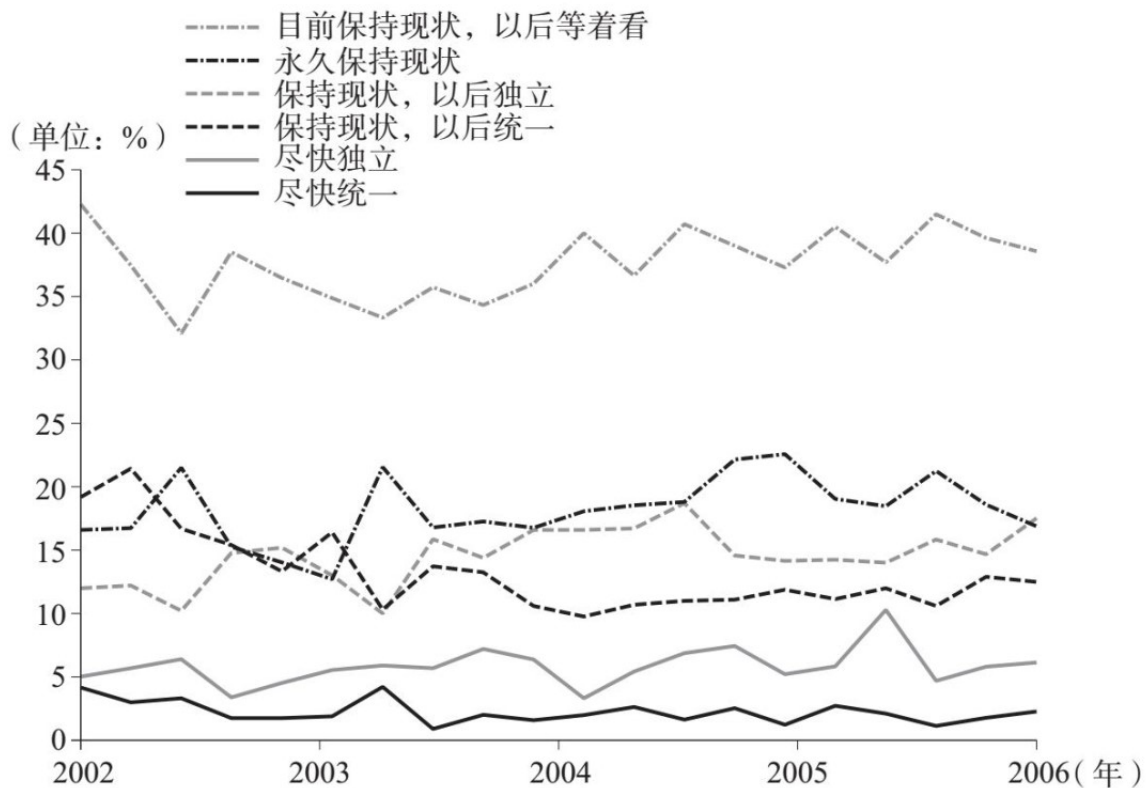


图8–9 台湾民众对“统一”和“独立”的态度

数据来源：台湾国立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

以上资料说明，“台湾人”是一个具有可塑性的多元概念，或者说，对“台湾人”的理解因人而异。“台湾人”这一认同似乎并没有多少政治意义，否则其和台独之间就应具有更明确的关联性。至于台湾地区今后将何去何从，目前尚无定论，因为事态仍在发展当中，很难断定将会有怎样的结果。台湾民众的观点也会受到诸多方面的影响：中国大陆将会对台湾地区采取怎样的行动，台湾地区政治将会出现怎样的危机以及其他更深层次的发展趋势等，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中国经济和政治从长远来看会有怎样的走势，台湾地区经济前景如何以及两岸经济融合会对台湾地区造成怎样的影响等。

虽然两岸日益加深的经济融合并不一定就会结出任何政治果实，但在过去的几年里，经济融合的速度和规模毫无疑问对台湾地区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李登辉担任台湾地区领导人时，由于担心两岸经贸往来会给台湾地区带来不利影响，下令限制台湾地区企业对大陆进行投资，并加快了“台湾化”进程。李登辉担心若再不采取行动，将会在两岸经济交流进一步密切之后坐失良机。陈水扁也继承了李登辉的政策，只不过迫于来自台湾企业界的巨大压力，这才有所退让，放松了李登辉时期的一些限制措施。台湾地区企业越来越依赖大陆市场及其设在大陆的生产基地，这不仅对台湾商界意义重大，对台湾选民也会产生深远的影响。虽然台湾地区经济在历史上曾严重依赖于美国市场，但大陆市场已经取而代之，正如中国市场对周边的许多邻国来说十分重要一样。由于台湾地区与大陆一衣带水，再加上两岸的习俗、文化、语言相同，因此台湾与大陆的经贸往来也就发展得更快、更为深入。因此，如果要预测台湾经济的未来或台湾人未来的生活水平，中国大陆则是必须考量的核心因素。因此，在2005年举行的一次民意调查中，赞成进一步深化两岸经贸往来的台湾受访者是反对者的两倍，这一点也就不足为奇。如今，中国大陆正试图利用两岸日益增长

的经济基础，建立并深化与各界群众的联系，以便影响台湾地区的政治走向。

正是由于台湾民意明显反复不定，所以对其施加影响才显得格外重要。然而，从历史来看，中国政府到目前为止对此似乎还不够重视。这主要是由三个原因造成的：第一，中国人认为台湾地区是“失地”，也就是说，自古以来，台湾和香港地区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对台湾的领土主张并非是出于什么人民主权之类的要求。换言之，台湾回归的合法性依据早在历史上就已经确定了。因此，在有关香港主权移交的谈判中，谈判的双方是中国人和英国人，香港民众无法作为一个谈判主体。这一点与世界其他通过谈判获得独立的前殖民地有所不同，通常其他前殖民地的民众会作为谈判的一方。第二，中国人对待香港和台湾地区的态度表明，国家主权对中国意义重大。第三，中国对台湾地区的看法格外体现出了“中国性”的理念，即认为中国民众与生俱来就具有某种特征或特殊的联系，这种特性深嵌于历史之中，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更改，无论人们喜欢与否。这个问题和结语中关于汉族人本质的部分直接相关。汉族人却是一个十分多样化的群体，但所有汉族人自认为同宗同源。因此，类似“台湾身份”会取代或者削弱“中国身份”这样的观点实在不足为信。

因此，中国在对台湾问题的立场上一直较为自信，至少直至不久之前仍是如此。但近年来，中国政府更加重视岛内局势，更为重视台湾民意的作用。比如，在2008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之前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中国政府开始争取国民党的支持，并于2005年邀请了国民党前领导人连战访问大陆。我们又应该如何理解中国方面所持有的这种谨慎的乐观态度呢？鉴于岛内的台独势力短期内已不可能有所壮大，且绝大多数台湾人还是十分务实，以各种方式支持两岸保持现状，因此大陆对台湾的形势日渐乐观。而且随着大陆与台湾在经贸上

的相互依存度进一步提高，两岸既有可能继续保持现状，甚至两岸的政治关系也将更为密切。

从目前的情况看，只要台湾不宣布独立，在情势未明的情况下，中国就将对台湾问题保持耐心，维持台海的现状。这样中国就可以一心一意地发展自己的经济，从而避免了台海一旦发生事端，必将严重影响中国在全球以及本地区的地位的局面。此外，中国大陆还深信，他们有的是时间。很明显，台湾经济将会越来越依赖大陆，而且随着大陆经济的高速发展，其对台湾民众的吸引力也与日俱增。同时，外交上饱受孤立的台湾还发现自己正面临着另一种危险，那就是被排除在以东盟为核心的新的地区贸易框架之外。实际上，朝鲜和中国台湾是东亚仅有的两个没有与其他任何国家签订自由贸易协议的国家和地区。得益于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中国在台海地区的军事力量有了质的提升，因此也必然对台湾的任何冒险举动形成强大的制约。此外，美国也试图对陈水扁的台独行动进行约束，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北京的一种鼓舞。最为重要的是，国民党在2008年“立法院”和地区领导人选举中取得的压倒性成功，进一步证明了大陆乐观态度的正确性。由于不满陈水扁的台独倾向及经济低迷，台湾民众以手中的选票来表示坚决要求改善与大陆的关系。新任领导人马英九则承诺将维持现状并加强和大陆的关系。在陈水扁主政的8年间，台湾经济的年均增长率只有4%，并且日益丧失了对外资的吸引力。台湾在国际上的孤立越发严重。

2009年4月，两岸关系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双方就金融服务、直航和共同打击犯罪签署了一系列协议。这可被视为两岸关系的转折点，两岸关系极有可能向更为密切的方向发展。2010年6月，两岸达成了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ECFA），这是两岸贸易合作的里程碑，也是两岸实现贸易自由化的第一步。在协议的第一阶段，大陆方面就做出了大幅的让步，对539项原产于台湾的产品和11个服务行业实施降税，总价值达138.4亿美元。而台湾方面降税的总额却只有30亿美元。

目前，大陆已经有23个城市开通了台湾的直航，而此前只能在香港中转。2011年，台湾允许大陆投资者对台湾的科技公司投资，这就使大陆投资者有机会参股台湾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和华硕等台湾在国际上最富竞争力的公司。此前，台湾对大陆的投资由来已久，但大陆对台湾的投资却处处受限。就在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签署后不久，台湾宣布已与新加坡就签署双边贸易协定展开了协商，并得到大陆方面的同意。这一举措可被视为其与东盟开展全面合作的前奏，极有可能结束其在本地区的孤立状态。当然，这样的发展与大陆的支持是密不可分的，因此对于台湾来说，改善两岸关系的重要性更为凸显：台湾融入本地区的程度将取决于其与大陆关系的发展。所有的一切都表明台湾的立场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随着台湾地区前领导人陈水扁因贪腐入狱而声名狼藉，从长期来看，现有的台独势力不断削弱，已经走入了死胡同。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标志着台湾经济开始加速融入大陆。我们已经进入到两岸关系越发紧密的新的历史时期。因此，不难预见两岸必将达成某种形式的协议，台湾承认大陆的主权，而大陆则赋予台湾某种形式的自治。

就此而言，未来美国势必会放弃将台湾地区作为国家根本利益并将不惜任何代价来“保卫”台湾的看法。随着中国的崛起，在未来几十年里，台湾地区对于美国的战略优先性肯定会不断下降。大陆已经开始考虑通过更加宽松的、台湾人可以接受的政治方案来解决台海问题。大陆曾一度向台湾提出了条件更为优厚的“一国两制”设想，只不过近期没怎么提罢了。或许大陆方面将来甚至会接受一个类似于英联邦的“中国联邦”或者“联邦制国家”，这样台湾不仅可以像香港那样享有高度的自治，还可以在承认大陆主权的基础上，享有更大的自治，甚至还可以在国际上拥有一定空间。就目前来讲，中国对台湾问题上的日益乐观，并非没有道理。两岸关系的未来走向，最有可能的就是关系日益紧密，甚至得以最终解决。当然也不排除恶化、甚至是民进党政府重新上台的可能性。如果未来民进党政府胆敢宣布独立，那么中国绝不会放弃以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可能性，就此整个东

亚地区——当然也包括美国在内，将陷入一场巨大的危机，也必将造成极为深远的影响。尽管目前是自蒋介石败退台湾以来，台独势力最为高涨的时期，但这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并不大。至少从目前来看，随着马英九在2012年成功连任，两岸关系得到了进一步巩固，而这也最能体现出中国在东亚地区发挥的巨大作用。

日本——很受伤

1949年以来，台湾问题一直被中国政府视为最为敏感的地区问题。但随着两岸关系的发展，日本已经取代了台湾，成为中国在东亚地区面临的最大难题。在中日甲午战争以前，两国关系一直还是比较和睦的。这次战争是日本1868年明治维新所引发的直接后果。当时日本实行“脱亚入欧”的战略，放弃了亚洲，尤其是中国，转而倒向西方，甚至还充满了对外扩张的野心。历史上，日本曾长期是“朝贡体系”的藩属国，并格外尊重、认同中华文明及其儒家传统。当然日本也曾时不时地疏远、反抗中国，但鉴于日本的岛国身份以及它自身先进的文明，这也不足为奇。

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后的一个多世纪里，中日关系远比中国同其他西方列强的关系要糟糕得多。许多中国人至今仍将中日甲午战争及后来签订的《马关条约》视为“屈辱的百年”中最为黑暗的时刻。甲午战争以及让中国在后来的和平时期依旧背上沉重包袱的《马关条约》，给中国人留下了极为痛苦的记忆。此外，日本在中国的世界观里属于二等国家，因此中国人认为，败给日本所带来的耻辱要远远超过败给西方蛮族。正是甲午战争中的战败从根本上瓦解了当时中国人的世界观。按照儒家的观点，日本打败了中国，也就是“学生”打败了“老师”，或者说“小弟弟”打败了“老大哥”。

甲午战争带给中国的耻辱随着日本1931年霸占中国东北以及1937年全面侵华而进一步深化，其给中国留下的伤口至今仍未愈合。时至今日，中国人一提起日本或者中日关系，就会想到南京大屠杀。虽然那已是70年前发生的事了，但它给中国人心灵造成的伤口至今仍在滴血，对中日关系的影响是如此之深，以至于就好像发生在昨天一样。甚至连南京大屠杀的遇难人数——中国方面认为是30万人，至今仍是双方争论的焦点之一。当然，上述问题之所以会遗留下来，是因为日本不仅至今仍不愿为此道歉，而且也没有任何反思历史的迹象。这与德国人为其在“二战”中的罪行表示深深的忏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然，日本确实也道歉了，不过只是向美国，因为日本败在了美国人的手中，美国给日本以沉重的打击，主导了东京审判，没收了日本的海外资产，并于战后对日本本土实施了占领。但日本从来没有向其伤害至深的亚洲邻国，尤其是中国和朝鲜表示过诚挚的歉意。要知道，日本对亚洲邻国犯下的野蛮罪行远远超过其对西方列强所造成的伤害。南京大屠杀就是最为恶劣的事例，日本人对中国平民烧杀劫掠，令人发指。实际上，在日本侵华的那段时间里，类似的事件时有发生，只不过规模没有南京大屠杀那么大罢了。日本对朝鲜半岛的殖民统治也是也残忍著称。日本战后虽然做了不少道歉，但都是敷衍了事。而日本法院也拒绝对日本侵略战争中的个人受害者做出赔偿的判决。日本这种对邻国的怨恨正是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的写照，对西方表示尊重，却看不起自己的邻国。“二战”后很长一段时期，日本也没有反思历史，因为战后的日本很快就又获得了本地区的主导地位，与那些经济欠发达的邻国分属于不同的联盟。作为日本的担保人和保护者，美国在冷战时期既没有要求也不希望日本向中国道歉，因为当时美国的战略重点并不在此。

转眼50年过去，东亚地区已经今非昔比。在发展水平上，日本在本地区已不再是一枝独秀，昔日日本被众多落后邻国环绕、自身却已达到西方水平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亚洲四小龙和日本的差距越来越小，整个东亚地区的生活水平也有所改观，而中国这个日本的老对手

则在谱写着人类历史上最壮丽的经济转型奇迹。简言之，历史终于让中国和日本站在了同一条起跑线上。日本作为一个社会、一种文化，当它有了明确的目标以及实现目标的途径后，就会全力以赴，始终保持最佳状态。但如果为了适应已有所改变的外部环境，需要对这些目标和途径做一些调整甚至要完全改写时，日本对于这样的转变似乎又觉得难上加难。于是，如法国一样，日本对于转变一拖再拖，直到最后问题积累成了需要通过革命才能完成的变革——只不过日本人把这种革命称作“复兴”罢了。面对整个东亚地区，尤其是中国的转型，日本的确显得有些迷茫，一时间失去了方向，能做的似乎还是过去的老一套，没什么新意。从1955年起直至2009年一直执掌日本政坛的自民党如今发现，事实上，横向思维已经行不通了。东亚问题研究专家朱峰认为：“对于中国的崛起，日本远不像其他国家那样准备充分。日本人不相信中国能崛起，也不愿意相信。但中国的崛起对日本造成的影响却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大。”最重要的是，日本或多或少对中国的崛起持否定态度，希望这只是昙花一现，或者只是人们一厢情愿地认为罢了。

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日本政治逐渐右倾，而且民族主义情绪更加强烈。这一态势在始终坚决反对日本“军事正常化”的社民党下台后进一步加剧。日本执政的政客对中国的态度开始变得越来越强硬。他们对于过去毕恭毕敬的对华态度也越来越丧失了耐心，不仅日益担心中国的崛起，而且还厌倦了中国老拿日本过去对外殖民的历史说事。在1996年的一次年度民意测验中，对中国持敌视态度的受访者人数首此超过了持有好感者。而朝鲜半岛危机、朝鲜威胁发展核武器以及1977~1983年间朝鲜绑架日本公民等事件，也更加刺激了日本的民族主义情绪。在日本的眼中，朝鲜对日本的威胁事实上也就代表了中国对日本的态度，因此也更加恶化了日本对中国的看法。1999年，狂热的民族主义分子石原慎太郎当选为东京都知事。此前，他曾持反美观点，但很快就调转枪口，瞄准中国，极度反华。与此同时，日本也

与美国签订了新的共同防卫协议，矛头直指中国，而且还十分隐晦地把中国台湾也纳入了日本的防卫范围之中。

在小泉纯一郎任日本首相期间（2001~2006年），日本对中国的敌视情绪达到了顶峰。小泉在任时，每年都会以首相身份参拜靖国神社。由于靖国神社供奉着日本在“二战”中阵亡军人以及那些甲级战犯的灵位，因此小泉的参拜就带有了明显的政治目的，这不仅让中国十分恼火，同时也助长了日本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然而，小泉的继任者们，不论是在任时间较短、曾经对中国保持强硬态度的安倍晋三，还是之后的福田康夫，以及此后的麻生太郎，都希望缓和小泉时期对中国的敌视态度，并同中国建立一种更加融洽的关系。

2009年9月，民主党的鸠山由纪夫当选为日本首相，标志着日本的政策方向出现了较大的调整。鸠山内阁一改此前历届自民党政府的政策。强调日本应与东亚发展一种全新的、更为密切的关系。鸠山提出了建立“亚洲共同体”的倡议，将亚洲称为“日本存在的根本”，同时试图建立一个更为平等、透明的日美关系。似乎长久以来早应出现的历史性转折——日本对其国际作用和定位认知的改变，已经触手可得。此外，为特意向中国示好，鸠山还在胡锦涛的继任者习近平访日期间，在短时间内成功安排了其与日本天皇的会见。然而，希望最终却破灭了。鸠山政府很快就被各种问题弄得焦头烂额，特别是因试图将冲绳的美军基地撤离而遭到了美国的强烈反对。2010年6月，鸠山被迫辞职，取而代之的是菅直人。菅直人在政治立场上更为传统，无论从何种角度而言，菅直人的当选都标志着维护现状派占据了上风。虽然在2011年8月，菅直人就被野田佳彦取而代之，但野田佳彦绝不会恢复鸠山由纪夫的政策，而且日本当时还在致力于海啸和核泄漏的灾后重建之中，无暇他顾。

在东亚，日本或多或少仍处于被孤立的状态。虽然日本一直十分慷慨地对本地区不少国家给予援助，但由于没有处理好战争遗留问

题，日本始终遭到许多邻国的憎恨，尤其是韩国。此外，日本依旧对其邻国持相对疏远的态度，拒绝向它们开放国内市场，并且只愿意同它们签订双边而不是多边协定，直到近期中国与东盟达成协议之后，才不得不有所改变。日本目前所遭受的孤立，通过以下两个案例可见一斑。一是日本在2005年曾提出希望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但以失败而告终。中国成功地动员了绝大多数亚洲国家反对日本的提议，最终使日本的计划落空。二是同样在2005年，中国发生了反日游行，抗议日本在新通过的历史教科书中淡化在“二战”中对中国犯下的罪行。这一次，亚洲各国还是一边倒地支持中国，反对日本政府。在以上两个案例中，日本遭到孤立的原因是一样的，那就是它没有正视战争给中国乃至其他所有邻国所带来的苦难。

中国的崛起客观上要求日本在思维方式上做出根本性的转变。实际上，如果日本几十年前就愿意为自己的战争罪行向邻国道歉的话，那么日本现在的利益将会得到最大的保障。但是，尽管野田佳彦曾做出了一定的努力，但日本至今仍没有任何道歉的迹象。不仅如此，日本还一直死抱着各种“二战”后的立场不放，结果让中国通过近10年高超的外交实践成功占得了先机。与此同时，中日两国关系仍处于冷战时期的冰冻状态，无论中方做何举措，日方总是以零和博弈的思维去考量。两国之间存有的争议不胜枚举，当然历史问题无疑是重中之重。但就目前而言，中日之间最重要、也最危险的争论就是关于钓鱼岛的归属问题和东海问题。此前，中日就已经在这一问题上多次发生了冲突，尤以1990年的最为严重。与南沙群岛不同，钓鱼岛周边海域已经探明了巨大的石油和天然气储备，所以它也就有了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中国方面指出，钓鱼岛自明代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当时的地图即为铁证。1894年甲午战争后，日本占领了台湾，随后窃取了钓鱼岛。因此，在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也应该将钓鱼岛归还给中国。和处理南沙群岛问题时一样，中国在钓鱼岛问题上已经提出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建议，但遭到了日本的拒绝。与此同时，中国已经在日本认为的争议海域进行油气开发。实际上，如果中日两国达成

联合开采、共同开发的协议，就可缓解当前的紧张局势，尽管有关岛屿争端和大陆架划界的问题仍存争议。原则上来说，这也是最为可行的行动，但这样做就要求日本要放弃现有立场。而且除非中日之间达成某种协议，否则钓鱼岛问题极有可能成为中日之间冲突乃至两国关系恶化的导火索。实际上，2010年秋，这一迹象就有所显现。当时日本4艘海岸警备队的船只在争议海域扣押了一艘中国渔船，并以违反日本法律为由逮捕了船长和船员。鉴于这一海域的争议性质，日本的行为无疑是一种挑衅。中国政府十分愤怒，随即做出反应，要求日方释放船员。情况迅速恶化，演变成两国之间自2005年以来最为严重的外交事件。正如2005年一样，中国许多城市出现了反日游行示威，但相比之下此次的规模要小得多。最终，日方先后释放了船员和船长，终止了所谓的法律程序。但这一事件却无疑犀利地提醒中日双边关系仍很脆弱，极有可能迅速滑向深渊。

当中日关系出现危机时，中国政府通常都试图对于民众普遍存在的仇日情绪加以抑制，以防事态失控。但有时候民众的情绪高涨到无法控制，如2005年、2010年就先后在多个中国城市出现了大规模的反日游行。如果说台湾问题和美国因素是导致20世纪90年代中国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重要因素，那一直以来，日本就一直是中国民族主义发酵的温床。相较于美国，中国对日本的仇视要深得多。除了朝鲜战争以外，中美两国并没有冲突的历史。而且早在1971年，中美两国就在全新的基础上重建了两国关系，而且一直延续到今天。此外，中美两国在地理上相隔遥远，分属太平洋的两岸。相比之下，中国和日本之间的敌对状态已经持续了100多年，而且从未间断过。虽然中国和日本是东亚地区最主要、最强大的两个国家，但在两国的现代关系中，根本找不到和解与共存的因素。中国人也许并不怎么喜欢美国人，但通常对他们都比较尊重。相反，包括高级知识分子在内的中国人常常都对日本颇有微词。不仅如此，中国的崛起更是强化了这种仇日情绪。时殷弘认为，如今的中国人普遍有仇日情绪，“如果中国对日本让步，那么就意味着中国无法崛起。如果对日本都要让步的话，那么中

国的崛起还有什么意义呢？”而保持战略耐心无疑符合中国的利益。2010年8月，中国已经取代日本，成为东亚最大的经济体。如果中国人能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日本也无法摆脱持续了二十余年之久的经济低迷，加之日本不得不应对2011年的地震、海啸和核危机的三重复杂影响，那么中日之间的天平无疑将继续向中国倾斜。中国注定会崛起为东亚经济的核心。甚至对日本来说，当前的中国已经拥有了巨大的经济影响力：2009年，中国取代美国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在2000~2003年短短的3年内，日本对华出口总额翻了一番。此外，对许多日本跨国公司来说，中国作为其生产基地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在此背景下，值得关注的是美国市场占日本出口的份额已经由1990年的30%降至2010年的17.7%。简言之，不论愿意与否，日本和中国正变得越来越相互依赖。当然，这并不是说中日关系就一定会变得更加和睦，因为两国之间相互的敌意实在是太深了。

那么，中日关系到底会何去何从呢？事态的发展存在着若干种可能性。迄今为止，日本一直自认在本地区是与众不同的，或者根本就不属于此。正如我们所见，日本自1868年明治维新以来就基本如此，它习惯于仰慕西方而鄙视亚洲其他国家。这种思维方式实际上已成为明治维新后的日本的最基本特征之一，因此，改变对其来说不仅十分困难，而且也难以接受。日本在“二战”中战败后，在安全问题上一直依赖美国，这也令其与亚洲其他国家的关系进一步疏远。日美之间的安全协议决定了日本必须更多地向太平洋以东的美国寻求支持，而不是与西边的亚洲其他国家加强合作。这也促使日本更多地把自己定位成亚太地区而不仅仅是东亚地区的强国。日本的这种心态在2007年得以充分体现，当时日本和澳大利亚签订了安全保障协议，后者是美国最忠实的盟友之一，而此前日本也只是和美国签订了类似的协议。虽然日本和澳大利亚既没有明说，也完全否认，但协议针对的目标明显是中国。此外，我们在之前也提到过，《日美安保条约》在过去的10年里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因此，日本未来最可能的走向便是沿着老路继续前进。

对日本人来说，继续保持现状，然后尽量拖延时间，直至最终不得不重新思考（这也是自1868年明治维新以来最深刻的一次改变）它与中国以及其他东亚国家的关系，这才是最符合日本利益的情况。而在中国人眼里，日美同盟还只是第二糟糕的结果，而最糟糕的（由于中国人担心日本会重蹈历史的覆辙）则是日本实现“军事正常化”。其实日本“军事正常化”步伐已经启动，只不过比较缓慢而且仍是以日美同盟为基础，没有选择脱离美国单独行动。然而，从长远来看，日本对美国的依赖也许难以为继。随着中国的经济、政治以及军事实力日益增强，日本也许不得不重新思考以更为积极的态度应对中国，正如鸠山内阁时一样。而美国或许也会逐渐意识到，中美关系远重于美日关系，因此将降低、搁置，甚至废除美日同盟。但这些都属于对遥远未来的推测。而最不可能出现的情况则是日本发展成为一个可以与中国抗衡的超级大国，原因很简单，日本太小、太特殊、太排外，而且自然资源极度匮乏。

美国——一头“巨象”

房间里——或者更为准确地说是东亚地区——还有一头“巨象”，那就是美国[注]。当然，美国根本不是东亚国家，它位于太平洋以东，距离东亚有千里之遥。但美国却与日本结盟，在韩国驻军，长期对中国台湾地区给予援助，在东亚地区与不同国家缔结了不同的双边联盟或条约，更不要提还发动了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自从20世纪50年代取代欧洲成为东亚军事霸主以来，这种态势一直延续至今。尽管其仍拥有本地区最为强大的实力，但美国的政治和外交影响力却在过去十余年的时间里急剧下降。美国在“9·11”恐怖袭击事件后对其外交政策进行了重新定位，加之中国不仅重新调整了在东亚的外交策略，而且还崛起成为东亚地区的经济支柱，所有这一切都使得中国在东亚的影响力急剧上升。同时，美国由于专注于中东事务而无暇他

顾，因此其在东亚的地位在小布什政府时期大幅下滑。如果考虑到所有的一切都只是发生在过去短短10年的时间里，那么东亚地区这种实力对比的变化实在是引人注目。在短短的几年内，所有东亚国家和地区都不得不重新思考自己对中国的态度，而且，包括新加坡、菲律宾、泰国以及韩国这些美国的正式盟友在内的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同中国建立了更为友好的关系，只有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除外。中国在东亚地区越发星光灿烂，而美国则逐渐黯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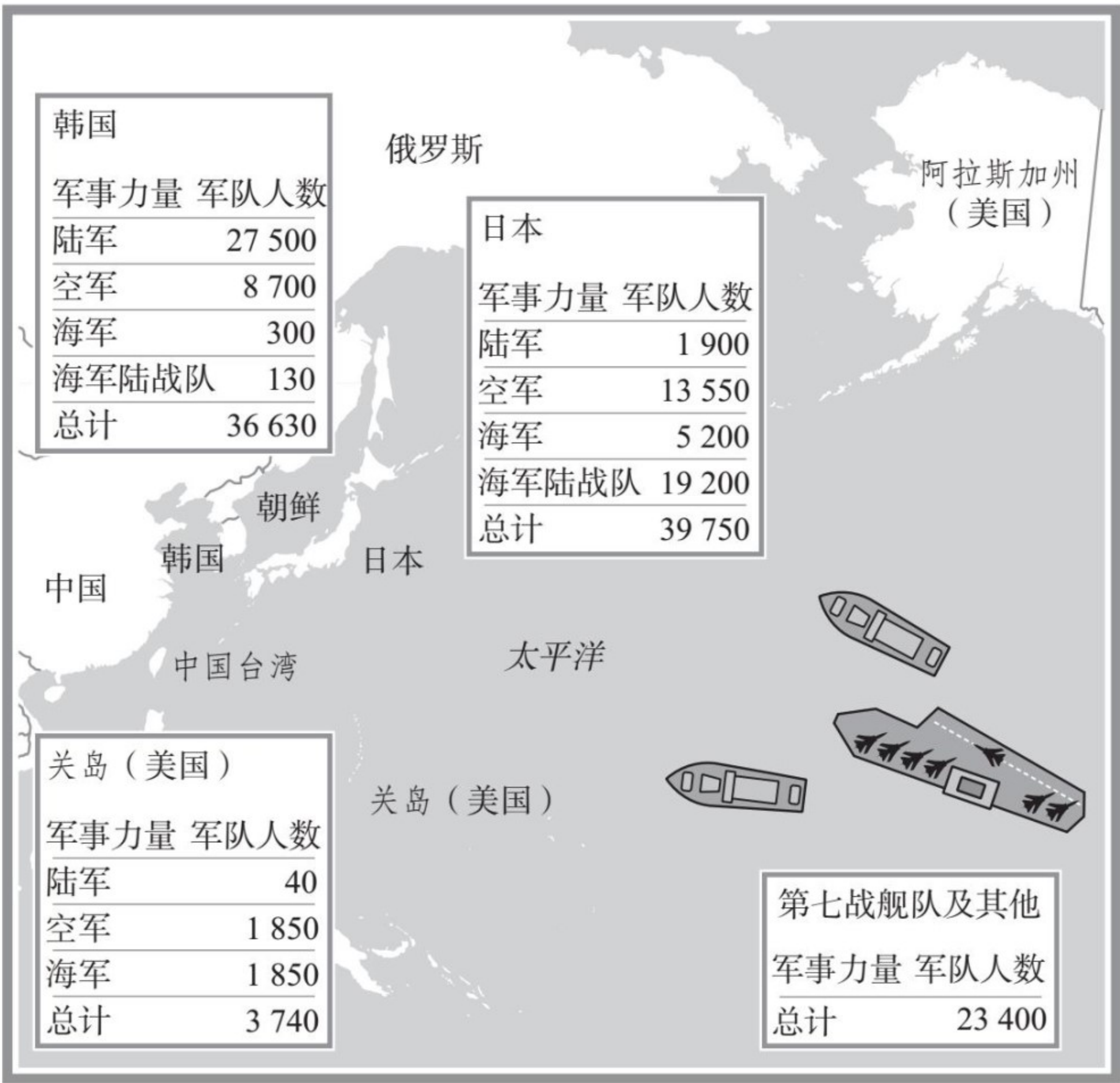


图8–10 美国在东亚的驻军（2007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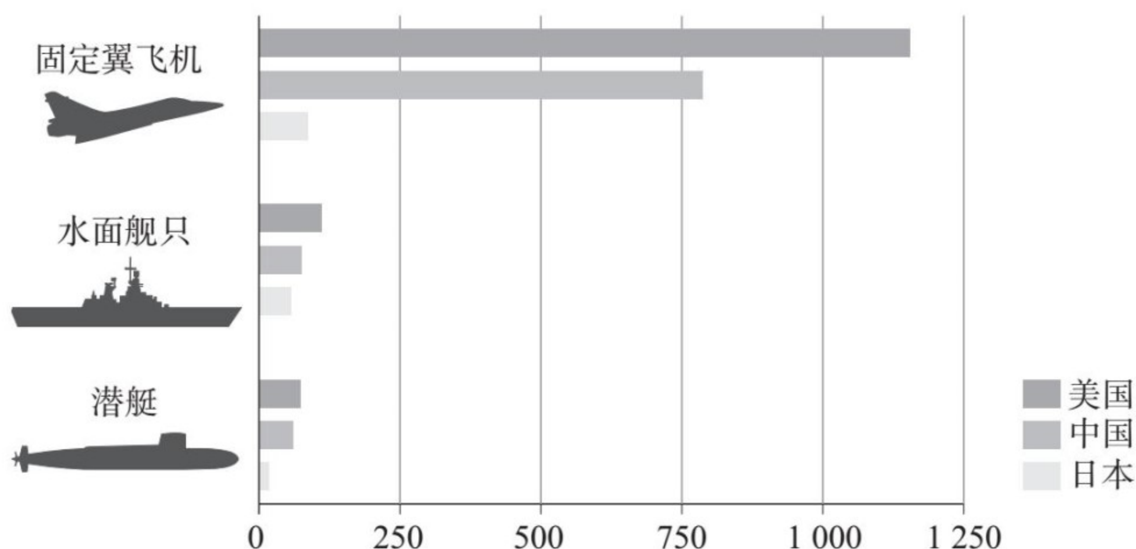


图8–11 海军实力对比（2007年）

当然，如果我们就此预测未来会以这种趋势发展下去，无疑是大错特错。恰恰相反，2010~2011年，美国成功地重返东亚，中国则发现自己处于守势。美国并没有将东亚拱手相让，而是很明显已经决意收复其在东亚的失地。截至2011年年底，美国战略中三个关键性的要素已经凸显。首先，美国成功地巩固并拓展了其在东亚地区的两个主要军事同盟，即美日军事同盟和美韩军事同盟。而且，在钓鱼岛的渔船事件后，日本决定针对其所认为的中国日益增长的威胁，实现“军事正常化”。此外，美国还宣布有史以来第一次在澳大利亚部署军队。所有的一切都代表了对美国在东亚地区的传统力量（军事实力）的肯定。其次，美国正在设法按照中国10年前的做法，加入东盟，而且实际上已经取得了不小的成功。此前，美国一直对东盟不甚感冒，但现在却在外交上更为主动、进取，最为明显的事例就是其于2011年11月第一次参加了东亚领导人峰会。这对美国人来说可是个新鲜事：很明显他们已经借鉴了中国成功的经验，吸取了自己失败的教训。而这一路径中的关键之一，就是对某些东盟国家（特别是越南、菲律宾和新加坡）所谓的对中国在南海和东海的海军现代化建设，及与此相关的

南沙和西沙政策上表现出来的关切，表示理解。这也是美国新战略的外交因素。

最后，美国正在着力推广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是一个多边的自由贸易协定，最初只有4个创始国，现在则还有另外6个国家正处于谈判的进程之中。美国的算盘打得很精，打算一箭双雕：一方面可以扩大美国在世界上最富活力地区的参与程度，从而为美国经济加油打气；另一方面可以使中国丧失在贸易协定问题上的主动性。美国希望借此将贸易协定的重心由东亚转向亚太。这并不新鲜，实际上，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的立场就一贯如此。从表面上来看，美国战略的一个关键方面就是通过在劳动力、知识产权、环境保护、加强国企监管等方面预设门槛，将中国排除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之外。然而，贸易谈判无疑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现在还无法对最终结果进行预测。但是，鉴于中国在本地区的经济重要性不断上升而美国却不断下降，因此很难想象美国能够在贸易协定方面占得先机。

我们可以确定是，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美国仍然是东亚地区的军事霸主，至少就海军和空军而言无可匹敌。美军实力最强的区域无疑是东北亚，远高于其在世界其他任何地区。东北亚也是世界上仅有的冷战对立延续至今的区域。日本对美国的支持可追溯到“二战”之后，韩国对美国的支持可追溯到朝鲜战争，中国台湾与美国的关系则可以追溯到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而美军在东南亚的军事实力则相对较弱。尽管美国试图重返东亚，但目前为止中美关系仍相对稳定。然而，美国遏制中国的企图（如通过提升军队建设水平），却可能会对双边关系造成严重的影响，无论是就地区层面而言，还是就全球层面而言，皆是如此。未来可能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美国将如何应对中国海军在西太平洋与日俱增的影响力：目前，美国仍将太平洋视为自己的领地。如果事态果然按这个方向发展，那么西太平洋将有可能成为引发中美两个大国之间紧张态势的导火索。当然，美国也有

可能寻求与中国海军的接触与合作，将其纳入到美国在西太平洋的体系之中。如果事态如此发展，那么中国实力的增长就不会对中美关系造成严重的影响，但这一点目前来看可能性不大。鉴于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军事实力以及美国在经济不振的背景下维持其现有的军事使命的成本不断高企，美国也有可能逐渐适应其在东亚地区影响力的不断下降。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在本地区的影响不断提升，美国的实力和影响则在迅速下降，这一点毋庸置疑。从长远来看，这一点似乎很有道理。到目前为止，中国的陆军力量已经在东亚傲视群雄，而美国则至少在一定时期内仍会是东亚地区的海上霸主（见图8－11）。这不仅说明了美国会继续在本地区遏制中国，也从另一个侧面表明美国的实力不断下降。陆上霸权代表了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和政治实力，而海上力量仅仅是美国硬实力的体现。

---

1. 芬兰化指一边维持议会民主制度和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同时却处于社会主义国家势力控制下的状态。——译者注
2. 现实政治指当政者应以国家利益作为从事内政外交的最高考量。——编者注
3. “房间里的大象”，是英语中一句谚语，用来形容一个明明存在的问题，却被人刻意回避或无视。——译者注

第9章
中国：正在崛起的世界强国

在北京的西北离中国人民大学不远，有一个大型家乐福超市，这家超市的货物琳琅满目，从服装、电冰箱到体育用品、食品，应有尽有。在这里，即使你不是为购物而来，随便转一圈，也需要花费很长时间。这是我所光顾过的规模最大的超市。在这里，每天都是人头攒动。家乐福，这家目前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零售商的法资企业，在中国就有112家规模大小不一的超市。

然而在2008年4月，家乐福突然成为中国民众抵制的目标，这股浪潮以野火燎原之势席卷了整个中国。在北京、武汉、合肥、昆明、青岛和其他很多城市，民众在当地的家乐福超市外举行了示威活动。对家乐福的抵制缘起于互联网论坛上一些内容简短的帖子，这些帖子宣称家乐福及其股东之一——法国奢侈品LVMH集团，曾资助过达赖喇嘛在印度的流亡“政府”。当时，西藏刚刚发生了严重的暴力犯罪事件。而发生在法国的对北京奥运会圣火传递活动的抗议与阻挠，以及法国总统萨科齐有可能抵制北京奥运会的传言，更是对此次抗议活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很多家乐福超市外，都聚集了大量民众，号召中国消费者对其进行抵制。示威者高举着勇敢护卫奥运火炬的中国残疾运动员金晶的大幅照片。北京奥运火炬在巴黎传递期间遭到了法国抗议分子的恶意阻挠，坐在轮椅上的中国残疾运动员金晶拼死护卫火炬，这一事件再次激怒了中国民众。中国民众对家乐福的抵制活动也严重影响了其他法国公司，这不禁让人联想到，当2005年中日关系跌到谷底时，中国民众对日本公司的抗议行为。

由于担心中国民众的抵制活动会影响其在华业务，家乐福不得不立即发表声明辟谣——家乐福没有资助过西藏流亡“政府”，同时也反对分裂中国的行为。为了平息抗议活动，中国互联网管理部门开始限制网民使用法国公司的名称进行信息搜索。与此同时，法国总统萨科齐为了缓和中国民众因奥运火炬事件进行的抗议活动，也委婉地对这种“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事件表示了歉意。由于法国公司对其产品会受到中国民众抵制的担心日甚，萨科齐不得不给中国运动员金晶写了一封信以表“同情”。在信中，萨科奇承认发生在法国的抗议以及对金晶的袭击行为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称这是一次让人“非常不快”的事件并对这种行为表示强烈的谴责。“在此请您相信，”萨科齐在信中写道，“由极少数人制造的令人遗憾的事件并不代表法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这封信是由法国参议长在正式访问上海期间转交给金晶的。另外，萨科齐也委派他的首席外交顾问到北京寻求缓和中国民众的反法情绪。

就在2008年的早些时候，另一家法国公司——标致雪铁龙公司，也发现自己伤害了中国民众的感情。当时它在西班牙《国家报》（*El Pais*）刊登了一则雪铁龙的广告，广告中引用了毛泽东的大幅照片，但却对其进行了恶意篡改。在广告的底部打出了这样的广告语：“毫无疑问，我们是王者，对于雪铁龙，革命远远没有结束。”这则广告在中国互联网论坛上被中国网民指责为“伤害了我们的民族自豪感”，同时也“侮辱了全体中国人民”。可以想象，这则广告被雪铁龙公司迅速撤了下来，并声明该广告是“不适宜的”，并对广告引起的任何“不悦”表示遗憾。雪铁龙公司在声明中表示：“我们一直珍视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情感，我们也尊重中国国家的代表人物和象征。”

然后在2008年5月，法国时尚品牌迪奥也尝到了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苦头。出于对中国公众可能抵制其产品的担心，迪奥宣布撤销并停止任何与美国女演员莎朗·斯通有关的形象广告、市场宣传以及其他

商业活动。在这之前，莎朗·斯通曾宣称，汶川大地震是中国对西藏态度的一种报应。同月，达赖喇嘛被伦敦城市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这也遭到了中国媒体的强烈批评。而在6月，该大学的副校长不得不到中国大使馆正式表示，“对于因为这次授予学位给中国人民带来的任何不悦致以歉意”。很显然，这一道歉与这所学校当时有434名中国学生及中国学生已经成为英国大学的重要收入来源的事实不无关联。

以上三个事例从不同方面证明了中国市场对很多外国公司和大学的重要性，以及有关公司、大学乃至所在国的领导人对中国民族情感的不敢轻视。对于中国公众的意见、关注点和态度在世界舞台上所发挥的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力，他们会更加重视。

随着中国崛起成为世界大国，一种新的世界秩序正在形成——尽管其未来的形态尚不明确。正如前文所述，最能突出表现这一过程的地区就是东亚，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中国已经成为该地区的核心。它既是本地区几乎所有国家最大的市场，也是目前正在成形的新经济框架的主导者，所有其他国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顾及和迎合中国——尽管中国的外交风格一如既往、坚定不移地自觉保持低调。迄今为止，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变化还尚未打破全球宁静的态势，但其速度和规模表明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充满不稳定性的时代。这与冷战时期异常的稳定和相对的可预见性形成了鲜明对比。

中国经济崛起的影响在未来10年的时间里将如何展现？当20年后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并在东亚地区占据支配地位之后，它将如何行事？中国将继续在现行国际体系的框架下行事（正如它在过去的10多年里所做的那样，直至不久之前仍然如此），还是成为一个全新国际体系的主要构建者和领导者？随着世界1/5的人口急迫地追求以往西方国家才拥有的生活水平，中国以及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崛起是否会使世界陷入灾难性的环境和气候危机？中国显然不知道这些问题

的答案，其他国家也是如此，但其如何对待中国将是中国做出何种回应的重要决定因素。国际关系专家们喜欢引用20世纪初德国和日本的崛起为例，说明新兴强国无法被限制在现有的国际体系框架内，其野心将最终导致战争的爆发。然而，中国的崛起未必会导致武力冲突——为了全人类的利益考虑，我们也强烈希望不要发生这种冲突。但冷静思考的话，即使考虑到历史时期的差异，中国的崛起对于世界的影响也将远远超过德国和日本。

21世纪的到来也标志着中国开始拥有了全球性思维。直至那时，对于世界大多数人来说，中国还只不过是一个人们知之甚少的遥远国度。如今，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中国的影响就已经切实存在且触手可及，不再是一组干巴巴的数据或者仅供决策者参阅的信息，而已经对全世界的意识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关于中国的电视节目和报刊文章已是司空见惯。造就这一全球“关注中国”时刻的主要原因有两个。第一，随着中国确立了“世界工厂”的地位，“中国制造”的商品开始涌入全球市场，从美国的沃尔玛到日本的吉之岛，几乎一夜之间商品价格大幅下降，创造了人们称之为“中国价格”的现象。毫无疑问，这使人们对中国崛起产生了“好感”。而这一“好感”会随着人们认识到，由于中国制造业极其廉价的成本，许多公司和就业机会都已经转移到中国，而有所缓和。第二，中国两位数的经济增长率使其对于世界原材料的需求日益增长，这产生了相反的效果——引起了通货膨胀而不是通货紧缩，导致大部分大宗商品的价格大幅持续上涨，其中石油最为明显，变化也最剧烈。除了主要原材料生产国之外，其他国家日益感到不安，它们越发意识到中国的崛起对其而言并非一定是好事。

对于中国崛起的影响，世界上存在不同的看法：对于众多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这主要意味着其出口产品价格更高，从而刺激了经济增长，此外还有大量的廉价商品；而对于西方国家和日本来说，最重要的影响是消费品和服装价格的大幅下降，以及大宗商

品价格的不断攀升；对于其他东亚国家来说，这意味着它们的产品拥有了一个广阔的新市场，同时它们国内也能享用到廉价的“中国商品”。但是，无论具体影响如何，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会因此受益。中国进入世界市场使得世界对中国产生了一种新的认识：中国成为世界强国已经为时不远。

2001年，中国政府开始实施“走出去”战略，其目的之一就是与大宗商品生产国建立更为紧密的关系，从而确保中国经济发展和大规模的城镇化所急需的原材料供应。这一政策的效果非常显著，不到10年的时间里，中国已经与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建立了紧密的关系，与中东、中亚和南亚的不少国家也建立了较为紧密的关系。无疑，西方国家最感兴趣也最关心的是中国对其的直接影响，但实际上，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关系的变化在中国作为新兴世界强国崛起的过程中更为重要。就此而言，我们必须要认识到世界经济重心日益由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向巴西、印度、印尼等发展中国家转移，而西方金融危机更是加速了这一进程，使其日益明显。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重视实际上是全球经济力量重构的一部分。2000~2005年，中国海外投资的增长超过5倍，达到113亿美元，而且仍然在持续快速增长，2009年达565.3亿美元，自2003年以来保持了年均55%的增长率。东亚是中国最重要的投资目的地，拉美、非洲和中东紧随其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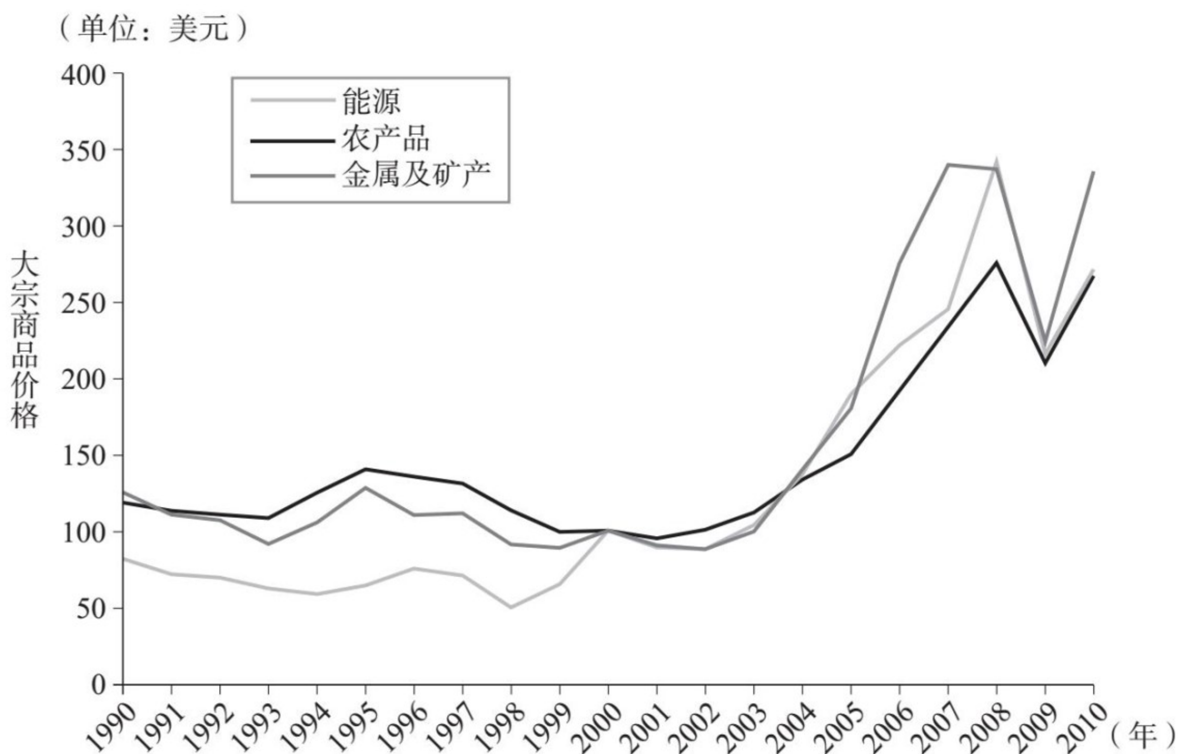


图9–1 日益上涨的全球大宗商品价格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截至2010年）

拉美

2000年，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出访了巴西、阿根廷、智利和古巴四国，为中国与这些国家达成一系列协议、增强经贸往来铺平了道路。自2003年以来，中拉贸易保持了近40%的年均增长率。中国与巴西关系的发展就是中拉关系日益紧密的典型事例。2000~2009年，在中国需求的拉动下，巴西对中国的出口额涨了18倍；2009年，中国成为巴西最为重要的出口市场，占其出口总额的12.5%。其中，大豆和铁矿石占了近2/3，原油占10%。相比之下，美国在巴西出口中所占的份额则由2002年的26%降至2010年的10%。可以说，巴西向中国的出口以大宗商品为主，而中国对巴西的出口则主要是工业制成品。2010年，中国成为巴西最大的投资国。在总额为484.6亿美元的外资中，中国的投资

额达到170亿美元。2010年年末，中石化宣布其将出资71亿美元认购雷普索尔巴西公司40%的股份。这也是迄今为止中石化在拉美地区最大的投资之一。一年之前，中石化与中国国家开发银行签署协议，为巴西国有石油公司巴西石油（Petrobas）提供100亿美元贷款，巴西石油则需要在10年内每天向中石化提供20万桶原油。随着世界上最大的离岸石油盆地之一的发现及投产，巴西正逐渐成为中国的主要石油供应商之一。鉴于中巴双边贸易的规模，在未来的5年内，人民币将极有可能取代美元成为双边贸易的结算货币。实际上，巴西很有可能成为所谓的“人民币贸易集团”中的重要一员。中巴双边紧密的外交和政治关系（例如同为金砖国家集团的成员），无疑将助推这一态势的发展。

尽管对于中国来说，与巴西这一拉美最大经济体的关系至关重要，但实际上中国的影响已经遍布了整个美洲大陆。中国公司购买了厄瓜多尔和委内瑞拉油田的股份，并在秘鲁的铜矿产业进行了三笔重要的投资。2011年，据秘鲁政府预测，在其能源及矿产领域现有及已达成协议的410亿美元的投资中，中资达110亿美元。中国已经与阿根廷签署了总额达100亿美元的货币互换协议，并与智利、秘鲁两国签署了自贸协议。根据世界银行的观点，拉美从与中国日益紧密的联系中获益颇丰，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还有一部分原因则在于不少国家从与中国的贸易中受益而日渐发展，拉美对这些国家的出口也有所增长。

中国已经成为拉美地区越来越多的国家最为重要的贸易伙伴或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2010年，中巴贸易占巴西外贸总额的14%，而2001年时这一比例仅为2.8%。同年，中智、中阿贸易总额分别占智利、阿根廷两国外贸总额的19.2%和9.7%，2001年相关比例则仅为5.6%和4.7%。至2014年，中国将取代欧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拉美第二大贸易伙伴。简而言之，中国已经对美国的后院产生了重要影响。但迄今为止，中国“走出去”战略取得最大成功的地方是非洲。

非洲

非洲对于中国的诱惑力显而易见：中国迫切需要各种原材料以推动其经济增长，2010年，中国原油的消费量占世界消费总量的10%，锌为43%，钢铁为42%，铁矿石为44%，铜为39%。正如我们在第5章所论及，除了稀有矿产之外，中国的自然资源非常贫瘠。因此，中国别无选择，只能放眼海外。另一方面，非洲的自然资源极为丰富，近期发现的石油和天然气储藏更是凸显其资源优势。另外，与一直备受美国关注的中东地区不同，非洲处于相对被忽视的状态。

2006年，中非这一新型关系的发展达到了巅峰：首先是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出访了非洲各国，接下来在11月，48个非洲国家的首脑政要出席了迄今为止在北京召开的规模最大的一次峰会。时任中国总理的温家宝提议，争取中非贸易在2005~2010年间实现翻一番。中国政府还做出了一系列其他承诺，包括：到2009年时对非洲的援助比2006年增加一倍；创建总额达50亿美元的中非发展基金，以鼓励中国公司在非投资并向其提供支持；将非洲最不发达国家享受零关税待遇的对华出口商品范围由190个扩大到440个；在今后3年内向非洲提供30亿美元的优惠贷款和20亿美元的优惠出口买方信贷；免除非洲负债最重、最不发达的国家截至2005年年底到期的政府无息贷款债务；在今后3年内，为非洲培训15 000名专业人才，向非洲派遣100名高级农业技术专家，为非洲援建30所医院和100所乡村学校，向非洲留学生提供中国政府奖学金的名额从当时的每年2 000名增加到2009年的每年4 000名。会议期间还签署了很多重大协议，其包括在埃及建设一个炼铝厂、在赞比亚建设一个新铜矿的项目，与南非签订了采矿合同等。相关承诺已经得到了履行，2000~2008年期间，中非之间的贸易总额从106亿美元增至1 068.4亿美元，增长了约10倍。2009年年末，时任总理温家宝承诺在未来的3年内再向非洲提供100亿美元的低息贷款，这

一数额是中国在2006年所承诺的一倍。此后，中非之间更是达成了一系列其他协议。

目前，石油占非洲对中国出口产品总值的一半以上，安哥拉已经成为仅次于沙特阿拉伯的中国第二大石油供应商，并远超位居第三位的伊朗。2009年，从安哥拉进口的石油占中国石油进口总量的16%。在阿尔及利亚、安哥拉、乍得、苏丹、赤道几内亚、刚果和尼日利亚等国，中国都有石油利益，其中包括可观的开采权，以安哥拉、苏丹和尼日利亚三国尤甚。目前，苏丹石油产出的一半输往中国，占后者石油需求总量的6%。来自非洲的石油占中国石油进口总量的比例已达到30%左右，而且随着中国在尼日利亚的三角洲地区购买了巨额股份，这一比例还将继续上升。在过去的10年里，中国从非洲进口主要原材料（矿石和金属除外）的增长量远远超过从世界其他国家进口的增长量。以木材为例，从非洲所进口的木材已占中国木材进口总量的20%。2008年，安哥拉、南非（非洲最大的经济体）、苏丹、尼日利亚、埃及依次成为中国在非最重要的贸易伙伴。2009年，中国成为南非最大的贸易伙伴和最大的出口市场。2010年，中非贸易总额达1 269亿美元，几乎与美国不相上下，尽管与欧盟相比还有一定差距，但差距已不断缩小。尽管发展迅速，但中非贸易仅占中国贸易总额的不到3%。2005~2010年期间，撒哈拉以南地区所吸引的中国投资占中国对外投资总额的13.8%，高于美国、欧洲和澳大利亚，但与亚洲、拉美、中美和中东地区（含北非）还有一定差距。据估计，中国在非洲的投资仅占外国在非洲总投资的3%。但也有预测认为这一比例实际上已经超过了9%。就资本流动而言，中国已经是仅次于美国的非洲第二大投资国，但与欧盟整体相比还有一定差距。现在看来，中国超越其他国家，以绝对优势成为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和最大的投资国只是时间问题，且优势将较为明显，但有朝一日印度也许会成为其重要的竞争对手。在2005~2007年的3年时间里，世界银行向非洲所提供的担保和贷款达174亿美元，而同期中国进出口银行所提供的担保和贷款总额就已达近160亿美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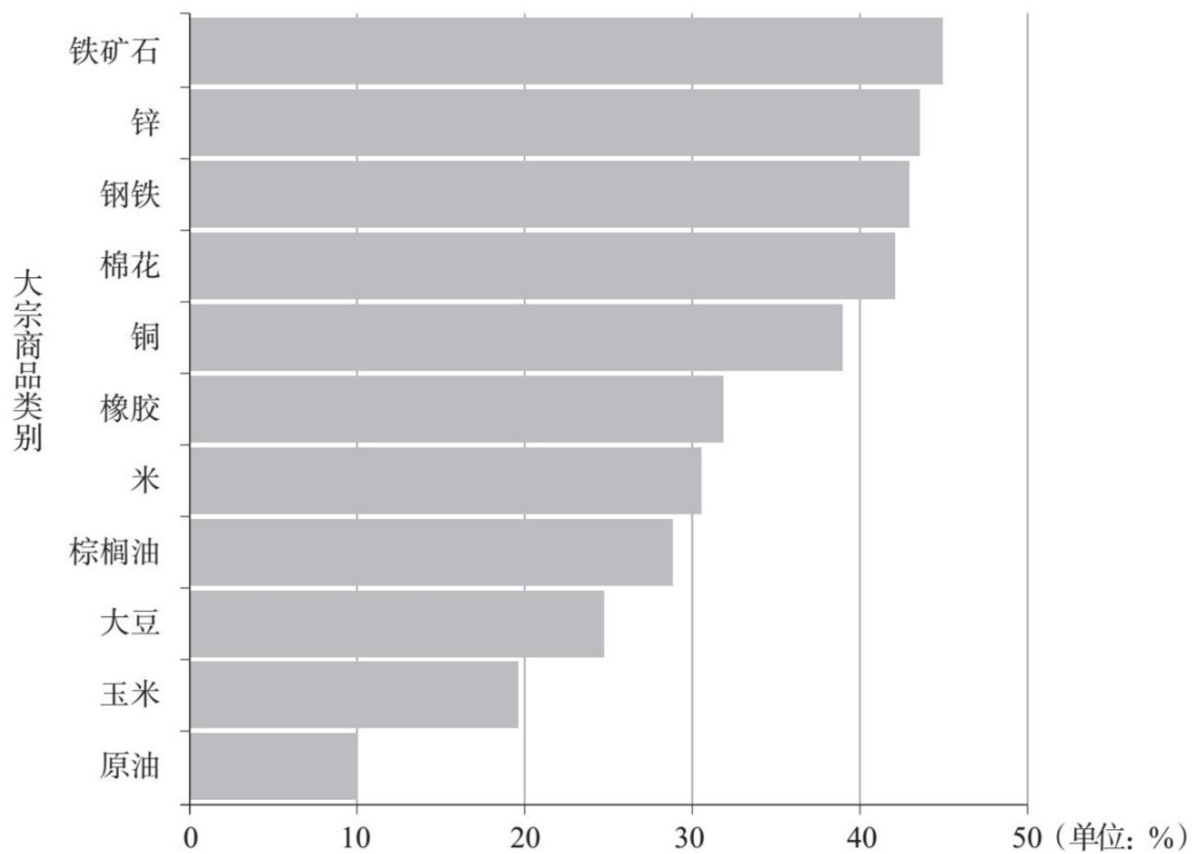


图9-2 2010年中国大宗商品的消费量在世界总量中的占比

资料来源：路透社

表9-1 非洲矿物储量及其占世界总储量的比例

矿物	非洲（储量）	世界（储量）	非洲约占比例（%）
铂族金属（吨）	63 000	71 000	89
钻石（百万克拉）	350	580	60
钴（吨）	3 690 000	7 000 000	53
锆（吨）	14	38	37
黄金（吨）	10 059	35 941	28
钒（吨）	3 000 000	13 000 000	23
铀（吨）	656	4 416	15
锰（千吨）	52 000	380 000	14
铬（千吨）	100 000	810 000	12
钛（千吨）	63 000	660 000	10
镍（千吨）	4 205	62 000	7
煤炭（百万吨）	55 367	984 453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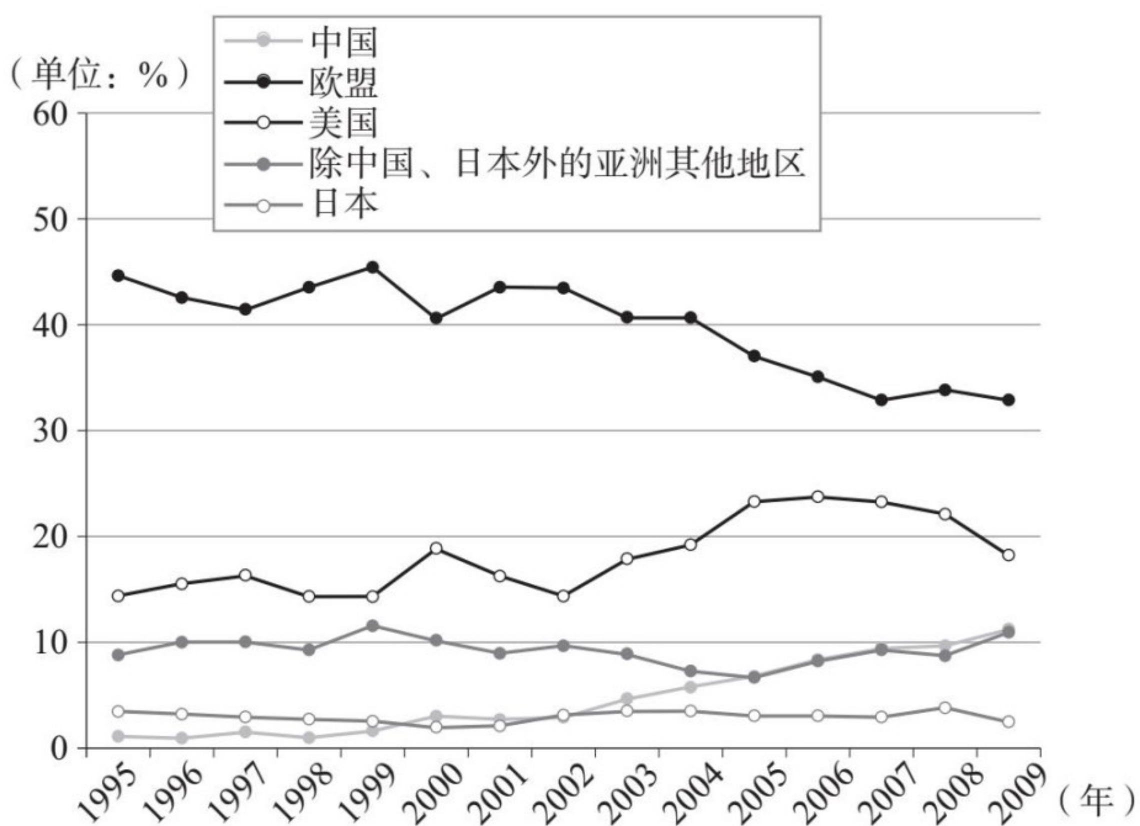


图9–3 1994~2009年世界主要国家及地区在非洲出口中的占比

数据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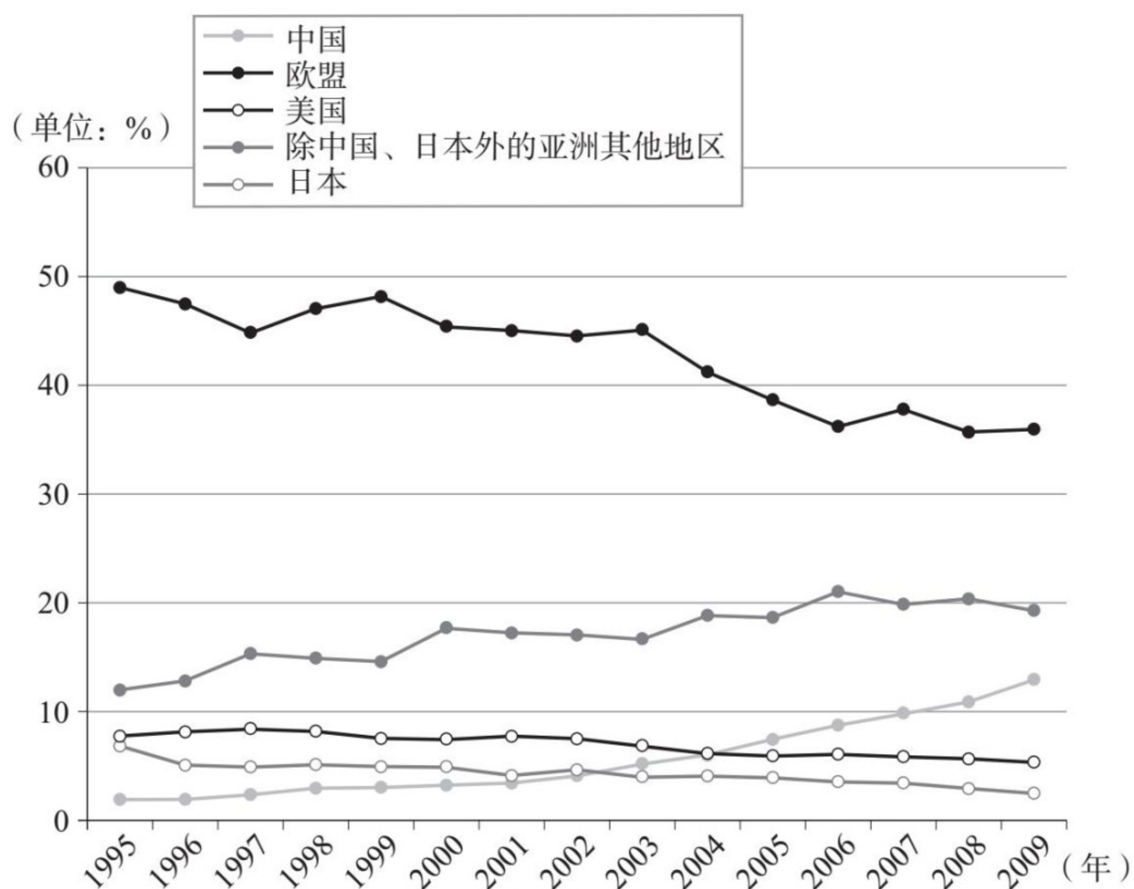


图9–4 1994~2009年世界主要国家及地区在非洲进口中的占比

数据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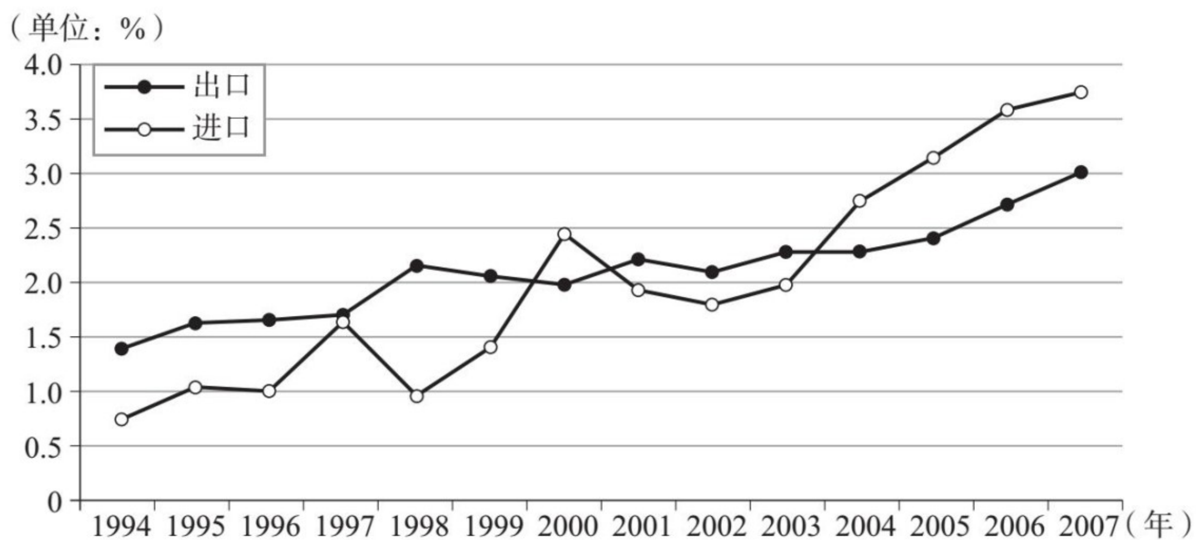


图9–5 非洲在中国进出口中的占比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统计年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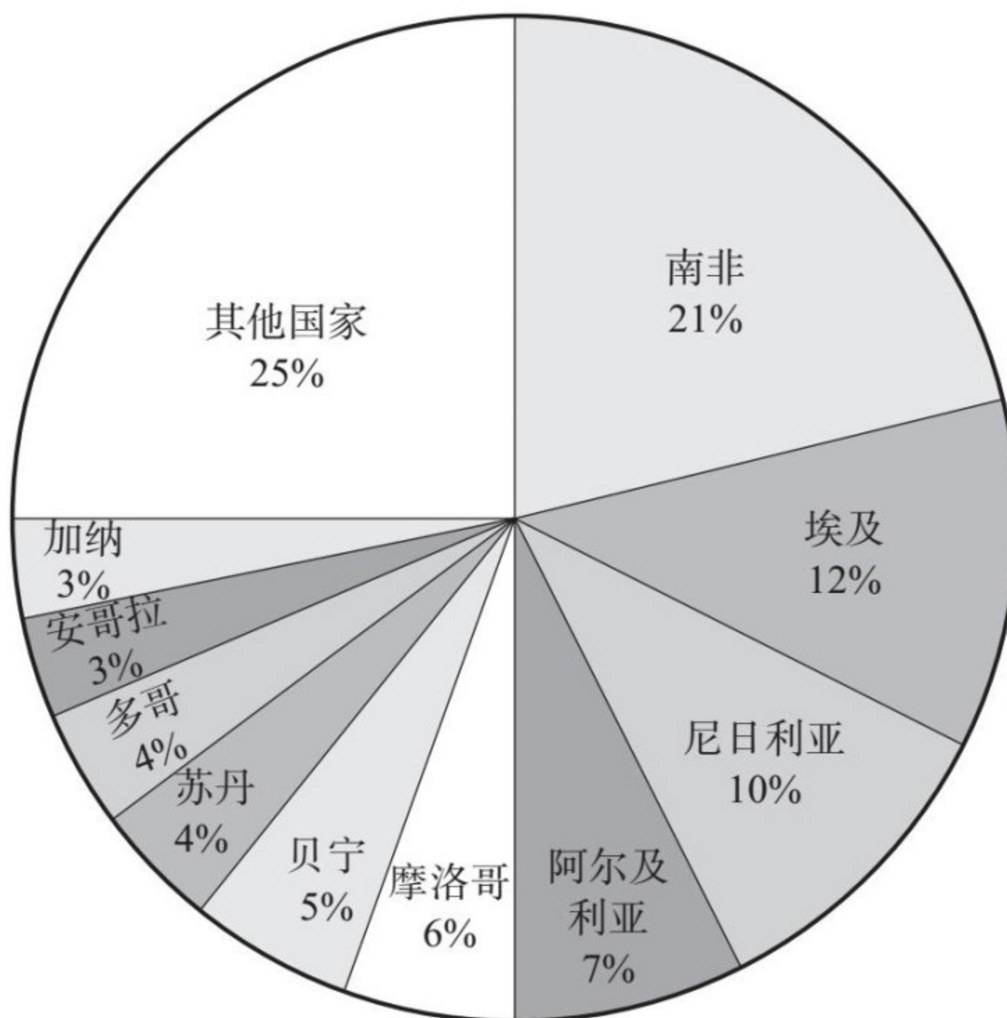


图9–6 2007年中国对非洲出口的主要国家及其所占比例

数据来源：2008年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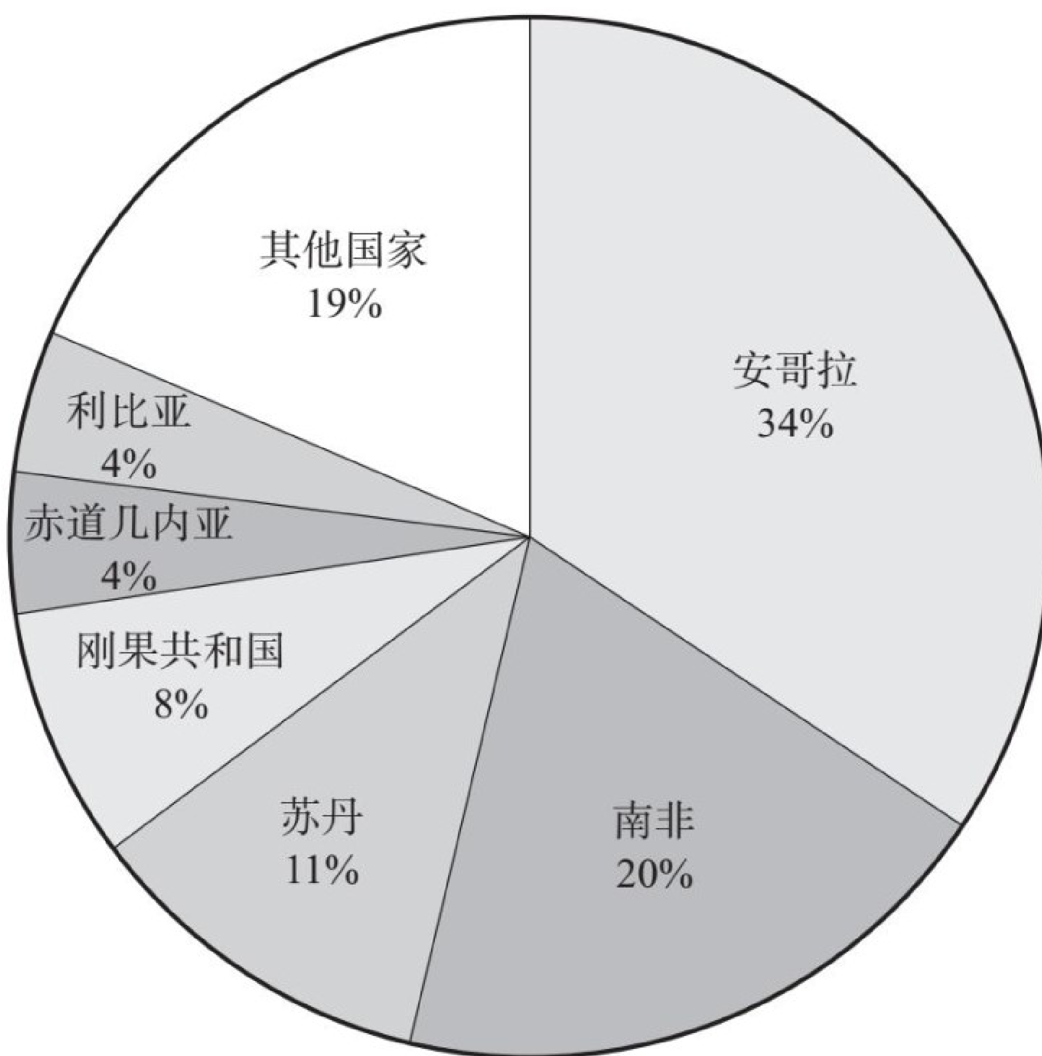


图9–7 2007年中国从非洲进口的主要国家及其所占比例

数据来源：2008年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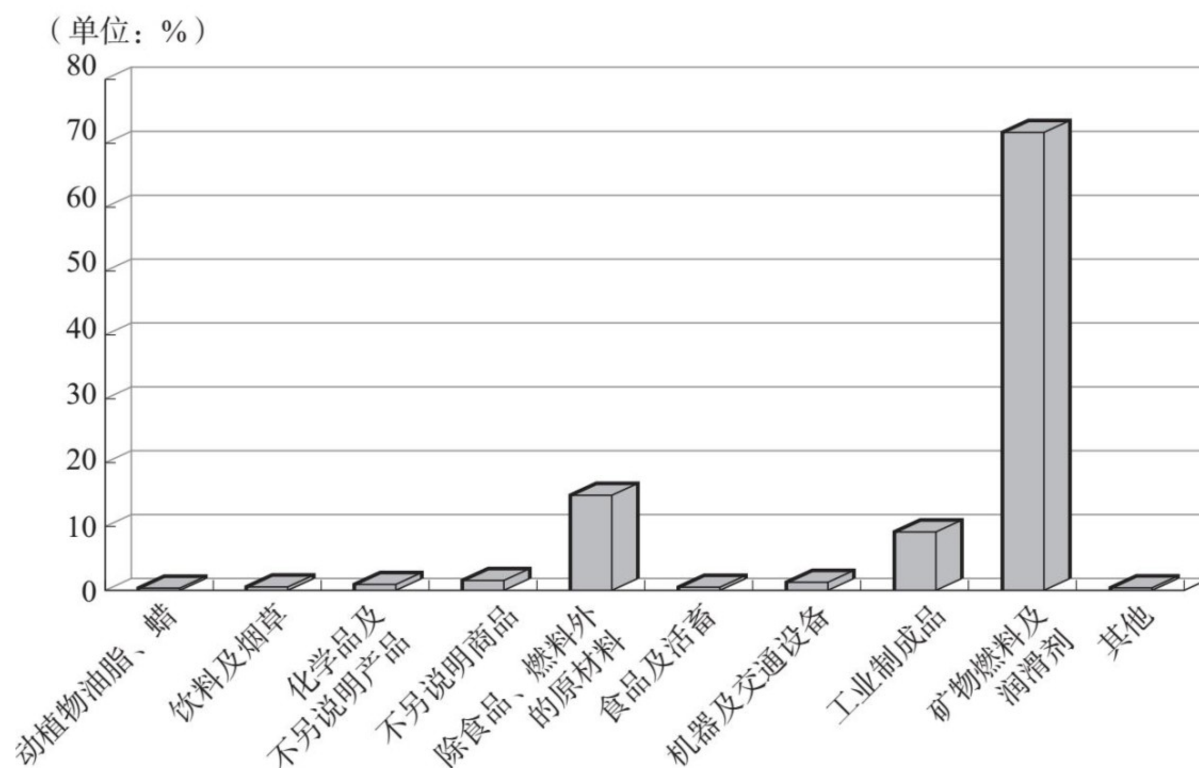


图9-8 2007年非洲向中国出口产品种类在总量中的占比

数据来源：2008年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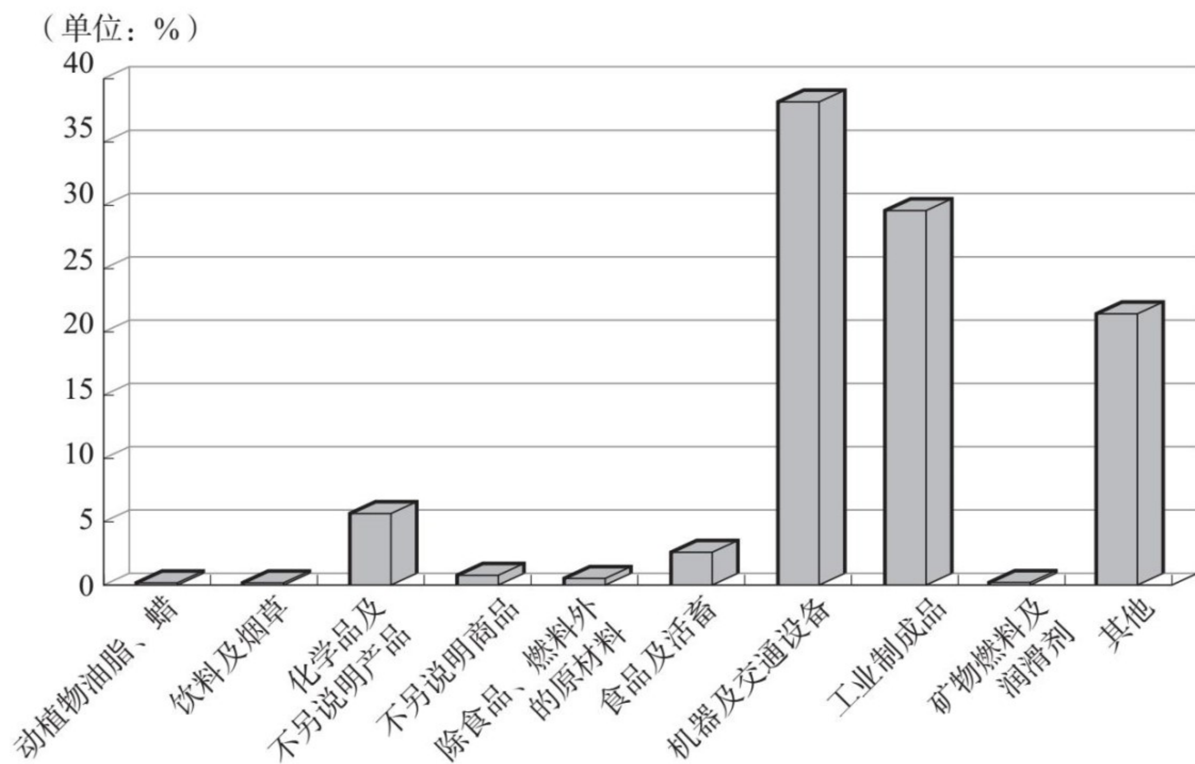


图9-9 2007年非洲从中国进口产品种类在总量中的占比

数据来源：2008年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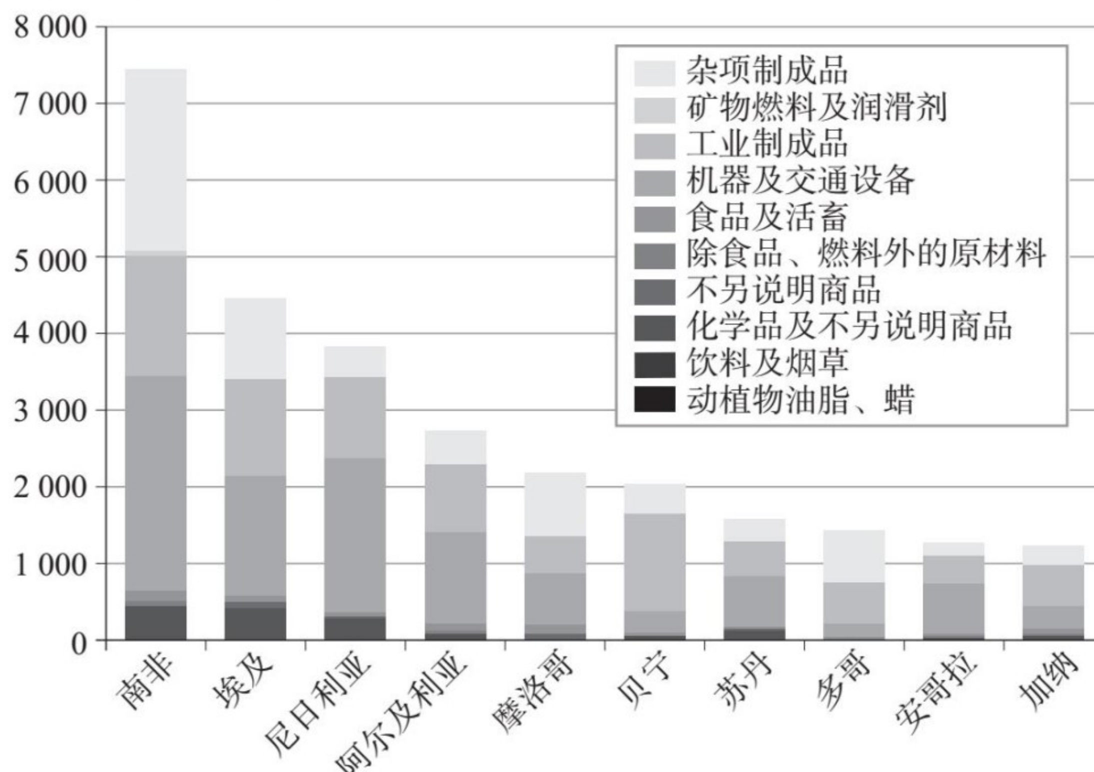


图9–10 2007年非洲从中国进口的主要产品（以国家和种类计）

数据来源：2008年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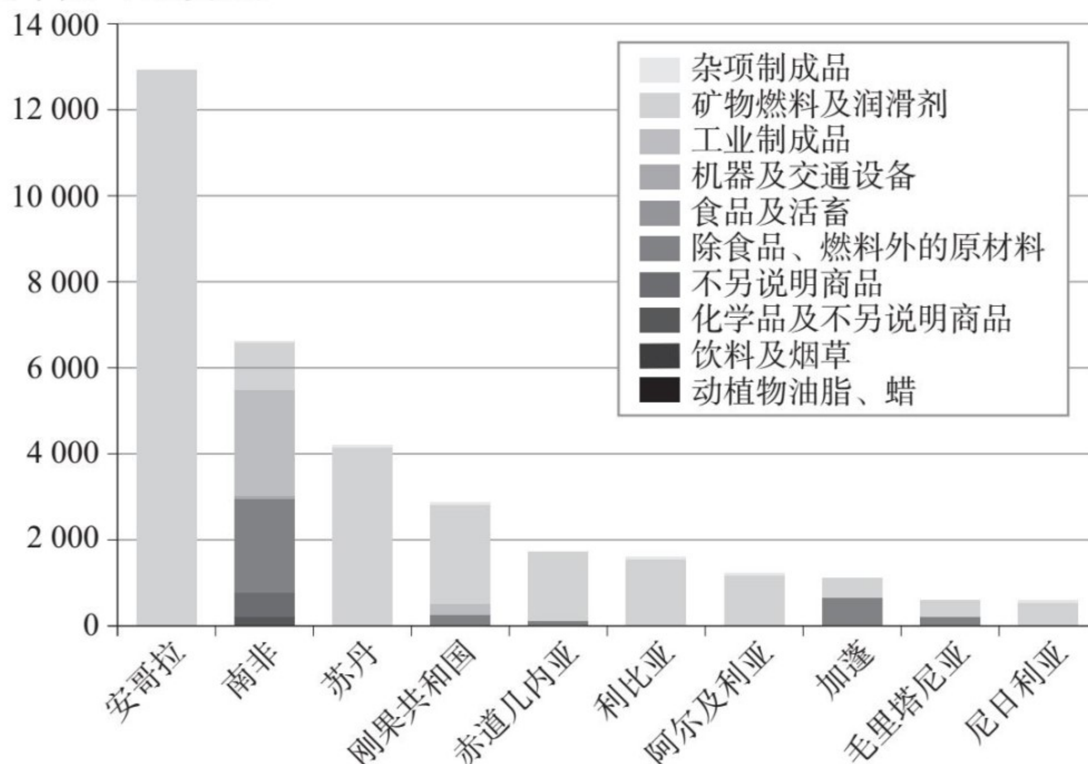


图9–11 2007年非洲对中国出口的主要产品（以国家和种类计）

数据来源：2008年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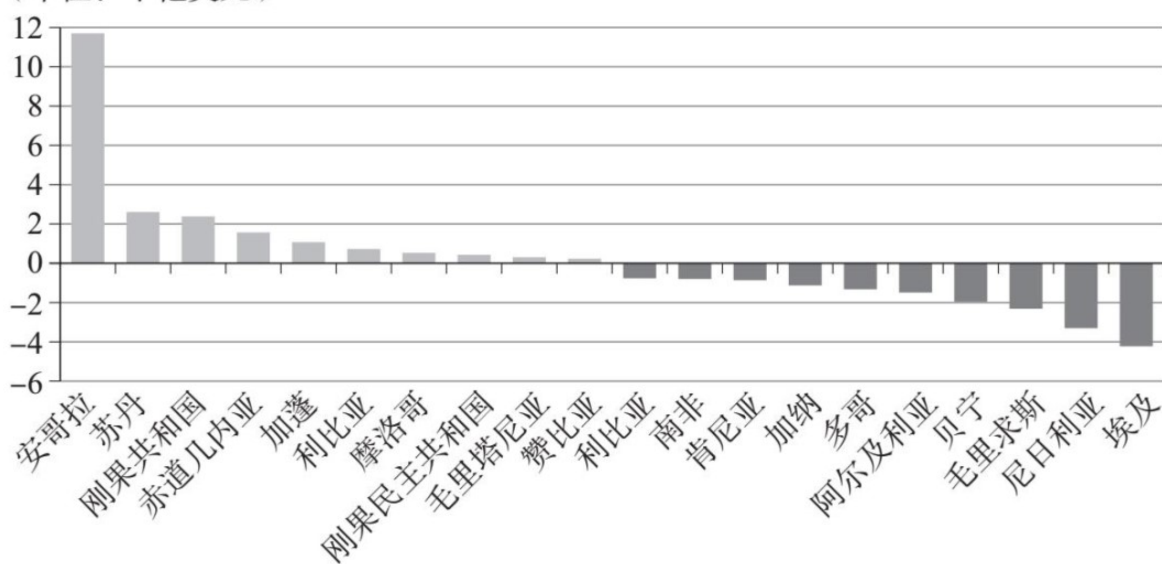


图9–12 2008年中非之间的贸易差额（正负案例各10个）

数据来源：2008年中国商务部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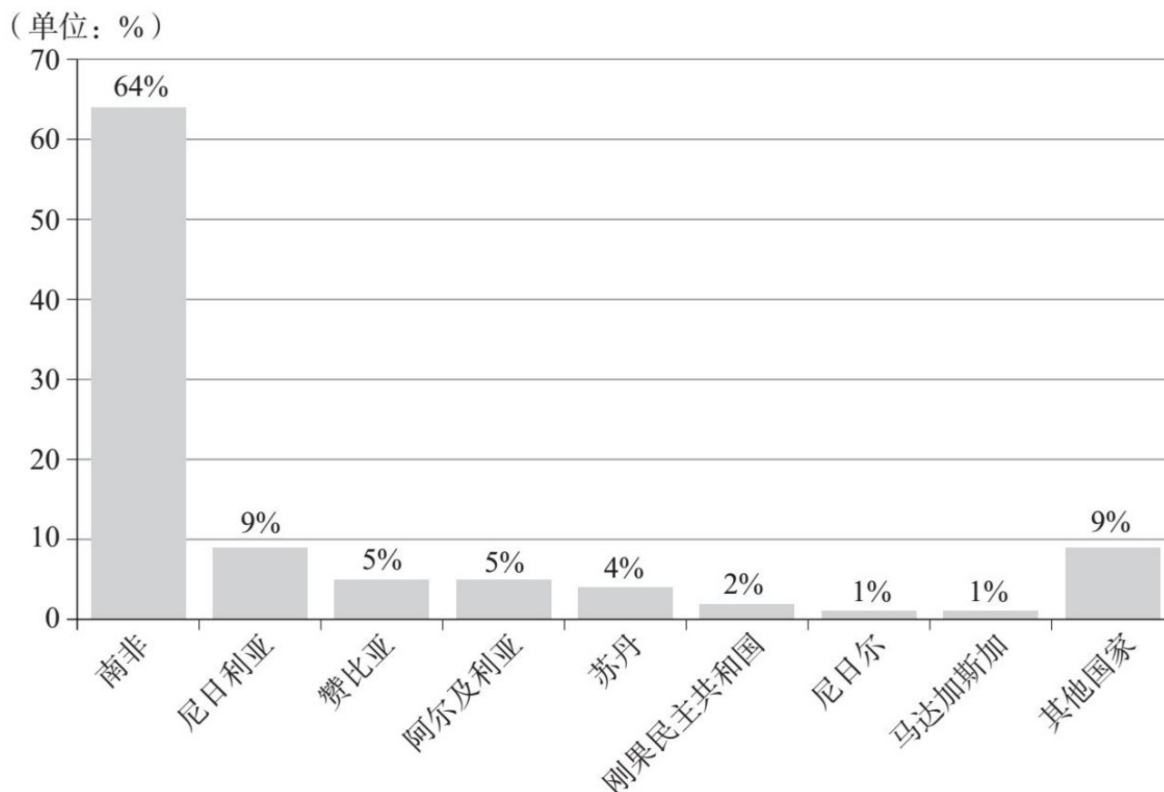


图9–13 2003~2008年中国对非投资的主要目的地

数据来源：2008年中国商务部

中国在非洲的存在不断扩大的证据随处可见：赞比亚有中国摊贩，中非共和国有中国伐木工人，津巴布韦有中国游客，南非有中文报纸，苏丹有中国的地质学家，非洲卫星电视有中文频道。据估计，有900家中国大中型公司在非洲开展业务，而小型企业则数目众多，尤其是在零售行业。中国人开的零售店扩张的速度尤为迅速，有时甚至引起了非洲当地人的警觉，以纳米比亚的奥希坎戈市为例，1999年，中国人在当地开设了第一家商店，2004年时商店总数已达22家，2006年时总数已超过75家。在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一条长达1公里的街道上，两边都是中国人的商店，主要出售进口女鞋、玻璃器皿等耐用消费品以及电子产品等，价格十分低廉。中国与非洲间的直航班机数量

迅速增长，往来的多是中国的商人、专家和建筑工人。与之相比，非洲和美国间的直航班机很少，乘客主要是救援人员，还有少数游客和商人。

表9–2 2003~2007年一些非洲国家的中国人口数

国家	最新预计	年份
阿尔及利亚	8 000+	（2006）
贝宁	4 000	（2007）
博茨瓦纳	3 000~10 000	（2006~2007）
布基纳法索	1 000	（2007）
喀麦隆	1 000~3 000	（2005）
佛得角	600~1 000	（2007）
刚果民主共和国	500	（2007）
科特迪瓦	10 000	（2007）
埃及	6 000~10 000	（2007）
埃塞俄比亚	3 000~4 000	（2006）
加纳	6 000	（2005）
肯尼亚	5 000	（2007）
莱索托	5 000	（2005）
利比里亚	600	（2006）
马达加斯加	60 000	（2003）
马拉维	2 000	（2007）
马里	2 000	（2007）
莫桑比克	1 500	（2006）
纳米比亚	5 000~40 000	（2006）
尼日利亚	100 000	（2007）

塞内加尔	2 000	（2007）
南非	200 000~300 000	（2007）
苏丹	5 000~10 000	（2004~2005）
坦桑尼亚	3 000~20 000	（2006）
多哥	3 000	（2007）
乌干达	5 000~10 000	（2007）
赞比亚	4 000~6 000	（2007）
津巴布韦	5 300~10 000	（2005~2007）

在非洲的中国人数量的增长也极为迅猛。据估计，2001年，在非洲的中国人总数为13.7万，但到2007年，这一数字已经增长到40多万（这一数字还有可能被严重低估）。相比之下，在非的西方国家员工仅约10万人。另一项更为大胆的估计表明，在非洲的中国人超过了50万，这还不包括安哥拉（该国的中国人估计达4万）和许多其他国家。根据2011年年初中国在利比亚撤侨行动显示，利比亚的中国人总数达35 000名之多。

当前的中国移民潮与19世纪末、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早期移民潮有所不同。除了规模更大之外，当前的移民来自中国各地，而不仅仅是中国南方和东部地区，移民的出身背景也各不相同，而且很多人似乎想在非洲长期居住。此外，当前的移民还受到了中国政府的鼓励。

与中国人口在非洲的激增相对应，中国越来越多的中产阶层游客也来到非洲观光。在一些非洲国家例如肯尼亚、冈比亚，旅游收入占其外汇收入相当大的一部分，据预测，在不久的将来，每年前往非洲旅游的中国游客将达1亿人次。例如，尽管塞拉利昂不是受中国影响最大的国家之一，但却雄心勃勃地规划在弗里敦市的蓝茉莉海滩开发一个多功能旅游度假区。根据塞拉利昂旅游局所描绘出的美妙图景，其

中将建有宝塔式的公寓，中国游客可在中央喷泉周围漫步。中国在非洲的存在不断扩大，另一项更有力的证明是中国军队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人数不断增加。2002年4月，全世界范围内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中国军人只有110名，截至2006年4月，这一人数已经上升到1 271名，这也使得中国在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人数的国家排名中从第46位上升到第14位。耐人寻味的是，大约80%的中国维和部队部署在非洲，远超英国、美国、法国和德国等其他国家。共有3 000多名中国军人参与了7项联合国在非洲的维和任务。此外，自2009年以来，中国在打击亚丁湾索马里海盗的国际行动中发挥了日益重要的作用，这也是中国海军第一次执行此类远洋任务。

目前为止，中国对非洲的影响主要还是积极的。实际上，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没有中国非洲现在将会是怎样。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广袤的非洲大陆从西方所获的利益屈指可数，即使是所谓的援助也被附加了基于所谓“华盛顿共识”的严苛的政治条件。在西方无所作为、苏联撒手不管的时候，中国积极介入，填补了空白。中国对非洲的积极影响体现在很多方面。首先，它为非洲众多的原材料出口国提升了市场需求和价格。2001~2004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GDP年均增长4.4%，2005~2006年年均增长5%~6%，2007年增长了7%。虽然在2009年有所回落，仅为1.7%，但在2010年却又恢复至4.7%。相比之下，相关国家1999~2001年的年均增长率仅为2.6%。中国显然是其发展的主要推动因素，因为自1998年起，中国在全球原材料消费增长中一直占有较高比例。另外，廉价的中国产品越来越普及，这也让非洲消费者从中受益。当然，那些非原材料出口国或与中国制造的出口产品相竞争的生产国，例如南非、肯尼亚和毛里求斯，则无法获得更高的收益或受到了一定的冲击。中国的纺织品出口已经造成了许多非洲国家企业的裁员，尤其是在南非、莱索托和肯尼亚。但总体来说，赢家要比输家多得多。

其次，作为一个可供选择的贸易伙伴、援助者和投资国，中国的到来营造了一种竞争环境，使得非洲国家摆脱了对西方国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依赖。安哥拉就是最好的例子。当中国提供了条件更为优惠的贷款后，安哥拉得以在2007年中止了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谈判。简而言之，中国的作用在于提升了非洲在世界经济中的战略地位。

再次，中国对非洲的援助通常是一揽子型，既包括大型基础设施建设，例如公路、铁路和大型公共建筑，也包括专业技能的提供。相比之下，西方国家在非的大部分投资都集中于石油和其他大宗产品，对于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十分匮乏。中国有一句俗话："要想富，先修路。"基础设施建设对于中国自1978年以来的改革进程至关重要，这一做法在非洲的应用则体现出对中国发展经验的借鉴。

最后，与西方国家和国际机构的做法相比，中国的援助少了很多附加条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固守其西方意识形态理念，坚持贸易自由化、私有化和减少政府干预，而中国的要求则远没有那么严格、教条。不仅如此，西方经常在援助中附加很多关于民主和人权的政治条件，中国则不同意在援助中附加任何政治和经济条件，各国应自主选择本国的发展方向。这与中国强调对主权的尊重是相一致的。对主权的尊重既被中国人视作最重要的国际法准则，也与他们在"屈辱的百年"中的亲身感受有着直接的联系。2006年4月，在尼日利亚国民议会发表的演讲中，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表示："中国始终不渝地支持非洲国家维护独立和主权、根据国情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愿望。"

中国和西方国家对待非洲（总体而言大都为发展中国家）的不同做法在非洲内部引发了对中国发展模式及对非援助的热议。中国的发展模式的显著特征之一就是政府主导的对基础设施建设和配套服务领域的大规模投资，而中国的援助较少关注自身经济利益，也不像西方

国家那样一心只为了攫取矿产资源。中国巨大的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贫困人口的减少，也引发了这些发展中国家的极大兴趣，它们希望可以借鉴中国的经验。中国模式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强政府的理念和不搞西方式的所谓“民主”，这一做法对于非洲各国政府来说显然很有吸引力。

中国学者张维为认为，中国模式有一些显著的特征。与目前深受质疑的“华盛顿共识”不同，中国模式拒绝“休克疗法”和“大爆炸式变革”，而是走基于现有体制进行渐进式变革的道路。它致力于打造一种能够掌控并领导改革进程的强大发展型国家。它还包括了一种“选择性学习”或者“文化借鉴”的过程：中国曾借鉴了很多国外的发展理念，包括美国的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然后对其进行了本土化改造。此外，它还注重改革的优先选择。例如，中国政府首先致力于进行经济改革，然后进行政治改革；首先在沿海省份进行改革，然后在内陆省份进行改革。在这种背景下，关于中国模式的探讨也是进行得如火如荼，有时也将这一模式称为“北京共识”。当然，“北京共识”与“华盛顿共识”之间存在着根本的不同，这其中既包括中国模式极其鲜明的非意识形态化，也包括其在实践中的试验先行与务实，经过实践检验的成功做法将继续采纳，而如果不适合就放弃，这一点在其他亚洲新兴国家中也屡见不鲜。但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来说，中国经验的可借鉴性相当有限，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国情自身有着鲜明的特色，特别是其规模巨大（这一点只有印度与其相似），政府的本质也独一无二（这一点没有任何其他国家与其相似）。也正是在此背景下，中国人本身对有关中国模式的探讨保持了相当的克制，而不是热衷其中，这一点令人玩味。

现在对中国与非洲关系的长期利弊做出任何深思熟虑的判断都还为时过早，毕竟这种关系还处于初始阶段，还没有多少有案可稽的信息和资料。对于非洲来说，最显而易见的危险是，中非关系在根本上是不平等的：相比较而言，中国的经济规模更加庞大，同时也更先

进。一方面，即使南非作为在经济上与中国最可匹敌的挑战者，其经济规模也远远小于中国；另一方面，非洲整个大陆的人口总数也赶不上中国。而且，中国与非洲国家之间的经济差距也变得越来越大。不论西方国家与中国在方式上有何不同，有一点看起来非常相像，那就是由于西方国家和非洲之间根本的结构不平等而导致的关系矛盾好像在某种程度上被复制到了中非关系上。非洲国家所面临的危险是，它们无法摆脱主要原材料供应国的地位，而这些国家也将因为许多原因，例如不利的贸易条款、中国竞争、腐败和缺乏战略意愿等，而无法通过工业化拓宽其经济发展道路。

在2005年北京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南非国际事务研究所董事会副主席莫莱茨·姆贝基（Moeletsi Mbeki）表达了非洲的忧虑：

> 非洲向中国出售原材料，中国则向非洲出售工业制成品。这一贸易模式十分危险，有重蹈非洲与欧洲殖民者关系覆辙之嫌，而且也注定是不可持续的。首先，非洲需要保留其自然资源以供未来其自身工业化所用。其次，中国的出口战略加剧了某些中等收入国家的去工业化态势……找到办法改变现有策略，符合中非双方的利益。

双边关系的这种不平等态势在津巴布韦表现得尤为明显。中国对津巴布韦的经济影响巨大，在铁路、电力工业等产业领域中居主导地位。中国在处理中非关系时通常使用精心设计的综合性战略。相比之下，很多非洲国家的对华策略则较为零散，对中国知之甚少，只是基于基本的实用主义而非长远的战略视角，这反而加剧了双边关系中的不平等态势。非洲国家与中国签署自然资源开发协议的危险在于，要么协议的条款对中国过于优厚，要么是相关国家利用这些收益进行短期的投资，可能伴有腐败的现象，令各种利益集团受益，甚至两种现象兼而有之。然而，从问题的另一个方面而言，中国虽然获得自然资

源的所有权，非洲国家政府则通常要求一定的优惠条件并获得了相关的劳务合同。例如，安哥拉就在与中国人打交道的过程中体现出了相当的智慧与实效。

中国的存在受到了非洲的广泛欢迎，激发了民众的热情，赞许之声远胜于批评之声。乌干达总统约韦里·穆塞韦尼（Yoweri Museveni）曾抱怨说，“西方统治集团十分自负，以自我为中心，不顾我们的实际条件”；而他觉得中国人则更像是在“做生意”。塞内加尔总统阿卜杜拉耶·瓦德（Abdoulaye Wade）表示，“相较于西方投资者那种后殖民主义慢慢悠悠有时还高高在上的态度，中国对待我们需求的方式要好得多”。

当然，对于中国在非洲的存在，同样也有焦虑和不安。最明显的事例是在赞比亚2006年举行的总统选举中，反对党候选人迈克尔·萨塔（Michael Sata）提出了强硬的反华路线，宣称“赞比亚正在变成中国的一个省，甚至不是一个地区”，并赢得了29%的选票。这促使中国驻赞比亚大使暗示：如果该候选人在选举中获胜，中国将可能撤出在赞比亚的投资。在2009年举行的选举中，萨塔采取了相对温和的对华态度，但仍然对当地工人在中资公司中的待遇表示不满。此次，萨塔仅以2%的微弱劣势落败。2011年，萨塔终于赢得了大选，但他却采取了一个政治家应有的态度，特别是对外资表示欢迎：其官方会见的第一位外宾就是中国驻赞大使。对于中国雇主剥削工人的指控并不罕见，不仅是在赞比亚，很多其他非洲国家也是如此。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尽管最早进入非洲的中国投资者都是国企，可随后而来的却大部分是小型企业或个人，他们也将中国的一些期望和规范带到了非洲，其中就包括监管相对不力等。

针对中国最强烈同时也是最持久的一项批评是，中国在非企业更倾向于雇用中国人而不是当地人，中国员工的比例曾高达70%。根据世界银行2005年所做的一项调查显示，尽管样本范围相对有限，但中国

公司所雇用的中方和非洲雇员的比例分别为20%和80%。现在已有证据表明，中资公司对相关批评十分在意，已经开始设法增加非洲当地员工的比例。也经常有人抱怨中方管理人员对当地人表现出负面的态度。当然，这两种情况都涉及中国人对有色人种尤其是非洲人的态度问题，尽管这一问题并不奇怪，但由于证据仍然太少，我们尚且不能得出任何恰当的结论。互联网上的一些调查也可以从侧面反映出中国人对非洲人的典型看法，认为其与中国工人相比，非洲工人“工作效率较低”，尤其是非洲男性，比较难以控制，而且富有侵略性。

当然，针对中国拒绝对非洲国家治理方式进行约束的态度，仍然存在着很大的争议——尤其是在西方。虽然这是事实，但中国近来对来自西方国家和非洲本地的批评意见正在变得越来越“敏感”，结果，中国促使苏丹政府接受了联合国和非洲联盟向达尔富尔派遣维和部队的要求。在南苏丹举行全民公决、苏丹正式分裂之后，中国则面临着与南苏丹政权建立良好关系的挑战（原苏丹80%的石油储量位于南苏丹）。尽管对于中国存在着种种批评，但尚无证据表明中国在非洲的记录要比西方的更恶劣：恰恰相反，中国并没有如西方国家般支持非洲大陆腐败和独裁政权，更不要提西方对非洲大陆的殖民统治令整个非洲发展滞后，无力面对后殖民时期的种种挑战。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令西方对中国在非洲所作所为的批评丧失了合理性。然而，让人想象不到的是，中国人却逐渐成为恐怖分子的目标，例如在尼日尔三角洲地区和埃塞俄比亚。随着中国的存在和影响不断扩大，随着中国不仅在非洲还在全世界逐渐承担起世界大国的角色和责任，这种现象肯定会越来越多。

中国在非洲保持存在的意义极为重大。其在非洲迅速提升的影响力表明，用不了多久中国就会成为非洲大陆的主导力量。这也是中国将要成为世界大国这一长远抱负的大胆宣告。中国参与非洲事务的速度极快，还成功地赢得了非洲精英的支持，这迫使西方国家在这块劣迹昭昭的大陆上采取守势。与西方国家在19世纪末对非洲的“瓜分”

不同——这种“瓜分”激起了欧洲国家之间的矛盾，中国对非洲的介入并没有与美国、英国或法国产生很深的矛盾，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着一定的变数。2008年年末，美国为协调其在非洲大陆的军事关系和行动成立了美国非洲司令部。此举表明了美国对中国在非洲日益增长的影响力的关切。然而目前为止，在非洲54个国家中，除饱受内战分裂之苦的利比里亚之外，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愿意接纳美国非洲司令部。结果就出现了荒诞的一幕，美国非洲司令部的所在地居然是德国的斯图加特。

除了提供的条件更为诱人外，中国在非洲取得长足进展的一个原因是它不像西方国家那样背负着历史包袱，而中国也总是习惯于强调这一事实。因此，中国一直强调，与欧洲殖民者相比，15世纪初郑和下西洋到达东非后，既没有索求领土，也没有抓走奴隶。更重要的是，与西方相比，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是非洲独立运动的坚定支持者。因此，由于中国本身的殖民地历史、其反殖民主义的记录和发展中国家的地位，中国与非洲国家关系的密切程度远远超过西方。这也反映在2007年皮尤全球态度项目的调查结果中，比如，非洲10个国家的调查对象都表示相比对美国的态度，他们对中国的态度更加友好。

然而，现在就中国对非洲事务的介入做出任何总体性或决定性的结论还为时过早。尽管中非关系中也存在若干西方与非洲关系的影子，但其为非洲提供的机会则远多于其带来的负面影响，且尚未完全利用。基于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中资公司自2006年起陆续在尼日利亚等地设立了经济区，其主要目的之一就是鼓励中国人对非洲制造业的投资，当然其中也有中国老旧产业转移的考虑。根据中国政府对1 600家中国公司进行的调研显示，越来越多的中资公司将非洲作为其生产基地。实际上，现在中国对非制造业投资占对非投资总额的比例已经达22%，与矿产业所占的29%相去不远。此外，一些非洲国家还将中国对其进行工业投资作为进行矿产合作的条件。在埃塞俄比亚，2/3的中资公司都在从事制造业。目前也有传言，中国将出资5 000亿美元，

对非洲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进行资助。当然，这点钱相对于中国的外汇储备来说只是九牛一毛。这一计划是否属实、能否实现均有待验证，但起码再次表明了中国对非政策的开放性和活力。中国对非政策的目标在于在中非之间建立一个贸易和发展圈，其中也包括对非洲进行产业转移。西方评论中非关系的问题之一，就是其所说的“新殖民主义”。鉴于中国并没有对外殖民的历史，西方的这一观点反映出了不愿思考和西方中心主义的实质。实际上，中国古代处理与东亚关系时所使用的“朝贡体系”思维，更可能为理解中非关系提供借鉴。

中东和伊朗

世界已探明的石油储量将近2/3都集中在海湾地区，其中沙特阿拉伯的储量超过总储量的1/4，伊拉克和科威特加起来的储量略低于总储量的1/4。这三个国家控制着世界已知石油储量的一半。该地区潜在的另一个产油大国是伊朗，它的储量略低于世界石油总储量的1/10。海湾国家的原油出口量占世界原油出口总量的比例接近40%，其中沙特阿拉伯的出口量约占12%，伊朗占7%。在1993年和1996年，中国分别成为石油产品和原油的净进口国。预计到2035年，中国原油需求的70%以上都需要进口来满足。现在，中国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原油进口国。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就已经开始为其将来的石油供应而费尽心思，开始采取措施确保石油供应的可靠性。2009年，中国最大的石油供应国是沙特阿拉伯（每天83.9万桶），其次是安哥拉（每天64.4万桶）、伊朗（每天46.3万桶）和苏丹（每天24.4万桶）。中国所进口的石油，有一半来自中东，约1/3来自非洲。因此，中国很自然地寻求与中东国家建立更为密切的关系。但是，与非洲不同，中东地区被美国视为其势力范围。在过去的30年里，美国越来越深入地介入中东地区，特别是与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建立了极为密切的关系，并且发动了两次海湾战争，在2003年更是侵入了伊拉克，完成了对伊

拉克的军事占领。因此，中国在该地区的行事非常谨慎，唯恐激怒美国（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把中美关系放在首要位置）。

如今，非洲显然已经在中国的外交政策中占据核心地位，因此，与非洲相比，中国实际上把中东放在次要的地位。2009年年末，沙特对中国的石油出口量已经超过了美国，有90余家中国公司在沙特开展业务，所雇用的中国工人超过了两万。其中，中国铁建与沙特方面合作，成功赢得了麦加至麦地那的高铁项目。

在过去的几年里，中国实施了多种策略以确保中东地区的石油供应。中国努力为签订长期能源供应协议与相关国家进行协商，最突出的例子是在1999年与沙特阿拉伯建立“战略石油伙伴关系”。另外，中国石油公司还寻求获得在该地区（包括在伊拉克）投资、开发油田的权利。此外，中国还鼓励海湾地区的公司向中国的炼油厂投资，从而促进双方建立更紧密的联系，沙特方面的响应最为积极。

中国政府在中东地区的战略核心是伊朗。中伊两国长期以来保持着紧密的关系。两国有许多共同之处，它们都是历史悠久、成就非凡的文明古国，在它们各自所处的区域内都有一种相较于其他国家的强烈优越感。它们都曾经遭受过西方列强的蹂躏，因此它们对西方怀有一定的敌视，认为如果世界不再由西方统治的话，它们将会发展得更好。尽管推动双边关系发展的主要是利益而不是立场，但这些共识无疑巩固了两国间的密切联系。

作为新兴的世界强国，中国经常寻求与地区强国建立友好关系（巴西和南非就是明显的事例），以增强其自身的实力和影响力。伊朗正是符合这一条件的国家之一。鉴于1979年革命后伊朗政府强势的伊斯兰意识形态，为维护自身的国际声誉，中国在处理与伊朗的关系时表现得非常谨慎。制约中国对伊朗态度的最重要因素当然还是美国的态度。中国在外交方面表现出了高超的“走钢丝”技巧，它时而与伊朗合作，与美国的政策相左；时而与美国合作，与伊朗的政策相

悖。直至2010年，中国一直成功挫败了美国对伊朗实施经济制裁的企图。在布什政府将伊朗列为所谓的“邪恶轴心”国家之后，中国一直在努力将伊朗移出名单之外。1979年伊朗革命后，美英势力撤出伊朗，中国与伊朗的经济关系开始得到发展。两国经济关系蓬勃发展的关键在于，中国向伊朗出口大量的高科技产品、工程服务和武器，以换取伊朗的石油和原材料，两国的贸易在20世纪90年代的发展速度极其迅猛，在过去的10年内更是涨了10倍。

2003年，中国两家大型汽车制造商在伊朗建立了生产厂。2004年，中国成功与伊朗签署了一揽子重大石油协议，伊朗不仅成为中国最大的石油供应国之一，中国还成为伊朗石油工业的关键股东和最大的外国投资者之一。另外，中国还在2007年与伊朗签署了进一步合作的协议，开发储量丰富的亚达瓦兰油田的部分资源，最近还将开发北阿扎德甘油田。

中国与伊朗关系将会如何演变，至今尚未有定数。由于需要与美国保持良好关系，中国与伊朗的关系仍会受到限制，而美国最敏感的地区莫过于中东。美国显然将伊朗视为该地区潜在的政治掮客和对其利益的主要潜在威胁，因此长期以来一直对其存有敌意。从长远看，中国乐意看到伊朗在海湾地区发挥重要甚至是主导性的作用，因为即使可能的话，中国自己在该地区担当这一角色也需要很长的时间。每个世界大国都需要盟友，伊朗就是中国在中东地区的天然盟友。正如国际关系专家高龙江（John Garver）论述的那样，东亚地区处于统治地位的中国和西亚地区处于统治地位的伊朗最终将成为“21世纪中叶以后单极时代的、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的核心要素”。实际上，这也可能是中国对于未来多极体系的展望。同时，为了保留做出选择的权利，中国可能一边继续增强在伊朗的影响力，一边尽量不与美国发生冲突。在美国寻求针对伊朗核问题进行制裁的背景下，对于伊朗石油禁运中国将采取何种立场，无疑值得玩味。

从长远来看，事态的发展还存在其他的可能。台湾问题是中国的重中之重，而统一道路上的最大障碍是美国对台湾地区的军事支持。中美爆发军事冲突最有可能的导火索就是台湾地区，尽管现在这种可能性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低的时期；一旦发生战争，中国将非常担心其海上石油供应线的安全，尤其是马六甲海峡和南中国海，这些供应线极易被美国超强的空中和海上力量切断。在这种情况下，伊朗或许可以通过西亚至东亚的陆上石油供应管线向中国供油。但事态的发展也存在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可能，即中美可能就中国台湾和伊朗达成某种交易，也就是说，美国同意停止对台军售，中国对伊朗也采取同样的做法。实际上为了台湾问题这一中国外交的核心使命，中国是会同意牺牲伊朗的。这种协议实际上代表了一种默认，即东亚是中国的势力范围，而中东则是美国的势力范围。

俄罗斯

20世纪80年代，在经历了20年痛苦的敌对状态后，中国与苏联的关系开始逐步好转。然而，为中俄两国关系完全转型奠定基础的则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苏联解体。俄罗斯只不过是苏联苍白无力的影子，尽管仍拥有前苏联80%的领土，但GDP仅为苏联的一半，人口则不足1/2。同时，中国开始实施改革开放，多年来一直保持着两位数的经济增长率。这两种发展态势代表了两国权力天平发生了重大变化，如今中国远比其曾经的对手强大。20世纪90年代，两国终于就几个世纪以来存在争议的边界达成协议，绵延4 300多公里的边界线是世界上最长的边界线。过去两国的边境是重兵驻扎的地区，如今则成为贸易和交流中心。边界问题的解决使俄罗斯和中国能够从各自的边境上撤离大批军队调往其他地区。前者将军队派往车臣以及与欧洲其他国家相邻的边界以应对北约的扩张，后者则将军队派往台湾海峡。在不断缓和的气氛中，两国与几个独立不久的中亚国家建立了上海合作组织，

其宗旨是促进合作，改善该地区的安全状况。冷战后，美国超强的实力引起了中俄两国共同的担忧，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尤其感到无助，而1989年后，中国受到了相对的孤立。这也是两国1998年签署战略伙伴协议的主要原因。中俄两国还同属金砖国家集团之列（金砖国家集团还包括印度、巴西及南非）。金砖国家原本是高盛集团在报告中提出的一个经济类别，但相关国家却通过2009年以来的领导人定期峰会，使其获得新生，形成了机制。中俄之间的贸易发展同样引人注目，2000~2007年间双边贸易额增加了5倍。

然而，中俄两国双边关系的战略潜力仍然存在着严重的疑虑。潜在的问题一方面是俄罗斯的虚弱感，另一方面则是中国不断增强的实力。尽管两国关系的和睦与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脆弱感和它与邻为善的意愿有很大关系，但这种脆弱感也使俄罗斯缺乏安全感，而且对其邻国存在疑虑。俄罗斯对中国的这种担心最明显的表现是在其远东地区，它在该地区仅有750万人口，而其所面对的中国东北三省人口为1.12亿。现在由于这一边境管理不善，许多中国人可以进入俄罗斯境内寻找工作机会或做生意。1994年，俄罗斯方面估计，其远东地区的中国居民达100万，而中国方面估计的数字则不到2 000。根据一些人口统计资料预测，到2051年，华人将成为俄罗斯联邦的第二大少数族群。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面临的人口危机无疑又加剧了这些恐慌，其人口由1991年时的1亿4 900万降至2010年的1亿4 200万。甚至还有预测，2050年俄罗斯人口将降至1亿1 100万（尽管这种预测经常是十分离谱）。俄罗斯对于华人移民泛滥的恐慌既表现了其固有的偏见，也表现了新的恐惧。不仅仅在俄罗斯，在任何其他地方外来的为数众多的中国人都会引起恐慌，但对于俄罗斯而言，与恐慌掺杂在一起的，是它对中国的历史偏见和冲突，是两国人口的巨大失衡和漫长的边界线。

俄罗斯拥有丰富的石油、天然气和许多其他资源，同时还是中国的主要武器供应国。对于中国来说，这使得俄罗斯成为一个诱人的合

作伙伴。但是，事实证明俄罗斯是一个“难缠”的伙伴，它不愿意完全按照中国的期望行事。在关于新建东西输油管道的问题上，两国进行了漫长复杂的协商，中方建议输油管道应通过中国境内，而俄方对此则很不情愿。直到2009年2月双方才最终达成协议，同意架设一条通往中国的石油支线，这也是为了回报中国对俄罗斯石油公司的投资。无疑，俄罗斯担心被中国套牢，从而降格为其原材料供应国。

21世纪以来，俄罗斯的确越来越注意保护其石油和天然气利益，它意识到，随着其国力的削弱，这些资源是它最有价值的资产，尤其在全球市场上油价还在如它所愿地不断攀高的情况下。在剥离了美国、欧洲和日本在其石油工业中的股权后，俄罗斯今后很可能也不会给予中国石油公司类似的权益。而且，在普京的领导下，俄罗斯实现了资源国有化，正与欧洲和其他前苏联国家就石油和天然气展开艰苦的谈判。

俄罗斯这种对中国意图的怀疑还扩展到前苏联域内的中亚国家。据报道，俄罗斯方面2005年8月透露，俄罗斯政府之所以急于进入乌兹别克斯坦的喀什－迦拿巴前美军基地，原因之一就是中国谨慎地表明有兴趣获取这个军事基地。中国发现自己在中亚地区获取石油利益的愿望遭遇了很多障碍，其中最为重要的障碍之一就是俄罗斯的抵制。目前为止唯一的例外就是哈萨克斯坦。哈萨克斯坦是中亚地区中国唯一获取了主要石油股份的国家，中哈石油管道的第三期也将于2011年建成。此外，近来中国对中亚地区的兴趣日益增长。土库曼斯坦已经同意将其新发现的巨大天然气资源的一半，通过一条新建的横跨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全长为4 350英里[注]的管道输往中国。中国在中亚地区的影响也在急剧扩大。

所有的一切都无法表明中俄关系可能恶化，但如果俄罗斯对中国崛起的恐惧加剧，甚至因此转向西方并从欧盟或北约寻求慰藉，这也并非难以想象。然而，俄罗斯的确暗示，中俄两国实力极度失衡所产

生的严重紧张态势将可能极大地制约两国关系的和平发展，不过考虑到两国波折不断的历史，这种关系本身就是一种成就。此外，到目前为止，对美国的担忧极有可能让两国走得更近，实际上已经对伊拉克和伊朗等问题产生了一些重要的影响。俄罗斯对格鲁吉亚的干预，以及随后俄罗斯在2008年承认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为独立国家的做法，都让中国感到不悦。这也在提醒人们，中俄两个大国之间的关系远没有那么简单。

印度和南亚

印度与中国有许多共同之处。两国都是人口超级大国，也都在经历着剧烈的经济转型。两国人口加起来占世界总人口的将近40%。两国都是所在大陆的主导，中国在东亚具有领导地位；至少就疆域和人口来说，印度在南亚也是一样。到21世纪中叶时，两国都可能成为重要的世界大国，中国毫无疑问，印度的可能性也极大。中印两国都展现了一种全新的民族国家形态，无论是就领土还是人口而言，都堪比一个大陆。与此同时，两国都正在重塑世界，使之向亚洲倾斜。这一全新的秩序与中小型欧洲国家主导的世界秩序迥然不同。两国在历史上也都曾被西方列强殖民统治：印度曾被英国统治，而中国则曾被众多列强欺凌（还包括邻国日本）。中印两国同为发展中国家，具有很多共同利益。两国在多哈回合贸易谈判、气候变化问题（特别是哥本哈根气候大会）、金砖国家集团内的紧密协作，就已经体现出这一点。此外，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为印度提供了可资借鉴、学习的宝贵财富。因此，印度和中国经常被相提并论，这一点不足为奇。

尽管两国存在众多相似性，但在很多方面，两国也存在着重大的分歧，横跨喜马拉雅山的漫长边界线就是重要的体现。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天然内陆屏障，喜马拉雅山也标志着两国政治和文化上的巨大分歧。中国的历史最为久远，而印度的历史则较短，它在英国殖民统治

末期才取得了现有的领土，或者至少是现有2/3的领土。中华文明与国家密切相关，而印度文明则与等级社会密不可分。印度是当今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而在中国，民主仍然是个相对陌生的概念。中国有强烈的身份和种族认同感，而印度则具有显著的多元化特色，拥有很多不同的种族、语言和宗教。毫无疑问，巨大的文化差异使两国相互产生了陌生感和距离感，缺乏理解和宽容的基础。事实上，佛教是从印度传入中国的，两国在第一个千年里也进行过广泛的文化交流，但这些现在好像已经被忘却了。

50多年来，两国的关系较好时充其量也是相互疏远和怀疑，经常相互敌对，甚至曾经爆发冲突。在1988年拉吉夫·甘地访华之后（这是自1954年尼赫鲁访华之后第一位访华的印度总理），两国关系似乎有所好转，但是实际上两国之间仍有芥蒂。这虽在一定程度上与过去半个世纪两国之间的恩怨有关，但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社会、文化之间的分歧，尤为体现在两国各个层面上的交流、对话都相对缺乏。两国地理位置相近，规模相似，因此人们常误认为中印两国彼此之间已经十分了解。但事实并非如此，两国了解对方的专家可谓凤毛麟角。印度的情况尤为如此：印度国内专门研究中国的大学和智库并不多；除个别几个外，印度的新闻机构大多没有在中国设立分支，尽管在伦敦等地设立了不少。曾到过中国、见证过中国那些大城市的印度人更是屈指可数。中国人对印度人有一种优越感，认为其没有规矩、缺乏条理；印度人则对中国人充满怀疑，在中印边界冲突中失利之后，更加了几分畏惧。因此，中国在印度人眼中的形象远比印度在中国人眼中的要高大。对双边关系影响最大的无疑是1962年的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中国毫无疑问是此次冲突的胜利者。时至今日，印度对此仍然耿耿于怀。尽管两国成立了联合工作小组和委员会，但仍然未能就边界问题达成协议。在中越边界问题解决之后，中印边界则是中国仅剩的未能解决的边界问题。影响中印关系的因素还有很多，其中，水资源的问题尤为明显。印度境内很多河流的上游都位于喜马拉雅山北麓

的中国境内，印度担心中国在上游修建水利项目将会导致印度境内水资源的减少。

目前为止，印度在自己的后院——南亚远未实现无可动摇的主导地位，而且还面临着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尼泊尔和缅甸的挑战。中国有意识地与这些国家建立友好关系以制衡印度，反过来，这些国家也依靠中国以抵制印度在南亚的主导地位及专横的态度。中国与尼泊尔的左翼政府保持了良好的关系。同样，中国与缅甸和孟加拉国也保持了密切的关系，其中经济援助无疑是重要的因素。中国已经向印度洋岛国毛里求斯的一个特别经济区投资了7亿美元。不久前，中国与斯里兰卡的关系也取得了重要的进展。印度虽对泰米尔猛虎组织[注]表示同情，却发现自己身处两难的境地。近年来，中国向斯里兰卡提供的援助增加了5倍，出口的武器也更加先进。实际上，南亚地区只有一个国家在中国的影响之外，那就是小国不丹，不丹是印度的保护国。对于中国来说，在所有的南亚国家中，与巴基斯坦的关系至关重要。巴基斯坦也是印度不共戴天的仇敌。中巴两国紧密的政治、经济、军事联系，可以追溯至20世纪60年代，从目前来看仍可持续相当一段时期。实际上，随着巴基斯坦与美国之间的关系日渐紧张，中巴关系极有可能会更为紧密。2010年12月，时任中国总理温家宝在访问印度之后，旋即来到了巴基斯坦，并宣布了总额达350亿美元的经济合作协议，以进一步巩固双边经济关系，使巴基斯坦能够更好地为中国的经济转型服务。相较之下，温家宝在访印期间所达成的协议总额只有160亿美元，仅相当于中巴经济合作协议的一半。与此同时，巴基斯坦一直请求中国在其西南部的临近霍尔木兹海峡的瓜达尔港建立海军基地。建成之后，中国海军可利用其进行修理和补给。这将为中国打开进入阿拉伯海的大门，并为其保护在中东地区日渐增多的油轮提供便利。然而，目前为止中国对这一提议并未做出积极回应。此外，还有传闻称中国可能会将缅甸的小渔港实兑改造为大型港口，正如中国所承建的斯里兰卡汉班托塔港一样。至少从理论上而言，这些港口将使

中国能够介入到其所高度依赖的不同的贸易航线之中，为中国收集情报及其船队乃至舰队补给等提供了便利。

中国施展了精明的外交手腕，这意味着印度将在南亚地区一直处于守势，无法展现其作为一个大国应有的影响力。印度甚至无法与其邻国达成妥协，对其进行安抚，消除邻国内心深处对印度所作所为乃至意图的恐惧和敌意。在此背景之下，成立于1985年的南亚区域合作联盟（简称SAARC，成员包括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不丹、马尔代夫、尼泊尔、斯里兰卡、阿富汗、缅甸）这一南亚地区的区域性组织只是有名无实，也就不难理解了。这与东亚的东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印度不仅没有在南亚建立起霸权地位，甚至未曾尝试在东亚发挥重要影响力，更不用说它还未和散居在东南亚的大批印度人建立任何有意义的关系。

就地缘政治而言，存在着两种可能的结果。第一，中国承认南亚是印度正统的势力范围。实际上，这不太可能。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太过广泛、深远，印度无法消除这种影响，中国也不允许这种情况的发生。这种结果也是为中国和其在该地区的正式、非正式盟友所反对的。实际上，正如我们所见，中国正在不断发展与巩固与南亚地区国家间的关系。此外，鉴于中国的增长率仍高于印度（尽管差距不大），这种情况在21世纪的后50年也不太可能发生。第二，印度承认中国在南亚的长期存在，并决定接受这一现实，例如承认与中国建立伙伴关系是处理该地区安全问题的必要条件。从长远看，这甚至意味着印度默认了中国在南亚和东亚的主导地位。就此而言，为确保其在亚洲存在、作用和影响的长期增长，防止出现可能影响这些增长的障碍将是中国的一项主要战略目标。其他还包括：反对美日同盟的扩大，拒绝接受关于南中国海有争议岛屿主权的任何多方提议或解决方案等。第二种设想，即印度承认中国在南亚的角色，是与这一战略目标相吻合的。而实际上，许多年来，印度已经被迫适应（至少是在事

实上适应）中国在南亚日益增长的影响，所以，第二种设想的相当一部分因素已经存在，至少是以一种默许的方式存在了。

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进一步巩固了其在南亚不断增强的实力。1950年，印度的人均收入比中国高出约40%；1978年，两国的人均收入基本持平。但到了1999年，中国的人均收入几乎达到了印度的2倍。2009年，中国的人均收入更是达到了印度的3.5倍还多。另外，尽管近年来印度的经济增长率稳步提升，但仍明显落后于中国，换句话说，中国仍然在拉大与印度的经济差距。尽管印度在某些方面取得了对中国的经济优势，特别是其计算机软件方面的快速发展，但从事计算机软件工作的劳动者所占的比例毕竟很小。随着中印两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两国的经济关系自然而然地变得越发重要，这也为双边关系的未来带来了些许希望。2010年12月，时任中国总理温家宝访问印度，当时的政治气氛就是认为日益紧密的经济合作将使双边关系更为密切。中国现在已经取代美国成为印度最大的贸易伙伴。然而，双边的经贸关系仍很不平等：印度对华出口的很大一部分是铁矿石，而中国则向印度出口了大量的工业制成品，中国处于明显的顺差状态，且这一态势不断扩大。2009年，制造业占印度GDP的比例仅为16%，而中国的这一比例为43%；印度的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2/3，与之相比，中国的这一比例不到50%。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相关数据，2009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是印度的4倍，而且差距还在不断扩大。即使印度的经济增长率超过了中国，印度的经济体量要想达到中国的规模仍然需要很长的时间。总而言之，至少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中国的经济实力仍将使印度相形见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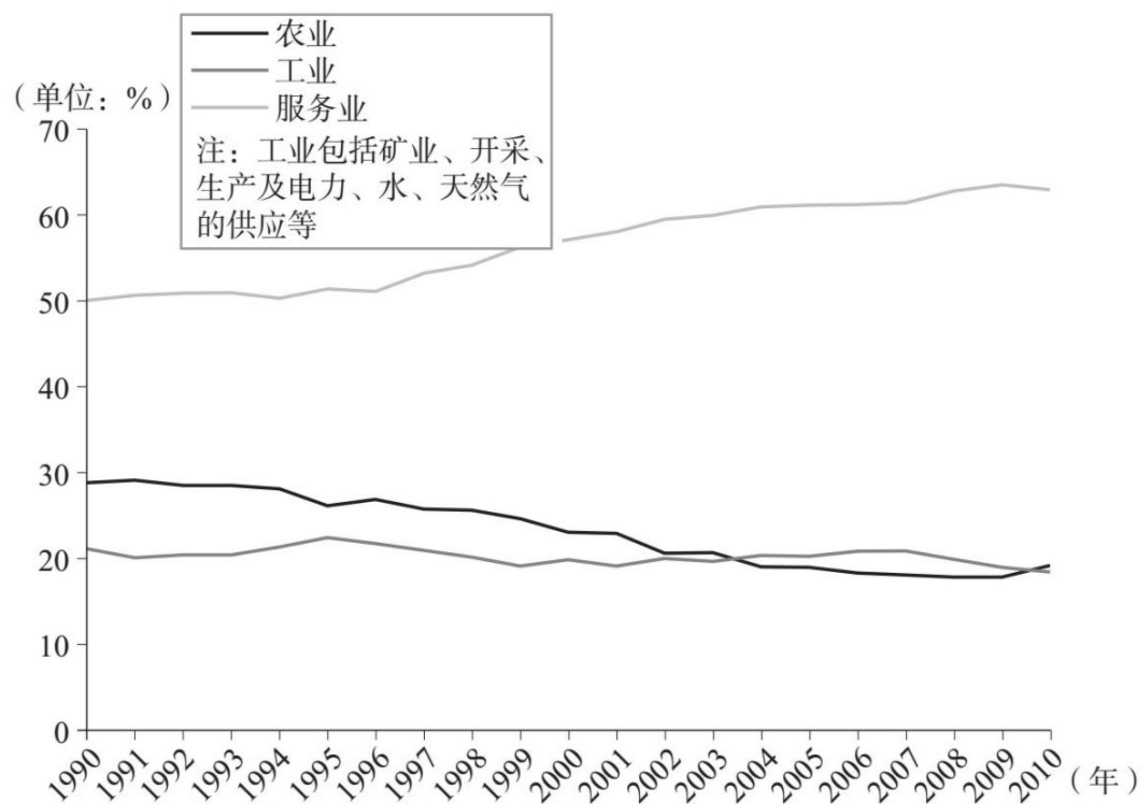


图9–14 印度GDP构成的变化

数据来源：印度中央统计局及环亚经济数据有限公司（截至201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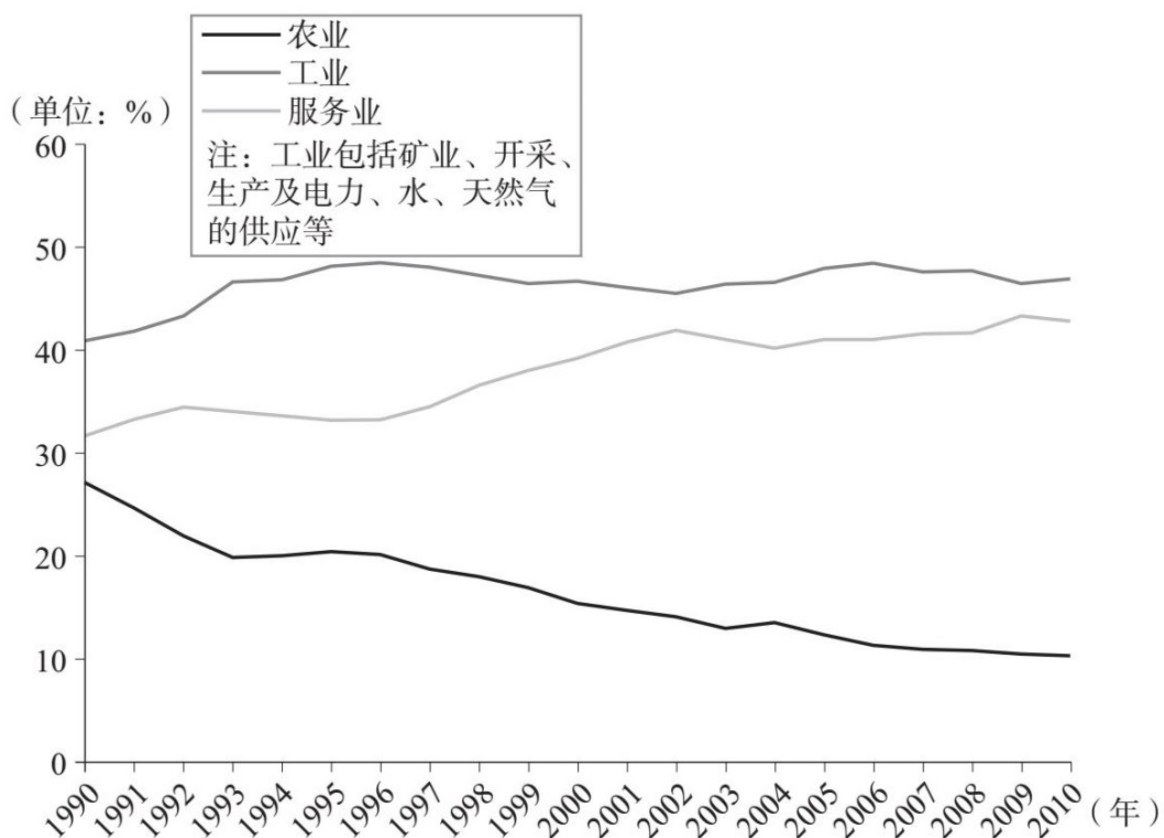


图9–15中国GDP构成的变化

数据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及环亚经济数据有限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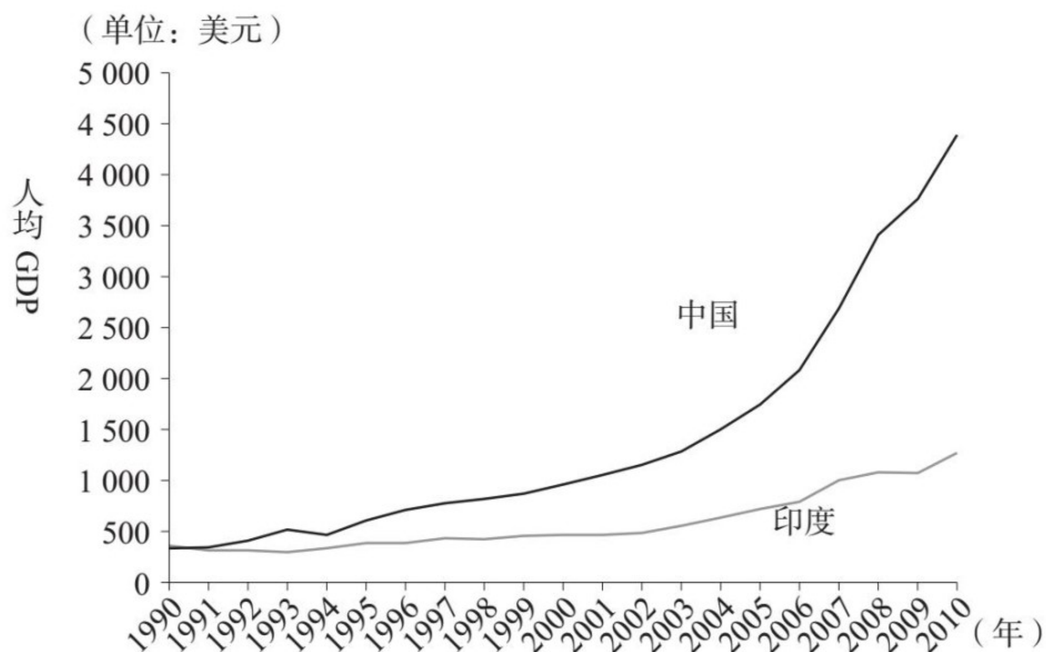


图9–16 中国、印度两国人均GDP的对比

数据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截至201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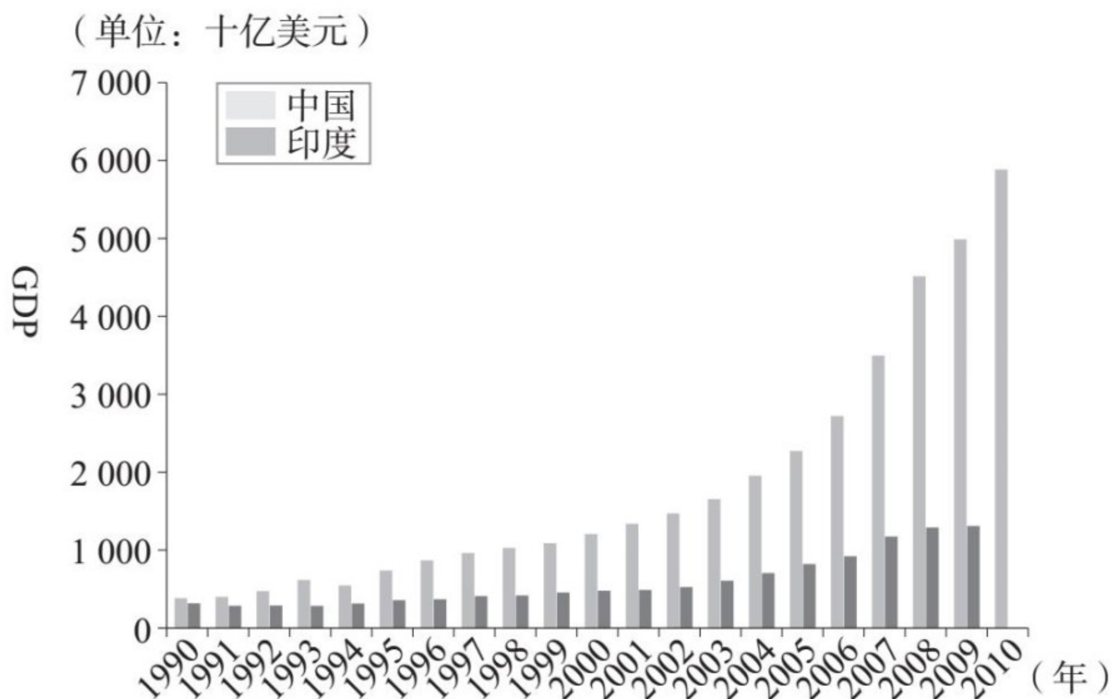


图9–17 中国、印度两国GDP的对比

数据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截至2010年）

此外，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印度将复制中国过去30年的增长奇迹。目前存在这样一种趋势，即对印度近年来的发展过于乐观，忽视了其所面对的巨大问题：国内政治派别开展的游击战在其国内的20个邦（占印度总面积的40%）都有所活动；巨大的不平等（据统计，2009年，印度最富有的50个亿万富豪的总资产相当于印度GDP的20%，占印度资本总额的80%，这也是为什么人们越来越将其与俄罗斯而非中国相提并论），腐败猖獗，政府低效、贪腐。所有的一切都使第二种设想变得更为可能，即印度被迫接受并适应中国在南亚的存在。这也增大了中国最终将成为东亚和南亚主导力量的可能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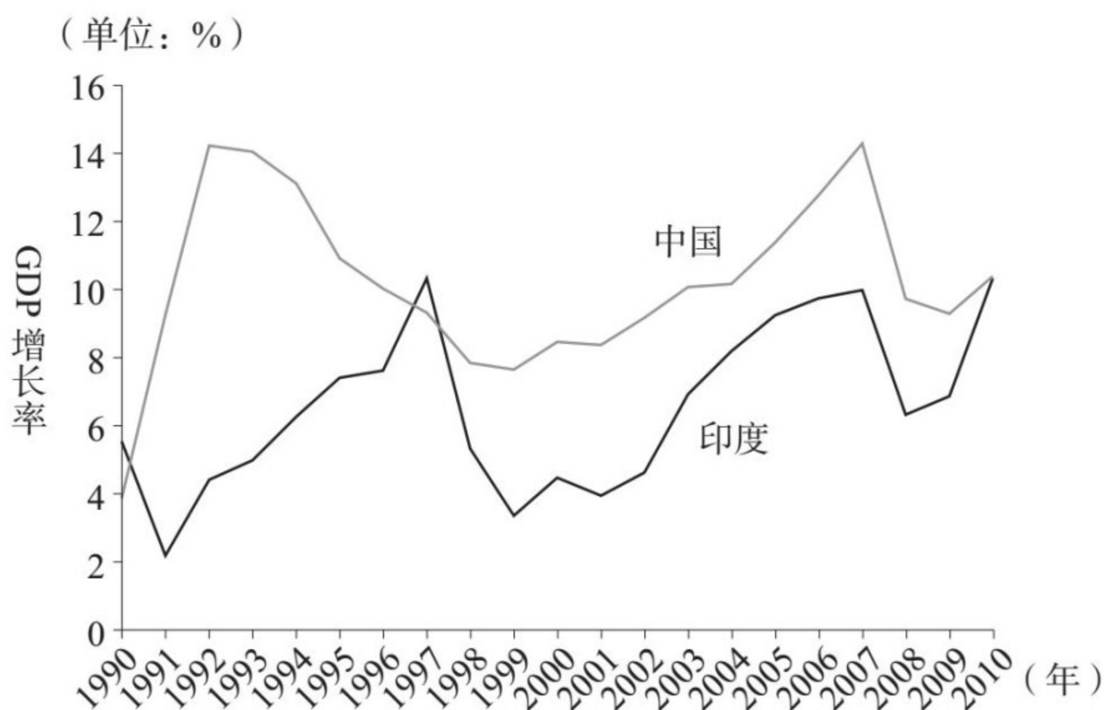


图9–18 中国、印度两国GDP增长率的对比

数据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截至2010年）

当然，印度对中国在南亚的主导地位十分不满，急于想方设法限制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尽管印度前总理辛格不断强调印中关系态势

良好，但在过去的10年中，印度实际上不断向美国靠拢。在克林顿连任期间，美国与印度建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2006年布什政府延续了这种关系，并将核能合作包括在内——这项协议最终在2008年得到了印度议会的批准。这一协议承认了印度有核国家的地位，这与美国以往的政策相悖——尽管印度尚未签署《核不扩散条约》。这突出地表现了美国的核扩散政策只是与美国的利益相关，而与原则无关，美国对待中东地区的伊朗和以色列的反差也证明了这一点。

当然，美国这种政策大转弯也有地缘政治的考量，美国想要扶持印度成为世界大国，并在南亚建立新的美国——印度轴心以应对中国的崛起。冷战时期，印度与美国的关系疏远，两国互不信任，两国关系在1989年后也没有改观，美国当时对印度和巴基斯坦一视同仁，并在印度1998年进行核试验后对其实施制裁。美国之所以愿意进行这种180度的政策大转弯，正是美国对中国日益恐惧的表现。对于印度来说，以往其立场是相对孤立，尽管从前与苏联长期保持了密切的关系外，但它却坚定地走不结盟路线，反对与主要大国甚至次一级的大国结成战略伙伴关系。但印度当权派（主要是军方）则明显地对中国日益崛起的实力感到不安。美印关系的发展为印度提高其国际地位、制衡中国在南亚地区不断扩大的影响提供了机会。2010年10月，奥巴马总统正式表示美国对印度谋求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表示支持，中国对此则一直反对。这也证明了之前的论述。近年来，印度也在积极改善与日本和澳大利亚的关系（两国都是美国的盟友），与越南的关系也有一定的发展。同时，我们也不应忘记美印每年都会举行联合军事演习。美印伙伴关系如何发展，可能将极大地改变南亚地区中印之间的力量均势，在提高印度底气的同时促使中国更加小心行事。美印伙伴关系也提出了很多问题，带来了很多不确定性。毫无疑问，如果事实证明这种伙伴关系牢固有效，那么这将成为在该地区和全球对抗中国的有效方法。中国会对此做出何种反应仍然有待观察，最可能的反应或许是加强与巴基斯坦的关系。但如果中国决定与印度保持战略友好，以此来抵御美国并否认自己在南亚的显著存在，这也是可以理解

的。鉴于印度长久以来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传统以及其全球性的雄心，印度不会轻易甘居美国的下手。就此而言，也很有可能出现一种中美印复杂的三角关系。

欧洲

尽管美国与欧洲的经济总量大体相当，但二者的全球影响却迥然不同：美国仍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而欧洲在世界上的作用却远小于其应有的比重。当然，其原因在于欧洲是由若干个不同的民族国家组成的，而为消除分歧而创建的欧盟的权力却十分有限，且相当一部分时间和资源都花费在调和成员国之间的不同利益和算盘上。因此，总体而言，欧盟一直在关注内部问题而非外部问题，总是处于不断的机制改革的进程中，签署了一个又一个的条约（最近的一个是《里斯本条约》）。这种内倾性并没有妨碍欧盟将自己视为世界其他地方发展的模板和国际体系发展的蓝图：欧洲普遍认为，让渡部分民族国家主权所形成的欧盟式的联盟，而非传统的民族国家体系，才是世界未来发展的方向。换言之，欧盟这种内倾性的思维方式与欧洲旧有的、根深蒂固的欧洲中心主义（即认为欧洲是世界的范例、领导和模板）实现了结合。因此，欧盟的外交政策一直充满了这样的预期，即其影响将会以欧洲为中心，呈同心圆状向外扩散，从东欧、中东到北非直至世界的其他地方。

当欧洲专注于自己的机制安排无心他顾之时，其全球实力和影响也一直在持续下降。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欧盟在全球贸易中的份额超过25%，现在则只有20%左右，而2030年将降至10%。在世界企业50强中，只有9家欧洲公司。全球经济中心由发展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更加弱化了欧洲的地位。欧洲虽然对此有所觉察，但直至目前为止仍过于关注自身和欧盟机制，对此问题并未过多关注。就民族国家和民众而言，也是如此。欧洲这片曾与世界大部分地区保持了密切关

系的大陆，却深陷智识和心理的陷阱之中，对当今世界变化的方式越发的无知，甚至置身事外。结果就是，欧洲的思想越来越具有防御性的特征。中国作为世界变化的推动者和代表，欧洲的精英对其却知之甚少，这与美国形成鲜明的对比。欧洲真正了解中国的专家并不多，领导人也只是一知半解，媒体上关于中国问题的争论一直都是老调重弹。换句话说，欧洲并不是在学习的过程中。实际上，这种自我愉悦的无知正是基于那种认为欧洲的思想和行为最为先进的不合时宜的傲慢。

将欧洲从美梦中惊醒的并非是中国，而是西方的金融危机及其影响。欧洲的银行体系举步维艰，经济紧缩、反弹无力（德国除外）。各国政府都面临着巨大的财政赤字，不同程度地开始紧缩开支。更糟糕的是，一些国家的银行危机还演变成主权债务危机（如希腊、爱尔兰和葡萄牙，西班牙和意大利也十分危险），最终不得不令欧盟（虽然极不情愿）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施以援手。这一过程还引发了欧盟成员国内部的严重分歧，甚至对欧元是否能存续的质疑也时而反复。金融危机的结果就是，欧盟面临着其经济和政治地位迅速下降甚至永久损伤的危险。欧洲的好日子一去不复返了，这种改变是根本性的。与此同时，在大部分欧洲国家深陷债务危机、经济低迷之时，很多发展中国家已经从经济危机中恢复，重新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如果说，此前欧洲一直对世界改变的程度与速度自欺欺人的话，那么现在其最终不得不直面现实，那就是欧洲一直处于衰退之中，欧洲的影响也日渐式微。西方金融危机正是那一记警钟。令人遗憾的是，这并非意味着欧洲将会做出调整，以适应其所面对的全新世界。恰恰相反，鉴于欧洲的历史与心态，欧洲将发现自己很难对看待自身及其在世界所处的位置以及对发展中国家的认知做出根本性的改变。

唯一一个似乎能够安然度过这场风暴的欧洲国家就是德国。这其中有两个原因。其一，德国是欧洲主要国家之中唯一一个成功将制造业占GDP的比重提升的国家，从1995年的20%提升至2008年的21%。相比

之下，同期的英国和法国制造业占GDP的比重都出现大幅下降，英国由18%降至12%，法国则由15%降至11%。德国出口贸易的成功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其制造业，直至不久之前，德国作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的位置才为中国所取代。其二，中国在2010年年末取代美国成为德国最大的非欧洲出口市场。有预测认为至2015年中国将成为德国最大的单一出口市场。德国之所以在2009~2011年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复苏，其向中国出口的工业产品，特别是资本货物、消费产品和高档汽车，功不可没。例如，德国最大的汽车制造商大众公司将中国称为其“第二个国内市场”。实际上，这有些略显保守。大众汽车在华的销量要远高于德国本土。很明显，德国经济之所以能够恢复，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其维持了一个具有高度竞争力、越发面向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制造产业。这与欧洲其他主要国家，如英国、法国、意大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很明显，它们都没能实现这一点。中国是英国第十一大出口市场，甚至位列爱尔兰之后。对于意大利来说，中国也只是其第十大出口市场。因此，除了德国之外，欧洲的主要国家实际上均重蹈了欧盟没能认识到全球经济重构并做出相应调整的覆辙，没能实现向发展中国的市场转向。鉴于大部分欧洲国家的贸易主要集中于经济发展陷入停滞的发达国家内部，而没有在发展中国家的市场进行，因此其很难实现经济的复苏。要知道，发展中国家才是全球经济增长的驱动力，未来也很可能如此。

中国看待欧盟的方式与其看待美国的方式截然不同，这一点不足为奇。就美国而言，美国是一个高度集权的民族国家，因此双边关系的所有问题都可以说是有意为之。这与欧盟截然不同，欧盟远非一个具有战略、协调思考和行动能力的集权国家，实际上只是一个尴尬的国家联合体，代表了不同的利益。此外，美国是一个全球大国，而欧盟则越发像一个地区强国，在中国的眼中亦是如此。实际上，在中国所属的东亚地区，自欧洲各个帝国解体之后，欧洲就已经不再是一个重要的行为体，其作用实际上已经被中国所取代。欧洲在如此重要的一个地区的缺位，实际上也证明了其战后以来全球地位的下降及越发

向地区大国角色的蜕变。除了欧元之外，所谓的欧洲全球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也仅限于“规范性权力”（normative power）这个概念，也就是说，通过协商和在国际机制内实现合法化，促进欧洲标准的普及。

大体而言，欧洲对于中国崛起的反应是低调、零散和不连贯的。这是因为欧盟在处理与其他国家例如中国的关系时，缺乏作为欧洲战略核心的权力和权限。结果就造成了欧洲在国际社会上的声音通常很小，而且经常发出很多不同的声音。中国则经常可以利用这一情况从中得利。在西方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的10年里，欧洲与中国的经贸关系发展迅猛，欧洲国家从中国大量进口廉价商品，同时，欧洲尤其是德国向中国的出口也有很大增长。这使得欧洲对中国的贸易赤字越来越大，那些生产与中国一样的同质性产品的国家的失业人数也在不断增加。但对于中国崛起带来的经济影响，除了对人民币贬值和日益增长的赤字之外，欧洲几乎没有什么争议。总体而言，大多数国家对中国崛起的态度还是认为受益者居多，因为消费品的价格得以大幅下降。但那些欠发达的欧洲国家，如葡萄牙、希腊，以及新近加入欧盟的成员国，都与中国存在一定程度上的竞争，因此态度更为复杂。

首先，金融危机的爆发及其影响使得很多欧洲国家，特别是法国和意大利，对中国崛起的冲击和全球化的影响的担忧不断加剧，导致相关国家与中国经贸关系趋紧，甚至还可能采取一定的反制措施，如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征收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等。尽管此前欧洲对中国经济崛起的主流态度以良性居多，认为利大于弊，然而这种相对乐观的看法却被日趋淹没在对负面影响的担忧之中。对中国跨国公司在欧投资和中国投资欧洲关键性产业的担忧，更是令其对中国的负面看法日增。

目前为止，欧洲一直对中国采取了一种相对傲慢的态度，在很多欧洲认为不妥的地方指手画脚，例如知识产权保护、人权和民主等。

这一做法不仅令中方十分恼火，连欧洲自己也发现随着自身实力的下降这种做法难以为继。随着中国实力的不断增强，欧盟对中国人权问题的指责在国际上获得的支持越来越少。同样，随着中国经济竞争力的不断提升，中国也越来越有底气和欧盟就贸易问题讨价还价。中国在知识产权转让问题上越发强硬的态度正是其越来越自信的体现。截至目前，欧洲一直自欺欺人地认为中国的竞争力仅限于廉价的消费品，这种鸵鸟心态还将持续相当一段时间。这种误判的根源在于严重低估了中国经济的活力以及高端产业（如高铁、电信、电力技术、电池和太阳能板）升级的能力与速度。实际上，中国的产业升级已经在进行之中。在上文提及的高端产业领域之中，中国已经具备或马上将具备竞争能力。不远的将来，中国在建工、机床、汽车和电子工程等领域也将可与西方一较高下。

从根本上重塑中欧关系的是欧洲当前所经历的主权债务危机以及持续的经济低迷。南欧和东欧国家都面临着严重的债务危机，很多都转向中国寻求援助。早期最明显的事例就是中国银行与希腊方面达成的购买总额为200亿美元希腊长期债券的协议。此协议最终因希腊方面拒绝向中方出售希腊银行的股份而告终。值得关注的是，中国的国有航运公司中国远洋运输集团，通过2010年达成的一项总价为34亿美元的长期特许权协议及造船、港口和集装箱码头等其他协议，已经获得了比雷埃夫斯（希腊港口）的一个集装箱码头的控制权。保加利亚政府正在积极寻求吸引更多的中方投资，很多中方公司已经与一家位于索菲亚的经济特区签约。罗马尼亚政府也是如此。虽然这些交易的规模和影响相对有限，但足以说明未来的发展态势。虽然德国、法国和英国等国家对中国投资采取了相对限制的政策，但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它们将调整政策，欢迎中资的进入。2011年11月，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董事长楼继伟宣布，中投公司这一主权财富基金有意作为权益投资人投资英国的基础设施领域。2012年1月，中投公司购买了泰晤士水务公司8.68%的股份，这一举措也得到了英国政府的支持。其他为数众多的、经济实力相对较弱的欧洲国家则对中国投资持积极、正面

的态度。特别是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十分乐见中国长期以来愿意购买其主权债务，因为这实际上也展示了中国对其未来经济前景的信心。因为购买主权债务被视为国家的机密，因此我们很难知晓其确切的数字。但欧洲方面估计，中国购买了西班牙75亿美元的债券，所购买的葡萄牙国债数额也达到了50亿美元。因此，在此背景之下，相对贫弱的南欧国家将中国视为了某种意义上的救世主，也就不足为奇了。甚至对德国、法国和欧盟而言，它们也应感谢中国在欧元危急之时给予的支持。2011年1月，时任中国副总理李克强访问欧洲之时，所到各国均对其充满了期待，希望中国可以慷慨地提供援助，以拯救深陷债务危机、资金短缺的欧洲国家。在金融危机之前，中国对欧洲的需求要远大于欧洲对中国的需求。现在，态势却发生了戏剧性的反转。最为明显的事例就是2011年的11月，欧盟所举行的一系列探讨如何拯救欧元的会议行将落幕之时，法国总理萨科齐致电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希望中国政府提供一大笔紧急援助贷款。

西方金融危机标志着欧洲地位的陡然急剧下降，不可逆转。欧洲在世界的荣光一去不复返。在金融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的双重冲击之下，欧盟内部也产生了分裂，呈碎片化的态势。大部分国家都面临着紧缩开支、增长不力、削减公共福利的困境。欧元区的未来仍然存疑。欧盟及其成员国将不得不面对其在世界上的作用日益下降的处境。其他国家对于成为欧盟的贸易伙伴已经不那么热衷，因为有更具吸引力的替代者可供选择。欧洲在国际组织中的影响力和代表权也在持续下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近开展的改革就已经说明了这一点。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欧洲的援助已经不再那么具有吸引力，那些更富有、更慷慨的金主，如中国，已经取代了欧洲的角色。2009年的哥本哈根气候峰会，早已证明了欧洲权威的迅速下降。中国、印度、南非、巴西以及最后一刻妥协加入的美国，最终达成了“临时协议”，而欧洲则完全被排除在这个小圈子之外。这是两个多世纪以来欧洲第一次被排除在其具有重要利益的主要国际会议的核心圈之外。最后，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至2050年时，欧洲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比例将降至不到5%，而1950年时，欧洲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比例达12%。

欧洲在东亚并没有重要的外交影响和军事存在，这也表明，与仍为该地区“安全主宰者”的美国不同，欧洲与中国没有重大的地缘政治冲突。在美国关心的所有重大议题上，例如中国台湾问题、朝鲜半岛问题或者美日同盟，欧洲都只是一个观望者。欧洲也并没有介入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双边同盟体系之中。因此，中欧关系的发展不会受这些因素的阻碍。与这类议题最近似的莫过于欧洲对华的武器禁运，中国一直努力游说欧洲解除这一禁令。欧盟本来已于2005年决定解除这一禁令，但迫于美国的巨大压力，欧盟最终收回了这一决定。美国甚至将欧洲解除对华武器禁运的问题上升到关乎美欧联盟的高度。从中可以看出，美国只有将此事变成西方的一种信念，才能达到维持现状的目的，这也表明欧洲或许已经准备在对华关系问题上进行独立思考了。但这并不表明从长远看欧洲将脱离美国转而支持中国（这简直是无法想象的），但从主要欧洲国家（例如德国和法国）对美国入侵伊拉克的反应来看，随着美国政策向单边主义倾斜，欧洲不打算再继续跟从美国。在奥巴马政府任期内，美欧关系得到大幅提升，虽然无法也不可能再回到冷战时期的亲密无间。随着中国的崛起和中东重要性的提升，跨大西洋关系将不再是美国对外关系的主轴。也就是说，与那种欧美在冷战时期形成的全天候的关系相比，新型的欧美关系将是一种根据具体事务进行灵活合作的关系。

随着全球的重心逐渐由大西洋向太平洋、从西方向亚洲转移，美国也将日益将战略重心向亚洲而非欧洲倾斜，因此欧洲将日益被边缘化。在此背景之下，美国与欧洲极有可能渐行渐远。然而，中国庞大的市场、雄厚的资金以及潜在的援助的影响力与日俱增，这也意味着中国对欧洲有很多牌可以打，正如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时一样。实际上，中国已经展示出了娴熟使用手中底牌的高超外交技巧。但我们也不能过分地夸大任何一种对未来前景的设想，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在地缘政治方面，欧洲更有可能站在美国一边，而不是中国一边。在一个大幕徐徐拉开的新世界里，出于历史、文化、民族和经济等多方面原因，欧洲更有可能和美国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但随着美国的衰落和中国的兴起，欧洲与美国之间的关系也将越发脆弱。

崛起的大国和衰落的大国

自1972年尼克松访华与毛泽东会面并就两国关系达成和解以及随后两国于1949年建立全面外交关系以来，中美关系历经40余年，一直是以稳定和延续为特征（尽管美国国内的舆论经常背道而驰）。两国关系虽历经了很多阶段，比如联合对抗苏联、中国的改革和现代化、中国90年代末的快速发展和对外开放、中国作为一个全球大国的兴起、当然还有美国总统的更替（从尼克松、里根、老布什到卡特、克林顿、小布什和奥巴马），两国的关系从根本上说一直很平稳。美国不仅逐渐对中国放开了国内市场，还同意其加入国际体系的各种国际组织之中；而反过来，中国则根据美国的态度，缓和、调整其政策。虽在不同阶段，用来证明美国对华政策正当性的理由有所变化，但其本质上是一致的。或许美国统治阶层一直以来支持这一对华立场的原因一时半会儿还不是那么明显，但最主要原因还在于历史根源。毛泽东与尼克松达成的和解发生在冷战时期的黑暗岁月里，这在美国与苏联的竞争中无疑意味着地缘政治的巨大胜利。这也使美国人产生了一种对中美关系的持久忠诚和承诺，正是这种忠诚和承诺保证了对华关系的长期稳定。

对于中国来说，维持中美关系的平稳发展一直是其近40年来外交政策的根本宗旨之一。从一开始，中美关系就处于邓小平所提出的确保中国拥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从而集中力量和资源发展经济这一战略的核心位置。邓小平曾发表讲话称必须“坚持基本路线100年不动摇”，这既表明了经济发展及中美关系的首要位置。同时也表

明，与其他文化不同，独特的长期洞察力是中国战略思想的鲜明特点。对于中国领导层来说，在整个改革阶段，维持和发展中美关系一直是一项重要原则，这是公认、无可争议的，长期以来，这种做法也使中国更好、更深入地认识了美国。

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中国和苏联对待西方的态度简直有天壤之别。苏联将西方视为敌人，而中国则在1972年之后选择与其做朋友。苏联选择独裁统治和孤立，而中国寻求融合和相互依赖。苏联拒绝加入“二战”后的西方国际组织，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等，而中国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耐心地等待了15年，直至2001年才成为其正式成员。苏联与美国进行军事对抗，双边是零和关系；而中国则与其和睦相处，开展合作，努力创造最适宜经济发展的条件。苏联被迫投入巨额的军费开支，而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逐渐降低了军费开支占GDP的比例，1950~1980年这一比例为6.35%，80年代降至2.3%，90年代则降至1.4%。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两国的战略是基于完全相反的逻辑。邓小平的名言最能代表中国的做法，即“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毋庸讳言，改革开放时期的中美关系是极其不对等的，直至不久之前仍是如此。中国对美国的需求程度远大于美国对中国的需求。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市场，是中国亟待融入的国际体系的看护者，是国际体系设计和运作的主要负责人。

正如中国问题专家梁思文（Steven I. Levine）所指出的，美国对待中国就像“自封的国际俱乐部资格审查委员会对待一个没什么名气的申请者那样”，它“有权接受或拒绝其入会或赋予其预备会员的资格”。从长远看，当中国更加强大之时，中国就有可能就这段不悦的经历向美国讨回公道。对中国而言，这也是其所受长期屈辱的另一种表现，只不过程度较为温和罢了。

与中国大力维护中美关系相比，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则存在着强烈的反差。直至金融危机之前，美国只是将与中国的关系视为其众多对外关系中的一个，而且通常远远算不上最重要的一个。因此，美国对中国的关注总是时断时续，偶尔能够上升到议事日程较为靠前的位置，大部分时间一直处于中等状态。比如，在克林顿第一任期内，中国基本排不上号。尽管小布什在其第一次总统竞选时表示强烈反对中国，将其描绘成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在“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之后，美中关系在华盛顿所列的优先排序中迅速下降，两国关系又迅速回复到以前的状态。实际上，只是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双边关系才开始有所改观，双方进行了首脑会谈，美国也开始越发认识到中国实际上是其战略重点之一。与两国对相互关系的不同程度的投入相对应，虽然中国对于美国的了解已经较为深刻，但在美国，除了一小部分圈内人之外，对中国的了解并不多。

在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之后，美国不得不重新思考发展对华关系的逻辑依据。这并不困难。随着中国改革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实行，外界认为中国正在走资本主义模式的发展道路。此外，考虑到中国两位数的经济增长率和庞大的人口，人们认为这也为美国的商业提供了无限的机遇。20世纪90年代时，中国成为美国全球化雄图中的关键因素。美国认为，全球化是一个西方化的过程，最终将不可避免地导致西方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胜利，而世界其他国家包括中国，将越来越像美国。美国的全球化雄图中包括很多设想，从西方生活方式和文化习惯的胜利到坚信西方式民主的普适性和绝对实用性，换句话说，现代性只有西方现代性这一种模式。1999年11月，小布什宣称：“经济自由催生自由的习惯，而自由的习惯催生对民主的期盼……与中国自由贸易，时间将证明我们是对的。”也正如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书中所说：“中国将拥有言论自由，全球化将推动其实现。”美国作家詹姆斯·曼（James Mann）也表示：“中国将不可避免地越来越像我们。”人们过去认为这是不言而喻的。实际上，这种广泛的观点

束缚了美国对华政策，使其背负上被极度夸大了的期望，而这种期望根本无法实现。美国根深蒂固的全球化理念存在极大的缺陷。

20世纪90年代，美国国内越来越多的利益集团开始攻击美国对华政策：工会组织担心中国进口产品的激增，批评中国的劳工和贸易政策；而人权组织则就异议人士和西藏问题进行抗议。尽管对华政策更多涉及的是总统而非国会的决策，但却仍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批评者抱怨声的影响。但我们需要明确的是，美国目前的对华立场不可能无限地维持下去。直到21世纪之前，中国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仍相对有限，大部分是在东亚，且主要集中在中国台湾问题上。的确，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以及美国自身出口竞争乏力等因素造成了两国间巨大的贸易逆差，但中国购买美国国债进一步促进了美国的信用繁荣以及美国消费者享受到价格低廉产品带来的好处则抵消了相关的负面影响。

随着中国在21世纪初开始大展宏图，其经济增长的速度丝毫没有放慢，中美两国间的贸易逆差在不断扩大，中美持有的美国国债总额一直在增长，中国公司受到鼓励纷纷投资海外。为了寻找充足、可靠的自然资源供应，在政府的支持下，中国公司开始向非洲、中亚和拉丁美洲挺进。中国在东亚的实力和影响也在迅速扩大。事实越来越清楚地表明，中国远非昔日可比。在许多大陆上和许多国家里，美国发现自己面对着中国利益在各个方面的不断增长，这意味着两国潜在分歧和冲突的源头正在逐步增多。

21世纪初所发生的两个事件已经表明中美关系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尽管当时并不明显。其一是小布什政府放弃了以往基于共识的多边主义外交政策，采取了单边主义政策，而且确立了“先发制人”的原则。美国抛弃了以往秉持的普世主义，转向了否定或看轻结盟必要性的国家主义。这种新战略注重军事力量和硬实力（而不是软实力），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时这种立场尤为明显。国家主权原则不得不服从于以政权更迭为目的而进行干涉的愿望。一个全新的、侵略

性的美国就此诞生了。在这一事件中，绝大多数国家反对入侵伊拉克，根据全球民意测验，大多数民众对此持反对态度。随着美国对伊拉克的占领遭到越来越多的反对并且被认为已经失败，美国不受欢迎的程度也在与日俱增，这在“二战”以来的60年里尚属首次。其二是2003~2005年前后，中国时代到来了，全世界都注意到了中国的转型，这一转型对于世界其他国家的意义和影响也开始显现。而这两个事件恰巧同时发生，因此彼此间进一步巩固了影响。人们普遍认为，中国正在崛起，而美国不像原来所想象的那样无所不能，两国间的力量天平开始向中国倾斜。

同时，美国对待中国的态度也开始改变，变得越发不确定。詹姆斯・曼近期出版的《中国幻想》（*The China Fantasy*）一书正反映了这一点。在书中，他质疑了其称之为“自欺欺人设想”的观点，即人们普遍认为，与中国进行贸易既符合美国的经济利益，最终也将推动自由市场和民主中国的出现。詹姆斯指出，尽管中国进行了市场转型，但我们绝不能就此自动得出中国将走向民主的结论。

2007年夏次贷危机爆发，在随后一年的时间里，美国金融部门遭受重创，享誉一时的雷曼兄弟公司走向破产，仅存的几家美国投资银行也被迫改变现状——美国政府相当看重的高盛集团也名列其中，这一切又加剧了美国民众的不确定性和不安。在这种背景下，美国政府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宣称要对金融部门展开大拯救，这也标志着被视为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资本主义“名片”的新自由主义体制彻底倾覆了。在经历了为时数周惊心动魄的金融事件之后，盎格鲁－美国模式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也导致西方经济陷入了严重的萧条状态之中。事实上，虽然美国依靠中国的信贷资金才采取了以上救市举措，从而“过得很舒服”，但这也表明了美国繁荣的脆弱性，以及全球的经济重心已经出现由美国向中国转移的趋势。中国的崛起和美国的金融危机开启了中美关系根本性变革的序幕。

冲突的加剧

中美两国一直试图对金融危机标志着双边关系发生转折这一事实轻描淡写，甚至加以否认。但对于世界而言，这样一种态势除了代表或标志着世界经济权杖由美国转移到中国，还有其他意义可言吗？实际上，再也没有其他的事件能具有此种意义了。无论两国如何遮掩，中美两国的态度都已经随之发生改变，正如两国对待其他国家的立场一样。当然，所有的假设、认知、政策、战略若要符合最新的现实，无疑还需要一段时间。中国国内就中国未来在世界中的地位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而相关的讨论无疑也直接涉及其与美国之间的关系。简而言之，中国蓬勃发展的经济力量以及中美之间力量对比态势的改变，无疑意味着邓小平时期专注于经济发展、消除贫困的信条，同时也是对美保持低调、在双边关系中处于次要地位的外交方针，正在逐渐被画上句号。中国领导层所面临的问题远比从前更加复杂：如何在一个快速变革同时中国的实力和影响力不断增强的世界中，界定中国的角色与目标。与此同时，对于美国来说，这也是有史以来第一次不得不面对自身衰弱的现实（除了存有争议的20世纪80年代之外）。美国国内对此的讨论才刚刚出现，而且对绝大多数美国人来说，他们还是第一次面对这么严重而又全新的问题。简而言之，中美两国目前为止都只是向全新的世界迈出了第一步。但相关口径的变化已经是显而易见。对于国际问题，中国此前一直是保持沉默或借其他国家之口来表达自己的立场（如赞同俄罗斯对美国入侵伊拉克表示质疑而自己则保持沉默）。然而在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已经开始更加愿意表达自己的意愿。在2009年的世界经济论坛上，时任总理温家宝对美国的经济模式进行了委婉的批评。两个月之后，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则对美元的地位进行了抨击，呼吁扩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这通常被视为中国新近出现的进取心的体现。实际上，将其称为中国更愿意公开、明确表达自己的意愿，更为合适。

那么，中美关系将处于何种境地？当然，所有的变化都尚处于萌芽阶段。我们不要指望会立即发生颠覆性的变革。中国人不会轻易地做出任何姿态，而是将一如既往地以标志性地谨慎和远见行事。尽管邓小平时代逐渐告一段落，但中国绝不会立刻或完全将之替换。恰恰相反，邓小平时期的政策和理念还将具有明显的延续性。美国人在很大程度上仍会否认、无视美国的衰落和全新的世界秩序所带来的影响，坚持认为很多方面看上去都与以往无异，至少表面上如此。美国人发觉很难将中国作为一个平等的伙伴看待（而且越发应该如此），因为他们在对待他者时的优越感和优势地位是如此的根深蒂固。在处理与中国的关系时尤为如此。

自毛泽东——尼克松时代起，中美关系一直保持了相对稳定，因此人们普遍认为中美关系大体上还是友好的。但正如中国国际关系专家阎学通所指出的，鉴于中美之间的巨大差别和利益冲突，中美之间的友好只是客套而已，所谓的友好也只是流于表面。按照其观点，这也是中美关系在友好与敌对、乐观与悲观之间摇摆的原因所在。那种总是以失望而告终的不切实际的期待，更是令中美关系雪上加霜，金融危机之后的中美关系就是明证。中美之间就人民币问题所展开的持续不断的争端，就是对此的经典例证，同时也表明了未来中美关系将越发的紧张，冲突亦将加剧。

金融危机所产生的直接影响之一就是政府间的高度合作，各国政府均采取了大规模的救市举措，以免其演化为经济大萧条，其中又以中国政府的力度最大。虽然相关举措取得了成功，但随着深陷债务泥潭的西方国家希望在世界推行其救市政策，原有的团结协作也出现了裂痕。美国对人民币的价值汇率问题火力全开，指责人民币的汇率至少被低估了25%，因此提升了中国产品不正当的竞争力，恶化了美国的贸易赤字。美国参议院还通过了一项法案，支持了美国公司所提出的要求，就中国的货币政策向中国产品征收惩罚性关税。实际上，事情远比看上去要复杂得多。中国所出口的产品中，有一半是由外国公司

生产和加工的。中国本土企业的出口份额只占中国出口总额的一小部分。换句话说，现有的统计方法高估了中国出口的比重，同时严重低估了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向中国提供最后组装的半成品的东亚国家和地区的作用。此外，正如哈佛大学经济学家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所指出，中国现有的对货币贬值的依赖，某种程度上是其2001年之前所执行的工业政策的结果；而根据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的严苛条件，这些政策已经不被允许了。尽管中国政府在2010年6月允许了人民币的小幅升值，但对于美国的压力，中国政府坚决抵制并予以反击，表示美联储的两回合量化宽松（也就是印发纸币）实际是在故意打压美元汇率和美元资产价值。中国还进一步质疑美国国内对于美元的压力及其国际储备货币地位之间的矛盾不断加剧，因此美元实际上已经无法再充当世界主要性的货币。在2011年1月胡奥峰会前夕，胡锦涛在接受《华盛顿邮报》和《华尔街日报》的联合采访中表示，“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是旧时代的产物”。2010年这一年的事实表明，中国所获得的国际支持要比美国多得多，甚至连德国也站在了中国的一边。西方一直建议签署一项新的广场协议（广场协议是1985年西方主要国家与日本签署的一项协定，导致了日元的大幅升值），但可能性却微乎其微。中国绝不会赞同这种协定。与唯美国马首是瞻的日本不同，中国的决策绝不会受外界干预。中国无疑会推动人民币的升值，这也是其国内的经济利益使然，但将会是以中国自己的方式、自己的节奏行事。货币问题之所以会引发如此争论，是因为其关乎中美之间经济力量的平衡、美国和美元的衰退以及中国作为新型金融主导力量的崛起。换言之，这也是衰落的大国与新兴崛起大国日益增长的矛盾的核心所在。

从更广阔的视角审视，有若干问题将会对中美关系，特别是美国对华态度造成重要影响。首先是美国对全球化的态度。20世纪90年代时，美国国内普遍认为全球化对美国来说是一个双赢的局面。美国不但在整个全球化的进程中留下了自己的印记，而且还可以在与其他各国的关系中获益。当时，美国向世界输出全球化的理念，然后从国内

获得全球化的好处；而如今，全球化日益被视为一个“回旋镖”，正一步步地对美国形成困扰。此前，美国被视为全球化最有力的推动者和最大的受益者，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东亚，尤其是中国，才是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中国对美国享有巨额贸易顺差，并持有大量美国国债，对美元币值的影响力日益增强，并且中国已经削弱了美国制造业的一些关键行业，特别是造成了美国很多制造业工人失业，这已经使其转变了自己的角色，日益成为令美国畏惧的竞争对手。人民币币值引发的广泛争议，食品、玩具等中国出口产品的安全问题，以及越来越多的对中国“不公平”竞争的指控等，就是对中国日益敏感的体现。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对中国的观点发生了决定性的改变。值得注意的是，在2010年11月举行的美国中期选举中，那些大肆攻击中国不平等竞争以及美国工作机会转移到中国的候选人并未取得特别的优势。美国国内的受益者，特别是那些将制造部门转移到中国的美国企业巨头和从廉价的中国产品中得益的美国消费者的数量，还是远多于利益受损者，其影响也大得多。但事态终将会发生改变。大宗商品（特别是石油）的价格不断上涨，将推动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向更加消极的方向发展。更为中肯的判断是，经济低速徘徊和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已经导致保护主义的抬头，如果在未来的几年内未有改善的话，保护主义将不可避免。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即使在次贷危机爆发前，认为对外贸易能够给美国带来好处的美国人的比例已经从2002年的78%迅速下滑到2007年的59%。

从长期来看，随着中国公司的科技水平大幅提升，美国经济将会面临来自中国产品的激烈竞争，而且竞争的领域不会仅限于低附加值产品上，还将日益扩展至高附加值产品，正如此前日本和韩国公司一样。在这一过程中，利益受损者的数量会迅速增加，这一点和欧洲的情况非常相像。这些变化将进一步动摇现已日益减少的对自由贸易和全球化支持的共识，导致贸易保护主义的倾向大增，而其最主要的目标无疑是中国的商品。如果美国诉诸贸易保护主义，那么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的中美关系的重要支柱之一将会受到严重影响。这也预示着

保护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向前迈出了更大一步以及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全球化进程的终结。多哈回合谈判的失败则进一步表明这种前景即便不是不可避免，出现的概率也很高。

其次是东亚地区的变数。正如我们在第8章讨论过的那样，目前已有明显的证据表明东亚这个全球最重要的经济区（东亚的经济地位已经超过了北美和欧洲）的均势已经发生了重大的转变。虽然目前尚未发生任何决定性的变化，但中国明显已经加强了自己的地位。菲律宾、新加坡等美国长期以来的盟友现在也开始动摇，正寻求与中国建立更为紧密的关系。实际上，日本是目前为止唯一一个拒绝与中国走得更近的国家。从中美关系的角度而言，这些变化更为广泛的意义在于，自“二战”后，东亚一直是美国毋庸置疑的势力范围，其地位仅受到毛泽东时代相对孤立的中国和美国越战失败的威胁。

但现在情况已并非如此，东亚实际上已经呈现两极化的态势，中国在经济上日益占主导地位，但美国在安全方面仍扮演主要的角色。正如前文所述，美国在2010年成功收复了小布什政府期间因向中东倾斜而忽视东亚所丧失的部分势力范围。可以预见，奥巴马政府已经认识到恢复美国在东亚存在的重要性，美国对此的决心也预示着未来东亚地区的态势将日渐紧张。然而，就长期来看，最具可能的态势就是随着美国经济地位的不断衰落，美国在东亚的存在也不断减少。美国在东亚地区的日益式微，也将对其全球地位造成影响：一方面，会令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更有信心；另一方面，也对其他国家发出了一个信号。

与此同时，中国开始以一种与美国截然不同的发展方式脱颖而出（中国在推广这一理念时十分谨慎），尽管其方式与冷战时期的全面竞争截然不同。小布什政府期间，美国日益强调硬实力的重要性，使其在世界上越发孤立，并且产生了一个真空地带。而中国则渐渐地填补了这一真空，当然并不仅仅是因为中国提倡多变主义、强调和平崛

起。在这种背景下，中国面对的主要是发展中国家，而不是发达国家。中国向其提供没有附加条件的援助，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尊重主权，重视强大的政府，反对超级大国专权，倡导公平竞争的环境等，都在发展中国家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美国软实力的主要内容则强调民主在国家内部的重要性，与之相比，中国则强调民主在国家间（尤其是尊重主权）和世界体制内的重要性。在当前国际治理机制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广受质疑的背景下，中国对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及其治理机制的批评，在发展中国家中引发了强烈共鸣。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印度）一道，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的先锋。

最重要的一点则在于，中国能够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自身的发展经验和模式，供其参考和借鉴。准确地说，这是美国这个老牌发达国家无法做到的。实际上，美国所提供的“华盛顿共识”现在也饱受质疑。除了东亚这个明显的例子外，在非洲和拉丁美洲，权力和感情倾向也从美国明显转移到了中国。虽然我们不应夸大这些转变，但它们的确可以作为具有重要意义的风向标。与此同时，在这场金融危机中，美国新自由主义大厦的突然坍塌也大大损伤了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吸引力。更为主要的是，由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也因起源于美国国内的危机而陷入了混乱，这也进一步削弱了美国的力量和威望。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军事实力，美国对这一问题一直不断渲染。美国是最为重视军事实力的国家，尤为体现在其巨额军费开支持续攀升以及高度重视保持相对于其他任何国家的绝对军事优势上。2002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强调，增强军事实力，其目的是为了“挫败潜在对手通过扩军以超越美国力量或与其平起平坐的意图”。事实上，美国单极化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军事现象。

美国人认为，中国会坚定不移地发展自身强大的军事实力，这令很多国家，特别是东亚国家感到恐惧。中国的规模、凝聚力以及中央集权统治的历史足以使其他国家疑虑重重，因此这种对中国决意成为

军事超级大国的担忧也使得其他国家焦虑不已，甚至疑神疑鬼。这一点在表9－3中得以充分的体现：在大部分民众对中国的经济崛起持相对支持态度的同时，很大一部分民众对中国日渐增长的军事实力极为担忧。

表9–3 中国日益增长的实力将对你的国家造成何种影响？

	日益发展的经济		日益增长的军事实力	
	正面影响（%）	负面影响（%）	正面影响（%）	负面影响（%）
美国	40	47	12	79
英国	44	42	11	74
法国	32	67	12	87
德国	37	58	16	72
西班牙	36	48	11	66
波兰	39	46	17	65
俄罗斯	49	30	14	71
土耳其	18	60	8	58
埃及	54	42	32	55
约旦	71	24	32	56
黎巴嫩	54	33	20	59
印度	34	56	27	64
印度尼西亚	61	28	41	39
日本	61	29	4	88
巴基斯坦	79	5	70	7
韩国	45	49	7	86
阿根廷	52	20	15	43
巴西	62	21	34	40
墨西哥	41	34	21	46
肯尼亚	90	6	66	25
尼日利亚	90	5	64	20

资料来源：皮尤研究中心（2010 年6 月数据）

美国国防部每年关于中国军费开支的报告以及此前小布什政府的一些要员对中国发出的警告背后都有一个明确的政治意图，即在某种程度上利用人们在冷战时期对苏联的恐惧，造成对中国的怀疑和不信任。实际上，迄今为止，中国一直选择了一条非同寻常的道路，一条重视发展经济而非军事实力的道路。在过去的10年里，中国国防预算的增幅大体上与其经济发展的速度相当。而在此前的20年，中国国防预算在GDP中的比重甚至有所下降。就国防预算在GDP中的比重而言，中国还不到美国的一半。直至不久之前，中国军队现代化的目标还只是确保对中国台湾一旦宣布独立做出必要的武力反应，并确保对任何可能蓄谋攻击中国的外部势力施以足够的威慑。这两方面都是中国长期以来关心的问题——台湾是中国历史遗留问题，而后者则源于中国“屈辱的百年”的教训及其对国家主权的无比重视。但我们必须注意到，中国建设强大军队的能力受到了严重制约，如相对较低的技术水平，欧盟和美国的武器禁运也使其只能从俄罗斯进口武器。因此，中国的军事实力远远落后于日本。目前，中国的第一艘航母“辽宁号”已经建成（在一艘苏联设计的、1998年从乌克兰购买的未完成的航母船体的基础上），而航母是军力投放的一个重要载体。而对于中国来说，将航母与其所必需的辅助舰只有效整合，仍是任重而道远。在此背景下，我们应了解世界上已有10个国家拥有航母，其中英国就拥有3艘（尽管相关费用令其捉襟见肘），甚至连印度和意大利也各有一艘。

除航母之外，中国现在也正在大力发展其在南海、东海和印度洋的海军能力。其研发的一种陆基反舰导弹，令美国国防部部长罗伯特·盖茨（Robert Gates）坦承将迫使五角大楼重新思考航母的部署方式。据预测，中国所拥有的潜艇数量已经与美国在该地区部署的潜艇数量相当。随着中国在相关地区利益的不断扩展以及中国迫切希望保护其在南海和马六甲海峡的至关重要的航道利益，中国逐渐成为相关

海域的一种重要的海军力量。然而需要强调的是，尽管中国大力发展海军力量，但仍难与美国相匹敌，这一态势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仍将持续。尽管如此，中国日益增长的军事实力势必会加重中美两国间的紧张局势。

危险在于，中美两国在未来可能会陷入冷战时期的那种军备竞赛并由此引发恐慌。无疑，在同中国比较时，美国对自己的硬实力十分满意。首先是因为其拥有压倒性的军事优势；其次，硬实力的作用深深地刻在了美国人的思维中，这一方面是由于冷战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是其建国和扩张中采用武力的后果，拓荒精神正是它的佐证。而中国人则没有这种思维。但美国也面临着一些危险，对于美国来说，中国的问题不在于其军事实力，而在于其强大的经济实力。中国的经济实力正渐渐地、势不可当地动摇着美国在全球的重要地位。美国若继续将中国主要视为一个军事问题，那么无疑是一种自欺欺人，从而分散自己的注意力，无法解决面临的真正问题，并因此加速自己的衰落。

这四个问题——美国对全球化的态度；东亚均势的转移；中国以一种完全不同于美国的模式在发展；军事实力问题——并非远虑，而是近忧，而且可能发生摩擦的领域还将继续增多。随着中国实力和抱负的快速增长，中美之间的冲突点和分歧点将逐渐增多。这就是中国变革的速度，它比我们预想的快得多，也比世界预期的快得多。“中国时间”过得远比我们历史上所习惯的时间要快。我们不难想象这些分歧点涉及的领域——中国和美国在能源供应来源上展开日益激烈的竞争和冲突，如在安哥拉、委内瑞拉和其他地区；美国和印度加强战略伙伴关系引发强烈的争议；资金充足的中国企业试图收购越来越多的美国公司，但这种行为可能会受到抵制，如中海油收购美国石油公司优尼科受挫；中国主权财富基金的保险柜里堆满了巨额贸易顺差的盈余，这有助于它通过贷款帮助美国的各大银行摆脱经济困境，并因

此获得在这些银行中的重要战略权益；中美两国就太空军事化的摩擦日益增多。

此外，中国和美国文化上的巨大差异（这一点连苏联都无法相比）更增加了相互产生误解和憎恶的可能性。实际上，中美关系的建构者之一亨利·基辛格曾指出："两国之间的巨大差异将有可能导致两国之间日益加剧的对抗……除非两国领导集体采取坚定的行动抵制这一趋势。"中国由共产党执政这一事实也是产生分歧的重要原因，这一点也经常被美国用来妖魔化中国，毕竟冷战的阴影并未散尽。

就长期而言，气候变化的日益威胁和世界各国采取更加积极的措施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的迫切性，可能令以上问题黯然失色。美国在小布什政府时期，对这一问题采取的是一种单边主义的立场，拒绝签署《京都议定书》，也拒绝接受全球变暖这一显而易见的科学观点。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没有被要求签署《京都议定书》，但现在它是第二大温室气体排放国，而且从全球的观点来看，将中国排除在外是站不住脚的。如果不把美国、中国和印度包括在内，任何新的气候协议都是毫无意义的。但相关协议的达成绝非易事，因为这涉及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不可避免的利益冲突，而中国和美国则分别是前者和后者主要的领导者，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就已经是明证。在哥本哈根会议上，随着中国、印度、巴西和南非最终占据主动、美国相对被边缘化、欧洲则完全被排除在外，因气变问题产生的全球争议的复杂性已经是昭然若揭。

如果中美关系严重恶化，任何想把中国从当前的全球经济体系中排除出去的想法都将是不可取的。实际上，中国已经深深地融入了国际生产体系之中，这一进程几乎不可能扭转。中国制造业现在已经成为主要西方国家及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的跨国公司所主导的全球劳动分工体系之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中国的对外出口中也占据了绝大多数的比例。由于中国的劳动力成本极低，中国的产品附加值占总

附加值的比例很小，仅为30%或者更低，这意味着任何对中国出口产品进行制裁的企图对许多其他国家尤其是参与生产过程的东亚国家所造成的伤害，要远甚于中国。当前，在全球经济萧条的背景下，能够证明中国的作用已经不可替代的证据更为凸显：中国的参与是任何解决方案都需要考虑的，而其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也是阻遏全球经济大萧条所带来严重危害的必要因素。

我们还应注意，即美国在东亚政策的可选择性也受到了限制。至于美国是否决定对其东亚的盟友例如菲律宾、新加坡或者印度尼西亚施加压力，迫使其疏远中国，现在还不得而知。但我们可以想象得到，这可能会产生相反的效果，因为如果被迫做出选择的话，这些国家可能选择倒向中国。

最后，如果美国选择加强与中国的对抗，并与其展开军备竞赛，这可能对美国而非中国的全球地位产生更大的伤害。而中国肯定会拒绝卷入这种军备竞赛。同时，对美国来说，问题在于中国的相对经济实力一直在不断地增长，这可是其他一切的基础！

中美关系必然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随着中国实力的增长，中国的利益及可能与美国产生冲突的领域也不断拓展。在合作的重要性与日俱增的同时，对抗的可能性也不断加剧。直至不久之前，在美国的眼中，中美关系仍只是众多双边关系中的一个，但很明显事实并非如此。随着中国的发展，中国的政策将如何演进，到底是继续韬光养晦还是更加有所作为，至今仍难下定论。同样，美国作为一个不断衰落的世界霸主，在面对一个全新的、截然不同的挑战者时将作何反应，也不得而知。

国际体系的未来

世界主导国家的关键特征之一就在于其具备建立和组织一套国际体系的能力，而大多数其他国家应愿意或者被迫接受该体系。英国建立的是1914年以前的国际金本位体系，这一体系以某种形态或形式覆盖了当时世界上相当大的部分。1931年英国最终被迫放弃金本位体系，这也标志着其全球金融霸权的终结。金本位体系后来被基于货币区域、受保护市场和势力范围的，越来越巴尔干化的体系取代。1945年之后，美国成为世界头号强国，在布雷顿森林，各方对新的国际体系达成了一致，并随后对其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实际上，这一体系本质上是美国的产物，美国的雄厚实力为其提供了可能——“二战”之后美国的GDP占全球的1/3。与此前英国主导的金本位体系不同，布雷顿森林体系是一个基于规则的、真实的国际体系。随着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及苏联解体后分立出来的国家纷纷加入其中，这一体系才真正成为全球性的体系。然而，美国经济的相对衰弱则为现有的国际经济体系和美元的未来，蒙上了一层阴影。

在过去的10年里，这种衰退已经十分明显。但直至西方金融危机发生之后，现存国际体系的脆弱性才为人所公认。为了进一步了解现有国际经济体系的衰弱，我们不妨将目光投向美国主导的经济体系的两大关键性机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对其作用进行审视。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马来西亚和日本建议成立一个“亚洲货币基金组织”，这足以表明该地区对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用的不满到了何种程度。这一提议引发了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强烈反对，它们将其视为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威胁，这一点当然是毫无疑问的。考虑到日本是倡议方之一，中国当时也对这一提议表示反对。然而，此后不久，中国就改变了反对的立场，并与东盟的十个成员国及日本、韩国一道，积极参与到《清迈协议》之中。《清迈协议》签署于2000年，开启了一系列双边协议的进程，并最终于2010年形成了一个外汇储备达1 200亿美元的区域性货币互换网络。这实际上已经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东亚的地位边缘化。

如果再发生一次亚洲金融危机，那么应对措施很有可能是一个以地区作用为主的金融解决方案。而且，在过去10年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东亚的作用已经大大削弱，各国已经有意地建立起庞大的外汇储备（见图9－19）以避免重蹈1997~1999年痛苦的覆辙。危机期间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寻求援助的国家，如印度尼西亚、韩国和泰国等，早已经还清了欠款，很难想象东亚国家会再次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助。拉丁美洲也选择了一条类似但又有所不同的道路，避免未来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依赖。巴西、阿根廷、厄瓜多尔和玻利维亚已经还清了欠款，并明确表示希望未来不再依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深层问题在于，其运营和资金都由发达国家所操控，但其资助的对象在2011年的欧元危机之前却大部分都是发展中国家。其借贷的政策也是以西方的意识形态为基础，因而受到发展中国家的广泛抵制。因此，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不再指望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中受益，早在西方金融危机之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为借贷方的作用就在不断降低。此外，在危机之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可资利用的资金总额也已不断减少，相对于中国等东亚国家的外汇储备，甚至显得有些可怜。在西方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某种程度上获得了重生：其所募集的资本有所增加，其作为借贷方的作用再次提升。但这也主要是对欧洲国家（特别是中东欧国家）以及为希腊、爱尔兰、葡萄牙纾解民困的欧盟而言。毫无疑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作用和资源已经受到了严格的限制，过去的荣光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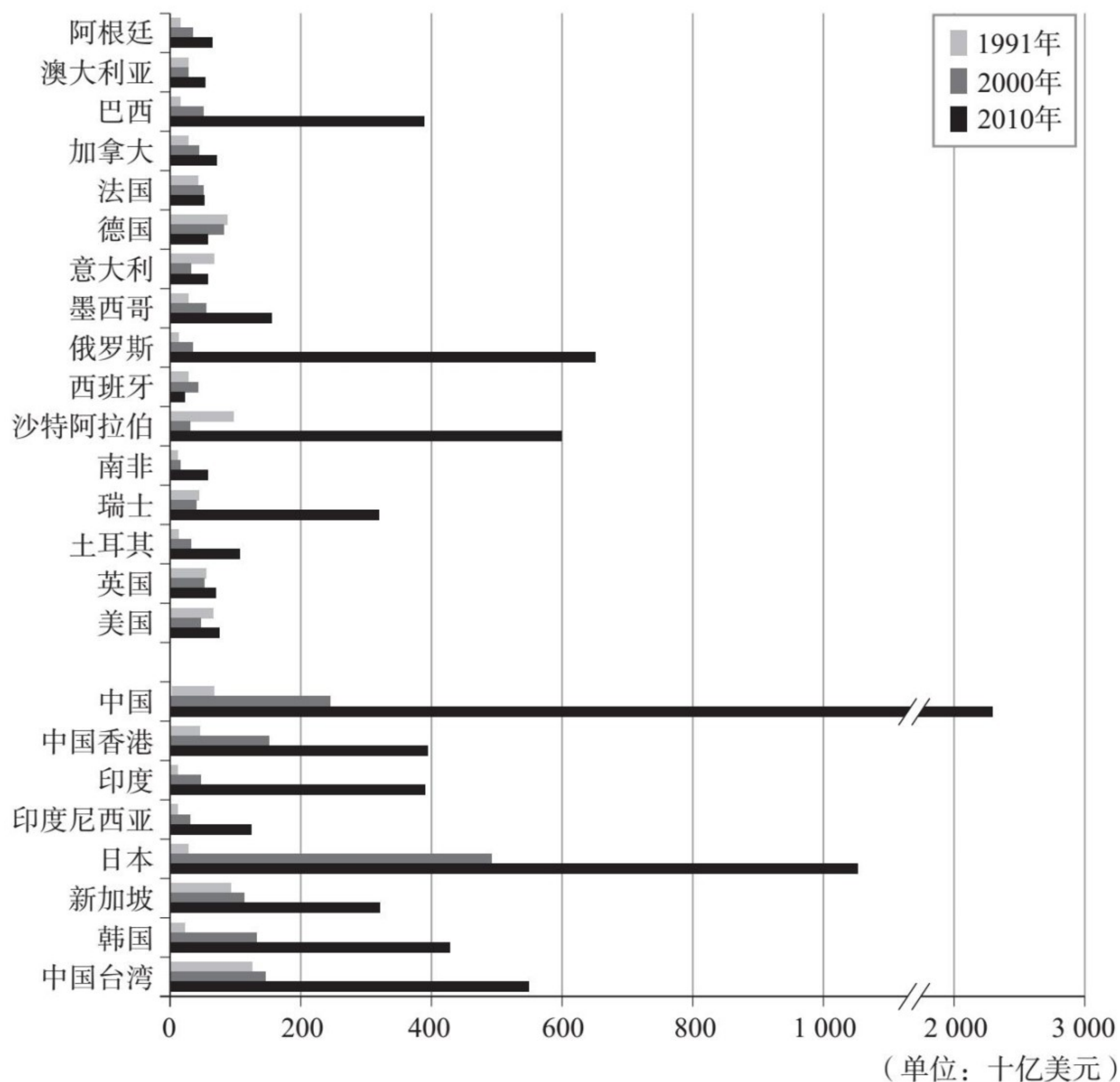


图9–19 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东亚外汇储备的增长

数据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让我们再将目光投向世界银行。随着中国金融实力的扩展，其对外借贷和提供援助的能力已获得了显著提升。正如我们此前对非洲进行的分析所显示，中国对非的借贷额已经超过了世界银行，实际上很多地区均是如此。根据《金融时报》的调查显示，2009~2010年间，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贷款总额已经超过了世界银行。特别是在此期间，仅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与发展中国家政府和公司签署

的信贷协议金额就至少有1 100亿美元，而同期世界银行向发展中国家政府和公司提供的贷款总额为1 003亿美元。换句话说，就对发展中国家的资助而言，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的作用已经远超世界银行。与此同时，随着多哈回合贸易谈判的失败（印度与中国也要负上一定责任）以及与东盟相关的各种机制的逐渐盛行，世界贸易组织的作用也远非10年之前贸易自由化处于鼎盛时期可比。始于2000年的东亚贸易自由化进程，其作用已经超过了世界贸易组织，而中国通过各种与东盟相关的机制，在其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前国际经济体系另一机制G7集团，则更形象地说明了国际体系的意义已经逐渐减退，甚至已经过时了。奇怪的是，2009年以前，该组织一直都未接纳中国成为其成员国，这也说明G7还不能完全代表全球经济，其合法性也越发受到质疑。2008年秋，当全球经济有可能面临1945年之后最严重的大萧条之时，这种情况更是得到了有力的说明。值得一提的是，参加此次对全球经济进行讨论的会议的不仅是原本的G7成员，而是由布什总统召集在一起的一个被称为G20的松散国家团体，这个团体不仅包括富裕的发达国家，也包括类似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印度尼西亚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在这样一个重要时刻，此举也表明发达国家已经不能再随心所欲地施加自己的影响了，要想使行动有效，有影响力的发展中国家的参与是必不可少的。此后，G7也失去了作为全球机制的可信性，现在已经没有什么效用了，当然可能对一小部分原有的发达国家来说除外。

中国的崛起和美国的衰落是全球经济衰退和国际金融体制陷入困境的核心议题。尽管自金融危机以来，国际社会已经下了相当的气力缩小盈余国和赤字国之间的差距，但却没能认识到其深层次的问题并非在于实现短期的收支平衡，而是全球经济重心从美国向中国的长期的根本性转移。基于储蓄习惯和出口策略，中国已经是一个规模庞大的债权人，而美国由于习惯消费和进口产品而成了一个规模更庞大的债务人，这也充分反映了中美之间经济力量平衡的深刻转移。美国消

费的繁荣依赖于中国通过购买美国国债而借钱给美国的意愿。当前美国仍处于经济发展无力的状态，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仍依赖于中国乐于继续购买美国国债的意愿，即使从中国方面来看由此得来的回报率没有多大的意义：一个发展中的贫穷国家完全可以用这些资金做更有意义的事情，这也是如今在中国正公开讨论的话题。但是，正如我在前面探讨过的，中国人已经陷入了“第22条军规”的怪圈：如果他们开始出售美国国债，或者暂停购买，美元就会大幅贬值，而他们手中持有的美元资产也会贬值。因此，位于当前中美关系核心的好像就是一纸浮士德契约，无论是就经济上和政治上而言，都是无法长久持续下去的。美国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和美元作为占支配地位的储备货币都依赖于中国全力而长久的支持。当前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本在于美国无法继续充当国际金融体系的支柱，这就是为什么当前的全球金融危机会如此积重难返，它与20世纪30年代的情况颇有些类似：当时英国无法维持其独一无二的金融地位，而美国还没有完全取而代之。正如1929年之后一样，我们实际上不断地从一场危机迈向另一场危机，首先是2008年西方（特别是美国）银行体系的崩溃，随后是主权债务危机（主要发生在欧洲），随后可能又是一场银行危机，汇率问题的日趋紧张，资本管控，保护主义有所抬头，美国主权债务危机苗头初现，随后又是美元贬值……直至一个全新的国际金融体系出现，替代现有的危机四伏、饱受质疑的体系。世界银行在2011年发布的一个报告预测，美元的统治地位将会于2025年之前终结，为美元、欧元、人民币三足鼎立的货币体系所取代。

就长期来看，解决当前美元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所面临的危机，最为可行的办法就是人民币作为一个主要的国际货币，并最终成为储备货币，取代美元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中国政府对于西方金融危机最为重要的回应之一就是开始谨慎地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但这一进程无疑是任重而道远，至少要持续10年之久。人民币目前还无法与美元全面抗衡的最主要的原因在于，目前为止人民币还无法自由兑换。而中国政府对于推动人民币自由兑换一事十分谨慎，因

为其可能会对中国的经济造成负面影响，而保持经济发展仍是其重中之重。

与此同时，随着中国及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实力的提升，美国、欧洲将不得不对现有的国际体系、国际机制进行调整，以适应发展中国家的需求与愿望。当然，正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G7集团对于改革的踯躅不前所显示的，美国和欧洲对改革还有很大的抵触。其根本原因在于其内心深处始终希望能够维护现有的可以促进西方利益和价值观的国际机制，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例如，在2008年7月，中俄联手否决了英美提出的对津巴布韦总统罗伯特·穆加贝（Robert Mugabe）及其政府的部分成员进行制裁的提议之后，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扎勒米·哈利勒扎德（Zalmay Khalilzad）表示，俄罗斯的立场“让人怀疑它还是不是可信赖的G8集团的伙伴”。2011年所发生的事件则更具有说服力。在多米尼克·施特劳斯·卡恩（Dominique Strauss-Kahn）曝出丑闻辞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职务之后，欧洲国家就迫不及待地提名一个欧洲人——法国财政部部长克里斯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作为继任人选，尽管在2007年卡恩上任之时欧洲国家曾强烈建议下一任领导人选择一位非欧洲人士。发展中国家也表示强烈不满，要求由一位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出任此职（金砖国家还发表声明对自1947年以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必须由欧洲人担任这一惯例表示谴责）。2010年秋，历经种种磨难，各方终于达成协议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重大改革。美国不顾欧洲的反对，接受了削减欧洲投票权的提议。欧洲不得不将其在执行董事会中所占的名额由8个削减至6个（执行董事会共有24个名额），同时新兴经济体（主要是中国、印度）也增加了6%的投票权。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已经名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十大股东之中。尽管实施了种种改革，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仍远不能代表全球经济发展的现状。美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投票权虽有小幅减少，却仍占17.67%之多，也保持了对组织中关键性决议的否决权（关键性决议仍需要获得85%的同意）。中国的经济体量已经超过了日本，相当于美国的1/3，但却只有3.65%的投票权，

而日、美两国的投票权则分别为6.01%和17.67%。在同年的早些时候，即2010年春，世界银行将发展中国家的投票权提升了3.13%，提升至47.19%（中国的投票权由2.77%提升至4.42%）。这些都表明发达国家已经做好准备向发展中国家做出重大妥协，而力度是否够大还尚待观察。2009年时任中国总理温家宝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国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资金的数额将取决于投票权改革的结果：随后中国向其注资500亿美元，这一数额虽然不少，但也仅是一般而已。

美国国际关系学者约翰·埃肯伯里认为，“因为以西方为核心的体系是开放、统一而且是基于规则和章程的，它有着宽泛而又深厚的根基，所以它很难被颠覆，但体系外国家要想加入也很容易”。此外，他还表示：“现有的国际秩序实际上已不是一个美国的秩序或西方的秩序，而是一个以持久有效的经济、政治规则和机制为深刻基础的国际体系。”也就是说，它比以前的体系更为包容、更加灵活，适应性更强。因此，它更有可能从内部进行改革，而不是被取代。现有的国际体系并非一个基于抽象的、普世利益的中立产物，美国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也远非公正无私、不偏不倚：实际上，美国利用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主导地位获得了无数的利益。美国坐拥世界最主要的储备货币，可以承受巨额的贸易赤字，因为那些向美国出口的国家，特别是东亚（包括中国），迫切地想获取美元作为外汇储备。因此，美国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独断行事，例如滥发钞票（正如其2010~2011年间重回量化宽松一样），操控巨额的贸易赤字（实际上美国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就已经出现了贸易赤字，自80年代中期开始赤字额越来越大），这是其他国家无法复制的。正如我们所见，美国通过独一无二的否决权主导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甚至还将继续主导下去。此外，对于美国的跨国公司来说，在进行贸易时无须产生货币兑换的成本，这也令其从中受益。美国的优势地位同样也令其在政治上受益颇丰，其他国家为了获取美元，也愿意对美国的要求做出让步，无论条件有多么苛刻。现有的国际经济体系可能具有国际性和包容性的特征，但它却清晰地反映了美国的实力，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按照美国的

意愿行事（鉴于美元的地位和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中的影响）。

鉴于美国以上的优势，在美国衰落之后，现有的国际经济体系将无法继续维持，至少从长期来看如此。就中期来看，相较于现有国际经济体系的延续，从现有的趋势来看，更可能会出现一个“双轨”的进程：一方面，在面对中国和其他国家挑战的背景下，现有的以西方为核心的国际体制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甚至可能包括世界贸易组织，虽不情愿但也不得不进行某种程度的、渐进的变革；另一方面，由中国以及其他新兴国家（例如印度和巴西）发起、支持的新体系即将走上历史的舞台，其很可能利用现有的机制（如金砖国家集团）等作为载体。2008年7月，林毅夫成为世界银行的中国籍首席经济学家，这就是一个从体系内进行变革的很好说明，因为在以前这个职位一直为美国人和欧洲人占据。近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代表权的改革则是另一例证。换句话说，中国很可能同时在“体系内”和“体系外”进行活动，在谋求对现有体系进行改革的同时，创建全新的、甚至是以中国为核心的国际机制。因此，中国在继续支持世界银行的同时，将积极拓展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在发展中国家的作用。与之相似，中国在继续支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同时，也将力挺东亚的《清迈协议》（中国出资384亿美元，占总份额的1/3），同时扩大向世界各国包括深陷债务危机的南欧国家的援助。世界贸易组织就是这一双轨进程的有趣例证。在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谈判停滞不前的同时，在世界贸易组织的框架之外，多边或双边的贸易协定不断结出硕果。正如我们在前文所见，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东亚的贸易协定，而在此进程之中，中国无疑是最为重要的单一行为体。这些各种各样的全新机制以及未来还将出现的新机制，终将替代现有的国际机制。替代的方式则可能与G20替代G7的过程相似，后者虽然继续存在，但也只是名义上的。

相较于机制的变化，美元的衰落及其最终为人民币所取代的影响将更引人注目（而在此之前，一定会有各种过渡方案）。这无疑标志着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的消亡以及中国主导的国际体系的崛起。美国势必会强烈抵制其从中获益如此之巨的国际体系的衰落，因此，任何变革都很可能将是漫长而又充满冲突的。正如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霸权不得不让位于与其竞争的美元区和法郎区一样，美国的霸权地位也有可能被替代，至少首先会面临着地区势力范围的激烈竞争。随着中美间实力的天平开始确定无疑地向中国倾斜，世界可能因此划分为美国势力范围和中国势力范围，比如，东亚和非洲得到中国的庇护，成为人民币区的一部分，而欧洲和中东仍然处在美国的保护伞之下。但这只是一种推测，这样的一种巴尔干化进程也可能不会发生。即便真的发生，从长远看，这种格局也不可能稳定持续，尤其是在世界融合程度如此之深的全球化时代。此前我所提出的假设出现的可能性更大，即出现一个由中国构建和主导的、全新的全球金融体系，人民币则取代美元成为主要的外汇储备货币。

至此，我们可以将目光转回当下，探讨一下人民币国际化的问题。大体上来讲，人民币的崛起离不开两方面的因素：人民币的贸易结算和储备货币的地位。实现人民币的储备货币地位，至少需要10年之久，因为其要求人民币可以自由兑换。然而，人民币在贸易中的使用，已经开始并越发广泛。直至不久之前，尽管中国身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制成品出口国要和最大的外汇储备国，但在国际贸易中却很少使用人民币结算。原因很简单，即中国的资本控制及其对现金贸易的严格限制。然而，中国政府已经转变了立场，决定开启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其迈出的第一步就是鼓励贸易以人民币结算。至2010年6月，中国已经将其试点了一年的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扩展至所有境外国家和国内20个省市，因此所有的进出口贸易都可以以人民币结算。然而，离岸市场则需要就此为相关国家和企业提供人民币离岸业务。随着中国同意在中国香港设立人民币离岸市场，人民币离岸业务也就成为可能。随后，中国政府同意允许一小部分投资者（包括

外国的央行）有限度地进入其在岸债券市场。马来西亚央行是第一家将人民币作为其外汇储备的外国央行，此后范围不断扩大，现在连印度央行也加入其中。韩国央行已经投资3 7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在中国大陆购买人民币资产，以摆脱对美元的过度依赖。

结果令人印象深刻：2010年6~11月期间，以人民币进行结算的贸易总额达到了3 400亿元，而一年多之前这一数字却是零。越来越多的西方跨国公司，如卡特彼勒、诺基亚、宜家和麦当劳，已经试水人民币结算，这对中国企业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避免使用美元可以帮助其减少货币兑换的手续费、降低外汇兑换风险。与此同时，汇丰、摩根大通、渣打等主要银行也迅速建立了相关体系处理世界范围内的人民币交易。中国香港是人民币离岸业务的中心。大部分的香港居民都坚信港币未来必须与人民币而非美元挂钩。几乎所有的香港民众都认为人民币将会升值，而美元则将贬值。人民币热已经席卷了香港这块英国的前殖民地。为了提升人民币的可利用性，自2008年12月以来中国央行——中国人民银行先后与阿根廷、印度尼西亚、冰岛、韩国等八个国家签署货币交换协议，总金额达8 000亿人民币。从目前来看，人民币贸易结算将可能首先在东亚实现，中国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日本和韩国等地的需求已经十分强烈，随后则会拓展至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2010年，汇丰银行估计在未来三到五年内，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中至少有一半将以人民币结算，总额达2万亿美元，这将使人民币成为仅次于美元和欧元的第三大全球贸易货币（地位甚至高于日元）。同理，在同样的时间内或更长一段时间，中国取代美国成为亚洲内部贸易的主要结算货币，也是有可能的。然而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却与众不同：此前英镑和美元的国际化都是由市场驱动的，而人民币的国际化则主要由政府主导。

在未来5年左右的时间里，人民币无疑将实现高度的国际化并成为主要的贸易结算货币之一。在未来10年之内，人民币的作用甚至可以超过美元。当然，只有在放松资本管制和发展中国资本市场的前提

下，人民币才能成为一个主要的储备货币，但我们仍可较为清楚地见证这一过程，同时我们应注意到中国政府决不会容许任何危及国内经济发展的举措。

---

1. 1英里≈1.609 4千米。——编者注
2. 泰米尔猛虎组织为斯里兰卡的反政府武装织组。——编者注

第10章
当中国引领世界

在未来20年、5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后，世界将会怎样？未来的确不可预知，但在本章中，笔者仍试图努力勾画出未来的主要特征。毋庸讳言，这些对于未来的描绘完全基于推测，所依据的一些假设也可能会被历史无情地证明是大错特错。

在所有假设中，最根本的一条就是中国的崛起势不可挡。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也将有所放缓，实际上这一势头已经出现。正如我们在第5章中所论及，中国现在正面临着从高度依赖高储蓄率以支撑其巨额投资的出口导向型、劳动密集型经济向减少对出口和投资依赖、更为依靠内需的创新型、资本密集型经济转变的挑战。在2010年所发表的一篇理性的文章中，经济学家余永定对当前发展模式的弊端进行了睿智的批判，指出重要的经济改革势在必行："中国已经来到了一个关键的节点——如果不进行痛苦的结构性调整，其经济发展的势头将一去不复返。"虽然其所担心的态势发生的可能性极小，但毫无疑问的是，中国所急需的变革无疑将使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下降至更为可控的7%~8%左右。外界经常有人揣测中国将会如20世纪80年代末的日本一样遭遇同样的发展放缓，然而两者的外部环境截然不同。当时，日本的经济已经相当发达，是世界最发达的国家之一；而中国总体而言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均GDP仍然较低，因此鉴于中国后发型经济的特征以及还有数亿人需要实现城镇化的事实，中国的经济发展无疑将会持续相当一段时间。实际上，中国的人均GDP还需要25年才能赶上日本经济泡沫破裂之前的水平。在10年之后，随着中国经济的日渐成熟，其经济发展速度也将不断下降，保持在5%左

右。此外，正如我们在第5章所探讨的，中国的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越来越多中国民众将依赖于日益发展的社会服务。中国经济增长率的下滑将不可避免，但这并不会影响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此外，在这一漫长的时期内，中国也很可能会出现重大的政治变革。然而所有上述假设都无法削弱作为本章基石的基本论断，即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增长（尽管增长率有所下降），中国注定要成为两个世界主要大国之一，并最终独领风骚。能否推翻这条假设，取决于中国是否会像历史上一样，因为某种原因经历一场21世纪版的间歇性内省和混乱。这似乎可能性不大，但考虑到中国的统一在两千年的历史中有一半以上的时间遭遇困境，我们也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

作为本章基础的假设是，中国将日渐强大，并在半个世纪后甚至更短的时间内崛起为世界领袖，至少在很多方面如此。当使用“中国统治世界”这一表述时，笔者当然并非取其字面之意，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在曾经或未来“统治世界”。这只是一种比喻：中国成为世界的主导力量，像美国及此前的英国一样享有全球的霸权。有趣的是，国际社会普遍认为这个预测很可能实现。举例来说，如表10－1所示，大多数印度人相信中国在未来20年内将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的主要力量，而美国和俄罗斯赞同此观点的人数则与反对者不相上下。

表10–1 各国关于中国是否以及何时将取代美国成为世界霸主的观点

	多长时间内发生			不会发生	不知道
	10 年	20 年	50 年		
	%	%	%	%	%
印度	32	24	9	24	12
美国	11	22	10	47	9
俄罗斯	10	17	13	45	15
日本	7	19	13	59	3
中国	4	13	20	34	29

数据来源：皮尤全球态度项目

令人吃惊的是，居然有不少人认为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与美国不相上下，甚至可能更胜一筹（见表10－2和表10－3）。在2010年春举行的皮尤全球态度项目调查中，相信中国经济已经超越了美国的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俄罗斯人和日本人居然占了多数，要知道事实恰恰相反。甚至在高盛公司于2007年所发表的报告中，高盛公司也仅是预测到2027年，中国的GDP总量才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此外，各国民众对待中国的态度总体相对友好，绝大多数国家的民意测验均显示其对中国的态度较为友好，特别是美国、俄罗斯、中东国家、拉美国家、非洲国家，其中又以非洲国家为最（见图10－1和表10－4）。鉴于中国经济在过去的30年中大约每7年就翻了一番以及由此带来的生活水平的显著提升，中国对其经济现状极为满意也就不足为奇了，而且其满意度自2002年以来一直稳步提升。实际上，中国人对本国经济状态的满意程度要远远高于相较于其他国家的受访者。

当中国开始逐渐成为全球大国，其持续增强的实力将以什么形式呈现？换句话说，掌握全球主导权的中国将是何种面貌？其将具备何种程度的力量、如何作为？当然，中国并非决定这些问题答案的唯一

变量，现在不是，未来亦是如此。实际上，还有其他两个重要因素对未来中国主导的世界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第一个因素与美国有关，美国衰落的速度到底有多快？面对中国崛起的挑战，美国自我调整的能力越强，其就越具有弹性。在此种情况下，美国将继续成为对中国崛起的制约。另一方面，如果美国无法甘心接受其衰落的现实，自欺欺人，沉浸于过去的荣光无法自拔，导致国内政治极化这一令人绝望的局面继续持续，缺乏有效的领导，那么其衰落的速度就要快得多。此外，正如我在后记中所要论及的，随着世界其他国家越发认识到美国霸权的衰落并以此作为其行动和决策的重要考量，那么美国的全球影响力的衰减速度无疑也将加快。此外，虽然其影响力没有美国大，但我们也不应忽视欧洲和日本持续衰退的速度，因为这也将对中国霸权的外延产生重要影响。

表10–2 美国仍被视为全球经济的霸主

	谁才是你眼中的世界经济霸主				
	美国（%）	中国（%）	日本（%）	欧盟（%）	其他（%）
美国	38	41	8	6	7
英国	38	44	5	8	6
法国	41	47	5	7	0
德国	18	51	8	19	4
西班牙	40	34	12	8	5
波兰	44	27	9	10	11
俄罗斯	23	27	25	9	16
土耳其	69	12	4	5	10
埃及	42	37	12	7	1
约旦	30	50	13	6	0

黎巴嫩	26	36	10	13	12
中国	45	36	2	6	11
印度	60	11	7	10	12
印度尼西亚	49	20	18	7	6
日本	40	50	2	4	3
巴基斯坦	53	21	3	1	22
韩国	77	15	1	5	3
阿根廷	43	24	12	10	10
巴西	51	18	13	5	14
墨西哥	53	22	9	8	9
肯尼亚	61	20	7	6	6
尼日利亚	55	27	7	5	7

数据来源：皮尤研究中心，2010年

表10–3 将中国视为全球霸主的人数也不断上升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美国	26	33	41
德国	30	28	51
法国	31	35	47
西班牙	24	22	34
英国	29	34	44
波兰	15	18	27
俄罗斯	12	26	27

土耳其	7	9	12
约旦	31	29	50
埃及	27	25	37
黎巴嫩	22	32	36
日本	19	21	50
巴基斯坦	18	26	21
韩国	15	12	15
印度尼西亚	15	17	20
印度	12	14	11
中国	21	41	36
墨西哥	17	16	22
阿根廷	13	27	24
巴西	–	–	18
尼日利亚	23	18	27
肯尼亚	–	13	20

数据来源：皮尤研究中心，2010年

表10–4 对华友好的民众比例

	2002 年（%）	2005 年（%）	2006 年（%）	2007 年（%）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美国	–	43	52	42	39	50	49
英国	–	65	65	49	47	52	46

法国	–	58	60	47	28	41	41
德国	–	46	56	34	26	29	30
西班牙	–	57	45	39	31	40	47
波兰	–	37	–	39	33	43	46
俄罗斯	71	60	63	60	60	58	60
土耳其	–	40	33	25	24	16	20
埃及	–	–	63	65	59	52	52
约旦	–	43	49	46	44	50	53
黎巴嫩	–	66	–	46	50	53	56
印度	–	56	47	46	46	46	34
印度尼西亚	68	73	62	65	58	59	58
日本	55	–	27	29	14	26	26
巴基斯坦	–	79	69	79	76	84	85
韩国	66	–	–	52	48	41	38
阿根廷	–	–	–	32	34	42	45
巴西	–	–	–	–	–	–	52
墨西哥	–	–	–	43	38	39	39
肯尼亚	–	–	–	81	–	73	86
尼日利亚	–	–	59	75	79	85	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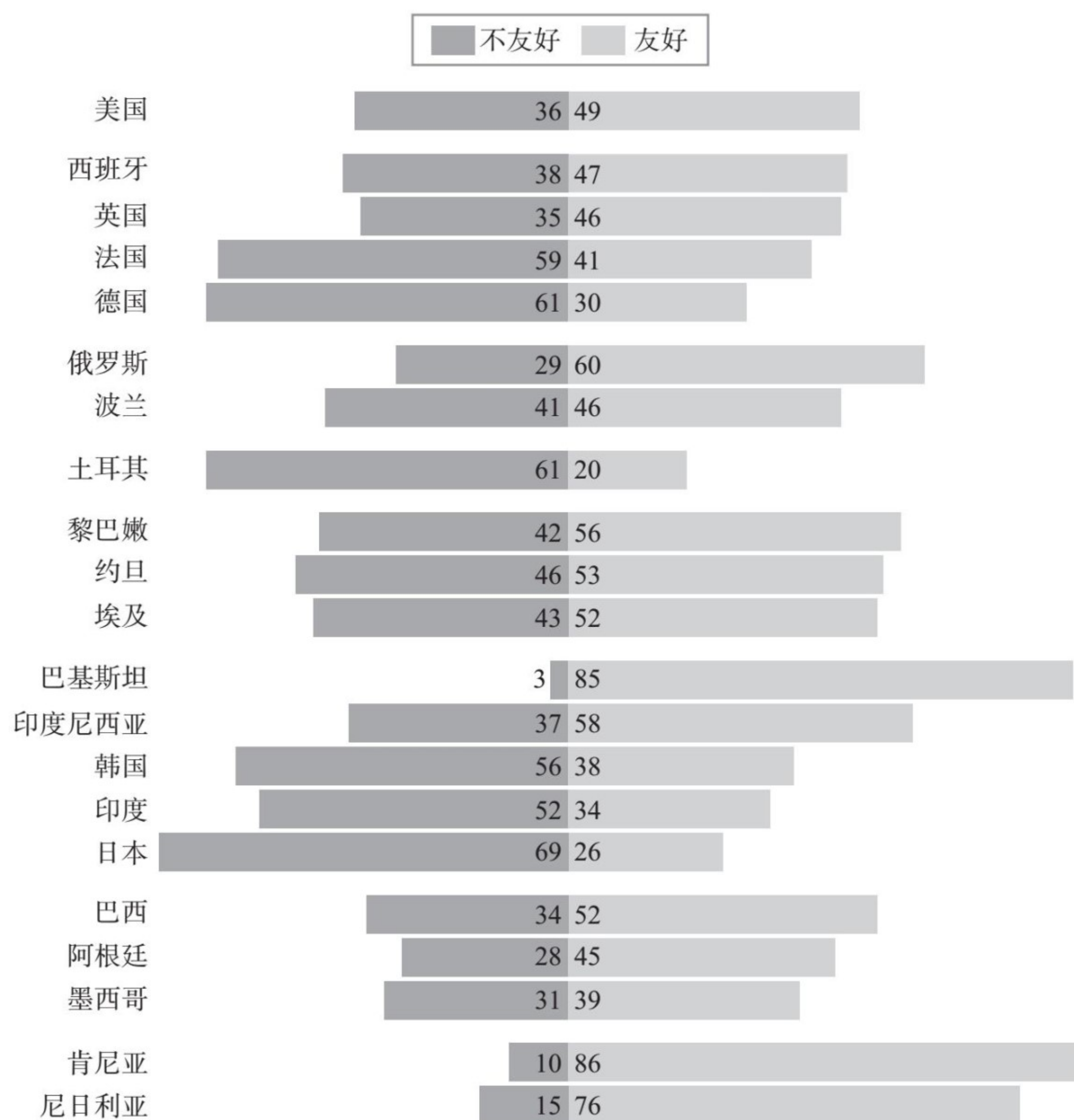


图10–1 民众对待中国的态度

数据来源：皮尤研究中心，2010年

第二个因素则是与新兴的发展中大国有关。我们正在进入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首先想到的就是印度，此外还包括巴西、印度尼西亚、墨西哥、南非、土耳其等其他国家）财富、实力和影响与日俱增的世界。目前，发展中国家的GDP已经占全球GDP的一半，在未来的25年内，其比例还将继续大幅增长。中国与主要发展中国家之间的

关系也是决定中国主导地位外延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就与新兴发展中大国的关系而言，印度是其中的关键。印度的人口规模与中国相当（人口结构则更为年轻），近年来经济增长也同样迅速，其具有成为中国重要的、长期的战略对手的潜力。但就经济发展程度而言，印度与中国尚不可同日而语，政府则效率低下、腐败重生，同时也深受社会高度不平等之苦，面临着国内政治派别开展的游击战的挑战（受影响的主要是南部和东部地区，相当于印度国土总面积的40%）。就种种因素来看，我们不能理所当然地认为印度将紧密跟随中国发展的脚步，然而，其充当一个中国制约者的角色还是绰绰有余的。除印度以外，我在上文中所提及的发展中国家中，没有一个能够与中国相提并论，但其却可以成为地区强国，迫使中国不得不与其合作并限制中国在相关地区的影响。作为中国当前实力的晴雨表和未来发展趋势的指示器，中国在金砖国家集团（金砖国家包括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以及最近在中国力挺之下加入的南非）内部的主导地位日趋明显。目前，对华贸易占据了其他金砖国家对外贸易总额的12%，比2000年时高了6倍。而其他4个成员国相互之间的贸易仅占其对外贸易总额的3%，这一数据在过去的10年中几乎没有变化。简而言之，中国正在迅速提升其相对于其他金砖国家的领导力。与当前和冷战时期相比，我们的确正在走向一个更加多极化的世界，但多极化的程度与方式，我们现在还不得而知。

我们探讨未来时，的确可以以史为镜，就中国未来崛起的性质与程度获得一些启示。过去200年里，出现过两个世界霸主，分别是1850~1914年的英国和1945年至今的美国。由于美国这个例子更具时效性，因此美国的经验虽并非模板，但也可作为参考，有助于我们体会和理解“中国治下的和平”，包括其将会有何种差异。那么，美国全球霸权具有怎样的特征呢？

- 全球最大的经济体。

• 人均GDP最高的国家之一。

• 世界上科技含量最高、最具创新性的经济体，以硅谷为典型代表，在研发上保持了高额投入。

• 拥有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以海空力量为基础，可以对全球任何地区施加影响。

• 全方位的世界影响力意味着美国是影响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制定决策和确定立场的一个关键因素。因此，从英国、以色列到墨西哥，甚至包括中国，各国的主权不同程度上都受到限制。

• 国际经济体系主要由美国设计并定型，其规则现在在很大程度上仍由美国制定。

• 拥有绝大部分全世界顶尖的大学，长期以来一直吸引着全球最出色的精英。

• 英语成为全球通用语言，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的影响力和吸引力。

• 好莱坞在全球电影市场上居主导地位，电视方面亦是如此，但程度上无法与电影相比。

• 美国知名企业，例如谷歌、微软、可口可乐和沃尔玛，正在占领其他国家同类产品市场，很多公司的业务已经遍及全球。

• 美国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纽约则是事实上的世界之都。

• 美国历史已是世界文化的一部分，全世界都熟知其历史上的一些重大事件，尤其是《独立宣言》、南北战争、西部开拓精神；一些风俗，从感恩节到万圣节，经常引起全世界的共鸣。

• 美国价值观，例如个人主义、民主、人权、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市场至上主义、自由和边疆开拓精神，极大程度上畅行世界。

·美国的霸权不可避免地与白种人的全球主导地位联系在一起，暗含了一种松散的以种族为基石的世界等级制度，在该制度下，其他种族处于从属和受支配地位。

然而，即使是美国这个历史上影响力最大的国家，其自视甚高的国力也绝非不受约束。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所阐述的“霸权”概念（应将其与中国人对该术语的运用区分开来，后者完全为贬义），涉及强制和认同、武力和领导等复杂的互动。尽管这个概念最初用来解释社会内部权力的自然状态，但也可以用于国际关系领域。葛兰西的理念与约瑟夫·奈提出的硬实力和软实力之间的差别有些相似，虽然后者本质上概念性较弱、更加注重分类。霸权绝非处于稳定状态，而是时刻受到挑战和重新界定；权力的平衡从来都不是静态的，而是时刻在变动。霸权也并非是绝对的。即使美国掌握的军事力量几乎和世界其他国家的总和相当，也并不意味着它可以随心所欲，例如对伊拉克的占领就是灾难性的。此外，正如我们所观察到的，在掌握军事霸权的同时，美国的经济优势却在逐渐消退。尽管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的政治军事超级大国，其在不同领域、不同地区的影响也是有差别的，某些情况下甚至受到极大的限制。以体育这个不太贴切的领域为例，虽然美国通常在奥运会奖牌榜上位居榜首，但在很多项目上不占优势，还有一些项目实际上是缺席的。除了篮球以外，美国人最喜爱的运动的影响力大体上仅限于美国。迄今为止，全球最受欢迎的运动是现代足球，起源于欧洲。与此相似，尽管美国在快餐市场上占有至关重要的份额，但美式烹饪技术对世界的影响微乎其微，甚至可以说完全没有。

那么，中国又会怎样？与美国的情况相同，中国式的全球霸权也将是中国特征的体现，其中既有传统特征，也包括现代特征。接下来我们的任务就是明确这些特征以及其对未来产生影响的方式。当然，霸权的形式将随着文化、技术、政治和经济上的更广泛变化而持续变

换。例如，在欧洲人建立霸权的时代，政治统治的特有方式是殖民主义，军力投放的主要形式是海军。但1945年后，殖民主义因为多种原因土崩瓦解。与之不同，美国时代是与其空中力量、军事基地的全球网络、强大的军事优势、松散的帝国、国际经济体系的主导地位和全球性媒体相联系的。因此，我们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对与未来中国霸权密切相关的新型“现代性”加以预测。

中国历史的深远影响

迄今为止，世界历史本质上就是一部西方史。然而，随着中国的崛起，状况将得以改变。熟悉中国历史的将不再只是中国人或者说东亚人，而将是全世界。正如全球很多人熟知美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一样（因为早期欧洲霸权的影响，欧洲历史受到同样的礼遇，全世界都知道法国革命、启蒙运动、工业革命和文艺复兴），中国历史上的关键事件也会为全球所熟知。这一进程已经在进行之中，2007~2008年大英博物馆举办的“兵马俑展”引发的异乎寻常的热潮就佐证了这一点。当然，中国历史的宏大与丰富意味着其中有些部分（例如长城）已为世人熟知。但在未来，世界对中国历史的了解将远远超出当下。2005年，中国的典型象征之一——万里长城吸引的游客数量已经超过欧洲文艺复兴的发源地佛罗伦萨，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世界对中国历史的热情。

除了历史悠久、发明众多之外，中国历史最引人注目的特点就是：当欧洲随着罗马帝国的灭亡而分崩离析、最终分裂成许多国家之时，中国却已朝着完全相反的方向前进，迈向了统一的征程。正是这种统一确保了其文明的连续性，并为中国的特性和影响提供了至今仍十分重要的疆域规模。纵观中国历史，“统一”即便不是最为根本的主题，也必定是其中之一。如果说过去两个世纪，历史（欧洲的，乃至世界的）讲述的是欧洲的故事、应用的是他们的观念，那么或许新

世纪中国将扮演极为相同的角色，为世界提供大相径庭的故事和理念，也就是：统一而非分裂的思想、文明国家而非民族国家、朝贡体系而非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和殖民主义、独具特色的中国式种族观念、有组织的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互动而非现代化与保守主义的互动。鉴于其对中国统一的标志性意义，公元前221年——这一年标志着秦国的胜利、战国时代的结束和现代中国的开始——将和1789年或1776年一样为世界所熟悉。中国第一位皇帝秦始皇不仅将兵马俑留给后人，而且创建了一直延续到1911年的王朝体系，他将和托马斯·杰弗逊或拿破仑·波拿巴一样广为人知，甚至可能更为知名。

中国历史中的很多其他方面也将会对现有的全球理念产生颠覆。例如，有如此之多的发明诞生于中国并被其他地区（起码西方是其中之一）的人采用，这有助于打破现代流行的“历史上西方发明最多”的神话。就此而言，远早于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等伟大的欧洲航海探险家的郑和南下西洋，无疑是对世界正本清源的典型例证。人们公认，乘坐着比同时代的欧洲船只大得多的巨舰，郑和在15世纪早期就已进行了7次航海之旅，到达了今天的印度尼西亚、印度洋和非洲东海岸。瓦斯科·达·伽马和哥伦布这样伟大的欧洲探险家的航海标志着欧洲长期的对外殖民时代的开始。但对中国来说，却是另一番情形，郑和下西洋从未产生这样的结果。明代中国甚至也没有类似于海军部这样的机构，因此正如历史学家爱德华·德雷尔（Edward Dreyer）指出的那样，“即使在郑和下西洋时期，当时的中国既没有兴趣讨论海权或远洋战略，也不曾运用所谓的此后海军理论家提出的所谓‘制海权’”。实际上，郑和的航海并未延续下去：它被证明是明代海上远航的谢幕之举，此后中国再次进入闭关锁国时期。郑和的任务不是为了殖民，也不是为了考察，如果是为了这样的目的，中国自然还会重复下去。他们肩负着弘扬中国影响力的使命，目标也非常传统，即在已知的世界里扬中国之威、立中国之名。中国人的兴趣不在于探索未知的地区，而是想让已知世界的人们了解中华帝国的存在和伟大。尽

管意义已远远超出原来预想的目标，但郑和下西洋所反映的仍是朝贡体系的理念。

历史总是被不断加以新的诠释，不断地在现实的背景下被重新解读。鉴于郑和七下西洋的超凡本质以及此后欧洲掠夺的场景仍历历在目，郑和远航的目的和影响招致诸多猜测，这也不足为奇。在再次寻求与东南亚国家建立更加紧密联系的背景下，中国近期在东盟国家赞助举办了数场纪念郑和下西洋的展览。这一举动是可以理解的：随着中国再次将目光投向海外，中国会对其最近一次这样的壮举进行回顾并提醒世界不要忘记。英国历史学家加文·孟席斯（Gavin Menzies）的研究更进一步，认为最早是中国人于1421年发现美洲大陆，而且还发现了澳大利亚。尽管几乎没有确凿的证据，但中国人发现美洲的观点却有不少可资利用之处。2003年中国领导人胡锦涛访问澳大利亚时，在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发表了演讲。演讲中含蓄地表达了对中国发现澳大利亚这一观点的认同："早在15世纪20年代，中国明代的探险船队就曾到达澳大利亚海岸。"当西方历史受到不断发展的中国历史的挑战、中国试图通过宣传其历史来提升大国形象时，类似的论述还可能不断增加。2007年，时任中国驻南非大使曾向非洲民众表示：

> 郑和给到访过的（非洲）地区带来了茶、瓷器、丝绸和技术。他不曾占领过一寸外国土地，不曾掳走一名奴隶。他带给外部世界的是和平与文明。这充分反映了古代中国人民希望与相关国家和人民加强交流的美好信念。这种爱好和平的文化已深深扎根于中国各时代人民的心中。

现在换个更加轻松的话题：有证据表明高尔夫球运动同样起源于中国。明代画家尤求于1368年绘就的《秋宴图》中有这样一幕场景：一位皇宫贵族挥动类似于高尔夫球杆的棍棒击向一个小球，试图将球

打入一个小圆洞中。在中国，这项运动被称为“捶丸”，也可称作“击球”。



节选自尤求所画的《秋宴图》，1368年
图片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

认为许多过去被视为是由欧洲（特别是英国）发明的运动，实际上起源于世界其他地区，这也不无道理：毕竟，英国人有非常多的机会从他们幅员辽阔的殖民地学习各种运动，并制定系统的规则。随着世界正逐渐摆脱西方的主导，此类发现和判断将越来越普遍，毫无疑问，其中一些甚至会得到广泛认同。那些曾经的殖民者从殖民地巧取豪夺了不少文物与艺术品，称其为自己所有，并将其作为珍宝陈列在大英博物馆等地。那些前殖民地希望将这些珍宝完璧归赵的愿望越来

越强，这也不足为奇。中国也是受害者之一。2009年，法国巴黎佳士得公司曾就已故的伊夫·圣洛朗（Yves Saint Laurent）所藏的两件兽首进行拍卖。这引发了中国的强烈抗议。中方表示这两件兽首是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英法联军洗劫圆明园时从中国窃走的。最后，这两件兽首被中国收藏家蔡铭超拍下，但其随后拒绝付款，因此在中国被视为英雄。未来类似的争议定然层出不穷，其中不仅涉及中国，还将包括很多同样认为自己的历史珍宝被窃取的国家。

作为新全球之都的北京

在世纪之交，纽约是事实上的世界之都，全世界对“9·11”恐怖袭击事件的反应最为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假设吉隆坡豪华得多的双子塔遭受同样的命运，有关这场灾难的报道想要占据全球媒体的头条达12个小时并连续数月见诸版面，根本是绝无可能。纽约之所以拥有如此的地位，是因为其是世界金融之都，是华尔街的所在地，还是一个大熔炉和最早的欧洲移民中心。不过，纽约的全球地位很大程度上是1945年以后形成的。1900年第一波全球化浪潮之时，世界之都是伦敦。16世纪，佛罗伦萨可能是世界上最为重要的城市（尽管在那个时代它很难被称为世界之都）。10世纪，中国的开封也许享有类似的地位，尽管当时世界上大部分人对其并不知晓；而在公元元年，世界之都则可能是罗马。再次展望未来，在50年内（当然是在21世纪结束之前），北京将极有可能确立事实上的全球之都的地位。虽然也将面对中国其他城市如上海的竞争，但作为中国首都、中央之国的中心和紫禁城的所在地，北京的候选地位会因为中国成为世界领导力量这一前提而得以确保。

但是北京的地位还不是问题的全部。我们可以设想中国的霸权将涉及至少4个基本的地缘政治变动：首先，北京将崛起为世界之都；其次，中国将成为世界领袖；再次，东亚成为世界最重要的地区；最

后，亚洲将担当世界最重要大陆的角色，这个过程还会因印度的兴起而加速。这种多重变动将引发全球中心（至少是象征性的中心）的迁移。一直以来，全世界都习惯关注西方，先是欧洲，后来是美国，现在这个时代正接近尾声。在谈到时区时，本初子午线位于伦敦，这是英国昔日主导地位的遗产，但以后国际社会将逐渐习惯根据北京时间制定日程。

文明国家的兴起

世界已经习惯于从民族国家的角度出发思考问题。这是欧洲主导时代遗留下来的重大成果之一。没有建立民族国家的民族急切渴望步入这一行列。作为国际体系的最主要的单位和行为体，民族国家获得了广泛的认同。1911年辛亥革命后，中国也不得不将自己定义为民族国家。然而，正如我们所见，中国成为民族国家的时间并不长，而且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在很大程度上中国仍然非常特殊，是一个文明国家。白鲁恂指出：

> 中国不仅仅是一个民族国家，更是一个有着民族国家身份的文明国家。中国现代史可以描述为是中国人和外国人合理将一种文明强行挤压进现代民族国家的专制、强迫性框架之中的过程，而现代民主国家则是西方文明裂变后才发明的制度。

正是这种文明的维度赋予了中国独一无二的特性。中国主要特征中的绝大部分在其试图成为民族国家之前就形成了，是其作为文明国家的产物：统一具有至高无上的重要性、国家的权力和作用、内部凝聚力的特性、大中华理念、中央王国的心态、儒家价值观、种族观念，家族和家族性话语，甚至还包括传统的中医。

到目前为止，政治发展都指向了同一个方向，全世界甚至包括中国都希望按照国际体系已确立的西方模式（即民族国家）塑造国家形态。这种理念在150年来中国试图改变落后挨打的地位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发挥了基础性作用。但当中国不再认为与西方的关系应该是单向的，当它又一次开始相信自己，认为自己的历史文化不仅是一笔伟大财富，而且其中的经验可直接运用于当下，这时会出现怎样的变化呢？实际上，这一过程已经开始了且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越发明显。

这无疑将导致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发生变化：事实上，中国会逐渐认为自己是一个文明国家，而非民族国家，或至少二者兼而有之，其他国家对中国的态度也是如此。正如我们在第8章所提及，东亚已经开始了这样的进程，很可能用不了多久，全球会有更多国家效仿。与殖民主义终结后世界一直按照民族国家理论思考问题不同，未来国际关系的词典里将包含更加多元化的词汇，需要开放更多的空间容纳相互冲突的观念、不同版本的历史和规模不等的关系模式。

朝贡体系再现

自现代欧洲民族国家兴起以来，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就主导着国际关系，成为国际体系理念通用的话语。然而，正如我们所见，随着时间的流逝，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自身也发生了变化，经历过数次反复。尽管如此，这个体系仍保留着内核，从本质上看是一种起源于欧洲、用以令世界服从其权威的理念。因此，世界不同地区在不同程度上都遵循着威斯特伐利亚规范。然而，东亚却并非如此。在东亚地区，朝贡体系的影响和中国的存在，意味着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与已有的社会结构和观念并存，依附于其上。东亚现实的特殊性可用下面这一事实解释：西方大多数关于冷战结束后中国日益崛起所引发的东亚国家关系变动的预测大都以失败而告终。一直以来，国际社会存在一种广泛的预期，即东亚会陷入持续升级的动荡、局势紧张甚至战争状态；中

国的崛起会遭到该地区其他国家的制衡和围堵。但事实是二者都没有发生。1989年以后东亚地区的战争数量远比冷战时期少得多，同时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各国试图约束中国（当然，日本是明显的例外）；相反，大多数国家都将发展对华友好关系视为重中之重，正如朝贡体系存续时一样。这也表明东亚的行为方式与其他地区截然不同，与西方基于自身历史和经验的预期迥异。中国和从属国之间的巨大差距是朝贡体系的基本特征之一，也是其长期特有的“稳定性”的根本原因所在。围绕日益强势的中国所正在构建的东亚新秩序很可能将被证明同样稳定。换而言之，与朝贡体系一样，国家间的巨大差距孕育出了深层次的稳定性，这与欧洲的经验截然相反。在欧洲，实力大体相当的民族国家之间几乎总是兵戎相见，这一状况持续了数百年之久，直至1945年为止。当它们被战争拖累得筋疲力尽之后，却发现欧洲已不再是世界的中心。

未来朝贡体系对东亚的影响将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不相上下，这一观点将不可避免地影响中国看待更为广泛的国际体系的方式。而且，作为世界最重要的区域，如果东亚都按照不同于全球体系中其他地区的规则行事，那么这必将对其些地区的行为和其所依照的规范产生重要影响。也就是说，朝贡体系不仅会塑造中国自己的世界观，在其全球霸权的背景下，还将对国际体系产生更为广泛的影响。正如作家康灿雄（David Kang）所言，冷战结束前，东亚国际关系模式一直被漠视、被边缘化，而今后将越发成为国际社会的主要模式之一。

朝贡体系的两个关键特征是中国与邻国之间在规模上的压倒性差距以及双方对中国优越性的认同和默许。在全球化时代，这些特征——特别是前者，也许会扩展到更大的范围。中国的经济规模和实力优势是如此之大，令其与包括东亚国家在内的很多国家的关系具有深刻的不平等性。其结果是，这些国家很可能将发现自己将高度依赖中国。最明显的例子是非洲，其次是一些拉美国家，例如秘鲁和玻利维亚；换句话说，也就是那些以生产初级产品为主的发展中国家。随着

中国对原材料的需求猛增，越来越多这样的国家将被纳入中国主导的体系之中。在此背景之下，中国和韩国、印度、沙特等国家甚至在海外（特别是非洲）租用、购买农田，以增加食物供给，这一点也值得我们关注。其中，规模最大的案例是在刚果购买了280万公顷的农田用于种植油棕树以生产棕榈油。人们自然而然地认为，中国正与那些国家建立的紧密关系同和西方与相关国家的关系无异，换句话说，只是对西方历史的重复。这无疑是大错特错。尽管有无数的机会可以如此行事，但中国绝不会步西方殖民者的后尘。鉴于双方规模上的巨大差距以及中国的历史经验，从新朝贡体系视角（而非殖民主义或新殖民主义的视角）对中国与相关国家的关系进行审视，无疑更为合适。要判断朝贡体系的另一个关键特征——对中国文化优越性的认同，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作用，难度则更大，尽管从其对中国思想的影响和漫长的历史延续性来看，这个特征无疑将继续对中国的认知和行为产生重要影响。然而，在更广泛的背景之下对上述因素进行考量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崛起的过程中，其他主要发展中国家——例如印度和巴西，也在成长，某种程度上，它们很可能会扮演制约中国力量和行为的角色。

数字的意义

1913年大英帝国鼎盛之时，人口只占世界的2.5%，同期西欧的比例则为14.6%。2001年，西欧占世界总人口的比例下降至6.4%。2001年，美国仍然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而人口仅为世界的4.6%。西方整体——包括东欧和澳大利亚这样的国家，但不包括前苏联地区——的比例为13.9%。与之相比，2001年中国人口占世界的比例为20.7%。当然，不论存在怎样显而易见的共性——历史的、文化的和种族的——将西方世界连接起来，使之成为一个整体，也无法与中国作为单一国家所具备的团结和一致性相比。正确的比较是将中国占世界

20.7%的人口与美国占世界4.6%的人口加以对比。换句话说，成为世界领袖国家之后，中国所拥有人口砝码与现代以来出现的任何世界霸权拥有者都有着本质的区别。

民主的基础就是每个个体都很重要。迄今为止，这种主张还仅局限于单个的民族国家境内，在超国家的层面上还未出现过任何形式的表达，更不用说全球层面。当然，联合国大会可能是个例外，不过正如人们所见，它并不具有实质性权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这样的机构从未进行过任何民主化的尝试，只是反映了创建和掌控这些国际机构的国家的政治、经济利益，因此美国占据主导地位，其次是欧洲，此外美国还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享有独家否决权。根据其“二战”后的所作所为，所谓西方的世界秩序，是在民族国家层面高度重视民主，而在全球层面弃民主如敝屣。这种全球秩序是反民主的，具有高度的专制色彩。中国崛起为全球主导国家后，虽然不可能引入一种全新的、民主的全球治理模式，但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巴西、俄罗斯，当然还包括中国）的崛起，必将催生更为民主的全球经济体系，其具体形态虽尚不明确但已初露端倪。过去两个世纪里财富和人口数量之间巨大的失衡这一特征将明显减弱。

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中来说（包括中国、印度、巴西、印度尼西亚等人口最多的国家），贫穷意味着边缘化，意味着事实上被排除在全球决策过程之外。相比之下，经济实力才是参与全球事务的通行证。或者说，建立在“金砖四国”（即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基础上的国际经济制度，在本质上将比当今盛行的西方主导的经济制度更加民主。而且，作为佼佼者的中国拥有如此之多的人口，以最简单的逻辑判断，这一事实本身就会使全球体系产生更加民主的要素。毕竟，1/5要比4.6%要有代表性得多。

作为世界大国，中国人口众多的特质将产生很多后果。实际上，对于世界其他地区，中国既会形成重力似的牵引作用，也会产生发散

效应。这种双重作用将会体现在很多方面。中国市场令人生畏的规模意味着，假以时日，它一定会成为世界最大的市场。由此，它也将成为大多数国际标准和规则事实上的制定者。中国国内市场的规模还将推动中国公司和股票交易市场的规模位居全球首位。20世纪50年代，欧洲人面对一切都是美国的这一可怕形势时目瞪口呆，而在未来，“中国”的标签则会令美国黯然失色。甚至拉斯维加斯作为世界赌博业之都的地位也将为澳门所取代。2010年澳门的博彩业收入已经是拉斯维加斯的4倍。发散效应的一个事例是中国的移民。中国将是人口净流出国，正如欧洲在20世纪中叶之前一样；但美国则不同，至今仍为净流入国。21世纪前几年数十万中国人迅速移民至非洲的现象，让我们对中国的海外移民可能产生的后果有了初步的认识。如果中国和非洲的经济联系以现有速度持续增长，那么华裔人口在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区的人口中将有可能占据相当一部分比重。大量中国人终将有一天移民至日本以填补该国日益减少的人口，这也并非是难以想象的，当然这也许需要后者的移民政策发生巨大变化。据估计，日本的华人（包括合法与非法的）数量现在已达40万。此外，俄罗斯的华人规模也在不断增加，远东地区尤为如此。即便无法与之前的欧洲移民相提并论，华人在世界上的分布程度也已远远超出美国人。

另一个例子与旅游有关。2010年，中国大陆赴海外旅游的人次达5 400万，而2004年只有2 800万人次。中国政府预计，2015年中国居民赴海外旅游的游客将达到1亿人次，而汇丰银行的预测则是1.3亿人次。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预计，到2018年中国旅游业的市场价值将与美国并驾齐驱。其中，对东亚（特别是东南亚）和澳大利亚的影响尤为显著，很多旅游目的地看起来就像被中国游客占领了。迄今为止，只有西方游客才有过如此的规模，但中国游客的规模也将大为增加。同样，仅仅因为讲汉语的本土居民数量如此庞大，汉语很快就会具有全球性的重要意义，这与此前的苏联及日本截然不同：在国力达到鼎盛时，两国的语言在边界以外也几乎没有什么影响（苏联在东欧地区的影响是个例外），其中一部分原因在于两国人口相对较少。就语言

而言，当前网民对于语言的使用情况已经可以令我们对未来可见一斑。尽管中国网民的比例远小于美国，但是在2008年中国的网民数量已经超过后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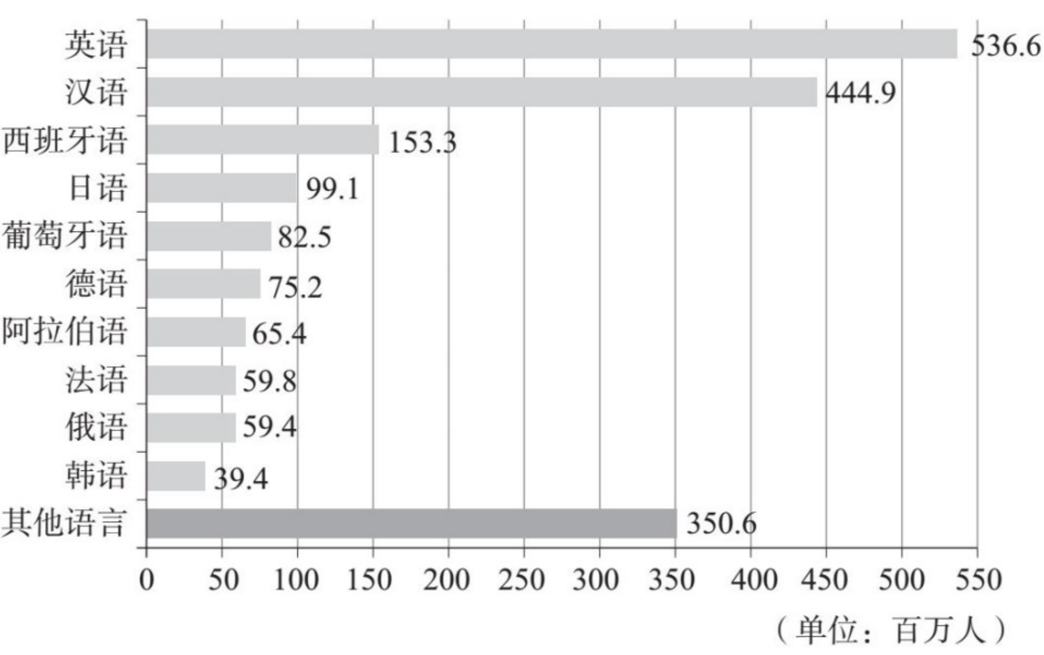


图10–2 世界十大互联网语言，2010年6月

数据来源：微瓦营销集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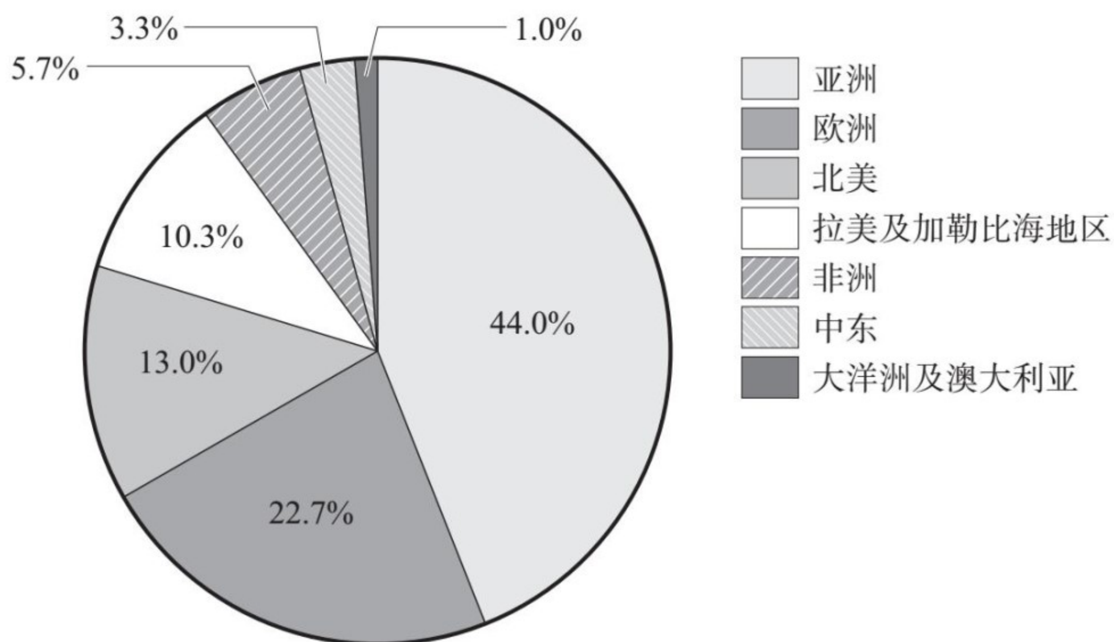


图10–3 世界互联网用户分布，2011年3月

数据来源：微瓦营销集团

中国的种族秩序

过去两个世纪里，高加索人种（白人）一直居于世界种族等级结构的顶端，享有特殊的地位。在欧洲殖民帝国时代，宣扬白种人天生优越性的种族理论常常被用来解释其统治地位。自20世纪中叶以来，随着纳粹主义的失败及此后殖民地解放运动的开展，如此直白的种族理论在世界大多数地区遭到唾弃，现今只受到少数西方人的推崇。但是，如果说这些种族理论在大多数地区不再被接受，一种未曾言明但无处不在的全球种族等级体系却仍然存在，白种人始终处于该体系的顶端。这种体系源于国家发展程度、肤色、人体特征、历史、宗教、服饰、习俗以及存在了数个世纪的种族观念和偏见。从全世界范围看，白人受到尊重和尊敬，同时也常常令人略感恐惧和憎恨。对白种人的这种复杂态度则是以下若干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相当长时间内

占据全球主导地位、巨大财富、占绝对优势的军事实力以及所取得的名副其实的成就。随着时间的流逝，中国对西方的超越将不可避免地推动全球种族等级体系逐渐重构。

尽管中国人内心有着深厚的民族自豪感，但经历了“屈辱的百年”之后，这种自信已经动摇并部分丧失。20世纪80年代，王小东称这种现象为“逆向种族主义”，即渴望模仿和照搬西方，贬低中国文化。但这个阶段现在已慢慢成为过去，取而代之的是不断增长的自信和向传统观念的回归。在坚持“中国必须向西方学习”的同时，中国认为西方也需要向东方学习。在西方远远领先中国一个多世纪后，中国人的优越感仍然保留下来，足见其根基之深。随着中国成为世界上重要的行为体，将会有新的理论、论述、论据来支撑、巩固中国的这种优越感。此外，如第7章所述，与欧洲相比，中国的种族理论存在重大差别，其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文明国家而非民族国家的性质。

在某些特定领域，例如足球、体育和流行音乐，高加索人种的全球优势已经遭遇重大挑战。但在商业、法律、会计、学术、时装、全球政治领导权等众多领域，白种人依然占有压倒性的优势。巴拉克·奥巴马和老虎伍兹等人只是极为稀少的特例，尽管前者当选为美国总统在当前背景下具有尤为重要的意义。纳尔逊·曼德拉在全世界享有崇高威望，但掌握的实权极小。随着中国的崛起，白种人在很多（如果不是全部）领域的统治地位将第一次遭遇严峻挑战。

种族观念的深远意义不可低估。国际关系学者总是忽略或无视其作为国家行为和国际关系的主要决定因素的重要性，而是更喜欢关注民族主义。但是正如第7章所论及的那样，人种和族群在国家的构建中发挥了中心作用。国际关系学者资中筠以美国的例子对此做了深度分析。在中国，那些被广泛接受的种族偏见实际上未曾遭到质询或怀疑，人们认为这些偏见合乎常理而不是奇谈怪论。中国也不存在反种族主义文化。这些事实意味着种族观念将继续对中国人的世界观、中

国各阶层民众相互评价的方式以及中国的国家行为产生重大影响。当然，经历了数个世纪相对封闭的状态后，随着中国日益向世界开放，在全新的基础上与世界融合，一些传统偏见必定衰弱乃至消亡，但此类观念在历史上如此根深蒂固，其持久性不可小觑。作为全球主导国家，中国基于种族意识和文化观念的双重影响形成的世界等级观，将对于中国如何认识其他国家和民族以及如何界定其在世界阶梯顶端的位置产生根本影响。

中华联邦？

西方这个概念与欧洲的向世界各个地区的扩张及移民紧密相连。然而，长期以来这一点则为人所忽视，基本上被视为理所当然，几乎无人认真审视过。是欧洲移民创建了美国，使之成为北美大陆一个由白人主导的社会，加拿大的情形同样如此。拉丁美洲这个称谓源于西班牙和葡萄牙对南美的殖民，时至今日仍可以在以下事实中得到印证：这些国家的精英绝大部分为白人，并且主要是原殖民时期移民家庭的后代。同样，英国移民通过对土著原住民的镇压、杀戮及随后的边缘化，创立了白人统治的澳大利亚。澳大利亚与新西兰一道，构成了西方在亚洲的前哨。若非如此，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今天仍会是原住民和毛利人的国家，国名、语言和文化将完全不同。如果南非的欧洲移民比现在多很多，那么作为人数较多的少数族群的白种人可能变为多数族群，白种人的统治就会永久化。正如我们所知，欧洲人（或者说白种人）的迁徙对今天世界的性质和构成产生了巨大影响。

白种人的迁徙是欧洲的相对权力和财富的结果。与之不同的是，中国人之所以迁徙，主要是因为在家乡饥贫交困，再加上大英帝国对使用华工的需求。最近几十年来，世界各地的华人少数族群差不多都实现了财富的不断增长，但相对而言，移居到东南亚的中国人尤为成功，其积累的巨大财富远超过人口的比例。过去中国移民勤劳但却贫

穷，如今在各自的栖息地，不论是经济还是文化领域，他们都在成功的道路上稳步向前。中国日渐强大的实力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助推的作用，提高了海外华人的自信、声望和地位。祖国和海外华人之间多方面的联系纽带，如贸易和汉语，无疑将有助于加强后者的经济地位。在一些西方国家，特别是在澳大利亚和意大利的米兰，日益富有的华人群体和当地警察不时发生冲突，有迹象表明当地的中国人越来越受到排斥。华人过去被米兰本地人视为既低贱又贫穷的群体，前者近来的成功让后者惴惴不安。同样，在托斯卡纳的普拉托，当地的18万居民中，华人就占了4万。当地民众对华人群体的敌视越发明显。在贝卢斯科尼政府的支持下，当地来自右翼政党北方联盟的市长，针对华人展开了大规模的迫害行动。然而，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提升和综合国力的增强，西方世界不得不接受这样的理念，即越来越多的本土中国人和海外华人将比西方人富有得多。但对于西方民众来说，由于先入为主的看法和根深蒂固的偏见，这并非易事。

接下来我们将就中国对待海外华人的态度进行探讨。正如前文所述，中国文明的一个叙事基调就是“大中华”的概念，这个概念既涵盖了中国大陆、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和中国台湾，又包括世界各地的华人。中国被视为华人世界的中心，北京处于心脏位置，而海外华人是其遥远的边界。所有中国人对大中华都有一种自发的向心意识。海外华人对中国经济转型做出的贡献表明其仍然具有强烈的归属感。中国的崛起必将进一步提高其在海外华人中的声望和吸引力，加强海外华人的认同感。在此背景下，中国积极尝试鼓励知名海外华人学者回国工作甚至定居，这一措施取得了巨大成功。与此同时，正如前文所述，中国移民正在增加，特别是在非洲，导致海外华人团体的不断出现与扩大。据估计，非洲目前至少有50万华人，其中大多数是最近才到达那里的。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泰国三国，居住在那里的华人都超过了700万；在缅甸和俄罗斯，超过100万；秘鲁有130万；美国有330万；澳大利亚有70万；英国有40万。目前，海外华人的总数大概有4 500万，不过这个数字很可能被严重低估了。

历史上，封建王朝统治时期的中国对海外的华人十分轻视，将其远离故土视为自绝于文明之外。然而，当代中国对待海外华人的态度则截然不同，中国政府甚至还鼓励某种形式的移民，并寻求与海外华人群体积极联系并对其给予支持。中国和海外华人的关系将如何发展？尽管现在中国仍不承认双重国籍，但未来是否会考虑改变？未来可能出现包含数量庞大的海外华人社团的中华联邦吗？或者说，作为文明国家，中国在其主导的现代世界中将表现为怎样的形式？毫无疑问，其他国家不会接受“中华联邦”这样一种安排，但如果中国实现了对世界的主导，权力的平衡也将发生倾斜，未来政治格局将会重新界定。自然，任何此类演变的影响，东南亚的感受应该是最强烈的，相较而言，该地区华人的实力最强、数量最多。

全球经济引擎

中国的经济实力无疑将是其全球霸权的根基。过去的数十年中，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结构的优化，中国实力的本质将不再主要依赖巨大的人口基数。就经济而言，我们无法准确预测出这种变化将会带来怎样的影响，但鉴于中国人口是美国的4倍，有推测认为未来中国的经济总量可能达到美国的4倍。2007年，高盛公司曾经预测中国将于2027年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金融危机之后，人们的预计则是到2020年），205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将是美国的两倍。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二大出口国，很快将攀升至首位，而2011年时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制造国。作为一个庞大的进口国（当然主要仍限于自然资源）和出口国，中国的贸易影响已经遍及全球。1990年，中国只是东亚少数几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2002年时，这一阵营已经有了明显的增长；至2010年，中国已经成为东亚很多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更为重要的是，2010年，中国成为其最大贸易伙伴的国家已经遍布全球，如巴西、阿根廷、智利、俄罗斯、南非、印度、埃及等，而且范

围还不断扩大。中国对外贸易在过去30年里迅速扩张的态势无疑将继续持续，至2030年，中国成为世界各地众多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

在根据市值计算的福布斯全球企业2 000强排行榜中，中国有两家企业位列前五，三家企业位列前十。根据《金融时报》的排行，2010年根据市值计算的全球企业五百强中，有23家中国企业的身影，就上榜企业数而言，中国名列第六（美国位列第一，有163家企业上榜），总市值则位列第三。如果将登记在香港的企业也计入其中，那么无论是上榜企业数还是总市值，中国将位列第二。相比之下，2006年全球企业500强中没有一家中国大陆企业的身影（香港有7家），2007年也只有8家企业名列其中（香港也有8家）。发展的速度是如此之快，不难想象在未来的10年内中国（包括中国香港）的上榜企业数量将超过美国，在2030年时，更是将占据全球企业500强的半壁江山。值得一提的是，同样在2010年，在彭博社发布的全球市值十大银行中，中国有四家银行名列其中，头两把交椅更是为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所占据。

表10–5 全球企业市值十强（2010年）

公司	所属国家或地区	市值（单位：百万美元）	业务领域
1　中石油	中国	329 259.9	石油化工
2　埃克森美孚	美国	316 230.8	石油化工
3　微软	美国	256 864.7	软件及电脑服务
4　中国工商银行	中国	246 419.8	银行业
5　苹果	美国	213 096.7	科技硬件及设备
6　必和必拓	澳大利亚 / 英国	209 935.1	矿产
7　沃尔玛	美国	209 000.7	零售业
8　伯克希尔·哈撒韦	美国	200 620.5	非人寿保险
9　通用	美国	194 246.2	工业
10　中国移动	中国	192 998.6	移动通讯

数据来源：《金融时报》

在所有的排名中（无论是企业排行榜还是银行排行榜），人民币的汇率都极为重要。在未来5年内（都不要说在未来20年内），人民币极有可能将大幅升值。假设人民币升值25%，那么中国的GDP及其公司的市值也将增长25%。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在2010年估测人民币的币值被低估了41%。无论正确与否，假设人民币升值41%，那么在201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就已经相当于美国的一半，中石油的市值则相当于埃克森美孚的1.5倍。鉴于中国的高储蓄率，随着中国资本账户的逐渐开放和资本流动逐渐自由化，未来中国的海外投资额将极为可观。2007年，中国的公私存款总额达4.8万亿美元，相当于其GDP的160%。假设储蓄率以每年10%的速度递增，至2020年中国的存款将达17.7万亿美元，届时中国的资本市场很可能已经完全开放。如果2020年时，有5%的存款流向海外，那就意味着8 850亿美元的对外投资。如果外流的资金达到储蓄额的10%，那就是1.7万亿美元。作为参考，2001年美国的

非贸易收入的总额为4 515亿美元。笔者落笔之时，中国海外投资从历史阶段来说尚处于初期，但增长极为迅速：中国的海外投资总额由2003年的28.5亿美元增至2009年的565.3亿美元，2010年更是超过680亿美元。中国的银行对西方金融机构的投资可以令我们对未来一窥究竟。2007年年底，始于当年8月的信贷紧缩令西方金融机构出现严重的资金短缺。2007年年底，中国金融机构已分别持有标准银行20%的股份、摩根士丹利9.9%的股份、黑石集团10%的股份、巴克利银行2.6%的股份。不过，事后证明这也正是最高点，中国政府逐渐意识到美国金融危机的严重程度，于是建议本国银行停止增持，避免成为陷入困境的欧美银行的救命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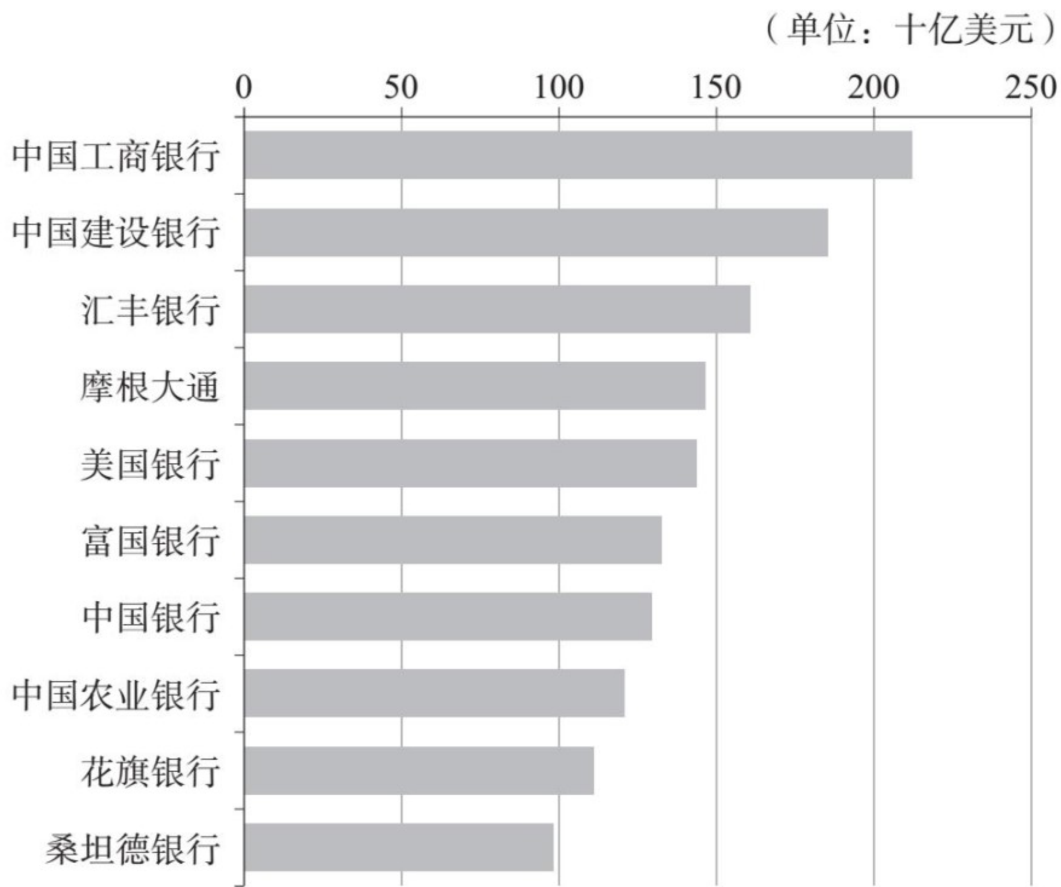


图10–4 全球银行市值十强（2010年7月7日数据）

数据来源：彭博社

目前已经有大量证据表明中国正在稳步攀登科技高峰。目前它的经济仍然处于“模仿”阶段，还未到“原创”阶段，但重大科研项目的数量正在上升，研发经费也在同步增加。2010年，中国已经取代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研发投资国。就顶尖科学出版物的数量而言，中国已经排名世界第五；在纳米技术等关键技术领域，中国也占有一席之地。依靠科学、工程和医学领域每年650万的大学毕业生和50万的研究生，中国已经建立了世界上最为庞大的科研队伍。2003年和2005年，中国成功完成两项太空载人飞行任务；到了2007年，中国又成功地用弹道导弹摧毁了一颗本国卫星，这也表明了其与美国竞争太空军事优势的意图。未来的十年，中国极有可能成为全球科技大国。

中国的崛起所带来的根本性经济影响之一，就是国际金融体系的转变和重构。始于2008年9月的金融危机表明，美国的经济光环已褪，不足以为世界经济体系保驾护航，也无法维持美元作为世界首要储备货币的地位。美国巨大的财政赤字意味着美元面临着贬值的重大威胁，这不仅将导致外国投资者对美元的信心危机和美元的大幅贬值，还可能威胁其储备货币的地位。此外，美元的颓势不只是在金融领域具有重要影响，对华盛顿在国际舞台的地位而言，其意义要深远得多。小布什时期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高级官员弗林特·莱弗里特（Flynt Leverett）指出：“人们总是纯粹从经济的角度谈论美元的衰落，其实货币政治非常有影响力，是美国及此前的英国在如此长的时间内雄踞霸主的重要因素之一。”同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首席经济学家肯尼斯·罗格夫（Kenneth Rogoff）写道：“美国人将发现，如果美元跌势过猛，维持全球霸权所需要付出的代价就会大得多。”

美元的下跌将可能造成多重后果：各国更愿意增加外汇储备中其他国家货币的比例，而不是美元；过去将本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的国家，包括中国，将放弃这一做法；美国将发现针对伊朗和朝鲜这类国家的经济制裁效力不如以前，因为对它们来说，美元融资渠道不再那

么重要了；各国将不再那么情愿将外贸盈余投资美国国债；美国海外军事基地的经费将显著上升；美国大众也会更多地反对为海外军事行动的巨额开销买单。换句话说，美国会发现，维持其世界霸主的地位难度更大、代价更高。1918~1967年间，随着英镑的衰落及曾经的大英帝国地位的下降，也发生过同样的变动。

在美元衰落的同时，人民币正逐渐兴起。到目前为止，人民币的作用因无法自由兑换而受到了根本制约。但正如上文所提及，在未来5~10年的时间里，情况将有所变化。至2020年，人民币很可能实现自由兑换，像美元一样自由买卖。届时（或许更早），大多数东亚国家（即便不是东亚全体国家）都将会成为人民币货币体系的成员，日本也不例外。鉴于中国很可能成为其他所有或大部分东亚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那么这些国家以人民币对外贸进行结算、将本国货币与人民币而非美元挂钩（目前该地区很大程度上已是如此）或者把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之一，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随着美国经济的相对衰落和美元持续走低，美元将逐渐（甚至迅速）丧失全球优势地位，被众多货币所取代，开始出现美元、欧元、日元三足鼎立的局面，人民币一旦实现自由兑换，也会加入其中。当人民币实现可完全自由兑换时，它将与美元和欧元一道成为三种主要外汇储备货币，并且迟早会取代美元，成为世界主导货币。这种局面很可能在未来20年内成为现实，也许更快。

当前的国际金融机制迟早会被新机制替代。当然，假如中国和印度最终取代美国的地位，在此情况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很可能发生重大的转变。但更有可能的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被日渐边缘化的同时，新机构将逐渐发挥作用。相较于10年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权力和影响已经远不如昔，而这个过程仍将持续。

一种全新的资本主义形态

在第3章中，笔者已经对美国资本主义的兴起与此前占主导地位的形态各异的欧洲资本主义的区别加以分析。在1850年之后的百年内形成的美国这一全新的、充满活力的资本主义形态，其特征与欧洲资本主义截然不同。其主要包括：庞大的、相对同质化的市场，而欧洲的市场规模较小，是由性质各异的、碎片化的各国市场所组成；劳动力的相对缺乏带动的生产工具的发明和劳动过程的不断改进；新型的流水线生产方式（即福特生产方式），包括更为精细的劳动分工和大规模生产，相较之下，西欧典型的生产方式则是小规模的、批量式生产；没有前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羁绊（这也是对印第安人迫害的结果），也就意味着资本主关系的发展几乎没有什么经济、政治和文化的障碍。当封建主义的残余在西欧的很多方面影响犹存之时（不仅限于土地所有制），美国却没有这样的情况，例如美国的农场得以迅速的、大规模的扩张。这些区别与美国的其他特征一道，影响了经济、科技、文化和政治等美国生活的方方面面。

正如19世纪现代美国资本主义的兴起一样，中国的崛起了也代表了资本主义本质的显著变化。相较于美国资本主义，中国模式具有怎样的关键特征？中国市场的规模要远胜于美国，这也为新型生产和营销方式的出现提供了可能。此外，中国的规模与多样性，也意味着其具有洲际经济的特征，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带有全球经济的特质。因此，其各省市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竞争，正如世界其他地区的民族国家的一样。汇丰银行预测，至2020年，中国有6个省的年均GDP将超过俄罗斯、加拿大、西班牙等国家；此外，有10个省的GDP将与印度尼西亚、南非、瑞士等不相上下。与此同时，中国对世界原材料的依赖及其工业品所具有的竞争力，意味着相较于美国，其经济的国际化程度（即与全球经济的相互依赖和融合程度）将更高。此外，新中国的建立对中国也产生了影响，特别是土地改革和实现了男女平等，为

中国社会的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动力。共产主义的传统一直影响着中国的资本主义模式，邓小平特别是毛泽东都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中国领导人一直将中国的资本主义模式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不仅是就社会主义中国延续性的老生常谈，更是对与传统联系的强调。最后，文明国家的性质也一直影响着中国的市场经济性质，最重要的体现之一就是中国政府的性质，即对经济、政治、社会的全面管理，富有战略眼光、高效等。因此，中国模式无疑与美国模式大相径庭。

与和西欧为代表的同时代发达经济体高度融合的美国模式不同，中国经济与发展中国家的联系更为紧密。鉴于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比例，中国经济对世界的影响要远远超过美国。此外，印度、巴西等人口大国经济转型与中国同步的事实，也促进中国模式重要性和影响力的提升。正如一百多年前的美国模式一样，中国模式也必将对世界发展的本质产生重大影响，但其过程将更为漫长。

作为世界大国的中国如何作为

鼎盛时期的欧洲一直打着“文明化”的旗号，试图将自己的意愿强加于世界其他地区。好战的心态源于欧洲自身似乎永恒的内战传统，与之相结合的殖民主义扩张是欧洲霸权计划的核心。尽管所处的地缘政治环境与过去迥然相异，美国人仍继承了欧洲遗产的重要部分，这也不足为奇。美国独占一个大陆的先天优势，也令其形成了根深蒂固的狭隘特性。早期清教徒移民及同时代人凭借宗教热情建立美国，此后又制定了包含福音主义和普救学说信条的《宪法》。因此，美国持有天定命运的信念，相信他们的精神目标是为世界其他地区启发心智。源于早期移民扩张主义思想的“天定命运”的历史、对美洲印第安人的屠戮以及无止境的西进欲望，无疑有助于我们理解美国作为全球超级大国的所作所为。那么，起源和历史与美国截然不同的中国又会有怎样的作为呢？

有两个因素必须纳入考量之中。第一个因素与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所谓现实主义流派有关。现实主义强调利益的重要性，因而重点关注大国在相同环境中如何以相似的方式作为。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认为，“新兴大国普遍存在追求利益和声望的膨胀心理”。按照这一观点，中国很可能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全球超级大国一样行事。相反，第二个因素则强调历史和环境对大国的塑造，因此其行为将完全不同。这两种不同因素一个强调共性，另一个强调个性，美国需要认识到，二者将共同构建中国作为超级大国的行为方式。共性因素包含的推动力显然更为人所熟知，而中国的独特性产生的个性倾向，相对来说不那么为人所知，也令人难以捉摸。

在此背景之下，历史学家威廉·A·卡拉汉认为目前中华文明存在四种不同的表述。第一种他称之为“中国”，即一个地域上的国家。这种论述显而易见的象征是长城，表现出御蛮族于国门之外的愿望，反映了本土主义情结——中国历史上反复出现的主题，这种情结很明显地体现在义和团运动和持续的对外国干涉——特别是美国和日本——的仇恨上。这种思想迎合了保守内向的中国本位情绪。我们大致可以将其描述为美国狭隘特性的中国版本。

第二种表述是“大中国”，象征着征服。正如第7章所论及，这种思想也是中华帝国扩张动力的本质所在。按照征服论，中国文明不断扩充和吞并新领土，试图征服、削弱边境的蛮族，使之文明化。在当前背景下，征服论的首要目标是国家统一，然后是为“屈辱的百年”

雪耻。中国学者阎学通从相对温和的角度评价说：“……中国人认为自己的崛起是重获失去的国际地位，而不是获得新权力……中国人认为中国的崛起是重建公正，而不是从他国那里攫取利益。”但是，很明显，征服论的温和色彩非常淡，人们更多地从扩张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角度进行阐释。

第三种表述是“大中华”，表示同化。这种思想和征服欲一样，在中国文化中根深蒂固，体现了对中国文明内在优越性的信念和同化其他人的愿望。用孟子的话来说就是：“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这里，问题的关键既不是征服，也不是恢复中国文化传统，而是界定、传播中国文化的特性。正如我们所见，这或多或少地与种族相关。按照卡拉汉的观点，文明中国是个开放的、具有扩展性的概念，与软实力这个概念相似，但却并非等同。

第四种表述，也是最后一种，与中国的海外移民有关，反映的是海外华人未曾间断过的中国认同感所蕴含的大中华理念。上述所有论述都体现在当代中国的立场当中，并对之产生持续的影响。与此部分相关的前三种表述中，哪一种将于何时居于主导地位，现在还难以定论。

牢记西方和中国行为模式的历史差异，可谓至关重要。西方长期以来一直试图向世界各地扩张，这种对外扩张可追溯至15世纪、16世纪的葡萄牙、荷兰和西班牙。中国则相反，并没有海上扩张的传统，只是自然而然地拓展陆地的疆界。欧洲人也许沿袭了中世纪的航海传统，从15世纪晚期开始，就意图通过海上实现扩张。与之相反，中国总是自视为大陆强国，从不认为自己是胸怀海外野心的海上强国，也不打算如此。郑和下西洋与欧洲伟大探险家航海探险的目的截然不同，正是对此的生动说明。直至今天，中国人也从未试图向领土之外投放力量。中国甚至现在还未能建立远洋海军甚至在未来一二十年内也难以实现这一目标的事实，无疑对我们也有所启示。虽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人未来不会寻求向远距离的海洋和陆地扩张，但他们的确没有这样的传统。我们有理由认为：作为超级大国，中国在未来将掌握这样的能力。但与西方不同，至少到目前为止对外扩张还不是中国人思维和行为方式的一部分。

还有一个因素可能会加强谨慎保守这一中国自古以来的特点。尽管“屈辱的百年”常被视为中国试图为历史雪耻的原因（这不禁令人想到了德国和《凡尔赛和约》的情形），但其也可能成为制约行为的因素。被侵略和半殖民地化的历史，以及在西方列强压迫下经历了这么多年苦难的事实，很可能让中国人产生谨慎心理。换句话说，德国的例子对中国根本不适用，二者对外扩张和被侵略的时序完全不同。中国是第一个受殖民化影响的大国，是被殖民的对象，而不是殖民者。因此，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将保持相当的克制，甚至在自己的力量足以横行天下时仍会如此。当前的现实就足以证明这一点。中国人不遗余力地慎重行事，向世界证明其没有扩张的野心。当然，中国对中国台湾的态度是个例外，毕竟台湾问题的性质也截然不同。的确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中国曾与苏联、印度和越南发生过冲突，但前两者只是边界纠纷，中国也并没有在冲突中显示出对外扩张的企图。这种相对的克制则与中国人思维方式的另一个方面有关，即保持耐心，也就是按照与西方政治思维截然不同的时间表办事。1972年周恩来对亨利·基辛格关于法国大革命影响的问题做出的回应，则是对此的生动总结：“这个问题言之过早。”这样的思维方式是文明国家而非民族国家的特征，图10－5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源于古代军事战略家孙子等人的中国军事思想极为看重“不战而屈人之兵”，认为“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武力实际上应是最后诉诸的手段，使用武力是虚弱而非强大的表现。正如孙子写道：“（未战）胜负见矣”。这是中国战略思想中非常重要的部分，但正如江忆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所指出的，认为此种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居于主导地位，而与之相反的、认为冲突是人类历史永恒的特性的思想，无疑是一种误解。江忆恩写道：“我对《武经七书》（《孙子兵法》等古代中国最重要的7本军事著作）的分析表明……这两种范式并非水火不容，而是在中国传统战略思想中占有同等地位。而备战范式即认为战争是难以避免的，绝大多数时候居于主导地位。”然而，其观点遭到了中国学者的激烈反驳。不论哪种观点

正确，中国必将需求建立强大的军事力量。2003年，一次针对中国一流大学5 000名学生的进行调查显示，49.6%的人相信未来中国应成为世界军事大国，83%的人认为中国的军事实力还不够强大，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表明了中国未来的态度（见图10－6和图1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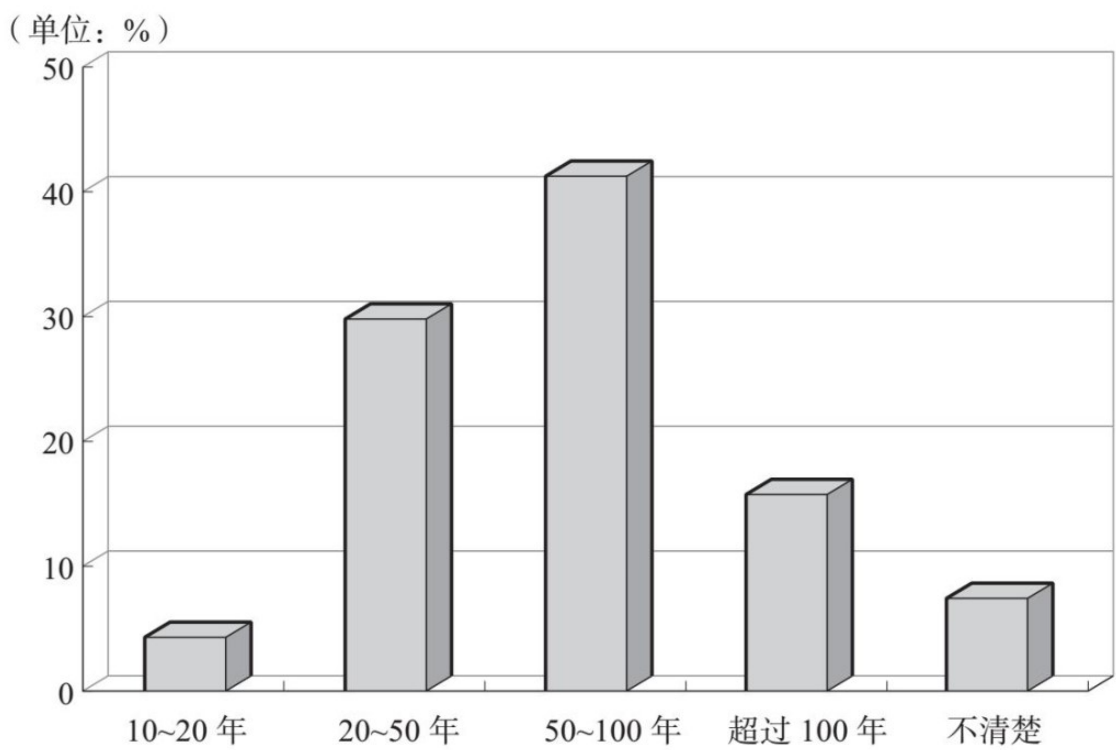


图10–5 中国青年对“你认为中国综合国力赶上西方发达国家需要多少年”的回答

我们可以得出怎样的结论呢？未来半个世纪，中国似乎不可能具有很强的侵略性。一方面，历史经验将继续对中国人如何使用不断壮大的力量产生深刻影响，告诫他们做事要谨慎、有节制。另一方面，由于中国越来越自信，中国人思想中那种数千年之久的优越感又会越发明显。尽管随着时间的流逝，中国作为超级大国的利益和特征在不断凸显，帝国色彩也逐渐浓厚，但是其绝不会成为西方传统意义上的帝国主义国家。中国将显示出强烈的国际社会等级观，认为中国代表了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更为高级的文明形式。这一观点在王赓武的论述

中已有所体现：尽管朝贡体系建立于等级制原则之上，“但更重要的是优越性原则（以及安全性或神圣性原则）”。这种等级制和优越性的结合在中国对东亚的态度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也有人认为，中国在处理与不同大洲、不同国家的关系时也是如此，对非洲尤为明显。王赓武认为，即使被迫抛弃朝贡体系、转而遵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原则（所有国家享有正式的平等），中国也从未真正相信这项原则符合实际。王赓武指出：“这一疑虑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世界目前的担忧，那就是一旦有机会，中国也许希望恢复其长期以来的神圣传统，即除了不能给予平等地位并认为其不如中国以外，其他方面对各国一视同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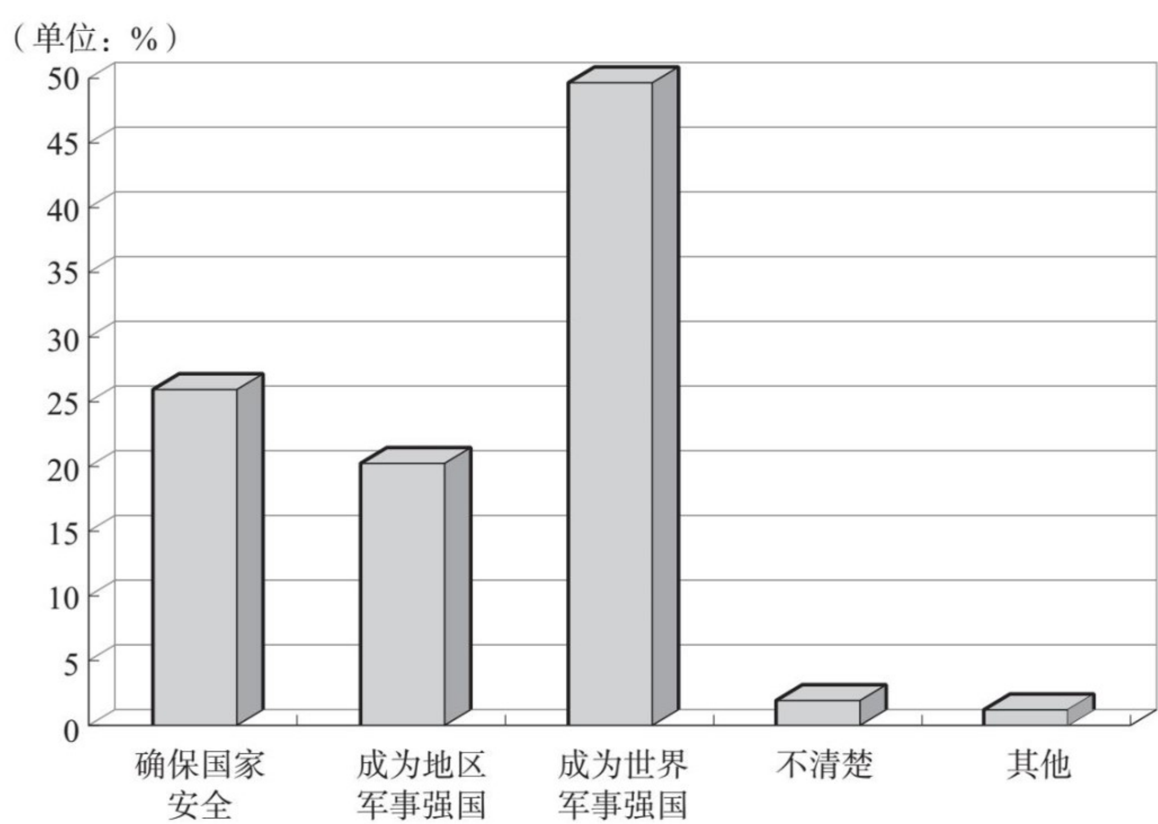


图10–6 中国青年对“你希望中国凭借未来的军事力量能够……”的回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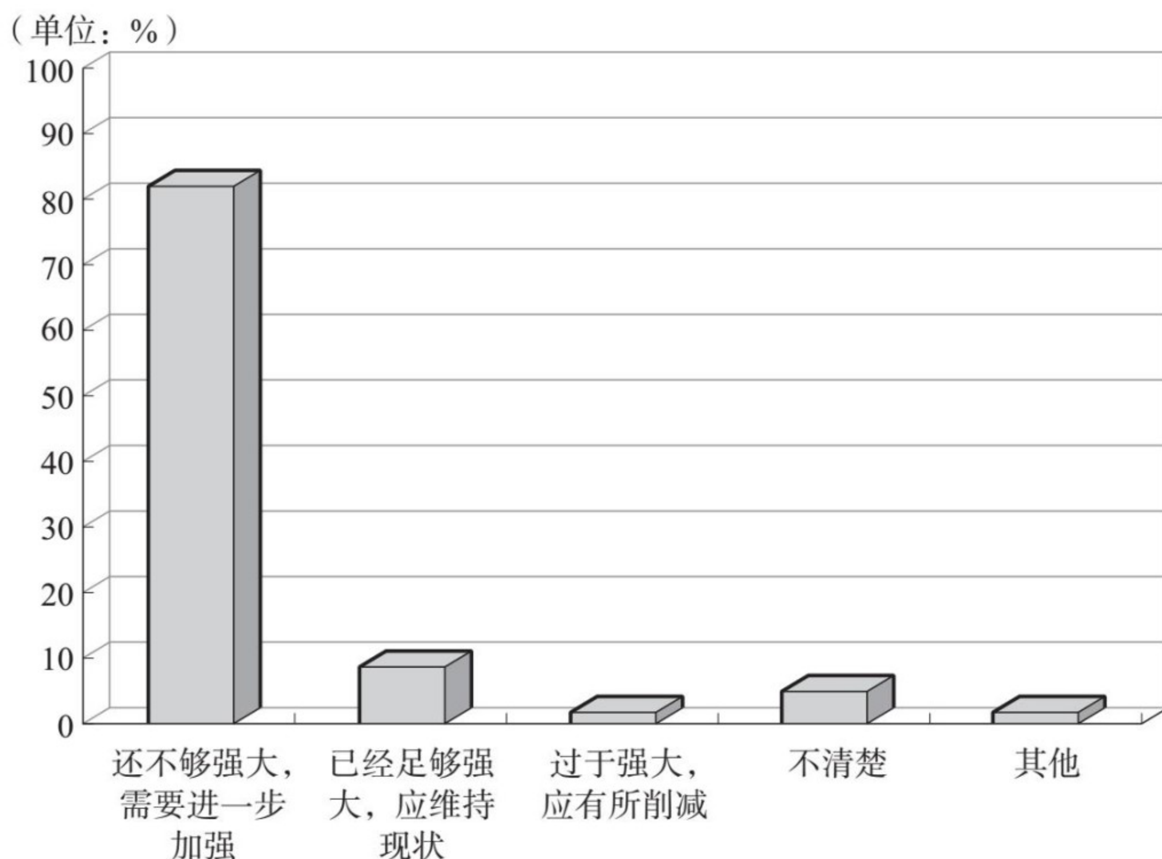


图10–7 中国青年对“你认为中国现在的军事力量……”的回答

中国文明的本质、悠久的历史以及其庞大的人口数量，意味着它对自身世界地位的定位总是与欧洲和美国意见相左。与西方相似，中国总是将自己塑造成或自认为具有普适性，是其他国家的榜样。然而与西方追求普世主义不同，中国却从来不追求扩张，而是认为中国就是比他者优越，居于他者之上。因此，中国从来都不希望如西方般征服、统治世界（正如西方殖民体系所体现的），而是高高在上，冷眼旁观（正如朝贡体系一样）。因此，欧洲人将其在殖民地定居的民众视为亲友，并向其提供帝国的保护；而古代中国人则认为移居海外者是自绝于文明之外，不值得对其庇护。重要的是，中国并不渴望统治世界，因为它已经相信自己就是世界的中心，这个角色和地位是上天赋予的。当中国成为全球主要大国时，这种思想可能会进一步强化。因此，中国或许将被证明远非西方那样具有明显的侵略性。但这并不

表明，在强加自身意愿于他国或者在世界各地发挥影响时，中国不会那么果断、那么坚决。然而，中国采用的方式则与西方截然不同，即通过宣扬其深信不疑的自身优越性及由此自然而然地产生的等级关系，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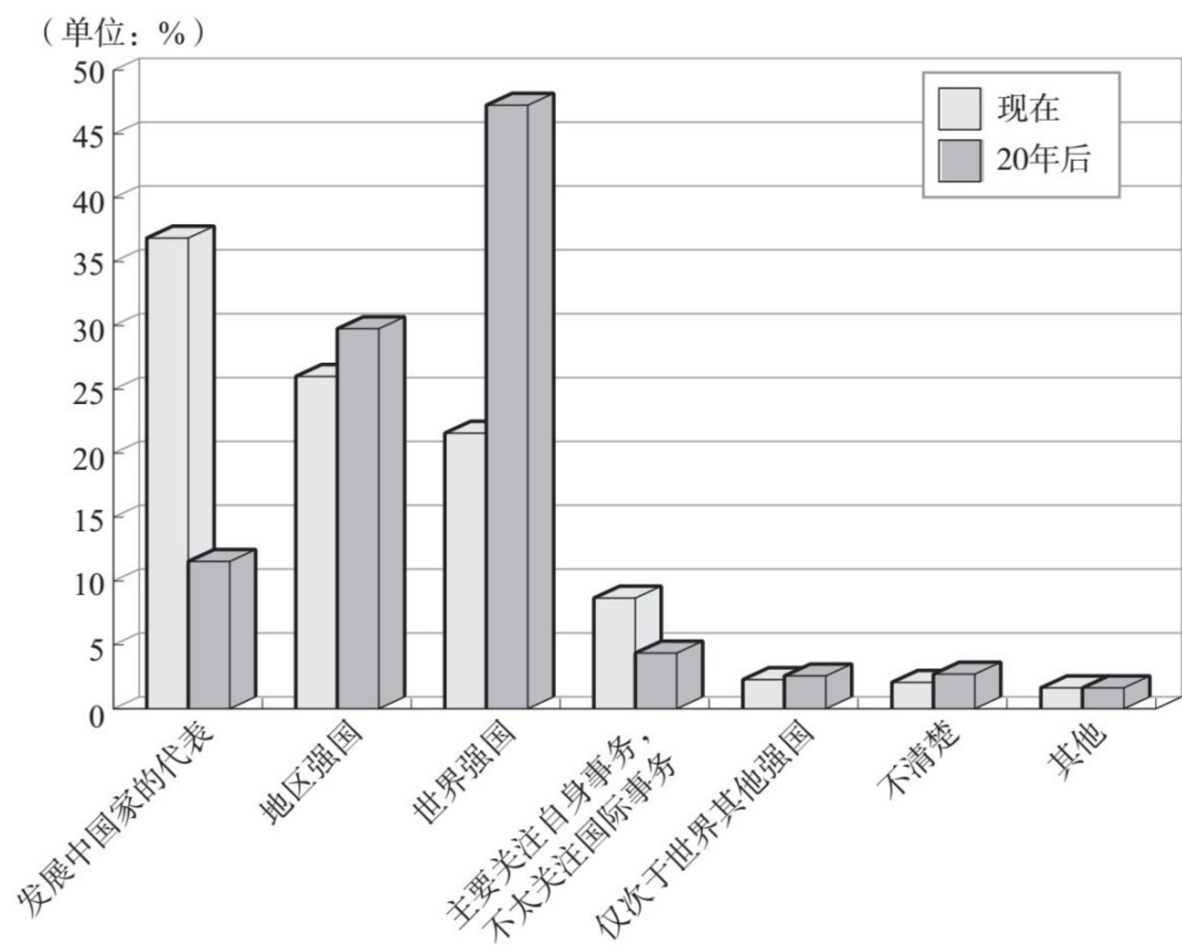


图10–8 中国青年对“你认为中国应该在国际事务中扮演什么角色”问题的回答

全新的政治一极

西方一直坚信其他所有国家无论历史和文化如何与之不同，最终必将向西方模式看齐。因此，对其来说很难想象还有这样一种可行的选择，对西方模式构成了严重的挑战。然而，中国的确提供了这样的

替代选择。为了理解中国政体的本质以及其与西方的不同，我们必须要在比较长远的时间框架中对其进行考量。正如第6章所述，中国的基本特征可以归纳如下：将统一视为中国政治的头等大事；国家内部的巨大差异；洲际规模的领土，意味着传统民族国家常见的反馈环在这里通常不具效力；政治阶层从不与教堂或商界等机制分享权力；政府位于社会顶端，在其他任何机构之上；道德说教和伦理典范居中心地位。考虑到其历史的厚重，我们无法想象中国政治会和西方类似。实际上，从长期来看，中国将有可能甚至可以说非常可能，越来越民主，但其民主的形式将不可避免地烙上根深蒂固的儒家传统印记。此外，与其说1949年后的共产党政体是中国历史准则的某种异类，不如认为在很多方面，共产党的统治依然没有脱离国家传统，这种迹象自邓小平时代起更为明显，但毛泽东时代亦是如此。

崛起为世界主要大国的中国将呈现出与西方完全不同的政治形态。由于共产党政府主导的转型取得了巨大成功，因此在国内享有极高的声望和支持率，这突出反映在中国人展望未来时所表现出的自信中（见图10－9和图10－10）。因此，在未来20年甚至更长时期内，中国共产党仍将继续执政。此外，鉴于中国共产党取得的成就，其全球声望的恢复、提高也无可厚非，实际上，这一过程已经开始了。在此背景下，我们应该从完全不同于观察苏联的视角来审视中国共产党的政权：毕竟，在前者失败后，中共取得了成功。而且自邓小平以来，中国实施的是与过去根本不同的战略：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不过，社会主义特质在中国社会仍留有深刻而持久的印记：毛泽东时代的土地改革消灭了封建地主（与印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忠诚于无阶级社会的理念；对公平的执着信念；高举社会主义旗帜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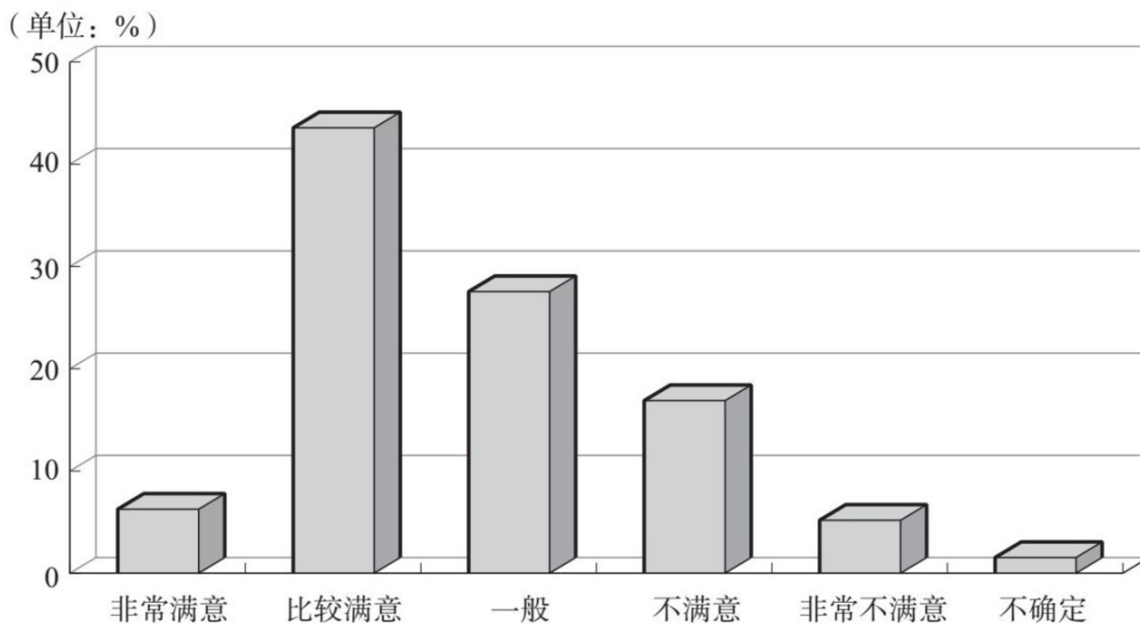


图10–9 中国青年对“你对现在的生活条件满意吗”的回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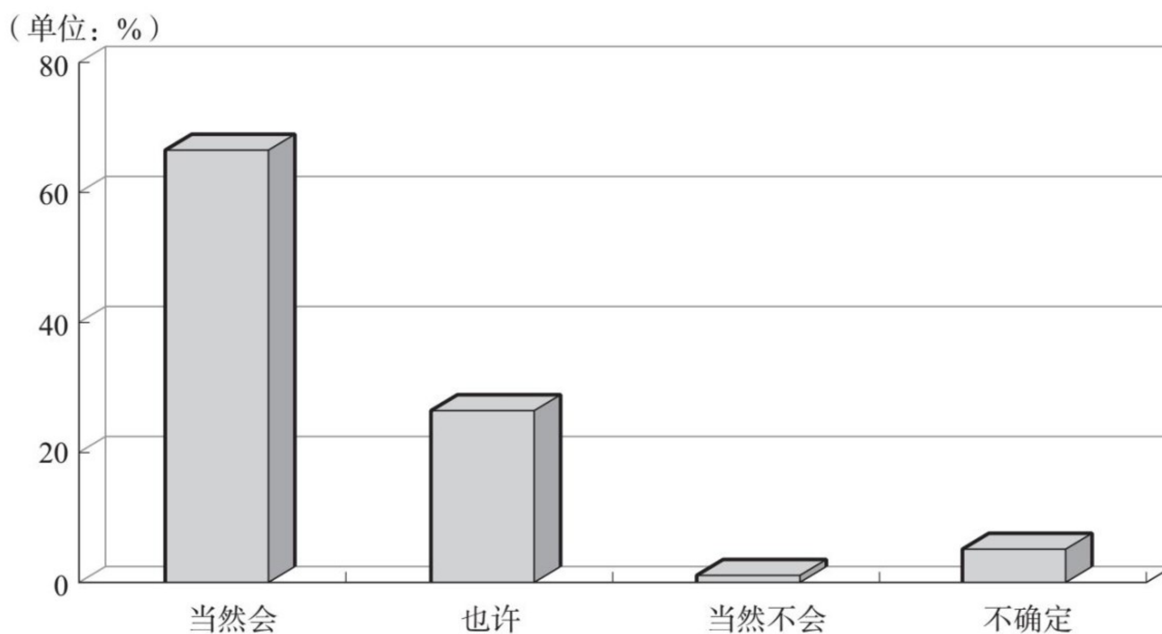


图10–10 中国青年对“你相信未来生活会更美好吗”的回答

在此背景下，我们必须要认识到中国民众对毛泽东的崇敬仍远胜于邓小平。在天安门广场以北的天安门城楼之上，仍高挂着毛泽东的巨幅画像。而他的遗体则被安放在天安门广场的毛主席纪念堂之中，

每年来凭吊的民众达数万人之多。然而，不论社会主义的中国将何去何从，中国对世界的主要政治影响因素仍将是儒家传统文化、西式民主传统的欠缺、政府的中心地位，以及任何可能出现的民间团体的相对弱势。中国更加民主之后，也会和西方有着千差万别。

总而言之，中国仍将扮演西方模式替代者的角色，其模式中蕴含着与西方截然不同的政治传统：后殖民时代的发展中国家、共产党政权、高度成熟的治国方略、儒家传统等。

价值观之争

200年来西方主导世界的事实，使得价值观之争基本上在所谓文明的价值观与落后或保守的价值观之间展开，在西方看来，前者指的就是西方，后者不仅指伊斯兰世界，还多多少少包括其他文化。事实上，价值观和文化的冲突比这种争论所暗示的要复杂、微妙得多。冷战期间，价值观冲突主要表现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之间。在当今现代性竞争的时代（现代性仍将是21世纪以及此后时期的指导理念），价值观争论则主要围绕文化、而非意识形态展开，因为社会的基本价值观主要是各自独特历史和文化的产物。尽管从表面上看，这些价值观也许呈现不同的形态，但实际上却经常会惊人地相似。

正如约翰·格雷（John Grey）所指出，就宽容而言，西方没有什么独特之处："当我们还没有宗教宽容时，奥斯曼人已经这么做了，中世纪西班牙的摩尔王国和印度阿育王的佛教王国也是如此。因此，宽容可以被视为普世价值。它并非为自由主义独享，甚至也不是现代性特有的。"即便如此，不同的人群所珍视的价值观之间也经常会爆发矛盾与冲突。在这个价值观多元且经常相互竞争的世界，实现对立的价值观共存共容，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实际上，对于现代性多元竞

争的全球化世界而言，要想让其以相对安宁、和睦方式存在，前提条件就是价值观的共存共容。这也将使西方世界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因为西方已经习惯于将自己的价值观视为规范，强加于其他国家之上，要求国际社会广泛接受其所倡导的价值观。

在这场价值观大争论中，中国无疑将是主角之一，这具有两重意义。第一层意义在于，中国将强烈抵制西方以人权（包括缺乏民主和言论自由有限）为借口贬低其国际声誉的言论。20世纪90年代，美国就曾经就上述问题对中国进行指责，中国则成功地对其进行了抵制，其主要原因就在于中国成功地争取到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支持。作为反击，中国及其支持者主张，政府优先考虑的应该是国际环境下的经济和社会权利，而不是国内政治权利。这一争论基本上反映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不同的优先选择、利益和经历。20世纪90年代末，随着中国持续增长的影响力开始使大国权力的均势和价值观争论的本质发生变化，美国的这些指责逐渐偃旗息鼓。事实上，21世纪前10年，由于在伊拉克和关塔那摩行为不当，不得不为自己辩护的变成了美国（而非中国）。2010年的联合国大会中，欧盟所提出的人权提案遭到了与会192个成员国中127个国家的反对（2009年反对票为117票），这一点也颇令人玩味。

第二重意义在于，短期来看，中国不会更多地就政治发难，但就长期而言，政治价值观无疑将具有更为重要的作用。正如我们所见，在中国的政治秩序中，基于儒家传统文化的伦理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在中国文化中，对与错泾渭分明，这也反应在强调儿童应从家庭和学校学习正确的道德行为之上。儒家学说本质上是一整套规范正确行为方式的观念。就此而言，尽管其是世俗的，与宗教无关，但与《圣经》和《古兰经》这样的主要宗教文献并无区别。封建王朝时代，儒家的教化为政府行为和中国式政权的本质奠定了基础，现在这种传统正又卷土重来。中国政府发表观点和声明时常常表现出的道德语气，反映了儒家文化的持续影响。而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以及其他儒家

社会，如日本和韩国）和西方社会在价值观方面复杂的深层次区别可谓无处不在，例如以团体为基础的集体主义（而非个人主义）、家文化、法治意识和以法律手段解决纠纷的意识相对淡薄。随着中国影响力的与日俱增，中国的价值观将对世界产生重要影响。

新兴城市和超大城市的兴起

1980年，中国的城镇人口只占其总人口的22%。现在，中国的城镇人口为6亿，占其总人口的比例为45%，而美国则为80%多。有预测认为，2025年，中国的城镇人口将达到9.26亿，2030年将超过10亿。就此而言，从现在起到2025年这不到15年的时间内，中国的城镇人口将增加3.26亿，这比美国的总人口数还要多。在20年左右的时间里，中国的城镇人口数量翻了一番，这对中国城市的本质和特征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1990~2007年间，通过不断向周围扩展，中国城市的规模不断扩张，居民数量也不断增长（主要源于周边地区的居民的并入，而非人口迁移）。未来，人口的迁移将对城市居民数量的增长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迁移人口将占到城市新增人口的3/4。按照目前的发展趋势，中型城市（即人口在150万~500万之间的城市），将吸收城镇新增人口的40%。中型城市的人口数将翻一番，数量也将由现在的73个增长至115个。与此同时，人口超过一千万的超大城市，将继续快速发展。至2025年，特大型城市居民总数占中国人口的比例将达13%，2005年这一数仅为6%。在未来的20年内，中国将出现8个超大城市，除现有的北京、上海外，还将包括成都、重庆、广州、深圳、天津和武汉。这些城市的人口也将由现在的3 400万增长至2025年的1.2亿，几乎翻了2番。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城市的规模则取决于对界定的方式，这也就解释了为何具有3 000万人口的重庆经常被称为中国第一大城市。实际上，重庆的面积与奥地利相当，大部分人口为城镇居民。实际上，以上我们提到的数字都是市区人口的数量，换句话说都是城市居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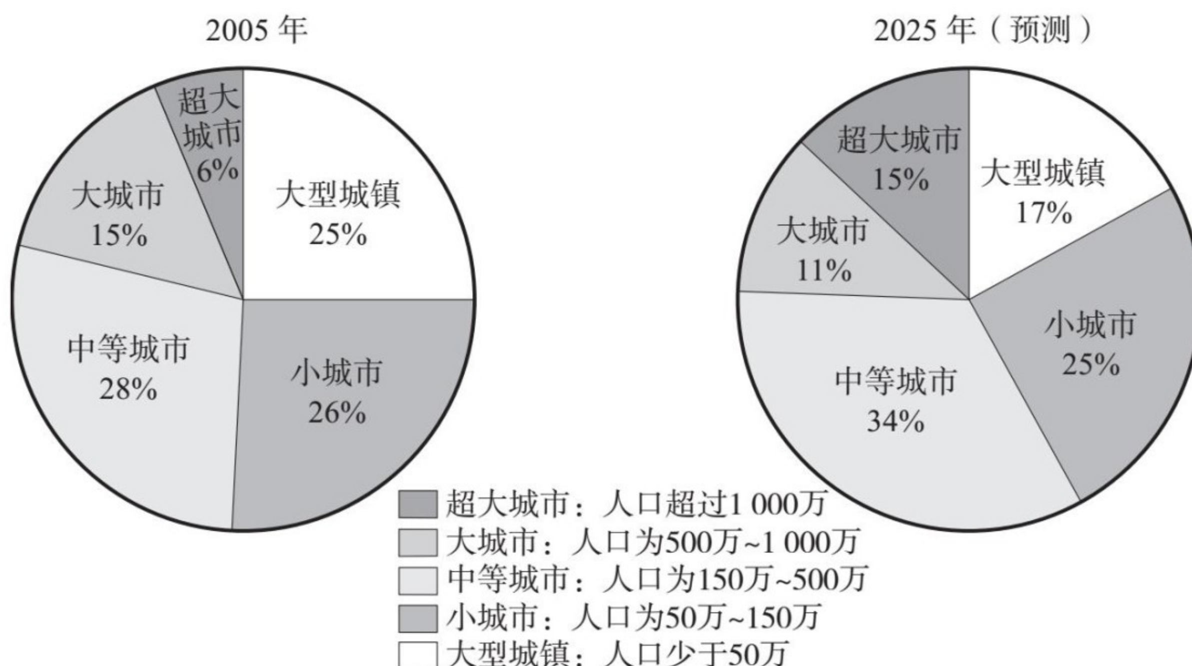


图10–11 中国城镇人口的分布（按城市规模分类）

数据来源：麦肯锡全球研究院

如此规模的城镇化需求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得以释放，其影响和规模远非之前北美和西欧的城镇化进程可比。至2025年，中国需要新建900~1 100兆瓦的发电能力，以满足城市的能源需求。此外，中国还需在同期新建50亿平方米的公路、28 000千米的计算机电缆和2万~5万座摩天大楼。在耕地面积不断锐减的情况下，这将对土地供应造成巨大的压力。空气质量、饮用水、城市金融、教育和医疗等方面的压力也很大。

城市交通方面所面临的挑战尤为严峻。中国深层次的问题在于人口密度。尽管中国与美国的领土面积相当，但中国人口却是美国的4倍，这也意味着其人口密度是美国的4倍。美国的城市空间也远比中国充裕。这也是为何美国能够依赖私家车而非公共交通的原因之一。美国的公共交通数量很少，甚至几乎不存在。这对中国来说是难以想象的。如果中国人都选择私家车出行，城市就会堵成一锅粥。即便在私家车保有量仍相对较低（按西方标准）、很多城市大量兴修地铁的情

况下，交通拥堵也已经成为北京、上海等城市的顽疾。鉴于中国城镇化的特征（即规模、速度和人口密度），中国将不得不在城市交通的诸多领域进行创新，这不仅仅限于公共交通。我们将亲眼见证中国城市的发展，假以时日，必将对全球产生重要影响。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的城市将成为印度、巴西、墨西哥等面临同样问题的、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的榜样。

中国人已经开始试验一种全新的城市交通方式，无须占用任何地面空间并可实现太阳能驱动。为应对中国的拥堵和空气质量问题，深圳的一家企业——深圳华世未来泊车设备有限公司发明了一种全新的交通工具。目前这种交通工具还没有确切的名称，人们将其称为立体快巴、空中巴士或陆地空客（见下图）。



中国的立体快巴，一种推广中的全新城市交通方式
图片来源：深圳迪特格工业品设计有限公司

这一全新的交通工具沿着固定的轨道运行，轨道宽度相当于两个交通车道。车厢则位于路面的上空，车体下面镂空，其他车辆则可以不受干扰地在车体下面通过。这种半公交、半火车的交通工具，一次

最多可搭载1 200名乘客，平均时速可达每小时40公里。其动力来源于市政电力和车顶部和车站处的太阳能电板。立体快巴的宽度为6米，其所装载的乘客量相当于普通公交的40倍，因此节约了能源，极大地减少了碳排放。其速度也远高于普通公交，因此可明显缓解交通拥堵。其建设成本只相当于地铁的1/3。据估计，至2025年，中国将需要新建170套公交体系，因此空中快巴的利益极为可观，这也不足为奇。北京正在门头沟区建设9公里的试验线路，一旦通过测试，将再修建186公里的线路。此外，河北的石家庄和安徽的芜湖，也正在申请资金修建空中快巴。

你会说汉语吗？

中国人口数量如此庞大的影响之一就是世界上将汉语作为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的人数为英语的两倍，其中绝大部分人生活在中国。不过，中国的崛起使世界其他地区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将中文作为第二语言。自2006年以来，这一过程得到中国政府的大力支持，他们在许多国家设立孔子学院，这些学院通常与当地大学挂钩。2010年6月，全世界已有94个国家（地区）设立了316所孔子学院和337个孔子课堂。中国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即国家汉办）的计划是，在2010年年底之前，设立500所孔子学院；2020年，孔子学院的数量达到1 000所。孔子学院大量借鉴英国文化学院、法语联盟和歌德学院的模式，其主要目的是中文教育，包括培养中文教师、传播中国文化。据估计，至2008年年底，全球有4 000万人正在学习中文（2010年，这一数字将升至1个亿），100个国家的2 500所大学设置了中文课程。汉语在东亚的发展趋势令人惊叹。以粤语为第一语言的中国香港地区在这一方面的步伐很快，东南亚的海外华人团体也是如此。在韩国，学习汉语的学生人数达16万，这一数字在过去5年内增长了66%，所有小学和初中都开设了汉语课程。泰国的中小学也是如此。泰国政府希望至

2011年可以有1/3的高中生能学习并使用汉语。在日本，就教授范围而言，汉语已经成为仅次于英语的第二大外语。2009年，马来西亚教育部宣布正在考虑将汉语列为中小学的必修课。2010年，印度教育部部长卡皮尔·西巴尔（Kapil Sibal）宣布将第一次在印度的中学引入汉语课程。当前，汉语普及的最大障碍之一就是汉语教师的缺乏，中国教育部开始成批派遣汉语教师前往柬埔寨、泰国、印度尼西亚、肯尼亚、阿根廷以及其他许多国家。汉语对东亚地区的吸引力是显而易见的：既然中国成为东亚经济中心，是该地区国家迄今为止最重要的出口市场和国内投资的主要来源，那么说好汉语对贸易、外交和文化交流就越发重要。

相比之下，西方的汉语教育力度较小，但即便如此，也已经爆发了汉语热，尽管形式要温和很多。2006年的一次在美国高中展开的调查中，有2 400人坦言，如果条件允许，他们会考虑学习汉语。立志要成为中文教学中心的芝加哥，现在学习汉语的中小学学生的人数已经达到了两万。据估计，现在全美开设中文课程的中小学已经达到了1 600所，而10年之前只有300所左右，不过缺乏受过培训的老师也是主要障碍之一。在美国约27 500所开设外语课程的中学中，开设汉语教育的比例由1997年的1%升至2008年的4%。英国的情况也与之类似，2000年只有2 233人拿到了汉语的普通中等教育证书，2004年为3 726人。一小部分私立学校也开始提供汉语选修课程，公立教育体系中也是如此。英国高等院校中将汉语作为主修课程的学生数量在2002~2005年间翻了一番，其他欧洲国家也出现了类似增长。西方（特别是美英两国）反应迟缓应归因于其在语言问题上故步自封（在过去10年里已经有数千所美国学校不再开设外语课程），未能从广泛层面上理解中国崛起的意义。

在当今的全球化时代，随着媒体全球化的加速发展，语言显然是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英语成为国际通用语言——对话者首选语言，以种种方式给美国带来了巨大利益。现在谈论汉语将来能产生怎

样的影响力还为时太早，但假以时日其必将与英语一起成为全球通用语言，也许最终超越后者。在此背景下，研究互联网这一案例是很有趣的。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的博客管理员布雷特·福塞特（Bret Fausett）认为："英语在互联网的应用正处于鼎盛时期。未来数年内，随着国际化的域名被引入互联网，用户可以用本土语言完成全部在线体验，英语作为互联网中心语言的地位将下降。"实际上，2010年5月起互联网已经开始引入了非拉丁语的域名。

预测语言未来发展趋势绝非易事。正如语言学权威戴维·克里斯特尔（David Crystal）所言："在中世纪，如果你敢预测拉丁语将不再被用于教育，人们会当面嘲笑你。同样，18世纪，如果认为除法语之外还有某种语言会成为未来文明社会的标准用语，也会受到嘲讽。"英语的兴起恰逢美国成为全球领袖之时，也是这一过程的产物。同样，美国的衰落将危及英语的地位：全球通用语言的地位不是凭空形成的，而是与民族国家的权力息息相关。英语和汉语对全球通用语言地位的争夺已初露端倪，很可能会持续一个甚至几个世纪之久。然而，这一竞争无疑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主要是因为作为语言和文化形式，它们有着天壤之别：一个是字母文字，另一个是象形文字；一个是单一口语的载体，另一个（就书面形式而言）包含众多不同的方言；英语依靠海外扩张和征服得以推广，汉语则通过渐进的领土拓展传播。

中国大学的崛起

美国施加全球影响力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高等教育。美国拥有公认的世界上最好的大学，这些学校吸引了相当一部分全球最优秀的学者和学生。在美国顶级大学，研究者可以使用最好的设备和资源；哈佛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麻省理工学院等高校的文凭所代表的荣誉远高于其他任何学校（也许牛津和剑桥除外）。当然，优秀的大

学，不论公立还是私立，都需要投入大量国民财富和资源。因此，迄今为止最好的大学都在西方。在《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的2010年世界大学排行榜上，美国大学在前10名中拥有7席，余下3席则属于英国。排名前30位的大学中，亚洲大学仅有3所，香港大学第21位，东京大学第26位，浦项科技大学第28位。排名前200位的大学中，中国大陆有6所，北京大学第37位，中国科技大学第49位，清华大学第58位，南京大学第120位，中山大学第171位，浙江大学第197位。2004年，在排名前200位的大学中，只有5所中国高校。上海交通大学的“世界大学学术排行榜”和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发布的类似排名，也显示了中国大学在世界的排名正在上升。此外，中国也在日益成为顶尖商务教育的主要中心，根据英国《金融时报》的“EMBA”排名，排名前20个项目中有4个在中国（包括中国香港地区）。

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外国留学生到中国大学求学。2003~2004学年，共有77 628名外籍学生在中国大学攻读高等学位，其中80%来自亚洲其他国家。韩国学生的人数远远超出其他国家，将近一半；其他学生来自日本、越南、泰国、印度尼西亚、尼泊尔等国家。另一方面，大量中国学生留学海外，尤其青睐美英两国。2009~2010学年，在美学习的中国留学生人数达12.8万人，2008年英国招收的中国学生为7.5万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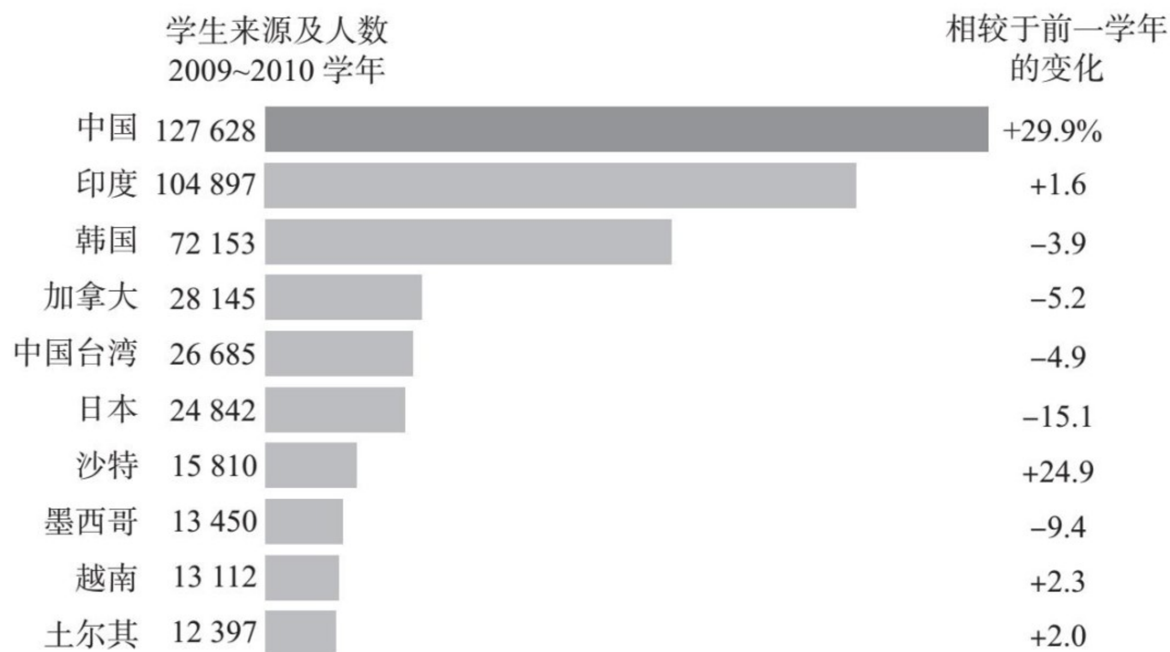


图10–12 2009~2010学年在美国大学学习的外国学生

数据来源：美国国际教育研究所

未来20年中国大学的全球排名极有可能稳步上升，最终进入前10之列。为了加速这一进程，中国政府下决心吸引海外顶尖华裔学者在中国大学任职。随着政府投入的不断加大和硬件设施的不断改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等学校终将成为世界公认的优秀学府，对全世界最优秀学者（不论是否是华裔）的吸引力与日俱增。中国大学显然已经成为吸引东亚学生的磁石，如果其能够对该地区的学术产生与中国经济同等的作用，那么这一趋势还会更加明显。

作为软实力的中国文化

当一个国家处于上升期时，其影响力亦将呈现不断扩大的良性循环态势。随着中国日渐强大，越来越多的人想要了解它，阅读相关书

籍，收看有关的电视节目或者去中国旅行。随着中国越来越富有、人民视野越来越开阔，其文化产业也随之成倍增长。穷国几乎没有资源用于开办画廊和艺术中心，最多只能维持小规模的电影业、平淡乏味的电视节目和陈旧的体育设施。媒体也无法在国外开设分支，只能依赖西方通讯社或媒体巨头出售的文章来获取国外新闻。例如，数年前的一篇报道显示15~35岁的中国男性公民中只有15%积极参加体育运动，与之相比，美国是50%；同期中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不超过一平方米。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中国的视野也将越发开阔，考虑过去不可能实现的目标，如举办奥运会，合作拍摄国际影星主演的电影，推动少林武僧环球巡演，在北京修建堪称艺术品的地铁网络及委托世界顶级建筑师设计富丽堂皇的新建筑等。财富和经济力量是施展软实力和文化影响力的前提条件。

好莱坞对世界电影产业的主导已超过半个世纪之久，在此过程中，其他国家的电影业则不断被边缘化。但是现在已经有两个强大的对手浮出水面。正如迈克尔·柯廷（Michael Curtin）所言：

> 贸易、工业、政治和传媒技术方面的最新变化已经为亚洲传媒业加快扩张和转型提供了动力，印度和中国的影视业制作中心逐渐成长为好莱坞的主要竞争者，如果说总收入尚不能与之匹敌的话，那么至少就受众的数量和热情而言足以相提并论……传媒公司CEO（首席执行官）第一次开始认真地将目光投向全球的华人影视市场。华人电影发烧友和追剧迷的数量，比美国和欧洲合起来还要多。

过去10年间，张艺谋和陈凯歌这些中国大陆导演和李安等中国台湾地区的导演，在西方越来越有名望，中国影星，如巩俐、李连杰、章子怡和成龙等，同样也是如此。最近几年，中国出品了一系列影星云集的大制作，资金通常来源于中国内地、中国香港和美国，在中国和西方都取得了巨大的票房佳绩。《英雄》《藏龙卧虎》《十面埋

伏》《功夫之王》和《满城尽带黄金甲》等佳片，标志着中国已经从过去低成本的文艺电影全面转型。这些巨星云集的电影一般是以过去某个朝代为背景的历史剧，从中国丰富的历史中提取素材，配以一连串激烈的武打场景。好莱坞电影和中国电影的故事情节和叙述方式差别很大，这也不足为奇，而这正是二者不同文化的体现。好莱坞强调结局皆大欢喜，而这从来都不是中国电影重点考虑的问题；好莱坞非常看重情节，中国电影注重武打效果；美国人关心的是电影本身的真实性，中国观众关心的是电影反映的社会真实性。从长远来看，中国电影业很可能将挑战好莱坞的全球霸主地位，给世界注入截然不同的价值观。此外，中国企业极有可能在未来以索尼收购哥伦比亚电影公司的方式将好莱坞的电影制片公司收入囊中，不过这也应该不会影响后者好莱坞式的电影作品。

值得关注的是，在此背景下武术已经在西方产生非同寻常的影响力。50年前，西方儿童对格斗的印象几乎全部来自拳击以及摔跤（当然，摔跤的影响要小得多）。20世纪70年代以来，这一状况完全被改变。西方传统格斗方式被东亚——特别是中国、日本和韩国——的武术、柔道和跆拳道取代，而在老年人中，太极的影响力也在与日俱增。在运动场、健身房和电影院，某些亚洲传统文化和运动已经取代西方的文化和运动，武术长期受到欢迎就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

中国经济的崛起以及遍布世界的华人群体正在改变中国艺术品市场的面貌。现在，纽约和伦敦中国艺术品市场上中国买家的数量与西方买家一样多。而就在数年前，这类艺术品整体上还被国际艺术品市场忽略。2006年，在苏富比和佳士得（世界最大的两家拍卖行）在纽约、伦敦和中国香港举行的拍卖会上，总计拍出了价值1.9亿美元的当代亚洲艺术品，价格屡创新高，其中大多数拍品来自中国。2006年年底在北京举办的拍卖会上，刘小东的一幅油画被一家中国企业以270万美元竞得，这是中国画家单幅画价的最高纪录。2006年张晓刚的作品拍卖金额为2 360万美元，在法国艺术价格网的世界艺术家畅销百强榜

前中仅次于让－米切尔·巴斯奎特（Jean-Michel Basquiat），名列第二。此次共有24位中国艺术家上榜，相较之下，5年前一位也没有。2010年，苏富比中国艺术品部国际主管表示，在此前的5年里，中国大陆的客户至少增加了3倍，其交易额增加了3~4倍。这些变化反映出中国艺术品和艺术家的全球影响力和热度不断上升。

然而，就国际媒体而言，中国仍然大幅落后于西方。近来，中国政府试图扩展国际影响力，提升国家通讯社新华社的地位，发行了《人民日报》新的海外版和《环球时报》英文版，提升中央电视台的国际频道的专业化程度，让亚洲观众可以通过卫星收看一整套中国电视节目。与CNN（美国有线电视台新闻网）和BBC（英国广播公司）这些西方媒体吸引全球受众的能力相比，中国媒体才刚刚入门。但半岛电视台的成功表明，对西方媒体形成严峻挑战并非如人们过去料想中那样困难。据报道，在2009~2010年期间，中国政府在“外宣”上共投入870亿美元，其中很大一部分被投到了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新华社和《中国日报》上。因此，新华社现在利用半岛电视台的网络，开播了全天候的电视节目。与CNN和BBC抗衡的中央电视台，启用了国际化的主播队伍，一改政府喉舌的传统形象，专业化程度不断提升，报道的客观性逐渐为人所公认。中央电视台共开设了5个语种的6个国际频道，据称其全球观众达1.25亿。一些省级电视台同样也开设了外语频道。新华社在发展中国家广设分支机构，已成为非洲民众最主要的新闻来源。目前，新华社在全世界共设有117个分支机构，雇员达400余人，并计划于2020年将其海外分支机构的数量增至180个。中央电视台的潜力尤为不应低估。其对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转播的平均收视人口为5亿，顶峰时达到8.42亿。2008年，中央电视台的收入预计将达到25亿美元（2002年时为10亿）。有这样的国内基础，随着中国的影响遍及世界，中央电视台的国际潜力将是巨大的。与此同时，鲁珀特·默多克旗下的新闻集团在2010年宣布，将其所拥有的三家中国频道出售给中国一家国有的私募基金，这实际上也是在侧面承认其在中国的失败。

北京奥运会

传统上，体育竞技并非中国所长，但在过去20年里，中国运动员取得了越来越多的成功。为了提高体育成绩，中国政府投入了大量经费改善体育设施，并将重点放在奥运会项目上，因为奥运会成绩显然被认为是大国的标志之一。虽然现代中国只是从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开始参赛，但付出终有回报。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中国拿到了32枚金牌，位列美国之后、俄罗斯之前。中国于1993年首次申办奥运会，但在2001年才取得成功。2008年北京奥运会是中国第一次举办的大型全球运动会，显然，在筹备过程中，中国政府将其视为向世界展示自1978年以来中国所取得伟大成就的良机。准备工作浩繁且周密，投入巨大。宏伟的新体育馆拔地而起，新建的公园向游人开放，新建了不少道路和地铁。据估计，整个运动会的花费——包括很多基础设施项目——达430亿美元。鸟巢无疑是最引人注目的部分，集规模、美观、优雅、精密和舒适为一身，很快成为世界标志性建筑之一。鸟巢的设计者是瑞士建筑师赫尔佐格和德梅隆以及中国艺术家艾未未，包含了很多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为筹备奥运会，中国政府全力以赴改善北京的空气质量，包括实行单双号限行等举措，这个措施被证明比较有效，并得以延续。

人们普遍认为这次奥运会本身无与伦比。各项比赛组织完善，运行精准，运动员得到精心款待，没有出现任何重大事故。中国在金牌榜上名列首位，获得51枚金牌，美国仅获得36枚——虽然美国奖牌总数超过中国10枚。最令人难忘的是由中国电影导演张艺谋执导的开幕式。精心编排的表演动用了15 000名演员，分为3个部分，主要围绕中国历史展开。开幕式充分运用许多典型的中国元素，例如舞者在一幅巨大画卷上翩翩起舞，2 008名鼓手整齐列队、敲击“缶”这一中国传统打击乐器。这显然是面向世界对中国历史和文化充满自信、通俗易懂的展现。奥运会结束后，世界普遍认同中国将奥运会盛事提高到了

一个全新的层次，其他国家几乎不可能与之比肩，更不用说超越。当会旗传递给2012年举办城市伦敦时，英国开始担忧如何才能举办一场与北京奥运相比不至于苍白乏味的奥运会。虽然英国更为发达，但英国政府一开始就表明态度：2012年奥运会会朴素得多。

除奥运会之外，中国运动员在网球赛事上也形成了一定的影响，2007年有6名中国女选手排名进入女子前120位。2008年，郑洁打进了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的女子半决赛。2011年，李娜不仅打入了澳网的决赛，更是获得了法网的冠军。目前为止，中国最为成功的运动员无疑是姚明，他成为美国NBA的顶级选手之一，被中国人视为巨星。与欧洲的顶级足球俱乐部一样，NBA也将中国视为该项运动的主要新市场。与日本和印度不同，中国政府认为高超的体育水平对国家地位和声望具有重大意义，所以未来数十年中国很可能在一些较有影响力的运动项目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中餐和中医

中国已在两个领域享有巨大的全球影响力：饮食和传统中医，虽然相较而言后者的影响力要小得多。多年以来，中国的烹饪艺术伴随华人移民而流传至世界各地，现在已为世界大部分地区所熟知。即使对中国知之甚少的人，通常也知道一两道中国菜，熟悉中国筷子，虽然不知道怎样使用。有趣的是，中餐的全球影响力并非因中国的崛起而产生，恰恰相反，源自它过去的穷困以及贫穷的中国人在他乡寻求更好生活的愿望。通常情况下，华人移民要么试图在定居地开设中餐馆，要么在中餐馆打工，为将来自己当餐馆老板做准备。中医在中国大陆以外地区的传播过程大体与中餐相同：海外华人将中医带出了国门，并在慢慢向当地居民推广。

中餐和中医都是中国悠久历史的产物，与其文明国家的起源颇有渊源。想想世界大部分地区是通过这两种文化遗产的精髓了解中国的，的确是一件趣事。中餐和中医的传播远早于中国的崛起，而中国的崛起无疑将加快其传播的进程。在此前的200多年里，那些被包括东南亚居民在内的外国人熟知的中国菜大多来自华人移民最多的地区，即广东省和福建省，而今，其他省份的菜肴也正在迅速流传，餐馆也遍地开花。中国菜肴十分丰富，种类繁多，这意味它能够满足众多不同的口味和需求，从廉价快餐到豪华盛宴，无一不可。过去人们需求的绝大多数是廉价中餐，最近这些年情况已经明显改变。中餐越来越受欢迎与“二战”后餐饮业的发展密不可分，但是不要忘记，虽然餐饮业的兴盛对于西方而言较为新鲜，但在中国，却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

中医的全球影响力也将持续扩大。中国许多医院都有中医门诊，医生通常具备西医和中医的双重行医资格。开西药时，他们经常会结合中医进行治疗，笔者曾经在北京一所医院体验过。中医在西方发展的瓶颈在于其无法像西医一样进行监管，尽管中医的临床试验在中国非常普遍。西医在中国取得了不小的成功，但中医仍然受到多数人的青睐，其中包括富裕的中产阶层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士。这主要是因为其已经历经数千年的检验，而且价格更便宜，副作用也小。人们承认，西药治疗癌症这样的疾病更有效，但即使用了西药，接下来一般还是会重新采用中药。中西医的对比颇具说服力地概括了文明智慧和科学知识的差异。中医是数千年试验和试错的结晶，是数百万人在日常生活和经验中积累的；西医来自科学方法和发明，来自提炼化学物品后的产物。越来越多的西方人承认，来源于古文明经验的缓解性药物和医疗方法是医学有效而重要的组成部分，即便我们并不理解它们大多数是如何产生效用的。

西方的没落

本章的目的在于探寻未来半个世纪中国全球霸权的发展路径。得出结论之前我们应该思考这枚硬币的另一面。西方将咽下这一进程最难以接受的苦果，发现自己的历史地位将被中国取代。其中的变革之深，难以想象。整整两个世纪，在某些方面的时间还要更久，西方（先是欧洲、接下来是美国）在全球占据压倒性优势。1945年以后，欧洲不得不调整心态以适应它不再是世界政治主导力量的事实。作为曾经的主宰者，欧洲国家（特别是英法两国）现在感觉与世界中心渐行渐远，这个过程令其痛苦万分。它们建立了欧盟作为应对策略，以缓和欧洲国家权力和地位的下降趋势。

不过，主导权由欧洲易手美国这一事实无疑有助于减轻欧洲人的失落感。在冷战背景下，经过夸大和偷换，西方推出了遏制苏联的理念。这一理念至少在1989年之前有效地帮助西欧与美国一道成为全球博弈的主要行为体，尽管很大程度上西欧扮演的不过是个小伙伴的角色。然而，这完全不是民族国家间仅仅基于利益而建立的正常关系。恰恰相反，美国是欧洲移民的产物，由欧洲人（以及非洲奴隶）创建，自建国之日起就自认为是与旧大陆颇有渊源的新大陆。换句话说，正是历史、文明、文化、种族以及地缘政治的危机感成就并巩固了西方的联盟。

不论是衰落中的欧洲还是从权力宝座上退位的美国，都不会从中国的崛起中获得上述补偿。对于这种结果，欧洲至少还有些准备：过去的半个世纪一直在试图适应衰落和权力易手的事实。然而直至今日，欧洲仍很难理解自己的世界地位持续下滑的状况并对目标做出相应的调整，更不要说接受现状了。在此背景之下，英国的经历无疑最值得关注。经过近乎绝望的努力，英国在一流国家排行榜上象征性地占据了一席之地，保住了全球大国的地位。它一直唯美国马首是瞻，时常徘徊于其阴影之下，似乎总是准备执行主人的命令。英国的外交政策长期克隆美国，国防和情报政策几乎完全依赖美国，与美国的同类政策紧密结合。英国对美国的依赖，不仅是因为自身地位的虚弱及

在其帝国崩溃之后未能确定独立的世界地位，更是大国地位不再这一事实对其造成创伤的结果。对其而言，发展与美国的关系是对其过去荣光的一种替代。即便现在军事实力已大不如昔（日益陈旧的军事力量正是英国迅速衰落的证明），一旦时机出现，英国仍时刻准备着对外进行军事干涉，伊拉克、阿富汗乃至最近的利比亚都是例证。不顾实力衰退和环境变化的帝国心态，仍时常以荒谬的方式作祟。不断持续的欧洲生存危机也突出反映了欧洲国家为了适应一个其重要性大幅降低的世界而进行调整（尤其是心态调整）的难度有多大。此外，欧洲的衰落几乎肯定会无限期持续下去。欧洲过去400年的辉煌一去不复返了，将如同古希腊和罗马帝国一样成为历史的遗迹。作为古希腊和古罗马帝国现实化身的希腊和意大利，除了残留下来的历史遗迹外，也并未体现出多少古老帝国的辉煌。

相较于美国将要面对的物质和心理危机而言，欧洲所承受的苦痛实在微不足道。美国完全没有做好迎接失去全球霸权的准备。小布什政府时期，美国试图将自己重新界定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能够通过单边主义和回避盟国的需求进一步攫取利益。也就是说，美国不但没有意识到它的相对衰落和权力收缩这一前景，反而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陶醉地认为美国的权力可以进一步加强，美国正处于上升期，21世纪的世界会重新按照美国的想法重塑。新保守主义是小布什政府时期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新保守主义断言，美国能够而且应该赋予自己新的定位。“9·11”恐惧袭击事件后不久，华盛顿陷入一场关于帝国的争论，内容涉及时下的美国是否仍属帝国及其可能的含义。小布什政府是一个富有攻击性的、自负的、实施扩张主义的美国迄今为止最为极端的代表。然而，即使在世界普遍认为小布什的政策由于伊拉克的混乱局面而宣告失败之后，美国国内还是很少有人认为美国正处于长期的衰落之中，它绝非处于取得全球新霸权的前夜，事实上它的权力已经达到了顶峰。相反，美国民众普遍认为美国只需在行使全球领导权时减少对抗性、增加认同感。甚至中国在东亚取得的成就也没有被视为全球权力发生重大转变的预兆。

2007~2008年，巴拉克·奥巴马在党内初选和总统竞选期间进行了一定的反省，但也并没有认识到美国将不得不学会应对衰退，至少在大选前夕金融危机发生之前仍是如此。即使是2006~2007年期间美元大幅贬值也不曾引发对美国衰落的担忧，尽管有一小部分观察家承认，长期来看，美元的地位可能面临威胁。因此美国根本没有意识到未来可能出现的变化，仍然陶醉于过去和现在的辉煌中，更愿意相信星条旗永远高高飘扬。1918年后，英国同样忽视并且拒绝承认自己的衰落，不断地试图挽留住曾经获得的一切，直到最后别无选择时才不得不放手。的确，直到20世纪50年代，英国还半遮半掩地承认其正在衰落，当时其海外殖民地独立之势已十分明显。2008年9月的深度经济危机和金融体系几近崩溃很可能被证明是美国的转折点。相较于2004年的报告，2008年11月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的报告得出的结论发生了180度大转弯。2004年的报告认为美国的全球霸权还将延续，“断定其他主要大国已放弃制衡美国的目标”；新报告则预测美国即将走向衰落，多极化雏形初现，美国将渐渐被迫与中国和印度分享全球权力。2008年的报告宣称：“到2025年，美国将发现自己只是世界舞台上众多重要角色中的一个，尽管也许仍然是最强大的。”目前，承认美国正在衰落的美国民众仍只是极少数，即便在美国政府内部也是如此。沉重的债务负担无疑将使美国民众越发认清事实。债务重负将使美国各级政府，特别是联邦政府无法按照已经习惯的方式行事。债务的重压将是冷酷无情的。如果说在过去的30年里，美国在过度消费中陶醉不已，那么接下来它将不得不面临其留下的长期恶果。当前困扰美国的政治极化已经令美国政府进退失措的事实，意味着应对债务危机的重任远比想象中复杂、持久得多。当然，这是衰落初现所引发的后果，此后及未来的几十年内，各种影响将不断出现。就全球视角而言，最大的危险在于美国未来某时将转向对抗立场，视中国为敌人，意图遏制中国。这方面一个不太极端的例子是，2008年总统竞选期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参议员约翰·麦凯恩曾提议建立“民主国家联盟”，将中国和俄罗斯从中排除出去（他还试图将俄罗斯驱逐出在

G8集团），此举无疑将导致新的全球分裂。这还只是一个相对温和事例。从长期看，人们的担忧应该是美国会将中国拖入军备竞赛，造成类似于冷战的局面。美国正在进入漫长的经济、政治、军事衰退期。就中期而言，美国的反应可能不会那么令人愉悦，世界只能寄望其不要过于恶劣。

中国的文明根源和历史根源与西方截然不同，地理环境也是迥异，这一事实将极大地强化西方的挫折感、迷失感和不安全感。鉴于英美之间明显的亲缘关系和共性，英国与作为其对手和世界霸权继承者的美国之间的对抗是一回事；而美国面对作为其竞争者和最终取代者的中国则完全是另一回事，毕竟二者的文明和政治毫无共同点可言。对美国来说，失去掌控世界的能力（顶峰时美国甚至拥有能够决定全球所有重大问题的专属权），所带来的冲击将是深远的。随着中国的兴盛，西方普世主义将不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它的价值观和理念的影响力也将不断减弱。中国崛起为世界大国使所有事务都相对化。西方习惯于认为世界是西方的世界，国际社会是西方的社会，国际机构是西方的机构，世界货币——美元是西方的货币，世界语言——英语是西方的语言。西方一直认定，“西方的”这个形容词天然地、毫无疑问地应置于所有重要名词前。这种情况将不再出现。西方会非常痛苦地发现，世界不再属于西方。此外，西方还会渐渐意识到自己将面临与那些曾长期处于西方霸权阴影下的国家同样的境地——后者当时不得不学习并遵从西方的法则。衰落的西方必须与其他文化和国家更加公平地共处，被迫认可并学习其长处，这也将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在一个无法主导的世界，西方内部也极有可能分崩离析，这一进程甚至已经发生。随着澳大利亚被无情地纳入中国经济圈，假以时日，其与西方的联系必将会减弱。欧盟的主权债务危机在欧盟内部产生了新的裂痕，一些影响最为严重的国家寻求与中国建立更为紧密的联系。这无疑也是欧盟未来离心压力的预兆。与此同时，在美国民众的心中，欧洲的重要性也大为降低：1993年，有一半的美国民众将欧洲视为美国利益最为重要的地区，亚洲的比例只有31%。而在2011

年，态势却出现了逆转，有47%的民众将亚洲视为最为重要的地区，欧洲的比例则降至37%。

结语

界定中国的八大特性

大体而言，西方对中国崛起的反应有两种。其一是或多或少地只是从经济角度对其进行考量。我们可以称之为“唯经济因素”。西方对中国的增长数字表示疑虑，畏惧这些数字对中国的世界地位所具有的意义。然而任何过度的焦虑不安都会因为相信中国正变得越来越西化而有所缓解，从市场和证券交易到汽车和私人住宅，中国拥有现代西方社会所具有的一切。这种观点大大低估了中国崛起的影响，是眼光短浅、缺乏想象力的体现。经济上的变化尽管是基础性的，但也只是整个图景的一部分。上述观点忽视了政治和文化方面的重要意义，其所依据的是这样一个基本假设，即在经济转型的推动下，中国事实上将融入西方社会。此种观点有意无意地暗合了福山的“民主终结论”，即自1989年以来，西方的自由民主越发成为世界发展的方向。其二则是对中国的崛起表示质疑，总是预期它将以失败而告终或深陷危机。鉴于苏联解体等因素，有人坚持认为，不从根本上进行政治改革，中国的转型就无法持续：除非他们采取西方的模式，否则就会失败。前一观点认为中国会自动转向西方道路，后一观点虽认为并非如此，但二者都相信，中国要取得成功，就必须真正融入西方。

本书的预测是基于一种全新的思维。这种思维并不认为“西方道路”是唯一可行的模式。在就此探讨之前，我们不应忽略西方已经安然应对了每一次重大挑战，1989年击败了最强大的对手苏联后盛极一时。其拥有令人叹服的增长和创新纪录，这也是它被证明在如此长的

时间内如此具有活力的原因所在。与1917~1989年意识形态大对立时期非此即彼的极端对立不同，现在的选择更为微妙。东亚的现代化案例无一不从西方的经验中收获良多，中国自1978年以来的改革就深受西方模式影响。但如果就此认为这就是中国成功的关键甚至是中国崛起过程的主导，无疑是大错特错。中国转型（实际上，除日本之外的东亚各国皆是如此）带来的启迪是，其成功地将从西方和东亚邻国学习到的经验与自身历史文化结合起来，从而开发和释放本国的活力之源。这样的模式始于日本，此后其他东亚国家皆是如此。我们已从非此即彼的时代进入到相互融合的时代。

本书的中心论点是，现代性模式绝非只有一种，事实上是多种多样的。直至20世纪70年代左右，除日本外，现代性仍是为西方所独有。不过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我们已见证了全新现代性的出现，它们从西方吸取经验，但获得成功最终靠的是充分利用本土资源，以之作为基础进行建设并对其进行转化。这些全新的现代性的原创性不亚于其混合性。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其原创性也体现于混合性之中。混合性也并非为亚洲所独有或者是非西方的：面对东亚社会不断取得的成功，西方将不得不学习并且吸纳它们的真知灼见和特性。在一定程度上，情况已经如此。例如，西方借鉴了日本制造体系的某些创新举措，由于这些措施深深扎根于日本文化，移植到西方后效果并不理想。当然，问题的关键之一在于西方模式的哪些元素是必不可少的，哪些是可选的。显然，目前所有成功的经济转型案例都是以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为基础的，尽管这些国家的经济机制和政策千差万别，更不要提政治和文化的巨大差异了。然而，认为启蒙运动的原则（例如法治、独立司法体系和代议制政府）也是成功转型的前提之一，必须加以吸收借鉴的观点，目前还未得到任何证明。日本的发达程度至少与西方不相上下，但其却并非以启蒙运动原则为基础，也没有采取西式民主，尽管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西方出于政治的考量就已经坚信如此了。即便中国进一步完善代议制政府、提高司法体系的独立

性——从长期来看这是有可能的，肯定也是按照自己的方式进行，依据本国的历史、文化传统，而这些与西方的传统特征几乎毫无瓜葛。

西方总是希望能够大体按照自身的标准——有时甚至是唯一标准——评价中国，尽管可以理解，但这无疑是错误的。这种想法，说好听点儿，只是相对无知的狭隘思想的体现；说难听点儿，则反映了西方过分狂傲的心态，即认为西方经验放之四海而皆准。西方极易以此为借口，拒绝投入精力去理解和尊重其他国家文化、历史和传统所蕴含的智慧和特殊性。正如保罗·柯文所指出的，问题的实质在于，西方思想是在西方长期掌握主导权的情况下培育而成，绝非像人们期望的那样浸润着世界理念，事实上它是高度狭隘的，自认为具有普适价值，换句话说，就是自认为正直公正、具有永恒的适应性。如果我们已经知晓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答案，那么也就几乎没有从他人处借鉴的必要。当西方尚未遭遇重大挑战时，也就是过去两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西方这种傲慢心态的代价通常由他人来承担，因为他们被迫听从西方的要求；但当重大挑战来临时（来自中国和其他国家的挑战将日益增多），这样的狭隘思想只会加剧西方的脆弱，削弱其向他人学习并进行相应调整的能力。

完全或主要以西方的历史经验视角来解释和评估中国，显然不妥。顾名思义，这一做法将中国所有的特质排除在外，而正是这些特质造就了中国。西方认为值得关注的事物只有那些中国与西方的共通之处。中国历史和文化遭到摒弃，被视为死胡同或者只是向西方转型前的铺垫，正如西式盛宴前的开胃小吃。这样的思维方式不只是对中国和其他非西方文化的蔑视，很大程度上还是无的放矢的行为。由于按照自身标准审视中国，西方拒绝承认中国自身的独创性，更意识不到这种独创性将如何改变我们生活的世界。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也就是全球化即西方化时代最辉煌的时期，人们普遍用西方观念解释亚洲四小龙和中国的发展，从那时起，已经有人意识到对于这样一个具有如此丰富的历史文化的庞大国家不能就这么草率地下结论。然而

当前，认为历史发展进程只有西方化这一单一路径，仍是西方压倒性的共识。因此，对于西方这一全新的理念，我们不应夸大，但其的确已经存在，尽管仍只是萌芽初现。随着中国日渐强大同时坚决保持自身的特色，西方虽不情愿但必将不得不直面二者存在的巨大差异，体会其中的意味。理解中国将是21世纪的巨大挑战之一。

那么什么将是中国现代性的关键特性呢？共有八个方面，中国人相信“8”是个幸运的数字。为了研究这八种特性，我们不仅应当考虑中国现代性的内部特征，而且要从中国在全球的重要地位出发，考虑这些特性如何影响和构建它的全球观和国际关系。

第一，中国并非真正传统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而是文明国家。的确，中国自称为民族国家，但它对民族国家地位的默认是19世纪后期以来面对西方列强时日久积弱的结果。

中国人勉为其难地承认中国不得不适应世界，不再坚持让世界适应中国（这一想法的乌托邦色彩越来越浓，希望也越来越渺茫）。但这无法掩盖一个基本事实，即中国不是传统的民族国家。一个世纪看似很长，但对一个自认为有着数千年悠久历史的民族来说却只是白驹过隙。当代中国的主要面貌，包括社会关系和习俗、生活方式、优越感、国家观念和对统一的执着，都是中国文化的产物，而不是近代成为民族国家后的表现。就表面而言，中国似乎是一个民族国家，但骨子里流的却是文明国家的血。

有人可能会质疑中国在适应民族国家状态期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至于原有文化的连续性已被打破，甚至在很大程度上都已消失了。但事实恐怕并非如此。封建帝制（更为确切地说，应该是儒家思想）没能实现现代化转型，因此在1911年被辛亥革命所终结。国民党政府也未能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和统一，也没能打败侵略中国的列强（尤其是日本），导致其于1949年被推翻。毛泽东时期，中国试图清除掉封建时代的很多事物，从儒家学说、传统服装到旧式土地所有权

和已有的社会等级制度，无一幸免。到了改革时期，农业地位有所下降，工业地位逐步上升，关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的决议不断涌现。上述任一时期都代表了中国历史上一个意义深远的片段，相互之间具有很大的差异。然而中国的传统特性中的相当一部分，都可以在以上各个时期找到印记，直至今天仍清晰可见。这个国家依然拥有广袤的领土，与18世纪晚期清政府统治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疆域相差无几。政府处于社会的中心位置，神圣不可侵犯，与封建帝国时期无异。作为思想巨匠，孔子的学说正经历大规模复兴，其理念仍在很大程度上塑造着中国思考和行事的方式。尽管儒家时期和社会主义时期存在着巨大差异，但二者还是存在着很大的相似性。此举并非意在否认中国所发生的根本性变革，而是强调意义深远的延续性也是中国的特征之一。借用科学的术语，就是中国的DNA（脱氧核糖核酸）仍然完整如初。中国对历史的依赖比任何其他国家更甚。历史对当下有着巨大的影响。长久以来，未能实现现代化和统一的遗憾，一直如阴云一般笼罩着今天的中国，让中国人始终无法摆脱遗憾和痛苦。但随着中国最终超越了“屈辱的百年”、成功完成历时一个半世纪的现代化宏图，它将更多地从本国历史中寻求启示、精神养分和共同点。再次成为世界中心的中国将尽情享受悠久历史的荣光，感慨公平终归到来、世界恢复了它应有的地位和状态。

过去，积贫积弱的中国别无选择，不得不遵循他人的规则。这也正是其成为民族国家的原因，即便其从未真正相信过这一理念。此举只不过是权宜之计和必要的妥协罢了。但当中国步入现代社会并最终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时，它不会再受这些约束的限制，而是将设定自己的规则和条件。中国可以自愿地按照本国的历史和本能行事，彰显文明的特质。

第二，中国越来越有可能按朝贡体系而非民族国家体系的构想处理与东亚的关系。正如第8章所论及，朝贡体系存续了数千年之久，直至19世纪末走向终结。即便那时，朝贡体系也未完全消亡，而是以风

俗和习惯的方式（这也是其悠久历史的产物），潜藏在新兴主导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下。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即便相较于19世纪中叶之前，中国在东亚的地区的地位也已远不如昔，朝贡体系也从未完全消失。朝贡体系盛行了如此之久的事实，意味着其已成为中国和东亚国家考虑双方关系的思维定式。因此，中国在东亚地区地位的任何根本性变动及由此导致的中国与其邻国之间关系的变化，都能够看到朝贡体系的影子。朝贡体系的终结有两个原因，其一是欧洲列强和日本在东亚地区成为主导力量，其二是中国实力的持续下降。如今，欧洲强国早已退出该地区，其继任者美国现在也已江河日下，日本的光芒也正迅速地被中国所遮掩。另一方面，中国正大踏步地恢复东亚经济支柱的地位。换句话说，令民族国家体系主导东亚的条件正在消失，而与此同时，我们正在见证朝贡体系的关键特征的复兴。

朝贡体系的特征在于中国和邻国间的巨大不平衡以及双方对中国文化优越性的共识。费正清在《中国的世界秩序》中提到："如果中国仍然相信其优越性，那么它很可能依据历史来确定自己未来的角色。"鉴于中国对自身优越性依然深信不疑，中国持续增长的经济实力和庞大的人口将促使东亚地区重回与历史相同的格局。中国实际上已逐步成为所有东亚国家最为重要的市场。而对于自身与中国之间巨大的实力差距，东亚国家也并不感到畏惧或予以抗拒（日本可能例外），这与历史惊人地相似。事实上，在中国崛起过程中，除了日本，其他东亚国家都在有意识地寻求大力发展与中国的关系，而并非与美国一道遏制中国。此举一部分是基于历史习惯和经验，还有一部分原因则在于相关国家认为中国的崛起不可避免、无法抗拒，因而进行了自我调适。中国的崛起及向朝贡体系的回归并非必然意味着地区的不稳定；相反，朝贡体系高度稳定，其根基在于中国的主导地位及大体上未遭挑战的等级关系模式。然而，认为任何对朝贡体系的回归都只是对过去的简单重复，例如邻国的总统和总理会承认中国国家主席的伟大和中国的优越性因而携带礼品前往北京朝拜，无疑是大错特错。相反，如今的朝贡体系可能具有以下三个特征：认同以中国为中

心的东亚秩序；以不言而明的等级制度为基础，中国的支配地位得到合理认同；各国默认和接受中国的优势地位。

朝贡体系的影响是否将仅局限于东亚？或者说世界其他地区会出现类似情形吗？当然，除东亚以外，其他任何地区都没有朝贡体系的传统。但这取决于中华帝国将在何时以看待东亚的方式看待世界。如果中国以大同小异的思维方式看待世界其他地区，并且具有压倒性的实力优势，那么它是否能够将与其同样的等级体系传播至世界其他地区？甚至是构建一个世界性的朝贡体系？对此，最为明显的质疑就是朝贡体系所涵盖的绝大部分国家都是朝鲜、越南、日本等与中国具有强烈的文化同质性的国家。而世界其他地区并非如此。就此而言，无论如何西方都将会置身于朝贡体系的影响之外。当然，笔者指的是美国和欧洲。即便从长期来看，也只有实力相对较弱的东南欧可能会被纳入到朝贡体系之中。但欧洲和北美的大多数国家，都具有强大的实力，足以抵制朝贡体系的影响。此外，我们不应忘记，正是欧洲最早强迫中国违背自己的意愿，摒弃朝贡体系、转而投入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怀抱。然而，从长远来看，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许会与中国建立某种类似朝贡体系的关系，这绝非异想天开，因为其与中国的距离比较接近，对中国经济的依赖也越来越大。中亚也可能经历同样的过程。在中国与非洲的关系中，鉴于双方实力的巨大差距，朝贡体系的再现也并非难以想象。拉美和南亚也可能会被纳入体系之中，当然印度将置身事外。不论是哪种情形，其关键特征都将包括：中国被夸大的力量，相关国家在众多领域对中国的依赖（特别是贸易和金融），以及对中国文明价值（如果不是实际优越性）的默认。然而，除了文化和种族差异将成为主要的隔阂和仇恨之源外，远隔万里的地理位置（如非洲和拉美地区），同样也是难以轻易克服的障碍。

第三，中国对待种族和民族的态度与众不同。汉族自认为是单一的民族，尽管很明显事实并非如此。之所以会形成此种观点，是因为中国文明历史极其悠久，有助于众多种族相互融合的长期过程得以实

现。中国的统一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性质，其支撑基础就在于汉族人同源同种的理念，即便是非汉族的中国人也被视为不同民族，而不是不同种族。此外，相当一部分中国人相信多祖论（即人类有多个起源），认为中国人的祖先与人类其他分支毫无瓜葛。也就是说，中国和中华文明的概念建立在这样的理念之上，即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差异不只限于文化和历史方面，而且还包括生理上的差别。中国政府坚信民族问题不可置疑，这一立场突出地体现在其处理“失地”问题上的态度以及认为香港和台湾与大陆同宗同源，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信念上。任何支持台独的观点都会立即遭到反对。正如第7章所述，中国人对民族问题的立场以及对于中国人的身份所蕴含的意义的认识，与其他人口大国（如印度、印度尼西亚、巴西和美国等）截然不同。这些国家明确承认其多种族、多民族的特征，并且在不同程度上引以为傲。

将中国在种族和民族问题上的立场描述为意识形态使然无疑是种错误的做法，因为这种立场实在是由来已久，深植于中国历史之中，因此这种观点并非事实。的确，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中国对待种族和民族问题的态度经历了深刻变化，但其渊源却在于中国文明悠久的历史。这种对于民族和身份的态度也不可简化为中国政府的立场，实际上，它在中国人脑海中根深蒂固。举一个时下的例子：如果说支持台湾回归的普通中国人与中国政府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前者的愿望甚至更为强烈。就此而言，即便中国出现所谓的民选政府，就对中国人的认同而言，其只会比现在的中国政府更排外、更激进。

我们也不要期望中国的种族和民族立场会有任何重大改变。的确，长久以来中国与外界相对隔绝，无疑使这一立场更为巩固。与世界不断的融合也有助于削弱那些因封闭无知造成的偏见。但其最基本的根源并未发生变化。实际上，中国的封闭并不局限于某个特定历史时期，它是理解笔者所述的中华帝国思想的基础。就此而言，“封闭”是中国世界观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甚至在宋朝和明朝前期也是如

此，无论就政策还是视野而言，当时的中国都是封闭主义者。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相较于欧洲大国，中国对本国民众与迁徙至他国领土的移民的态度截然不同。欧洲人认为移民和殖民者是文明传播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仍然归属于祖国；而封建王朝时期的中国却对那些离开中央王国的民众长期漠不关心，似乎离开中国的人就游离于文明之外。这一观点也为我们如何理解21世纪中国如何与世界其他地区持续融合提供了视角。中国正在快速融入世界，但一如其历史所示，它也会保持一定程度的疏远，安居于民族等级观并根植于文化和民族自大心理的优越感之下。

第四，相较于其他民族国家，中国领土的特点与众不同，规模与一块大陆不相上下。此外，还有4个国家的领土堪与大陆相比。美国的领土面积几乎与中国不相上下，但人口只有中国的1/4。澳大利亚本身就是一块大陆，领土面积约为中国的80%，而人口不足2 100万，比马来西亚和中国台湾都要少，而且绝大多数都居住在沿海地区。巴西领土面积约为中国的90%，但人口要少得多，仅为1.85亿。也许与中国最为相似的是印度，二者人口相当，但印度的领土面积只有中国的1/3。因此，尽管中国与这些国家各有相似，但就人口数量和领土面积综合而言，中国无疑是独一无二的。不论从人口还是领土来看，中国的现代化都将是大洲级别的。这不仅对中国过去的发展至关重要，对未来也同样如此。对普通的民族国家而言，建设大洲规模的国家是完全不同的命题，因为这其中暗含如何实现同质性的问题，除非人口很少（例如澳大利亚），或最早是殖民地（例如基本上由欧洲移民建立的美国和澳大利亚）。如果一个国家如中国般疆域辽阔、人口众多，其特征之一必然是巨大的多样性，某些方面实际上可以将中国视为是数个甚至很多不同“国家”组成的联合体。这并非意在贬低贯穿本书之中的、关于将中国团结在一起的凝聚力，而是为了表明这种统一现象更加非同寻常。我们是在和这样一个国家打交道：它既是一个国家又是一块大陆，换句话说，既是民族的又是国际的，因而必须同时按照民族国家和国家多样性的规则来统一治理。

基于以上及其他原因，与普通民族国家相比，中国政府运作的方式可谓独特。例如，反馈环就截然不同。普通民族国家政府的行为将产生似乎顺理成章的结果，但在中国也许完全行不通。此外，在一个如此规模的国家里，政府可以在不全面推广的情况下在某个城市或省份进行试验，即便其力度很大，影响深远。邓小平的改革就是如此。因此，在较为发达的省市（例如浙江和上海）进行民主改革实验，也并非没有可能。如第6章所述，文明国家的概念包含“一种文明，多种制度”的认知。1997年香港按照“一国两制”的原则回归中国，让这个概念为更多国家所知晓。实际上，中国内部多种制度并存的理念有着悠久的历史。西方的传统观念认为，中国应该遵循西方的标准成为“民主国家”。然而，我们印象中的西方民主体系从未在中国这样的庞然大物身上扎下根来，唯一的例外是印度。实际上，除印度之外，勉强堪称近似的例子只有像欧盟这样的跨国机制，而它的章程和运作方式又是极不民主的。未来，中国也许会以自己的方式向着中国式的民主转变，但西方要求中国立即实现向西式民主的转变，无疑忽视了像中国这样规模庞大的文明国家与规模小很多的西方民族国家之间的巨大差异。堪与中国相比的欧盟民主程度也尚待提高的事实，无疑更证实了这一点。

第五，中国政体的本质极具特色。与西方特别是欧洲的经历不同，中国的王朝既不会被迫，也没有必要，更没有意愿与其他竞争机制或利益集团（例如教会或商贾）分享权力。在过去的一千多年里，中国从未出现西方那样有组织的宗教团体，中国商人也不是通过集体行动获取更多利益，而是各自为战。政府，不论是王朝时期还是共产党时期，都没有与任何人分享权力：它管理着整个社会，享有至高无上、不受挑战的地位。熏陶并塑造了中国社会近两千年之久的儒家精神，从未要求政府向民众负责，而是坚决要求其忠于儒家的道德理念。对任何非王公贵胄的人士来说，成为封建官僚体系的一员意味着达到了人生可能的最高成就。而整个封建官僚体系的成员，都必须接受儒家道德伦理的教育。官僚体系的效用显而易见：在长达数百年的

时间里，就效率、管辖权及开展大型公共工程的能力而言，中国的政府机构无可匹敌。唯一例外的民众负责，只是出现在民众对政府失望不满，起义反抗之时。届时，现任统治者的“天命”已尽，不再具有合法性，合法性掌握在民众的手中。然而，除了此种极端情况以外，民众从未真正享有过主权。即便是在封建王朝统治被推翻之后，王权国家也是被国家主权而非西式的人民主权所取代。

新中国建国之后，西方意义上的民众问责没有在中国出现。毛泽东时代，政府的合法性主要在于意识形态方面，依据的是阶级斗争体系理论，在该理论中，工人和农民被誉为国家的新主人；到了改革时期，部分取而代之的是政府和人民之间“重结果轻过程”的不成文契约——政府必须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历史上的那些关键要素现在仍一如既往地决定着中国政体的特质，这也证明了中国国家政权的历史延续性。西方式的民主问责仍不存在，目前为止也看不到任何改变的迹象。尽管在封建统治瓦解之后的几百年里，中国发生了令人震惊的巨大变化，经历了国民政府统治、军阀混战、半殖民主义、新中国成立和当前的改革，政府的地位仍无可动摇，高居社会之上，享有巨大声望，被视为现今中国的形象代表和确保国家稳定、统一的力量。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政体的这种本质特征不同于任何西方社会，甚至可以说不同于世界上的其他任何社会。鉴于其非同寻常的历史跨度（至少两千年之久，甚至可能要更长），上述特征实际上已成为中国本质的一部分。

中国统治机构的合法性，影响深远、根深蒂固，并不依赖于代议制；事实上，即使现在引入普选权，统治机构合法性的根源仍然在于中国上千年的基础。中国政府的合法性在于民众认同其是中国文明和文明国家的代表与化身，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这也就解释了为何中国民众的眼中的政府合法性会与众不同。

中国政府是颇为称职的机构，可以说比世界其他任何传统政府都要优秀，未来有可能会对世界其他地区产生重大影响。它已证明自己不仅具有非凡的持续性，而且能够进行令人称道的自我重塑。新中国建立之后，已经出现过两次这样的调整。第一次是毛泽东时期，共产党创立了新政府，中国重新统一；第二次是改革时期，这个政权获得新生、重新焕发活力，引导国家经济转型。尽管中国貌似没有任何正式的民主问责机制，但实际上“天命”的传统理念至今仍发生着重要的作用：如果执政党没有注重社会公平或没能维护国家统一，从而引发了严重的社会动荡，那么历史也就不会站在它这边。

第六，中国的现代性和其他东亚国家一样，以国家转型速度快而著称。某种程度上与西方现代性的经验截然不同，中国的现代性将过去和未来同时融入当前时代。在第4章中，我将亚洲四小龙描述为快速型社会。它们习惯于快速变革，天生比西方（尤其是欧洲）更能轻松面对新事物和未来。它们拥抱新事物的方式正如孩童接触计算机或任天堂游戏机的方式一样，满怀乐趣和期待；欧洲社会则相反，它们对待新事物一般要谨慎得多，甚至感到畏惧，就好像成人面对着不熟悉的科技发明。其原因在于东亚社会没有如欧洲和北美一样完整地经历社会各个发展阶段及相应的科技发展阶段，因此民众的集体思维中也并没有充斥着传统行为方式的理念，不会受其束缚。不过，由于规模庞大，中国式的现代性还应当与其他东亚国家区别开来。韩国、中国台湾大约用了30年的时间大体上完成了农业社会向全面城市化转型。从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已经30多年了，中国近半数的人口仍然生活在乡村。哪怕再过10年，到2025年的时候，农村人口比例仍将占1/3左右。这使得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不仅比邻国更加漫长，而且更加复杂。因为广大农村的长期存在，在未来的数十年中，中国仍将持续不同发展阶段共存的状态。这突出体现在不同省份的生活水平的巨大差距上。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并存更加凸显了历史的重要性和影响，农村地区的存在也将历史的效用不断反馈。这使得中国这个深陷于历史之中的国家甚至因此更加意识到历史的存在。

第七，1949年之后，中国一直由共产党领导。过去半个世纪中，两个最为重要的年份所包含的意义截然不同：1989年，标志着东欧社会制度的剧变；而1978年，代表的不仅是历史上最引人瞩目的经济转型的开始，更重要的是这场转型是由一个共产党主导的。这未免有些矛盾。前者表明一个重大时代的结束，后者则象征着一个也许会被证明更加非同寻常的时代的开始。鉴于西方对共产主义根深蒂固的不满情绪——特别是1989年之后，那么西方戴着厚厚的有色眼镜看待中国共产党，也就不足为奇了。实际上，自1989年东欧剧变之后，西方一直错误地认为中国共产党注定也会下台。共产党执政这一事实始终对西方对中国的态度产生深刻影响，而这一偏见似乎还将持续相当一段时间，即便不是一成不变的话。但是，根据中国近来的经历，我们现在应以比过去更为长远的视角看待共产主义：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大不相同。十月革命之前，苏共（布尔什维克）的支持者大多集中在人口相对较少的城市，相比之下，在人口众多的农村地区其支持者却是寥寥。因此，苏共从未有过广泛的群众基础，这也是苏共在1917年之后依赖威权、高压统治的原因所在。中共则截然相反。中共的民意基础绝大部分都是人口众多的农村地区，相较于国民党，其在城市所取得的支持相对较少。因此，与苏共不同，中共具有相当的群众基础。这也是为何在“文革”之后，中共有信心、有能力调整方向，实施几乎完全不同的战略的原因所在。相较于苏共，中共展示出了截然不同的灵活性与实用主义。只有具有如此深厚群众基础的组织才能够如此思考、行事。而戈尔巴乔夫领导下的苏共，虽然最终选择了一条不同的道路，却是为时已晚，更导致了苏联的内乱和土崩瓦解。

就长远来看，中国共产党将走向何方，目前尚不可知：唯一肯定的是其仍将处于自我变革之中。然而无论怎样，作为这个国家大规模转型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将在中国的现代性乃至世界的现代性上留下深刻的印记。中国共产党创立并且革新了中国的现代国家；在百年分裂后重新统一中国；在打败日本殖民主义者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制定了战略并付诸实施，使中国经历了百余年的挫败之

后，重新看到恢复与往日中华帝国相似的世界地位和权力的希望。为此，中共成功地将现代中国与历史、儒家学说和王朝盛世重新联系起来。可以说，所有伟大的历史转型要获得成功，都必须包含与历史重新联系的过程。正如前文所强调的那样，在这个方面，共产党的政权理念和儒家理论之间的相似性尤其令人印象深刻。鉴于儒家理论已经盛行了两千年，中国共产党为了成功实现目标，除了其他举措外，还必须找到一种方式对传统的儒家理念进行改造和创新（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如此）。

第八，未来数十年内，中国将继续表现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双重属性。对于所有世界主要大国来说，中国这一境况独一无二。当然，这也是中国的巨大体量所导致的漫长现代化进程的结果。通俗点儿说，中国的转型是大洲级别的，具有大洲式的不同步性，非一般国家可比。其结果是现代性与农村的相对落后相互融合、相互作用，这种二元的状态将引发众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问题。相当一部分地区实际上仍处于完全不同的发展阶段，这是中国现代化不可能也不能够忽视的事实。前文已经探讨了未来数十年里这个事实将如何让中国直面本国历史。实际上，这也将对中国如何认识自己的利益及与他国的关系产生重要的影响。中国必然会将自己定位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综合体，兼具两方面的利益。这已经在很多领域有所体现，包括关于中国对气候变化承担哪些责任的讨论。当然，随着时间的流逝，中国经济中的发展中国家成分所占比例以及受雇和受惠于这些成分的人数将有所下降，中国将越发像发达国家一样作为，而不再是二者的综合体。但未来的25年，甚至50年内，中国仍将考虑两方面的利益，表现出两方面的特征。日本和西方列强强加给中国的“屈辱的百年”（特别是被殖民化的经历）所带来的屈辱感，极有可能巩固这一态势。中国将是第一个从19世纪至20世纪上半叶世界大分化的“失落”阵营中崛起的大国；也是第一个曾经沦为半殖民地和失败者（而非殖民者和胜利者），却又重新崛起的大国。这一经历以及由此产生

的观念将成为现代化时期中国人思想中密不可分的部分，将对其作为全球大国的行为产生深刻影响。

在此背景下，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更加深远的观点。如果说发达国家塑造了20世纪的世界，那么21世纪很可能将由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塑造。这无疑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人们对究竟哪一个才是20世纪最为重要的历史事件众说纷纭，但1917年的十月革命、1989年的柏林墙倒塌以及1945年的法西斯战败无疑是最有可能的候选对象。人们的选择也总是受到当时历史条件的影响。在20世纪最后10年，1989年的东欧剧变以及之后苏联的解体似乎是当仁不让的选择，正如20世纪上半叶将1917年的十月革命视为最重要的事件一样。现在，21世纪前10年即将进入尾声，另一个过去很少提及的事件却又浮出了水面，成为最具可能性的选择。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只可能在殖民主义终结后成为现实。对非工业化国家而言，殖民时代几乎完全堵塞了它们通向工业化的道路。帝国主义国家可没有兴趣为自己的工业创造竞争对手。这不是说殖民主义的后果完全是负面的，虽然有些情形下确实如此，尤其是在非洲。在东亚，日本对朝鲜和中国台湾的殖民以及西方对中国香港和其他开放口岸殖民的影响尽管也是以负面为主，但至少显示出工业化的可能性，因此为相关国家和地区此后的转型播下了种子。正如我们所见，殖民主义的终结是当今世界多元现代性得以发展以及新型现代性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前提。我们现在才体会到，1945年至20世纪60年代殖民主义的溃败应当被视为20世纪里程碑式的事件之一，甚至也许是最为重要的，尽管因为很明显的原因西方一直大大低估其重要意义。

鉴于上述八种特性，显然中国的现代性之路将大大有别于西方。中国将从根本上推动世界变革，其深度远非过去两个世纪中任何新兴的全球大国可比。然而，这一前景常常被大为低估。一方面，就中国人自己而言，他们明智地选择了长期博弈，不断试图让其他国家相信中国的崛起对世界影响较小。另一方面，西方占据世界领袖的交椅如

此长时间，以至于发现自己无法想象或理解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而且，按照既得利益集团——西方特别是美国显然属于此类——的本性，它们不会承认（哪怕是私下认同）世界正处于一场全球大变革的边缘，将导致其全球地位和影响力的显著下降。中国就是房间里的大象，尽管没人愿意说出来。因此，全球权力的平衡正经历一场近乎悄无声息的非同寻常的变动，除了有人在巨大压力前不得不讨论到底是中国还是美国采取了某种欺瞒行为之外，几乎无人知晓。这与此前曾出现过的类似变化，例如德国1914年之前的兴盛、日本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崛起、苏联——特别是1945年后——的挑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虽然这几个事件都不具备中国崛起那样的根本性意义，但其造成的威胁在当时并没有被低估，而是被夸大，这与中国现在的境遇是何其的相似。就实质意义而言，与中国崛起最近似的例子是美国的兴起，后者同样在一定程度上悄无声息，当然这主要是因为它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幸运地成为受益方，向筋疲力尽、负债累累的西欧贷款，也大大加快了其崛起的速度。不过，与中国崛起相比，即便是美国的崛起其意义也远没有这么重大。

迄今为止，中国总是展现出一副局外人的形象，耐心地、努力地争取成为现有体系中的一员。作为新兴大国，中国不得不接受并适应现有的国际规范，特别是尊重当前的超级大国——美国，使其立场软化。因为要获得更广泛的认同，后者的合作和默许是必不可少的前提。因此，1978年以后，为了成为国际社会所接受的成员并享有相应的利益和特殊待遇，中国坚持了长期的努力奋斗。在全力发展经济的同时，中国得出结论：在当前的发展阶段，中国只能将有限的精力和资源投入到根本目标当中，承受不起全面出击的代价。通过这种约束和自律，邓小平和他之后的领导层显示出非凡的智慧，从未忘记长远目标，绝不允许为短期考量所牵绊。与此同时，如同政治规则一样，中国也不得不学习、吸收全球化产生的经济、技术要求，以便满足已确立的国际标准，适应已有的规则。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同样积极地借助了有效的合力，尝试向更发达的国家学习，在全球市场成功争得一

席之地，吸引外资，采纳证券交易和资本市场的规则，获取最新技术。越来越多的全球问题（首先是气候变化问题）需要所有国家，特别是中国这个人口最多的国家参与其中，共同制定总体解决方案。这也将进一步推动中国与世界的融合。

然而，融合只是未来图景的一方面。中国的崛起也将越发导致与融合恰好相反的特征，也就是说，强大的反作用力会促使它背离现有规范。在很多方面，中国都偏离了当前发达国家和全球政治制度的惯例。作为裹着民族国家外衣的文明国家，中国潜藏的本质和身份越来越显露无遗。当今东亚国际关系中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很有可能逐步被现代版本的朝贡体系所取代。一个拥有世界1/5人口的国家正在改变全球经济的运行方式和权力结构；一个自认为无论是历史、文化还是种族都可以称得上世界最伟大文明的国家，作为全球大国，显然迟早会要求和期望全球关系进行重构；一个遭受过欧洲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看待世界的方式绝不会和那些从它那里攫取过利益的国家相同。拥有着至高无上权力却从未实践过西方民主问责的中国政府，管理着堪与大洲相比的疆域，尽管表现为与众不同的现代共产党形式，但直到今天还浸透着儒家的思想和气息。这与那些启蒙了西方社会并且至今还主导国际社会的信念形成了鲜明对比。

1776年美国发表的《独立宣言》、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英国工业革命、两次世界大战、1917年的俄国革命以及1989年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造就了西方。然而对中国而言，历史上具有纪念碑意义的重大事件几乎完全不同。对其重要的是：公元前221年，秦王朝统一中国；唐、宋、明、清等朝代；鸦片战争；1911年辛亥革命；1937~1945年日本的侵略；1949年新中国成立；1978年改革开放。不同的重大历史事件也表明了大相径庭的历史。因此，虽然中国融入世界，同时也会深深背离。中国自1978年以来的崛起的特征就是融合倾向占据主导地位，中国急于让世界相信其是“负责任的大国”就是很好的例证。随着中国积累了更多的财富、变得更加自信和强大，背离倾向将逐渐

成为主流，但这些都只会发生在很久以后。在未来20年左右的时间里，随着现代化进程的继续，中国很有可能选择继续扮演维持现状的大国的角色。

有两股强大的力量将推动中国按照自己的意愿重塑世界。中国体量如此巨大的事实意味着它对其他任何国家都具有万有引力般的吸引力。时间上最接近的例子就是美国，但后者规模小得多。规模庞大将使中国能够制定与其他国家关系的准则，而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发展水平限制了这种能力，但未来其影响力将成指数级增长。中国的大块头将迫使世界其他地区基本上默许其行为方式。此外，中国的体量加之其义无反顾地转型，使时间通常站在中国的一边。中国有足够的时间可以等待，因为它知道随着时间的流逝，世界正逐步按照它的意愿得以重塑。以中国与日本的关系为例：假设中国持续高速增长，那么日本最终将被迫接受中国在东亚的领导地位。虽然不尽相同，中国与欧洲和美国的关系同样也可以这样认为。事实上，随着中国的崛起，时间本身也具有了全新意义：时间表实际上被拉长了，至少在某种意义上如此。我们已经习惯以相反的方式思考，即只争朝夕。美国就是典型的例子，这是一个历史短暂、值得回忆的事情不多、常常热衷于自我改造的国度。中国正相反，其有着5 000年历史和极为久远的记忆。如果中国按照跨度大得多的时间表构想未来，这也不足为奇。因此，中国具备了耐心的品德，确信历史会毫无疑问地站在自己一边。如果说这种信念自古以来一直存在于中国人的脑海中，那么21世纪必然会成为现实。

当中国这个世界大国挣脱了现代化的束缚后，将会怎样行事呢？认为其会像西方一样的看法，无疑是错误的；尽管中国的确会受到西方的影响，但历史表明二者还是有所不同。欧洲及此后的美国，一直侵略成性、极力扩张，触角遍及世界。而中国的扩张不过限于其所在的大陆，尽管在全球化时代，这种状况已有所改变且这种改变仍将持续。但没有什么理由认定中国会成为第二个西方。中国的确将成为世

界霸主，但其却将依据与其历史文化相符的、全新的、截然不同的方式行事。许多西方人担心中国缺乏西方民主，但过去30年来这个国家的透明度已明显提高，政府也更加负责。这个过程很可能持续下去，并在未来某个时候导致规模大得多的政治转型，尽管任何民主变革的形式都显然会与西方有所不同。然而，鉴于1978年以来的巨大成就，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不大可能出现任何重大变革。对中国最大的担忧还不在于此，而是在于其根深蒂固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将如何建构和影响中国的行为及其对世界其他国家的态度，还不得而知。但可以确定的是，这一影响深远的观念绝不会消失。如果说人们给西方贴上的标签通常是侵略和征服，那么给中国的就是自大的优越感以及由此产生的等级思想。

中国崛起成为世界主要大国标志着西方普世主义的终结。西方的规范、价值观和制度将面临越来越多的来自中国的竞争。然而，西方普世主义的衰落绝不只是因为中国的崛起，后者只是世界经济多极化和现代性多样化这一更为广阔图景的一部分。现代性竞争模式的出现预示了全新世界的诞生，在这样的世界里，没有哪个半球或国家能够具备西方过去两个世纪拥有的威望、领先性和占压倒优势的实力。取而代之的是，不同国家和文化现在开始争夺正当性和影响力。西方主导的世界已是过眼云烟；在新世界里，至少在21世纪，中国不会拥有过去西方拥有的地位。然而，中国的优势将越发明显，假以时日，中国极有可能成为迄今为止最具统治力的国家。

后记

金融危机之后：中国主导的世界秩序的开始

2008年的金融危机标志着中美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没有什么能与此相比。美国经济的管理体系暴露出致命的缺陷，监管不力的金融部门几乎毁掉了整个美国经济。在短短几个月内，危机就动摇了世界对美国和西方经济能力的认同。相比之下，中国的经济信用却得到了极大的增长。与此同时，金融危机也暴露出维持美国经济的负债的严重程度，自美国实施救市以来更为明显。而中国的经济实力却进一步凸显，中国拥有庞大的外汇储备，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净债权国。尽管是老生常谈，金融危机将最终迫使美国意识到中国正成为其金主的事实以及其中所蕴含的实力对比变化。

但这仅仅是个开始。就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美国经济出现了萎缩。哪怕此后复苏，也只会是低速徘徊。然而，令西方不解的是，中国经济仍保持了逆势增长的态势，因此更为凸显了中国政府刺激举措的成功以及中国经济数十年来不为西方经济危机所困的能力。然而，很明显金融危机揭开了一个全新而又漫长时期的序幕：西方经济复苏乏力，前景不甚乐观；如欧洲国家一样，美国将面临为期数年的财政紧缩，削减政府和个人开支；至少对美国而言，还面临着大幅削减财政赤字的紧迫压力。这令事态更为复杂。被希腊、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和意大利等国的主权债务危机所困，欧洲一体化进程面临崩溃

的危险，欧元也受到了指责。与此同时，西方国家的经济仍继续处于另一场衰退的边缘，继续爆发银行危机和全面萧条的危险尚未排除。相比之下，中国在其庞大的外汇储备、大量的外贸盈余和高额储蓄的支撑下，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仍可保持经济快速增长。所有的一切都造成了世界权力由西方（特别是美国）向中国的转移，而这一过程不仅令人称奇，而且不可逆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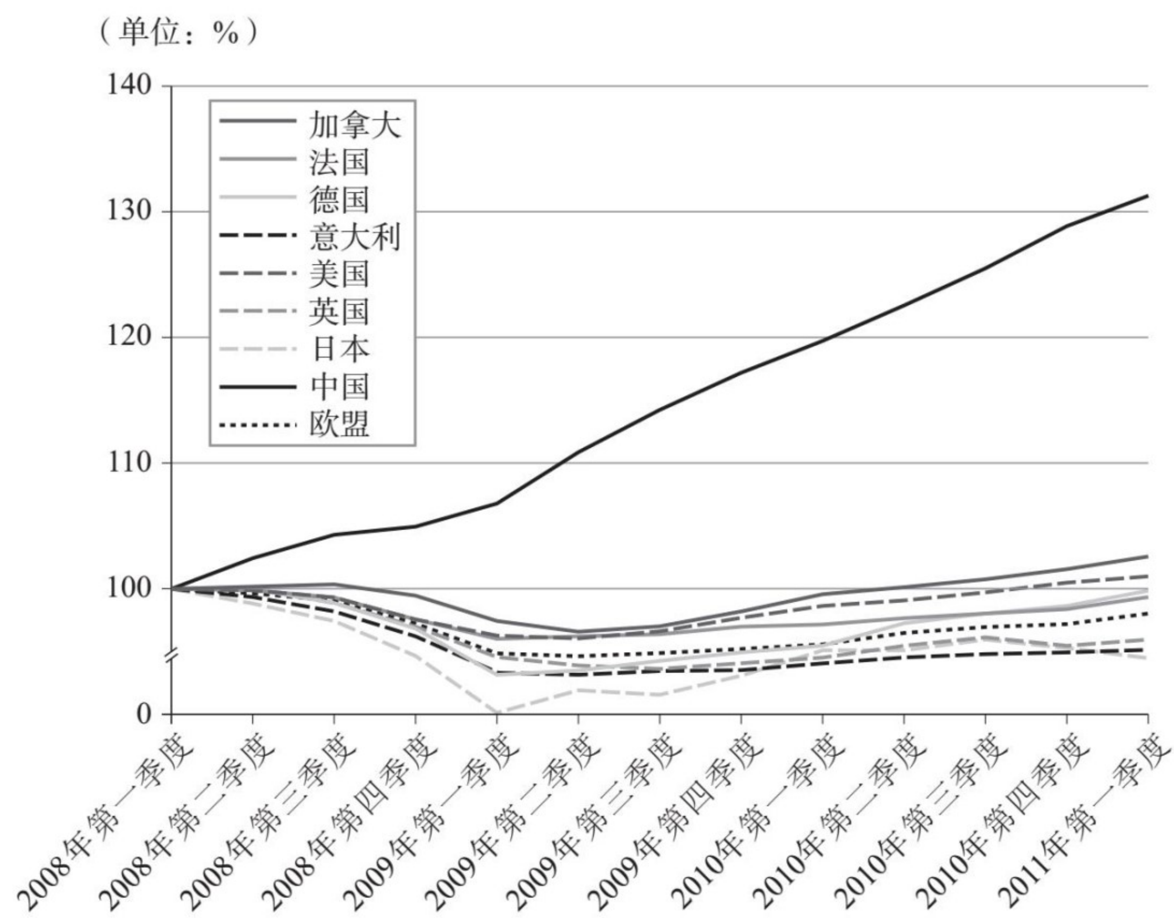


图1 金融危机之后中国与西方的GDP增长率对比

数据来源：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中国国家统计局、《哈沃分析》（数据截止至2011年第一季度）

无论是美国政府还是中国政府均未承认权力的转移。至少从表面上来看，一切仍是照旧。这种所谓的风平浪静只是一种假象，当然，我们也可以理解。对中美两国来说，维持这种心照不宣的默契的确十

分必要，而地缘政治板块重心的迁移无疑令事态更为复杂。自2009年秋以来，中美之间出现了一系列悬而未决、困扰双边关系的事件，这令阻碍双边关系发展的困难日益凸显，其具体包括：2009年12月，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上中美立场迥异；2010年，奥巴马总统会见达赖喇嘛并批准了新的对台军售项目；谷歌因所谓的网络管控退出中国市场；中美双方就人民币汇率和美国对华贸易赤字问题争论不休；美国海军继续在黄海军演；中国拒绝就2010年11月的“延坪岛炮击事件”对朝鲜进行谴责；中国在南海问题上以及对同年夏天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所发表的干涉言论的立场日趋强硬；中国严厉批评美联储的量化宽松政策并对美元的作用提出质疑等。以上的种种均发生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甚至这只是冰山一角。只有2011年1月胡锦涛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令双边关系稍有缓和，但也仅是暂时而已。造成这种误解和紧张态势的深层次原因在于中美关系本身已经发生了变化，但目前中美双方均未能理解这一改变的真正含义。

当然，这也是情有可原的。长期以来，中美之间的关系一直处于不平等的状态，而美国必须平等对待中国这一理念至今很多人仍无法接受。对于美国人来说，这种调整无疑是个痛苦的过程。尽管美国逐渐将中国视为一个重要的对手，至少在某些方面如此；然而，在其他方面，其必须向中国学习，正如2011年1月奥巴马发表国情咨文在谈到人造卫星时一样（虽然在演讲中奥巴马只提到了中国4次，但其全篇的潜台词都是如此）。想要美国真正平等地看待中国，恐怕还需要相当一段时间。毕竟，只是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后美国统治阶层才不得不开始认真看待美国正不断衰落这一事实。尽管对“美国衰落论”的讨论不绝于耳，但很少有人了解其真正的意义，知道应该如何回应。正如其他面对衰落的国家一样，美国正陷于思维定式之中。美国的知识精英现在还难以想象世界不再由美国主导将会怎样，更不要说中国主导世界了。起码到目前为止，这还不大可能。

中国的处境则截然不同。对一个财富和实力迅速增长的国家来说，以战略的思维进行思考要容易得多。与不得不要决定放弃何种利益及承诺的美国人不同，中国人则是要选择哪些新领域需要开拓，这可要容易得多。然而，西方的金融危机向中国领导层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与其他人一样，中国领导人也没有预料到此次危机会如此突然、程度会如此严重。转瞬之间，中国的领导人就不得不面对这一将给中国外交政策带来深远影响的巨大灾难。自改革开放伊始，邓小平“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有所作为”的理念就一直是中国外交政策的指导原则。中国一直严格遵循相关原则，并在外交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然而，西方金融危机的出现却改变了中国所面临的环境，为中国打开了全新的机遇之窗，因此在中国国内引发了应如何应对此次危机的巨大争论。实际上，中国的政策已经开始发生了微妙的转变。

此前，如有可能的话，中国很少表明自己的立场，特别是在入侵伊拉克等极易引发与美国之间冲突的争议性问题时尤为如此；而是倾向于由他人，通常是俄罗斯，替其表明立场。自金融危机以来，中国明显变得更加开放、态度更为明确，至少在经济事务上如此。在2009年1月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期间，时任中国总理温家宝明确表示美国银行应该对金融危机负责。两个月后，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则提议应结束美元在世界金融体系中的主导地位，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取而代之，充当超主权储备货币。2010年，美国政府攻击人民币汇率过低，而随后中国政府则针对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展开反击，认为这将使中国的巨额美元资产大幅贬值，质疑美元不能再继续将其国内的作用与其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责任混为一谈。中国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质疑及其希望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中发挥更为积极作用的期待，无疑是迄今为止这一变化最为明显的体现。然而，这种新兴的自信并非仅仅体现在政府部门。例如，2010年7月，中国最大的评级机构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发布了自己的主权信用评级。穆迪、标准普尔、惠誉等发布的主权信用评级的公信力在西方金

融危机中严重受损。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大公评级将中国主权信用等级列为AA+，而仅将美国列为AA，这也不无道理。实际上，从技术角度来看，美国已经处于资不抵债的状态，但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无疑令这一点很容易为人所忽略。而当时，穆迪却仍将美国的主权信用等级列为AAA，而仅将中国列为A。更为主要的是，中国展示出的自信心不断增长，有时甚至还更为果断。

中国的外交政策

当然，就目前来看，邓小平的战略思想仍将是中国外交政策的主要基础。鉴于其已经实践了30余年并成功创造了中国崛起所需的有利国际环境，特别是减轻了其他国家对于中国转型的焦虑与怀疑，邓小平外交战略思想的地位不会被轻易动摇。然而，实际上，邓小平的外交思想逐渐显得不合时宜。邓小平的外交思想是针对一个贫弱国家所做出的抉择，目前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虽仍相对较低，但其实力却已经不再羸弱。随着国家利益在全球的快速扩展，中国需要的是能促进并保护其全球利益的外交政策。这一客观需要与邓小平提出的“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有所作为”的对外关系指导方针之间的冲突将不断加剧。邓小平的对外关系指导方针很简单也很明确，就是最大程度确保国内经济增长所需的外部经济环境，为此，尽可能地与美国保持良好的关系。当然，此外还包括对国家主权的高度重视，这与中国注重对主权的保护有关，而此点又与中国的历史及当时的综合国力相对仍处于弱势高度相关。邓小平的外交战略思想无疑具有明显的防御性特征，以经济发展为中心。当时的中国并没有称霸的野心，也没有试图改变世界。相反，希望通过接受西方的规范，成为西方所主导的国际体系中的一员。然而，这一指导方针相对有限的眼界和利益关注点已经日益无法与中国作为快速增长的全球大国的需要相匹配。

现有外交指导方针的局限在近期中国在东亚面临的外交困局，特别是在处理与东盟之间的关系时，暴露无遗。正如第8章所述，此前的10年，中国的东亚外交政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然而，2010~2011年，中国在西沙群岛和东沙群岛的政策以及在南海海军力量的增强，导致东盟对此的关切不断增长，中国越发觉得举步维艰。在东亚国家的焦虑背后，隐藏着一系列因素。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使得其他国家的挫败感不断增强，而那些受其影响最为直接的邻国尤为如此：其很多关于中国遥远未来的设想，都以惊人的速度成为现实。20世纪初，对于东盟的南海声索国来说，中国关于南海问题“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建议，似乎是要将争议无限期的搁置。然而，10年之后，中国实力的快速增长则再次令相关国家感到不安，至少对越南、菲律宾等国来说如此。中国至今尚未明确表示其对南海岛屿问题的长远立场，更是令事态雪上加霜。中国的一位低级别官员在另有任用之后，却在2010年将南海岛屿称为中国的“核心利益”（所谓的核心利益就是将其置于与台湾问题同等重要的地位），令事态进一步复杂。这一表述意味着中国对相关岛屿的主权实际上不容置疑。这种明确性的缺乏实质上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它反映出了中国政府对于南海问题或更为准确地说整个东亚地区的未来，缺乏足够的准备与远见。对于东盟的南海声索国而言，其最大的担忧在于中国海军力量的建设。尽管中国海军建设的力度并不算大，但无疑加剧了东盟相关国家对中国长远意图的疑虑与担忧。而中国政府也无意就其海军在南海的部署问题向东盟通报，更不要说与其协商了。这与中国在东亚地区推行其经济战略的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经济问题上，中国对东盟展示出了罕见的低姿态，接受了后者提出的多边协议作为其东亚地区经济外交的模板。这尤其说明了相较于军备建设上的单边主义，中国在推行经济外交时更为游刃有余、脚踏实地。

东亚问题的案例无疑是邓小平外交理念未来发展方向及无法与现实相适应的最好说明。就更广阔的视角而言，这也反映了中国作为一个全球大国而非封闭的地区大国所面临的全新挑战。在未来的10年

里，中国将会面临塑造一种全新外交政策的棘手难题。这一全新的外交政策将不再以中美关系为首要关切，也不再唯经济问题至上。对于这一转变所蕴藏的更为广泛的历史意义，我们也应给予认同。自19世纪末以来，甚至可以说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积贫积弱的现实与不得不适应西方规范和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的需要就一直主导着中国的外交政策。而这一时代现在已近尾声。

然而，中国的新型外交政策将走向何方，目前尚无定论（至少在很大程度上如此）。然而，至少对一些问题的判断我们还是有一定把握的。与视中美关系为首要的现行外交政策不同，中国未来外交政策的关切与重点将更为全面。中国将对不同的地区和相关国家给予适当关注，中国也不再理所当然地将其他双多边关系都置于中美关系的框架中考量。尤为重要的是，中国将对亚洲特别是东亚地区给予更多的关注：实际上，亚洲特别是东亚地区将成为中国外交政策的聚焦点。目前，中国的外交政策带有一定的重商主义色彩，无论是非洲、东亚还是北美和拉美地区，中国与相关国家的双边关系绝大部分都是经济驱动的结果，其中贸易和贷款是首要关切，而投资和货币问题也逐步被纳入考量。因此，一直以来中国的外交政策未免有失狭隘，基本上都局限于经济政策的范畴之内。中国外交政策支配地位的唯一体现，就是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个成功的经济模式，除此以外，其影响力相当有限，均局限于经济领域。中国全新的外交政策无疑将更为全面，这不仅仅是就其对外关系的范围而言，对其所蕴含和试图推广的价值观和表述方式而言，也是如此。此外，在其思考问题的方式和理念上，也将更富有战略性。正如邓小平的国内政策十分注重实用主义一样，中国的外交政策也将如此。但随着中国外交政策自主性的增强，受本国利益和独特价值观的影响日渐增多，其战略性也将不断提升。

我们不妨对邓小平的外交思想与中国新型的外交政策再次进行对比。邓小平的外交思想强调使用性和适应现有外交规范的需要，承认

融入现有国际体系的必要性，因而在外交政策形成的过程中淡化了中国历史、传统和文化的重要性。在探索全新外交路径的过程中，其将不可避免地转向中国历史以寻求灵感与指导。当前，在中国学界，探索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呼声越来越高。早在2005年，这一趋势就已经十分明显。在当下所进行的争论中，中国的作家和学者使用“王道”、“霸道”等中国传统思想理念的频率越来越高，并认为其在当前的国际背景下仍具有适用性和相关性。当代中国哲学家赵汀阳在其著作中就使用了中国的传统理念。赵汀阳认为“世界”最终将演变成“中国”理念中的最高政治单位“天下”，而中国也将成为一个全新的大国，因为按照“天下”的理念，中国将信奉一种全新的普世主义。同样，极富影响力的国际关系学者阎学通也探讨了春秋战国时期思想家的理念与当前中国外交政策的相关性，其中包括孔子、孟子、老子、荀子等。借鉴荀子的理念，阎学通将权力规范与道德规范进行了区分。权力规范与武力等物质力量相关，而道德规范则旨在赢得民心、影响理念。在此基础之上，阎学通概括了三种统治方式：暴政，指完全或主要依靠权力规范，其主要代表是欧洲主导的时期，特别是英国的主导时期（直至1914年“一战”爆发），以及此后的欧洲内战时期；霸道，既包括权力规范（特别是就大国对其对手的行为而言）又包括道德规范（主要是就盟友而言），换句话说，这是一种双重标准的思维，其主要代表是冷战时期的美国和苏联以及冷战后至今的美国；第三种类型荀子称之为仁政，即国家的施政完全依靠道德规范。阎学通坦承中国正在逐渐具有“霸道”的能力，但就长期而言，中国将施行一种全新的统治，即“王道”。因此，我们已经开始见证一个更具本国特征的中国外交政策的形成。其深植并取决于中国（而非西方）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包括和而不同、天下主义、中国中心主义、中国的天定大国地位以及其相较于西方的道德优越性等。2005年9月，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的讲话，就与此密切相连。胡锦涛在讲话中提出了包容不同文明、承认多样性及差异的“和谐世界”的理念。

有鉴于此，未来中国的外交政策极有可能与美国截然不同。阎学通认为，中国如果只是简单地模仿美国，那么注定以失败告终；正如美国一样，中国也必须探索出一套全新的治理世界的方式。如果中国模仿美国的政策，例如在东亚大幅提高军费开支以期与美国抗衡，那么两国之间的紧张态势及冲突必然加剧。中国必须找到一条不同的道路，但目前为止仍尚未成功。实际上，自2008年奥巴马入主白宫以来，美国在东亚的政策一直比中国更为娴熟。很明显，中国没有能够缓解邻国关于其未来意图的关切，而美国在某种程度上却成功地打出了安全这张牌。如果中国的确打算认真推行一套与美国截然不同的外交政策，那么其在东亚的实践成功与否无疑至关重要。中国必须要自我克制，不能陷入与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军备竞赛之中。要知道，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时间无疑站在中国这一边。中国应寻求通过说服或榜样的力量而非武力来实现其抱负。为此，对于自己的抱负及目标（包括任何的军队建设），中国应采取更为开放、公开的立场。而这一路径将与目前其在南海海军建设方面采取的单边、秘密的方式截然不同。相反，中国应将公开进行有关战略的辩论，这对于国内外来说皆有益处。中国也应就军事计划与邻国展开对话，正如其追求地区经济的目标时一样。倘若果真如此，中国无疑向世界展示了尽管其体量和实力远比邻国强大，但这种优势并不意味着中国要使用武力，而是心怀仁爱：在此情形之下，中国的实力优势就是以“仁政”为特征，实际上将代表一种全新的全球领导方式。

中国的世界经济秩序

中国作为全球大国影响日益增长的动力仍在于其经济的快速发展。一个人口如此众多的大国，在30多年的时间里一直保持了两位数的经济增长速度，这对于世界来说是前所未有的。也正是因此，全球秩序得以快速的变革。然而，世界的不少地区，包括美国、日本甚至

整个欧洲，至今未能领会这一变革的本质，也未能理解其速度。绝大部分国家仍停留在过去的思维定式之中，甘愿做既有等级秩序的囚徒，仍然用老眼光看待中国，宁愿相信中国的经济增长即将陷入停滞。实际上，随着中国经济体量不断增大并保持了较高的增长率，中国改变世界的能力也不断增强：若保持10%的年增长率，那么其经济总量每7年就大体上可以翻一番，但每一次的起点都将会更高。因此，如果今天中国的经济总量翻了一番，其全球影响远非10年前中国经济翻倍时可比，更不要说25年前了，当时中国的经济总量只相当于现在的5%。尽管“十二五”规划预计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将有所放缓，保持在7%左右，但以上设想仍然适用。

如果说美国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全球化的设计师的话（在20世纪初，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担当这一角色），那么自2008年以来，其地位逐渐被中国所取代。中国正在日益影响全球化的本质：一个全新的、由中国驱动的并以中国为模板的现代化进程正在显现。那么这一现代化进程的关键特征何在？贸易无疑是重中之重。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贸易国和世界最大的出口国。其在全球出口贸易中所占的比例由1990年的不到2%升至2010年的约11%。中国贸易的迅速增长体现在两个方面，即极富竞争力的工业制成品出口和数量巨大的自然资源进口。中国现在已经是一个令人叹服的工业国。2011年，中国已经跃居世界第一大工业国（按产量计算），终结了美国对此长达110年之久的垄断。迄今为止，中国的出口仍绝大部分依赖于其廉价和相对高效的劳动力。但随着2011年取代日本在世界研发投入排名中名列第二，中国将迅速转向高端制造业，在高铁、风力涡轮机、太阳能电板和高端通信设备等领域已经大体上能与西方一较高下。当前，高端制造业产品在中国工业制成品出口中所占的比例逐步扩大，其中不仅有在华投资的跨国公司的作用，中国本土公司的作用也在不断提升。因此，长三角和广东地区的经济正逐步与韩国和中国台湾并驾齐驱，而四川、湖北等内陆省份的经济也正在逐渐赶上此前上海和广东的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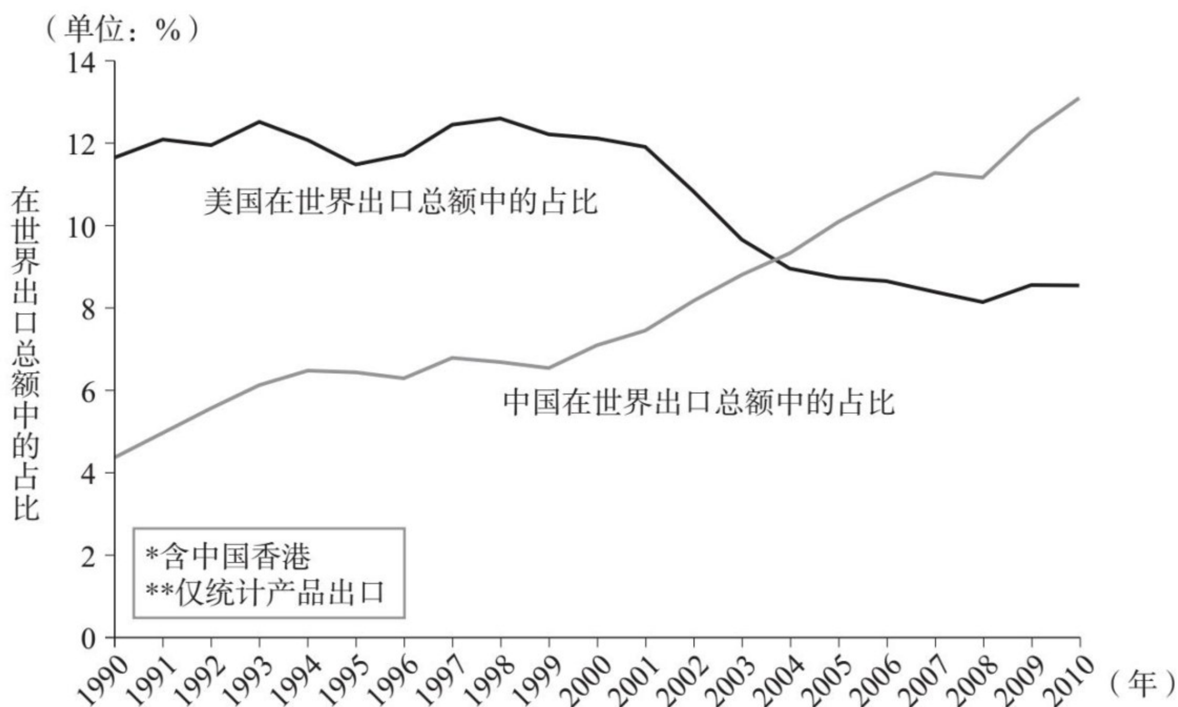


图2 中国*与美国在世界出口总额中的占比**

数据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贸易方向统计年鉴

中国对大宗商品持续增长的海量需求也是推动中国贸易总额不断增长的重要因素。中国对大宗商品的需求在世界经济史上可谓前所未有。中国已经成为不少大宗商品的最大单一需求国，因此，已经将众多的原材料生产国（主要是发展中国家）纳入其经济轨道之中，且这一数量还在逐步增长。中国几乎凭一己之力就扭转了大宗商品价格的历史性下滑，因此，其与印度堪称是大宗商品生产国的福音，当然中国的规模远非印度可比。随着进出口总额的不断增长，中国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已经成为世界相当一部分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含进口与出口），其中包括巴西、澳大利亚、日本、印度、巴基斯坦、俄罗斯、智利、埃及、南非、韩国等。这一现象在中东地区最为明显，中国已经成为该地区绝大多数国家的最大出口市场。此外，2001~2010年期间，很多国家对华贸易总额（含进口与出口）占其外贸总额的比例的提升速度也相较于1992~2001年期间有了明显提高（见表1）。换言之，中国贸易的影响力正在稳步上升。因此，我们可以设想一下至

2020年，世界上将有多少国家将中国视为最大的贸易伙伴？这无疑将导致中国的影响进一步大幅提升。

表1 各国（地区）对华贸易在其外贸总额中的占比

国家	1991 年（%）	2001 年（%）	2010 年（%）
巴西	0.9	2.8	14.0
阿根廷	1.1	4.7	9.7
智利	2.0	5.6	19.2
哥伦比亚	0.1	2.0	8.1
委内瑞拉	0	0.8	8.4
墨西哥	0	1.4	5.7
美国	3.5	6.7	14.3
加拿大	1.5	2.3	7.0
英国	0.6	1.9	6.2
意大利	1.2	2.0	4.8
法国	1.0	1.6	3.8
西班牙	1.2	1.8	4.2
葡萄牙	0.3	0.6	1.8
德国	1.3	2.7	6.1
瑞典	1.1	2.1	3.8
挪威	0.8	1.8	4.1
土耳其	0.7	1.5	6.4
俄罗斯	NA	4.7	8.9
巴基斯坦	2.9	4.0	13.5

印度	0.4	3.5	10.5
南非	NA	2.8	13.1
尼日利亚	0.5	2.5	6.9
埃及	1.6	3.3	9.0
阿尔及利亚	0.8	0.7	5.9
沙特阿拉伯	0.9	3.9	12.8

国家	1991 年（%）	2001 年（%）	2010 年（%）
日本	5.0	11.8	20.4
韩国	4.0	10.8	22.8
中国台湾	1.0	32.5	43.0
泰国	2.2	5.2	12.0
马来西亚	2.2	4.7	16.3
印度尼西亚	3.5	4.6	12.7
菲律宾	1.2	2.7	12.4
澳大利亚	3.7	7.5	20.6

数据来源：《金融时报》

与贸易模式变化紧密相连的则是中国全球化的第二个特征，也就是中国作为主要信贷国和资金提供者的崛起。为巩固、促进与其他国家的贸易联系，中国政府不仅积极签署贸易协定，此外还积极与他国签署提供长期贷款的协定。2009~2010年，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与中国进出口银行这两家关键的机构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了至少1 100亿美元的长期贷款，相比之下，世界银行在2008年年中至2010年年中向发展中国家提供长期贷款的总额也只有1 003亿美元，而且中资银行的条件要优

惠得多。仅在能源领域，规模更大的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在2009~2010年就向其他发展中国家（含政府与公司）提供了至少650亿美元的贷款。以上数字不仅展示了中国日渐增长的经济实力，也表明了世界银行重要性的相对下降。对外贷款在巩固中国与世界各发展中国家日益增长的贸易关系方面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中亚、非洲、中东、拉美皆是如此，对外贷款成为中国对外政策的关键工具。其中，绝大部分贷款用于原材料的采集和基础设施的建设。中国提议在东南亚修建高铁网络就是典型的事例，这将大幅削减旅行时间，从而使该地区与中国的联系更为紧密。中国不仅愿意提供资金、技术，也愿意在建设上提供援助。

在一定程度上，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与中国进出口银行可被视为一个全新的国际影子金融体系[注]的新型机构。就运作速度与规模而言，其他金融机构少有能及，甚至堪称无人可比。以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为例，其下属的不同分支机构负责不同地区的业务，如重庆分行负责巴尔干地区业务、河南分行负责南部非洲的业务。就影响力和活力而言，这两家银行颇有19世纪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风范。正如罗斯柴尔德家族在资助欧洲工业化方面发挥了关键性作用一样，在21世纪之初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与中国进出口银行在规模更大的发展中国家中也发挥了类似的作用。中国对发展中国家金融业务的显著扩展及日渐慷慨，与西方的悭吝形成了鲜明对比。在未来10年，西方对发展中国家提供的资金将明显收缩，其地位和影响也将随之下降。

中国全球化的第三个特征就是人民币的日益国际化，当然这一过程目前仍处于起步阶段。尽管中国身为世界第二大贸易国和第二大经济体，但直至不久之前，人民币却仍未能扮演任何国际性角色或具有任何国际影响。目前为止，尚未有明确迹象表明中国政府将改变以国内经济发展为先的政策。中国政府也仍会致力于使其国内经济免受国际金融体系变动的干扰。我们预计中国政府的人民币战略将会分为两个阶段：首先，将逐步推进人民币贸易结算，这一点将很快实现，且

不需要人民币的自由兑换；其次，推动人民币成为贮备货币，这无疑将任重道远。为推动人民币贸易结算，中国政府必须首先实现人民币在海外的可兑换，然而直至不久之前，事情还并非如此。就在金融危机发生前夕，中国政府于2008年12月与6个国家签署了货币互换协议，开启了相关进程。随后，中国政府赋予了香港人民币离岸中心的地位。少部分国家的央行已经将人民币作为外汇储备之一，其中包括日本和印度的央行。而将人民币作为外汇储备的央行数量也在快速扩大。人民币贸易结算将使中国公司可以用本国货币进行进出口贸易，改变现有的使用美元（或欧元，当然欧元范围较小）的情况，因此可减少相当数额的货币兑换费用。这一优势目前为止还大部分为美国公司所独有。汇丰银行预测，至2013~2015年，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中，至少有一半将实现人民币结算。可以预见的是，人民币的贸易结算将追随中国外贸发展的脚步，当前中国出口贸易的一半流向了发展中国家。人民币将首先在东亚地区建立主导地位，但也将更多地用于中国与非洲、南美、中亚和中东地区的贸易结算。因此，也许最早至2015年，东亚地区的大部分贸易就可以实现人民币结算。鉴于目前为止东亚地区的大部分贸易仍以美元结算，未来美元在东亚的地位将受到极大的动摇。与此同时，人民币将取代日元成为世界三大主要贸易货币之一，当然想要超越欧元仍是任重而道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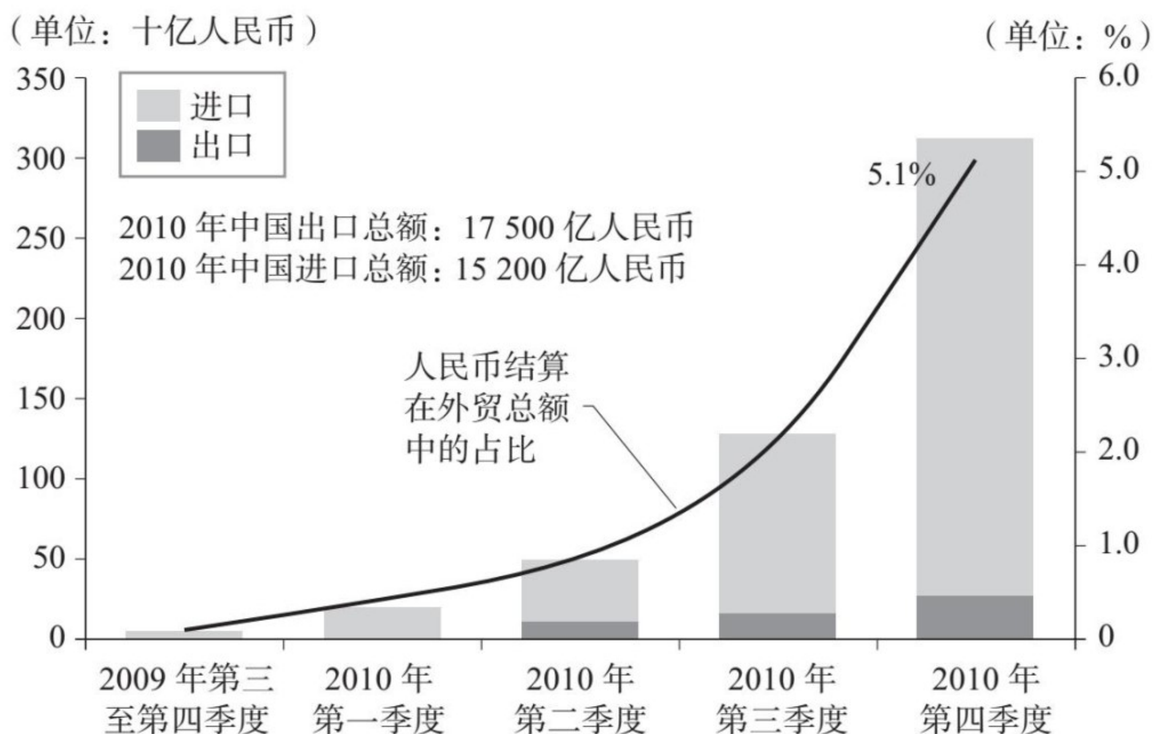


图3 人民币贸易结算的日益增长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人民币的自由兑换虽然是其作为储备货币广泛使用的必要条件，但中国政府对此必将采取十分谨慎的态度。然而，人民币的自由兑换毫无疑问将是中国政府的长期目标。对此，有两个迹象可以表明：一是中国政府决定于2020年之前将上海打造成全球金融中心之一，这无疑需要人民币实现自由兑换；二是中国政府认为鉴于美元自身的权限及无力同时履行其国内货币和国际储备货币的双重职责，当前的国际金融体系无法持续。我们可以认为，中国政府将于2015年左右正式考虑启动人民币的自由兑换进程，当然，也可能会稍晚一些。届时，人民币将成为世界第二重要的贸易货币，美元作为贸易货币的地位将相应衰落，其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也可能因美国政府应对预算赤字和贸易赤字不力乃至失败而越发动摇。如果美国爆发严重的主权债务危机，美元的地位遭受质疑的时间甚至还将提前。一旦如此，人民币全面可自由兑换将随着其成为世界主要的储备货币而水到渠成。与美

元以及此前的英镑不同，人民币的崛起是由政府法令而非市场力量启动并推进的，这无疑将进一步提醒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全新且与众不同的世界。随着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逐步取代世界银行的地位，人民币逐渐超越美元，上海取代纽约成为世界一流的金融中心，中国崛起是否会导致一个全新国际金融体系形成的答案也就不言自明：我们不能确定的只是这一过程将以怎样的形式呈现，不同阶段的时间节点以及中国主导的世界金融体系的本质与外延。

中国全球化新时代的第四个特征依然与众不同：大体而言，就是新兴全球经济体系的核心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北方或南北关系，而是南南关系；换句换说，就是发展中国家。这一转变的证据已经十分明显。1999年，世界外汇储备的62%掌握在发达国家（即西方国家与日本），发展中国家的份额只有38%。2010年，发展中国家所占的份额就已经达到了至少65%，发达国家的比例则不到35%。1970年，发达国家在世界制造业中所占的比重为65%，发展中国家所占的比重为35%。至2008年，发达国家所占的比重已经降至52%，发展中国家所占的比重则升至47%。1980年，发展中国家占据了全球出口总额的32%和全球进口总额的26%，2009年，其所占份额则分别升至43%和44%。在过去的30年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已经发生了转变。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率远高于发达国家（世界银行于2011年5月发布的一份报告预测，2011~2025年期间，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率将达到4.7%，而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则只有2.3%），人口规模更是令发达国家难以企及，因此，全球经济的重心正逐步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转移，而且这种趋势越发明显。

表2 世界的转变：发展中国家的作用不断提升

	1980~2005 年	2005 年至今
全球经济增长	滞后 / 依附	引领 / 独立
全球治理	被动	主动
全球大宗商品价格	接受	方制定者
全球创新 / 科技	模仿	创新
全球工业标准	适应者	制定者 / 改进者
全球企业战略	被动 / 反应	主动
全球企业并购	对象	发起者

资料来源：约瑟夫·昆兰，跨大西洋研究院研究员

通常认为，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也将逐渐将自己定位为发达国家，正如此前的日本一样。这无疑是误解了当前历史潮流的本质：首先，中国的转型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历并无太大差异；其次，以上现实加之中国对进口原材料为数众多且不断增长的需求，意味着从长远来看，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将日趋紧密。中国与巴西的关系就是典型的例证。对于巴西来说，中国已经成为一个远比美国重要的市场。根据2010年的数据，出口至中国的货物占其出口总额的15%，相比之下，美国的比重只有10%，尽管2002年时美国所占的比重还为26%。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前景远比发达国家更为乐观的事实，将进一步巩固、凸显中国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

这为理解中国崛起以及美国衰落提供了一个截然不同的视角。人们通常认为，随着中美之间差距的缩小，中国在国际经济中的表现将与美国越发相似。然而，我们似乎正走向另一个截然不同的经济范式，美国、欧洲、日本的经济将在不同程度上陷入停滞，在与经济规模更大、更具活力的发展中国家对比时相形见绌，而中国无疑将是发展中国家集团中有史以来最为重要的一员。在中国经济转型的同时，

发达国家也将发生变化。中国塑造的世界经济新秩序的重心无疑在发展中国家而非发达国家，人民币也将成为新体系中的主要货币。与此同时，在中国的带领下，广大发展中国家也将越来越成为全球新机制的塑造者和引领者（无论其到底以怎样的方式出现），这将成为中国主导的世界经济秩序的特征之一。这一截然不同的世界经济形态并非仅如我们已经日渐熟悉的中国取代美国那样简单，全球经济的重构从长远来看必将导致美国和欧洲作为世界主要经济行为体地位的下滑乃至被边缘化，中国将成为世界经济的主导力量。这实际上将是对西方国家的严峻挑战。西方经济的未来将越发依赖于其与中国及其他主要发展中国家发展贸易的能力，这必将要求其对自身的经济目标及理念进行重新定位。除德国以外，其他欧洲国家几乎都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当然美国和日本的情况也只是略好罢了。

2009年12月举行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可以使我们对未来一窥究竟。与过去一个世纪（实际上是过去两个世纪）的主要国际会议不同，此次会议并非由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和欧洲）主导。特别是欧洲，竟然发现自己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其眼中的“世界其他地区”（即发展中国家）所取代。就气候变化议题而言，已经实现了此前国际经济会议中没能实现的世界权力的重新分配。即便是那些最小的国家，也有了一席之地。最终协议的决定者是中国、印度、南非和巴西，正是以上国家起草了最后的协议文本。美国只是在最后时刻才被征求了意见，而令欧洲懊恼的是，自己被完全排除在外。此次哥本哈根会议有可能成为未来的模板。

中国主导的新秩序的第五个特征在于发达国家的核心之一欧洲以及中国对其的影响。直至金融危机之前，中国对欧洲的需求远胜于欧洲对中国的需求。中国的脆弱性在于其对欧洲市场的持续性依赖，而相比之下，欧洲对中国则没什么过多的期望。这与依赖中国不断购买其国债的美国截然不同。金融危机致使中欧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欧洲国家在不同程度上都面临着债务危机和资金短缺，急需外资注

入。此前一直是欧洲国家的公司在华寻找机会，现在态势却发生了逆转。中国以三种方式增强了其在欧洲的影响：购买欧洲国家的主权债券、投资欧洲企业、参与欧洲的公共采购。不出所料的是，中国在经济问题较为严重的东南欧显得最为积极、介入也最深。

中欧关系的逆转尤为体现在那些深陷债务危机的欧洲国家之上。这些国家的政府急于寻求中国政府的支持，希望中国购买本国的国债。2010年6月，中国购买了希腊的国债，作为回报，获得了比雷埃夫斯港为期35年的经营权，并签署了一项资助其购买中国船只的协议。据外界估计，中国购买了75亿美元的西班牙国债和50亿美元的葡萄牙国债。2011年6月，时任中国总理温家宝表示中国有可能将购买匈牙利国债。目前，我们从中欧双方都无法确认中国购买相关国家国债的总额，但其存在却是确定无疑的。根据某些消息来源，2011年上半年，用于购买美元资产的中国外汇储备的数额大幅下降，这也暗示其可能被用来购买欧洲资产。

与此同时，中国对欧直接投资的数量也迅速增长，尽管总额仍相对有限。其中，中资公司对沃尔沃和名爵的收购，无疑是最为人所熟知的案例。2006年，中国对欧的直接投资总额仅为13亿美元。但仅在2011年上半年，中资企业所完成了3笔不同的收购（一家西班牙公司的巴西资产、一家匈牙利化学公司以及一家挪威的大型硅产品生产商），每笔金额都超过了这一数字。中方最近还决定以收购德国中小型高科技企业的股份作为获取技术和知识产权的手段。例如，中国最大的私募基金复星集团计划斥资20亿美元收购德国的中小型科技公司。最后，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在欧洲日趋活跃，最近分别在保加利亚、克罗地亚、希腊、波兰、罗马尼亚、塞尔维亚、斯洛文尼亚等地开设了分支机构，支持当地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并购。随着东欧国家政府深陷财政危机，中国公司愿以低廉的利润竞标道路和桥梁等基础设施建设的意愿，毫无疑问将越发具有吸引力。

中国的金融实力及其巨大的体量，正在使欧洲的态度发生转变。尽管相较于北欧国家，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希腊等南欧国家此前更为担心中国对其劳动密集型产业构成的竞争，但现在它们却更加渴望吸引来自中国的投资。同样，随着来自欧洲资金的减少，保加利亚、匈牙利等中东欧国家对中国的资金也更为依赖。因此，正如在很多发展中国家一样，来自中国的贷款也成为欧洲国家除欧洲或国际银行贷款之外的选择之一。可以预见的是，这些变化将影响欧洲以一个声音与中国展开对话的能力，不同国家的利益必然会有所不同，因此立场也必然各异。德国对中国出口的不断扩大，与英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也是欧洲国家利益分歧的例证。而正如在其他地区一样，中国更希望以双边而非多边为基础处理问题的方式，更将加剧欧洲国家间的分歧。欧洲的案例表明，中国的金融实力不仅能够影响政府决策，甚至能够改变发展中国家乃至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最后，中国对欧元的极力支持，极大地提升了其在欧洲主要国家，如比利时、德国和法国的声誉。中国希望能够确保除美元之外仍存在一个坚挺的货币，而此举无疑在事实上也削弱了美国的地位。这也是中国在与其他国家打交道时如何开始发展其影响力的实例。事实上，以上所有不同的事例也说明了未来中国将如何成功地使欧洲国家（或至少是一部分欧洲国家）与美国之间产生距离。

目前为止，中欧力量对比转变最为明显的事例发生在2011年10月所举行的旨在寻求方法解决欧元危机的欧盟峰会闭幕之后。就在会议结束之后，法国总统尼古拉斯·萨科奇马上致电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请求中国向欧盟的欧元拯救基金大幅注资。第二天一早，欧洲金融稳定基金的负责人就飞往北京，其目的与萨科齐基本无异。中方出于对欧盟能力的担忧，拒绝了欧方的出资请求，但最终同意加入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建立的、包括其他国家在内的救援机制之中。这当时在中国国内也引发了强烈的争议：作为一个人均生活水平只有欧洲1/5的国家，出资挽救一个要富裕得多的地区是否合适？与此同时，欧洲请求中国大规模援助这一举动实际上使欧洲人可能是有史以来第一

次直面中国崛起和欧洲衰落的意义及影响。在“二战”之后，支离破碎、入不敷出的欧洲曾向美国求助，最终得到了马歇尔计划的帮助。但60多年以后，深陷债务危机的美国无暇他顾：中国则是能够提供欧洲所需的大规模帮助的唯一选择。

中国的软实力

作为发展中国家经济转型的杰出代表和非洲、东亚、拉美等地区许多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国已经在发展中国家中享有相当的尊重、具有相当的影响力。相较之下，尽管在东南欧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中国在西方的软实力仍乏善可陈。原因主要有二：其一，中国仍是一个相对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其二，中国并没有实行多党制民主，关于这一问题我们会在下一部分做深入探讨。而前者所具有的含义却被大幅低估：经济财富是决定一个国家影响力的基本因素。这在民众远比从前更加了解其他地区的全球化世界尤为如此。发展中国家的民众有一种天生的欲望，希望能够脱离贫困、过上更好的生活。这就产生了一种隐性的全球等级结构，至少就生活标准而言，民众希望能够赶上那些生活在更为富裕国家的人们，却看不起那些在穷国、生活条件比自己更差的人群。一些台湾民众对两岸统一的担心，不仅仅是因为大陆缺乏所谓的民主，更为重要的是，大陆民众的生活水平仍相对较低。与之相似，在1997年之前香港民众对回归的抵触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其认为大陆人比较穷、文明程度较低。比如，德国人肯定不愿意将自己的生活条件与希腊人互换，更不要说赞比亚人，虽然希腊人和赞比亚人都希望能够享受到德国人的条件。很明显，中国的相对贫困极大地影响了其对西方的影响力。此外，就吸引力而言，富裕的西方国家还享有另一个优势，就是影响他人的手段：硅谷、大型体育赛事、宏伟的博物馆和百老汇，都是为富裕、发达的社会所有，当然也

有极个别的例外。中国直至2008年才成功举办了奥运会，也只有到那时中国才会拿出必要的资金取得如此的成功。

这就涉及了软实力的本质及其起作用的方式。软实力这一概念的主要倡导者是约瑟夫·奈。在其所著的《软实力：权力，从硬实力到软实力》注（*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中，约瑟夫·奈认为软实力和硬实力之间是独立、分离的。他将经济实力（以及军事实力）界定为硬实力，并认为“软实力并不依赖于硬实力”。约瑟夫·奈认为“一个国家的软实力主要依靠三种资源：文化……政治价值……和外交政策”。然而，经济实力（即一个国家所拥有的经济财富）则是大部分软实力的基本前提条件。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其原因有二：其一，民众都希望能够过上富裕国家而非贫困国家的生活；其二，大部分软实力是以经济实力为基础，并依靠其实现。约瑟夫·奈认为“美国不少的软实力是由好莱坞、哈佛大学、微软和迈克尔·乔丹产生的”。但其实他们中的每一个在不同程度上都是巨大的国家财富的产物。设想一下，世界除了美国之外的哪一个国家还能同时拥有其中的两个？更不要说4个了。对于巴西、安哥拉甚至中国来说，拥有这样一系列杰出的代表都是不可能的。只有美国这个迄今为止仍是世界上最为富有的国家和最发达的经济体，才有实力如此。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软实力和硬实力并非如约瑟夫·奈所认为的相互独立。它们也许是不同形式的力量，但却紧密相连，都是一个国家及其统治体系和精英的总体力量的体现。硬实力和软实力这对概念的问题在于，它认为力量是割裂的、毫无联系的，而没有将其视为有机的、完整的。硬实力和软实力的概念人为地将力量分成了互不关联的部分，其动态的本质，包括不同形式力量之间的微妙互动，也因此遗失殆尽。

中国日渐增长的影响力无疑将以一系列不同形式而又内在关联的力量为基础。其中，最为重要的毫无疑问是其不断扩大的经济实力，其不仅为中国发挥更先进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影响力（即软实力）奠定

了基础，也为中国军事实力的增长提供了必要的经济支持。霸权国家必须发展全方位的能力来领导、影响、吸引、降服、说服、恐吓、劝诱其他国家；其必须能够描绘出一幅其他国家愿意准备接受的愿景图画（无论是主动顺应还是被迫接受），其中包括对霸权国家主导地位及其自身从属关系的默认。正如美国一样，为实现这一能力，需具有经济、军事、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实力。中国已经开始了这一进程，尽管只是雏形初现。例如，我们现在正在见证以中国不断增长的地区经济主导权为基础的东亚的飞速重构。然而，直至目前为止，中国在东亚地区所谓纯粹的霸权能力还有待进一步发展，更谈不上所谓的“王道”了。

与此同时，中国日渐增长的财富将迟早会使其以不同的方式向世界展现自己。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不断增多且令人印象深刻的央视海外频道、遍布世界的数百家孔子学院（其主要用以教授、推广普通话）及数量不断增长的、享誉国际的电影巨作，都可以被视为“文化走出去”战略的一部分。一个贫穷的国家肯定无法承受这样一个全球性的文化基础设施建设，但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肯定能够具有这样的实力，也必将如此。

对很多人来说，巅峰时期的美国最具吸引之处是能够在如此众多的领域设定现代性的标准，这也是其巨大的财富和实力使然。全世界的民众都将目光投向了美国，作为理解和预测未来的方法之一。在过去的60年里，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私家车、郊区生活、购物中心、空间探索、个人电子计算机、摩天大楼、相对廉价的太空旅行、互联网、脸谱网、iPod（苹果音乐播放器）、快餐、常春藤联盟、牛仔裤、好莱坞……真是不胜枚举。美国之所以有能力如此，正是因为其有极为强大的经济实力。就现代性的典范而言，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与美国相提并论。然而，随着经济的相对衰落，美国以原有方式实施的领导力已经开始减弱，与此同时，中国已经显现出发挥此种作用的若干微小但却重要的特征，尽管其影响程度仍十分有限。中国的基础

设施无疑是最为明显的事例，甚至已经引发了世界的妒忌：规模庞大的机场、完善的高速公路网络、北京至拉萨的铁路（穿越了“世界屋脊”）、浦东机场至上海的磁悬浮列车、三峡大坝、鸟巢体育场以及世界最大的高铁网络（中国的高铁网络将给中国的经济、社会带来极大的改变，并最终改变中国与东亚其他国家的联系）。与此相似，中国正在通过对太阳能电板和风力涡轮机产业的巨额投资拥抱一个更加绿色的未来。

相比之下，美国及其日益陈旧的基础设施（车站陈旧、铁路网糟糕缓慢、机场不好不坏，空中飞行的地面追踪系统甚至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以及固执地沉迷于私人汽车）已经相形见绌。美国用于交通和水利的公共开支只占其GDP的2.4%，而中国的比例则是9%。中美两国在相关问题上意愿和远见的对比发人深省。的确，奥巴马总统曾设定了要让80%的美国人坐上高铁、98%的美国人用上宽带的目标：在其2011年发表的国情咨文中，奥巴马表示美国需要“在创新、教育和建设方面超越其他国家”。但要实现以上的目标都需要巨额的投资，然而美国现在实际上已经资不抵债。美国当前的情况与20世纪60年代初所面临的“人造卫星挑战”截然不同，当时的美国还能够动用巨大的资源。世界已经越发将眼光投向中国，以了解基础设施的未来发展趋势。实际上，这已经可以被视为中国日益形成的软实力的一部分，而这种软实力的影响对象不仅限于发展中国家，也包括发达国家。

当我们谈及中国软实力的文化范畴时，我们的思维方式必须超越好莱坞、篮球和流行音乐等流行文化的限制。家庭教育是最为根本的问题之一。中国的家庭教育观与西方的截然不同。霍华德·加德纳（Howard Gardner）在其所著的《打开视野》（*To Open Minds*）一书中，曾对两国教育模式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加德纳在书中并没有做价值的判断，而是将两种教育传统之间的惊人差别进行了描述。中西方教育理念之间存在很多差别：在中国，家长的权威被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而西方家长的权威则是可商量的；中国家长通常对孩子抱有

很高的期望，远高于西方，因此通常会对孩子在学习和成绩上有更多的要求；与此相似，中国的家长通常在孩子的行为和责任上有更为明确的道德要求，而西方的理念则更为自由放任；中国的家庭，无论是核心的小家庭还是大家族，其社会重要性和社会地位都远比西方大得多，父母不仅要照顾儿童，而且要赡养老人。

尽管中国的教育理念似乎是可取的，但却仍不可能将其植入到西方社会之中。虽然如此，正如在过去两个世纪西方对其他文化施加了巨大的影响一样，我们没有理由认为中国将来不会如此，特别是在一个包括文化差异在内的各种距离都在逐渐缩小的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中。2011年年初，蔡美儿（Amy Chua）所著的《虎妈战歌》（*Battle Hymn of the Tiger Mother*）在美国引发的巨大争议，已经说明了相关问题的敏感性。这不仅是因为人们对于美式家庭教育日渐增长的担忧、对中国崛起的疑虑，还包括华裔学生和亚裔学生在美国学校中的杰出表现。当前，美国存在一种新的不安全感，虽不情愿但也不得不承认中国文化中的某些地方可能值得美国借鉴。这种情绪并非是道德恐慌，但却可以视为一种征兆。目前为止，西方对两种传统优劣的比较还主要限于教育方面，但其潜在的影响则要广泛得多，包括社会凝聚力、社会融入、犯罪、不良行为和对老年人的照顾等诸多方面。

对教育的关注无可厚非。这种认为教育对国家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意识由来已久，甚至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当时英国发现德国正日益对其形成挑战。然而，全球化却催生了一种层次更高的意识和理念，即对民族国家的教育进行对比。这种对比不仅限于有着悠久的比较历史的西方社会之间，而是覆盖所有国家，包括东亚国家。数十年来，对世界各国（地区）教育水平进行的大型调查一直受到媒体的关注，而且这些调查屡次得出东亚儿童的教育水平要高于西方的结论。2010年12月，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所进行的最近一次关于15岁青少年数学、科学和阅读能力的调查，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调查结果还显示美国的语言教育水平远落后与亚洲国家甚至某些欧洲国家，

仅位列中游。不仅上海在三个领域都位列榜首，新加坡、韩国、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日本等儒家文明区的位置也十分靠前，特别是在数学能力方面，与上海一道包揽了前6名。

表3 15岁学生教育水平的比较

科学	PISA 得分	阅读	PISA 得分	数学	PISA 得分
中国上海	575	中国上海	556	中国上海	600
芬兰	554	韩国	539	新加坡	562
中国香港	549	芬兰	536	中国香港	555
新加坡	542	中国香港	533	韩国	546
日本	539	新加坡	526	中国台湾	543
韩国	538	加拿大	524	芬兰	541
新西兰	532	新西兰	521	列支敦士登	536
加拿大	529	日本	520	瑞士	534
爱沙尼亚	528	澳大利亚	515	日本	529
澳大利亚	527	荷兰	508	加拿大	527
荷兰	522	比利时	506	荷兰	526
中国台湾	520	挪威	503	中国澳门	525
德国	520	爱沙尼亚	501	新西兰	519

科学	PISA 得分	阅读	PISA 得分	数学	PISA 得分
列支敦士登	520	瑞士	501	比利时	515
瑞士	517	波兰	500	澳大利亚	514
英国	514	冰岛	500	德国	513
斯洛文尼亚	512	美国	500	爱沙尼亚	512
中国澳门	511	列支敦士登	499	冰岛	507
波兰	508	瑞典	497	丹麦	503
爱尔兰	508	德国	497	斯洛文尼亚	501
比利时	507	爱尔兰	496	挪威	498
匈牙利	503	法国	496	法国	497
美国	502	中国台湾	495	斯洛文尼亚	497
平均成绩	501	丹麦	495	平均成绩	497
捷克	500	英国	494	奥地利	496
挪威	500	匈牙利	494	波兰	495
丹麦	499	平均成绩	494	瑞典	494
法国	498	葡萄牙	489	捷克	493
冰岛	496	中国澳门	487	英国	492
瑞典	495	意大利	486	匈牙利	490
奥地利	494	拉脱维亚	484	卢森堡	489
拉脱维亚	494	斯洛文尼亚	483	美国	487
葡萄牙	493	希腊	483	爱尔兰	487

2009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PISA(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测试，此次测试共有65个国家、地区与经济体的学生接受了阅读、数学和科学三个方面的评估。

资料来源：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此次，美国或英国并没有如从前般贬低调查结果的意义，强调这只是死记硬背的结果。恰恰相反，美国和西方普遍承认以中国为首的东亚国家在学校教育上已经超越了西方，尽管在过去的十多年里西方一直在致力于缩小这种差距。尤为引人关注的是上海在此次调查中的极为优异的表现，在所有三个领域都具有巨大的优势。最近，上海成功地进行了教育改革，赋予了教师更大的能动性，教师的工资待遇和培训程度更高，并鼓励其参与到课程设置之中。然而，东亚在教育方面取得的成功并非仅仅是教育体系使然，也是教育体系与文明互动的结果。正如上文所提及，相较于西方，儒家社会十分重视教育，家长期望并要求其孩子取得优异的成绩。因此，东亚的教育成就在一定程度源于其文化传统。常春藤高校的品质是美国的根本实力之一，但从长远来看，基础教育体系则更为重要，因为其教育的对象是全体民众，而不仅仅是一小撮儿精英。

从广义的角度对软实力进行审视（即包括基础结构、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我们可以看到尽管中国仍只是一个相对贫穷的发展中国家，但却对西方的理念产生了重要影响。然而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经济实力的相对落后，仍将会限制其对更为富有的西方产生更广泛的吸引力。

中国政府

西方普遍认为中国政府一直面临着合法性危机。其中的逻辑很简单：政府的权威来自民主，但是中国缺乏西方式的民主，因此其也就缺乏合法性。从西方的立场和价值观出发，这一质疑几乎是无可辩驳的。然而，现实情况恰恰相反。根据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的托尼·赛奇（Tony Saich）所进行的调查，2009年对中国中央政府表示比较满意或十分满意的受访者比例高达95.9%以上（尽管对地方政府满意的比例只有61.5%）。无论是就何种标准而言，这一数据都代表了相当高的

满意度，也初步说明中国政府的合法性决不能和是否具有西方民主画上等号。假如二者的确存在必然联系，那么数据应该低得多。实际上，正如我在第6章中所指出，民主只是决定合法性的因素之一，并不是合法性的必然保证，意大利复兴运动以来的意大利政府明显缺乏合法性这一事实已经说明了这一点。与西方的传统看法相反，尽管中国不存在西式民主，但中国政府却比西方任何国家的政府都具有合法性。其原因就在于中国政府权威的来源与众不同：中国政府被视为中华文明的保护者、捍卫者和化身，其主要任务是确保文化或文明国家的统一。与西方国家政府不同，近一千多年来，中国政府的权威几乎没有遭到过严峻的挑战。这一事实也进一步巩固了其合法性。因此，自古以来，中国政府的权力就几乎没有明显的边界。这所有的一切都说明了赛奇调查的结果。中国人对政府的认知与西方人截然不同。西方人将政府视为一个外来者、干涉者，甚至是一个必须时刻对民众负责、由民众评价的必要对手。而中国人则将政府视为亲友，正如家庭的一分子，甚至可能是家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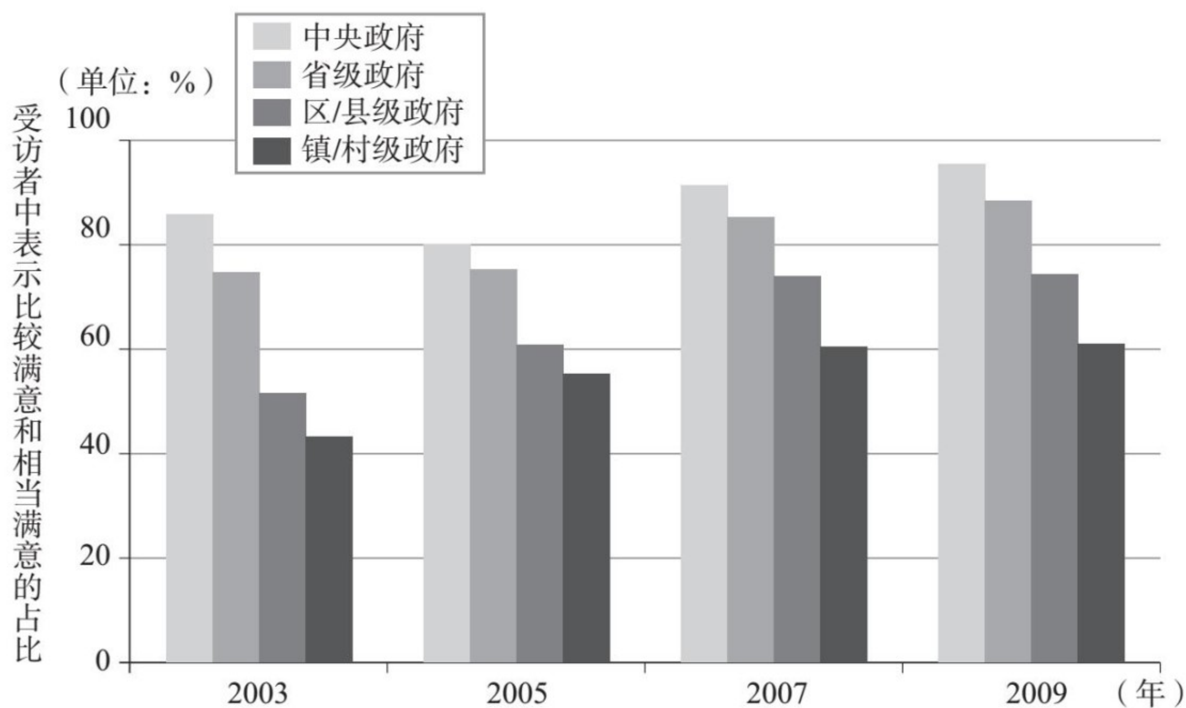


图4 中国民众对政府的满意度

数据来源：托尼·赛奇，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此调查于2003~2009年间共采访了4千名受访者）

合法性的本质并不是区别中国政府与西方政府的唯一特征。中国政府的历史演进与构建也与西方截然不同。现代形式的政权以及由通过科举考试而招募的人员组成的、胜任管理这样一个规模国家的中央行政部门，其在中国的出现时间也远早于欧洲。中国的政府也逐渐具有了对经济、人口、军事等事务管理的一系列权力，例如在国家内部调配粮食和修建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权力。而这种情况出现的时间也远早于欧洲。而所有的这些特征至今仍非常明显，只是程度有所不同。实际上，没有任何一个中国机制能比中国政府更与众不同或更具本土特征了。

当前中国政府的经济作用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与其最为相近的，应属将高度活跃的政府、强大的工业基础和出口导向型战略结合起来的日本、韩国等东亚发展型国家的政府。中国模式在借鉴其经验的同时，本身也具有鲜明的特色。在日韩两国，国家所有制比例相对有限；而在中国，国有制的作用和范围则要大得多。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政府对国有企业进行了重要改革。当时西方普遍认为中国将采取与俄罗斯等国相同的改革路径，实行私有化，大幅降低国企的规模与作用。然而结果恰恰相反。中国政府采取了“抓大放小”的政策，国有企业的数量虽然大幅减少，但大型国企却得到了重构、资助、巩固与扩大。至2008年，国有企业控制了中国工业和服务业总资产的30%。顶尖的150家国企，不仅没有成为跛脚鸭，反而实现了大幅盈利。中国经济政策的目的之一就是打造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中国公司，其中大部分是国企。我们很难想象当今世界还有与其类似的例子！

大部分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其国有企业都享有不同程度的保护，经常处于事实上的垄断地位。中国的情况则截然不同。中国政府将国企置于不得不面临来自其他国企、私营企业和外国公司激烈竞争

的境地。虽然中国的国企从国家获得了大量的扶持与帮助，但却具有相当的独立性，能够以私人企业的方式管理和募集资本。对中国国企最为准确的描述，应该是兼具国企和私企的特征。在私企中，政府也发挥了明显的作用。一些大型的私企，如联想和华为，一直得益并依赖于其与政府的紧密关系，这一点与日本、韩国的情况较为类似。然而与日、韩私企占据主导地位不同的是，绝大部分中国的优质企业都是国企。

中国模式的核心就是一个活跃、无处不在的政府。政府与强大的国企集团关系紧密，与大型私企互有联系，主导了中国的经济转型。中国政府是一个极富活力的机构，自邓小平时代以来，就一直致力于推动改革。在不断的探索、试错的基础上，中国政府不停地重构，定期对各个部门进行重新定位和激励。这与西方盛行的新自由主义理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新自由主义认为政府必然会僵化、退化、不合时宜。还有一点我们不应忘记，中国政府指的是一批相关的机构，不仅包括中央政府，还包括省政府（其中有9个省政府管理的人口与法国和英国不相上下），北京、上海、重庆等超大城市的政府（每个城市的人口都至少有2 000万）以及其他各个层级的政府。每个省级单位的政府也都有自己的经济和工业政策以及自己的省属国企，例如中国最大的汽车制造商之一的奇瑞，就是安徽省的国企。实际上，中国经济如此富有活力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各省及各省的企业之间也存在激烈的竞争。

中国模式还有另外一个方面也不同寻常。其同时具有两个看似矛盾的特征。一方面，中国的政府无处不在。无论是中央、省级还是市级政府，都十分活跃，以各种方式参与到经济和社会生活之中。而与此同时，中国又致力于推行市场经济，鼓励竞争。中国政府反对垄断，一旦有垄断存在，政府就会对市场进行重组以确保竞争。对第一个特征我们无须多言，对其致力于市场和竞争，我们也不必惊讶。正如我们在第1章和第3章中所述，这些都深植于中国的历史和理念之

中。然而，中国模式的特别之处（实际是独特之处）在于其将政府和市场高度结合了起来。

尽管中国的经验具有高度的历史独特性和客观现实环境，但其仍有不少值得其他发展中国家借鉴之处，其中最为明显的包括：应建立积极主动、称职、富有战略眼光的政府，提倡竞争，不断地学习与实践，愿意向国外学习与借鉴以及相对开放的市场等。然而，中国发展的两个基本特征则是其他发展中国家无法复制的：一是中国政府本身；二是中国巨大的规模和疆域（当然，印度是个例外，其人口数量与中国相近）。

相对于发展中国家，中国政府可供西方借鉴之处就没有那么明确了。西方社会看上去应该不会接受中国的治理模式。相反，中国所谓的“缺乏民主”极大地刺激了西方民众，其认为自己的民主经验为世界各国提供了一个普适的样板，更不要说中国了。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日渐增长的实力与影响将迫使西方主动寻求更好地理解中国政府如何、缘何与众不同，包括在指出其问题的同时承认其优点，尽管西方可能会继续指责中国缺乏民主。此外，中国政府还有其他很多不同于西方之处值得学习借鉴。第一个就是“政府能力”。在过去的30年里，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兴盛与市场和私有化至上，这一概念已经在西方的日程表里消失了。日益增长的反政府意识干扰、分散了对于政府理应称职、有能力兑现承诺的关注。第二个则是政府的战略能力，就是能够从长计议的思维和行事能力。这也是中国政府最大的优势之一。相反，西方政府最大的缺陷之一就是为任期所困。随着中国的崛起，西方政府将面临将民主与一个全新的、更为长远的时间概念相结合的挑战，这将要求其对政治治理的本质和形式进行认真的重新思考。最后，中国将政府与市场高度结合起来的范式也将对西方关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争论产生长远的影响。

以上种种听上去可能有些难以置信，至少对很多西方读者来说确实如此。让我们在一个更为广阔的背景下再对其进行考量。西方当前正处于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之中。在金融危机发生若干年之后，何时能走出危机至今仍不得而知。实际上，这样一场困扰西方资本主义的危机至今仍处于初始阶段：若干年已经过去，我们对于这场危机的深层次原因和如何应对仍知之甚少。这样的危机也不可避免地令很多过去数十年习以为常的基本理念遭受质疑，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新自由主义，尽管当前还很少有人承认这一事实。面对经济的动荡，西方可谓黔驴技穷，没能做出任何创造性的回应，只是不停地重复老路。长远来看，其政治影响也将十分显著。例如，正如我们将在下一部分所见，大多数美国人已经感受到相较于过去30年生活水平有了明显下降。近来，越来越多西欧民众的感受也是如此。这极有可能会动摇维持了西方社会战后长久稳定的社会契约。最后，与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不同的是，这场危机还伴随着全球权力由西方向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的根本性转移。这也无疑会影响很多西方国家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位置。在过去的200多年里，在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中，西方一直处于明显的优势地位。发展中国家首先是沦为西方的殖民地，随后又成为贫弱的后殖民社会。因此，西方可以以非常优惠的条件攫取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但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的增长，加之其自身对大宗商品的需求日益增多，大宗商品价格也随之大幅提升。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大宗商品的价格变得越发昂贵。未来，这一趋势还将持续并继续深化。

这一危机的深刻性将使塑造西方社会的治理和政治基础遭受不同程度的质疑。此类经济危机并非自然现象，而是人为造成，是政策、优先顺序、思想体系和利益造成的恶果，反映了统治集团的能力、态度和意识形态。与战争一样，此类危机是对相关集团能力、关联性、整合程度和持久性的无情考验。就此而言，历史将要对美国的政治体系进行严厉的宣判。美国的政治阶级放任自己成为金融部门及其利益的囚徒（英国也是如此）。自此，美国政府发现自身几乎处于瘫痪的

境地，深受社会极化的困扰，权威不断遭受质疑与攻击，决策则经常受到强有力的游说的影响（其中华尔街至今仍是最有影响力的游说集团）。我们很难想象美国政府居然会有无力回应并应对国家所面临的严峻挑战的时刻。当然，美国政府自认为建立了一个被世界很多国家羡慕的民主体系，但如果政府无力履行必要的职责，即不具有统治、协调和领导社会的能力，所谓的民主体系又有何用呢？与此同时，欧洲的治理也明显失灵，上文所提及的欧元危机以及欧盟面临解体的危险就是最为明显的例证。这与中国政府在过去30年领导中国实现转型的过程中所展示出来的能力与远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政府的表现无疑最为抢眼，其所取得的成就堪与过去两个世纪中任何国家政府所取得的成就相比。这并非是要掩饰中国治理体系所存在的缺陷和腐败，但我们却不应因此而一叶障目，否认其取得的惊人成就。这种对比持续的时间越长，西方就越会发现自己有必要向中国学习。

美国的衰落

美国衰落这一问题第一次浮出水面是在20世纪80年代，当时美国面临着日本的严峻挑战。但随着日本泡沫经济的破灭，这个问题又逐渐销声匿迹。随后，苏联的解体所带来的狂喜更是令此无人提及。10年之后，小布什入主白宫期间一个基本的前提就是美国实力达到了历史的顶峰，放眼全球罕有匹敌，世界即将迎来一个全新的美国世纪。当然，正如我们在序言中所提及的，美国经济的相对衰落实际上已经开始了。然而只有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美国公众才不得不严肃对待这一问题。此后，美国国内就这一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尽管只有为数不多的人认同美国的衰落将是一个不可逆转的长期过程。很多保守派人士，如查尔斯·克劳萨默（Charles Krauthammer），坚信所谓的衰落只是一个政治问题：“对今日之美国来说，衰落并非一种条

件，而是一种选择。在苏联解体、世界进入单极世界20载之后，美国将要就是否继续维持其主导地位做出决策。衰落或继续处于统治地位，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2010年1月的一项民调显示，华盛顿的民主党和共和党精英中有1/4认同金融危机标志着美国国际霸权的终结。

直至金融危机之前，很多关于这场迫在眉睫的危机的警示都被普遍忽略或少有提及，例如国家身负重债、持续的财政赤字和由来已久的经常项目逆差。金融危机改变了这一切。美国民众开始认识到美国对中国继续购买美国国债的依赖，承认美国的贸易赤字将不断增加美国对中国及其他国家的负债。对银行的援助进一步增加了美国的财政赤字。2010年，美国的财政赤字达1.6万亿美元，相当于GDP的10%。美国年度财政赤字的总额（即美国的国债）达9万亿美元左右，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在2001~2007年间积累下来的。仅伊拉克战争一项，最终费用就高达3万亿美元。至21世纪30年代，维持美国国债的成本（即支付给中国和其他国债持有者的利息）预计将比国防预算还要高。因此，美国国债极有可能在未来引发一场主权债务危机：因为其国债的外国持有者可能会认为美国政府将无力履行其义务，出现债务违约。这将导致美元的恐慌性抛售和大幅贬值，其作为储备货币的地位也将遭到全面动摇。

美国政府现在面临同时大幅度削减财政赤字和经常项目赤字的挑战。在经济大幅衰退之后，美国政府还不得不面对未来10年经济低速徘徊、实际工资停滞或下降和大幅削减政府开支（包括教育、养老、医疗、国防等领域开支）的窘境。美国政府将如何应对，目前尚不可知。有关于此的政治争论日趋极化，截然不同的立场和表述可谓针锋相对。茶党的兴起就是最好的例证。茶党高度敌视政府，希望能够让国家恢复到早期的弱政府甚至小政府状态，其将目光投向18世纪的美国历史寻求灵感就是明显的证明。美国国内这种日益增长的矛盾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据估计，1970~2000年，扣除物价因素，80%的美国民众收入下降了10%；而最富有的20%的人群，其收入增长了60%。

1976~2007年，58%的实际收入增长流向了最富有的1%的家庭。换句话说，数十年来，大多数美国民众的实际收入不断下降，与此同时，不平等却在加剧，作为美式生活方式的神圣特征之一的社会流动性也在大幅下降。为应对收入的不断下降，小布什政府大肆鼓励房地产借贷（无论是抵押贷款还是信用卡）的发展，但次贷政策上的失误，最终导致了金融危机的爆发。除生活标准下降之外，造成美国社会政治极化的原因还有很多。在过去的10年里，由于被冷战的胜利冲昏了头脑，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发动了两场错误的战争，最终都以失败告终。这对于一个以其军事实力为傲的国家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此外，随着对国家衰落的讨论日渐增多，美国对其此前毋庸置疑的世界霸主地位也不再那么自信。鉴于以上，一种新兴的不确定性开始感染整个国家，也就不足为奇了。

对于大部分的美国人来说，特别是那些生活在内陆地区的美国人，相对于国内问题，外交政策的优先性要低得多（这一点与国防政策有所不同），在生活水平大幅下降之时尤为如此。相较于2010年，美国国务院2011年的预算被削减了16%。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向众议院抱怨“我们正处于信息战之中，而我们正在被打败……获胜的是半岛电视台”。此外，希拉里还指出在中国和俄罗斯增加其国际广播预算的同时，美国有线电视网和英国广播公司却在削减预算。在谈及中国时，希拉里表示：“好吧，让我们坦率地谈一下现实政治。我们正在与中国竞争。以巴布亚新几内亚为例，在那里发现了巨大的能源储备……埃克森美孚正在推进该项目。中国则时时刻刻尝试用一切手段，设法后来居上，把我们挤出这个项目……我同时也要指出中国为太平洋岛国提供了6万亿美元的发展项目。我们拿什么回应呢？什么也没有。”随着预算削减的幅度越来越大、效果越来越显著，希拉里的抱怨仅仅是一个开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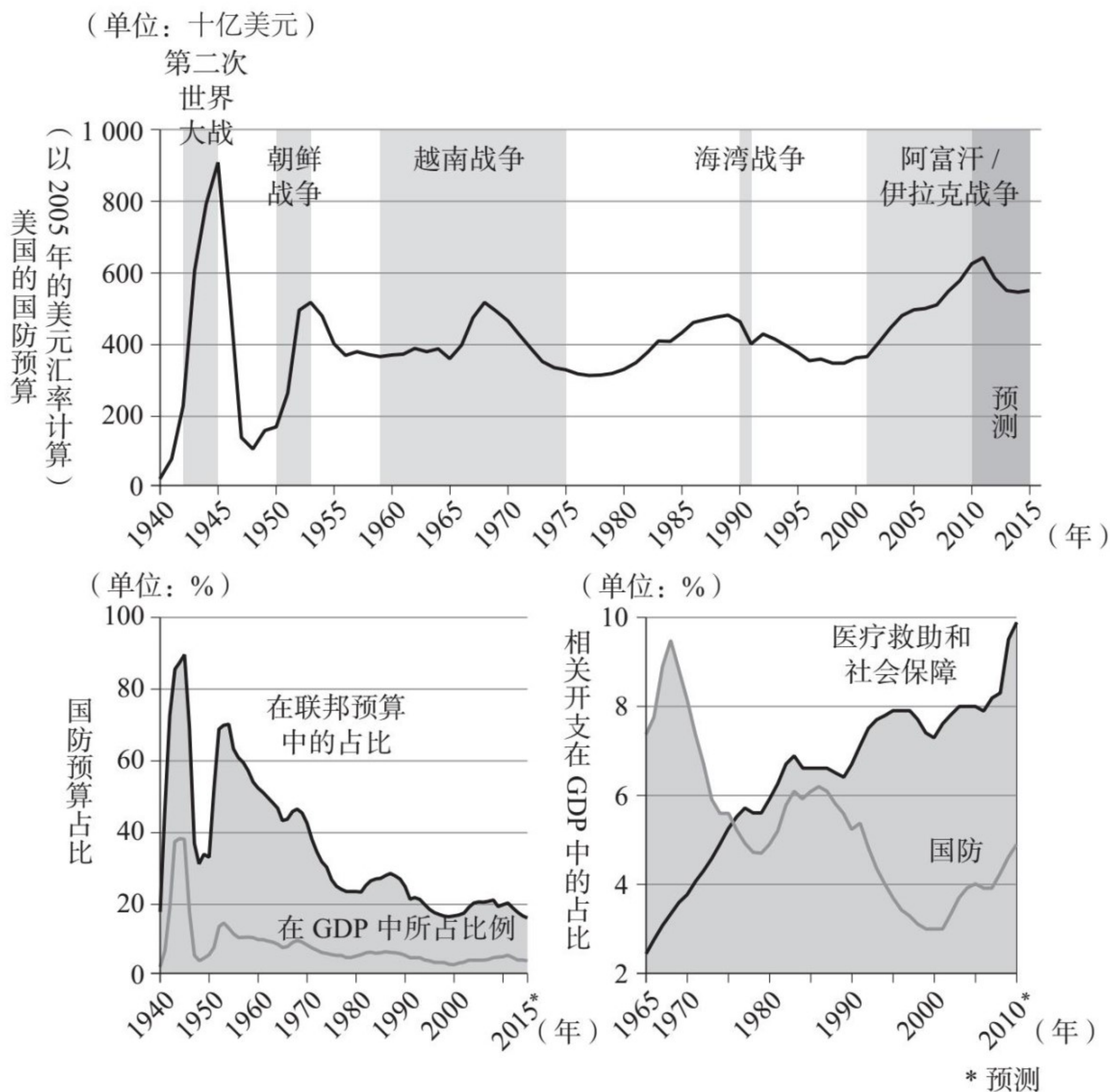


图5 美国巨大的防务预算压力

数据来源：美国传统基金会

相较于国防部的预算，美国国务院的预算就是小巫见大巫。鉴于国防预算占联邦预算的20%左右，因此大幅削减在所难免。冷战的结束曾导致国防预算的大幅削减，但其主要是出于地缘政治考量而非经济原因。美国在70年以来第一次不得不因经济原因而削减国防预算。2011年1月，白宫命令国防部在未来5年对国防预算削减780亿美元，因

此导致了20年以来第一次大规模裁军。而新装备的购买、海外军事援助、海外军事基地和非核心军事行动受到直接影响。随着美国政府越发不愿过多地介入不相关的军事行动，财政吃紧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或多或少将立即显现。这在美国处理利比亚问题的政策上体现得尤为明显。起初，美国不愿加入2011年3月西方对利比亚的军事干预，随后又立即从核心位置抽身。实际上，我们很难想象未来美国会发起伊拉克战争或阿富汗战争那样耗资巨大的军事干预行动，甚至连像20世纪90年代的科索沃战争那样的军事干预行动也不会介入。2011年3月，就在即将卸任国防部部长之前，罗伯特·盖茨（Roberts Gates）毫不隐讳地指出，如果未来任何一位国防部部长向总统建议向亚洲、中东或非洲大规模派遣部队的话，首先应该如麦克阿瑟将军建议的那样，“检查一下他的脑子”。2012年1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将在未来10年里削减4 870亿美元的军费预算，陆军和海军极有可能成为被开刀的对象。美国军队正面临预算被逐渐削减的境况。

对美国海外军事投入的彻底的再评估正在进行之中。除了已经结束的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外，美国的海外军事力量主要部署在三个地区：东亚、欧洲和中东。对于美国来说，将军队部署在东亚主要是针对中国。正如第8章中所提及，奥巴马政府明确表示不会削减在东亚的军事存在，相反还将有所加强。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军事行动逐渐告一段落的事实表明，在不增加军事预算的前提下，美国将拥有更多可利用的资源。然而，从长远来看，我们有理由认为随着中国军事实力的不断增长，美国无力承担维持现有巨大优势的财政重负，尽管某些右翼人士认为这是最基本的要求。与此同时，美国将积极扩展和维持其与本地区不同国家的军事同盟，如美日军事同盟、美韩军事同盟、美澳军事同盟、美新军事同盟、与东南亚不同国家之间的军事同盟以及未来的美印军事同盟等。此外，一旦条件允许，美国将寻求让其盟友（如日本与韩国）更多地承担在其本土驻扎的美军的费用。就美国而言，欧洲的问题也将更多地由欧洲人自己来解决，这一趋势在近段时间以来已经十分明显。实际上，美国前国防部部长盖茨

在其2011年6月最后一次政策性讲话中指出：“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是，面对很多明显不愿投入更多必需资源、做出必要的改变以便有能力保障自己的国防安全的国家，美国国会和美国政府增加珍贵的资金的愿望和耐心都会逐渐磨灭。”相较之下，鉴于其政治的变化无常及石油的重要性，中东地区仍将是美国海外的重心之一。

削减国防预算无疑是一个充满冲突、极为痛苦的过程。对于美国人来说，军事力量是美国地位和全球霸权的终极象征：其深嵌于美国民众的意识之中，激发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在所有国旗中最为醒目的星条旗，骄傲地在数不清的建筑外和家庭外飘扬（美国中部地区尤为如此）。至目前为止五角大楼向国会提交的预算几乎从未遭受过质疑，所谓的通过也只是走过场而已。这一事实足以说明军事在美国所具有的特殊地位。军事在影响民族感情的同时，本身耗资巨大。因此国防预算的背后也有着众多利益集团的身影：武器制造商、受到国防项目承包商游说恩惠的议员、国防工业和五角大楼所提供的工作岗位与合同、致力于美国地缘政治作用的智库以及数十万在部队服役的人员。1961年，前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Dwight D. Eisenhower）在发表告别演说时，曾发出了著名的警告，提醒民众警惕军工复合体的作用。自那时起，军工复合体的实力又得到了显著地增长，我们毫不怀疑在未来10年其作用将进会一步提升。

衰落的帝国要认清自己的实力不再，无疑是极为困难的过程。它们是如此渴望握住旧日的荣光，有如此多的既得利益要求其保持现状，伟大的理念已经如此根深蒂固，从王座上跌落、放弃相关的承诺无疑会伴随着极大的不情愿和极度的痛苦，因冲突而四分五裂，最终导致支离破碎，转向保守实用主义。英国就是典型的例证。苏联算得上是最明显的例外，直接以解体告终。就英国而言，其国家的衰落是由军事日渐孱弱、经济不断紧缩导致的一系列战术退却体现出来的。当然，从长远来看，出于战略远见而进行的退却无疑是一个最为理性的选择，也最符合国家的利益。然而，如果要制定一个美国实现复

兴、应对中国崛起的长期规划，其与美国实际可能采取的措施将大相径庭。当前美国所面临的真正挑战并不在于军事而在于政治。大体而言，五角大楼庞大的军费预算已经不再与美国的目标相符，将本应用于复兴美国经济大业的国家资源投入到那些并没有太大价值的地区。值得一提的是，教育的孱弱堪称美国这个世界上最为富有的国家的战略优先顺序制定上的悲哀。美国应投入大量资金改革现有严重不足的教育体系。

但在未来的10年，在财政紧缩的压力无情地削减联邦预算的同时，美国的教育体系仍将面临资源匮乏的难题，这是毋庸置疑的。而军工复合体所得到的资助则将肯定远大于国家的实际需要。或者换而言之，正如此前的英国一样，美国的衰落必将导致异常的结果。因为那些曾经的大国，远不能放弃过去的帝国范式，而是在众多强大利益的作用下，固执地试图坚守过去的荣光，而这只会加速衰落的过程。战略和远见是新兴大国独有的特征，拒不接受、留恋过去及因此导致的不可避免的衰退，则是衰落大国无可阻挡的印记。

做好大吃一惊的准备……

2007年，高盛公司预测至2027年中国经济的总量将超过美国。我不禁回忆就在本书的精装版于2009年6月在英国出版之后，我曾做过多场报告，大家普遍的反应就是这些数字仅仅是预测，属于遥远的未来，不大可能成为现实。当时已经是雷曼兄弟公司破产9个月之后了。没有一个人，甚至没有一个评论家认为中国经济总量超过美国的过程可能会比预计的还要快。当然，结果就是现在大家纷纷如此预测。相较于高盛关于中国经济总量将于2027年超过美国的预测，2010年，法国巴黎银行将时间提前到了2020年；随后，在2011年，《经济学人》预计中国将在2018年就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这在笔者落笔之时，只有6年的时间了。换句换说，这一事件并非是遥不可知的未

来，“新千年式”的倒计时已经在进行当中（见图6、7）。当然，就某些指标而言，中国已经超过了美国。例如，2007年，中国的出口总额已经超越了美国；2011年，两者之间的差距扩大到了惊人的30%。与之相似的是，2009年，中国固定资本投资总额也超过了美国；而2011年，两者之间的差距更是扩大到40%以上。2010年，中国的工业生产总值已经超越了美国，而汽车销售、能源消耗，甚至更加令人吃惊的是连居民专利申请量，也超过了美国。当然，中国的对外金融资产也大大超过了美国：中国持有的对外金融净资产总额为2万亿美元，而美国则是净负债2.5万亿美元。美国至今仍具有巨大优势的唯一领域就是国防预算，其总额相当于中国的6倍；而中国直至2025年才能赶上美国。最后我们来看看两国的经济总量。2011年，美国的GDP大体上相当于中国的两倍，这相较于2000年的8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追赶美国的速度令人可谓十分引人瞩目。面对这样庞大的经济力量，对于中国崛起为世界经济的主导，美国几乎是束手无策。我们甚至已经能够列出中国日益增长的优势地位的关键节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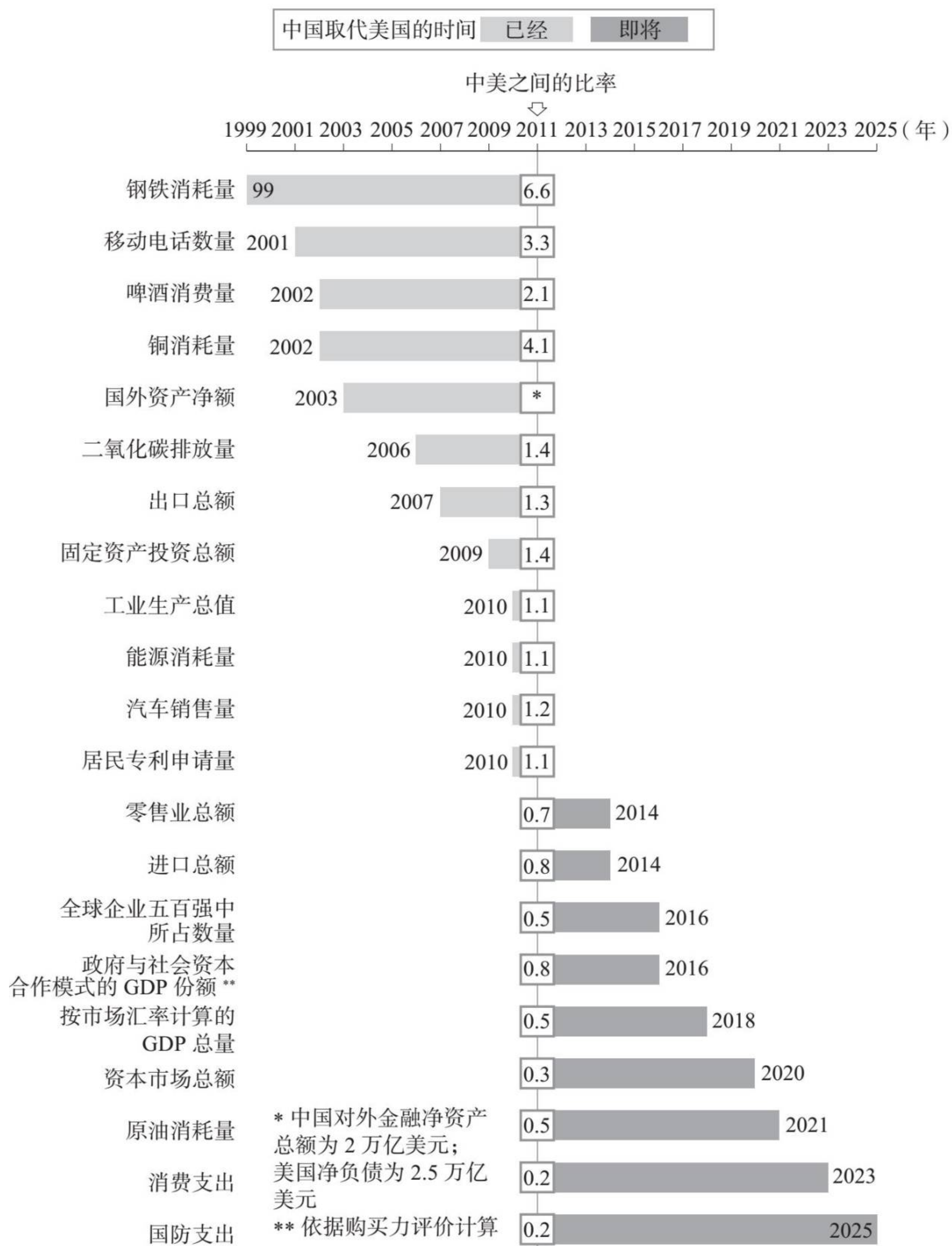


图6 中国正逐步取代美国

数据来源：《经济学人》、英国石油公司、环亚经济数据有限公司、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电信联盟、汤森路透、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证券交易所联合会、世界钢铁协会

第一个时间节点就是西方的金融危机，这一点明确无疑。正如我们上文所提及的，尽管其作用被西方严重低估，但金融危机却标志着中美之间的实力对比发生了根本性转变。而下一个时间节点则是在未来10年内，即中国经济总量超过美国之时。这不仅将明显具有巨大的经济意义，此外还将对世界对中美两国及其前景的认知产生显著的影响。换句话说，其影响不仅限于经济领域，还包括政治、意识形态领域。第三个关键阶段将是人民币取代美元成为世界主要储备货币。对此的确切时间我们暂时还无法预测，主要是因为其将取决于中国决定何时实现人民币的可自由兑换。但鉴于美元的根本缺陷及脆弱性，其时间可能要比人们通常预计的快得多。目前看来，这一目标不可能在10年内实现，但随着人民币实现可自由兑换，或将可以在20年内实现，这一点是可以想象得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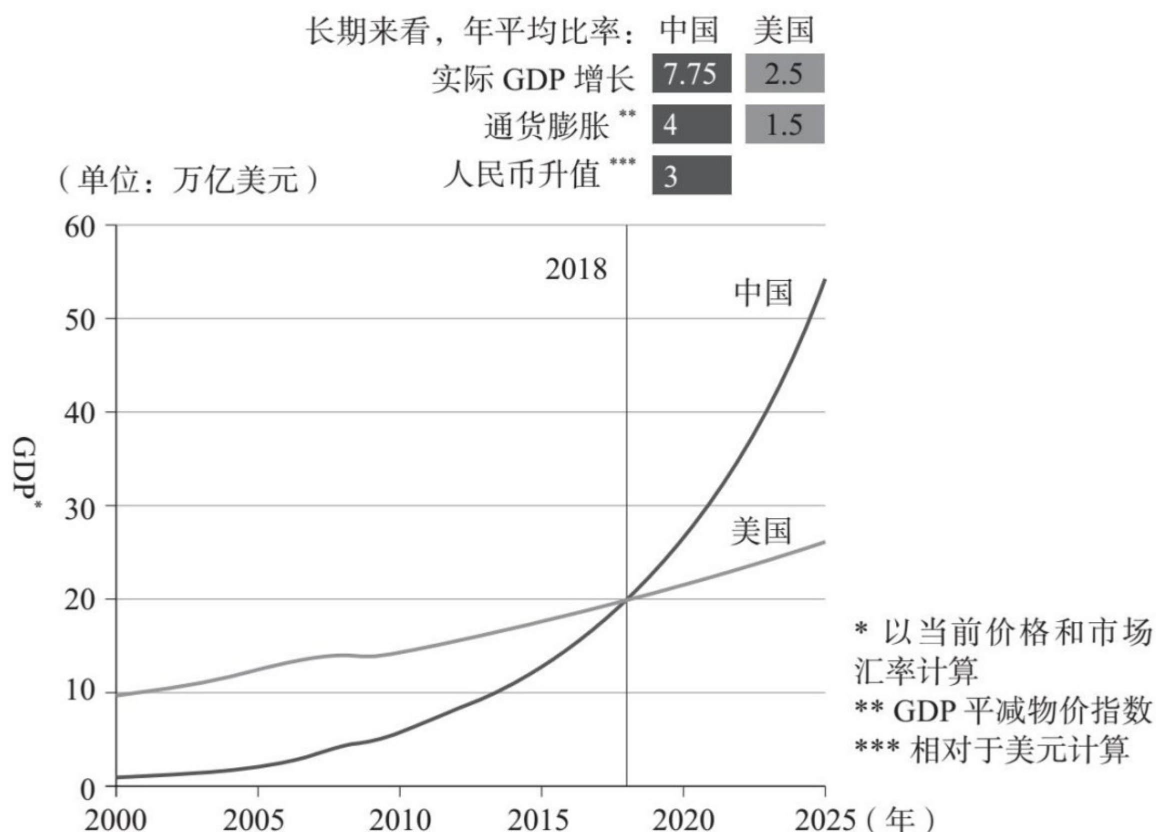


图7 中国将于2018年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

数据来源：《经济学人》

当然，以上都是经济标准，为了更好地考量中国的崛起与美国的衰落，我们需要更为广阔的视角。这些经济变化将对美国的地缘政治影响力带来怎样的冲击？过去10年，美国在东亚影响力的衰落在很大程度上可归因于美国在东亚经济影响力的下滑。更为显著的是，金融危机将美国的衰落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明显地展现在世人面前。在此背景之下，对2010年以来的阿拉伯动荡的本质及根源进行反思，无疑是件趣事。中东一直在美国的外交政策和军事投入中占据着远比其他地区更为重要的位置。“阿拉伯之春”最为重要的体现就是埃及的解放广场运动。该运动推翻了美国在中东地区最为亲密的盟友之一胡斯尼·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其政府每年会收到4万亿美元的美国军事援助。此后，在2011年举行的埃及议会选举中，两个主要的伊斯兰政党获得了67%的选票。美国地位削弱的其他体现还包括美国不愿在

轰炸利比亚军事行动中承担主要责任（这如果发生在小布什政府时期，美国肯定当仁不让），以及作为美国在中东地区三个主要盟友之一的沙特（此外还包括以色列和埃及，当然是穆巴拉克统治下的埃及）对美国提出的不要武装干涉巴林的建议置若罔闻。最为重要的是，有明显的证据表明美国在中东地区最为重要的盟友以色列，正在与美国逐渐疏远：中东地区新近崛起的土耳其一直对以色列咄咄逼人；埃及对以色列正展现出更多的敌意；巴勒斯坦不顾美国和以色列的强烈反对，选择跳出已经确定的和平进程的限制，寻求以主权国家身份加入联合国。

若想从以上事件中得出明确的结论，还为时过早，但所有这些均表明美国在中东的影响力不断减弱。就更广阔的全球视角而言，这表明事态的发展可能要比此前预想中的更为迅速。当霸权只是在道义上存在而非实力使然，考量也就会发生变化：此前被视为不可想象的行为，现在突然变成了可能，无能为力的感觉被可能性所取代。苏联在东欧地区坍塌的速度，就是最为经典的例证。当然，美国的情况截然不同，但我们也完全有可能高估了其实力，低估了其脆弱性。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以及2011年8月标准普尔剥夺了美国经济长期以来的AAA级评级，在短短3年内，世界对美国的认知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随着美国实力衰弱的日益明显，我们有理由认为其全球影响力也将加速消解。这在拉美地区和东亚地区已经是持续相当一段时间的明显态势，美国在这两个地区的霸权在迅速衰落。此外，美国国家安全机构倾向于将军事援助和支援置于外交和政治手段之上的事实（对此，美国在中东特别是埃及、伊拉克、也门所扮演的角色，就是明显的例子），也使得美国的影响力更容易受到军事存在变动的影响。正如笔者此前所言，甚至连美国软实力的持久性也一直被夸大。

因此，我们不能排除美国实力的衰落可能比人们预想中的还要快这一假设将引发深远的地缘政治影响。迄今为止，西方仍普遍认为中国本身具有极大的脆弱性：然而，在我们普遍质疑中国经济能否保持

引人瞩目的快速增长的同时，美国的经济却以令人吃惊的节奏沉沦。我们可能望错了方向，美国的缺陷才应该也必将占据我们的视野。实际上，美国全球实力的崩溃将比此前人们预想的还要快，在未来的20年内，其全球影响力将会黯然失色。随着由中国主导的世界秩序的形成，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正在以引人瞩目的速度瓦解。欢迎来到未来！

---

1. 影子金融体系指一些不会像银行一样受到金融监管部门和条例严格监管的金融机构。——编者注
2. 《软实力：权力，从硬实力到软实力》中文版已于2013年5月由中信出版社出版。——编者注

附录

海外华人

出于种种原因，人们很难准确估计出海外华人的数量。在非洲和澳大利亚等地区，移民现象仍然非常活跃。在如何精确界定海外华人方面，也存在很多问题，混血儿便是一个明显的例子。由于非法移民、人口普查的准确性和概念的不确定性等各种原因，数据的可靠性和精确性都值得商榷。然而，尽管存在上述的诸多难处，附表还是大概给出了海外华人的总体规模及其分布的主要国家。

华人移民拥有悠久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明朝时期的下南洋（即移民至东南亚）。华人移居全世界的进程始于19世纪，当时中国南方沿海省份的劳动力过剩，欧洲殖民地则招募华工充当劳工。移民至东南亚国家的华人最多，但是到19世纪下半叶，也有大量华人移居到美国，特别是前去淘金和修建铁路的人，更是络绎不绝，此外还有很多移民移居至澳大利亚和其他地区，其中包括欧洲及南非。仅在1844~1888年期间，就有200多万的华人定居到马来半岛、中南半岛、苏门答腊岛、爪哇、菲律宾群岛、夏威夷、加勒比、墨西哥、秘鲁、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20世纪下半叶，移民到北美和澳大利亚的人数明显增多。就在不久之前，前往非洲和其他地区的华人也开始显著增长。

关于这一话题，已经存在大量的著作，其中包括：潘翎（Pan Lynn）的《海外华人百科全书》（*The Encyclopedia of the Chinese*

Overseas）和《炎黄子孙：海外华人的故事》（*Sons of the Yellow Emperor: The Story of the Overseas Chinese*）；罗宾·科恩（Robin Cohen）的《全球移民介绍》（*Global Diasporas: An Introduction*）；苏珊·高尔（Susan Gall）、伊瑞尼·娜提雅维达（Ireane Natividad）的《在美亚洲人年鉴：关于在美亚洲人的参考文献》（*The Asian American Almance: A Reference Work on Asians in the United States*）；王赓武的《中国与海外华人》（*China and the Chinese Overseas*）；王灵智、王赓武的《华人移民：文选》（*The Chinese Diaspora: Selected Essays*）（第2卷）以及王赓武的《海外华人》（*The Chinese Overseas: From Earthbound China to the Quest for Autonomy*）等。

国家	华人人口
印度尼西亚	7 566 000
泰国	7 153 000
马来西亚	7 070 000
新加坡（华人占绝大多数）	3 496 000
美国	3 376 000
缅甸	1 662 000
加拿大	1 612 000
秘鲁	1 300 000
越南	1 264 000
菲律宾	1 146 000
俄罗斯	998 000
澳大利亚	670 000
日本	607 000
英国	347 000
柬埔寨	344 000
南非	250 000
法国	231 000
印度	189 000
老挝	186 000
巴西	152 000
新西兰	148 000
意大利	145 000
荷兰	145 000
尼日利亚	100 000

非洲（含南非和尼日利亚）	400 000~600 000

参考文献

Acharya, Amitav, ‘Containment, Engagement, or Counter-dominance? Malaysia’s Response to the Rise of China’, in Alastair Iain Johnston and Robert S. Ross, eds, *Engaging China: The Management of an Emerging Power* (London: Routledge, 1999)

Aikawa, Kayoko, ‘The Story of Kimono’, in Atsushi Ueda, ed., *The Electric Geisha: Exploring Japan’s Popular Culture* (Tokyo: Kodansha International, 1994)

Akao, Nobutoshi, ‘Re-energizing Japan’s Asean Policy’, *AJISS-Commentary,* 2 August 2007, posted on www.jiia.or.jp/en/

Alden, Chris, *China in Africa* (London: Zed Books, 2007)

—— Daniel Large and Ricardo Soares de Oliveira, eds, *China Returns to Africa: A Rising Power and a Continent Embrace* (London: Hurst, 2008)

Alderman, Liz, ‘Beijing seen striving for influence in Europe’,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2 November 2010

Allen, G. C., *A Short Economic History of Modern Japan*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1962)

Anderlini, Jamil, ‘Chinese lost billions in diversity drive’, *Financial Times*, 15 March 2009

—— ‘German industrialists attack Chinese’, *Financial Times*, 18 July 2010

—— ‘Foreign Companies “losing out” in China’, *Financial Times*, 2 September 2010

—— ‘China extends help to tackle euro crisis’, *Financial Times*, 21 December 2010

—— ‘China cements role as top of the Brics’, *Financial Times*, 14 April 2011

—— with Alloway, Tracy, ‘Trades reveal China shift from dollar’, *Financial* Times, 20 June 2011

Anderson, Benedict,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 1983)

——*The Spectre of Comparisons: Nationalism, Southeast Asia, and the World* (London: Verso, 1998)

Anderson, Nick, ‘US students in middle of global pack’, *Washington Post*, 7 December 2010

Arlt, Wolfgang Georg, *China’s Outbound Tourism* (London: Routledge, 2006)

Arrighi, Giovanni, *Adam Smith in Beijing: Lineages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London: Verso, 2007)

Askouri, Ali, ‘China’ s Investment in Sudan: Displacing Villages and Destroying Communities’, in Firoze Manji and Stephen Marks, eds, *African Perspectives on China in Africa* (Oxford: Fahamu, 2007)

Bacevich, Andrew J., *Washington Rules: America’ s Path to Permanent War* (New York: Metropolitan Books, 2010)

Bairoch, Paul, De Jéricho à Mexico: Villes et économie dans l’ historie (Paris: Gallimard, 1985)

—— and Maurice Levy-Leboyer, eds, *Disparitie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since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New York: St Martin’ s Press, 1975)

Barthes, Roland, *Empire of Signs*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82)

Barysch, Katinka, with Charles Grant and Mark Leonard, *Embracing the Dragon: The EU’ s Partnership with China* (London: Centre for European Reform, 2005)

Batson, Andrew, ‘Sum of iPhone parts: trade distortion’, *Wall Street Journal*, 16 December 2010

Bayly, C. A., *The Birth of the Modern World 1780–1914: Global Connections and Comparisons* (Oxford: Blackwell, 2004)

Bayly, Christopher, and Tim Harper, *Forgotten Armies: The Fall of British Asia, 1941–1945*(London: Allen Lane, 2004)

Beattie, Alan, ‘A reach regained’, *Financial Times*, 22 April 2010

—— ‘IMF succession: A contested quarry’, *Financial Times*, 25 May 2011

Beedham, Brian, ‘Who Are We, Who Are They?’, survey, *The Economist*, 29 July 1999

Bell, Daniel A., *China’s New Confucianism: Politics and Everyday Life in a Changing Societ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 and Hahm Chaibong, eds, *Confucianism for the Modern Wor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Benedict, Ruth, *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 Patterns of Japanese Culture* (London: Secker and Warburg, 1947)

Beng, Phar Kim, and Vic Y. W. Li, ‘China’s Energy Dependence on the Middle East: Boon or Bane for Asian Security?’ *The China and Eurasia Forum Quarterly*, 3:3 (November 2005)

Bennhold, Katrin, ‘Mutual trust called crucial to US–China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13 September 2010

Bernstein, Richard, and Ross H. Munro, *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China*(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97)

Bickers, Robert, *The Scramble for China: Foreign Devils in the Qing Empire, 1832–1914*(London: Allen Lane, 2011)

Biers, Dan, *Crash of ’97*(Hong Kong: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1998)

Bin Wong, R., *China Transformed: Historical Change and the Limits of European Experience*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0)

Blackburn, Robin, ‘Enslavement and Industrialisation’, posted on www.bbc.co.uk/history

Blank, Stephen, ‘China, Kazakh Energy, and Russia: An Unlikely Ménage à Trois’, The China and Eurasia Forum Quarterly, 3:3 (November 2005)

Bokhari, Farhan, and Kathrin Hille, ‘Pakistan turns to China for naval base’, Financial Times, 22 May 2011

Bonnett, Alastair, *The Idea of the West: Culture, Politics and History*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4)

Bowring, Philip, ‘China and Its Minorities’,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3 March 2008

Bracken, Paul, *Fire in the East: The Rise of Asian Military Power and the Second Nuclear Age* (London: HarperCollins, 1999)

Bradsher, Keith, ‘Currency dispute hots up in China’,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26 March 2010

—— 'Coal abounds, but China veers to sun and wind, too',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3 July 2009

—— 'Chinese firms take commanding lead in production of renewable energy',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2 June 2010

—— 'China taking solar challenge to US turf',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26 August 2009

Branigan, Tania, '"If I see them, I run. That's how I live." Africans living on the edge in China', *Guardian*, 7 October 2010

Brautigam, Deborah, *The Dragon's Gift: The Real Story of China in Afric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Broad, William J., 'China plans to lead world in getting to bottom of sea',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13 September 2010

Brown, Kerry, *Struggling Giant: China in the 21st Century* (London:Anthem Press, 2007)

Brown, Kevin, Robert Cookson and Geoff Dyer, 'Malaysian boost for Beijing's renminbi hopes', *Financial Times*, 19 September 2010

Brown, Lester R., 'A New World Order', *Guardian*, 25 January 2006

Brown, Michael, et al., eds, *The Rise of China*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2000)

Bush, George W., 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 29 January 2002

Bush, Richard, ‘Taiwan Faces China: Attraction and Repulsion’, in David Shambaugh, ed., *Power Shift: China and Asia’s New Dynamic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

Callahan, William A., *Contingent States: Greater China and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4)

——*China: The Pessoptimist Nation*(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Carr, Edward, ‘Brushwood and gall’, A special report on China’s place in the world, *The Economist*, 4 December 2010

Castells, Manuel, *The Information Age: Economy, Society and Culture*: Vol. I,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1996; Vol. II, The Power of Identity, 1997; Vol. III, End of Millennium, 1998 (Oxford: Blackwell)

Cha, Victor D., ‘Engaging China: The View from Korea’, in Alastair Iain Johnston and Robert S. Ross, eds, *Engaging China: The Management of an Emerging Power* (London: Routledge, 1999)

Chan, Allen, ‘The Grand Illusion: The Long History of Multiculturalism in an Era of Invented Indigenisation’, unpublished paper for Swedish-NUS conference, ‘Asia-Europe and Global Processes’, Singapore, 14–16 March 2001

Chan, Kam Wing, ‘Measuring the urban millions’, *China Economic Quarterly*, March 2009, pp. 21–6

Chan, Minnie, and Ng Tze-wei, ‘Missiles will go one day, Taiwan told’,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24 September 2010

—— ‘Japan’s submarine plan raises arms race fear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22 October 2010

Chang, Gordon G., *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 (London: Arrow Books, 2002)

Chang, Iris, *The Rape of Nanking* (London: Penguin, 1998)

Chang, Jung, and Jon Halliday, *Mao: The Unknown Story* (London: Jonathan Cape, 2005)

Chang, K. C., *Food in Chinese Culture: Anthropological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7)

Chase-Dunn, Christopher, et al., ‘The Trajec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World System: A Quantitative Reflection’, IROWS Working Paper No. 8,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Chen Jian, *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 (Chapel Hill, NC: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1)

Chen Kuan-Hsing, ed., *Trajectories: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London: Routledge, 1998)

—— ed., 'Civil Society and Min-jian: On Political Society and Popular Democracy', *Cultural Studies*, 17:6 (2003)

—— 'Notes on Han Chinese Racism', unpublished paper, 2007 (revised version, 2009, available at www.inter-asia.org/khchen/online/Epilogue.pdf)

——*Asia as Method: Towards De-Imperialization* (Durham, NC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0)

Chen Jian, *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Chapel Hill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1)

Chen, Jie, and Bruce J. Dickson, *Allies of the State: China's Private Entrepreneurs and Democratic Change*(Cambridge, Massachusetts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Chen Xingdong, 'RMB convertibility and two-way floating', *Economics Inside China*, September 2010, BNP Paribas

Cheng Chin-Chuan, 'Chinese Varieties of English', in Braj B. Kachru, ed., *The Other Tongue: English Across Cultures* (Urbana a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2)

Cheng Youhua, et al., ‘Urban Planning in Shanghai towards the 21st Century’, *Dialogue* (Taipei), February/March 1999

Ching, Frank, ‘Diaoyu peace in our tim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3 November 2010

Ching, Leo, ‘Yellow Skin, White Mask: Race, Class and Identification in Japanese Cultural Discourse’, in Chen Kuan-Hsing, ed., *Trajectories: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London: Routledge, 1998)

Choi Chi-yuk and Ng Tze-wei, ‘Xinjiang to lift blackout in “gradual and orderly” way’,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30 December 2009

Chow, Kai-wing, ‘Imagining Boundaries of Blood: Zhang Binglin and the Invention of the Han “Race” in Modern China’, in Frank Dikötter, ed., *The Construction of Racial Identities in China and Japan: Historical and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 (London: Hurst and Company, 1997)

Chow, Vivienne, ‘Newly rich mainlanders push antique prices through the roof’,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5 March 2010

Christensen, Thomas J., ‘China, the US–Japan Alliance, and the Security Dilemma in East Asia’, in Michael Brown et al., eds, *The Rise of China*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2000)

——Alastair Iain Johnston and Robert S. Ross, ‘Conclusions and Future Directions’, in Alastair Iain Johnston and Robert S. Ross, eds,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China's Foreign Polic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 Robert Cookson and Geoff Dyer, ‘Yuan direction’, *Financial Times*, 14 December 2010

Chu Shulong, ‘US Security Strategy in Asia and the Regional Security Regime: A Chinese View’, paper for IIP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Tokyo, 30 November–1 December 2004

Chu Yun-ha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aiwan's Identity Crisis: Implications for Northeast Asia’, paper given at conference on ‘Nationalism and Globalisation in Northeast Asia’, Asia Research Centr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2007

Chua, Amy, *World on Fire: How Exporting Free Market Democracy Breeds Ethnic Hatred and Global Instability*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2003)

——*Battle Hymn of the Tiger Mother*(New York: The Penguin Press, 2011)

Chua, Beng-Huat, ‘Postcolonial Sites, Global Flows and Fashion Codes: A Case-study of Power *Cheongsams* and Other Clothing Styles in Modern Singapore’, *Postcolonial Studies*, 3:3 (2000)

—— ‘Conceptualising an East Asian Popular Culture’, *Inter-Asian Cultural Studies*, 5:2 (2004)

Chung, Erin, ‘Anti-Black Racism in China’, 12 April 2005, and ‘Nanjing Anti-African Protests of 1988–89’, posted on www.amren.com

Chung, Jae Ho, ‘China’s Ascendancy and the Korean Peninsula: From Interest Revaluation to Strategic Realignment?’, in David Shambaugh, ed., *Power Shift: China and Asia’s New Dynamic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

Clarke, J. J., *Oriental Enlightenment: The Encounter Between Asian and Western Thought* (London: Routledge, 1997)

Cohen, Paul A.,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4)

Cohen, Robin, *Global Diasporas: An Introduction* (London: UCL Press, 1997)

Confucius, *The Analects*, trans. Arthur Waley (Beijing: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1997)

Cooper, Robert, *The Breaking of Nations: Order and Chao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London: Atlantic Books, 2003)

—— ‘Civilise or Die’, *Guardian,* 23 October 2003

Copson, Raymond W., 'US response to China's Rise in Africa: Policy and Policy Options', in Marcel Kitissou, ed., *Africa in China's Global Strategy* (London: Adonis and Abbey, 2007)

Crystal, David, *English as a Global Langua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Cui Jia and Zhu Zhe, 'Xinjiang support package unveiled', *China Daily*, 21 May, 2010

Curtin, Michael, *Playing to the World's Biggest Audience: The Globalization of Chinese Film and TV*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

Curtis, Mark, and Claire Hickson, 'Arming and Alarming? Arms Exports, Peace and Security', in Leni Wild and David Mepham, eds, *The New Sinosphere* (London: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 2006)

Cwiertka, Katarzyna, 'Culinary Globalization and Japan', *Japan Echo*, 26:3 (June 1999)

Dabringhaus, Sabine, and Roderich Ptak, eds, *China and Her Neighbours:* Borders, Visions of the Other, Foreign Policy 10th to 19th Century(Wiesbaden: Harrassowitz, 1999)

Davies, Norman, *Europe: A Hist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Davis, David Brion, *Inhuman Bondage: The Rise and Fall of Slavery in the New Worl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Dean, Kenneth, ‘Despotic Empire/Nation-State: Local Responses to Chinese Nationalism in an Age of Global Capitalism’, in Chen Kuan-Hsing, ed., *Trajectories: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London: Routledge, 1998)

Dentsu Institute for Human Studies, *Life in the Era of Globalisation: Uncertain Germans and Japanese Versus Confident Americans and British, the Second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Global Values* (Tokyo: July 1998)

Desai, Meghnad, ‘India and China: An Essay in Comparative Political Economy’, seminar paper, Asia Research Centr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2003. Revised version available to download from www.imf.org.

Deutsch, Anthony, and Henry Sender, ‘Indonesia uneasy about links with China’, *Financial Times*, 30 April/1 May 2011

Devan, Janamitra, Stefano Negri, and Jonathan R. Woetzel, ‘Meeting the challenges of China’s growing cities’, *The McKinsey Quarterly*, 2008, Number 3, pp. 107–16

Diamond, Jared, *Guns, Germs and Steel: A Short History of Everybody for the Last 13,000 Years* (London: Vintage, 1998)

Dickie, Mure, ‘Japan to shift focus of defence to China’, *Financial Times*, 14 December 2010

Dikötter, Frank, *The Discourse of Race in Modern China* (London: Hurst and Company, 1992)

—— ed., *The Construction of Racial Identities in China and Japan:* Historical and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London: Hurst and Company, 1997)

—— Introduction to his*The Construction of Racial Identities in China and Japan*

—— ‘Racial Discourse in China: Continuities and Permutations’, in hisThe Construction of Racial Identities in China and Japan

——*Mao’s Great Famine: The History of China’s Most Devastating Catastrophe, 1958–62* (London: Bloomsbury, 2010)

Dillon, Sam, ‘Foreign Languages Fade in Class – Except Chinese’,*New York Times*, 20 January 2010

Dinmore, Guy, ‘Tuscan town turns against Chinese migrants’,*Financial Times*, 8 February 2010

Dittmer, Lowell, ‘Ghost of the Strategic Triangle: The Sino-Russian Partnership’, in Zhao Suisheng, ed., *Chinese Foreign Policy: Pragmatism and Strategic Behavior* (New York: M. E. Sharpe, 2004)

Dombey, Daniel, and Gideon Rachman, ‘US and the world: Mapped out’,*Financial Times*, 2 June 2010

Dore, R.,*The End of Jobs for Life? Corporate Employment Systems:* Japan and Elsewhere(London: Centre for Economic Performance, 1996)

Dower, John W., *Embracing Defeat: Japan in the Wake of World War II* (New York: Norton, 2000)

Downs, Erica Strecker, and Phillip C. Sanders, ‘Legitimacy and the Limits of Nationalism: China and the Diaoyu Islands’, in Michael Brown et al., eds, *The Rise of China*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2000)

Dreyer, Edward L., *Zheng He: China and the Oceans in the Early Ming Dynasty, 1405–1433*(New York: Pearson Longman, 2007)

Drifte, Reinhard, ‘Japanese–Chinese Territorial Disputes in the East China Sea – Between Military Confrontation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 unpublished working paper, available to download from http://eprints.lse.ac.uk

——*Japan's Foreign Policy for the 21st Century* (Basingstoke: Macmillan, 1998)

——*Japan's Security Relations with China since 1989: From Balancing to Band-wagoning* (London: RoutledgeCurzon, 2003)

Duara, Prasenjit, *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The Global and Regional in China's Nation-Formation* (Oxford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 ‘Visions of History, Trajectories of Power: China and India since Decolonisation’, in Anthony Reid and Zheng Yangwen, eds, *Negotiating Asymmetry: China’s Place in Asia* (Singapore: NUS Press, 2009)

Dunlop, Fuchsia, ‘Enthused by China’s Tea Infusions’, *Financial Times,* 11–12 September 2004

Dyer, Geoff, ‘The Great Brawl of China’, *Financial Times*, 11 July 2008

—— ‘How China is Rising Through the Innovation Ranks’, *Financial Times*, 5 January 2007

—— ‘Russia Could Push China Closer to the West’, *Financial Times*, 27 August 2008

—— ‘Russia Fails to Secure Regional Backing’, *Financial Times*, 28 August 2008

—— ‘Beijing bronzes expose faultline with west’, *Financial Times*, 6 March 2009

—— ‘Consequences of stronger RMB dawn on US’, *Financial Times*, 23 February 2010

—— ‘China: A populist rising’, *Financial Times*, 9 March 2010

—— ‘China’s policy: Anxious to shed colonial image and foster a new cycle of trade’, *Financial Times*, 14 June 2010

—— 'Wen calls bluff of moaning multinationals', *Financial Times*, 20 July 2010

—— 'China: A new core rises', *Financial Times*, 3 August 2010

—— 'Power play in the South China Sea', *Financial Times*, 9 August 2010

—— 'Beijing's elevated aspirations', *Financial Times*, 10 November 2010

—— 'Beijing and troubled nations: Signals of a shift', *Financial Times*, 20 January 2011

—— and Jamil Anderlini, 'Distant Thunder: Separatism Stirs on China's Forgotten Frontier', *Financial Times*, 17 August 2008

—— Jamil Anderlini and Henry Sender, 'China's lending hits new heights', *Financial Times*, 17 January 2011

—— Ralph Jennings, 'China snubs Nobel with rival peace prize', *Financial Times*, 8 December 2010

—— Richard McGregor, 'China's Champions: Why State Ownership is No Longer Proving a Dead Hand', *Financial Times*, 16 March 2008

—— and David Pilling and Henry Sender, 'A strategy to straddle the planet', *Financial Times*, 17 January 2011

Economy, Elizabeth C.,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Washington, DC, 3 July 2002

——*The River Runs Black: The Environmental Challenge to China's Futur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4)

Edgecliff-Johnson, Andrew, et al., 'Wen and Putin lecture western leaders', *Financial Times*, 29 January 2009

Eichengreen, Barry, *Exorbitant Privilege: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Dollar and the Future of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Elvin, Mark, *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 (London: Eyre Methuen, 1973)

—— 'Secular Karma: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 Understood in Tradi-

tional Chinese Terms', in Mabel Lee and A. D. Syrokomia-Stefanowski, eds, *Modernisation of the Chinese Past* (Sydney: University of Sydney, School of Asian Studies, 1993)

——*The Retreat of the Elephants: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China*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4)

—— 'The Historian as Haruspex', *New Left Review*, 52, July–August 2008

Emmott, Bill, 'The Sun Also Rises', survey, *The Economist*, 8 October 2005

——*Rivals: How the Power Struggle Between China, India and Japan Will* Shape Our Next Decade(London: Allen Lane, 2008)

European Commission, ‘The Challenge to the EU of a Rising China’, in*European Competitiveness Report* (Luxembourg: 2004)

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and Asia Centre à SciencesPo, ‘Climate Policies After Copenhagen’,*China Analysis*, 27

Fairbank, John King, ed.,*The Chinese World Order: 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 and Merle Goldman,*China: A New History* (Cambridge, Mass.: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Featherstone, Mike, ed.,*Global Culture: Nationalism, Globalization and Modernity* (London: Sage, 1990)

Fenby, Jonathan,*The Penguin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The Fall and Rise of a Great Power, 1850–2008*(London: Allen Lane, 2008)

Ferguson, Niall,*Colossu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American Empire* (London: Allen Lane, 2004)

——*Empire: How Britain Made the Modern World* (London: Penguin, 2004)

—— 'Empire Falls', October 2006, posted on www.vanityfair.com

——*Civilization: The West and the Rest*(London: Allen Lane, 2011)

Fernandez-Armesto, Felipe,*Millennium: A History of Our Last Thousand Years* (London: Bantam Press, 1995)

Fifield, Anna, 'G7 meets amid doubts over relevance',*Financial Times*, 6–7 February 2010

Firth, Niall, '3D Express Coach: The Chinese bus that solves traffic jams by letting you drive UNDERNEATH it',*Daily Mail*, 7 August 2010

Fishman, Ted C.,*China, Inc.: The Relentless Rise of the Next Great Superpower* (London: Pocket Books, 2005)

Fitzgerald, John,*Awakening China: Politics, Culture, and Class in 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Frank, Andre Gunder,*ReOrient: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French, Howard W., 'Is the US Plunging into "Historical Error"?',*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1 June 2006

—— 'For Old Rivals, a Chance at a Grand New Bargain',*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9 February 2007

—— 'Chinese See a Continent Rich with Possibilities',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15 June 2007

—— 'Side by Side in China, While Still Worlds Apart',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20 March 2008

—— 'Again, Beijing Cues Up its Propaganda Machine',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4 April 2008

—— 'China Luring Scholars to Make Universities Great', *New York Times*, 28 October 2008

—— and Lydia Polgreen, 'China Brings Its Deep Pockets to Africa',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13 August 2007

Friedman, Thomas L., *The Lexus and the Olive Tree: Understanding Globalization*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1999)

—— 'Democrats and China',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11–12 November 2006

—— 'China's Sunshine Boys',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7 December 2006

——*The World is Flat: A Brief History of the Globalized World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London: Allen Lane, 2005)

—— and Michael Mandelbaum, *That Used to be US: What Went Wrong with America? And How it Can Come Back* (London: Little, Brown, 2011)

Fukuyama, Francis, ‘The End of History?’, *National Interest*, 16, Summer 1989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London: Hamish Hamilton, 1992)

——*Trust: The Social Virtues and the Creation of Prosperity* (London:Hamish Hamilton, 1995)

—— ‘US democracy has little to teach China’, *Financial Times*, 17 January 2011

Funabashi, Yoichi, Interview with Wang Jisi, *The Asahi Shimbun*, 12 June 2010

—— ‘Tokyo has no option but to cleave to China’, *Financial Times*, 17 May 2011

Gall, Susan, and Irene Natividad, eds, *The Asian American Almanac: A Reference Work on Asians in the United States* (Detroit: Gale Research, 1995)

Gardner, Howard, *To Open Mind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9)

Garrett, Valery M., *Traditional Chinese Clothing in Hong Kong and South China, 1840–1980*(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Chinese Clothing: An Illustrated Guid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Garrison, Jim, *America as Empire: Global Leader or Rogue Power?* (San Francisco: Berrett-Koehler Publishers, 2004)

Garver, John W., *Protracted Contest: Sino-Indian Rivalr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1)

—— 'China's Influence in Central and South Asia: Is It Increasing?', in David Shambaugh, ed., *Power Shift: China and Asia's New Dynamic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

——*China and Iran: Ancient Partners in a Post-Imperial World*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6)

Gaulier, Guillaume, Françoise Lemoine and Deniz Ünal-Kesenci, 'China's Integration in East Asia: Production Sharing, FDI and High-Tech Trade', *CEPII Working Paper No. 2005–09* Gernet, Jacques, *Daily Life in China on the Eve of the Mongol Invasion, 1250–76*(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A History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2nd ed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Gerth, Karl, *China Made: Consumer Culture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Natio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Giddens, Anthony,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Gilboy, George J., ‘The Myth behind China’s Miracle’, *Foreign Affairs*, July–August 2004

Gill, Bates, ‘China’s Evolving Regional Security Strategy’, in David Shambaugh, ed., *Power Shift: China and Asia’s New Dynamic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

Gilley, Bruce, *China’s Democratic Future: How It Will Happen and Where It Will Lea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4)

Gittings, John, *The World and China, 1922–1972* (London: Eyre Methuen, 1974)

——*The Changing Face of Chin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Godwin, Peter H. B., ‘Force and Diplomacy: China Prepares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n Samuel S. Kim, ed., *China and the World: Chinese Foreign Policy Faces the New Millennium,* 4th edn (Oxford: Westview Press, 1998)

Gooch, Liz, ‘Researchers in Asian countries raise their scientific profile worldwide’,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13 September 2010

Goodman, David S. G., and Gerald Segal, *China Rising: Nationalism and Interdependence* (London: Routledge, 1997)

Goody, Jack, *The East in the Wes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Gough, Neil, 'US rollout of BYD's all-electric car delayed',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24 August 2010

Gowan, Richard, and Franziska Branter, *The EU and Human Rights at the UN: 2010 Review*, 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2010

Graddol, David, *The Future of English* (London: British Council, 1997)

——*English Next India*, British Council, 2010

Gramsci, Antonio,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1971)

Grant, Charles, 'India's Role in the New World Order', Centre for European Reform Briefing Not (September 2008)

—— 'Is China being beastly to foreign investors?', Centre for European Reform, 30 July 2010

—— and Katinka Barysch, *Can Europe and China Shape a New World Order?* (London: Centre for European Reform, 2008)

Gray, John, *False Dawn: The Delusions of Global Capitalism* (London: Granta Books, 1998)

—— '(Re-)ordering the World: Dilemmas of Liberal Imperialism', *RSA Journal*, 2:6 (2002)

Gries, Peter Hays, *China's New Nationalism: Pride, Politics, and Diplomac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 and Stanley Rosen, eds, *State and Society in 21st-Century China* (London: RoutledgeCurzon, 2004)

Guttenplan, D. D., and Sam Dillon, 'West picks through the rubble as Chinese shine in student test', *New York Times*, 8 December 2010

Hall, Stuart, 'A Different Light', lecture to Prince Claus Fund Conference, Rotterdam, 12 December 2001

Halper, Stefan, *The Beijing Consensus: How China's Authoritarian Model will Dominate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0)

Hampden-Turner, Charles, and Fons Trompenaars, *Mastering the Infinite Game: How East Asian Values are Transforming Business Practices* (Oxford: Capstone, 1997)

Harootunian, Harry, *The Empire's New Clothes: Paradigm Lost, and Regained* (Chicago: Prickly Paradigm Press, 2004)

Harrell, Stevan, ed., *Cultural Encounters on China's Ethnic Frontiers*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5)

Hawksworth, John, and Gordon Cookson, 'The World in 2050 – Beyond the BRICs: A Broader Look at Emerging Market Growth Prospects', March 2008, posted on www.pwc.com, p. 3

Hayashi, Yuha, and Julian E. Barnes, ‘Gates Leaves Beijing, Will Press Japan to Expand Its Defense Role’, *Wall Street Journal*, 13 January 2011

He Huifeng, ‘Illegal Vietnamese workers flood delta factorie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23 April 2010

Heisbourg, François, ‘Europe Must Be Realistic About Life After Bush’, *Financial Times*, 6 February 2008

Held, David, *Democracy and the Global Order: From the Modern State to Cosmopolitan Governanc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5)

Hendry, Joy, ed., *Interpreting Japanese Society: Anthropological Approaches* (London: Routledge, 1986)

Higashinakano Shudo, *The Nanking Massacre: Facts Versus Fiction, A Historian's Quest for the Truth* (Tokyo: Sekai Shuppan, Inc., 2005)

Higgins, Charlotte, *It's All Greek to Me* (London: Short Books, 2008)

Hille, Kathrin, ‘Chinese pay rises encourage move to cheaper provinces’, *Financial Times*, 26–27 June 2010

—— ‘China acts to tackle Uighur tension’, and ‘Development unlikely to drown out disharmony’, *Financial Times*, 3–4 July 2010

—— 'Carriers back China's global reach', *Financial Times*, 17 December 2010

—— 'China reveals aircraft carrier plans', *Financial Times*, 17 December 2010

—— 'China missile may cause power shift', *Financial Times*, 28 December 2010

—— 'China faces pressure to alter one-child policy', *Financial Times*, 28 April 2011

—— 'Maoist revival gathers pace in Chongqing', *Financial Times*, 24 May 2011

—— and Jamil Anderlini, 'China: Mao and the next generation', *Financial Times*, 2 June 2011

—— and Richard McGregor, 'Trouble at the margin', *Financial Times*, 10 July 2009

—— and Tom Mitchell, 'News Corp sells control of its China TV channels', *Financial Times*, 9 August 2010

Hilsum, Lindsey, 'China, Africa and the G8 – or Why Bob Geldof Needs to Wake Up', in Leni Wild and David Mepham, eds, *The New Sinosphere* (London: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 2006)

Ho, P. Y., and F. P. Lisowski, *A Brief 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 and Its Influence*(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1998

Hobsbawn, Eric, *The Age of Empire 1875–1914*(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87)

——*Age of Extremes: The Short Twentieth Century 1914–1991*(London: Michael Joseph, 1994)

—— 'America's Neo-conservative World Supremacists Will Fail', *Guardian*, 25 June 2005

——*Globalisation, Democracy, and Terrorism* (London: Little, Brown, 2007)

Hobson, John M., *The Eastern Origins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Hodge, Nathan, and Julian E. Barnes, 'Pentagon Faces the Knife', *Wall Street Journal*, 7 January 2011

Hook, Leslie, 'Repsol and Sinopec join forces in Brazil', *Financial Times*, 1 October 2010

Hope, Kerin, and Jamil Anderlini, 'Athens turns to Beijing for bond sale', *Financial Times*, 27 January 2010

—— 'China prepares to invest in Greek projects', *Financial Times*, 14 June 2010

Hoslag, Jonathan, 'China builds a bridge across the Danube', *Financial Times*, 27 June 2010

Howell, Jude, ed., *Governance in China* (Oxford: Roman and Littlefield, 2004)

Hu Angang, 'Five Major Scale Effects of China's Rise', unpublished seminar paper, East Asia Institut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2005

—— 'Green Development: The Inevitable Choice for China, Parts One and Two', posted on www.chinadialogue.net

Hu Jintao, Interview, *Washington Post*, 17 January 2011

Huang, Cary, 'Najib calls for expanded yuan rol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5 June 2009

—— 'Leadership wakes to grey storm of ageing population',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2 November 2009

—— 'Najib calls for expanded yuan rol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5 June 2010

Huang Ping, '"Beijing Consensus", or "Chinese Experiences", or What?', English-language unpublished paper, 2005

—— and Cui Zhiyuan, eds,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Washington Consensus', 'Beijing Consensus', or What?* (Chinese-language edition)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2006)

Huang, Yasheng, *Capit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ntrepreneurship and the Stat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Hufbauer, Gary Clyde, and Yee Wong, ‘Prospects for Regional Free Trade in Asia’, working paper,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Washington, DC, October 2005

Hughes, Christopher R., *Chinese Nationalism in the Global Era* (London:Routledge, 2006)

—— and Gudrun Wacker, eds, *China and the Internet: Politics of the Digital Leap Forward* (London: Routledge, 2003)

Huntington, Samuel P.,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96)

——*Who Are We? America’s Great Debate* (London: The Free Press, 2005)

Hutton, Will, *The Writing on the Wall: China and the West in the 21st Century* (London: Little, Brown, 2007)

Hyde, Henry, ‘The Perils of the “Golden Theory”’, *Strait Times*, 21 February 2006

Ignatieff, Michael, *Empire Lite: Nation-Building in Bosnia, Kosovo and Afghanistan* (London: Vintage, 2003)

Ignatius, David, ‘Ike was right: Cut defense’, *Washington Post*, 26 January 2011

Ikenberry, G. John, *Liberal Order and Imperial Ambition: Essays on American Power and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Polity, 2006)

—— '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Future of the West: Can the Liberal System Survive?', *Foreign Affairs,* January-February 2008

—— 'China and the Rest Are Only Joining the American-Built Order', *New Perspectives Quarterly*, Volume 25, No 3, Summer 2008

Inoguchi, Takashi, 'Nationalism, Globalisation and Regional Order in North-East Asia: The Case of Japan at the Dawn of the Century', paper presented at conference on 'Nationalism and Globalisation in NorthEast Asia', Asia Research Centr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12 May 2007

Itoh, Fumio, ed., *China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Politics, Economy, and Society* (Tokyo: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Press, 1997)

Jacques, Martin, 'Global Hierarchy of Race', *Guardian*, 20 September 2003

—— 'Democracy Isn't Working', *Guardian*, 22 June 2004

—— 'Strength in Numbers', *Guardian*, 23 October 2004

—— 'No Monopoly on Modernity', *Guardian*, 5 February 2005

—— 'The Neo-con Revolution', *Guardian*, 31 March 2005

—— 'The Middle Kingdom Mentality', *Guardian*, 16 April 2005

—— 'Where Is Japan?', seminar paper presented at Faculty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s, Aichi University, 27 July 2005

—— 'Imperial Overreach is Accelerating the Global Decline of America', *Guardian*, 28 March 2006

—— 'The Age of America or the Rise of the East: The Story of the 21st Century', *Aichi Universit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27 (March 2006)

—— 'The Death of Doha Signals the Demise of Globalisation', *Guardian,* 13 July 2006

—— 'America Faces a Future of Managing Imperial Decline', *Guardian,* 16 November 2006

—— 'The Citadels of the Global Economy are Yielding to China's Battering Ram', *Guardian*, 23 April 2008

—— 'It seemed impossible . . .', *Observer*, 4 April 2011 Jenner, W. J. F., 'Race and History in China', *New Left Review,* 11 (September–October 2001)

Jin, Yi Kai, 'Big and Beautiful, the New Shanghai City', *Dialogue* (Taipei), February–March 1999 Johnson, Chalmers, *Japan: Who Governs? The Rise of the Developmental State* (New York: W. W. Norton, 1995)

——*Blowback: The Costs and Consequences of American Empire* (London: Time Warner, 2000)

——*The Sorrows of Empire: Militarism, Secrecy and the End of the Republic* (London: Verso, 2004)

—— 'Why the US Has Really Gone Broke', *Le Monde diplomatique*, February 2008 Johnson, M. Dujon, *Race and Racism in the Chinas*(Milton Keynes: Author House, 2007)

Johnson, Steven C., 'Dollar's Decline Presents a Challenge to US Power',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28–29 April 2007

Johnson, Tim, and Julie Sell, 'Getting relics hom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5 March 2009

Johnston, Alastair Iain, *Cultural Realism: Strategic Culture and Grand Strategy in Chinese Histo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 and Robert S. Ross, eds, *Engaging China: The Management of an Emerging Power* (London: Routledge, 1999)

—— eds,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China's Foreign Polic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Jomo K. S., ed., *Tigers in Trouble: Financial Governance, Liberalisation and Crises in East Asia* (London: Zed Books, 1998)

Jones, Eric L., *The European Miracle: Environments, Economics, and Geopolitics in the History of Europe and As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Jones, Gavin W., 'Not "When to Marry" but "Whether to Marry": The Changing Context of Marriage Decisions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in Gavin Jones and Kamalini Ramdas, eds, *Untying the Knot: Ideal and Reality in Asian Marriage* (Singapore: NUS Press, 2004)

Kachru, Braj B., ed., *The Other Tongue: English Across Cultures* (Urbana a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2)

——*Asian Englishes: Beyond the Canon*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5)

Kagan, Robert, *Paradise and Power: America and Europe in the New World Order* (London: Atlantic Books, 2003)

——*Dangerous Nation: America and the World 1600–1898*(London:Atlantic Books, 2006)

—— 'The Case for a League of Democracies', *Financial Times,* 13 May 2008

Kahn, Joseph, and Jim Yardley, 'As China Roars, Pollution Reaches Deadly Extremes', *New York Times*, 26 August 2007

Kang, David C., 'Getting Asia Wrong: The Need for New Analytical Framework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7:4 (Spring 2003)

——*China Rising: Peace, Power, and Order in East Asia*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7)

Kaplan, Robert D., *Monsoon*(New York: Random House, 2010)

Kaplinsky, Raphael, *Globalization, Poverty and Inequality* (Cambridge:Polity, 2005)

—— 'Winners and Losers: China's Trade Threats and Opportunities for Africa', in Leni Wild and David Mepham, eds, *The New Sinosphere* (London: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 2006)

Kapur, Akash, 'Upholding a tradition of tolerance',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12 February 2010

Karumbidza, John Blessing, 'Win-Win Economic Co-operation: Can China Save Zimbabwe's Economy?', in Firoze Manji and Stephen Marks, eds, *African Perspectives on China in Africa* (Oxford: Fahamu, 2007)

Katz, Richard, *Japan, the System that Soured: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Japanese Economic Miracle* (New York: M. E. Sharpe, 1998)

Katzenstein, Peter J., and Takashi Shiraishi, *Network Power: Japan and Asia*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

Kazmin, Amy, 'India: designers create a world of colour with a royal touch', *Financial Times*, 31 August 2010

Kennedy, Paul,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London: Fontana Press, 1988)

——*Preparing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London: HarperCollins, 1993)

—— ‘Who’ s Hiding Under Our Umbrella?’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31 January 2008

Khanna, Parag,*The Second World: Empires and Influence in the New Global Order* (London: Allen Lane, 2008)

Kim, Hee-sun, ‘Kayagu˘m Shin’ Gok, New Music for Antiquity: Musical Construction of Identity in Contemporary South Korea’ , unpublished paper, 2005

Kim, Samuel S., ed.,*China and the World: Chinese Foreign Policy Faces the New Millennium,* 4th edn (Oxford: Westview Press, 1998)

Kim, Shee Poon, ‘East Asian New Regionalism: Toward Economic Integration?’ ,*Ritsumeikan International Affairs*, 5 (2003)

——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Mahathir’ s China Policy: Economic Cooperation, Political and Strategic Ambivalence’ ,*Annual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3 (2004)

Kissinger, Henry,*On China* (London: Allen Lane, 2011)Kitissou, Marcel, ed.,*Africa in China’ s Global Strategy* (London: Adonis and Abbey, 2007)

Klein, Naomi, ‘Police State 2.0’ ,*Guardian*, 3 June 2008 Kohut, Andrew, ‘Friend or Foe? How Americans see

China', *Wall Street Journal*, 13 January 2011

Kotkin, Joel, *Tribes: How Race, Religion, and Identity Determine Success in the New Global Economy*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2)

Krauthammer, Charles, 'A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for a Unipolar World', Irving Kristol Lecture,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Dinner, 10 February 2004

—— 'Decline is a Choice: the New Liberalism and the end of American ascendancy', *The Weekly Standard*, Volume 015, Issue 05, 19 October 2009

Kristof, Nicholas D., 'Glory is as Ephemeral as Smoke and Clouds',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23 May 2005

—— 'The Educated Giant',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29 May 2007

Krugman, Paul, *The Return of Depression Economics* (London: Allen Lane, 1999)

Kuhn, Philip A., *Origins of the Modern Chinese Stat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Kumar, Vikas, 'Why is SAARC Perennially Gridlocked and How can it be Revitalized?', *Clingendael Asia Forum*, 16 December 2010

Kurlantzick, Joshua, *Charm Offensive: How China's Soft Power is Transforming the World*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7)

Kwok, Kristine, ‘Thousands protest over Urumqi syringe attack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4 September 2009

Kwong, Peter, *The New Chinatown*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87)

Kwong, Robin, ‘China and Taiwan sign landmark deal’, *Financial Times*, 29 June 2010

—— ‘Taiwan begins trade talks with Singapore’, *Financial Times*, 5 August 2010

—— ‘Taiwan to open tech industry to Chinese investment’, *Financial Times*, 27 February 2011

Kynge, James, *China Shakes the World: The Rise of a Hungry Nation*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2006)

—— ‘China’s “locally global” financial reforms’, *Financial Times*, 27 November 2009

—— Geoff Dyer and James Blitz, ‘Bear gifts for friends’, *Financial Times*, 15–16 January 2011

—— Richard McGregor, Daniel Dombey, Martin Arnold, Helen Warrell, and Cynthia O’Murchu, ‘The China Syndrome’, *Financial Times*, 3 March 2011

Lafraniere, Sharon, and Martin Fackler, ‘North Korea fires only words after South’s drill’,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20 December 2010

Lal, Deepak,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98)Lam, Willy, 'China Flexes Its New Muscle',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21 December 2007

Lamont, James, and Farhan Bokhari, 'China signs $35bn in deals with Pakistan', *Financial Times*, 19 December 2010

—— and Geoff Dyer, 'China eyes industrial bases in Africa', *Financial Times*, 3 December 2009

—— and Geoff Dyer, 'Wen's trip to India stirs old squabbles', *Financial Times*, 14 December 2010

—— and James Fontanella-Khan, 'India: Writing is on the wall', *Financial Times*, 21 March 2011

—— 'Turning deaf ear to Mandarin no longer wise', *Financial Times*, 3 October 2010

—— and Amy Kazmin, 'Fear of influence', *Financial Times*, 13 July 2009 Lampton, David M., *Same Bed, Different Dreams: Managing US–China*

Relations, 1989–200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1)

—— 'China's Rise in Asia Need Not Be at America's Expense', in David

Shambaugh, ed., *Power Shift: China and Asia's New Dynamic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

—— 'What Growing Chinese Power Means for America', hearing before the US Senate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 East Asian and Pacific Affairs Subcommittee, 7 June 2005

——*The Three Faces of Chinese Power: Might, Money, and Mind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8)

Lan, Yuk-yuen, *The Practice of Chineseness*(Hong Kong: CyDot, 1999)

Landes, David, *The Wealth and Poverty of Nations* (London: Little, Brown, 1998)

Lankov, Andrei, 'The Yeonpyeong Island Incident: why it happened, why nothing can be done, and what to expect: some thoughts', North Korean Economy Watch, http://www.nkeconwatch.com/2010/11/29/lankov-onthe-shelling-of-yonpyong/

Large, Daniel, 'As the Beginning Ends: China's Return to Africa', in Firoze Manji and Stephen Marks, eds, *African Perspectives on China in Africa* (Oxford: Fahamu, 2007)

Larmer, Brook 'The Center of the World', *Foreign Policy* (September–October 2005)

Lau, D. C., trans., *Mencius* (London: Penguin, 1970)

Leahy, Joe, ‘Brazil and China trade tensions set to rise’, *Financial Times*, 30 January 2011

—— ‘Drawn into an ever closer embrace’, *Financial Times*, 20 May 2011

—— ‘Financial flows: Commodities are central to defining the relationship’

Financial Times, 20 May 2011

Lee, Chunli, ‘Strategic Alliances of Chinese, Japanese and US firms in the Chines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The Impact of “China Prices” and Integrated Localisation’, unpublished paper presented to the Fairbank Center for East Asia Research, Harvard University, October 2004

—— ‘Trends of Open Product Architecture and Internationalisation of Private Companies in the Chinese Automobile Industry’, *Aichi University Economic Review*, 169 (2005)

—— ‘China Targets Detroit’, *World Business*, April 2006

—— ‘Product Development by Chinese Automakers: The Dilemma of

Imitation and Innovation’, unpublished working paper for International Vehicle Program, MIT, July 2007

—— Jin Chen and Takahiro Fujimoto, ‘Chinese Automobile Industry and Product Architectures’, unpublished paper

Lee, Mabel, and A. D. Syrokomia-Stefanowski, eds, *Modernisation of the Chinese Past* (Sydney: University of Sydney, School of Asian Studies, 1993)

Leonard, Mark, *Why Europe Will Ru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London:Fourth Estate, 2005)

——*What Does China Think?* (London: Fourth Estate, 2008)

Leong, Evan, ‘Are You Chinese?’, paper for Chinese American Youth Program, Roots Conference, San Francisco, 1998

Levin, Dan, ‘In China, love of old is something new’,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5 February 2010

—— ‘Shanghai looks to glorious past’,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4 May 2010

Levine, Steven I., ‘Sino-American Relations: Practicing Damage Control’, in Samuel S. Kim, ed., *China and the World: Chinese Foreign Policy Faces the New Millennium*, 4th edn (Oxford: Westview Press, 1998)

Li, Cao, ‘Busting the Bribe Tribe’, *China Daily*, 20 August 2009

Li, Rex, ‘Security Challenge of an Ascendant China: Great Power Emergence and International Stability’, in Zhao Suisheng, ed., *Chinese Foreign Policy: Pragmatism and Strategic Behavior* (New York: M. E. Sharpe, 2004)

Lieberthal, Kenneth, ‘Why the US Malaise Over China?’, YaleGlobal Online, 19 January 2006

Lieven, Anatol, *America Right or Wrong: An Anatomy of American Nation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Lim, Louisa, ‘Mixed-Race TV Contestant Ignites Debate in China’, 11 December 2009, www.npr.org/templates/story.php?storyId=120311417Little, Ian, *Picking Winners: The East Asian Experience* (London: Social Market Foundation, 1996)

Lo, Bobo, ‘Russia, China and the Georgia Dimension’, *Centre for European Reform Bulletin* 62 (October–November 2008)

Lo, Chih-cheng, ‘An Inconvenient Truth: The Rise of Taiwanese Identity and Its Impacts’, paper given at conference on ‘Nationalism and Globalisation in North-East Asia’, Asia Research Centr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12 May 2007

Lo, Fu-chen, and Yue-man Yeung, eds, *Emerging World Cities in Pacific Asia*(Tokyo: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1996)

Long, Simon, ‘India and China: The Tiger in Front’, survey, *The Economist*, 5 March 2005

Loper, Kelley, ‘Cultivating a Multicultural Society and Combating Racial Discrimination in Hong Kong’, *Civic Exchange*, August 2001

Lovell, Julia, *The Great Wall: China Against the World 1000* BC - AD *2000*(London: Atlantic Books, 2006)

——*The Opium War: Drugs, Dreams and the Making of China* (London:Picador, 2011)

Lu Xun, *The True Story of Ah Q*, trans. Yang Xianyi and Gladys Yang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02)

Luttwak, Edward, *Turbo-Capitalism: Winners and Losers in the Global Economy*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98)

McCann Erickson, *Pulse(r) Bites: Consumer Insights Around the World*, 2 (Beijing: 1 April 1999)

McCormack, Gavin, 'The US - Japan Security Treaty at 50: Entering Uncharted Waters', 24 June 2010, Clingendael Asia Studies and Clingendael Asia Forum

Macfarlane, Alan, *The Origins of English Individualism* (Oxford: Blackwell, 1979)

——*Japan 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 (London: Profile Books, 2007

McGreal, Ian P., *Great Thinkers of the Eastern World* (London: HarperCollins, 1995)

McGregor, Richard, 'Chinese steel executive beaten to death', *Financial Times*, 26 July 2009

——*The Party: The Secret World of China's Communist Rulers*(London:Allen Lane, 2010)

Mackenzie, Michael, and Gillian Tett, 'Moody's warns US over credit rating fears',*Financial Times*, 3 February 2010

Mackerras, Colin, 'What is China? Who is Chinese? Han–Minority Relations, Legitimacy, and the State', in Peter Hays Gries and Stanley Rosen, eds,*State and Society in 21st-Century China* (London: Routledge Curzon, 2004)

McNeill, William H.,*The Rise of the West: A History of the Human Community* (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

McRae, Hamish,*The World in 2020: Power, Culture and Prosperity: A Vision of the Future* (London: HarperCollins, 1994)

Maddison, Angus,*The World Economy: Historical Statistics* (Paris: OECD, 2003)

——*The World Economy: A Millennial Perspective* (Paris: OECD, 2006)

——*Chinese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the Long Run, Second Edition, Revised and Updated: 960–2030* AD (Paris: OECD, 2007)

Mahbubani, Kishore,*The New Asian Hemisphere: The Irresistible Shift of Global Power to the East*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8)

Mallet, Victor, ‘China’s Spanish debt buys put ata6bn’, *Financial Times*, 6 January 2011

Mance, Henry, ‘Why are Chinese schoolkids so good?’ http://blogs.ft.com/beyond-brics/2010/12/07/why-are-chinese-schoolkids-so-good/

Mandelbaum, Michael, *The Frugal Power: America’s Global Leadership in a Cash-Strapped Era*(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10)

Manji, Firoze, and Stephen Marks, eds, *African Perspectives on China in Africa* (Oxford: Fahamu, 2007)

Mann, James, *The China Fantasy: How Our Leaders Explain Away Chinese Repression* (New York: Viking, 2007)

Mapstone, Naomi, ‘Cash flow into Peru mine brings rights fear’, *Financial Times*, 19 January 2011

Markoff, John, ‘China seeks supercomputing edge’,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1 June 2010

Marsh, Peter, ‘China noses ahead as top goods producer’, *Financial Times*, 13 March 2011

—— ‘Focus on deals high up value chain’, *Financial Times*, 25 April 2011 Martinez, D. P., *The Worlds of Japanese Popular Cul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Mearsheimer, John J.,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W.W. Norton, 2001)

Menkes, Suzy, ‘Hitting the High Cs: Cool, Cute and Creative’,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21 March 2006

—— ‘Whose Sari Now?’,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17 May 2008

Menzies, Gavin, *1421: The Year China Discovered the World* (London: Bantam Books, 2003)

Miller, Tom, ‘Big cities, small cities’, *China Economic Quarterly*, March 2009, pp. 27–31

Minxin Pei, ‘How One Political Insider is Using His Influence to Push Rural Reform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2 January 2003

Mire, Amina, ‘Giving You a Radiant White Skin “Because You Are Worth It”: The Emerging Discourse and Practice of Skin-whitening’, unpublished abstract for Ph.D., University of Toronto, 2004

—— ‘Pigmentation and Empire: The Emerging Skin-Whitening Industry’, *A CounterPunch Special Report* (2005), posted on www.counterpunch.orgMishra, Pankaj, *An End of Suffering: The Buddha in the World* (London:Picador, 2004)

—— ‘Getting Rich’, *London Review of Books*, 30 November 2006

Mitchell, Tom, and Geoff Dyer, ‘Heat in the Workshop’, *Financial Times*, 14 October 2007

Mochizuki, Mike M., ‘China–Japan Relations: Downward Spiral or a New Equilibrium?’, in David Shambaugh, ed., *Power Shift: China and Asia's New Dynamic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

Monro, Alexander, and Dana Denis-Smith, ‘China taps into the heart of Turkmenistan's gas fields’, *Financial Times*, 17 December 2009

Montes, Manuel F., and Vladimir V. Popov, *The Asian Crisis Turns Global*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99)

Moon, Chung-in, and Seung-won Suh, ‘Overcoming History: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and Nationalism’, *Global Asia*, 2:1 (2007)

Moran, Robert, ‘The Beltway Ponders America's Global Influence’, *National Journal.com*, 9 February 2010

Morishima, Michio, *Why Has Japan ‘Succeeded’?: Western Technology and the Japanese Etho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Morris, Ian, *Why the West Rules For Now: The Patterns of History and What They Reveal About the Future*(London: Profile Books, 2010

Müllerson, Rein, 'Crouching tiger hidden dragon: Which will it be?', *Eurozine*, http://www.eurozine.com/articles/2010-04-29-mullerons-en.html

Naik, Gautam, 'China is poised to top Japan in R&D', *Wall Street Journal*, 16 December 2010

Naisbitt, John, *Megatrends Asia: The Eight Asian Megatrends That Are Changing the World* (London: Nicholas Brealey, 1996)

Nakama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search, *Scenarios for the Future of Japan: Research Material* (Nihon Keizai Shimbun, Inc. (Nikkei) and Global Business Network, 1999)

Nakamoto, Michiyo, 'Asia: Displacement activity', *Financial Times*, 22 August 2010

Nakane, Chie, *Japanese Society*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70)Nathan, Andrew J., and Robert S. Ross, *The Great Wall and the Empty Fortress: China's Search for Security* (New York: W. W. Norton, 1997)

Naughton, Barry, *The Chinese Economy: Transitions and Growth*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2007)

—— 'China's Distinctive System: can it be a model for other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19:65 (June 2010)

New American Century Project, *Statement of Principles*, http://www.

newamericancentury.org/statementofprinciples.htm

Ng, Eric, 'China catching up with Europe on solar farm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9 April 2010

Nodskov, Kim, *The Long March to Power: The New Historic Mission of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Copenhagen: Royal Danish Defence College Publishing House, 2009)

Nolan, Peter, *China at the Crossroad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4)

——*Transforming China: Globalisation, Transition and Development* (London: Anthem Press, 2005)

Noriega, Roger F., 'China's Influence in the Western Hemisphere', statement before the House Sub-committee on the Western Hemisphere, Washington, DC, 6 April 2005

Norins, Martin R., *Gateway to Asia: Sinkiang: Frontier of the Chinese Far West* (New York: The John Day Company, 1944)

Nye, Joseph S., Jr, *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 Why the World's Only Superpower Can't Go It Alon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4)

Nyíri, Pál, 'The Yellow Man's Burden: Chinese Migrants on a Civilizing Mission', *The China Journal*, No. 56, July 2006

Oakley, David, and Anousha Sakoui, 'China offers Spain 1bn euro confdence vote', *Financial Times*, 12 July 2010

Obiorah, Ndubisi, 'Who's afraid of China in Africa? Towards An African Civil Society Perspective on China–Africa Relations', in Firoze Manji and Stephen Marks, eds, *African Perspectives on China in Africa* (Oxford: Fahamu, 2007)

OECD, *PISA 2009 Results: What Students Know and Can Do – Student Performance in Reading,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Volume 1 (Paris: OECD, 2010)

Ofon, Abah, 'South–South Co-operation: Can Africa Thrive with Chinese Investment?', in Leni Wild and David Mepham, eds, *The New Sinosphere* (London: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 2006)

Ohashi, Hideo, 'China's Regional Trade and Investment Profile', in David Shambaugh, ed., *Power Shift: China and Asia's New Dynamic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

Ohnuki-Tierney, Emiko, *Kamikaze, Cherry Blossoms, and Nationalisms:* The Militarization of Aesthetics in Japanese History(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2)

O'Neill, Jim, et al., 'China and Asia's Future Monetary System', *Goldman Sachs Global Economics Paper,* 129 (12 September 2005)

Onishi, Norimitsu, ‘US and China court Indonesia’,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10 November 2010

—— ‘US and China court Indonesia’,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10 November 2010

Oster, Shai, Dinny McMahon, and Tom Lauricella, ‘Offshore Trading in Yuan Takes Off’, *Wall Street Journal*, 14 December 2010

Ostler, Nicholas, *Empires of the World: A Language History of the World* (London: HarperCollins, 2005)

Overholt, William H., *China: The Next Economic Superpower* (London: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93)

Page, Jeremy, ‘China Tests New Political Model in Shenzhen’, *Wall Street Journal*, 18 October 2010

Pan, Lynn, *Sons of the Yellow Emperor: The Story of the Overseas Chinese* (London: Arrow, 1998)

——*The Encyclopedia of the Chinese Oversea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ark, Seo-Hyun, ‘Small States and the Search for Sovereignty in Sinocentric Asia: The Case of Japan and Korea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in Anthony Reid and Zheng Yangwen, eds, *Negotiating Asymmetry: China’s Place in Asia* (Singapore: NUS Press, 2009)

Patten, Chris, *East and West: China, Power, and the Future of East Asia* (London: Macmillan, 1998)

Perdue, Peter C., *China Marches West: 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 (Cambridge, Mass.: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 'Why Do Empires Expand?', workshop on 'Asian Expansions: The Historical Processes of Polity Expansion in Asia', Asia Research Institut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12–13 May 2006

Perkins, Dwight H., 'History, Politics, and the Sources of Economic Growth: China and the East Asian Way of Growth', in Fumio Itoh, ed., *China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Politics, Economy, and Society* (Tokyo: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Press, 1997)

Persaud, Avinash D., 'The Dollar Standard: (Only the) Beginning of the End', posted on www.opendemocracy.net

—— 'When Currency Empires Fall', posted on www.gresham.ac.uk

Pew Global Attitudes Project, *World Publics Welcome Global Trade – But Not Immigration,* 4 October 2007, posted on http://pewglobal.org

Pew Research Center, *Global Attitudes Survey 2010*, released 17 June 2010 Peyrefitte, Alain, *The Collision of Two Civilizations: The British Expedition*

to China in 1792–4 (London: Harvill, 1993)

Pilling, David, ‘Asia’s quiet anger with “big, bad” China’, *Financial Times*, 1 June 2011

—— ‘China’s bear hug has benefits for wary Taiwan’, *Financial Times*, 24 June 2010

—— ‘A recipe for trouble in China’s backyard’, *Financial Times*, 29 September 2010

—— ‘Kim Jong-il plays his aces’, *Financial Times*, 23 November 2010

—— ‘A rock lobster lesson for booming Australia’, *Financial Times*, 8 December 2010

Pohl, Otto, ‘The West’s Glossy Magazines “Go Forth and Multiply”’,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14–15 February 2004

Politi, James, ‘World Bank sees end to dollar’s hegemony’, *Financial Times*, 17 May 2011

Pollack, Jonathan 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Asian Security Order: Assessing China’s Impact’, in David Shambaugh, ed., *Power Shift: China and Asia’s New Dynamic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

Pomeranz, Kenneth, *The Great Divergence: China, Europe,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Pomfret, John, ‘US raises pressure on China to rein in N. Korea’, *Washington Post*, 6 December 2010

Porritt, Jonathon, ‘China Could Lead the Fight for a Cooler Climate’, 13 November 2007, posted on www.chinadialogue.net

Portal, Jane, ed., *The First Emperor: China’s Terracotta Army* (London:British Museum Press, 2007)

Prestowitz, Clyde, ‘The Yuan Might Shift; the Imbalances Won’t’,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1 June 2005

——*Three Billion New Capitalists: The Great Shift of Wealth and Power to the East*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6)

Pye, Lucian W., *Asian Power and Politics: Th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Authority*(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The Spirit of Chinese Politics*(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 ‘Chinese Democracy and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in Fumio Itoh, ed., *China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Politics, Economy, and Society*(Tokyo: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Press, 1997)

Quinlan, Joseph P., *The Last Economic Superpower: The Retreat of Globalization, The End of American Dominance, and What We Can Do About It*(New York: McGraw Hill, 2011)

Rajan, Raghuram G., *Fault Lines: How Hidden Fractures Still Threaten the World Economy*(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0)

Rachman, Gideon, ‘Why McCain’s Big Idea is a Bad Idea’, *Financial Times*, 5 May 2008

—— ‘Welcome to the Nuclear Club, India’, *Financial Times*, 22 September 2008

—— ‘China’s increasing influence’, *Financial Times*, 24 April 2010

Ramo, Joshua Cooper, *The Beijing Consensus* (London: Foreign Policy Centre, 2004)

Reader, John, *Missing Links: The Hunt for Earliest Man* (London: Penguin, 1999)

Reed, John, ‘Geely seals deal to buy Volvo from Ford’, *Financial Times*, 28 March 2010

Rehman, Iskander, ‘Keeping the Dragon at Bay: India’s Counter-Containment of China in Asia’, *Asia Security*, 5:2, 2009

Reid, Anthony, ‘Nationalisms in South East Asia’, seminar paper, Asia Research Institut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24 January 2006

—— and Zheng Yangwen, eds, *Negotiating Asymmetry: China’s Place in Asia* (Singapore: NUS Press, 2009). The book

is based on papers given at 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Rationalizing China's Place in Asia, 1800 to 2005', organized by the Asia Research Institut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3–4 August 2006; it is these original drafts that were my sources, so my page references may not match the published book.

Ren, Daniel, '"Harsh jail" terms for Rio Tinto four',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30 March 2010

Research-Works, *R&D: China's Growing Competitive Edge*, Shanghai, 27 February 2010.

Rice, Xan, 'China's Long March', *Observer Sport Monthly*, October 2006 Richburg, Keith B., 'Is China a rival to the US? Many Chinese think not – or

not yet', *Washington Post*, 8 February 2011

Roach, Stephen S., 'Manchurian Paradox', Morgan Stanley, 27 April 2009

Roberts, J. M., *The Triumph of the West* (London: Phoenix Press, 2001)

Rocha, John, 'A New Frontier in the Exploitation of Africa's Natural Resources: The Emergence of China', in Firoze Manji and Stephen Marks, eds, *African Perspectives on China in Africa* (Oxford: Fahamu, 2007)

Rodrik, Dani, *One Economics, Many Recipes: Globalization, 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Growth*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 'Making room for China in the world economy', December 2009, http://www.hks.harvard.edu/fs/drodrik/Research%20papers/Making% 20room%20for%20China.pdf

Rohwer, Jim, *Asia Rising: How History's Biggest Middle Class Will Change the World* (London: Nicholas Brealey, 1996)

Ross, Robert S., 'Engagement in US China Policy', in Alastair Iain Johnston and Robert S. Ross, eds, *Engaging China: The Management of an Emerging Power* (London: Routledge, 1999)

—— 'The Geography of Peace: East Asia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n Michael Brown et al., eds, *The Rise of China*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2000)

—— and Zhu Feng, eds, *China's Ascent: Power, Security, and the Futur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8)

Roubini, Nouriel, 'A presidency heading for a fiscal train wreck', *Financial Times*, 28 October 2010

Russell, John G., 'Race and Reflexivity: The Black Other in Contemporary Japanese Mass Culture', in John Whittier Treat, ed., *Contemporary Japan and Popular Culture*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 'i Press, 1996)

Ryosei, Kokubun, 'Did the Ice Melt between Japan and China?', conference on 'Nationalism and Globalisation in North-East Asia', Asia Research Centr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12 May 2007

Sachs, Jeffrey, 'Amid the Rubble of Global Finance, a Blueprint for Bretton Woods II', *Guardian*, 21 October 2008

Sands, Philippe, *Lawless World: America and the Making and Breaking of Global Rules* (London: Allen Lane, 2005)

Satoh, Haruko, *The Odd Couple: Japan and China, the Politics of History and Identity* (Japa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7 August 2006), available on http://yaleglobal.yale.edu

Saul, John Ralston, *The Collapse of Globalism and the Reinvention of the World* (London: Atlantic Books, 2005)

Sautman, Barry, 'Myths of Descent, Racial Nationalism and Ethnic Minoritie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Frank Dikötter, ed., *The Construction of Racial Identities in China and Japan: Historical and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 (London: Hurst and Company, 1997)

—— 'Honour and Shame? China's Africa Ties in Comparative Context', in Leni Wild and David Mepham, eds, *The New Sinosphere* (London: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 2006)

—— ‘Friends and Interests: China’s Distinctive Links with Africa’, *African Studies Review*, 50:3 (December 2007)

—— and Ellen Kneehans, ‘The Politics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 in Hong Kong’, *Maryland Series in Contemporary Asian Studies*, 2 (2000)

—— and Yan Hairong, ‘East Mountain Tiger, West Mountain Tiger: China, the West, and “Colonialism” in Africa’, *Maryland Series in Contemporary Asian Studies,* 3 (2006)

Schäfer, Daniel, ‘China and Germany: Reflected glory’, *Financial Times*, 18 January 2011

Schell, Jonathan, *The Unconquerable World: Power, Nonviolence, and the Will of the People* (London: Allen Lane, 2003)

Schiller, Ben, ‘The Axis of Oil: China and Venezuela’, 2 March 2006, posted on www.opendemocracy.net

Schilling, Mark, *The Encyclopedia of Japanese Pop Culture* (New York:Weatherhill, 1997)

Sen, Amartya, *Development as Freedo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The Argumentative Indian: Writings on Indian History, Culture and Identity* (London: Allen Lane, 2005)

Sender, Henry, 'China has much to gain from supporting the euro', *Financial Times*, 3 February 2011

Shambaugh, David, ed., *The Modern Chinese Stat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Modernizing China's Military: Progress, Problems, and Prospect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 'China Engages Asia: Reshaping the Regional Ord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9:3 (Winter 2004/5)

—— ed., *Power Shift: China and Asia's New Dynamic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

—— 'Return to the Middle Kingdom? China and Asia in the Early Twenty-first Century', in David Shambaugh, ed., *Power Shift: China and Asia's New Dynamic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

——*China's Communist Party: Atrophy and Adapta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8)

—— 'China flexes its soft power',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8 June 2010

—— 'Coping with Conflicted China',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Winter 2011

—— Eberhard Sandschneider and Zhou Hong, *China–Europe Relations:* Perceptions, Policies and Prospects(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Shell International Ltd, *Shell Global Scenarios to* 2025*: The Future Business Environment - Trends, Trade-offs and Choices* (London: 2005)

Shen, Boming, 'The Challenges Ahead: China's Membership in the WTO', 2002, posted on www.cap.Imu.de/transatlantic/download/Shen_Bom ing.doc

Shen, Simon, 'A constructed (un)reality on China's re-entry into Africa: the Chinese online community perception of Africa (2006–2008)',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 47: 3 (2009)

Shenkar, Oded, *The Chinese Century: The Rising Chinese Economy and Its Impact on the Global Economy, the Balance of Power and Your Job* (New Jersey: Wharton School Publishing, 2006)

Shi Anbin, 'Mediating Chinese-ness: Identity Politics and Media Culture in Contemporary China', in Anthony Reid and Zheng Yangwen, eds, *Negotiating Asymmetry: China's Place in Asia* (Singapore: NUS Press, 2009)

Shi Yinhong, 'China and the North Korea Nuclear Problem: Diplomatic Initiative, Strategic Complexities, and Relevance of Security Multilateralism', unpublished paper, Beijing, 2004

—— 'China's "Capitalist Transition" and China's Foreign Policy', unpublished paper, Beijing, 2005

—— 'The General Situation of the China‐Japan Relations and the Imperative for a Composite Strategy', workshop on Sino-Japanese relations, Renmin-Aichi University conference, Beijing, 2005

—— 'China and the North Korea Nuclear Problem: Diplomatic Initiative, Strategic Complexities, and Relevance of Security Multilateralism', in Guoguang Wu and Helen Lansdowne, eds, *China's Turn to Multilateralism: Foreign Policy and Regional Securit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 'The Impact of China's Capitalist Transition on Foreign Policy', in Christopher A. McNally, ed., *China's Emergent Political Economy: Capitalism in the Dragon's Lai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 'China‐Japan Political Relations and the Imperative Strategic Management', in Niklas Swanström and Ryosei Kokubun, eds, *Sino-Japanese Relations: The Need for Conflict Prevention and Management* (Newcastle upon Tyne, UK: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2008)

Shibusawa, Masahide, Zakaria Haji Ahmad and Brian Bridges, *Pacific Asia in the 1990s* (London: Routledge, 1992)

Shih, Toh Han, 'China high-speed rail to take global lead by 2012',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26 October 2009

—— 'Rail plan may boost China's regional sway',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22 November 2010

Shin, Leo K., *The Making of the Chinese State: Ethnicity and Expansion on the Ming Borderland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Shirk, Susan L., *China: Fragile Superpowe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Shirouzu, Norihiko, 'Volvo's Big China Gamble', *Wall Street Journal*, 14 September 2010

Smith, Peter, 'Australia bars China bid for Oz Minerals', *Financial Times*, 27 March 2009

—— 'China drives engine of Australia's success', *Financial Times*, 2 Feb-ruary 2010

So, Hirano, 'Study of Contemporary Political History of East Asian Region - from the Chain Effect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Nationalism Perspective', workshop on Sino-Japanese relations, Renmin-Aichi University conference, Beijing, 2005

Song, Weiquiang, seminar paper, Aichi University, 21 May, 2005

—— 'Study on Massive Group Incidents of Chinese Peasants', Ph.D. dissertation, Nankai University, 20 April 2006

Song Jung-a, ‘G20 agrees historic reform of IMF’, *Financial Times*, 23 October 2010

—— with Robert Cookson, ‘South Korea seeks to shift reserves to China’, *Financial Times*, 4 May 2011

Soros, George, *The Crisis of Global Capitalism*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1998)

Spence, Jonathan D., *The Chan’s Great Continent: China in Western Minds* (New York: W. W. Norton, 1998)

——*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2nd edn (New York: W. W. Norton, 1999)Spence, Michael, ‘The west is wrong to obsess about the renminbi’, *Financial Times*, 21 January 2010

Stanlaw, James, ‘English in Japanese Communicative Strategies’, in Braj B. Kachru, ed., *The Other Tongue: English Across Cultures* (Urbana a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2)

‘Statement from Bric IMF directors’, *Financial Times*, 24 May 2011

Steele, Valerie, and John S. Major, *China Chic: East Meets Wes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9)

Stephens, Philip, ‘A Futile European Contest for Obama’s Ear’, *Financial Times*, 10 November 2008

Stevenson, Alexandra, ‘India losing English advantage to China’, *Financial Times*, 19 November 2009

—— ‘Google’s China market share declining’, *Financial Times*, 22 April 2011

Stiglitz, Joseph E., ‘Thanks for Nothing’, *Atlantic Monthly*, October 2001

——*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London: Allen Lane, 2002)

—— ‘Development in Defiance of the Washington Consensus’, *Guardian*, 13 April 2006

——*Making Globalization Work* (London: Allen Lane, 2006)

—— and Linda J. Bilmes, *The Three Trillion Dollar War: The True Cost of the Iraq Conflict*(London: Allen Lane, 2008)

Suettinger, Robert L., *Beyond Tiananmen: The Politics of US–China Relations 1989–2000*(Washington, 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2003)

Sugihara, Kaoru, ‘Agriculture and Industrialization: The European Experience’, in Peter Mathias and John Davis, eds, *Agriculture and Industrialization* (Oxford: Blackwell, 1996)

Sun Shuyun, *The Long March* (London: HarperPress, 2006)

——*A Year in Tibet: A Voyage of Discovery* (London: HarperPress, 2008)Suryadinata, Leo, *Southeast Asian Chinese: The Socio-Cultural Dimension* (Singapore: Times Academic Press, 1995)

Swaine, Michael D., 'China's Regional Military Posture', in David Shambaugh, ed., *Power Shift: China and Asia's New Dynamic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

Symonds, Matthew, 'A global love affair', A special report on cars in emerging markets', *The Economist*, 15 November 2010

Tadashi, Yamamoto, ed., *Deciding the Public Good: Governance and Civil Society in Japan* (Tokyo: Japan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Exchange, 1999)

Terrill, Ross, *The New Chinese Empire: And What It Mea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3)

Therborn, Göran, *European Modernity and Beyond: The Trajectory of European Societies, 1945–2000*(London: Sage, 1995)

——*Between Sex and Power: Family in the World, 1900–2000*(London:Routledge, 2004)

Thirlwell, Mark, 'Dealing with the Dragon: Australia and Chinese Inward Investment', 1 April 2010, *Clingendael Asia Studies*

Thomas, Bella, 'What the World's Poor Watch on TV', *Prospect*, 82 (January 2003)

Thompson, Chris, '"We can do the job fine from here"', *FT Magazine*, 19/20 June 2010

Tong, Shijun, *Dialectics of Modernisation* (Bergen: University of Bergen, 1994)

Torode, Greg, and Minnie Chan, 'Vietnam buys submarines to counter China',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7 December 2009

Tou raine, A., *C ri ti que de la mo d er ni té* (Pa ri s: Fa ya r d, 1992)

Treat, John Whittier, ed., *Contemporary Japan and Popular Culture*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 'i Press, 1996)

Trompenaars, Fons, *Riding the Waves of Culture: Understanding Cultural Diversity in Business* (London: Nicholas Brealey, 1993)

Tu Wei-ming, *The Living Tree: The Changing Meaning of Being Chinese Toda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Tucker, Sundeep, 'Chinese déjà vu', *Financial Times*, 9 June 2010 Tumulty, Karen, and Ed O'Keefe, 'The government tends to resist reorganisation', *Washington Post*, 28 January 2011

Tyler, Christian, *Wild West China: The Taming of Xinjiang* (London: John Murray, 2003)

Ueda, Atsushi, ed., *The Electric Geisha: Exploring Japan's Popular Culture* (Tokyo: Kodansha International, 1994)

Ulrich, Jing, ‘China Holds the Key to Food Prices’, *Financial Times,* 7 November 2007 United Nations, *UN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Uni te d Na tion s Deve lo p men t P ro g ra m me, *Ra p po r t mon dia l sur le déve loppement humain* 1999 (Paris: De Boeck Université, 1999)

United States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Global Trends 2025: A Transformed World* (November 2008)

Van Hear, Nicholas, *New Diasporas: The Mass Exodus, Dispersal and Regrouping of Migrant Communities* (London: UCL Press, 1998)

Veriah, Harinder: see the website in her memory at www.harinderveriah.com Vermander, Benoit, ‘The Law and the Wheel’, *China Perspectives*, 24 (July–August 1999), Hong Kong Vogel, Ezra F., *The Four Little Dragons: The Spread of Industrialization in East Asi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Is Japan Still Number One?* (Selangor Darul Ehsan, Malaysia: Pelanduk Publications, 2000)

Vuving, Alexander, ‘Traditional and Modern Sino-Vietnamese Relations’, in Anthony Reid and Zheng Yangwen, eds, *Negotiating Asymmetry: China’s Place in Asia* (Singapore: NUS Press, 2009)

Wade, Geoff, ‘Some Topoi in Southern Border Historiography during the Ming (and Their Modern Relevance)’, in Sabine Dabringhaus and Roderich Ptak, eds, *China and Her Neighbours: Borders, Visions of the Other, Foreign Policy 10th to 19th Century* (Wiesbaden: Harrassowitz, 1997)

—— ‘Don’t Be Deceived: Our History Really is Under Serious Attack’, *Canberra Times,* 27 April 2006 Wade, Robert, *Governing the Market: Economic Theory and 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East Asian Industrializa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Waldmeir, Patti, ‘Chinese aim to be king of the road’, *Financial Times*, 22 April 2010

Waley-Cohen, Joanna, *The Sextants of Beijing: Global Currents in Chinese History* (New York: W. W. Norton, 1999)

Wallerstein, Immanuel, *Geopolitics and Geoculture: Essays on the Changing World-syste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Wang, Bijun, and Yiping Huang, ‘Is there a China model of overseas direct investment?’, http://www.eastasiaforum.org/2011/04/12/is-there-a-china-model-of-overseas-direct-investment/

Wang Chaohua, ed., *One China: Many Paths* (London: Verso, 2003)

Wang Chih-ming, ‘Capitalizing the Big Man: Yao Ming, Asian America, and the China Global’,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5:2 (2004)

Wang Gungwu, ‘Early Ming Relations with Southeast Asia: A Background Essay’, in John King Fairbank, ed.,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China and the Chinese Overseas* (Singapore: Times Academic Press, 1991)

——*The Chineseness of China: Selected Essay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Joining the Modern World: Inside and Outside China* (Singapore and London: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and World Scientific 2000)

——*The Chinese Overseas: From Earthbound China to the Quest for Autonomy* (London and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The Context of a New Beginning’, in David Shambaugh, ed., *Power Shift: China and Asia’s New Dynamic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

Wang Hui, *China’s New Order*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The End of the Revolution: China and the Limits of Modernity*(London: Verso, 2009)

Wang Jisi, 'China' s Changing Role in Asia' , available at www.irchina.org

—— Interview with Yoichi Funabashi,*The Asahi Shimbun*, 12 June 2010 Wang Ling-chi and Wang Gungwu, eds,*The Chinese Diaspora: Selected*

Essays, 2 vols (Singapore: Times Academic Press, 1998)

Wang Xiaodong,*Chinese Youth' s Views on the World: A Survey Report* (Beijing: China Youth Research Centre, 2003)

—— 'Chinese Nationalism under the Shadow of Globalisation' , Lectur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7 February 2005

Wang Yizhou, 'Political Stabilit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Globalisation - Another Perspective on Asia' s Financial Crisis' , unpublished article, Beijing, 2000

—— ed.,*Construction within Contradiction: Multiple Perspectiv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Beijing: China Development Publishing House, 2003)

Wang Zhengyi, 'Conceptualising Economic Security and Governance: China Confronts Globalisation' ,*Pacific Revie*, 17:4 (2004)

—— 'Contending Regional Identity in East Asia: ASEAN Way and Its Implications', unpublished paper, 2001

Warburton, John, and Leo Horn, 'China's Crisis: A Development Perspective (Part One)', 25 October 2007, posted on www.chinadialogue.net

Ward, Andrew, 'The old world order is melting away', *Financial Times*, 17 December 2009

—— and Geoff Dyer, 'Nineteen countries shun Nobel Prize ceremony', *Financial Times*, 7 December 2010

Wassener, Bettina, and Andrea Deng, 'Taking the high road, with 1200 aboard',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18 August 2010

Watts, Jonathan, *When A Billion Chinese Jump: How China Will Save Mankind - or Destroy It* (London: Faber and Faber, 2010)

Weidenbaum, Murray, and Samuel Hughes, *The Bamboo Network: How Expatriate Chinese Entrepreneurs are Creating a New Economic Superpower in Asia*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6)

Wheatley, Alan, 'Preparing for China's tourist boom',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21 December 2010

Wild, Leni, and David Mepham, eds, *The New Sinosphere: China in Africa* (London: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 2006)

Wilkinson, Endymion, *Japan Versus the West: Image and Reality* (London:Penguin, 1990)

Williams, Richard, 'It' s the End of the World As We Know It (and Cricket Will Be Fine)', *Guardian*, 22 April 2008

Wilsdon, James, and James Keeley, *China: The Next Science Superpower?*

(London: Demos, 2007)

Wilson, Dominic, and Anna Stupnytska, 'The N-1 1: More Than an Acronym', *Goldman Sachs Global Economics Papers*, 153 (28 March 2007)

—— and Roopa Purushothaman, 'Dreaming with BRICs: The Path to 2050', *Goldman Sachs Global Economics Papers*, 99 (2003)

Wolf, Martin, 'Why America and China Cannot Afford to Fall Out', *Financial Times,* 8 October 2003

——*Why Globalization Work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5)

—— 'The Brave New World of State Capitalism', *Financial Times*, 16 October 2007

—— 'Life in a Tough World of High Commodity Prices', *Financial Times*, 4 March 2008

—— 'Why Agreeing a New Bretton Woods is Vital', *Financial Times*, 4 November 2008

—— 'Why China's exchange rate policy concerns us', *Financial Times*, 8 December 2009

—— 'Wen is right to worry about China's growth', *Financial Times*, 21 September 2010

—— 'Faltering in a stormy sea of debt', *Financial Times*, 19 April 2011

—— 'Manufacturing at risk from global shift to Asia', *Financial Times*, 20 May 2011

—— 'Europe should not control the IMF', *Financial Times*, 24 May 2011 Wolferen, Karel van, *The Enigma of Japanese Power: People and Politics in*

a Stateless Nation(New York: Vintage, 1990)

Wong, Herman, 'On Global Catwalks, a New Face That's Hot – Asian', *China Daily*, 24 May 2006

Wong, Kandy, 'Subsidy doubts delay BYD's electric car', *Financial Times*, 24 February 2010

Wood, Frances, *No Dogs and Not Many Chinese* (London: John Murray, 1998)

Woodall, Pam, 'The New Titans', survey, *The Economist*, 16 September 2006

Wooldridge, Adrian, ‘After Bush: A Special Report on America and the World’, *The Economist*, 29 March 2008, p. 10

World Bank, *The East Asian Miracle: Economic Growth and Public Policy* (Washington, DC: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At China's Table: Food Security Options* (Washington, DC: 1997)

——*China Engaged: Integration with the Global Economy* (Washington, DC: 1997)

——*Clear Water, Blue Skies: China's Environment in the New Century* (Washington, DC: 1997)

——*Financing Health Care: Issues and Options for China* (Washington, DC: 1997)

——*Old Age Security: Pension Reform in China* (Washington, DC:1997)

——*Sharing Rising Incomes: Disparities in China* (Washington, DC:1997)

—— ‘Will Resilience Overcome Risk? East Asia Regional Outlook’, November 2007, posted on www.worldbank.org

Wright, Robert, ‘China on track to join ranks of train manufacturers’, *Financial Times*, 1 March 2010

—— Wright, Tom, ‘Wen touts deals and trade ties on trip to India’, *Wall Street Journal*, 16 December 2010

Wu, David Y. H., and Sidney C. H. Cheung, eds, *The Globalization of Chinese Food* (London: RoutledgeCurzon, 2002)

Wu, Friedrich, 'The Renminbi Challenge: the future role of the Chinese currency',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Fall 2009

www.ft.com/FT500

www.timeshighereducation.co.uk/world-university-rankings/2010-201 1 top-200.html

Xie, Andy, *Asia/Pacific Economic*, report for Morgan Stanley, November 2002

Xinran, *What the Chinese Don't Eat* (London: Vintage Books, 2006)

Xu, Gao,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n China: How big are they?' EastAsia Pacific/Blog, World Bank, posted 19 January 201

Xu, Gary Gang, *Sinascape: Contemporary Chinese Cinema* (Oxfor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07

Yahuda, Michael, *Hong Kong: China's Challenge* (London: Routledge, 1996)

—— 'The Evolving Asian Order: The Accommodation of Rising Chinese Power', in David Shambaugh, ed., *Power Shift: China and Asia's New Dynamic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

Yan Xuetong, ‘The Rise of China in Chinese Eye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10:26 (2001)

—— ‘The Instability of China–US relations’,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2010

——*Ancient Chinese Thought, Modern Chinese Power*(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

Yao, Shujie, ‘China will learn from failed Chinalco-Rio deal’, *Financial Times*, 7 June 2010

Yardley, Jim, ‘China Offers Defense of Its Darfur Stance’,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8–9 March 2008

—— ‘After the Fury in Tibet, Firm Hand Trembles’,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18 March 2008

—— and Somini Sengupta, ‘Beijing Blames the Dalai Lama’,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19 March 2008

Yoshino, Kosaku,*Cultural Nationalism in Contemporary Japan* (London:Routledge, 1992)

Youngs, Richard,*Europe’s Decline and Fall: The Struggle against Global Irrelevance*(London: Profile Books, 201

Yu Bin, ‘China and Russia: Normalizing Their Strategic Partnership’, in David Shambaugh, ed.,*Power Shift: China and Asia’s New Dynamic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

Yu Yongding, 'Opinions on Structure Reform and Exchange Rate Regimes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 unpublished paper, Japanese Ministry of Finance, 2000

——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orld Economy', unpublished paper, Nikkei Simbon Symposium, 5 April 2005

—— 'China's Macroeconomic Development, Exchange Rate Policy and Global Imbalances', unpublished paper, Asahi Shimbun Symposium, October 2005

—— 'China's Rise, Twin Surplus and the Change of China's Development Strategy', unpublished paper, Namura Tokyo Club Conference, Kyoto, 21 November 2005

—— 'China's Structural Adjustment', unpublished paper, Seoul Conference, 2005

—— 'China's stimulus shows the problem of success', *Financial Times*, 25 August 2009

—— 'A different road forward', *China Daily*, 23 December 2010

Zakaria, Fareed, *The Post-American World* (London: Allen Lane, 2008)

Zha Daojiong, 'China's Energy Security and It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hina and Eurasia Forum Quarterly*, 3:3 (2005)

Zhang Feng, ‘Rethinking the “Tribute System”: Broadening the Conceptual Horizon of Historical East Asian Politics’,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ume 2, 2009

Zhang, Peter G., *IMF and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1998

Zhang Wei-Wei, ‘The Allure of the Chinese Model’,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1 November 2006

Zhang Yunling, *East Asian Regionalism and China* (Beijing: World Affairs Press, 2005)

—— ed., *Designing East Asian FTA: Rationale and Feasibility* (Beijing: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2006)

—— and Tang Shiping, ‘China’s Regional Strategy’, in David Shambaugh, ed., *Power Shift: China and Asia’s New Dynamic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

Zhao Suisheng, ed., *Chinese Foreign Policy: Pragmatism and Strategic Behavior* (New York: M. E. Sharpe, 2004)

——*A Nation-State by Construction: Dynamics of Modern Chinese Nationalis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Zheng Yangwen, ‘Move People Buttress Frontier: Regime Orchestrate [*sic*] Migration-Settlement in the Two Millennia’, workshop on ‘Asian Expansions: The Historical

Processes of Polity Expansion in Asia', Asia Research Institut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12–13 May 2006

Zheng Yongnian, *Discovering Chinese Nationalism in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Will China Become Democratic?: Elite, Class and Regime Transition* (Singapore: EAI, 2004)

Zhou Ping and Loet Leydesdorff, 'The Emergence of China as a Leading Nation in Science', *Research Policy*, 35 (2006)

Zhu Feng, 'Why Taiwan Really Matters to China', 2004, available at www.irchina.org

—— 'Regionalism, Nationalism and China's Regional Activism in East Asia', unpublished paper, 2006

—— 'China Policy Toward North Korea: A New Twist', *PacNet*, Pacific Forum CSIS, No. 60, 8 December 2010

Ziegler, Dominic, 'Reaching for a Renaissance: A Special Report on China and Its Region', *The Economist*, 31 March 2007